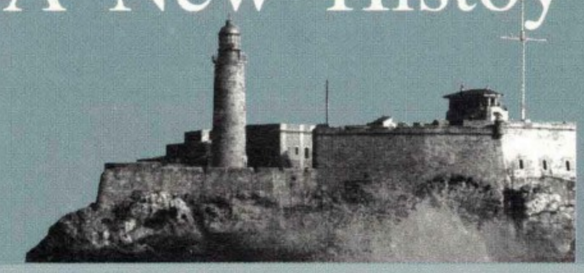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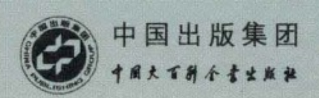


古巴史

理查德·戈特 著 徐家玲 译

CUBA A New Histo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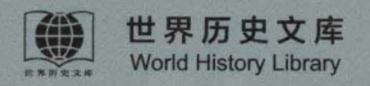




CUBA A New Histo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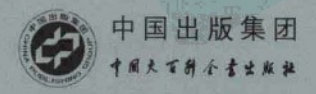
定价：58.00元



古巴史

理查德·戈特 著 徐家玲 译

CUBA A New History



图字:01 -2011 -0510

CUBA:A NEW HISTORY

by

RICHARD GOT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巴史/(英)戈特著;徐家玲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7

ISBN 978 -7 -5000 -9198 -1

(世界历史文库)

Ⅰ. ①古… Ⅱ. ①戈… ②徐… Ⅲ. ①古巴—历史 Ⅳ. ①K75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8633 号

责任编辑 郭银星

责任印制 倪 亮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88390635

印 刷 北京永生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960 1/16

印 张 33.25

字 数 410 千字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 80 种，2 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

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鸣 谢

这本在古巴写作的书，若没有古巴驻英国大使何塞·费尔南德斯·德科西奥·罗德里格斯（José Fernandez de Cossio Rodríguez）和新闻参赞勒内·蒙佐特（Rene Monzote）的慷慨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他们对这个项目给予了友好的关切，开放了许多渠道，还帮我争取到了对许多政府要员的采访。我最初是在 1963 年带着休·托马斯（Hugh Thomas）的介绍信到达哈瓦那的。数年后，我带着从他的女儿贝拉（Bella）那里得到的另一份相似却又不尽相同的名单踏上了归途。我对他们所给予的所有同事般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古巴的这些年，我得到了我的老朋友帕布洛·阿曼多·费尔南德斯（Pablo Armando Fernández）和他的妻子马鲁嘉（Maruja）的关照，同他们有过多次愉快的交谈；费尔·阿吉（Phil Agee）也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从一个美国中情局（CIA）特工变成了一个旅行代理”的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乐天派，同时也是美国—古巴交流的促进者。在研究古巴的历史时，我受到了一批经常在中世纪修士般的条件下仍然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的历史学家们的影响，他们是：豪尔赫·伊巴拉（Jorge Ibarra）、菲·伊戈勒西阿斯（Fé Iglesias）、吉列尔莫·希门尼斯（Guillermo Jimēnez）、费尔南多·马丁涅斯（Fernando Martínez）、欧尔佳·波图翁多（Olga Portuondo）和埃德华多·托莱斯－格瓦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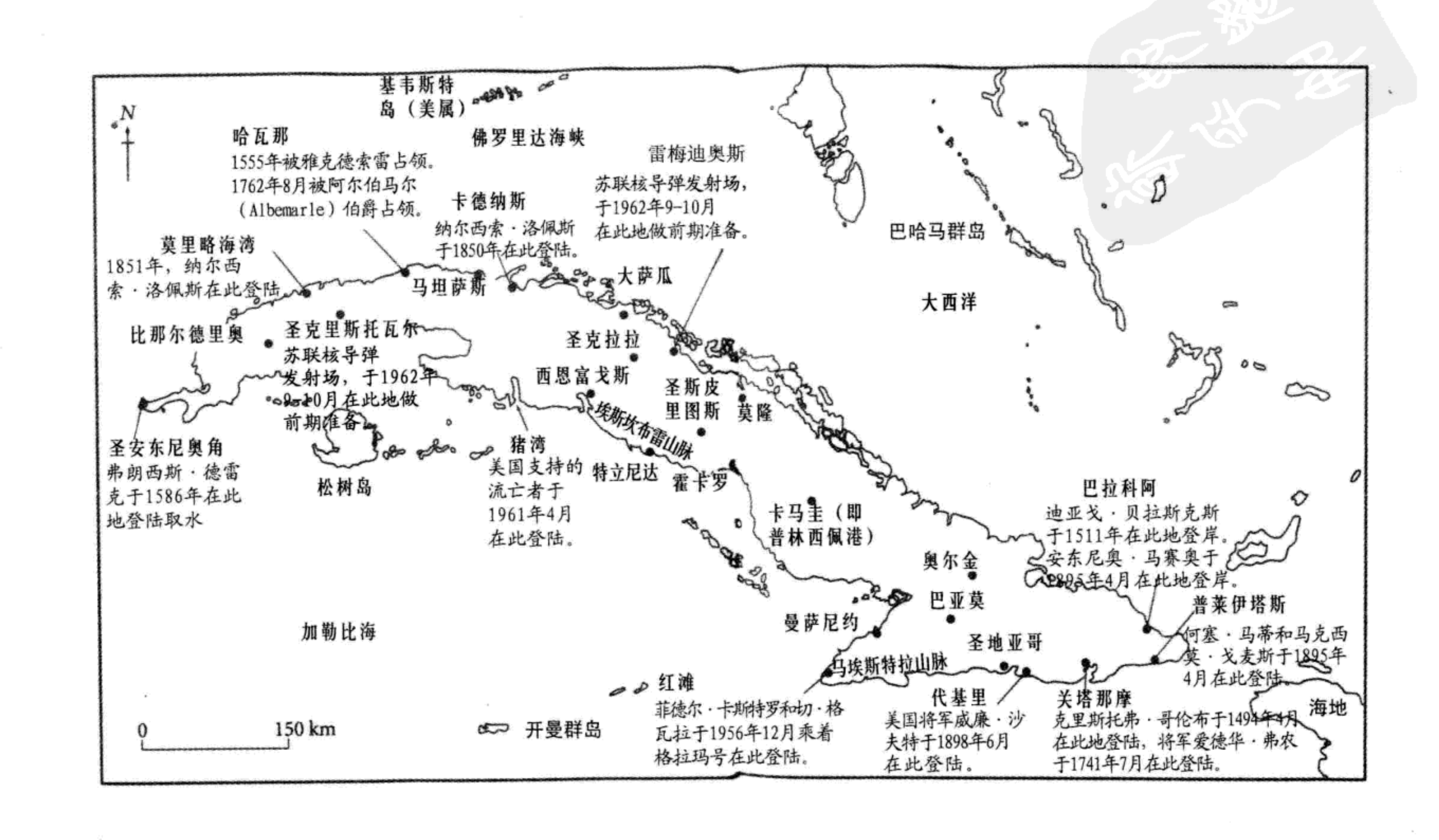
(Eduardo Torres－Cuevas)，他们在不同的方面给予我相应的指导。

在伦敦，我得到了玛丽·图尔内（Mary Turner）的帮助，她经常给我提出有益的建议；艾米莉·莫里斯（Emily Morris）则在古巴经济方面给予我指导；维多利亚·布里廷（Victoria Brittain）给我提供非洲方面的知识；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曾与我进行的关于古巴的谈话使我受益终身。还有其他许多人，包括阿利斯泰尔·亨内西（Alistair Hennessy）、弗雷德·哈利迪（Fred Halliday）、托尼·卡普西亚（Tony Kapcia）、哈尔·克莱帕克（Hal Klepak）和让·斯塔布斯（Jean Stubbs），都有意无意地给了我启发和鼓励。同时，马克西米利·阿沃莱伊斯（Maximilien Arvelaiz）重新唤起了我对现代拉丁美洲史的兴趣。

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亚当·弗洛德海姆（Adam Freudenheim，现就职于企鹅出版社）最先提出了关于这本书的设想，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积极自信的编辑。十分荣幸的是，独具慧眼的桑迪·查普曼（Sandy Chapman）成为了我的终审编辑。和善的伦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院院长詹姆斯·邓克利（James Dunkerley）对我的初稿提出过周到缜密的意见，对此我不胜感激。

我的妻子费雯·阿什利（Vivien Ashley）在古巴之旅中一直激励着我，陪伴着我，我对她表示特别的感谢，同时也对切尔西和威斯敏斯特（Chelsea & Westminster）医院内视镜室的杰里米·汤普森（Jeremy Thompson）及其全体工作人员表示特别的感谢，他们帮助我熬过了一段漫长而困难的时光。

理查德·戈特（Richard Gott）
伦敦和哈瓦那，2004 年



N
基韦斯特岛（美属）
佛罗里达海峡
哈瓦那
1555年被雅克德索雷占领。
1762年8月被阿尔伯马尔（Albemarle）伯爵占领。
卡德纳斯
纳尔西索·洛佩斯于1850年在此登陆。
雷梅迪奥斯
苏联核导弹发射场，于1962年9–10月在此地做前期准备。
巴哈马群岛
莫里略海湾
1851年，纳尔西索·洛佩斯在此登陆
马坦萨斯
大萨瓜
大西洋
比那尔德里奥
圣克里斯托瓦尔
苏联核导弹发射场，于1962年9–10月在此地做前期准备
圣克拉拉
西恩富戈斯
圣斯皮里图斯
莫隆
埃斯坎布雷山脉
圣安东尼奥角
弗朗西斯·德雷克于1586年在此地登陆取水
松树岛
猪湾
美国支持的流亡者于1961年4月在此登陆。
特立尼达
霍卡罗
卡马圭（即普林西佩港）
巴拉科阿
迪亚戈·贝拉斯克斯于1511年在此地登岸。安东尼奥·马赛奥于1895年4月在此地登岸。
奥尔金
巴亚莫
曼萨尼约
圣地亚哥
普莱伊塔斯
何塞·马蒂和马克西莫·戈麦斯于1895年4月在此登陆。
加勒比海
马埃斯特拉山脉
红滩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于1956年12月乘着格拉玛号在此登陆。
代基里
美国将军威廉·沙夫特于1898年6月在此登陆。
关塔那摩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1494年4月在此地登陆，将军爱德华·弗农于1741年7月在此登陆。
海地
0
150 km
开曼群岛

序　言

1963 年 10 月，我第一次造访古巴。当时，时常鞭笞加勒比海的大飓风刚从这座岛屿的中心和东部横扫而过。弗洛拉（Hutticane Flora）飓风摧毁了咖啡作物，毁灭了田地和农庄，毁坏了公路、铁路和桥梁，并且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同时也像一个典型的西班牙殖民时代的总督那样，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担负起了救援工作。在每个夜晚的电视节目中，他都在不屈不挠地进行着抵御洪水的斗争，鼓励其饱受磨难的人民："革命的力量比自然更加强大。"我在那个月还经历过另外一件不幸的事件，是在圣伊莎贝尔德拉斯拉哈斯（Santa Isabel de Las Lajas）举行的"节奏之王"贝尼·摩尔（Beny Moré）的葬礼。他是一名歌唱家，直到今天他仍被公认为是古巴最伟大的歌唱家之一。他的灵柩被一队士兵抬着，数以千计的送葬者挤满了乡村的街道。 1

那时的哈瓦那仍旧是一个富有且繁华的首都。它那殖民时代的建筑虽然已被夷为平地，但是它广阔的郊区——那里的小宫殿中挤满了享有政府津贴的乡下孩子——与美国南部那些引人注目的城市相比，别无二致。色彩鲜艳且富于想象力的招贴画仍然在醒目地宣传革命，据说是由美国的智威汤逊（J. Walter Thompson）广告公司（其在哈瓦那的分部已经完全投向革命）的平面设计师设计的。对于一个来自于

堕落、颓废并且仍然受到战争蹂躏的欧洲的来访者来说，“共产主义”的古巴比它残存的资本主义的虚饰外表更有吸引力。我为伦敦的左翼周刊《论坛报》（Tribune）有所保留地记录下了我的第一印象：

> 现在古巴革命即将进入第六个年头，令人咋舌的自信仍反映在革命的每个方面。许多事情可能会使人们对古巴心存不满，但是人们永远不能否认一个最重要的客观事实：这场革命仍然广受欢迎。中央集权统治的这五年，是激情大于其控制能力的五年；是充分认识到自我错误的五年；是美国敌意不断增长，直至以现在的封锁为顶点的五年；是资源匮乏日益严重的五年。所有这些，没有一样真正减弱了古巴革命的热情，或者有损于它的吸引力。

在那个年代，乘坐西班牙伊比利亚航空公司的英国造涡轮螺旋桨式子爵型飞机，从欧洲飞到古巴需要24小时，途经中部大西洋，在沿途的大部分岛屿起降。我去古巴时随身带着匈牙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巴洛夫（Thomas Balogh）的两本著作——所有追求进步的拉丁美洲经济学家都要阅读的著作，还有一小块装在瓷罐里的斯提尔顿奶酪。

这块奶酪购于伦敦男人街（杰明街）的一家颇有名气的奶酪店——帕克斯顿和惠特菲尔德奶酪店（Paxton and Whitfield），是我的一位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的智利同事克劳迪奥·维利茨（Claudio Véliz）送给我的，他在那里负责拉丁美洲项目。在刚刚访问哈瓦那返回后，克劳迪奥认为，一块斯提尔顿的熟奶酪是送给古巴共产党的幕后智囊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Carlos Rafael Rodríguez）最为合适的礼物。那一代的拉丁美洲共产主义者们（罗德里格斯于1943年加入巴蒂斯塔的内阁）都有着资产阶级的爱好，就像后来我从帕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那位智利诗人那里发现的。他享受着崇拜者对他所表示的敬意，即成箱的威士忌和罐装的鱼子酱。

哈瓦那机场的官员们对斯提尔顿奶酪表现得十分紧张和谨慎，他

们用织针去刺它，以确认它不是一枚炸弹。紧随失败的猪湾入侵之后，美国筹划的旨在破坏古巴政权的“猫鼬行动”最近已经被放弃，但是迈阿密的流亡团体对这座岛屿的恐怖袭击仍旧频繁发生。据之后由美国中情局公开的一则报告称，在11月，也就是我来此的一个月后，一名间谍在巴黎将一支钢笔枪交给了古巴的联络人，以便用它来暗杀卡斯特罗——就在美国总统肯尼迪遭枪击的当天。所以说，古巴人对待那些不速之客携带的礼物持谨慎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在哈瓦那的那段时间里，维利茨委托当时的古巴工业部长切·格瓦拉，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季刊《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撰写文章。我的任务之一，就是去接收他的手稿。我被介绍给多位在格瓦拉的经济部工作的拉丁美洲人，不久之后，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就能够在这座岛屿上游历，近距离地观察革命，同时等待一个与格瓦拉会面的机会。

我驱车前往比那尔德里奥（Pinar del Rio），坐飞机前往圣地亚哥，然后在马埃斯特腊的群山中穿行，去探访卡斯特罗原来的游击队营地。哈瓦那通往圣地亚哥的道路被洪灾阻塞，想要从这座城市出行，只能依靠一辆苏联赠送的四轮驱动的吉普车。回到哈瓦那，在我入住的宾馆门口，我看到卡斯特罗正从车里出来，于是我用了一晚上的时间聆听他在革命广场集会上的讲话。我与安东尼奥·努涅斯·希门尼斯（Antonio Nunez Jimenez）进行了面谈，他是游击战的专家，曾经为格瓦拉介绍过有关古巴独特的地理地势问题。我与尼古拉斯·纪廉（Nicolas Guillen）会过面，他是一个来自激进家庭的古巴黑人诗人，最后我终于能够在我们进一步讨论最新的农业改革——这一个小时中我们谈论的令人兴奋的话题——之前将那块现在多少有些潮气的斯提尔顿奶酪送给卡洛斯·拉斐尔。我甚至为格瓦拉的部里那些满心疑惑的官员们做了关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讲座。

直到最后一个晚上，我才见到了格瓦拉本人。我被带到了一个在苏联大使馆花园中举办的招待会上，那是一个例行的外交庆典，每年都会举办，以庆祝十月革命的周年纪念日，受邀的古巴人因新奇而兴

3

奋不已。午夜之后，格瓦拉在一个由朋友、保镖、随行人员组成的小团体的陪伴下，戴着他标志性的黑色贝雷帽，穿着敞开到腰部的衬衣，阔步走进了会场。他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在过度仰慕音乐家的时代来临以前，他就已经拥有了摇滚明星般的耀眼光环。无论正在做什么事情，人们都停了下来，只是注视着这位革命的缔造者。“如果他进入一间屋子，所有的事情都会围着他转……”一位有着相似经历的阿根廷记者——朱莉娅·科斯滕拉对正在为格瓦拉传记做访谈的乔恩·李·安德森（Jon Lee Anderson）如是说，“上天赐予他无与伦比的吸引力……他有着与生俱来的无法估量的魅力。”这是恰如其分的描述。

格瓦拉在世的时候，拥有超凡的吸引力，当他死后成为曼特尼亚[①]式的偶像人物及安迪·沃霍尔时代流行音乐招贴画上的一个迷人形象之前很久，就是如此。就像特洛伊的海伦一样，他拥有让人们愿意为他而死的魅力。在哈瓦那的那个温暖的秋夜，他坐在使馆花园的一个角落里，所有人都聚集在他的周围。人们互相介绍，热烈地交谈。我没有记住当时人们所讨论的东西。那时，我仅是一个年轻的、学识浅薄的、略通西班牙语的初涉政海者，如同飞蛾那样——像那些来自欧洲和美洲的数以千计的叛逆者和冒险家一样——被炽烈的革命火焰吸引到古巴来。格瓦拉有些随意地告诉我，他还没有写完我要取走的那篇文章，全文会在几个星期后被邮寄到伦敦去。

革命并非一帆风顺。虽然支持卡斯特罗的人（fidelistas）已经掌握政权达五年之久，但是我遇到的在经济部和哈瓦那大学工作的许多人都对革命信心不足。旧秩序显然已经被摧毁了，但是新的时代仍旧迟迟没能到来。在圣地亚哥，我同一名来自东德城市莱比锡的年轻教授进行了交谈，他在早上 7 点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沮丧地发现，没有一个古巴学生在这个时间能睡醒。但是，作为一名革命的旁观者，

---

①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北部帕多瓦画派代表画家（1431—1506），以其绘制的壁画，特别是人物画而闻名于世。

这个国家的动荡不安本身就具有吸引力，充满希望。古巴人似乎以一种义无反顾的热情穿上了新的马列主义的外衣。我注意到，我的一位古巴朋友访问了布拉格。他惊讶地发现，卡夫卡（Kafka）居然不是一位民族英雄！即使在革命时期，自由主义思想在古巴仍然被允许存在。“让赫鲁晓夫（Khrushchev）皱眉蹙额的抽象艺术在这里繁荣发展”，我写道，“哈瓦那的所有家庭都能够收看《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①]。”在五年的剧烈动荡之后，未来革命将如何发展看起来仍是一片空白，而这张白纸如今即将被书写。

4

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同切·格瓦拉见过面——尽管在四年后的10月，我非常突然地看到了他的遗体。1967年10月，一个星期一的下午5点，当一架直升机从天而降时，我正在玻利维亚山城瓦里格兰德（Vallegrande）的机场，直升机的起落架处用绑带固定了一个担架。几小时前，格瓦拉被玻利维亚军队高层下令枪决了。由于前一天晚上一名在圣克鲁兹（Santa Cruz）附近军事训练团中工作的美国官员透露了格瓦拉被俘的消息，我连夜驱车数个小时赶往玻利维亚军方的前方基地瓦里格兰德。在那里，一名紧张不安的指挥官告诉我，不准许继续前往拉伊格拉（La Higuera），这个位于前方的村庄就是格瓦拉被关押的地方。那个年代的玻利维亚，在没有军事许可的情况下，是不允许从城镇里外出的。

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瓦里格兰德的所有人都聚集在飞机场上，直升机到达后，格瓦拉的遗体被转移到了一辆小型雪佛兰货车上。这辆货车驶离机场，进入城镇，转进了当地的一家小医院。格瓦拉被放置于一个露天洗衣场的平底水池上。这次行动是在美国中情局的一名负责古巴—美洲事务的特工的控制下实施的，当时我们所知，他的名字是“爱德华多·冈萨雷斯”，是当时在游击区行动的两个特工之一。当我问到他是哪里人的时候，他给了个神秘的答复，“哪儿的都不

① 又译为《露滴牡丹开》，著名导演费里尼的“背叛分部曲”之一，1960年上映，马斯楚安尼、艾克伯格、艾柏等主演。——译者注

是”。在场的人中，唯有我们两个曾在格瓦拉生前见过他，可以证实这就是他本人。

成群的村民涌入了洗衣场的院子中，只为去看一眼死去的格瓦拉，我在人群中停留了半个小时左右，被他那双睁着的让人过目难忘的眼睛所吸引。之后，我经过了整整一晚上 8 小时的长途旅程，乘坐吉普车返回了圣克鲁兹，想办法将这个消息公之于众。

1967 年，格瓦拉的死终结了许多人同古巴革命的浪漫主义式的联盟，随后的一年，卡斯特罗公开发表尖锐言论，反对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布拉格之春”，并更进一步地正式将古巴革命纳入苏联支持者的阵营中。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一直在对哈瓦那进行访问，对拉丁美洲游击运动的历史和斗争进行着自己的研究。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在我的记忆中保留着早年对古巴革命的热情，古巴人民及其不懈的斗争经历对我造成的持久影响，还有对他们岛屿的悠久历史持续不断的兴趣。我在 30 年后重返哈瓦那以便将这些记忆写下来。



引言：古巴人民

卡萨大酒店（Casa Granda）颇具人气的露台咖啡厅临街而建，俯瞰着位于古巴圣地亚哥城（Santiago de Cuba）中心树木枝繁叶茂的殖民时代的广场。在远方，矗立着一座有着阿拉伯式装潢的古老木制房屋。这座房屋建成于16世纪早期（一些人是这么认为的），目的是纪念这座岛屿的征服者迪亚戈·德·贝拉斯克斯（Diego de Velasquez）。左侧是一座庄重而又现代的20世纪大教堂，右侧则是市议会办公室的阳台，1959年1月2日，即革命的第一天，菲德尔·卡斯特罗就在那里对群众进行讲演。

每逢周六，露天咖啡厅里都会挤满了举办“成人礼”（*quinceañeras*）的女孩和她们的父母、好友。漂亮的15岁女孩们穿着飘逸的白色衬裙，在此害羞地庆祝她们的生日——同时也是步入成人世界的仪式。这些出场的女孩及其家庭成员高矮不一，身材各异，肤色也不同——有黑人、白人和黑白混血儿。这种景象是对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仪式的重现，但是就像在古巴发生过的许多事情一样，它在100年前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个时代，想要在城镇的中心看到这种社会上种族大融合的情景是不可能的。

今天的古巴是一个新生的民族。直到卡斯特罗革命之后，古巴的社会才开始凝聚起来，成为一个团结和统一的国家。在西班牙帝国主

义者历时数世纪的专横统治下，直到 1898 年之前，古巴的居民都被按照种族、阶级和原籍、裔系分割开来。这个国家历史的显著特征，就是种族暴力、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白人对黑人及所有其他种族的迫害。城镇和大部分乡村中的人都在极度的恐惧和不安中度过了他们的一生。征服、反抗、奴隶起义、海盗入侵、失败的独立战争以及失败的革命，这一切似乎都在喘息之间相继发生。直到 1959 年，古巴的政治斗争才被枪炮解决了。19 世纪来此游历的旅行者们经常会记录道，街头根本见不到任何女人。她们被以充分的理由关在家里。①

6

现在的古巴人，大部分是白种人或黑白混血儿，但是在这座岛屿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超过一半的居民是黑人，绝大多数都是奴隶。长期以来，黑人和白人的比例变化不大。直到 19 世纪中期，西班牙殖民当局致力于通过鼓励白人移民的方式，来使居民成分“白人化”。此外，这几十年间奴隶的输入变得更加困难，虽然奴隶制仍然被允许存在，但是奴隶贸易是非法的，这些都使得白人的人口比例日益上升。1886 年，古巴的奴隶制才被正式废除。②

古巴的黑人来自不同的地区。他们来自于遍布在西非漫长海岸线上的，从北部塞内加尔到南部安哥拉的众多部落和民族——甚至还来自非洲东南海岸的莫桑比克。他们有着不同的语言、信仰和音乐。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古巴这个他们被运抵的新家园中，他们都保持着这些差异。为了维护其共同的利益而形成的黑人社团和救助社保持了他们的特性。

第一批黑人奴隶是随着 16 世纪初西班牙殖民浪潮到来的，他们被安置在金矿和铜矿中工作，之后则是烟草农场。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大多数黑人奴隶在甘蔗园中生活和劳动，其他人则是作为家中的佣人。但是，黑人中的许多人——虽然数个世纪以来他们的数量不断变化，

① Luis Martinez – Fernádez, “Life in a ‘Male City’ Native and Foreign Elite Women in Nineteenth Century Havana”, *Cuba Studies*, vol. 25, 1995.

② 在加勒比海的其他地区，奴隶制的终结要早得多，集中在 1834 年到 1848 年间。在美国，它终结于 1863 年；在巴西，它终结于 1888 年。

但是加勒比海地区总是要多于其他地方——则根本就不是奴隶。被称为“自由的有色人”或“有色的自由人”的这些人，通常都是城市工人，成为雇佣工人或工匠，有的时候则成为独立的小生意人。20 世纪起，新的黑人移民开始了，这些人来自于牙买加和海地。他们是作为合同工，带着回程的船票来到这里的，但是后来许多人都留了下来。这些自由黑人并非是古巴下层社会的唯一组成部分。在社会下层不同种族间的通婚，创造出了一个黑白混血儿人口群体，在外人看来，这种现象是这个国家的显著特点，但这种说法并非完全准确。实际上，古巴的种族融合有着显著的阶级性和分裂性。

在数个世纪中，古巴居民中的白人，也被分为不同的群体。虽然大多数人来自西班牙本土，从加那利群岛渡海而来。其他人则来自欧洲的其他地方，确切地说，是来自前哈布斯堡帝国的所有国土——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奥地利、波兰、荷兰——同时还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 20 世纪，也有一小股移民浪潮随着美国于 1898 年到 1902 年之间对古巴的占领而到来。

就像非裔古巴人一样，来自西班牙的移民保持着强烈的地域差异感，他们骄傲地自称来自加利西亚或阿斯图里亚斯、安达卢西亚或者莱昂、加泰罗尼亚或者巴斯克地区。整个 19 世纪乃至 20 世纪共和国时代的最初几十年间，在俱乐部、“赌场”和互助社中，他们仍然保持着西班牙人的传统，以确保他们的子女获得良好的教育，并且使他们的女儿在特定的群体中婚嫁。

7

古巴白人中的许多人是作为拓殖者和农民来的，但是多数人很快就改弦易辙，到城市里去谋求发展，他们控制了国家的官僚机构、商业、贸易和工业。作为在国家政治中，不管是在殖民统治还是在反抗运动，抑或是在反叛战争中占据首要地位的一个群体，西班牙的移民及其后裔总是占据着历史书中的绝大篇幅，这种现象一直持续着，直到近来学术界为公平起见，开始研究其他弱势群体的历史。

因为总是被国家黑人居多的状况所困扰，白人殖民者们不断地号召人们从欧洲向此地进行移民，试图以此来保持他们的统治地位。无

论是在 1898 年古巴从西班牙手中解放出来之前还是之后，激进的统治精英们都经常积极地鼓励白人移民。这些精英们所公开宣称的使居民“白人化”，并保持白人移民有数量上的优势地位的目标基本上实现了。移民浪潮从西班牙统治的时代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30 年代［其中还包括菲德尔的父亲——安吉尔·卡斯特罗（Angel Kastro）］。到了 20 世纪中叶，人口中的黑人比例大幅度下降了——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从 50% 减少到了不足 30%。

多民族古巴的第三个组成群体是土著居民，即除了近代的移民之外的大部分古巴原住居民，他们存在的痕迹通常都被忽略或者被否认。尽管圣地亚哥的学者们思想更自由开放一些，但其重要性仍被今日哈瓦那的多数古巴历史学者所贬低。尽管这些年来与之相悖的证据越来越多，但是官方仍然固执地坚持，泰诺人（Tainos），这些在哥伦布（C. Columbus）到来前占据了这座岛屿许多个世纪的土著民族，在殖民征服的初期已经灭绝了。

显然，事实并非如此。这座岛屿的原住民有许多幸存了下来，居住在官方指定的土著人居住地和群山中的部落里，这种情况至少维持到了 19 世纪，并且他们也同那些新来的人们通婚，尤其是同黑人。他们的地名仍然留有过去的痕迹，他们的词汇中的许多词语，遍布在现在古巴通用的西班牙语中。“古巴”本身就是个印第安语词。哥伦布曾听到巴哈马群岛的土著居民谈到一座被称为“古巴”和“古巴纳坎”（Cubanacan）的南方大岛。印第安人宽敞明亮、通风良好的波希奥（*bohios*）茅舍——一种用棕榈叶建造的小屋——被西班牙殖民者所接受，现在仍能在乡下的一些被人遗忘的地区看到，或者在海滩的旅游旅馆的建筑风格中重现。

古巴人口中的另一个小群体就是中国人，他们是在 19 世纪中期，作为替代非洲奴隶的契约劳工被运至这里的。当国际上反对奴隶贸易的运动最终获得胜利的时候，种植园主们必须去寻找新的劳动力来源地。

8

古巴的这些不同的人群——印第安人、西班牙人、非洲人和中国

人——总是经历着长期暴力冲突的历史，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被两个始终存在着的主题所主宰：对内部安全的探寻和外来进攻的威胁。作为位于敌方海域中的远离两个大陆海岸线的一座大岛，古巴很难摆脱这两种状况的纠缠。古巴的暴力史比殖民统治的历史要早得多。在西班牙人永久移居到这里之前的数个世纪里，岛上的土著居民就已经被一代接着一代、源源不断到来的拉丁美洲森林民族们所取代，并不断被迫迁移，这些人从奥里诺科河三角洲地区（Orinoco Delta）涌出，乘木筏沿着加勒比海群岛进入古巴。这种古巴被征服前的居民们所经历过的外来威胁和内部动乱一直持续着，在1511年迪亚戈·德·贝拉斯克斯（Diago de Velàsquez）和他的西班牙征服者到来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

最早移居到古巴的那代居民所遇到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自然灾害。热带风暴、飓风和龙卷风的频繁袭击已经成为贯穿其历史的常态，至今如此。每年带来死亡和毁灭的飓风季的历史影响，在路易斯·佩雷斯（Louis Perez）关于自然力量对古巴发展的影响这一引人注目的研究中被重点强调了。他谈到了“huracán”是如何从当地土著语言变成一个西班牙词汇的。“泰诺印第安人用‘huracán’来表示庞大无比，具有摧毁性威力的，来自大地四面八方的以风的形式存在的致命力量。”①

16世纪，第一批基督教世界的冒险者进入了这个长期动乱、充满挑战的环境中，带着他们的士兵、海员、定居者、商人、工匠和牧师——还有与日俱增的黑人奴隶。第一代的新来者很快就放弃了这座岛屿，在16世纪20年代乘船离去，前往征服墨西哥和秘鲁，30年代去征服佛罗里达。他们留下了那些可怜的永久定居者，这些男人和妇女因为与土著居民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而惶惶不可终日。

征服初期，定居者在整座岛屿的不同地点上，为自己建造了少量的小城镇，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的政令都未能走出他们的外

① Louis Pérez, *Winds of Changes: Hurrican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ineteenth - Century Cub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 17.

围防御工事。在山区里居住了数个世纪的土著居民中的幸存者，多数与西班牙人和黑人奴隶通婚，他们长期处于阴郁状态下，会不时发生摩擦，最终演变成武装反抗或起义。在这座岛屿的悠久历史中，许多地区都是不存在法律、政府和财产权的处女地。在这座岛屿上，被遗忘的印第安群体以及亡命的黑人奴隶，都住在与世隔绝的帕伦克（palenques，即设防的隔离区）中。从这样的传统中滋生出了从18世纪中叶就开始滋扰农村地区的盗匪活动，并且产生了大量参加19世纪独立战争和20世纪那些起义活动的粗暴的起义军人。

9 移民同印第安人之间偶发的冲突，贯穿了征服后的第一个世纪，连绵不断。很快，除了长期存在的内部威胁外，来自国外的袭击也随之而来——这是古巴历史上另外一个长期存在的特点。紧随西班牙人之后，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员和殖民者也进入了加勒比海地区——有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这些新殖民者将欧洲的内部纷争带入了这片新发现的热带地区，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里的争斗时而发生。他们占领了毗邻古巴的岛屿，并且以海盗的方式，长期在海岸线外徘徊，只要看到能够进行贸易、获取钱财或者能对那些拒绝合作的人进行破坏的机会，他们就会猛扑过去。

如果说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白人移民们的人生酷烈而短暂的话，那么黑人奴隶所能得到的就更少了。那些能够在跨越大西洋的严酷旅程中幸存下来的人，都会被烧红的烙铁打上标记，送到种植园去工作，如果他们显示出反抗或者不愿工作的迹象的话，就会遭受毒打或者被伤害致残。这些人中，男性在数量上远远多于女性，并且一些宗教机构为了省钱只雇佣男性奴隶，这就成为了他们的不满和性压抑的源头。①

---

① “1795年一位从牙买加到古巴旅行的游客（可能是新教徒）提到了古巴岛上从属于大型教团的最大最好的制糖企业的数量，这些教团都是贪婪的庄园主。在禁止性行为的掩饰下，他们购买大量的男性黑奴。那些自然本性受到压制、心情沮丧的黑奴，就像最初的罗马人一样，抢夺妇女，并且带着她们躲入山中。”见R. C. Dallas，*The History of Maroons*，London，1803，p. 60。

到19世纪，作为潜在的劫掠者，美国加入了那些已经将势力范围延伸到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的贪婪的欧洲列强的行列。[①] 在拉丁美洲的各个地区，当西班牙帝国的总督们纷纷被当地的移民军队所打败的时候，古巴仍然保持着其对西班牙王室的效忠。看似荒谬的是，正是欧洲同美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得古巴能够在这个世纪末之前都处于西班牙的控制之中。西班牙帝国在加勒比海的统治时间被延长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像极了世界另一端的土耳其帝国。为避免它的灭亡带来更糟的后果，欧洲列强竟使这个帝国延续到了20世纪。

西班牙最终于1898年撤离了古巴，这时距离1895年古巴最后一次独立战争的爆发已经过去了3年。在这一年，尽管古巴军队尽了自己的努力，还是由美国实施了对西班牙致命的一击。美国人侵入并占领了这座岛屿，迫使西班牙帝国投降。美国军队同其他军队一起，在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率领下，在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附近登陆，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在圣地亚哥沿海摧毁了西班牙舰队。

1898年，西班牙终于从古巴退出，1902年美国也随后撤出，但这丝毫没有减少这座岛屿上的居民们所受到的暴力侵害。内部的起义和外国的干涉，在20世纪的前60年里，仍旧是这个国家历史的显著特征，这种情况直到1959年卡斯特罗革命后才改变。在独立战争期间形成了一种被美化了但实际上有害的传统，即每当选举产生了有争议的结果时，无论选举本身公正与否，都会有人拿起武器，带着少数人前往山区（manígua，古巴的农村中的穷乡僻壤）。在1952年巴蒂斯塔（Batista）的军事政变后，年轻的男人（和女人）认为拿起武器进山，在农村大肆破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同时他们在城里的同谋们则 10

① 西班牙、法国、葡萄牙、英国、俄国甚至德国都在古巴的历史上留下了印迹。1942年8月，德国海盗的一艘潜艇进攻并击沉了两艘古巴货船。这一事件促使古巴总统巴蒂斯塔允许美国在比那尔德里奥（Pinar Del Rio）建立军事基地，为美国和英国训练空军人员。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在战争中的任务就是寻找德国潜艇，科科岛（Cayo Coco）后来成为了著名的旅游胜地，因为海明威在其著作《岛在湾流中》（*Islands in the Stream*）中描述了他在这里的经历。

囤积来自海外的军火，筹划爆炸事件，并进行着后来被称为“恐怖主义”的活动。

革命的一个不容否认的成果是带来了国内的安全和稳定，这还是这座岛屿历史上的第一次，尽管古巴人民为此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外部的威胁没有消失，事实上还与以前一样多。美国人威胁要恢复他们对古巴的支配，并在 1961 年派出了一支侵略军。1962 年，另外一个庞大的欧洲帝国苏联又迅速进入古巴的历史，虽然从时间上来看有些迟了，但它作出了在这座岛上部署核弹头这样野心勃勃的决定，让整个世界大吃一惊。就像其他的欧洲帝国曾经做过的那样，苏联也将它的势力延伸到了加勒比地区，试图对这座岛屿施加影响。俄罗斯人声称，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支持卡斯特罗对其敌人进行的革命斗争，但是就像所有的大帝国一样，他们其实是有自己的打算的。

为了对外部干涉作出回应，同时遵循 19 世纪 20 年代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提出以来的既定政策，美国决定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并赞助对它进行类似于对 17 世纪海盗那样的攻击。之后，到了 20 世纪末，在古巴人拼命摆脱这种枷锁的努力下，古巴周围的海域再次挤满了从事非法贸易的商船。许多曾经满载烟草和鼻烟、糖和朗姆酒的海盗船，现在则运载着大麻和可卡因。

在这些船只中，有少数并不结实的小艇，专门从古巴和加勒比海的其他岛屿上将偷渡者运到佛罗里达去。这种不受管制的移民，除了在 1980 年到 1994 年间的偶尔几个时段外，是不被古巴和美国所允许的。但是，随着美国人越来越富有，加勒比海诸岛和中美洲诸小国变得日益贫困，人们对北美经济的强大吸引力几乎无法抗拒。

如这本书想要阐明的那样，古巴人民有着充满冲突和动乱的过去。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在 21 世纪也无法消失殆尽。革命或许可以为这座已开发 500 年的岛屿带来社会安宁，但是它的实现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当卡斯特罗在其演说的结尾处援引加里波第的话，“Patria o Muerte”（为祖国毋宁死）时，并非是仅仅以此作为一个浪漫的修辞。因为，他和他的人民都对这句跨越了几个世纪的话语有着深深的共鸣。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危险的殖民：屠杀、奴隶制和海盗（1511—1740）

11

阿图伊（Hatuey）和迪亚戈·贝拉斯克斯（Diego Velásquez）：印第安酋长与西班牙征服者间的对抗（1511）

巴拉科阿（Baracoa）一年四季气候炎热、潮湿，可能由于那些见证，这个古巴（Cuba）东北部的小港口折射出少许的历史氛围。被挤在高山和大海之间的几条街道两边排列着陈旧的木屋，它们和两座古老的石筑防砦一样，是西班牙帝国权威的残余。一个更为现代的建筑是屹立于小型机场旁的苏维埃式的大饭店，这座被雨水侵蚀而褪色的水泥建筑，是另一个消逝的帝国留下的纪念。在一座石筑防砦中有一个小博物馆，其庭院中屹立着阿图伊的半身雕像。他是1511年第一批西班牙人登陆时，巴拉科阿土著反抗武装的领袖，像现有的古巴历史以前和以后的许多人一样，他是一个来自东方今天被称为海地（Haiti）的国家的难民。古巴是一个岛屿，但它也是庞大的加勒比（Caribbean）群岛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历史在这个不可改变的地理环境中衍生。

今天，沿着一条穿越群山的之字形道路前行，很容易到达巴拉科

阿，但在以前的若干个世纪中，巴拉科阿一直与古巴岛的其余部分相隔绝。它的对外联系主要依靠海路，向东穿过向风海峡（Windward Channel）到达海地，向北则通往美国（United States）——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经常从这里的小港湾将椰子和香蕉运到美国。

20世纪60年代，卡斯特罗革命时修建了这条路，那时古巴仍投资于大型工程上。这项工程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从前的独裁者巴蒂斯塔的允许而修建，但是从未完工。当1963年两位革命英雄切·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Raúl Castro）来这里出席一个由慷慨的国家出资建立的可可工厂成立仪式时，这条道路保证了这里短期的经济繁荣。虽然在陡峭的山路上行驶，汽车可能坠崖，但这里的巧克力产品仍不断向外售出，这是政府更重视稳定的贸易而非个人安危的典型实例。

12 困难时期的另一个迹象是一半以上的当地居民脱离了天主教，现在他们都转入了新教的教堂，在今天的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发生了这一重大的体制性改变，古巴无疑不能置身事外。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拉科阿是来自西班牙的天主教斗士在古巴的第一个登陆点，而且一个来自欧洲帝国的士兵很快卷入与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新教派的支持者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中。

对于第一批征服者而言，选择巴拉科阿作为登陆地点是愚蠢的，但也许他们并不熟悉这一地区，并且也没有其他选择；也许他们是听从了哥伦布的建议，因为哥伦布在1492年第一次到加勒比地区探险时曾经瞥见了这个地方，并在报告中热情洋溢地描述了它。巴拉科阿是距离海地最近的港口，1511年迪亚戈·德·贝拉斯克斯正是从这里发动了对古巴的远征。①

那时的巴拉科阿居民像其他古巴人一样自称为泰诺人，他们被最早的西班牙访客视为淳朴的人群。一位目击者描绘说，他们“逆来顺受，性格恭顺，习惯服从，非常好客，极少关注性生活的快乐和其他

① 这个环绕着今日海地的岛屿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被西班牙人统称为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

激烈的身体运动”。[①] 泰诺人种植丝兰根，收获后脱皮，做成木薯面包。他们还种植棉花和烟草，并且食用玉米和土豆。与征服者随行的多明我会传教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写道：“他们有丰富的食物，有生活必需的所有物品。他们有许多庄稼，并且侍弄得很好——其物产非常充裕，我们用它们来充饥——我们都亲眼所见”。[②]

泰诺人不是古巴的原住民。这个岛上更古老的族群被称为瓜纳阿塔贝伊斯人（Guanahatabeyes），他们来自今天南美国家委内瑞拉（Venezuela）和哥伦比亚（Colombia）的森林。直到现在他们的艺术品还能在巴拉科阿对面的半岛的尽头，主要是在瓜纳阿卡维韦斯（Guanahacabibes）半岛的西部被发现，这个族群的名称即来源于此。征服者贝拉斯克斯记载说，他们的生活“像原始人一样，没有房屋或者城镇，只是食用他们在森林中找到的肉类以及海龟和鱼”。

考古材料显示，瓜纳阿塔贝伊斯人被随后的两次移民浪潮驱赶到西部，这就是同样从大陆北迁，穿过奥里诺科河三角洲来到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 Island）的泰诺人和西波尼人（Siboneys[③]）。他们都属于南美洲（South America）一个人所共知的阿拉瓦克人（Arawaks）族群，以主人—奴隶的关系共同生活。拉斯·卡萨斯记载说，西伯尼人是“一个非常单纯和温和的民族”，他们与泰诺人比邻而居，但是被他们作为奴隶来对待。

对于哥伦布时代以前的古巴历史，除了人类学和考古学做了一些开拓性工作外，仍然主要依靠猜测和想象，它的早期殖民史也很少有人记载，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被该岛自己的历史学家所忽略。然而在殖民统治的前两个世纪，在这个岛上及其周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给它

13

① 引自 Jaime Suchlicki, *Cuba from Colymbus to Castro and Beyond*, London, 1997, 8 页。

② 在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Historia de las Indias* (Vol. 3, Biblioteca Ayacucho, Caracas, 1986, pp. 81－101) 一书中用了很长的篇幅描述古巴的人口，以及这里的植物和动物。

③ 根据维基百科资源，Siboneys 即现在常说的 Ciboneys，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居住在加勒比海中大安的列斯群岛上的原住居民。http://en.wikipedia.org/wiki/Ciboney, 2010 年 11 月 8 日。——译者注

的民族、社会和经济打下了永久的烙印。当地土著印第安人与西班牙征服者之间的融合；大量来自非洲（Africa）海岸的黑人涌入；一个拉丁美洲的西班牙大城市的奠基和建设；以及一种种植与畜牧并重的经济模式的形成——利用奴隶，使19世纪创造财富的机器，即蔗糖的出口最终获得繁荣——所有这些都是早期殖民史的重要发展历程。

同样十分重要的是古巴在殖民征服后不久就卷入了欧洲大陆的纷争中。作为西班牙帝国的一块殖民地，古巴发现它置身于欧洲战争的前沿，成为欧洲越过大西洋延伸到加勒比地区的前线。帝国主义列强企图使古巴孤立于当时的全球经济之外，使它仅仅依靠西班牙，但是事情的发展出乎他们的意料。在20世纪俄国人来此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古巴的居民区被法国人、英国人、荷兰人以及后来的北美人认为是官方舰队（和非官方的海盗）的合法猎物。古巴也与周围的邻国发生了紧密的贸易关系，就像在哥伦布时代之前一样——这些国家和地区有海地、牙买加（Jamaica）、佛罗里达（Florida）和中美洲（Central America），以及墨西哥（Mexico）。事实上，在西班牙人统治的前三个世纪，古巴的财富是建立在非法贸易和走私基础上的，这几乎与其母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合法贸易量一样多。[①]

泰诺人第一次看到哥伦布驶过其北海岸，是在1492年10月28日，可能在巴拉科阿。他在1494年从欧洲出发的第二次探险中沿着古巴南部海岸航行，在许多小港湾登陆——包括后来成为巨大美国海军基地的关塔那摩（Guantanamo）。哥伦布以友好的笔触描述他的古巴之行，把建有大房子的村庄描写成“看起来像营地中的帐篷，没有规则的街道，但是星星点点遍布各处。屋内都打扫得很干净，装饰着精致的家具。所有这些房子都是用棕榈的枝干建成，十分美丽”。[②]

西班牙在加勒比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永久性的殖民地在古巴的东部，位于伊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岛上的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

① Roland Ely, *La Economia Cubana entre los dos Isabeles*, *1492—1832*, Havana, 1960, p. 21.

② 引自 Willis Fletcher Johnson, *The History of Cuba*. Vol. 1, New York, 1920, p. 28。

港。尼古拉·德·奥万多（Nicolas de Ovando）是那里的第一个统治者。他把当地的印第安人登记造册，纳入强制劳动的体系，这种制度于是成为古巴组织生产的固定模式。他也鼓励那些乘坐西班牙定期货运船来的新移民发展畜牧业和种植甘蔗。

直到1511年，殖民运动才从伊斯帕尼奥拉岛（Spagnuola）扩展到古巴。贝拉斯克斯命令征服该岛并且向该岛移民，但是他的部下遭到印第安人持续几十年的激烈抵抗。第一个土著武装力量的领导人被编年史家称为阿图伊，他是一位来自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土著泰诺人酋长或者首领。在数个世纪中，阿图伊成为古巴土著印第安民众形象的代表，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被所有那些希望彻底改变该岛历史的人所追忆，最终——受到彻底的冒犯——成为一种畅销啤酒品牌的名字，这个名字在革命期间因其母公司的国有化而保留了下来。

阿图伊目睹了伊斯帕尼奥拉岛上哈拉瓜（Xaraguá）的印第安人在1503年遭受到奥万多策划的大屠杀，他看不到该岛的未来，他和他的许多追随者从水路来到古巴。当尾随其独木舟的西班牙人在1511年来到古巴时，他们已经在巴拉科阿上方的山间立足。阿图伊组织了当地的抵抗。他自己的经历告诉他，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

贝拉斯克斯是阿图伊的对手，他在29岁时参与了1494年哥伦布的第二次远航探险，那是他首次来到西印度群岛。贝拉斯克斯一直受到历史学家的诋毁，然而，他却是早期拉丁美洲的伟大征服者之一，是伊斯帕尼奥拉岛和古巴的总督，尤卡坦（Yucatan）半岛的统治者。如果不是埃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án Cortes）阻挡了他的野心，贝拉斯克斯可能会征服整个墨西哥。

数个世纪中在古巴历史上留下其烙印的一长串独裁者和魅力非凡的人物中，贝拉斯克斯是第一人。他于1465年出生在西班牙城市巴利亚多里德（Valladolid）附近。他被描绘成“一个很有能力、特别英俊、风度翩翩、很受欢迎的人，有很强的领导和指挥才能”。[①] 他被同

① Johnson, *History of Cuba*, vol. 3. p. 39.

时代的人视为高效的管理者，是那个时代美洲最富有的人。一处声称为他的故居和官署的庭院仍旧屹立在古巴圣地亚哥的主广场之一角。这是一处精致、比例均衡、带有晶格构造窗户和凉爽庭院的摩尔式建筑。回想起那些从大马士革（Damascus）到塞维利亚（Seville）处处可见的阿拉伯式建筑，使人联想到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就是紧跟着它对阿拉伯人占领下的西班牙（Spain）进行光复（Reconquista）的胜利之后发生的。

在对伊斯帕尼奥拉岛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行动中，贝拉斯克斯是实际上的军事指挥官。他参与了 1503 年在哈拉瓜进行的迫使阿图伊逃到古巴的大屠杀行动。不同于奥万多所采取的模式，贝拉斯克斯并不打算用那么残忍的方式来对待古巴的印第安人。他从自己早年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经历中感悟到灭绝当地的印第安人是错误的，因为征服者需要印第安人，不仅是拥有他们的土地，而且需要他们提供食物和劳动力。

贝拉斯克斯在 1510 年末的最后几天动身去古巴，率领了 3 艘船只和一支由 300 名士兵构成的军队，从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西北岸起航。他穿过 60 英里的向风海峡，在巴拉科阿驻足，在亚松森港进行洗礼。① 从这一天起，印第安人对征服采取了敌对行动，贝拉斯克斯在巴拉科阿以北的群山中搜捕印第安人的领袖。阿图伊中枪倒下被俘，然后被活活烧死。

15

一则著名的故事使人们能够记起阿图伊愤怒面对基督教侵略者企图使他转变信仰时的特别天性。阿图伊死亡的情况被记录在那个时代拉斯卡萨斯所著的畅销书《印第安毁灭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一书中。这位传教士、大地主曾经参加了贝拉斯克斯的侵略武装。当时，阿图伊被绑在柱子上，一位方济各会传教

---

① 该港的西班牙名全文为 Nuestra Senora de la Asuncion，现为巴拉圭首都，位于皮科马约河与巴拉圭河汇合处附近，1537 年由西班牙征服者建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口锐减的那个时期（1541—1580），取而代之成为南美东部西班牙殖民活动的中心。1731 年，此地是最早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起义地点之一。——译者注

士向他简单介绍了基督教的神话体系：

> 这位传教士告诉他，如果他只相信现在听到的话，将步入天堂享受荣誉和永恒的安息，但是如果他不这样做，将会坠入地狱，忍受那无尽的折磨和痛苦。
>
> 阿图伊略加沉思后，问这位传教士，基督徒是否将去天堂。当得到答复说善良的基督徒可以进入天堂时，他继而不假思索地反驳道，如果是那样的话，他选择下地狱，因为他不想再看到那些残忍的畜生。[①]

虽然其领袖遇害，但印第安人仍然继续对这些新来的西班牙人进行袭击。抵抗运动现在由阿图伊的盟友卡瓜克斯（Caguax）领导，他也是从伊斯帕尼奥拉岛逃离的难民。贝拉斯克斯要求增援，潘弗利奥·德纳瓦斯（Púnfilo de Narvaez）从古巴正南方的牙买加岛赶来，该岛已于两年前，即1509年被西班牙人占据。潘弗利奥在他快40岁时成为冒险家，他是来自巴利亚多里德的另一个征服者，并且真正征服了古巴。他把自己的残忍烙在这个岛上，后来领导了征服墨西哥和佛罗里达的行动。潘弗利奥从牙买加带来了30名配有弩弓的士兵，并受命率领一支侵略军呈扇形出击，由海陆两方面闯入内地。在巴亚莫（Bayamo）附近的马埃斯特腊山一处山坡下的印第安居民点，他扮演了古巴历史上的重要角色，在这里，他打败了印第安人武装，并且杀死了卡瓜克斯。

在三年时间里，潘弗利奥的军事小分队——现在扩大为拥有20匹战马的500人的队伍——驰骋全岛。当这支队伍西进时，屠杀了曼萨尼约（Manzanillo）附近卡奥纳奥（Caonao）的居民，这是被拉斯卡萨斯观察后忠实地记录下来的另一场骇人听闻的事件：

---

①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a*, London, 1992, p. 28.

当时，地方居民来到一个距离其定居区 10 里格的地方迎接我们，用食物和其他礼物款待我们——给我们面包和鱼及任何他们能够提供的食物——基督徒们却像是突然受到魔鬼的驱使，在我眼前毫无理由地杀死了 3 000 多人——那些坐在我们面前的男人、妇女和儿童。我那天看到的残暴行为比任何事情都要恐怖，甚至不想去看。[1]

16 当西班牙人向全岛进发时，幸存的印第安人逃进深山或渡海避入小岛或沿岸的礁石上。从这些相对安全的战略要地（这些地区在 21 世纪发展为旅游胜地），印第安人抛弃了早期希望与新来的西班牙殖民者友好相处的想法，并对他们发动攻击。他们的激烈反抗使殖民者震惊。于是，西班牙殖民者在 1523 年发动了摧毁“印第安人核心区”的行动，但是印第安人的反抗仍持续了许多年。这些殖民者于 1527 年在巴亚莫、1529 年在圣地亚哥郊外被印第安人杀死。

被称为马鲁人（Cimarrones）的山地印第安人，也在 16 世纪 20 年代攻击边远的殖民点。他们的头领瓜马（Guama）在巴拉科阿上方建立了根据地，经过持续十几年的战斗，于 1532 年战败被杀。零星的抵抗在整个 16 世纪时有发生，但印第安人确实被恶狗和大屠杀吓怕了，也被欧洲的疾病削弱了。

在征服刚开始的几年，全岛的许多战略要地都被置于征服者的有效控制之下，贝拉斯克斯掌管了六个西班牙小殖民点的建设。它们的名字公开地表达出侵略军的基督教情感：巴亚莫的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 de Bayamo）、拉圣提斯玛·特里尼达岛（La Santisima Trinidad）、哈瓦那的圣克里斯托瓦尔（San Cristóbal de La Habana）、圣斯皮里图斯（Sancti Spiritus）、普林西佩港的圣玛利亚［Santa Maria del Puerto del Principe，即卡马圭（Camaguey）］和古巴的圣地亚哥。殖民点建立的地方是大量印第安人已经居住过的——这里最容易获得当地

---

① Las Casas, *A Short History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 p. 29.

的劳动力。[①]

西班牙人到来的目的是希望找到黄金，他们非常高兴地在奥连特（Oriente）省的河流和山上找到了黄金。然而黄金储量很小，经过了约25年的时间很快就挖完了。在前30年，古巴贡献给西班牙84 000盎司黄金，但是产量逐渐下滑，到1539年仅有650盎司。[②] 在岛上也发现了铜矿，在圣地亚哥附近的群山开采了埃尔·库珀（El Cobre）铜矿，虽然开采断断续续地从那时持续到现在，但它既没有直接的吸引力，也不具有黄金的价值。

西班牙统治者很快意识到，在古巴的殖民事业不能仅靠开采岛上的矿产资源。头脑敏锐的贝拉斯克斯清楚地看出它的未来发展在于种植业。他于1514年要求从伊斯帕尼奥拉岛带来马、牛、种子和农具。这项配合殖民的重要任务就此开始。贝拉斯克斯离开巴拉科阿，在南部海岸的重要港口圣地亚哥建立了他的永久总部。

西班牙人一边征服，一边殖民。在古巴建立的模式，早在一个世纪前，即当卡斯蒂利亚（Castile）的基督徒渐渐地把阿拉伯穆斯林赶出家园，即赶出西班牙大陆时，已经在西班牙本土确立。在西班牙，从穆斯林手中收复的土地被称为王室领地（*realenga*），是国王的财产。它被分配给基督教徒士兵和农民，由他们负责种植和生产并保护它免遭穆斯林的攻击。

17

这种本土的土地拓殖体系，即在“光复”了的西班牙所采用的典型模式，被纹丝不动地在美洲使用，首先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然后在古巴实施。古巴的土地于1513年被宣布为西班牙国王的财产，阿拉贡的斐迪南（Ferdinand of Aragon）颁布了一项法令，授予他未来的拓殖者以权利和义务：

---

① Irving Rouse, *The Taino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People who Greeted Columbus*,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3, p. 157.

② Ely, *La Economia Cubana*, p. 17. 据埃利（Ely）统计，84 000盎司黄金在20世纪60年代相当于1 500 000美元。

> 鉴于此，朕的臣民将被鼓励去印度[①]定居，因此他们可以如朕对其所期望的那样舒适地生活……朕希望那里应该给予去那些新区开发、殖民的人们房屋、奖励和土地……而且，如果他们在那里劳动，并在那片土地上建立住所，居住了4年以上，朕将授予他们权利，即从那时起，他们可以自由、自主地出售和处置那些财产。[②]

王室代表（*Vecinos*）[③]被指定负责分配王室的领地。他得将王室领地分成较小的份地，称赐封地（*encomienda*），分配给那些将实际开发土地的人们，即受恩者（*encomenderos*）。这就是支撑领地制体系的理论。毫无疑问，这种体制在西班牙“光复”后的土地上推行得很好，因为有许多赤贫的本土居民能够接管被遗弃的阿拉伯人农庄。[④]但是在古巴，斐迪南的法令则几乎毫无意义，因为那里严重缺乏白人劳动力。受恩者们并不愿意横渡大西洋去自己从事劳动。他们想“如朕对其所期望的那样舒适地生活”，正像他们的君主生动地表达的那样。耕种和收获的实际工作必须由印第安人来进行，因为他们是仅有的可用劳动力。

当拉斯卡萨斯于1502年首次踏上圣多明各的土地时被告知“你来的正是时候，这里将有一场与印第安人的战争，我们能得到许多奴隶”。他说，这则新闻“让船上的人极度兴奋”。类似的情形很快在古巴各地出现。因为岛上的所有土地都被认为是属于国王的，所有的印第安人都被认为是奴隶。他们将成为征服者的劳动工具。

贝拉斯克斯也被授予“印第安人分配者”（*repartidor* of Indians）

① 即现在所说的西印度群岛，如所周知，由于哥伦布的错误，当时的西方人如此称呼新发现的美洲地区。——译者注

② 引自 Ramiro Guerra y Sanchez, *Sugar and Society in the Caribbea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Cuban Agriculture*, New Haven, 1964, p. 32.

③ 该词的原意是“邻居们”，但在殖民地则指国王的地方代表（原书文内注）。为了阅读的顺畅，这里提出来，置于注释中。——译者注

④ 这里指发生在西班牙的驱逐阿拉伯占领者的“光复运动”，旧译“列康吉斯达”。这里是将古巴的历史与西班牙本土的历史加以比较。——译者注

的头衔，这个职位特许他在征服者中分配印第安民众，给每个“王室代表”一群印第安人作为奴隶使用，这种制度被称为分摊制（repartimiento）。每一个“王室代表”都能得到一群当地印第安人，数目从40人到300人不等，于是，这些印第安人可直接被“受恩者”们役使。

贝拉斯克斯被编年史家给予了一个仁慈的好名声，尽管这种分配制度本来就不公平，但是他试图使印第安人能够被善待。在他的政令中，印第安人主要被用于种植业，并且在一年中只为他们的“受恩者”领主工作一个月。但事实上，这个制度并没有如他所愿的运转，反而给印第安人带来了灾难。

18

贝拉斯克斯明显有利的计划最终被抛弃了。所有帝国的历史都证明了，奴役土著民众为外国侵略者的利益而劳作是很困难的。土著居民拒绝工作，死亡或者亡命他乡。征服者们不得不从外地带来奴隶。古巴的印第安人也不例外。许多人在潘弗利奥的惩罚性行动中被屠杀，也有许多人仅仅是放弃劳动而藏匿到山间。

很快，征服者就必须从古巴外部寻找劳动力。他们在加勒比地区开展了猎奴行动，从附近岛屿捕捉印第安人。他们不顾一切地寻找劳动力，甚至航行到更远的地方，去往南美和中美大陆，甚至远至北美去开拓新的奴隶源地。对那些被俘的印第安人施虐的记载与后来人们所描写的大西洋奴隶贸易并无二致。16世纪中叶的一位意大利旅行者描绘了他在委内瑞拉海岸目睹的情形：

[印第安] 奴隶都被烧红的铁块在脸上和胳膊上烙上一个C符号[代表查理五世（Charles V）]；然后地方长官和队长们就可以随意处置他们；一些奴隶被分给士兵，士兵们随后卖掉他们或者在彼此之间赌博时输掉他们。当有船只从西班牙来时，他们用印第安人去换酒、面粉、饼干和其他需要的东西。甚至那些被这些西班牙人强暴而怀孕的妇女，也被毫不留情地卖掉。

然后，商人把他们运到其他地方再次出售。剩下的人被塞进特制

的大型快帆船中，转卖到伊斯帕尼奥拉岛。他们把这些印第安人塞到甲板下面，这些多在内陆地区捕获的印第安人对大海极端恐惧，任何人也不得走出充斥着其呕吐物与其他排泄物的舱底，他们不得不像动物一样站在垃圾污物中；而当大海处于平静状态时，他们仍然缺少淡水和其他食物，因此这些孱弱的可怜人受到炎热、恶臭和干渴以及拥挤的折磨，在船舱底下几乎窒息。①

经历了这样的虐待，这些被带到古巴的印第安人奴隶很快也像岛上的土著民一样死去，或者丧失了劳动能力，他们融入先前那些居于岛上人烟罕至的沼泽地和山谷间的难民群体中。当输入的奴隶不再能够被奴役时，征服者不得不再去其他地方寻找。绝望之中，他们转而去非洲购买黑奴。

19 这里的移民们从未因拉斯·卡萨斯的游说活动而获益。卡萨斯对受到屠杀的印第安人深为同情，他试图通过宣讲印第安人的苦难而引起西班牙君主的关注。他放弃了在岛上获得的土地，把生命的后 50 年献给了印第安人的事业。他往返于大西洋两岸之间，在墨西哥与马德里（Madrid）之间奔走呼号，接二连三地写作抨击性的文章。西班牙君主及其顾问们十分惧怕他的攻击。拉斯·卡萨斯所写的征服史和他所记录的早期印第安人的遭遇，成为阐述 16 世纪历史的最著名作品。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负责起了被称为“黑色传奇”的西班牙人暴行的建构，后来被英国人和荷兰人所宣传。几个世纪里，他的作品在欧洲的新教徒眼中几乎和《圣经》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他所统计的数字可

① 吉罗拉米·本佐尼（Girolami Benzoni）是一位来自意大利米兰的旅行者，他在 1541—1556 年间游历了美洲，并且写下了他在委内瑞拉海岸的一个西班牙聚居区 Cubagua 的见闻。他没有见到有过印第安奴隶被运送到古巴，但是描述了那些运至圣多明各的印第安人的命运。Girolami Benzoni, *History of the New World*, *Shewing His Travels in America from 1451 to 1556*, London, 1857.

能有夸大之处，但是这不能否定他的第一手观察的重要性。[①]

拉斯·卡萨斯在西班牙的游说很有效。西班牙王室意识到，如果殖民者们不施以仁政，印第安人有可能会灭绝。终于，在1529年，即征服后的20年左右，且在贝拉斯克斯于1524年去世后，国王设立了“印第安人保民官”（Protector of the Indians）职衔，并把这项任务交给两名天主教士。然而，这次值得称道的王室姿态只取得了微乎其微的成功。如同在殖民地社会所经常发生的那样，那些被派出来代表母国之改革意向的人，很快屈服于当地殖民者所施加的社会压力。在古巴，这两个神职人员很快站到殖民者的立场上，为自己的利益而压迫印第安人。

十年后的1542年，国王完全废除了领地制，颁布新的法令承认印第安人是臣民而不是奴隶，但为时已晚。大多数印第安人已经不存在了。同样的，殖民者也给当局敲响了警钟。许多早期西班牙移民——水手、商人、手工业者、农民——离开不安全和没有发展前景的南部西班牙来寻找新的生活。然而，一些怀揣着使自己成为农场主和小地主的梦想来到古巴的移民，却从未被明确地赋予占有土地的特权，或者没有被授予使用充足的印第安人为其劳动的特权。徇私舞弊和不称职的官僚们在中世纪随处可见。

其他人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耕种，他们的野心是寻找黄金。当他们发现黄金的产量减少时，成千上万的人涌往发现富含金矿的南美大陆去寻找黄金。当贝拉斯克斯从巴拉科阿移往圣地亚哥时，他已经为把古巴建成为西班牙人向南方和西方——到牙买加、达连（Darien）湾、墨西哥、秘鲁征服的跳板奠定了基础。

许多第一代的西班牙探险者像潘弗利奥一样把古巴视为进入大陆

---

① 有7 000多名儿童在其父母被运送到矿山后而饿死，我还见到了其他的一些惨景。后来，人们决定大规模猎杀逃到山中的当地土著民，随后，猎杀团体进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肆意残杀，从而造成该岛土地荒芜，人烟罕至。这使我们在最近上岛时，见到的是一片令人悲痛欲绝的惨象，它又恢复了原来那种广袤、贫瘠、荒凉的状况。Las Casas, *A short Account*, p. 30.

20 的跳板。每年都有新的探险家整装待发。第一批探险者于 1517 年由弗朗西斯科 · 埃尔南德 · 德 · 科尔多瓦（Francisico Herández de Córdoba）率领从哈瓦那（Havana）动身去尤卡坦。探险者回来告诉贝拉斯克斯，他们所去的地方比古巴更有魅力。他们热情洋溢地描述那些“人口稠密的国家，有石头建造的房屋，那里的人们都穿着棉布织就的袍子，他们拥有黄金并在田里种植玉米……”①

这些地区显示出比古巴更加诱人的前景，探险者的故事激发了贝拉斯克斯和其他许多人的兴趣。其中一个是曾担任过沉闷的殖民地巴拉科阿市长，后来成为圣地亚哥市长的埃尔南多 · 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据说，他认为：“我到那里是为了发财，而不仅是像一个农民那样去种地。”科尔特斯于 1485 年出生于埃斯特雷马杜拉（Estremadura）的麦德林（Medellin），他在 1504 年航行到圣多明各，参与了 1511 年贝拉斯克斯对古巴的征服。8 年后，在 1519 年 2 月，他征集了一支规模很大的征服部队从拉圣提斯玛 · 特里尼达岛（La Santíssima Trinidad）出发，开始了后来所说的对墨西哥的远征。一位当时的编年史家记载道：“我和我的同伴心理上都患了疾病，它只能用黄金来治愈。”随同科尔特斯出航的是一支由 380 名年轻人组成的军队，他们是古巴最优秀的殖民者，来自卡斯蒂利亚、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和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edura）。

科尔特斯的远征，以及随后从古巴到墨西哥和佛罗里达的探险活动（其中一支由潘弗利奥率领），是殖民者从加勒比地区卷向阿兹特克人（Aztecs）和印加人（Incas）的广大领土，标志着西班牙帝国掀开了美洲历史的新篇章。古巴是这场新运动的发源地，但不是直接的受益者。在大陆上发现了新的文明，以及随之组织的大量探险活动，加强了由科尔特斯建立的古巴的这个早期桥头堡的地位，这是影响未

① 见 Bernal Diaz del Castiool, *The Conquest of New Spain*, London, 1963, 26 页。“据说，这里的沃土是全世界所仅有的；而且，当人们发现了各式各样的陶土偶像时，人们认为，它们都属于异教崇拜的偶像，还有人认为它们是那些被提图斯和维斯帕芗驱赶出耶路撒冷，并用船运抵此处的犹太人制作的。”

来古巴社会建立的最主要因素。这种做法不权剥夺了古巴崭新的发展前景，而且为把古巴变成一个纯粹的前往（和返回）美洲大陆的中转站铺平了道路——这原本应是它最无关紧要的作用。

黄金激发了人们去其他地方探险和定居的热情，这在古巴留下许多荒凉的西班牙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在几十年里陷入了贫困和人口锐减的境地。根据一份当时的估算，在 1544 年，该岛人口不到 7 000 人，其中有 5 000 名印第安人、800 名黑奴，仅有 660 名西班牙殖民者。[①] 在 30 年的殖民活动后，殖民者仅仅保留了一个小的立足点。直到很久之后的 16 世纪，当那些载满来自秘鲁和墨西哥白银的宝船必须在冒险横渡大西洋之前，在哈瓦那集结之时，古巴才又有了经济上的繁荣——恢复了它作为西班牙帝国黄金链条中重要一环的地位。

古巴的印第安人发生了什么事?

21

在大多数版本的古巴早期历史中，印第安人都是以极快的速度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虽然阿拉贡的斐迪南严令要保护印第安人，贝拉斯克斯也关注着不使印第安人灭亡，但征服的实际情况却是印第安人口大量并且急速地消失。他们或死于潘弗利奥罪恶的野蛮屠杀中，或死于由征服者带来的欧洲疾病。此外，还有出于其本身原因的死亡。文化的冲击对他们的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20 世纪的古巴人类学家费尔南多·奥拉兹（Fernando Ortiz）记载了完全不同的文明对当地民众造成的灾难性影响：

> 随他们而来的有大量铁器、弹药、马匹、马车、帆船、罗盘、钱币、工资、文书、印刷厂、书籍、主人、国王、教会、银行家……一场革命性的剧变颠覆了古巴的印第安人，彻底地撕裂了他们原有的制度体系并毁灭了他们的生活。[②]

---

① Suchilicki, *Cuba from Columbus to Castro*, p. 28.

② Fernando Ortíz, *Cuban Counterpoint Tobacco and Sugar*, Durham, N. C. 1995, p. 99.

征服者制造的暴力压迫是不仅应当受到谴责而且产生了与预期相反的效果。因为那时确实有印第安人的反抗，最著名的像阿图伊和卡瓜克斯，他们都经历了西班牙人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屠杀，还有许多遗存下来的记载描述了当地印第安人以友好方式欢迎入侵者。他们出于诚心的善意表现常常被入侵者误解或者被视而不见。在所有帝国的历史上，处于征服前线的殖民者明显是最残忍的，在古巴的西班牙人也不例外。没有一个西班牙司令官能够控制他的军队的过激行为。他显然更不能控制他们的猎犬。

在古巴征服的早期，猎犬被西班牙人作为一种最具威慑力的武器来使用。爱尔兰赛犬被带进这个岛，受到训练后去寻找和屠杀印第安人，如拉斯卡萨斯所说，"把他们撕成碎片……并且活埋他们"。[①] 后来，这些猎犬被用来搜捕逃跑的黑奴，而且关于他们使用这种手段追逐被征服者的消息甚至传至加勒比其他地方和北美洲。[②]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印第安人选择了自杀，甚至全家一起。拉斯卡萨斯写道："一些人开始逃到山林中，而其他人则绝望地放弃了自己的生命。男人和女人上吊自杀，甚至亲手吊死了他们的孩子。"[③]

以往编写的古巴历史忽视或者低估印第安人在后来若干世纪中在该岛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解释道，至16世纪末印第安人已经由于屠杀、疾病和自杀而消失了。但是，著名的美洲历史学者伊琳娜·莱特（Irene Wright）于1910年写道，"在我看来那根本是不可能的"，"甚

22

① Bartolomé de Las Cassas, *Historia de Indias*, Mexico City, 1952, vol. III, p. 103.

② 罗德里戈·廊桥（Rodrigo Rangel）是赫尔南德·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的秘书。赫尔南德·德·索托领导了1539年从哈瓦那到佛罗里达的征服。罗德里戈·廊桥解释道，征服者经常带着"爱尔兰灰猎犬和勇猛、残暴的猎狗"。读者应该可以理解，他写道，"把他们投向狼狗，他们就会被狗吃掉，撕烂。"参见 E. G. Bourne, *Narrative of career of Hernado de Soto*, New York, 1904, vol. II. 60 页。Henry Bouquet 上校在1763年承担了征服北美印第安人的任务，他写道："我希望我们能使用西班牙的方式，用英国犬追捕他们，辅以骑警和一些轻骑，我认为，它们才能有效地消灭和驱逐这些害人虫。"后来，英国人听说，古巴的西班牙人使用了36条狗和12名训犬师将莫斯基多印第安人（Mosquito Indians）逐出尼加拉瓜海岸地区，而在1795年，西班牙当局自古巴派出军犬和训犬师去牙买加镇压逃亡黑奴的一次起义。

③ Las Cassas, *A Short Account*, p. 32.

至现在古巴人仍旧保留着土著居民的红色人种的血缘特征。”①

把印第安人的痕迹从古巴历史中抹去的做法持续了很长的历史时期，然而印第安人看上去仍在许多世纪里在古巴持续存在着并发挥着其重要性。虽然西班牙殖民者建立了6个坚固的殖民城镇，但岛上的大多数地区却处于他们的有效控制之外。在大片沼泽和山地的丛林中以及沿海岛屿中，一定有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能够不受干扰地生存几十年，甚至可能达几个世纪。在16世纪和17世纪，逃亡的黑奴加入到这些被遗忘的印第安幸存者中，形成了帕伦克隔离区，即在19世纪和20世纪能够为更广泛的抵抗运动提供救助的独立的城镇和乡村。这种隔离区——类似于在其他加勒比海诸岛上建立的逃亡黑奴定居中心——经常被历史学家视为黑人抵抗的中心，但实质上，它们只是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混居处。

在19世纪的前50年中，由于西班牙男性殖民者在印第安妇女身上发泄自己的性欲，出现了大量的混血人口。这种情况也发生在17世纪拉丁美洲大陆的其他地方。第一代横渡大西洋进行征服和殖民活动的士兵和殖民者中很少有妇女。1514年，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官方所认可的西班牙男子的妻子中，有40%是印第安人。一份权威的结论认为“在现代多米尼加共和国（Dominican Republic）、波多黎各（Puerto Rico）和古巴的人口中，相当一部分的人可能有部分泰诺血统”。②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代又一代混血儿的姓名和语言来自于他们的西班牙父亲，然而他们也肯定带有他们印第安母亲的文化和基因。在征服后的第一个世纪所产生的古巴民众中的印第安血统一定会因随后几年里大批新殖民者和奴隶的涌入而被冲淡，但它绝不会完全消逝。在1895—1898年古巴独立战争期间，在古巴的美国记者格罗弗·弗林（Grover Flint）记载道，他遇见了“一位十年战争中的老兵，被称为

---

① Irene Wright, *Cuba*, New York, 1910.

② Rouse, *Tainos*, p. 161.

'Indio Bravo（印第安人勇士）' 的大米奎兰（Major Miguelin）……他有着古铜色眼睛，自称有印第安人血统……"[①]

1901 年，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大学的一位人类学家斯图尔特·库林（Stewart Culin）因听说在古巴东部山区存在"一个原始的印第安部落"，遂赴巴拉科阿考察，在那里发现了印第安人和混血儿居住的村庄，并给他们照了相。[②] 后来，在 20 世纪，古巴地理学家和革命者安东尼奥·努涅斯·希门尼斯（Antonio Nuñez Jiménez）1945 年在马埃斯特腊山（Sierra Maestre）脚下碰见了纯种的印第安人。他也展示了自己给他们照的一幅照片。[③]

尽管印第安民众作为一种持续的文明和文化已经被完全摧毁，但在该岛的记载中告诉我们，那些个别幸存的印第安群体可能是为了适应古巴政府某些特定时期的需要而被说成是"消失"了的。他们第一次"消失"是由于殖民者和西班牙国王在涉及土地时的争执。在 16 世纪，由于拉斯卡萨斯的努力，印第安人被置于西班牙王室的保护之下。他们的人身和土地不能被殖民者（合法地）染指。这项保护印第安人的政策导致了这样的结果，那些贪婪地攫取土地的殖民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声称印第安人已经被杀光。如果那里没有印第安人，如果他们已完全消失的观点被接受，那些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人，尽管他们认为自己是印第安人，却不能够要求受到君主的保护。印第安人曾居住的特殊区域——可能确实还在那里居住——也就能被殖民者以合法的方式宣布拥有。

后来，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古巴的进步人士也乐于无视印第安人的幸存，因为那些发起"印第安原住民主义（indigenismo）"运动，试图赞美和发扬古巴印第安人传统的人们，通常也是保守的种族主义

① Grover Flint, *Marching with Gomez: a war correspondent's field note - book kept during four months with the Cuban army*, London, 1898, p. 28.

② Stewart Culin, "The Indians of Cuba", *Bulletin of the Free Museum of Science and Art*, Philadelphia, vol. III. no. 4, May 1902.

③ *Antonio Nuñez Jiménez*, *Geografia de Cuba*, 2*nd*, *edn*, *Havana*, 1960 (1*st edn*, 1954) p. 652.

者，他们想歌颂印第安人的过去、贬低民众中非洲黑人的贡献。19世纪那些急于保护西班牙文化的小说家们，经常在他们的历史小说中构建印第安人的形象，作为抗衡那些颂扬古巴非洲传统的砝码。①

这种观点也受到音乐家的支持。一位19世纪古巴音乐研究者安东尼奥·巴奇列尔·莫拉莱斯（Antonio Bachiller y Morales）认为古巴音乐的非凡特征来源于土著民因素而不是来自于非洲—古巴元素。在他于1880年出版的《古巴原始艺术作品》（*Cuba Primitiva*）一书中，讨论了西波尼印第安人的音乐和舞蹈，并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印第安音乐被大量地融入到［古巴民歌］中，其程度远超过以前我们的想象"。② 他们强调古巴文化对印第安传统继承的因素大于黑人贡献的目的是企图把古巴的文化从"非洲因素"的"污染"中解放出来。③ 古巴革命后，大部分古巴本国的历史学家也拒绝承认，甚至拒绝讨论印第安人幸存的可能性。一种类似的缄默状态也存在于加勒比地区的其他国家。

输入黑奴人口

这种沉默并没有影响到当代学者对于古巴非洲人口的研究。黑奴制度和严密控制奴隶的需求是古巴早期殖民时代遗留下的部分遗产，长期以来也一直被认可。白人不愿意从事劳作，印第安人劳动力的紧缺以及从其他岛屿和美洲大陆捕获印第安人计划的失败迫使西班牙当局寻求一种新的、被其他时期的另外一些帝国所采用的方法。从遥远国度运来的奴隶毫无逃跑的希望，他们与众不同的肤色使得他们在企图逃跑时很快被认出。　24

---

① 按照鲁宾·穆尔（Robin Moore）的观点，该运动根植于拉蒙·德·帕尔马（Ramón de Palma，1812—1860）、被称为"El Cucalambé"的克里斯托鲍尔·那布勒斯·法雅德（Cristobal Napolés Fajardo，1829—1862）和约瑟·弗纳利（José Fornaris，1827—1890）的文学作品中。见 Robin D Moore，*Nationalising Blackness*，*Afrocubanismo and Artistic Revoliution in Havana*，*1920—1940*，Pittsburgh，1997，127页。

② Moore，*Nationalising Blackness*，p. 28.

③ Moore，*Nationalising Blackness*，pp. 129 - 130.

征服加勒比地区的很久之前，在西班牙本土，来自非洲的黑奴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阶层。15 世纪，10 万名以上的黑奴在西班牙工作，他们绝大多数在安达卢西亚。[①] 结果，奴隶成为殖民者扩张时经常使用的工具，在 1511 年后，他们中的多数人作为个人奴隶被带到古巴。早在 1516 年，奴隶就被要求参加国家的建筑项目。贝拉斯克斯曾恳请西班牙国王从圣多明各派遣“12 名非洲黑人”到圣地亚哥修筑防备袭击的要塞。与此同时，尽管输入黑奴的花费一直被视为一笔沉重的负担，富裕的殖民者还是已经通过自己的方式获得了黑奴。这种早已建立的合法和半合法的贸易模式，还将持续几个世纪。

直到 16 世纪 20 年代，圣地亚哥当局才考虑到可以大规模输入奴隶以作为矿山和庄园的劳动力。1527 年，考虑到岛上人口的减少——因为印第安人明显的死亡和许多年轻的殖民者离开此地去墨西哥——国王做出了一项在随后 350 年里影响岛上移民模式的决定。命令要求往古巴运送“1 000 名非洲黑奴”，“以减轻印第安人的劳动强度”——但是，在这个特别的事件中，记录显示文件所提的这批黑奴从未到达古巴；缩减了的殖民群体没有能力承担购买奴隶的资金。[②] 事实上在经历了最初的冲动后，他们不再急于购买新的奴隶。16 世纪 30 年代以后，每年运来的奴隶数量极少超过两位数的情况也证实了，由于殖民者大量离开此地到墨西哥去，古巴殖民地的发展极其缓慢。[③]

无论前几十年到底有多少奴隶来到这里，国王的法令已经颁布。古巴作为一个黑人和黑白混血人群国家的未来已经确定。这些从非洲被强迫移民的黑人——伴随着 16 世纪西班牙人的登陆和殖民，以及绝大部分土著民的逐渐减少和最终消亡——对古巴的历史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古巴的社会、文化和经济，以及人民的种族成分都不可

① Levi Marrero, *Cuba: Economia y Sociedad*, Madrid, 1978, vol. I, p. 211.

② Hubert Aimes, *A History of Slavery in Cuba, 1511—1868*, New York, 1907, p. 8.

③ 大主教卡斯蒂利亚的萨米安托（Bishop Sarmiento y Castilla）在报告中写道，1544 年，有 744 名奴隶到达，但是这一数字显然“包括黑人和外来的印第安人”。Eduardo Torres Cuevas and Oscar Loyoa Vega, *Historia de Cuba, 1492—1898*, Havana, 2001, p. 60.

逆转地被这种历史性的人口迁徙改变了。

古巴的奴隶贸易又持续了三个世纪，在这段时间，刚好有不到100万的非洲人被强迫迁移到该岛。其中大部分（可能占总数的85%）于19世纪到此从事甘蔗种植工作。当时，该岛繁荣的主要来源就是甘蔗种植。虽然在奴隶贸易的最后岁月里，这种贸易成为有争议的和非法的行为，但是奴隶输入并没有停止，直到1886年奴隶制被正式废除为止。美洲其他国家早已废除奴隶制，但是古巴（还有巴西和美国）仍旧继续保留它，甘蔗种植园主惊人的财富依赖于奴隶制的继续存在。 25

16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通过如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一类人的大量作品和激进的政治活动，西班牙君主的注意力转移到矿山中的印第安人的生活状况上。国王迫于压力，禁止在矿井中使用印第安人，然而却免不了听到殖民者对劳动力紧缺的抱怨。殖民者想得到黑奴，而且想免税地输入黑奴。他们告诉巴亚莫主教，这个岛将“由于缺乏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而毁于一旦。1542年，当地殖民者要求圣地亚哥、太子港（Puerto Príncipe）和圣斯皮里图斯（Sancti Spíritus）省的行政长官呈送一份要求获得更多奴隶的紧急申请：“这里最急需的是非洲黑人……我们祈求当局准许每位公民都可免税带来4名非洲黑人。”①

为了允许殖民者摆脱进口税，古巴当局认可了（或者无视）他们从摩洛哥（Morocco）的巴巴利（Barbary）海岸以及地中海的撒丁岛（Sardinia）、马略卡岛（Mallorca）和梅诺卡岛（Menorca）私自运来便宜的奴隶。此行为对于想要把美洲民众全部天主教化的王室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为这些奴隶不仅仅廉价，而且都是穆斯林。一份1543年的王室法令命令将古巴的所有来自北非的奴隶驱逐出岛。“因为居住在利凡特（Levant）那个区域的非洲黑人说他们是摩尔人或穆斯林，于是，其他穆斯林将会在天主教信仰已经扎根的新大陆与这些

① Aimes, *History of Slavery*, p. II.

穆斯林联合，因此，输入此类人是不符合我们利益的”。[①]

16 世纪 40 年代之后，大多数黑人直接来自西非海岸。少数黑人由于西班牙殖民地的动乱，后来与他们的主人一起自新大陆而来：1655 年来自牙买加的；1791 年来自圣多明各的；1808 年来自路易斯安那（Louisiana）的；后来在 19 世纪来自佛罗里达、墨西哥以及来自独立的南美洲各共和国的。

早期种植园的奴隶绝大部分是男性，因此他们的人口不能够自我增长，尽管“开明的”种植园主在 19 世纪末输入了大量的女性奴隶，但奴隶贸易仍在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着。在涉及奴隶贸易是否正义的争论中，19 世纪的一些种植园主始终以维继“性别平衡”为由进行辩解。

在整个 16 世纪，黑人的输入量不断增加，16 世纪末有 12 000 名黑奴生活在这个岛上，形成了可能是移民中最大的一个孤立的群体。[②]1581 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联合后，有更多的定期运输陆续到达。古巴现在能够利用葡萄牙和非洲之间的奴隶贸易，通过一切合法或者非法的手段持续获得奴隶。其中一些奴隶是通过葡萄牙的船只运抵哈瓦那的，其他的是通过走私船的贸易，沿着海岸线运送到小港口的。这种大量的、被当地禁止的贸易不仅是小商人乐于从事的买卖之一，而且官员和教士也乐此不疲。

起初，输入的非洲人只保持一个较小的比例，然而从 17 世纪开始时，非洲人口数量已经占到了全部人口的一半，这在白人殖民者中间引起了普遍的恐慌。非洲移民从来没有接受他们作为奴隶的生活状况。像他们的印第安人先驱那样，第一批前来的黑奴和他们的后代经常起来反抗。1532 年的一份政府文件提到，岛上共有 500 名黑奴（和4 500 到 5 000 名印第安人），也提到了第一次黑人起义的消息——在巴亚莫附近的约巴伯（Jobabó）金矿。这次起义很快被镇压，领导者的首级

① Marrero, *Cuba: Economia y Sociedad*, vol. I, p. 220.

② Jorge and Isabel Castellanos, *Cultura Afrocubana: el Negro en Cuba, 1492—1844*, Miami, 1988, vol. I, pp. 20 - 25.

被挂在城外的旗杆上示众。[①] 另一起黑人与印第安人联合的起义发生在1538年，当局派出训犬师（rancheadores）平定了它。总督随后报告说“Se ha hecho justicia, y ya esta la isla segura”，即正义取得胜利，岛上归于安定。[②]

大量输入黑人的事实在殖民早期就引起了殖民者的恐慌，因此黑人和印第安人都被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逃亡的黑奴既不能抛头露面，也不能独立生活，他们时刻为自己可能受到的惩罚而担惊受怕，后来，这项法律也扩及到印第安人。16世纪50年代的一则报道说，黑人去做行商，贩卖肉类和水果是不合法的。那些被捉住的人将被责罚300鞭子（当印第安人在独木舟内或者马背上被发现时责罚200鞭子，再次触犯时责罚300鞭子并割去一只耳朵）。[③]

1606年，哈瓦那的白人市民呈递给总督一份备忘录，提醒总督注意：他们估计在这片殖民地的黑人有20 000名左右。这些警惕的市民写道，如果这些人起来造反并与盘踞在附近海岸的海盗武装联合，那么他们很容易就能将这个岛从西班牙手中夺去。[④] 殖民早期对于奴隶叛变与外部干涉的恐惧，在以后的3个世纪中一直使白人殖民者忧心忡忡。

德雷克（Drake）战鼓之打击（1586）

在哈瓦那狭窄港湾入口处附近，屹立着雷尔弗埃查城堡（Castillo de la Real Fuerza），它是位于加勒比海岸旁的一座“袖珍型”的16世纪西班牙山头防砦。堡垒是两层的方形建筑，四角棱堡环绕，它的灰色石墙周围现在环卫着晚些时候的古式加农炮。它背靠着阿巴斯（Plaza de Armas），经常是游人如织，屋顶的小阁楼提供了一个远眺城

① Marrero, *Cuba: Economia y Sociedad*, vol. I, p. 211.

② Marrero, *Cuba: Economia y Sociedad*, vol. I, p. 219.

③ Marrero, *Cuba: Economia y Sociedad*, vol. I, p. 221.

④ Irene Wright, “Rescat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uba, 1599—1610”, *Hispanich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III, no. 3, August 1920, p. 358.

市和港口的绝佳之处。这座令人愉悦的城堡建于16世纪60年代，与其说它是一座防御工事，不如说是西班牙权力的一种象征，由于它深入内陆，不能直接威胁16世纪时可能到达海岸地区的海盗船。在200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西班牙总督的官邸和办事处。

27

这座城堡是在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Ⅱ）的命令下建造的，其目的是防范欧洲海盗的威胁。因为随着第一代西班牙殖民者定居古巴，该岛成为了所有欧洲国家挑战西班牙王室对新世界（New World）所有权的攻击焦点之一。加勒比海在16世纪成为了南欧天主教帝国与北方新教列强的角斗场之一。这种角逐主要是军事和海上势力的较量，但是以强烈的宗教狂热和意识形态冲突为特征的，还受到了不可妥协的贸易需求的刺激。①

16世纪20年代，第一艘袭击古巴海岸的船只来自西班牙在欧洲的主要敌人法国。早在1523年，就有一艘法国船截获了科尔特斯派出的从墨西哥到西班牙的宝船。法国人之后，葡萄牙人、英国人和荷兰人接踵而至，他们的海盗船无休止地袭击古巴海岸。这些外国船只在近海一直游荡了200多年，掠夺在哈瓦那集结的那些从墨西哥和秘鲁满载价值连城货物而返回的西班牙宝船，并且对岛上的生产和商业造成了长久的威胁。

由于西班牙新来者很少定居在古巴，因此无助于增加这个年轻的殖民地本来就稀少的欧洲人口。16世纪50年代，岛上的殖民者仅有322户，1570年哈瓦那所炫耀的数字也仅有60户。② 岛上只有为数不多的防守士兵，许多年轻人都已经去美洲大陆寻求他们的前途，对来自海上的袭击只能进行软弱的抵抗，外国船只来去自如。

第一次对古巴袭击的起因完全是由于法国和西班牙在欧洲的对抗。1519年，斐迪南二世（Fedinand Ⅱ）的西班牙王国摇身一变成为查理

① Louis Martinez – Fernandz, *Torn Between Empires: Ecomony Society and Patterns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Hispanic Caribbean, 1840—1878*, Athens, Ga., 1994, p. 11.

② Henry Kamen, *Spain's Road to Empire, the Making of a World Power, 1492—1763*, London, 2002, p. 121.

五世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庞大的帝国囊括了欧洲多数地区，与法国人进行了持续40多年的战争，直到1559年方才结束。查理五世与法兰西君主弗朗西斯（Francis）之间的冲突很快扩展到加勒比海，从16世纪20年代开始，法国海盗不断在这里制造事端，摧毁船只和港口。[①]

巴拉科阿、圣地亚哥和哈瓦那的港口会定期受到法国船只的侵袭。一支法国舰队在1537年，即在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向佛罗里达进军的前夜，占领了哈瓦那。法国的私掠船在1538年至1540年期间封锁了圣地亚哥。巴拉科阿港在1546年被洗劫，圣地亚哥也在1554年和1558年两度遭到洗劫。1555年，雅克·德索雷（Jacques de Sores）率领军队洗劫哈瓦那，这使法国在加勒比海对西班牙的战争达到高潮，在当时的文献记载中，雅克被描述为“一个路德教徒”和“法国或英国最伟大的私掠者”。[②]

28

雅克·德索雷的袭击是古巴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它引起了——反常态地——相当激烈的抵抗，第一次显示出萌芽状态中的古巴民族主义特征。印第安自由人和黑奴都参加了殖民者（the vecinos）的武装，抵抗外国入侵者，并嘲笑入侵者为一船法国“异教徒”。一群在港口东部瓜纳瓦科阿（Guanabacoa）建立保留地幸存的印第安人热情地与他们的新统治者一起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这场抵抗徒劳无功，这主要是由于西班牙总督缺乏领导能力，雅克·德·索雷在这天获胜。哈瓦那被占领并且被彻底烧毁。[③] 这次法国人的胜利并没有导致更广泛的影响，因为法国私掠船没有能力占领全岛。雅克在袭击城镇后满意地离开。无论如何，一项欧洲和平协议已经在讨论中，和往常一样，加勒比海事务仍然取决于远方的决定。4年后，即1559年法国和西班牙停战，在加莱（Calais）南部的卡托—

---

① Kenneth Andrews, *Trade, Plunder and Sttlement: Maritime Enterprise and the Genesis of the British Empire, 1480—1630*, Cambridge, 1984, p. 118.

② Irene Wright, *Historiaa Documentada de San Cristóbal de la Havana*, Havana, 1927.

③ Marrero, *Cuba: Economia y Sociedad*, vol. I, p. 271.

堪布累奇（Cateau – Cambresis）签订了一份和约。

欧洲的和平是一个显著的成就，然而制止美洲海盗船和私掠船的半独立的活动却并非易事。另一个法国船长让·里鲍（Jean Ribault）于 1562 年在佛罗里达海岸的卡洛林堡（Fort Caroline）建立了一个胡格诺士兵的殖民地，这对天主教徒控制的哈瓦那北部的战略性航道佛罗里达海峡是一个威胁。一直负责护送回国货物的西班牙舰队司令官佩德罗·梅嫩德斯·德·阿维莱斯（Pedro Menendez de Aviles）在 1565 年被派去摧毁异教徒的殖民地，屠杀了“不是法国人而是路德教分子”的法国殖民者。据他自己的估计，“我们杀死了 132 人”，他的凶残——在欧洲被广泛报道——在许多年内都威慑着其他欧洲人，使其不敢定居在西班牙的新世界。①

梅嫩德斯所受到的奖励是被任命为古巴总督，但是像许多后来的古巴人一样，他更为佛罗里达的潜在价值所吸引，于是在大西洋沿岸的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建立了一处要塞，恰在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的南部。这个与印第安人隔海相对的小殖民点从未繁荣起来，西班牙新国王拒绝批准梅嫩德斯对他的对手发动一场“血与火的战争”。200 年后，佛罗里达仍旧不过是哈瓦那的一个前哨。

16 世纪 60 年代，一位有活力的新君主统治了西班牙，这位统治者试图给西班牙的美洲帝国带来秩序——古巴首当其冲。从 1556 年到 1598 年，菲利普二世持续 40 多年的统治给哈瓦那城留下了永久的痕迹。作为德意志人出身的查理五世皇帝之子，菲利普是在卡斯蒂利亚长大的王子，具有西班牙人的观念，他也很少关注庞大的哈布斯堡帝国。哈布斯堡王室的传统领地奥地利（Austria）被查理五世遗赠给自己的兄弟斐迪南（Fedinand），斐迪南于是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新皇帝。而菲利普拥有更有价值的遗产，即其继承的西班牙和美洲——包括古巴——以及西班牙的意大利（Italy）和尼德兰（Netherlands）属地。20 年后，即 1581 年，像是对其失去奥地利的某种补偿，菲利普

29

① 引自 Kamen，*Spains Road to Empire*，249 页。

得以把葡萄牙和它的帝国纳入了自己的全球势力范围。[①] 与葡萄牙的联合使西班牙可以将有利可图的巴西和安哥拉（Angola）领土以及非洲奴隶贸易和葡萄牙（Portugal）海军都纳入自己的手中。

德索雷占领哈瓦那后，菲利普二世在加勒比地区的第一项任务是应对欧洲袭击的威胁。他在所有重要的港口都建造了大型要塞，并为那些从墨西哥和秘鲁运白银到塞维利亚，中途在哈瓦那集结的宝船组织了相应的防卫。

早年，当最早到达古巴的西班牙民众放弃此岛去美洲大陆寻找更多的财富和荣誉时，古巴曾失去了其在西班牙帝国中的重要性。现在它重新获得重要性是因为地理学家和航海家开始明白它的特殊性。从北非海岸向西穿过大西洋的船只被强劲的海风推动抵达古巴南岸的圣地亚哥。从哈瓦那北岸离开的船只同样可借北大西洋盛行的西风穿过巴哈马群岛（Bahamas）向东返航。在此后的 3 个世纪，哈瓦那成为西班牙和美洲之间商业交往的支点。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西班牙据点，它未来的地位现在已经被认可了，但是首先它必须保卫自己免受欧洲掠夺者的攻击。

1561 年，即法国人摧毁哈瓦那之后的第六年，菲利普命令在哈瓦那港口建立一些大型要塞。雷尔弗埃查城堡是加勒比地区第一个象征西班牙权威的大型建筑。类似的和更坚固的要塞最终建立在波多黎各的圣胡安（San Juan）和哥伦比亚海岸的卡塔赫纳（Cartagena）。菲利普也设计了一套新的护航体系，即所有从哈瓦那驶往塞维利亚的宝船，都会有一支武装舰队提供保护。

载着殖民地所需货物的西班牙舰队常常从塞维利亚［后来从加的斯（Cadiz）］启程，沿非洲海岸南下至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或者到佛得角（Cape Verde）。从这里它将顺风航行直抵哈瓦那。在哈瓦那，它将分成两支独立成行的舰队，新西班牙（Nueva España）舰

① 在菲利普的侄子——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奥（Sebastião）于 1578 年在摩洛哥阿尔卡萨基维尔（Alcázarquivir，即凯比尔堡）之战被杀后，葡萄牙被并入西班牙。

队驶往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Vera Cruz），大陆（Tierra Firme）舰队驶往南美大陆，先在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停靠，然后驶抵巴拿马（Panama）的诺姆布拉德迪奥斯（Nombre de Dios）港［后来驶抵的是贝洛港（Porto Bello）］。

当这些船只满载金银和绿宝石返航时，在横渡大西洋之前，两支舰队将在哈瓦那集结。这种偶然形成的从美洲向西班牙转移财富的方式极易遭受海盗的攻击。一种为往返塞维利亚的船只提供非固定和非正式护航的活动在16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菲利普现在为增强这种保护提供了必要的资金。

30

在这种新体系下，从拉丁美洲大陆驶出的船只组成的宝船队将首先抵达哈瓦那。这些船只将在这个港口集结，16世纪末，经常一次超过100艘船，在横渡大西洋的海军舰队准备好之前，船员们可能要等待几个月。然后，它们在海军舰艇的严密保护下驶往西班牙，穿越大西洋到达塞维利亚。这些宝船队每年在飓风季节前的秋季航行一次。

如此多的外国水手出现在哈瓦那——因为西班牙船只的船员来自所有的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欧洲及其以外的国家——给哈瓦那城带来了持续几个世纪的世界风味。为了服务这些过客，哈瓦那成为一座由木匠、泥瓦匠、店主、娼妓、银行家和商人云集的城市。船舶维修成为一项中心活动，后来成为一项重要的产业。它利用当地能够获得的结实的热带木材为西班牙海军提供船只。

然而，当哈瓦那因为路过的宝船而富裕时，穷困而人口稀少的古巴在16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仍旧不断遭受外部的干涉。与法国的和平在1559年得以实现，他们在佛罗里达的殖民据点被摧毁，现在，西班牙的加勒比地区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独立的海盗，这种威胁此后持续了200年之久。海盗们可能会威胁古巴的城镇，或者仅仅作为沿海经商的独立商人，带来欧洲商品并且从殖民者的大牧场中收购牛肉和牛皮。在早期，这些独立活动者大部分是法国人或葡萄牙人，后来是英国人和荷兰人。

在西班牙占领的前两个世纪，古巴许多土地上建立了大牧场。蔗

糖和烟草是后来得到发展的。在这些年里，古巴人民的生活贫穷艰苦，与世隔绝。[①] 因为法律严厉禁止他们与外国人贸易或者交往，大部分人饲养家畜并耕种小块赖以生存的土地，有时出售牛皮或腌牛肉。这些可以在哈瓦那通过官方途径完成，要么就是通过非法手段，且是获利更多的方式，在省内与走私者和海盗贸易。

加勒比地区新一代的欧洲海盗使用许多伪装和不同的名称：如巴肯尼亚海贼（buccaneers）、私掠船员（corsairs）、私掠者（privateers）等。有时，来源于荷兰语的称呼是自由冲锋者（free-booters）或者暴民（filibusters）。"巴肯尼亚海贼"上岸寻找腌肉。古巴的印第安人（从海地的土人那里）学会了一种保存肉食的方式，即把肉晒干，然后再在用绿叶和枝条生的火上熏烤。印第安人称用来挂肉的支架为 *boucan* 或 *buccan*（*bacon*），当时，制作或者出售这种肉的人被称为 *bucaniers* 或者 *buccaneers*。[②]

31

猪是西班牙殖民者从欧洲带到古巴的第一批家畜。早期，猪仔允许在岛上散养，猪肉成为一种重要的食物，它不仅对于当地的殖民者，而且对于那些来到被遗弃的小海湾寻找淡水和食品的海盗都非常重要。他们学会在"支架"上烤猪肉，于是，这个词就与海盗自身联系起来，即把腌肉带回家的人。

"私掠者"这一用语本身不同于"巴肯尼亚海贼"，后者拥有他们所在国家的官方执照。而私掠者拥有自己的私掠船，受到法国或者英国君主（和后来的荷兰君主）的授权，可在战时攻击敌方船只。[③] 所有从事上述活动者都从事沿海走私，这种行为在西班牙语中被称为"rescates"，常被用来指以物易物或者赎金，即一种常常被认为包含欺诈和蒙骗的交易。[④] 掠夺者从欧洲运来奴隶和奢侈品，殖民者供给他

① Guerra, *Sugar and Society in the Caribean*, p. 35.

② Hudson Strode, *The Pageant of Cuba*, London, 1935, p. 66.

③ Kenneth Andrews, *The Spanish Caribean: Trade and Plunder, 1530—1630*, New York, 1958, p. 245.

④ Kenneth Andrews, *Elizabethan Privateering: English Privateeering during the Spanish War, 1585—1603.* Cambridge, 1964, p. 120.

们肉和皮革。早期的殖民者随船带来牛和猪，这些早期殖民者逐渐富裕和拥有特权的后代在古巴经营大牧场，为欧洲对廉价皮革永无穷尽的需求提供产品。16世纪70年代，每年（合法的）出口2万张皮革，皮革的产量远远超过了当地对肉类的需求。

欧洲掠夺者和非法商人从古巴不设防海岸的多处港湾登陆。因为他们是此地的主要商人，富裕的古巴牧场主并不讨厌获得以物易物和交换的机会。在菲利普二世考虑保护哈瓦那和宝船时，他忘记了岛上的其他地方。在哈瓦那建造的要塞很少能够阻止海盗的袭击，因为海盗们能够选择古巴无数小海湾的任何一处登陆。岛的东端留下了大量的不设防的缺口，长久暴露于入侵和袭扰之下。邻近的圣多明各富人在1595年10月报告说海盗们已经在当地的港口活动了4年。

如此的人数众多，如此的永不停息，好像这里是他们自己国家的港口……他们安然地闯入，寻找可进行以物易物交易的对象，寻找人烟稀少和广布有角牲畜的土地，因此他们在任何立足的地方伺机等待非洲黑人和其他在丛林中生活处于法律管辖之外的可怜的违法者出现……①

在16世纪的后20年，这些沿着加勒比海岛屿沿岸掠夺的行径被那些在整个加勒比海地区占主导地位的英国私掠者主导。英国继法国之后成为了西班牙的头号劲敌，此后两国进行了持续18年的战争，即从1585年到1603年伊丽莎白（Elizabeth）女王驾崩。这场战争对哈瓦那以外的古巴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私掠者很快登上沿海缺乏保护的殖民地，对畜牧场和糖厂发动攻击。被孤立的古巴殖民者就只能同英国私掠者进行物物交换的贸易了。②

32

菲利普二世在1586年意识到，其通往南美洲的门户——加勒比帝

① 引自 Andrew，*Elizabethan Privateering*，37页。

② Kenneth Andrews（ed.）*English Privateeering Vayage to the West Indies*，*1588—1598*，Cambridge，1959，p. 30.

国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下。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英国私掠者——40 多岁的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就在 1586 年沿着古巴海岸巡航。德雷克作为那个时代典型的私掠者已经熟悉了西印度，并且使自己成为那里的一位名人。他早在 15 年前就获得了伊丽莎白女王颁发的“常规私掠特许”，并且在 1572 年对加勒比海进行了一次初步探险。他摧毁了诺姆布拉德迪奥斯港（Normbre de Dios），这是从秘鲁运载白银的宝船在巴拿马的集结地（在 16 世纪 90 年代被贝洛港取代）。

随着西班牙和英国的战争在 1585 年爆发，德雷克再次被派往西印度。这次不是私掠行动，因为他率领了一支庞大的英国舰队——载着 2 000 人和 12 支士兵分队的 22 艘船。他得到了攻击加勒比地区西班牙主要城镇的命令，并且在 1586 年 1 月攻占了大城市圣多明各。

古巴当局意识到古巴现在一定会成为他的目标，他们准备应对这位传奇的私掠者即将发动的攻击。于是他们下令从各个小城镇征兵，并从墨西哥派来了携带 6 个月给养的 300 名士兵。哈瓦那最终集结了一支拥有将近 1 000 名军人的武装部队准备抵抗英国敌人。守军在弗埃查城堡和港口入口处的蓬塔（Punta ）和莫罗（Morro）两要塞布置了火力点。一根由圆木支撑的铁链横贯水面。

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警报。德雷克反而从圣多明各向南驶往南美大陆并且占领了卡塔赫纳。当哈瓦那当局听说德雷克已经离开卡塔赫纳掉头向北驶往古巴时，他们被迫再次作好战备。这时有消息传来：德雷克的舰队已经抵达古巴岛的最西端，在圣安东尼奥角（Cape San Antonio）短暂登陆，补充淡水，他的整个舰队在 5 月底从哈瓦那的海岸扫过，然而并未进行攻击。也许是这位伟大的英国船长有了另一种想法，也许他的部队太过疲惫，也许他得知西班牙人有所准备而停止了攻击。他径直向北驶往佛罗里达，攻击了更易攻的圣奥古斯丁殖民地。

德雷克放弃了对古巴的攻击，但是他带给菲利普二世的恐惧极大地影响了西班牙人在岛上实行的政策。他于 1586 年的航行经常被视为是古巴殖民历史第一个时代结束的标志。岛上人所要求的一切东

西——船只、枪械、要塞、士兵——那时候突然到来了，正如伊琳娜·莱特如此生动地揭示的："菲利普在他自己的海岸线边和他的岛屿中间听到了德雷克的战鼓和都铎王朝海军枪炮的轰鸣声。它们预告着另一个时代的到来。"①

33 西班牙几乎整整一个世纪都依靠它自己的海军力量在加勒比海保护它的财富。德雷克攻占了那些距离遥远并且易于攻击的殖民地。尽管哈瓦那成功地阻止了他的攻击，然而古巴的其他港口，特别是圣地亚哥都未能进行防御。由于岛上本就弱小的抵抗力量都被集中在首府哈瓦那，圣地亚哥成了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它被自由活动的法国海盗攻占和洗劫，再未成为该岛的首府。

当局很快从德雷克航海探险这一事件中了解到，西班牙人的保护是无效的，殖民地需要适当地强化防御工事和组织自我保护。② 一位来自罗马的伟大军事工程师吉安·巴蒂斯塔·安东内利（Gian Battista Antonelli）于1586年被派往哈瓦那，来汇报岛上的防御工事。他在港口入口处的两个标志性要塞开始了他的工作——西侧是圣萨尔瓦多·德拉彭塔（San Salvador de la Punta），东侧海角是莫罗堡。城堡主要由奴隶建造，士兵和囚犯辅助，这项工程又持续了40年，在1630年方告竣工。安东内利在加勒比海地区度过了许多年，还设计了圣胡安和圣多明各的要塞，为古巴修筑道路并为哈瓦那修建了水渠，为这个城市提供永久的清洁的水供应。

这些措施收效甚好。英国人用了两个世纪的时间才得以在加勒比海取得了对西班牙的优势。德雷克确实造成了戏剧性的影响，但是直到16世纪末，英国人还没有足够的组织上的和经济上的实力去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其长期计划。毕竟这是一个小国在远离家乡的地区所操纵

---

① Irene Wright, *The Early History of Cuba, 1492—1586*, New York, 1916, pp. 370－371.

② Irene Wright, *The Early History of Cuba*, p. 369.

的活动。[1] 德雷克在完成 1586 年的伟大远征后回到英国，他在抵抗 1588 年派往袭扰英国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时起了突出的作用。当他返回西印度试图进一步攻击西班牙的殖民地时，发现这里的防御增强了。他晚年的海盗活动皆以失败告终，这也标志着英国国势的衰弱。他于 1595 年 1 月死于诺姆布拉德迪奥斯港附近的海岸。

英国人所抢来的西班牙掠夺品的数量与从拉丁美洲运抵西班牙的货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在德雷克生前和身后，英国的私掠行为只对从哈瓦那驶出的舰队（flota）有过一些小的冲击，最多有三次，即在 1590—1591 年、1594—1595 年和 1601—1602 年。这一时期，舰队在能够安全通航前在哈瓦那耽搁了 6 个月。[2] 哈瓦那航行的延迟对西班牙的财富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可能阻挡了西班牙战争机器的运转，但是在加勒比地区的力量天平迅速向西班牙方面倾斜。

在英国人远离古巴海岸的半个多世纪中，其他欧洲国家成了西班牙在该地区权威的主要挑战者。尽管当局建筑了许多大型要塞来努力保护该岛，古巴却仍处于欧洲列强船只的袭击之下，这影响到它的贸易、经济发展和全体居民的富裕。远在欧洲的列强长期争端的结果是对古巴的外来威胁一如德雷克时代那样现实。法国人、葡萄牙人和英国人已经暂时地被赶走，但是凶猛的新教徒荷兰人很快替代了他们，成为 17 世纪前十年加勒比地区的主要强国。

34

西班牙与荷兰在欧洲交战，这场冲突很快就成为全球性的了。1624 年，一支荷兰舰队占领了巴西（Brazil）的主要城镇巴伊亚（Bahia），在 1628 年它的目标是哈瓦那，或者说特别是白银舰队。最著名

---

① Andrews, *Trade, Plunder and Settlement*, p. 243. “他们再次被恶劣的天气、遥远的距离、疾病、不可抗拒的自然力，以及他们自己有限的自然资源、技术和技能所击败。他们的海军力量太弱小了。他们手中控制的军队甚至不足以控制一个大型的港口，更何况是在敌人的领土中心长期控制一个基地。正如下个世纪的数次灾难性失败所证明的那样，海军同时在海上及陆上进行两栖作战的方式在此后数十年才得以成形；当时的人们还在研究海洋战争的战略和战术，且很少估计到攻克一个防御要塞时的困难，如在攻击大西洋岛屿或西印度的防御基地时所可能遇到的要塞时的那样。”

② Andrews, *Trade, Plunder and Settlement*, p. 248.

的荷兰海盗，即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海军上将皮特·海恩（Piet Heyn）指挥了这两次行动。他率领了一支由32艘船只、700条独木舟和3 500名士兵组成的舰队。他隐蔽在哈瓦那，等待舰队从墨西哥到来。9月8日黎明，一支由15艘船只组成的西班牙舰队径直驶入此时停靠在马坦萨斯湾（Matanzas）的荷兰舰队中间。皮特·海恩拦截了这支驶入港湾的白银舰队，俘获了8艘船，击沉了1艘。“被俘获的财富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有金、银、珍珠、靛蓝、糖、洋苏木（桃花心木）和昂贵的皮革，这些货物在荷兰卖出了不少于1 500万荷兰盾的价格。”[1] 荷兰的学童从此演唱着一首歌颂这位著名海盗事迹的歌谣：“皮特·海恩的名字小，但是他的事迹很伟大；他俘获了白银舰队。”

其他的荷兰海盗很少有这样幸运。几年后，科奈留斯·乔尔斯（Cornelius Jols）在1653年从库拉索（Curaçao）岛驶出攻击和掠夺了圣地亚哥。这次他获得了成功，但是当他第二年想重温他的胜利时，却被逮捕和处决了。圣地亚哥不断地遭到袭击，其中有荷兰人，也有法国人。他们的私掠者和海盗掠夺了埃尔·库珀的铜矿和东部行省的甘蔗园。圣地亚哥人（Santiaguinos）很快成为保护自己利益的强悍海盗。1634年，一位新总督弗朗切斯科·里亚纳·德拉冈博阿（Francisco Riana de Gamboa）到达古巴，他采取措施进一步增强了岛上的防御，在哈瓦那船坞建立了一支小型海岸巡逻舰队（guarda - costas）巡视附近海岸的水域。另外，古巴的一支小型海盗舰队（Corsarios）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攻击敌国与其加勒比海岛上据点间的运输。古巴水手们，其中有汤米·罗德里格斯（Thomé Rodríguez）、菲利普·吉拉第诺（Felipe Giraldino）和弗朗切斯科·米盖尔·瓦茨盖（Francisco Miguel Vázquez）等开始骚扰在牙买加和佛罗里达的英国人，以及在加勒比其他地方的法国人和荷兰人。[2]

外国人并不是西班牙人唯一的威胁，他们也受天气的制约。使用

---

① Perus Blok, *History of the Peoples of the Netherlands*, New York, 1900, vol. IV, p. 17.

② Rafael Fermoselle, *The Evolution of the Cuban Military*, *1492—1986*, Miami, 1987, p. 23. 亦见 Saturnino Ulibarri, *Piratas y Corsarios de Cuba*, Havana, 1931。

如此脆弱的船横渡大西洋一直是一种冒险，而白银舰队面对这些因素时尤其脆弱。白银舰队通常在每年的 6 月或者 7 月在哈瓦那集结，然后与它们的护航舰一起返回西班牙，而在 1622 年发生了一次重大的灾难。那一次，船只集结得比较晚，直到 9 月份，一支由卡德莱耶塔侯爵（Marqués de Cadereyta）率领的 27 艘船组成的舰队才起航。这次拖延导致了一场灾难的发生。舰队离开哈瓦那仅一天，就被卷入秋季破坏性的飓风之中，丢失了 8 艘船，其中包括 3 艘大宝船，还有 500 人落入海水。[①] 宝船队在第二年再次遇险，尽管舰队离开港口时采取了两项细心的措施，舰队主要船只决定在哈瓦那过冬。结果西班牙仍然不幸，因为海难使西班牙完全丧失了两年的财政收入，形成严重的资金短缺。

在被隔绝的这些年里，古巴的人口依旧没有变化，在 17 世纪中叶其总数不超过 30 000 人。奴隶依旧在不断输入，但是新来的移民中很少有白人的身影。1649 年的一次灾难性流行病可能使岛上 1/3 的居民死亡。直到 1655 年，人口数量才有所增加，当时突然一下子涌入 10 000名来自牙买加的富裕的西班牙殖民者。150 年后，法国殖民者也向海地进行了类似的移民活动。[②] 这些移民是由于英国人的原因，即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派出一支舰队攻击了在加勒比地区的西班牙属地后，被迫离开牙买加的。克伦威尔最初是希望能占有古巴和圣多明各，他派出一支由 55 艘船只组成的分遣队，同时配有载运 9 000 名士兵的运输船去执行这项任务。西班牙人在圣多明各的抵抗太强烈，英国舰队于是放弃了占领古巴的计划，转而把注意力投向牙买加这个虚弱和缺乏抵抗的目标。牙买加岛上无助的西班牙军队很容易被英国舰队征服，岛上的守军被迫投降。数以万计的不愿意接受英国统治的西班牙殖民者遂向北驶往古巴，他们妄想能够在某一天回来。

---

① Irene Wright, "The Dutch and Cuba, 1609—1643",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IV, no. 4, November 1921.

② Johnson, *The History of Cuba*, vol. I, p. 295.

由于英国人占据着邻岛，古巴自身很容易受到来自西班牙的欧洲敌人的袭击，西班牙也数次试图收复英占牙买加，一次是在 1657 年，另一次是在 1658 年。另外，由克里斯托弗·明格斯（Christopher Myngs）率领的一支小型英国舰队在 1662 年被派出恐吓西班牙人。他带领一支仅有 12 条船组成的 2 000 人的舰队轻易地在阿瓜多尔（Aguadores）登陆并占领了圣地亚哥。[①] 这个城镇的西班牙长官佩德罗·德·莫拉莱斯（Pedro de Morales）不敢号召当地的欧洲移民（criollo）组织民间武装，而他的西班牙正规军应付不了英国人的威胁。他撤往巴亚莫，而众多的圣地亚哥的市民撤往距内陆不远的印第安城镇埃尔·卡内（El Caney）。

明格斯洗劫了这个城镇并破坏了海港入口处的莫罗堡，炸毁了它的弹药库。因为他并没有安全占有一个古巴据点的长远计划，所以几天后就撤走了。他更集中和成功的目标是开辟圣地亚哥和牙买加之间的贸易路线，强迫西班牙人认识到牙买加永远不再是他们的了。很快，一条运载铜、庶糖和奴隶的繁荣的贸易路线在两岛之间开辟了，西班牙已无法阻止这项在两地之间彼此便利交往的安排。[②]

几年后，著名的威尔士海盗亨利·摩根（Henry Morgan）在牙买加总督托马斯·莫迪福德（Tomas Modyford）爵士的命令下于 1688 年驶往古巴去侦查一次具有威胁性的西班牙人袭击的详情。摩根带着 10 艘船和 300 人，在古巴南部海岸登陆，前往深入内陆 50 英里的普林西佩港（卡马圭）：

> 一旦私掠者控制了城镇，他们就把所有的西班牙人——男人、女人和孩子以及奴隶，关进当地的数所教堂里，抢夺所有他们能够搞到

---

① 明格斯船长（Myngs，1625—1666）曾是伊丽莎白号的船长，于 1655 年成为马斯顿·摩尔（*Marston Moor*）号的船长，他指挥着这艘船进入西印度群岛，并且在那里逗留数年。

② Olga Portuondo, *Santiago de Cuba: desde su fundación hasta la guerra de los diez dias*, Santiago, 1996.

手的物品。然后他们在农村各地搜寻，每天掠回许多物品、囚犯和供给物资。当把这些控制在手中时，他们按其传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完全忘记了他们可怜的囚犯们，任他们在教堂里忍饥挨饿。①

来自牙买加的对古巴殖民者的持续性的重要威胁于两年后，即1670年西班牙与英国达成一项协议后方才减少，这份协议承认了英国在加勒比地区殖民地的存在。一个与法国人签署的类似协定于1697年在里斯维克（Ryswick）签订：交换条件是承认法国对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的圣多明各的统治，法国则承诺终止它的海盗袭击。对于古巴人而言，17世纪末的这些条约唤起了他们的希望，长期以来经历的不安定状况已经结束，这个岛现在可以和平发展。

蔗糖和烟草：岛上财富在17世纪的发展

17世纪是古巴殖民统治的第二个世纪，然而仅在此时殖民者才能够建立最终使其繁荣的经济基础。这些第一代征服者的后人在16世纪已经安居在遍及全岛的大牧场里，舒适地看着大自然完成它的工作，虽然亦有黑人和印第安人劳动力的帮助。由官方销售或者经由走私商经营的牛肉和皮革提供了有用的财源，猪和腌肉的经营也同于此，但是形成的这种经济模式仅仅能够维持生计。一些典型的殖民城镇，如哈瓦那和圣地亚哥情况比较好，它们服务于过境贸易、船只维修，储存食物用以款待战船、商船以及白银舰队的船员，逐渐在西班牙人前往美洲的路途中扮演了必不可少的角色。

然而，17世纪时，随着蔗糖和烟草制品的收获和交易的发展，岛上的经济节奏开始改变。这两种作物作为农业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开始 37

① 引自 Strock，*The pageant of Cuba*，1935，69页。后来摩尔根（Morgan，1635—1688）航行到巴拿马（Panama），控制了防守牢固的贝洛港，宣称将在获得当地人给予的大笔赎金之后离开。1669年，他发动了对马拉开波（Maracaibo）的进攻，1670年再次回到巴拿马，控制了查格里斯（Chagres）城堡，沿查格里斯河逆流而上，最后于1671年1月占领巴拿马城。

与牧场的收入持平，及至18世纪开始成为岛上财富的主要来源。

蔗糖并非加勒比海地区的原产商品；它最初来自太平洋地区（Pacific）。由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种植了许多世纪后，它被西班牙人在早期探险横越大西洋时带来，不久后就在伊斯帕尼奥拉岛进行商业性种植。1516年，在国王斐迪南驾崩之前，尼古拉·德·奥万多将这里生产的第一批蔗糖呈献给他。[1] 1523年，斐迪南的继承人查理五世皇帝鼓励在古巴生产蔗糖，批准将4 000比索赐予"有责任心的"古巴殖民者来建立蔗糖厂。国家从一开始就给予了私人种植园主（enterpreneurs）蔗糖产业的支持，由设在塞维利亚的财政署（Casa de Contratación）来提供财政保障，这个贸易促进信贷公司早在20年前，即1503年就建立了。

第一批大规模的糖料种植园——随着三个糖厂在马坦萨斯湾附近建立——于1576年在古巴建立。那些最初的糖厂使用的是木质滚筒，由骡或者牛做动力榨糖，然后用托盘陶罐盛放糖浆。在敞口的锅内煮开糖浆，烘干后最后生成一种粗制的棕色糖，这种糖在岛上消费绰绰有余，但很难加工为高品质的出口商品。[2] 这种简单的生产方法一直持续到17世纪。

古巴以及伊斯帕尼奥拉岛和波多黎各是最早在美洲种植甘蔗的西班牙殖民地，也是第一批使用奴隶的种植园。这些奴隶也是最早被用于种植农业。然而在前两个殖民世纪，这里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其他加勒比的欧洲殖民地早已跑到前面了。

虽然糖来自太平洋，但第二种一直与古巴有关的产业——烟草，却是南美洲和加勒比的特产。泰诺人种植和吸食烟草，但西班牙殖民者对它产生兴趣是在征服之后的许多年。从非洲来的黑人是最早对它感兴趣的外界人，他们种植、吸食烟草并且将它卖给在哈瓦那的宝船船员。西班牙人称它为"非洲黑人药品"，直到17世纪初他们意识到

① Kamen, *Spain's Road to Empire*, p. 85.

② Johnson, *The History of Cuba*, vol. 1, p. 225.

这里的商机之前，对此不屑一顾。黑人很快禁止将自己种植在烟草场（vegas[1]）或者田里的烟草用于交换，尽管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他们被卷入到了烟草的生产中。1826 年，出身于克里奥尔人（creole）的寡头政治执政者弗朗切斯科·阿兰贡（Francisco Arango）写道："只有白人经营烟草场确是事实，但是绝大部分的烟草场是由黑人在白人监工的监督下耕种的。"[2]

高级烟草的生产开始于 17 世纪的哈瓦那和特立尼达岛之间，向西直到比那尔德里奥的肥沃土地上。西班牙国家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财富来源，可以弥补那些为抵抗欧洲敌船掠夺性袭击而驻扎在岛上的卫戍部队的开支，一种官方的烟草专卖制在 1717 年被引入。当地的生产者必须把他们的烟草卖给国王的代理商。生产者的骚乱导致专卖制的放松，但直到 100 年后，即当自圣多明各进入古巴东部的法国商人看到了烟草的市场潜力之后，这一产业才开始崛起。[3] 一个新的经济基础被奠定，但是进程依旧缓慢。 38

① Vegas，西班牙文，原意为低洼地，此处指专门种植烟草的农田。——译者注

② 引自 Joan Casabivasm，*Bread, or Bullets: Urban Labour and Spanish Colonialism in Cuba, 1850—1898*，Pittsburgh，1998，32 页。

③ Aimes, *History of Slavery*, p. 21.

第二章　西班牙帝国面临挑战（1741—1868）

关塔那摩（Guantánamo）落入海军上将弗农（Vernon）手中（1741）

39　美国军队称它为吉特莫（Gitmo）；古巴人称它为开玛内拉（Caimanera）；英国人曾经称它为坎伯兰（Cumberland）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4年到达这里，称它为Puerto Grande，即大港。关塔那摩港是古巴南部最大的港口，比壮观的西恩富戈斯港口抑或古巴的圣地亚哥那片美丽的水域更大。它是古巴和美国在20世纪争斗的焦点，在21世纪早期，因当时其海岸的一座美国兵营被作为关押从遥远的阿富汗（Afganistan）运来的囚犯的监狱，这里曾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广阔的关塔那摩港湾几乎全部被高山包围，与其附近的陆地相隔离。西班牙殖民者避开了它，发现这里气候不利于健康并且过分炎热。这个地方终年为蚊虫所侵扰。哥伦布的船员们在此地上岸时，发现印第安人在岸上烤鱼，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告诉他的船员自己去解决给养问题。当地人说，他们在为他们的首领准备着一场盛宴，所以一直在海滩上烤鱼，以免鱼肉因天气炎热而变质。当地人承诺，他们会在第

二天夜里捕更多的鱼，于是，他们与这些不期而至的客人分享了他们的美食。

关塔那摩在外部干涉者眼里成为了一个优越的据点。在哥伦布初次光顾的几年后，西班牙人全副武装地来了，400 年后美国士兵登上了这里——并永远驻扎于此。英国人在美国人到来之前的一个多世纪经由这片海岸，但在这支由海军上将爱德华·弗农（Edward Vernon）率领于 1741 年驶入这个港口的舰队中，有一支由北美 13 个殖民地来的 600 位富庶殖民者组成的小分队。[①]

从德雷克时代以来，英国船只一直在古巴附近巡航，并进行走私贸易。在 18 世纪，随着新兴英帝国的日渐强大和西班牙人的逐渐衰落，英国人变得更具有侵略性，他们在 1741 年占领关塔那摩并且在 20 年后占领哈瓦那。作为一个帝国，英国人在这个岛上获得的利益是有限的，但是他们的商业野心是无止境的。海军攻击是英国人在 19 世纪进行财政渗透的序幕。海军上将弗农的登陆为古巴历史通往新时代铺就了道路，该岛的所属权问题处于列强纷争中，先是英国和西班牙，后来是英国和美国。 40

弗农在 1739 年被派往加勒比，这道命令对于西班牙帝国是灾难性的，像 150 年前德雷克的行为一样严重。同年，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再次爆发，是由古巴海岸巡逻艇的一次胜利引起的，这种巡逻艇是由当地人建造并配备人员，用以骚扰英国商船的小船。罗伯特·詹金斯（Robert Jenkins）船长明显是这些袭击的受害者，他曾被割下一只耳朵作为惩罚，当他的案件被呈至伦敦众议院时，激起了普遍的战争热情。反对派领袖威廉·普尔特尼（William Pulteney）爵士在 1740 年 8 月写给弗农的信中称"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阻止西班牙人再次冒犯我们……我们的口号是'夺取并控制'。就是对古巴而言，如果要英国

① 美国人于 1898 年 6 月 6 日到达这里，100 名美国海军在关塔那摩登陆，并在其港湾建立了麦克卡拉（McCalla）大营。美军指挥官威廉·谢夫特将军（General William Shafter）在来古巴的途中就一直在阅读弗农元帅在 1741 年征途中写的日记。见 Frank Freidel, *The Splendid Little War*, New York，1958，56、77 页。

人民给你些建议，我可以打赌，99%的舆论将是要求攻击那个岛。”①

弗农如他的前驱德雷克一样选择夺取哈瓦那，但是1741年的哈瓦那仍然同1586年一样，被认为防守过于严密。圣地亚哥由于其港湾入口处有巨大的防御堡垒也很难直接攻击，于是，弗农最终去其他地方寻找目标，于1740年向南驶往巴拿马。他希望占领这一地峡，切断西班牙通往其太平洋领地的商业生命线。贝洛港的两座西班牙要塞被破坏，这次胜利使他在英国扬名，但是由于兵力太少而不能建立一个永久基地，他撤回牙买加。②

由于他的部队不断减员，弗农转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古巴，他于1741年7月带领着一支由8艘战船、40艘运输船、4 000名士兵，及来自牙买加的1 000名黑人和来自北美殖民地的600名富裕殖民者组成的队伍攻击了关塔那摩。③ 他当时的计划是在这个港湾登陆，然后从陆路攻击圣地亚哥。后来他希望驶往哈瓦那——占领整个岛屿并把它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像一个世纪前在牙买加发生的那样。

当他在关塔那摩登陆时，就照英王次子的名字，重新将此地命名为坎伯兰湾。他写道：“我认为这是岛上最适合作为英国殖民地的一块地方，我很高兴地发现美洲人已经把它视为希望之地。”④ 弗农的计划从理论上看来是可行的，但是英国陆军司令托马斯·文特沃斯（Thomas Wentworth）将军不愿意去进攻比他准备得更充分的西班牙人。文特沃斯拥有更多的军队，但是西班牙人更熟悉地形。一支由白人、黑人、印第安人和混血儿组成的微小的古巴卫戍部队挫败了英国人对圣地亚哥进攻的既定计划。

41

① *The Vernon Papers*, *Navy Records Society*, London, 1858.

② 在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所写的小说《蓝登传》（*Roderick Random*）中可找到关于这次征伐的不甚清晰的传奇式记载。

③ Olga Purtuondo, “La Consolidacion de la Sociedad Criolla, 1700—1763”, *Historia de Cuba* Vol. I, *La Colonia*, Havana, 1994, pp. 205 - 207.

④ Edward Vernon, *Original Papers relating to the Expedition to the Island of Cuba*, London, 1744, p. 44. 作为一个曾经的水手，在古巴以渔民和牛仔的身份生活了许多年的约翰·德雷克（John Drake）为弗农提供了从关塔那摩到圣地亚哥极好的、详细的第一手路线资料。

由于被封锁这个不友好的港湾，难以找到食物，弗农的部下又染上了黄热病，他被迫于年底撤退，返回牙买加。后来在1748年，英国人试图正面攻击圣地亚哥港口的要塞，同样无功而返。英国、西班牙和法国之间关于欧洲问题的纠纷在那年解决了，古巴在短时期内显然是安全地摆脱了英国的进一步进攻。

哈瓦那落入阿尔伯马尔（Albemarle）伯爵手中（1762）

欧洲的和平持续了不到10年，1754年，法国和英国再起战端。这场冲突从1754年持续到1763年，从欧洲扩展到加勒比并且席卷印度（India）和北美，这就是美洲人所熟知的“法印战争”，欧洲人所熟知的“七年战争”，是近代史上第一次“世界性战争”。尽管在这场战争的早期，古巴并未卷入其中，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西班牙最初保持中立，听任法国人和英国人在遥远的大陆上解决他们的纠纷。

当战争降临到西属加勒比时，对于承受着自两个世纪前雅克·德索雷（Jacques de Sures）对哈瓦那袭击以来最屈辱攻击的古巴而言，其后果是灾难性的。西班牙在1761年，即在法国已经失去了在加拿大（Canada）和印度的属地时，错误地与法国的军队联合。法国人把西班牙放到反击英国的天平上作最后一搏，但是失败了。古巴被卷入了一场对它几乎毫无利益可言的欧洲冲突。英国人继弗农袭击这个岛后占领了它，一支新的英国海军舰队在海军上将乔治·波科克（George Pocock）爵士率领下被派往哈瓦那。这次战役的总司令是第三代阿尔伯马尔（Albemarle）伯爵乔治·凯佩尔（George Keppel）。1762年，装载着4 000名士兵的大约50艘船自朴茨茅斯（Portsmouth）起航，在巴巴多斯（Barbados）补充了给养，并在牙买加补充了大量援军。

哈瓦那很好地顶住了来自海上的袭击。菲利普二世的工程师和他们的继任者功绩卓著。阿尔伯马尔按照弗农书上的一处描述，决定从陆路攻击。波科克的一些船只停靠于哈瓦那附近的海湾，摆出一种会立即发动攻击的样子，而阿尔伯马尔已经在6月初派主力部队在哈瓦

那东部的科希玛（Cojimar）登陆。[1] 他的小股部队从陆地上攻击哈瓦那，激起了在当地瓜纳瓦科阿酋长领导下的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反抗。经过40天的包围后，哈瓦那在8月中旬投降了。西班牙总督离去，阿尔伯马尔取而代之。英国的攻击是一次外部强国对古巴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投入了大约14 000名英国士兵，近300人阵亡。[2]

42 英国人对哈瓦那和从马列尔（Mariel）到马坦萨斯湾之间一小部分古巴北部海岸的占领仅持续了10个月。1763年2月签订的《巴黎和约》标志着七年战争正式结束，宣告了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战败。新世界被重新瓜分。英国人同意从古巴撤军，但获得了西属北美领地佛罗里达，这种安排能够使他们加强在美洲大陆上已经存在的帝国的实力。阿尔伯马尔伯爵把哈瓦那移交给一位来自西班牙的新总督。

英国人的短期占领经常被历史学家视为古巴进入近代大门的标志，哈瓦那以空前的规模开放港口进行对外贸易——那一年，有1 000艘大船在此卸货，货物中包括10 000名奴隶。比英国的短暂统治更重要的是，古巴向英国的北美领地开放。北美商人现在合法地在哈瓦那立足，古巴商人亦转而前往北美港口交易。这种联系在英国人离去后继续存在，并且在1776年美国革命爆发时仍旧保持并扩大。哈瓦那成为了驶往大陆的战舰的一个重要集结点。

然而古巴岛与北美之间这种交易的机会没有得到稳定的发展。当18世纪80年代北美13个殖民地最终从英国人统治下解放时，西班牙重新强化了其早期对古巴外贸活动的多方面控制。新生的美国则把它的注意力从古巴转移到与富裕的法国殖民地圣多明各的贸易活动中。曾一度从古巴进口糖、糖蜜、可可和咖啡的美国人现在则向法国人购买。只有在1791年圣多明各爆发革命时古巴才成为美国所钟爱的贸易伙伴。

---

① 科希玛（Cojimar）是厄纳斯特·海明威最钟爱的垂钓码头。

② Rafael Fermoselle, *The Evolution of the Cuban Military, 1492—1986*, Miami, 1987, p. 13. 这次有650多名英国士兵受伤，随后又有数千人死于黄热病，这是一种非常容易致人死亡的疾病。西班牙和古巴方面共损失380人，1 500人受伤。

西班牙对古巴的新兴趣（1763—1791）

英国人占领哈瓦那可能为古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推动力，而真正的改变发生在西班牙收复该岛之后。古巴开始从查理三世（Charles III，1759 年到 1788 年马德里的统治者）的“开明专制”中获益。短暂失去古巴，加之其他西属美洲受到潜在威胁，给西班牙政治带来一股新的动力。在查理三世和他能干的大臣康坡曼内斯伯爵（Conde de Campomanes）的推动下，改革成为那个时期的常态——改革影响到教会、教育、税收和土地占有制度。新的地图被绘制出来，新的道路修建成功，农业的发展也受到鼓励。地方的主动权受到了欢迎——几个世纪后，这种主动权被描绘成“分离”。在西班牙全境内不同城镇建立了超过 70 个“国家之友社”（Sociedades de Amigos del Pais），这是政府所支持的由地方贵族组成的研究机构，他们聚集起来共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研究、地方教育的发展和技术的革新等。

43

这些大都市改革的消息传到西属殖民地，而且在几个世纪中，马德里政府头一次对它的殖民帝国有了新的、智能发展方面的兴趣。科学探险队被派去探索它的未知地区，去考察它未来的经济能力。这阵西班牙改革之风吹到古巴，新一代的开明地主、种植园主和企业家开始聚集在哈瓦那讨论经济发展和推行来自欧洲的新思想。

主持这场讨论的是在整个 18 世纪 90 年代担任总督的路易斯·德拉斯卡萨斯 - 阿拉贡利（Luis de las Casas y Aragorri）。由于他与这个岛上甘蔗园主们的密切关系，他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改革派地主和律师，其中最重要的是弗朗切斯科·德阿兰贡 - 帕勒尼奥（Francisco de Arango y Parreño）。一个仿西班牙模式建立的“国家经济之友社”（Sociedad Económica de Amigos del País）于 1793 年在哈瓦那成立，它的成员包括 27 名最有权势的糖业巨头。这一社团的名称加了“经济（economica）”一词，表示它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它很快在 1794 年衍生出一个“王室农工商领事部”（Consulado Real de Agricultura，Industria y Comercio）和一份日报 *Papel Periodico*。在一个并不存在任何类似殖

民地议会机构的时期，上述社团组织使得古巴精英们感觉到他们能够对于国家发展的方式有所建言，并能够使当地的殖民总督多少理解什么是公共意识的萌芽（尽管这些社团只是由白人精英组成）。

古巴的“经济之友社”（Sociedad Economica）主要关注畜牧业、蔗糖和烟草这些它的成员基本上占优势的行业，但是它也关注正在进行的对采矿业、商业和工业的研究，并让它们引起相关利益派别的注意。它对糖业和烟草业生产技术的进步特别感兴趣，也促进了对化学、植物学和数学的研究（并把相关题目的书籍翻译成西班牙语）。它更广泛的兴趣包括教育和内陆运输。[①] 对于加勒比海上一个小小的岛屿而言，这些广泛的知识性活动无疑并不算是成功的。事实上，这个社团（Sociedad）是把欧洲的启蒙思想带到古巴的工具。

富裕而年轻的古巴种植园主阿兰贡（Arango）是这些开创性活动的领袖人物。他在蔗糖生产中采用新的科学技术，从英国引进蒸汽动力。他也成立了“发展促进会”（Junta de Fomento），这是“经济之友社”的一个分支，有效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他也是20世纪拉丁美洲国家计划体系的先驱。阿兰贡与德国经济学家、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男爵是好友，洪堡在1800年和1804年相继访问古巴，写了一篇颇有创意的关于该岛经济的小文章，这篇文章重新向欧洲人（和后来的美国人）介绍了古巴的经济潜能。他的这部作品中许多思想来自于与阿兰贡的讨论。[②]

44

阿兰贡是自由贸易的捍卫者，并终其一生在说服西班牙君主注意古巴岛对西班牙的利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阿兰贡是一位带有现代主义激情的典型民族主义者，同时伴有强烈的保守主义和等级观念，他是后来杰出的古巴人的先驱，这些人具有相似的兴趣和关注点，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该岛一定总是显得太小。

① Louis Pérez, *Cuba, Betwee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xford, 1995, p. 66.

② Alexander von Humbold, *The Island of Cuba, a potilical essay*, Princeton, 2001.

圣多明各奴隶起义（1791）

在18世纪时，扩展到加勒比地区的欧洲战争引起的警报和征伐常常影响古巴，但是它的近邻的一次奴隶起义深刻地影响了该岛的历史。1791年8月，在当时最富裕的欧洲殖民地圣多明各（后来称为海地）爆发了一次成功的奴隶起义，导致成千上万的法国企业家来到古巴避难。这些殖民者增强了农业变革的动力，这促进了一个世纪内岛上财富的不断增长。

圣多明各（原来被西班牙人称为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西部距离古巴仅仅60英里，两岛居民由于他们共同的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祖先而有着密切联系，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东部（和圣多明各城）自从哥伦布时代以来就掌握在西班牙人手中，西部在17世纪中叶被法国海盗从西班牙手中夺取。法国对该地的所有权在《里斯维克条约》中被正式承认。令人困惑的是，法国人把他们所占有的该岛的一端称为“圣多明各”。

1791年的起义，有500 000名黑人奴隶拿起武器反抗他们的白人主人，把“革命”的威胁——这个颠覆性的信息来自于1789年后的巴黎——带到古巴的门口。对于法国殖民者而言，圣多明各在整个18世纪已经成为一个财富之岛，他们输入奴隶并使奴隶在他们的甘蔗、咖啡、棉花和靛蓝种植园里劳动。对于法国政府和地主而言，巨大的财富产生了。800个左右的种植园每年平均出产71 000吨糖，将近3 000处咖啡农场生产30 000多吨咖啡，超过当时世界总供应量的60%。[1] 而在西班牙占有的该岛东端，此时仍处于不发达阶段，仅有125 000名居民。

然而圣多明各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法国殖民地的人口在18世纪80年代超过50万人，其中90%是奴隶。仅有40 000名白

① Luis Perez, *Cub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iers of Sigular Intimacy*, Athens, Ga. 1997. p. 9.

人和20 000名黑白混血的自由人。因为力量的天平明显倾向于黑人，45 很久以来这里就具备发动一次成功的奴隶起义的可能性，再加上受到1789年法国革命的鼓舞。这次奴隶起义为时短暂、斗争残酷。关于起义者被镇压和大量屠杀的情节被毫无遗漏地记载下来，在加勒比地区引起的反响超过一个世纪。随后的革命和内战、外国的干涉带来了更多的死亡和破坏。然而依据后来的标准，死亡的总数并不是特别高——可能有10 000名黑奴和2 000名白人被杀。奴隶的死亡常常不被注意，但是白人出人意料地被杀，却在那个时代明显地引起了震惊。起义成功的原因被归结于圣多明各不同种族间的严重分离，这种单纯的信念在古巴和其他加勒比地区的白人中造成了一种直接而广泛的恐惧，他们担心类似事件可能再度发生于他们和其他岛屿上的少数白人身上。

最早的难民在1793年到达古巴，他们怀着很快就会回家的期待主要聚集在哈瓦那。当整个伊斯帕尼奥拉岛，包括西班牙所属部分和圣多明各城在1795年落入黑人起义者手中时，殖民者的移民数量骤增。1798年，当一支试图扑灭黑人起义的英国干涉军被迫撤退时，移民潮更是滚滚而来。许多殖民者定居在圣地亚哥和古巴东部周围的乡村。1803年，出现了一个更大的移民潮。当时欧洲再起战端，拿破仑（Napoleon）企图重建法国人（和白人）在圣多明各的统治，却遭到惨败。在1791年后的10年里，总计有30 000名法国难民来到古巴。这些是他们时代的“船民”，是一个将发生在后来世纪的大规模移民的先声。

逃离了劫难的法国移民快乐地面对生活，给懒散的西班牙殖民者带来了勤奋的榜样，法国式的咖啡种植园广布在马埃斯特腊山山脚和关塔那摩周围。他们带来了资金、劳动力、他们的种植技术、他们对外贸和外部市场的熟悉以及他们辛勤工作的能力。一位法国游客描绘了新殖民者如何带来了“剩余的财富和一些奴隶，特别是他们的知识、经验和活力。从那时起，大安的列斯群岛（Antilles）的两个岛屿互换了角色：圣多明各陷入了原始状态，古巴代替它立足于未来的战

车上。”[1] 在19世纪初，其他的新来者移居此处。几千名赤贫的西班牙殖民者来自伊斯帕尼奥拉岛东部和被拿破仑卖给美国人的遥远的路易斯安那（先前是西班牙的）。[2]

由于这些移民的能量，古巴从一个由不发达的小城镇、牧场和烟草园组成的殖民地成了后来所称的“农业综合企业”——巨大的半工业化的甘蔗和咖啡种植园，其特征是使用迄今无法想象的大规模的奴隶劳动。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新殖民者能够拉动“古巴农业脱离16世纪进入19世纪”，他们仅仅在几十年内就做到了。[3]

46

这是该岛历史上最繁荣的世纪。19世纪20年代，古巴仍旧是一片满是牲畜和烟草的土地，但是蔗糖和咖啡正在成为一种价值更大的——很快将成为主导性的——经济行业。1827年，3 000个大牧场和5 000个烟草园依旧繁荣，但同时又出现了1 000家糖厂和2 000处咖啡种植园。棉花（76个农场）和可可（66个种植园）进一步边缘化。然而旧古巴的一些东西仍然存在。当工人们努力在这些新型的种植园中为国内外的市场进行商品生产时，农村人口的主要部分仍旧是为生存而劳作的俭朴的农民，他们过着一种从迪亚戈·贝拉斯克斯时代以来从未改变的生活方式。[4]

蔗糖业的发展显著地影响了岛上的政治和文化，因为它导致了古巴奴隶数量的激增。这反过来促进了因圣多明各和路易斯安那移民而强化的白人种族主义的滋长。海地革命的发生，对它的过分残酷行为夸大了的记忆——不仅仅影响到古巴，也影响到美国和拉丁美洲——

---

① Gustave d' Hespel d 'Harponbille, *La Reime des Antilles*, Paris, 1850.

② 因此尚未解决的是新来者进入古巴的途径问题，1807年马德里下令将岛上的所有外国人驱逐出境，该法令在两年后，即1809年在哈瓦那的法国定居者同古巴人发生冲突后得到重申。哈瓦那官方发现该法案无法实施。一些逃难者根本就不理会该法案，其他逃难者则匆忙准备入籍材料。Duvon Cubitt, “Immigration in Cuba”,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XXII, May 1942, pp. 280 – 288, 引自 José Antonio Portuondo, *Proceso de la Cultura Cubana*, Havana, 1938, 该书有附录“法国移民”（*La immigración francesa*）。

③ Roland Ely, *La Economia Cubana entre los dos Isabeles*, *1492—1832*, Havana, 1960, p. 80.

④ Ramiro Guerra, *Sugar and Society in the Caribbea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Cuban Agriculture*, New Haven, 1964, p. 49.

在整个19世纪和此后都在古巴上空徘徊，这对于白人来说是一个永远的警示，即如果他们在制定政策和施政方面出现任何错误，就会发生什么事情。许多古巴白人感觉他们长期生活在海地模式的奴隶起义的阴影下。他们的感觉没错，因为许多古巴黑人从海地榜样中受到了鼓舞。

奴隶数量的快速增长（1763—1841）

古巴黑人有像海地一样发动起义的能力，并且建立一个黑人共和国的期望吸引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奴隶数量的增加是按照他们的预期进行的。[①] 在1762年后的30年里差不多有100 000名非洲奴隶来到这个殖民地，超过了先前3个世纪的总和。在1511年到1762年的250年间有60 000名左右的非洲奴隶被运进来，平均每年有240人。随着后来蔗糖产业在18世纪的扩展，运来的奴隶人数明显呈跨越式增长，平均每年登陆的奴隶有3 300人。

古巴的奴隶数量在1791年达到85 000人，在接下来的25年里翻了一番，在1817年达到199 000人。10年后，在1827年，它几乎又增长了50%，达到287 000人。在19世纪30年代，奴隶输入的数量超过早期殖民时期任何一个10年，到1841年有436 000名奴隶生活在该岛——接近100万人口的45%。

当然，黑人的总数更大，因为并不是岛上所有的黑人都是奴隶。在西班牙本土，当局允许奴隶主授予奴隶自由，这项政策也惠及古巴。与加勒比海地区其他岛屿（和北美洲国家）相比，古巴有相当多的自由奴隶。在19世纪前期，原来的黑人奴隶和他们的后代——“自由有色人种”——的数量已经增长了两倍（从1792年的54 000人增加到

① 1827年，在古巴为数707 487人的总人口里面，白人只有311 051人。黑人的总数为393 436人，其中286 942人为奴隶，106 494人为获得释放的有色人种。Philip Howard, *Changing History: Afro－Cuban Cabildos and Societies of Col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Baton Rouge, La., 1998, pp. 82－83. 霍华德称，1841年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黑奴和获释有色人种的数量都大大超过白人的数量。上引数字似乎并不能证实这一点。

1841 年的 153 000 人）。1841 年的人口普查揭示了长久以来的推测——奴隶和“自由的有色人”构成了数量可观、证据确凿的多数人口（58%）。[①]

白人殖民者听到上述普查结果后并没有掩饰他们的警醒。然而实际上黑人可能从 17 世纪初，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超过了白人的数量，黑人占多数的状况可能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中期。1841 年的人口普查只是对这一情况的官方认可。白人惧怕的是黑人具有自我组织的能力。

尽管西班牙（及葡萄牙）当局对待不驯服的黑人奴隶一直是严酷的，但他们在古巴和巴西建立的殖民体系有一定的特殊性，不同于美国。这在某种程度上对黑人有利，因为这里的黑人并不是被简单地称为“黑人”或者“非洲人”，而是被允许以其独特的出身引以为豪。他们一直知道自己来自非洲的哪个部分。白人殖民者采纳了一种西班牙传统，基本都按照他们在西班牙的原籍参加一个 cabildos[②]（后来人们提及它时，称其为“兄弟会”）组织。自然，从 16 世纪后期以来，黑人也被允许这样做，奴隶和自由人一起，按照白人的社团组织模式，组成他们自己的同乡会。

西班牙人认为这将是一个慈善的社会组织，有利于不同部落的非洲人在保持其原有的某些传统的同时适应古巴的特殊环境。18 世纪中期哈瓦那的主教佩德罗·奥古斯丁·莫雷尔·圣克鲁斯（Pedro Agustin Morell de Santa Cruz）对于黑人加入他们的非洲同乡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以至于他在 1755 年授予这些组织以教会的认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促进和加快他们的宗教指令的执行。[③]

黑人奴隶和“自由的有色人”组成的同乡会是依据部落或者民族

① Perez, *Cub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 12.

② 西班牙文原意有“修会”、“教士会”的意思，但其职能应该类似中国经常有的同乡会，故下译“同乡会”。——译者注

③ Robert Paquette, *Sugar is Made with Blood: the Conspiracy of La Escalera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Empires over Slavery in Cuba*, Middletown, Conn, 1988, p. 125.

界限而形成的。奴隶们被白人主人根据其来源地进行划分，使用众多不同的名称来区分这些来自非洲海岸遥远的民族——曼丁哥人（Mandinga）、甘加斯人（Gangá）、米纳人（Mina）、卢库米人（Lucumí）、卡拉巴利人（Carabali）、刚果人（Congos）、马古亚人（Macua）和许多其他部族的人。这种由奴隶主设计的名字常常是对原来非洲部落名称的误读，但是它们很快地被奴隶们自己所使用。[①]

曼丁哥人和甘加斯人来自于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在那里他们被称为马林克人（Malinkes）；米纳人来自黄金海岸［Gold Coast，今加纳（Ghana）］，在那里他们被称为阿肯人（Akans）。另外两个群体来自于今天的尼日利亚（Nigeria）：卢库米人是来自贝宁湾（Benin）的说约鲁巴语（Yoruban）的民族，卡拉巴利人是来自比夫拉（Biafra）的民族，也被称为伊博人（Ibos）和埃菲克人（Efiks）。马古亚人来自非洲东部，与莫桑比克（Mozambique）的马库阿人（Makwas）有血缘关系。[②] 16 世纪末来自安哥拉的奴隶被称为“刚果人”，这是因为他们在刚果河流经的区域被葡萄牙奴隶贩子捕获。大约 400 年后，他们的一些后代在卡斯特罗的军队中保护他们从前的祖国。

48

据罗伯特·帕克特（Robert Paquette）记载，白人殖民者根据某些民族群体通常表现出的不同的性格特征来给他们做标识。

1840 年左右，占主导性的偏见认为曼丁哥人和甘加斯人是“最温顺和值得信赖的”；卢库米人是“易怒的和好战的、狡猾的”，但是“工作努力”；米纳人和卡拉巴利人与卢库米人相似；刚果人是“蠢

---

① Levi Marrero, *Cuba: Economia y Sociedad*, *Madrid*, 1978, vol. III. p. 23. 16 世纪晚期被葡萄牙贩奴者输送到古巴的奴隶来自非洲西海岸从塞内加尔到安哥拉的各港口。圣地亚哥城外的采铜城镇埃尔·库珀 1608 年的人口统计数字显示，有不同种族的奴隶在该矿工作：其中有安哥拉人（占主体）、康加人（Congas）、恩奇克人（Enchicos）、米那人（Minas）、摩赫果人（Mohongos）、贝奥赫人（Biohos）、布朗人（Brans）、巴诺内人（Banones）、曼尼刚果人（Manicongos）、纳卢埃人（Nalúes）、卡拉巴利斯人（Carabalíes）、泰拉诺瓦人（Terranovas）和克利奥罗人（Criollos）。一些奴隶以及他们的后代将其种族身份保持了长达两个世纪之久。

② Paquette, *Sugar is Made with Blood*, p. 37.

货、大酒鬼和色情狂”；马古亚人“像刚果人一样残忍”。[1]

虽然黑人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但他们在殖民早期的生活中并没有受到后来成为普遍现象的那种社会歧视。他们很少受到个人或者社会的歧视，自由的黑人与白人一样进入教堂或者穿街走巷。他们也被允许携带武器和加入哈瓦那的黑人军团（Batallón de Pardos y Morenos）。[2] 直到19世纪，他们的周边环境才变得不大友好，特别是白人对圣多明各事件可能重演的恐惧日渐加重。

第一场独立风暴（1795—1824）

19世纪初古巴新社会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受到从欧洲传来的启蒙思想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很快将取得成功的西班牙统治下拉丁美洲大陆的民族独立意识的影响。古巴早期进行了许多次反西班牙的起义。来自“自由的有色人”而不是来自引领大陆解放斗争的白人上层精英的黑人革命，最先仿效海地的例子，在古巴组织起来。

一位巴亚莫的56岁自由民尼古拉·莫拉勒（Nicolás Morales，据说他长得“漆黑”）早在1795年就开始组织革命。他的团体试图把黑人和白人联合起来，其支持者中有许多白人。他们的纲领是废除“压迫穷人的”税收；分配土地给穷人“因为富人已经占有了全部土地”；将教士们“送回他们的修道院”[3]。由于起义之前出现了叛徒，于是起义没有对国家构成严重的威胁，莫拉勒和他的起义同伴被投入监狱。出卖他们的那个混血儿士兵被授予200英亩的土地。[4]

一个更重要的独立计划在1810年被提出，当时正值拿破仑入侵西班牙而使西班牙变得虚弱。一些黑人军队中的“自由的有色人”参与　49

① Paquette, *Sugar is Made with Blood*, p. 37.

② Willis Fletcher Johnson, *The History of Cuba*, vol. I, New York, 1920, pp. 230 – 231.

③ 即不许教士参与种植园的开发与管理，如前所述，教士们在古巴的产业有相当大的规模。——译者注

④ Ramiro Guerra Sanchez (ed.), *A History of Cuban Nation*, vol. III, Havana, 1958, pp. 118 – 122.

了一场由两个保守的贵族和一名富裕的白人官员领导的白人独立运动，他们都是共济会员。[①] 他们谋求独立，但是没有打算改变岛上的社会结构。根据他们设计的框架，奴隶仍旧是奴隶，白人仍旧进行统治。这是在古巴发生的第一个唤起印第安人过去历史的政治运动。他们设计了一面旗帜，上面绘着一位以烟叶蔽体的印第安妇女。他们自称为印第安人（*indios*）或者尤卡坦人（yukuinos），视古巴为尤卡坦历史的延伸。他们从人们口述的记忆中挖掘出 16 世纪的酋长阿图伊的形象，称他为“西班牙人入侵的第一个牺牲者”。[②]

由于众多黑人军队成员卷入起义，因此需要动员白人民众进行反击，首次创造了将在此后整个世纪不断重演的局面，这也成为西班牙控制该岛的关键因素。由新近移民家庭的年轻男子所组成的一支白人志愿者队伍建立起来以帮助殖民当局。一位法国游客称这些“来自同一个西班牙省份”的从军者是“哈瓦那的忠诚卫士”。[③] 来自特定的西班牙原籍地的移民们，从殖民早期就受到白人同乡会鼓励，告诉他们要忠实于自己的家乡，而这种精神恰恰激发了志愿兵（voluntarios）的热情，并强化了他们对母国的强烈支持。他们的政治意识是保守的，其语境是种族主义者的，他们成为了西班牙国家的一个坚强堡垒。

1810 年的起义被这些“帝国的忠诚卫士”所镇压——得到一些从圣多明各来的法国新移民的援助和总督萨默尤尔勋爵（Marques de Someruelos）萨尔瓦多·何塞·莫罗·萨拉查（Salvador Jose de Muro Salazar）的有力领导。萨默尤尔是一位优秀的统治者，被描绘成“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组织者”，他亲自出现在哈瓦那街头镇压起义者。那几位白人起义领袖被判刑入狱 10 年，随后被驱逐出美洲，而两个参与此事的黑奴受到 200 鞭刑并被判入狱，戴镣铐服刑 8 年。

---

① 阴谋策划者是一位富有的大地主罗曼·德·拉鲁斯·西尔维拉（Roman de la Ruz Silveira）和来自巴亚莫（Bayamo）的律师约坎·安凡特（Joaquin Infante）。他俩都是共济会的注册会员，十分了解欧洲出现的最新思想。军事统帅是雷斯·弗兰西斯科·巴萨夫－卡登纳斯将军（General Luis Francisco Bassave y Cardenas）。

② *Historia de Cuba*, *La Clonia*, Havana, 1944, p. 337.

③ Etienne－Michel Mass, *L' isle de Cuba et La Havane*, Paris, 1825, p. 249 .

1812年的一次新的起义再次呼唤效仿海地。这不是一次奴隶暴动，而是该岛第一次谋求独立的全面的黑人暴动，一场由“自由的有色人”组织的暴动。其领导人何塞·安东尼·阿庞特（Jose Antonio Aponte）是哈瓦那一位熟练的黑人木工，原是贝宁湾一个操约鲁巴语的卢库米人。[①] 他是哈瓦那黑人军团的前任司令官，在他的社团里有一些地位，是当地约鲁巴同乡会的首领。他以制作那些将基督教和非洲的元素相结合的宗教性木雕为生。

像许多自由的古巴黑人一样，阿庞特很了解外部世界的政治形势，特别是关于圣多明各的事情。他个人所崇拜的英雄——从他的房间墙壁上所见壁画得到证明——是海地领导人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 Ouverture）和亨利·克里斯托夫（Henri Christophe）。（他还有一尊乔治·华盛顿的雕像）在他家里，还发现了1804年海地独立宣言的复印件和克里斯托夫写给他的信。[②]

50

罗伯特·帕克特认为被压迫的人民一直有他们自己的智慧和交际网，19世纪的古巴黑人也不例外。

> 奴隶和自由的有色人在古巴港口城镇的船坞中走动；他们向商贩和外国私掠者兜售新闻和商品；他们捡起茶余饭后的闲话，在礼拜日、节日和非裔古巴人的同乡会中向更多的朋友传播；他们偷听白人之间的谈话；他们与数以千计的随其法国主人来到的圣多明各奴隶混在一起；他们也听到了战鼓声。[③]

阿庞特正是这样一位外来智慧的接受者。古巴黑人对于1812年在加的斯召开的西班牙国会（Spanish Cortes）的消息格外留心，这是一次有殖民地代表出席的近似革命性的会议。会上讨论了结束奴隶贸易，甚至废除奴隶制的问题。这些争论的消息很快传到哈瓦那，一些奴隶

① Paquette, *Sugar is Made with Blood*, p. 123.

② Howard, *Changing History*, pp. 76 – 77.

③ Paquette, *Sugar is Made with Blood*, p. 76.

相信西班牙政府已经通令废除奴隶制。[1]

此时似乎正是发动一场反西班牙起义的有利时机——同在拉丁美洲其他地区正在发生的起义一样。如果古巴的奴隶加入，阿庞特的起义必定会有一个成功的机会。许多黑人同乡会被动员起来，在哈瓦那和一些省城召开了秘密会议。起义者宣布的纲领是“废除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推翻殖民专制统治，用其他的方式，即自然的没有可憎的种族歧视的古巴，取代腐败和封建的政权”。[2] 这也是一个国际性的宣言。美国和巴西热衷于废奴主义的组织都被告知，古巴即将发生和海地一样的起义。[3]

在普林西佩港（卡马圭）和奥连特省，起义在平稳的策划中——参与者有自由的有色人、奴隶和白人。这项密谋得到许多不同行业人的支持——制鞋匠、木匠、制鞍匠、烧炭工、撞钟人和赶牛车的。[4] 阿庞特的计划是当西班牙军队从首都调出应付那些地方上的起义时，在哈瓦那夺取政权。

自由主义的史学家倾向于把阿庞特描绘成那个世纪后来发生的独立战争的先行者，然而他更可能是一个以海地为榜样的黑人民族主义者。阿庞特在奥连特省的主要助手希拉里奥·赫雷拉（Hilario Herrera）是圣多明各革命中的一员老兵，是来自附近岛屿的古巴英雄——从阿图伊和卡瓜克斯到马克西莫·戈麦斯（Maximo Gómez）——中间的又一位精英。

51

像往常一样，起义计划难以保密。在普林西佩港，这项密谋被出卖给当局，尽管在哈瓦那周围的一些甘蔗园，奴隶暴动提前进行，但是萨默尤尔勋爵很快在全岛实行了安全措施。赫雷拉逃亡海地，而阿庞特滞留哈瓦那。他与另外5名“自由的有色人”和3名奴隶一起被

① 在加勒比海的英属殖民地出现了同样的误解，那里的很多奴隶被误导而相信反对奴隶贸易的胜利就意味着奴隶制的废除。

② 官方后来公布了这方面的证据。见 Howard，*Changing History*，75 页。

③ Howard，*Changing History*，p. 76.

④ Elias Entralgo，*La liberación étnica cubana*，Havana，1953，引自 Howard，*Changing History*，74－75 页。

判处绞刑。萨默尤尔命令将他们的首级展示在“最热闹的公共场合以警告其他人”。阿庞特的首级被置于城市入口处的一个铁笼里。这次严酷凶残的镇压有效地阻止了进一步起义行动的发生，长达10年之久，但是许多年内对阿庞特之密谋的纪念活动一直在黑人社团中举行。

19世纪20年代，受到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在美洲大陆胜利的影响，一些持不同政见的白人重新发动了争取独立的斗争。那位伟大的委内瑞拉解放者玻利瓦尔进军整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Ecuador）、秘鲁和玻利维亚（Bolívia），并且迫使西班牙军队节节败退。何塞·弗朗切斯科·莱穆斯（Jose Francisco Lemus）曾经是哥伦比亚的玻利瓦尔军队中的一名军官，领导了古巴方面的玻利瓦尔运动，此次行动被称为“玻利瓦尔的阳光与闪电”（Soles y Rayos de Bolívar）。[1] 像早先1810年的密谋一样，“玻利瓦尔阳光与闪电”的支持者也呼唤回到前哥伦布时代的古巴，号召建立一个称之为Cubanacán（古巴的印第安称谓）的独立的新国家。他们的计划受到西班牙发生的事件的刺激，1823年4月那里的一次成功的反革命行动被认为是将要在古巴进行镇压的信号。密谋者计划在委内瑞拉的卡贝略港（Puerto Cabello）集结待命的一支3 000人的“玻利瓦尔”军队进入古巴时，他们将在古巴本土同时举行一场起义来呼应。[2] 但是西班牙当局比密谋者更快，在他们准备好之前，这个密谋已经被揭发。来自委内瑞拉的援助从未兑现。[3] 莱穆斯和他的同伴被捕并遭流放。

这次遭到镇压的被捕者中有一位是圣卡洛斯（San Carlos）神学院的哲学教授费利克斯·巴雷拉（Felix Varela），他是一位具有影响力的神职人员，也是一位领导时代的人。巴雷拉是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支持者和废除奴隶制度的倡导人。当他作为古巴代表参与1820年的马德

① 这伙国际主义阴谋集团的成员包括前哥伦比亚总统（Jose Fernández la Madrid）、厄瓜多尔总统候选人（Vicente Rocafuerre）、一位秘鲁作家（Manuel lorenzo Vidaurre）和一位阿根廷冒险家（Jose Antonio Miralla）。

② *Historia de Cuba*, *vol. I*, *La Colonia*, Havana, 1994, p. 339.

③ 入侵军统帅曼里克将军（General Manrique）在即将前往古巴之前突然辞世。

里国会时，就已经站在上述不同凡响的立场上了。在“阳光与闪电”密谋后他被迫流亡，先是在西班牙，然后到美国，在那里他经常为流亡者报纸撰稿。在美国，他帮助教育那些不像他那样睿智的新一代古巴的知识分子。作为值得尊敬的和进步公民的榜样，他在古巴的政治领域经常受到人们的怀念。

那么，是什么使得古巴与其他西属美洲迥然不同？它不乏人们对政治的不满。启蒙主义、共济会的组织、对美国独立战争的记忆、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以及圣多明各黑人革命的震撼——所有这些都对古巴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许多受过教育的古巴人，包括黑人和白人都认识到自己是广阔的、不断变动的世界的一分子，都开始探求该岛未来发展的新道路，然而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这里偶尔有奴隶起义和“自由的有色人”的起义，但是没有一次能像海地的黑人起义那样取得绝大多数群众的支持。

52

对古巴独立的支持在理论上可能来自宣布拉丁美洲大陆独立的小股殖民者军队。然而玻利瓦尔很少表现出要把他的军事行动向北扩展到古巴的兴趣。只是在 1824 年 12 月于秘鲁的阿亚库乔（Ayacucho）最终打败西班牙的大陆军队后，他才制订向哈瓦那派兵的尝试性计划。他经常表示不愿把斗争扩展到加勒比海，在他的众多信件中有一封写道：“实现和平比解放这些岛屿更重要。一个独立的古巴将给我们带来大量的工作。”玻利瓦尔甚至不可避免地相信，一个解放的古巴可能成为“另一个海地共和国”。①

无所不在的安全系统也是一个因素，它使大多数密谋在几周内就会被发现，并经常在行动之前就会被镇压。由于不能动员大量的或者有广泛影响力的群众，这些独立活动没有一个对西班牙的长期统治造成严重的威胁。

尽管一些进步的个人倾向于摆脱西班牙独立，但是古巴的经济精英们是保守的，他们担心殖民地与母国断绝关系后会出现不良的经济

① 引自 Hugh Thomas, *Cuba or the Pursuit of Freedom*, London, 1971, 103–105 页。

和社会后果。没有西班牙的支持，种植园主不能够保持他们的经济权力赖以存在的奴隶制基础，也没有足够的力量镇压奴隶的暴动。他们不愿意反抗西班牙，这也是西班牙当局推出新经济政策的结果。西班牙最终放开了岛上的贸易，废除了引起争议的烟草专卖，并且允许占主体的古巴人取得了影响岛上经济发展方向的地位。加之紧随而来的由于海地崩溃带来的财富增加，更使得岛上几乎无人企图追随南美的解放之路了。

鼓吹白人移民的强烈呼声

西班牙当局认为他们抑制白人殖民者分离主义野心的秘密武器是黑人数量优势的存在。一位西班牙大臣在19世纪30年代谈到“非洲黑人的威慑力，相当于一支100 000人的军队”。这是西班牙“防止任何白人起义企图”的王牌。[①]这一判断是准确的，甚至在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那些有独立思想的白人知识分子也不免受到种族主义思想的毒害。

53

19世纪古巴历史的核心问题，是对于种族问题的争论。古巴的黑人被认为是对白人上层和想象中的岛上未来社会的一种威胁。然而，古巴未来的繁荣依赖于甘蔗种植园中黑人劳动力的持续供应。如何在保持这种有利可图的产业的同时又能确保白人的安全呢？几十年来，这始终是上层精英们所关注的问题，多种可能性一直在酝酿讨论中。也许奴隶贸易应当停止；也许奴隶应当受到善待；也许应该输入更多的女奴；也许政治应当改良；也许自由黑人应当被驱赶以防止他们与奴隶合谋；也许应该鼓励更多的白人移居此岛，以使黑白人口的比例有利于白人。

尽管有过像阿庞特那样受到海地革命影响的人，但是，岛上的黑人从未有过一个共同的声音。建立一个黑人共和国的梦想在后来变得

① 引自Tom Chaffin，*Fatal Glogy*：*Narciso López and the First Clandestine US War againt Cuba*，*Charlottesville*，Va，1996，33页。这位大臣就是约瑟·马利亚·卡拉特拉瓦（José Maria Calatrava）。

失去了吸引力，那时大部分黑人满足于设想一个仅仅使他们能够享有与白人平等权利的社会。他们并不寻求建立一个排他的黑人政府，而这也不再有任何可能了，因为到19世纪60年代，种族间的平衡向有利于白人方向倾斜。奴隶的输入越来越少，而白人移民则形成浪潮。

圣多明各的发展对于马德里和哈瓦那而言都是一个可仿效的典范。它的奴隶经济被视为是其经济成功的关键，在1794年也因此被古巴的“经济之友会”注意：

在圣多明各殖民地遭到灾难性的破坏，并且非洲黑人在那里制造的可怕的破坏和闻所未闻的罪恶昭然于世之前，每当论及我们岛屿的发展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自由地和无限制地输入非洲黑人。这个结论的得出是由于这个不幸的殖民地享受了巨大的繁荣——这种繁荣完全归因于耕种其土地的大量奴隶。①

面对1791年的起义，殖民者们试图依靠奴隶制繁荣的梦想更像一个梦魇。马德里当局认为，古巴奴隶人口也会以类似的方式激增，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奴隶们最初的抵抗却终止了所有加勒比岛屿的奴隶贸易。然而，古巴“经济之友会”中的精英则另有想法。渴求劳动力的强大种植园主刚使经济步入正轨。他们依靠蔗糖发财的梦想和占领圣多明各世界市场的机会依赖于非洲奴隶不受阻碍地流入。

54

上述精英之中能言善辩的代言者弗朗切斯科·阿兰贡激烈地阐明应无限制地输入奴隶的诉求。他写道：古巴不像圣多明各。白人在古巴不是一个微弱的少数民族，这个岛上的白人数量几乎与黑人等量齐观。这里没有诱发起义的直接原因。如果国家鼓励白人移民，黑人将处于控制之下。阿兰贡提出了一个移民计划，通过为白人移民建设村庄的方式来打破黑人在乡村大量集中的现象。他写道：“如果这些白

① 引自 Duvon Corbitt, “Immigration in Cuba”,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XXII, May 1942, 284页。

人处于方便的位置上，就能有效地制止乡村奴隶的煽动性思想”。[①]

阿兰贡在经济之友会内寻找自己的同盟者来实施他的建议。该社团强调继续奴隶贸易的重要性。它的口号是控制而不是废除，“有必要谨慎地实施这一方案——依据手头的人口普查数据——目的是不仅要阻止非洲黑人数量超过白人，而且也不能允许其与白人的数量相等。”[②] 这是该岛下一个世纪及以后的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种族主义者的思考模式。

阿兰贡所提的，使农村中满是白人的思想被 18 世纪 90 年代担任总督的路易斯·德·拉斯卡萨斯（Luis de las Casas）全盘接受。奴隶输入和白人移民将同时进行，拉斯·卡萨斯亦计划在人烟稀少的地区建立新的乡镇。[③]

白人移民的问题在混乱的拿破仑战争时期几乎没有进展，直到 1815 年才被重新提起。一位新总督何塞·西恩富戈斯（Jose Cienfuegos）和他的热情的司库亚历杭德罗·拉米雷斯（Alejandro Ramirez）在 1817 年建立了一个新组织“白人移民部”（Junta de Población Blanca）。马德里政府通过授予土地和减免税收的方式支持白人移民，通过一项从所有输入男性奴隶的收入中提取 6 比索[④]的税收支付给白人移民部，使这项计划在财政上有了保障。[⑤] 因为在 1818 年到 1821 年间有 56 000 名左右的奴隶被运抵哈瓦那，白人移民的经费并不短缺。

阿兰贡鼓动白人移民的梦想很快实现了。在西恩富戈斯建立了一个新殖民点，它位于雅拉瓜（Jaragua）大港湾的尽头，这名字是为了

---

① 阿兰贡的计划在 1972 年 1 月 14 日就已经形成，这仅仅是在圣多明各反抗活动过后的 5 个月。见 Fracisco de Arago y Parreño, *Obras*, vol. I, Havana, 1888, 97 - 100 页。引自 Corbitt, “Immigration in Cuba”, 282 页。

② 引自 Corbitt, “Immigration in Cuba”, 284 页。

③ Corbitt, “Immigration in Cuba”, p. 286. 政府当时建立的发展代理机构王室农业与商业代办处（Consulado Real de Agricultura y Comercio）看好阿兰贡的计划，在 1796 年的报告中称“首先需关注的是毫不迟疑地、谨慎而目标明确地在统治区推动白人殖民地的发展……”

④ 原文如此，令人费解。一个大体合乎逻辑的解释应该是每输入一位黑人交 6 个比索的税。——译者注

⑤ Corbitt, “Immigration in Cuba”, p. 288.

纪念那位总督。[①] 一位来自路易斯安那的君主派难民路易·德·克洛埃特（Louis de Clouet）上校获得了一份招募殖民者的契约。1823 年，来自费城（Philadelphia）、巴尔的摩（Baltimore）和新奥尔良（New Orleans）的 845 名殖民者到达西恩富戈斯。其他有着不同背景的白人殖民地分别建立在圣克拉拉（Santa Clara）西部的圣多明各、哈瓦那西部的马列尔、关塔那摩、卡马圭的努埃维塔斯（Nuevitas）。尽管这些殖民项目的宗旨是应对种族间人口数量的失衡，但是政府在这个非常时期还有其他的动机。在迄今荒芜的地区殖民，在西班牙移民中灌输义无反顾的忠诚观念，有助于阻止颠覆性的独立运动。[②]

55 19 世纪 30 年代，这项希望看到一个"白人古巴"的事业由一位多产的记者、雄辩家和煽动者何塞·安东尼奥·萨科（JoséAntonio Saco）及其周围的一群知识分子所继承。萨科是经济之友社的一个分支《双月评论》（*Revista Bimestre*）的编辑。[③] 它的那些撰稿人都属于一个追随阿兰贡的精英群体——热衷于教育、政治自治和法国重农学派的思想。他们比阿兰贡更进步，既不为西班牙政府辩护，也不倡导独立。他们是怀有使"古巴"完全从西班牙分离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梦想的第一代古巴知识分子。正是这样，他们与那些对古巴的西班牙传统心存感激的半岛人（peninsulares），即最近从西班牙本土和加那利群岛（和拉丁美洲大陆）迁来的新移民发生了长期冲突。

萨科广泛描写了古巴社会的不同阶层，深刻批评了殖民地政府的

---

① 虽然港口一度充斥着走私商人，但是在港湾地区建立定居点的早期尝试还是失败了；18 世纪 40 年代建立的小型堡垒 Castilla Nuestra Senora de los Angeles 抑制了走私者的活动，同时也抵挡住了英国人的入侵。

② Laird Bergad, *The Cuban Slave Market*, *1790—1880*, Cambridge, 1995, p. 106. 由政府资助的推动白人移民的运动在 1821 年拉米雷兹（Ramirez）去世后，丧失了有力的支持，数年后由于黑人超过白人，Cienfegos 地区怨声载道。1859 年的一份报告以后悔的语气提到，"该地区黑人人口不断增长而非白人……白人移民仍在继续，但是这并不是因为官方的鼓励，而是一种自然流动。白人移民部（Junta de poblacion Blanca）于 1842 年解散。奴隶制将无可避免地消亡，这里需要更多的白人工人而非白人农民。当对劳力的大规模需求不再能实现，种植园主被迫转向更远的地方——中国去寻找它。"

③ 其他对此有贡献者包括 José de la Luz Caballeo、教育革新家 Domingo del Monte 以及一位流亡诗人 José Maria Heredia。

无知和愚蠢。他和他的那些朋友的缺陷是充满敌意地不喜欢古巴的主体人口是黑人这一事实。他那个群体中的一员加斯帕尔·贝当古·奇斯内罗斯（Gaspar Betancourt Cisneros）是普林西佩港的一位种植园主，笔名萨尔瓦多·卢加雷尼奥（El Lugareno），他热情地呼吁要向古巴引进“优等人”。在这里，他特别是指德国人和撒克逊人。[①]

萨科表达出强烈的种族主义意识。他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是以后在岛上再也看不到黑人。“我所说的古巴民族只应当是所有白人种族构成的明智者的群体。”[②] 他继承了阿兰贡的运动，认为“白人移民等于农业进步、艺术完美，一言以蔽之，这是古巴各个方面繁荣的基础；是将威胁我们的衰朽大厦摧毁，并在坚不可摧的基础上重建的坚定希望。”

萨科提醒大家注意一个新的威胁，即19世纪30年代英属加勒比海的奴隶都得到了自由。如果不能有更多的白人殖民者尽快到来，牙买加和海地的黑人可能会与古巴的黑人为一个共同目标联合起来：

> 与黑人居民相比，古巴殖民地必须且迫切需要使其白人居民占有道义和数量上的优势……必须考虑到120万名野心勃勃的海地人和牙买加人在觊觎古巴秀丽的河滩和闲散的土地；必须尽可能地抵制我们周围的300万黑人——这个数量还将继续增长——的可怕影响，他们将在不久的将来把我们拖入一个残忍的血腥屠杀中。[③]

有两种办法可用来对付来自黑人民众明显的威胁。一是如先后赴任的总督所主张的那样加以镇压。另一种就是由萨科和他的朋友们支持的与邻近拥有奴隶的共和国美国合并。

---

① 引自 Gerra, *A History of the Cuban Nation*, 183 页。

② 引自 Luis Pérez, *On Becoming Cuban: Identity, Nationality, and Culture*, New York, 1999, 90 页。

③ 引自 Franklin W. Knight, *Slave Society in Cuba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adison, 1970, 99 页。

56 随着“阳光与闪电”密谋的重新进行，在古巴岛上，一个新的压迫时代已经开始。弗朗切斯科·狄奥尼西奥·维夫斯（Francisco Dionisio Vives）带着不惜任何代价都要保住该岛的指令被派往哈瓦那担任总督。他在岛上统治了将近10年，建立了在所有西班牙统治者中持续时间最长和压迫最重的政权。在西班牙帝国已于拉丁美洲失败这个消息带来的危机气氛中，古巴总督在1824年创立了特殊的军管制，目的是镇压那些“制造混乱，改变社会安宁的人”。在接下来的50年里“行政和军事常务委员会”（Comision Militar Executiva y Permanente）把该岛置于军事法律的管制之下。该委员会的建立意在压制白人的政治积极性和严格控制自由的黑人民众。他们的社会和娱乐活动——经常被用来掩盖其颠覆性活动——被置于长期的监控下。节日和舞蹈以及社会和宗教聚会，现在也都得先行登记并且经常被完全禁止。

维夫斯特别关注自由黑人与奴隶合谋的可能性，他于1832年在其长期统治结束时道出了他的担忧：

> 自由黑人和黑白混血儿生活在他们受奴役的同族兄弟中间，在某些时候会非常不利，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抑制他们（奴隶们）的不满和追求解放的自然倾向，他们会企图依靠自己或者在外界帮助下形成对于白人民众数量上的优势。

他所提议的解决办法是把所有有色民众驱逐出该岛，这一思想经常被后来的总督反复考虑。①

维夫斯的继任者米格尔·泰肯·罗西格（Miguel Tacón Rosique）将军曾经参与西班牙保卫其拉丁美洲殖民地的战争，他继承了前任的压迫政策，在统治该岛时并不遵循西班牙政府的方略。当马德里命令解散“行政和军事常务委员会”时，泰肯却保留了它。当奥连特省行政长官曼纽尔·洛伦兹（Manuel Lorenzo）将军支持进步的西班牙法

① 引自 Paquette，*Sugar is Made with Blood*，105页。

令，宣布1812年的激进宪法——企图在西班牙控制下成立一个支持奴隶制但是“民主的”政府——之时，泰肯派军到圣地亚哥镇压。泰肯使古巴岛保持了封闭状态。

这种压迫使古巴知识分子转而反对西班牙，许多人开始严肃地思考如何改变现状：独立还是合并到美国。最早受到泰肯迫害的是萨科，由于“他对哈瓦那青年巨大的影响力”而在1834年被驱逐出境。他在巴黎侨居多年，写了一本关于奴隶制历史的书。他一直惧怕将会有一个黑人主导的独立的古巴，从而成为与美国合并这一主张的早期倡导者。 57

19世纪古巴的许多政治讨论都是关注于这种可能的关系。萨科是一位持惋惜态度的支持者，他在1837年1月写道，其“主要期望”仍然是“古巴是古巴人的古巴”，但是他感到“这可能不会实现，因为这个政府正把我们推向革命”。他认为这种状况“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只能使我们投入美国的怀抱。这种思想必须现在就宣传并且灌输到所有的观念中”。[1] 如果古巴必然落入外国的怀抱，他写道：“没有比她落入伟大的北美联邦更光荣或者荣耀的了。在那里，她将找到和平和慰藉、力量和保护、正义和解放。”[2] 萨科所生动表达的这种梦想，在美国比在古巴更强烈，且从未完全从古巴的政治争论中消失。

美国干涉的开端（1823—1851）

美国夺取古巴的意识并不是从这些微弱的舆论氛围中产生的。很久以来，美国就在讨论着兼并这个岛的可能性。相继执政的美国政府都警醒地考虑到在古巴出现一个黑人共和国的可能，并考虑到这将对美国实行奴隶制的南方各州可能产生的影响。马丁·范布伦[3]（Martin

---

① Antonio Elorza, *La Guerra de Cuba*, *1895—1898*, Madrid, 1998, p. 59. 亦见 Eduardo Torres Cuevas, *José Antonio Saco*: *acerca de la esclavitud y su historia*, Havana, 1982, and José Opatrny, “José Antonio Saco's path toward the idea of Cubanidad”, *Cuban Studies*, 24, 1994。

② José Antonio Saco, *Parallels between Cuba and some English Colonies*, Havana, 1837.

③ 1837—1841年在任。——译者注

Van Buren）总统在1829年警告“考虑到美国南方的利益，我们并不期望古巴岛脱离西班牙而独立，它的直接后果是将会突然解放无数的奴隶民众，使邻近的美国海岸极其敏感”。[①]

在19世纪20年代，正是西班牙人从拉丁美洲大陆撤出的时候，美国有意识地要成为古巴舞台上的一名主角。从1776年以来，美国人就对古巴感兴趣，并时而与其他感兴趣的集团讨论它的未来。然而他们完全是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旁观者。随后，当美国人于1821年正式占领西属佛罗里达后，他们突然意识到古巴因此而更接近自己的领土。早些时候关于古巴岛未来的随意性的讨论变成越来越严肃的问题。[②]

谁拥有古巴现在被视为关系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驶出密西西比（Mississippi）河参加海岸贸易的美国船只，不可避免地要经过美国迈阿密（Miami）和西属哈瓦那之间的海峡。由于西班牙对拉丁美洲大陆的持续控制逐渐削弱，古巴处于玻利瓦尔武装以及从未停止过的英国掠夺者德雷克、弗农和阿尔伯马尔的后继者的潜在威胁下。

58

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美国关心的问题，他希望古巴（和波多黎各）不要落入除西班牙外的任何国家的控制下。他在1823年4月23日写给美国驻马德里公使休·内尔森（Hugh Nelson）的一封信中起草了一份关于美国新战略的提纲（参见附录1）：

这些岛屿本应是附属于北美大陆的，从多方面考虑，它们中的一个——在我们海岸边几乎就能看到——将成为我们联邦商业和政治利益非常重要的目标。

---

① 引自Perez，*Cuba and the United States*，109页。

② 西班牙属佛罗里达一直困扰着美国，因为这里是来自美国南部州逃逸奴隶的天堂，同时也是塞米诺尔（Seminole）印第安人制造无尽麻烦的源头。1818年，美国军队在安德鲁斯·约翰逊（Andrew Jackson）将军的率领下，穿过边境线进入佛罗里达，进攻印第安人。他们占领了西班牙人的两个要塞。约翰·亚当斯要求西班牙，要么控制好他们的领土，要么将佛罗里达出卖。西班牙人答应放弃佛罗里达，以此来换取美国人签署协议，答应放弃德克萨斯，当时它属于新西班牙（墨西哥）的一部分。该协议于1819年签署。

亚当斯谈了他个人的想法。如果西班牙在古巴的统治结束，它必须被美国的统治代替——一个预言将在本世纪被实现：

自然法则和物质引力使然。就像一个苹果被暴风雨从树上吹掉，只能毫无选择地落到地上，如果古巴被迫从它与西班牙非自然的联系中分离，是不可能自我支撑的，只能被吸引投入北美联邦，由于相同的自然法则，北美不能使古巴脱离她的怀抱。①

此后，依旧对美国事务具有影响力的托马斯·杰弗逊（Tomas Jefferson）写信给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总统，讨论占领“任何一个或者更多的西班牙省份”的可能性。他写于1823年10月的信件反映了美国关于是兼并和夺取古巴还是允许其独立的争论长期没有达成共识：

我坦率地承认，我一向把古巴当作最有意义的附属地，甚至可以将它归于我们的国家体系中。控制该岛和佛罗里达角，将使我们能控制整个墨西哥湾以及与它相邻的地峡和国家——这里所有水路的必经之处——将成为补足我们政治安宁的手段。然而，如我所料，即使古巴本身赞同，这也是不可能的，除非通过战争；而它的独立，是我的次要兴趣（尤其是它脱离英国而独立），如可以不通过战争取得，我将毫不迟疑地放弃我对其未来发展的第一愿望，而接受它的独立——伴随着与英国的和平与友谊——而不是以战争和她的敌对为代价的联合。

这种态度被1823年12月2日门罗总统在其呈递国会的咨文中宣

① 引自 Willis Fletcher Johnson, *The History of Cuba*, vol. 2, New York, 1920, 261－262页。

称的所谓门罗主义奉为信条。门罗主义的产生是美国代表团在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与俄国政府谈判美洲大陆西北海岸问题的副产品。59 美国代表告诉俄国人，门罗宣布欧洲列强应当离开美洲。“这一事件被恰当地评价为是美国在宣布一个涉及美国的权利和利益时所遵循的原则，即从此之后，作为已经获得并保持着自由和独立的美洲大陆，不能被任何欧洲列强作为未来殖民活动的考虑对象。”门罗警告那些列强，美国认为“任何试图将它们的部分制度延伸到这个半球任何地方的企图都被视为对我们和平与安全的危胁”。

在19世纪20年代，美国明确表示它对古巴的未来感兴趣，但是直到20年后这件事情的结果也没有浮出水面。美国于19世纪40年代对墨西哥进行侵略，且于1847年兼并了它一半的领土，激起了帝国扩张的空前热情。英国人阻挠了美国在加勒比海进行扩张的可能性，现在他们不仅积极地参与反对奴隶贸易的运动，而且反对奴隶制本身。古巴是英国的主要攻击目标之一。

古巴的奴隶制受到英国人的攻击（1817—1842）

在19世纪的多数时间，古巴当局——政府、商人和种植园主都持同样的立场——不愿意废除奴隶贸易。奴隶制本身神圣不可侵犯，美国和巴西的种植园主也赞同这种观念。奴隶主们深信，古巴的生计依赖于这项贸易，如果不是靠无限制的大西洋贸易所提供的奴隶们的廉价劳动，他们的高品质生活将不能长久。于是，古巴成为西班牙帝国历史上最大的奴隶输入殖民地，在1790年和1867年间，78万多名奴隶被带到这里。随着英国人在1807年后退出这项贸易，古巴成为这项“令人反感的贸易”在加勒比海的主要中心。[1]

随着时代的进步，支持奴隶贸易的古巴逐渐变得孤立。英国人于1807年在自己的殖民帝国内制止了奴隶贸易（而不是奴隶制度），并

① Bergad, *The Cuban Slave Market*, p. 38.

且着手进行一场“正义之战”① 制止任何地方的奴隶贸易。美国在1808年停止了这项贸易。而西班牙政府在伦敦的压力下于1817年承诺将在1820年废除其殖民地的奴隶贸易。只是在此时，西班牙人虽然在协议上签了字，但西班牙人不具备执行协议上要求的条件——即使他们想做（事实上他们不想）。直到1868年，古巴漫长的海岸线从未被西班牙海军有效地控制，早期著名的海岸巡逻已成为一种记忆。非洲奴隶更大规模地继续涌入古巴，使有教养的英国人感到惊愕并被激怒。

60 1817年在马德里签署的《英国—西班牙协定》创立了一个早期国际检查制度的范例。依据该条款规定，英国海军被授权搜查那些被怀疑载有奴隶的西班牙船只。一旦被发现船上有奴隶，他们（和这艘船）将被扣押。他们的命运将由设在大西洋两岸的哈瓦那和英属非洲殖民地塞拉利昂首府弗里敦（Freetown）的英—西法庭来决定。

如果这些法庭判决释放这些奴隶，英国海军将释放他们，并把他们移交给上述两城市之一的执政者。在古巴，这类释放的奴隶被称为释放者（*emancipados*），将“准备”获得自由，这个过程可能持续5年——或者大多数情况下是永远的。理论上他们在此期间将获得工资和宗教指导，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人得到自由。1824年到1836年间在海上搜捕到9 000名释放者，1841年被官方估计是居住在古巴的，只有2%的人获得自由。②

奴隶贩子很容易逃避1817年的协定，最常用的方式是改变他们航船上的旗帜，因为英国海军只被允许登上在西班牙注册的船只。而在19世纪20年代大部分前往哈瓦那进行贸易的贩奴船都是在葡萄牙注册的。古巴奴隶进口商也很容易通过贿赂西班牙官员使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泰肯被指控在1838年退休时已经拥有45万美元的“人头

① 此处原文是“十字军”（Crusade），在基督教词汇中，它不仅表示宗教之战，也表示其“正义”的性质，为避免引起读者误会，此处译为反奴隶贸易的“正义之战”。——译者注

② Paquette, *Sugar is Made with Blood*, p. 135.

钱”，许多都是他同美国驻哈瓦那的领事勾结而获取的。[①] 古巴有数不清的港口和小海湾欢迎奴隶贩子，正像他们曾经在早期提供给海盗和私掠者保护一样。估计在 1821 年到 1836 年间，每年有 1 1000 名奴隶（切不可混同于释放者）到达古巴。[②]

非洲奴隶贸易仍在不计后果地继续着。在美国注册的船只也不是上述搜查协议的搜查对象，他们继续将奴隶运到古巴。1839 年，在巴尔的摩纵式帆船友谊号（Amistad）上发生的著名暴动引起了人们对这个漏洞的注意。在这次暴动中，53 名新运来的奴隶趁着这艘船离开哈瓦那沿海岸航行时劫持了它。[③] 由在美国注册的船只主导的奴隶贸易直到 20 年后，即 1862 年 2 月贩奴船伊利号（Erie）船长纳撒尼尔·戈登（Nathaniel Gordon）在纽约被公开绞死后才被废除——这是因参与奴隶贸易而被处死的唯一的北美人。他在刚果河畔将 900 名奴隶装船后，于 1860 年 8 月在非洲卡宾达（Cabinda）海岸被美国海军船只捕获，其罪名是贩运奴隶到古巴。[④]

最终对古巴繁荣更大的威胁是由英国人领导的废除奴隶制的国际运动。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废除了英属加勒比领地的奴隶制，古巴迫于压力起而仿效。1835 年，当英国与其他海上列强（除美国外）签署了共同搜查协议后，英国封杀了奴隶贸易。就在这一年，一份新的英—西协定《戈拉登协议》（*Clarendon Convention*）被签署，该协议允许英国而不是古巴的官员控制那些释放者，并给予英国人将他们转移到邻近的英国殖民地的权利。一位虔诚的废奴主义者理查德·马登（Richard Madden）博士戴着“解放非洲人事务主管”的头衔担任英国驻哈瓦那公使。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调查自 1817 年协定以来被安置在这

61

① Paquette, *Sugar is Made with Blood*, p. 135, and Thomas, *Cuba*, 2nd editon, p. 124.

② Davis Eltis, “The Ninteeenth Century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ycal Review*, February, 1987.

③ 奴隶们希望可以航行去非洲，但是船上的其他人有不同的看法，船最后去了长岛。最后，他们被美国海岸警卫队扣押，提交审判，1841 年奴隶们最终获得自由。

④ Hugh Thomas, *The Slave Trade: The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1440—1870*, London, 1997, p. 774.

个岛上的释放者的命运。马登是一位爱尔兰医生，曾经担任牙买加地方官员，他在那里宣传反种族主义的观点，于是1834年后牙买加的奴隶制逐渐停止，但他不受当地白人的欢迎。他的名声先于他本人传到哈瓦那，泰肯于是写了一封信警告马德里，说马登是一个危险人物。“如果他来到古巴岛生活，将会有更多的机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散布煽动性的思想，这可是会令我防不胜防的。”①

马登有权依据上述协议接收运往哈瓦那的释放者，并将他们送往解放了奴隶的英属牙买加、特立尼达岛或者伯利兹（Belize）。当泰肯拒绝转运时，马登租用了一条英国船罗姆尼（*Romney*）号为奴隶提供保护。罗姆尼号一直在港口外抛锚停泊，可想而知，这引起了在1838年接任泰肯职位的华金日·德埃兹佩莱塔（Joaquín de Ezpeleta）的忧虑，因为这艘船上的船员和管理者都是来自英属西印度地区的黑人。英国自由黑人的邻近显然将会鼓动古巴奴隶民众，这位新任总督向马德里抱怨道，“仅仅通过他们的语言和衣着”英国黑人士兵就会“激起他们[在古巴]的同种族的人不惜任何代价且无视所有威胁而寻求自由的强烈愿望。”②

英国人的坚定立场，加之西班牙出现了一个进步的政府，以及教皇格雷哥利十六世（GregoryXVI）坦率的声明，对古巴人的态度开始产生了影响。教皇在1839年发布了一份敕令，谴责奴隶贩子，因为他们对待奴隶“像对待不洁的动物”，并禁止天主教徒参与这种贸易。经营这种贸易的人将被开除教籍。③ 古巴总督拒绝在古巴公布这则敕令，但是对奴隶贸易的态度已经开始改变。1841年到1843年担任总督的杰罗尼莫·韦尔德斯[（Geronimo Valdes），另一位参加1824年秘鲁战争的老兵]极力反对这种贸易并对新来的奴隶关闭了哈瓦那奴隶

① David Murray, *Odious Commerce, Britian, Spain, and the Abolition of the Cuban Slave Trade*, Cambridge, 1980, pp. 122, 125.

② Murray, *Odious Commerce*, p. 125.

③ Thomas, *The Slave Trade*, p. 665.

市场。[1] 1841 年，他下令使 1 000 多名释放者获得自由。[2] 然而，尽管有高层的强烈反对，在此后 20 年内，奴隶仍旧持续地大规模运来。在 1840 年到 1860 年间，多达 20 万名奴隶可能被运到古巴。[3]

1840 年，马登的职位被另一位反对奴隶贸易的激进战士戴维·特恩布尔（David Turnbull）所接替。作为一个后世“人权记者”的先驱者，特恩布尔此前曾在巴黎和西班牙担任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的记者，并且出版过一本畅销书《西方之旅》（*Travel in the West*），描述了一次穿越古巴奴隶种植园的旅行。[4] 1840 年他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反对奴隶制大会上谈道，奴隶贸易是“现实中曾折磨人类的最大的罪恶”。他从英国外相那里得到的指示是，督促古巴当局遵守 1817 年和 1835 年的协议并且调查释放者的状况。

特恩布尔会见了许多萨科的朋友，尽管萨科现在被流放，但可以想象，他仍旧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他在整个岛上旅行，调查在边远地这种植园工作的释放者的命运。当他试图解放一名已经为奴 16 年的释放者时，引起了总督的愤怒。总督告诉特恩布尔，他的调查已经“是对岛上政治管理的严重冒犯，因为这就意味着，你有资格倾听有色民的抱怨并为他们提供保护，支持他们的主张”。总督担心“此种状态可能会失去使他们附属与服从的束缚”。[5]

特恩布尔也会见了许多自由的有色人，他们的社团中有些领导人在打听牙买加奴隶制废除之后的发展问题。他的会见并没有涉及非裔古巴人和白人群体寻求结束奴隶制的密谋，也没有试图推动古巴的独立，但是总督有理由猜疑他的动机。[6] 特恩布尔通过弗朗西斯·罗斯·科金（Francis Ross Cocking）参加了上述会议。科金是他在领事

---

① Bergad, *The Cuban Slave Market*, pp. 65 – 66.

② Howard, *Changing History*, p. 86.

③ Thomas, *The Slave Trade*, p. 746.

④ Paquette, *Sugar is Made with Blood*, p. 133.

⑤ Paquette, *Sugar is Made with Blood*, p. 141. 当时的总督是安哥拉王公佩德罗·泰雷兹·德·吉隆（Pedro Tellez de Giron）。

⑥ Rodolfo Sarracino, *Los que volvieron a Africa*, Havana, 1988, pp. 99 – 100.

馆的助手，也是他负责的英国和国外反奴隶制社团的报纸《反奴隶制通报》驻哈瓦那通讯处的记者。科金是一名训练有素的英国会计员，他于1839年第一次到达哈瓦那并成为一名商人的记账员。他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先前在委内瑞拉生活了10年并邂逅了他的妻子。根据他后来的陈述，他在1841年加入了一个“富裕的、理智的和有影响力的古巴人”组织，讨论独立和结束奴隶制的问题。[①] 这个包括白人和自由黑人的组织，在为佩德罗·玛利亚·莫里利亚（Pedro Maria Morilla）所起草的6点宣言而奋斗。宣言曾发表在《反奴隶制通报》上：

1. 白人和自由的有色人将共同推动一项独立运动。

2. 起草并公布一份独立宣言并为他们的运动提供根据。

3. 为独立而战斗的奴隶将获得自由，他们的主人在独立后将会获得补偿。

4. 自行其是反叛其主人的奴隶将被认为犯有叛国罪。

5. 将以一种确保其主人安全的方式起草奴隶解放的计划。

6. 一名使节将被派往英国政府寻求援助以建立一个包括“所有阶层和各色人种”的新社会。

但这份宣言墨迹未干，特恩布尔就被总督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persona non grata*）而撤回牙买加，留下科金暂时处理领事馆事务达数月之久。[②] 直到特恩布尔的继任者于1842年8月到达哈瓦那之前，科金一直在哈瓦那工作。他的活动让许多古巴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如果继续进行奴隶贸易，英国人可能会入侵此岛。[③] 他在1846年的叙述中写道，“在这个特殊时期”，

63

① Paquette, *Sugar is Made with Blood*, pp. 163 – 164.

② 1842年，特恩布尔同一些英国黑人一起从巴哈马（Bahanas）回到古巴，希望可以解救一些被视同于奴隶的巴哈马人。他们在该岛的北部海岸靠近Gibara的地方上岸时，特恩布尔（Turnull）被逮捕，并被指控蓄意组织反抗活动。许多西班牙人希望处死他，但是他最后被驱逐，并且永远不得再回到古巴。Thomas, *The Slave Trade*, p. 668.

③ Paquette, *Sugar is Made with Blood*, p. 159.

> 如果我能掌握10艘武装帆船，有数以千计的武器装备，还有一小群能带着这些武器在我指定的地点登陆的人，我将能实现该岛的独立和随之而来的奴隶解放；因为有成千上万人已经整装待发，他们将集合起来，武装起来，登上这个岛屿。[①]

继承特恩布尔担任领事的约瑟夫·克劳福德（Joseph Crawford）是由一个很少关注反奴隶制运动的英国新政府任命的。科金被解雇。在牙买加的特恩布尔鼓励科金去他那里，表面上是接受一项新的任务——征集移民工人，使其取代在牙买加种植园里工作的奴隶——包括来自古巴的有色民。实际上，特恩布尔需要科金在他组织的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古巴起义活动中帮助他。科金于9月回到古巴，到南部港口圣地亚哥、曼萨尼约、特立尼达和西恩富戈斯检查革命的准备情况。

这里的革命热情比哈瓦那更高，但是科金失望地发现，大多数白人仍旧担心结束奴隶制会影响到该岛的繁荣。他发现英国在加勒比地区的竞争者美国也派代表在该岛推行古巴独立的思想，但是不涉及奴隶解放的问题。这种思想已经严重削弱了一些他曾经联系过的白人的积极性。

黑人的情绪更加高涨，他也高兴地发现，他原来参与的一些哈瓦那组织的成员已经派“代表在全岛旅行”。他们“激起了不易遏制其爆发的革命激情”。[②] 科金意识到没有白人支持者的一次黑人起义将会造成灾难，就去“尽自己所能”地说服黑人，“当时，如果他们得不到当地白人的财富和权力支持”，起义将是不成熟的。

科金于1843年5月离开古巴，驶往英国，作为反对奴隶制社会的古巴专家在伦敦出席了第二届世界反奴隶制大会，随后返回加拉加斯（Caracas）定居，与其妻子的亲属们共同生活。在加拉加斯，他写了自己参与古巴密谋的传记。关于科金传记的真实性一直存在一些疑问，

① Paquette, *Sugar is Made with Blood*, p. 164.

② Paquette, *Sugar is Made with Blood*, p. 167.

64

但是正如罗伯特·帕克特指出的那样，后来约瑟夫·克劳福德给伦敦的公文“证明克里奥尔人和非裔古巴人毫无疑问地曾经反复思考推翻西班牙政府的计划，并且科金曾经参与其中”。[①] 克劳福德在1842年8月告诉伦敦方面，在哈瓦那存在“众多”革命阴谋集团，“我被告知，所有这些特别的集团早已为特恩布尔先生所知晓。”他写道，他也担心科金已经“致力于克里奥尔人的革命计划了”。

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不满的古巴白人可以选择参与各种密谋活动。他们可以选择解放奴隶，并可因此希望得到英国援助，或者他们也可以选择保有奴隶而加入一项亲美派的阴谋，像10年后纳尔西索·洛佩斯（Narciso Lopez）从新奥尔良进军时所做的那样。在所有这些活动发生之前，该岛被一次黑人起义的浪潮所吞没，随后则是残酷的压迫。

黑人起义：梯刑（La Escalera）密谋（1843—1844）

1843年3月的一个清晨，在卡德纳斯（Cardenas）附近的一座糖厂中，当更夫正在换班时，战鼓声敲响了起义的节奏。因赫尼奥·阿尔坎西亚（Ingenio Alcancia）下属的一个甘蔗种植园的奴隶发动了一场经过充分准备的起义，他们杀死工厂的工程师和另外两名雇主，破坏了附属于糖厂的许多建筑物。随后就转移到邻近庄园，吸纳了那里的奴隶，并赢得在新建铁路线上的工人的支持。根据当时的记载，他们“按照军队的秩序，穿着节日的服装，举起色彩缤纷的旗帜，手持皮革盾牌”前进。[②]

这是“梯刑密谋”起义的开端，参与者包括奴隶和“自由的有色人”。科金于1846年在加拉加斯写的自传中宣称，卡德纳斯暴动是一位“刚愎自用”的有色人酋长所领导的。[③] 然而这次起义和前述英国领事的活动并无直接的联系，特恩布尔和科金遍访全岛的旅行只是鼓

① Paquette, *Sugar is Made with Blood*, p. 168.

② 引自 Paquette, *Sugar is Made with Blood*, 177页。

③ Paquette, *Sugar is Made with Blood*, p. 167.

励黑人相信英国人将不会袖手旁观。

这是介于1812年阿庞特起义和1868年爆发的第一次独立战争之间最有影响的起义，它在人们的印象中留下的记忆不是因为起义本身，而是因为残忍的镇压活动。这次起义和镇压事件被称为*escalera*（梯刑），这是指一种将被捕的囚犯绑在上面施以鞭打折磨的一种简单木梯。[①] 这种梯子是一种经常在甘蔗种植园使用的刑具，用来摧毁有可能反叛的奴隶们的反抗精神。

在因赫尼奥·阿尔坎西亚，当局别无他法，遂集结了军队和当地带猎犬的训犬师及贫穷的白人（*monteros*）。起义者被赶到霍韦亚诺斯（Jovellanos）上方的群山里，他们在逃亡途中进行了可想而知的破坏。4个白人被杀死，另有2人严重受伤，但是奴隶随后受到猛烈的镇压。马坦萨斯地方的行政官写道："许多奴隶被射死，更多的奴隶被白人居民和士兵吊死。"[②]

起义像一串点燃的爆竹一样迅速席卷古巴西部，在各个预料不到的地区爆发。一个在圣诞节将发生起义的谣言传遍全岛。11月份在马坦萨斯的特里温维拉托（Triunvirato）甘蔗种植园发生的一次暴动，（据说）是由一位名叫"黑卡洛塔"（La Negra Carlota）的女黑奴[③]充当先锋的，她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砍刀。一个世纪以后，在古巴出兵干涉安哥拉时，就用她的名字为这次行动命名为"卡洛塔行动"（Operation Carlota）。

1843年，古巴总督莱奥波尔多·奥多内尔（Leopoldo O' Donnell）命令逮捕马坦萨斯周围甘蔗种植区的数千黑人，包括奴隶和自由的有

---

① 拉蒙·贡扎雷斯（Ramon Gonzalez）是使用这种木梯刑具的最残暴的行刑者。他"命令将他的犯人带到一间粉刷成白色的房间里，四壁沾染着此前那些受害者的鲜血和皮肉……室内有一个血淋淋的梯子，犯人被头朝下绑在上面，无论奴隶还是自由人，只要他们不按照检察官的诱导招供，就会被鞭打致死……他们被皮带抽打，其顶部是细金属丝制成的致命的钉扣……他们的死亡被公之于众，当然由内科医生来诊断，死因是腹泻"。引自Paquette, *Sugar is Made with Blood*, 220。

② Paquette, *Sugar is Made with Blood*, p. 178.

③ 这位起义领袖是女性，在西班牙语中，La是阴性冠词。——译者注

色人。他在1844年2月宣布，其目标是“使奴隶重新恢复到习以为常的不会严重伤害其主人的顺从和受奴役的状态，同时严厉地、毫不留情地惩罚［奴隶］和白人以及自由的有色人中把这种不安分和不顺从的因素引进来的领军人物”。[①]

从1844年1月到3月末，奥多内尔和“军事委员会”（Comisión Militar）在马坦萨斯周围有色人种群众中实行了恐怖统治，这是一段“充斥着搜查、逮捕、拷打、逼供、审讯和惩罚的紧张时期”。[②] 一位于1844年来到古巴访问的纽约律师理查德·伯利·金贝尔（Richard Burleigh Kimball）把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描述为“卑鄙、残忍和血腥的”。他们的审讯“伴随着最残酷的鞭笞，经常使用迟早会致死的手段进行刑讯”。[③]

另一名美国游客约翰·沃德曼（John Wurdemann）博士描绘了建立在马坦萨斯和卡德纳斯的“屠宰房”，并且报道了那些被控有罪者如何被“鞭打逼供……在多数情况下对一个黑人要鞭打1 000多下；这种持续的拷打造成大量的死亡，更多的人死于伤口的剧烈疼痛和坏疽”。[④] 一位英国记者在1844年8月指出“在那里所有的地方都显得很平静，但那是恐怖的平静。”[⑤]

历史学家确认了当局这次镇压的规模和程度，但是许多年来没有人能够确定是否真的存在过一个由密谋导致的起义。古巴的军事委员会把这些事件描述成“有色民反对白人的密谋”（*Conspiracion de la gente de color contra los balancos*），但是大多数古巴的历史学家不愿意接受这是一场由黑人领导的反对白人的起义这一说法。最近的研究证明，西班牙当局可能是正确的。当时确有一些组织起来的秘密活动——奴隶们组织起来寻求自由，有色人组织起来寻求更好的待遇，伴随着局

① 引自Paquette，*Sugar is Made with Blood*，236页。奥多内尔的祖先是由多内加尔（Donegal）移民至西班牙的。

② Paquette，*Sugar is Made with Blood*，pp. 219 - 220.

③ 引自Paquette，*Sugar is Made with Blood*，220页。

④ 引自Paquette，*Sugar is Made with Blood*，227页。

⑤ 引自Paquette，*Sugar is Made with Blood*，232页。

66 外白人们的恐慌。英国驻哈瓦那领事的无所顾忌的活动必定更加促使这次起义达到不可想象的程度。然而并不存在一个全方位的密谋活动，值得当局下如此功夫严酷镇压。

"梯刑"运动仅仅是一场古巴的少数白人民众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惶惶不安地担心着可能发生的起义。他们的担心在1841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出来后进一步加重，这次人口普查显示出在古巴历史上，奴隶人数第一次超过了白人。古巴刚刚过100万的总人口中包括41.8万名白人、43.6万名奴隶和15.3万名有色人种自由人。①

沃德曼博士指出，在"梯刑"起义时期古巴的白人移民有着显而易见的恐惧："所有圣多明各屠杀时的惨状都被重演。许多白人被剥皮和活活烧死，除了那些将面临更糟糕命运的年轻妇女外，其他所有的人不分年龄和性别统统遭到屠杀。"②

西班牙当局长期关注古巴的自由黑人民众的情况，其相对庞大的人口比例超过了加勒比海其他岛屿或者美国的黑人人口比例（但是与巴西类似）。奥多内尔不能摆脱他们，正如维夫斯所希望的那样，但是他利用了"梯刑"起义的机遇驱逐了并非在古巴出生的自由黑人。所有这类成年男子被限制在两周内，即1844年3月前离开该岛。从那时起直到1845年6月，根据佩德罗·德商·查博（Pedro Deschamps Chapeaux）的估计，"至少有739名有色自由民逃离。其中416人到墨西哥，92人到非洲，40人到美国，其余的人到牙买加、巴西和欧洲。他们在墨西哥和其他地方仍然受到西班牙人的监视，阻止他们返回古巴。事实上，王室曾明令禁止任何有色自由民或者释放者进入古巴。"③

奥多内尔的暴行受到古巴上层白人的赏识。但当它结束时，有些人开始质疑它是否明智。于是，许多甘蔗园领主和商人聚集在发展促进会向马德里的伊莎贝拉（Isabella）女王传达支持其总督的谄媚信

① Chafin, *Fatal Glory*, Charlottescille, Va. 1996. p. 33.

② J. G. F. Wurdemann, *Notes from Cuba*, Boston, 1844.

③ 引自 Paquette, *Sugar is Made with Blood*, 228页。

息。它谈到乡村的奴隶受到“城市的自由人和释放者”鼓动进行了“一次广泛、庞大和恐怖的起义”。他们的密谋受到“外国的”支持并且有“外部和他们同肤色的支持者的赞同”。如果不是“上帝之手”……激励着陛下您怀着愉快的心情将这个岛的支配权交付于那些今天进行着管理的一些专业而又勤奋的杰出人物手中，古巴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将“不能够幸免于难”。[①]

19 世纪 40 年代早期的这一事件揭示了关于古巴人观念的一个重要事实。人们可能动员白人进行独立斗争，动员黑人为结束奴隶制而斗争，但是这两个目标不可能并行不悖。白人害怕结束奴隶制度，黑人也并不十分关注独立。黑人寄期望于英国人，因为他们于 1834 年在邻近的牙买加解放了奴隶。白人则寄希望于美国，因为美国的奴隶主现在仍然统治着南方。

67

纳尔西嘉·洛佩斯和美国兼并的威胁（1850—1851）

1843—1844 年的斗争惊吓了黑人并且警告了处于长期恐惧中的白人，于是，在古巴，一种要求将本岛归并于美国的呼声甚嚣尘上。19 世纪 40 年代在社会的富裕阶层中增长了倾向于兼并的情绪，并且在整个 19 世纪，它都是存在于古巴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第一位明确的倡议者是流亡到纽约的一位富裕的古巴种植园主克利奥托巴尔·马丹（Criotóbal Mádan）。他是约翰·奥沙利文（John O' Sullivan）的表兄弟。奥沙利文是一位美国记者，他在 1845 年创造了“天命论”（Manifest Destiny），这是一种为美国扩张辩护的观念并且成为一个主导性的政治口号。奥沙利文写道，美国的使命就是“将上帝分配给我们的每年数百万人的自由发展传播到整个大陆”。这里，他没有特别明确地提到古巴，但是对于那些被这个口号所鼓舞的诸多美国政治家和士兵们来说，古巴被列在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从前的墨西哥领土德克萨斯（Texas）之后的第一位。政治家想通过购买的方式从西班牙那里

① 引自 Paquette, *Sugar is Made with Blood*, 231 页。

得到该岛，士兵则设想着一次“擅自入侵”行动将会使他们占领墨西哥大部分领土的胜利重演。

奥沙利文和马丹都支持兼并古巴领土，认为该岛与大陆之间日益紧密的贸易关系必将促成一个政治上的联合。在那个世纪中叶，美国成为了古巴最大的贸易伙伴；它大量进口古巴糖并且提供给它工业产品。西班牙和英国被远远甩在后面。北美船只从所有的东部海岸港口——从波士顿（Boston）和纽约，从费城和新奥尔良——驶往哈瓦那，供给古巴人现代生活的必需品：“木箱料、桶板、木匣、木桶、铁箍、钉子、柏油、纺织品、咸鱼、谷物、猪油、面粉和稻米。”① 返回美国港口的船只运载甘蔗、可可、烟草和咖啡。1859 年，在加勒比周游的英国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描写了古巴贸易如何落入美国人手中，他想象哈瓦那“像新奥尔良一样成为美国的城市”。②

贸易的增加伴随着移民的到来。理查德·马登在 19 世纪 30 年代注意到北美人移民到哈瓦那东部的情况。他写道：“该岛北部沿海的一些地区，尤其是临近卡德纳斯（Cárdenas）和马坦萨斯的地方，具有了更多美国的而不是西班牙殖民地的特征。”③ 1898 年的一位游客理查德·戴维（Richard Davey）指出了这个国家如何在“最近 7 年里”美国人泛滥。他们引进了“新教的所有形式”，包括主教派教会成员和贵格会教徒，甚至还有震颤派教徒。④

古巴人自身变得对美国而不是对欧洲更感兴趣，如马丹一类人选择美国作为自己的最终流亡地，就可证明这点。原来的流亡者会选择居住在马德里或者巴黎，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的立足之地选择在北美的城市。在这种变化的氛围中，兼并古巴自然成为哈瓦那和华盛顿都在讨论的一个话题。这种思想的唯一阴影是，如果美国去夺取

---

① Peréz, *Cub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 13.

② Antony Trollope, *The West Indies and the Spanish Main*, London, 1862.

③ 引自 Peréz, *Cuba and the United States*, 20 页。

④ 引自 Peréz, *Cuba and the United States*, 25 页。

古巴，可能会卷入一场美英之战，英国仍旧是它在加勒比的主要竞争对手。

然而19世纪中叶，力量的平衡发生了转变。美国以更大的热情谋求它的贸易和政治影响力，很少担心欧洲的干涉。[①] 连续几届美国政府向西班牙提出购买古巴的要求，马德里当局都一概拒绝。詹姆斯·波尔克（James Polk）总统在1848年出价1亿美元，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总统在1854把开价增加到1.3亿美元。皮尔斯驻欧洲的大使还建议道：如果马德里拒绝出售，“那么，我们将以人类或者神的任何法律，证明我们有能力将它从西班牙手中夺过来”。[②]

美国政府喜欢采用购买的提议，认为军事行动将会带来许多问题；它几乎无异于进行一场战争。自由随意的袭击则是另一回事。提倡使古巴和美国合并的美国人和古巴人很快采取了行动，组织了对于古巴海岸的“掠夺性”征伐。这些小规模的登陆活动包括一次数百名美国袭击者的行动，他们计划与他们所希望的古巴岛上的反抗者取得联系。这些冒险者的核心人物是纳尔西索·洛佩斯（Narciso Lopéz），他是一位领导了两次对古巴进军的前西班牙军官。第一次登陆活动是在1849年的卡德纳斯，第二次是在1851年哈瓦那西部的莫里略海湾（Playa El Morrillo）。

洛佩斯于1797年出生在委内瑞拉，他年经时在委内瑞拉独立战争期间为西班牙作战。19世纪20年代回到西班牙，在西班牙服役期间，他是一个成功的军事—行政长官，连续担任昆卡（Cuenca）、瓦伦西亚（Valencia）和马德里的行政长官。移民到古巴后，他创立了自己的生意，并成为特立尼达省（Trinidad）的地方行政长官。他与一些支持古巴与美国兼并的富有家族有着很好的联系。他的表兄弟波索斯·杜尔盖斯（Pozos Dulces）伯爵弗朗切斯科·德弗里亚斯（Francisco de

① Luis Martínez - Fernández, *Torn Between Empires*, Athens, Ga., 1994, p. 2.
② 引自Peréz, *Cuba and the United States*, 44页。

Frias）是有着美国教育背景的改革家。[①]

脱离了西班牙当局后，洛佩斯的思想变得热衷于古巴独立，宣称他的激情来自于年轻时所经历的玻利瓦尔的“阳光与闪电”密谋。他提出的目标是重拾玻利瓦尔的计划，解放古巴岛。他的第一次进军在1850年5月，从新奥尔良出发后，他们短暂地占领了卡德纳斯，但是他的那些不情愿战斗的战士们听到西班牙军队即将进发的谣言后，遂转而撤回船上。

69 第二次进军于1851年在莫里略海湾开始，也以失败告终，洛佩斯被捕。9月1日，在哈瓦那港入口处的蓬塔（Punta）要塞下方的广场上，他被处绞刑（garote vil），这是西班牙国家经常乐于使用的用螺丝扣勒死受刑者的刑罚。[②] 他受刑时告诉那些围观的群众“我并不希望伤害任何人，我的目标是你们的自由和幸福”。[③]

美国奴隶制度在1863年的结束和西班牙自身的政治转变，引起了一阵吹过古巴的改革之风，这阵改革之风受到了1859年到1866年间统治哈瓦那的比较进步的官员弗朗切斯科·塞拉诺-多明格斯（Francisco Serrano y Dominguez）和多明格·达尔西（Domingo Dulce）的鼓励。塞拉诺取消了一些对克里奥尔人上层的政治障碍，允许兴办文化社团和杂志，甚至允许一定程度的政治辩论。西班牙人俱乐部（Casino Español）在这个时期建立，这是一个国家官员、军官和富裕的种植园主聚会和娱乐的场所。[④] 这些在整个岛上普及的殖民者的俱乐部组织形式直到19世纪末仍然十分盛行，为那些支持与西班牙联系的人提供了一个牢固的组织基地。

---

① 洛佩斯去世后，与他早已分居的遗孀多罗莱斯·弗里阿斯—雅科特（Dolorés Frias y Jacott）嫁给了曾经反对洛佩斯远征的何塞·安东尼奥·萨科。

② garote vil，一种西班牙绞刑具。它与一般的绞刑架不同，是在一根不足一人高的立柱上钉一片可供受刑者坐着的横木。受刑者坐在横木上，一个绳套套在犯人颈部，在其背后用绞盘式工具使受刑者窒息而死。参见 http：//en. wikipedia. org/wiki/Garrote，2010年2月13日。——译者注

③ 引自 Chaffin，*Fatal Glory*，216页。

④ Joan Casanovas，*Bread or Bulets*：*Urban Labour and Spanish Colonialism in Cuba*，*1850—1898*，Pittsburegh，1998，pp. 72-73.

西班牙先是在来自英国的废奴主义者，而现在是来自美国的持续压力下，最终于 1867 年同意放弃奴隶贸易，而早在半个世纪前它就首次承诺这样做。因为害怕这个措施将鼓动黑人民众的野心，西班牙同时强化了种族隔离政策。当地行政官员被指示“要给有色人种戴上应该对白人表现出的服从和敬畏的镣铐，因为美国奴隶的解放，可能会导致那个种族变得难以驾驭的新闻和教义的传播”。[①] 然而白人现在开始可以更自由地呼吸。一份 1860—1861 年间的人口统计数据表明，岛上现在第一次出现了白人人口占多数的情况。白人移民在 19 世纪 50 年代悄无声息地增长扩大了白人劳动力的数量，现在是 71.6 万人对 64.3 万个黑人。

现在，奴隶贸易已经终结，种植园主主要关心的是寻找新的劳动力来源。他们首先追随着 16 世纪西班牙殖民者的足迹，在尤卡坦寻找。数以千计的尤卡坦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在 1848 年到 1861 年期间被带到古巴的纯种的玛雅印第安人，按照契约规定在甘蔗场工作。[②] 随后他们转向中国。1853 年到 1874 年间的“苦力贸易”把将近 13 万名中国劳动力带到这个岛。他们中有 9.5 万名左右来自中国，在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装船。[③] 其他人来自亚洲的其他地方：西班牙的菲律宾殖民地；英国的香港殖民地；法国的印度支那（Indochina）殖民地。[④] 他们的旅行环境令人震惊，与非洲人所经历的相差无几，许多人死在旅途中。原来经营奴隶贸易的公司安排了苦力的运输，并与他们签下工作契约。到 19 世纪末，中国人的人数是 14 863 人，或者说

70

① 引自 Cassanovas, *Bread or Bullets*, 79 页。

② Javier Rodriguez Piña, *Guerra de Castas: la venta de indios mayas a Cuba, 1846—1861*, Mexico City, 1990.

③ Howard Blutstein, *Area Handbook for Cuba*, Washington, 1971, p. 80. And Knight, *Slave Society*, p. 119.

④ 额尔金（Elgin）爵士是牙买加前总督，1857 年，他作为英国的特命全权大使被派往中国。他描写了汕头（Swatow）如何被两个大规模从事鸦片生意的代理人邓特（Dent）和贾丁（Jardine）所控制。他们还从事苦力贸易，包括绑架可怜的苦力，将他们送上船——在这类船上，所有奴隶贸易时期的恐惧都在重演——在给他们特别的承诺后，将其运送到诸如古巴等地。Frances Wood, *No Dogs and Not many Chinese*, London, 2000, p. 85.

大约是古巴人口的1%。[1] 中国于1873年取消了苦力运输，古巴庄园主于是既没有奴隶，也没有“苦力”了。[2]

这些“苦力”工作在甘蔗种植园、糖厂和联系蔗糖产业的铁路建筑工地。许多人在他们的契约结束后仍旧留在那里并在城镇自谋生路，他们或从事家务劳动和贸易活动，或经营饭馆和洗衣店。他们来的时候都是单身男性，没有女人，许多人很快与古巴人结婚，包括白人和黑人。

中国移民以其他方式很好地融入到古巴社会。当古巴独立的呼声在1868年响起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参加了战斗，与黑人起义者并肩战斗，而不与那些完全把他们当作奴隶劳动力一样使用的富裕的西班牙白人站在一起。[3] 他们与其他被轻视的社会下层成员一起，投身到有助于塑造古巴国家的炽热的火炉中，经历了席卷全岛30年的起义和国内战争。

---

① Blutestein, *Area Handbook for Cuba*, p. 80.

② 1902年，美国驻古巴当局禁止中国移民入境，但只要糖的价格居高不下，尤其是糖的繁荣期、一战期间和其后的时期，还是有数千人继续非法来到此地。

③ Juan Jimenez Pastrana, *Los Chinese en La Lucha por la liberación Cubana*, *1847—1930*, Havana, 1963, pp. 71－75，引自 Thomas. *Cuba*. 256页。

第三章　独立战争与占领 (1868—1902)

71

亚拉[1]的呐喊 (Grito de Yara) 和十年战争的爆发 (1868)

令人愉快和繁荣的巴亚莫镇位于通往奥连特省入口处的马埃斯特腊山的遮蔽下。这是一座由平房和直角街道——时而沿着与它同名的河谷蜿蜒前行——构成的殖民城镇，镇中心是一块叶状广场，晚上孩子们在那里驱赶着用夸张的颜色涂饰的山羊车招摇过市。这里的政治事件皆围绕着一尊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 (Carlos Manuel de Céspedes) 的大型青铜塑像发生，此人是当地的律师和地主，发动了摆脱西班牙统治的古巴独立运动，在 1868 年 10 月夺取了此镇。他宣布，这个城镇现在是该岛的省会，他本人即是独立的古巴"总督"，一个合法的殖民地统治者。他的宣言后来被独立运动中的竞争者们所重申，以证实此人包藏着独裁的野心——正像他可能做的那样。

这个月早些时候，塞斯佩德斯已经把他的朋友和奴隶集合在他自己靠近曼萨尼略 (Manzanillo) 的德玛希亚瓜 (*La Demajiagua*) 庄园内，为后来被称为"亚拉的呐喊" (Grito de yara) 的事件制定了一个

① 亚拉，古巴地名。——译者注

正式宣言。Grito 即喊声（cry）或呐喊（shout），这种呐喊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曾发动了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Yara（亚拉）是附近一个岛屿城镇的名字。后来被称为“祖国之父”的 49 岁的塞斯佩德斯在欧洲旅行期间获得了大量的革命经验并且成为一个更广泛的寻求独立的政治密谋集团的成员。

11 月，革命扩展到西部，即普林西佩港。那里的组织者是萨尔瓦多·奇斯内罗斯·贝坦科尔特（Salvador Cisneros Betancourt）和伊格纳西奥·阿格拉蒙特（Ignacio Agramonte），他们都来自富裕的种植园主家庭。一个参加过美国—墨西哥战争且经验丰富的老兵曼纽尔·德克萨达（Manuel de Quesada）也参与了他们的活动。西班牙古巴统治当局现在面临着一场意在打破其殖民统治枷锁的战争。他们进行了长期而又极其恐怖的顽抗，最后还是败给了那些发动独立战争和独立运动的倡导者。

72

自从 1791 年圣多明各的奴隶起义以来，西班牙镇压了所有那些反对它在古巴继续统治的反抗活动。通过军事化的管理将奴隶关进其营舍内，实施残酷的压迫使自由黑人的数量减少，而流放的威胁笼罩着有别于中下层阶级的持不同政见的富裕白人。如果该岛实现独立，黑人有可能占据统治地位，加之因蔗糖产业而创造的空前的财富对于岛上精英阶层极具诱惑，使得大部分白人坚定地支持他们的母国西班牙。只是在社会边缘的知识分子（而且经常是那些被放逐的知识分子）有可能讨论古巴摆脱西班牙统治的问题，而且那一时期常常带有与美国合并的背景。

1868 年，突然有少数几个意志坚定的人占领了巴亚莫和卡马圭（Camagüey）并举起了反叛的旗帜。他们利用了西班牙国内陷于一场内战的时机——其君主制被推翻，首相被暗杀。然而，无论它自身有什么样的麻烦，西班牙从来不会放松其控制着富裕的加勒比海岛屿的帝国铁拳。先后接任的总督都同样残暴地在古巴进行战争。独立战争的第一阶段持续了 10 年，更广泛的战斗时断时续，竟然超过了 30 年，直到美国的干涉才意味着西班牙人最终在 1898 年被迫撤出该岛。在有

些人眼里，这场斗争持续了90多年——直到1959年的革命。

十年战争是一场国内战争和种族战争。一边是少数意志坚定的白人地主与他们的黑人奴隶和自由黑人的联合体；另一边是西班牙军人。加之大批的信奉白人种族主义的殖民者，他们中有许多人是西班牙来的新移民，他们的孩子集合在志愿者组成的“杀手军营”。这种在独立战争期间形成的，为建立政权而进行暴力抵抗的传统在后来几乎每过10年都会重现——以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在1878年、1879年、1895年、1906年、1912年、1933年和1956年再现。

塞斯佩德斯选择的时机看起来很有利，因为西班牙自身正处于威胁中。马德里在古巴起义的前一个月，即1868年9月18日爆发了被称为“光荣革命”的事件，驱逐了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在19世纪60年代原西班牙帝国许多耻辱性战败的刺激下，胡安·普赖姆（Juan Prim）和前古巴总督弗朗切斯科·塞拉诺两位高级将领发动了一场政变，推翻了女王长久且缺乏活力的政权。这次宗主国的动乱对古巴产生的影响类似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对圣多明各的影响。两次革命都削弱了母国与殖民地的联系，引起了人们对新建立的革命政府动机和计划的猜疑。在这两种情况下，宗主国的革命都导致了殖民地的起义。

73

由于一系列的外部灾难使之无能为力和精疲力竭，西班牙很长时期以来即濒临内部崩溃的边缘。1865年西班牙军队在圣多明各败北，次年第二支舰队在秘鲁海岸被击退。[①] 目击西班牙船只狼狈撤回圣地亚哥的古巴人由此深刻感受到，西班牙是一个失去了帝国光辉的虚弱和落伍的国家。1867年，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的法国军队在墨西哥令人沮丧的表现［随后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Ⅰ）被处决］使人们更加深信，衰落中的欧洲列强不可能控制或者影响美洲的事务了。1865年10月的莫兰特湾（Morant Bay）起义发生在英属牙买加。1868年9月，波多黎各爆发了一场反对西班牙、争取独立的起义

① 1866年5月2日，因秘鲁怠慢了一群来自巴斯克的移民，与西班牙发生了一起小冲突。马里亚诺·伊格那西奥·普拉多（Mariano Ignacio Prado）上校成功地击败了西班牙舰队，保卫了秘鲁的卡亚俄港。

［“诸神的呐喊”（the Grito de Lares）］。西班牙帝国如此衰败实属罕见。

西班牙人在圣多明各的战败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许多具有军事经验的多米尼加人来到古巴谋生并且最终在古巴参与战斗。在他们中间，产生了马克西莫·戈麦斯（Maximo Goméz）这位独立战争中最有才华的起义将领。还有几百名在古巴的奥连特省寻找工作的退役士兵，他们多数是黑人，其中一些人在 1868 年响应了塞斯佩德斯的号召。那里还有被西班牙军队蔑称为 *mambi* 的圣多明各黑人。该词源于和其非洲词根有关的 mbi 一词，常常被用来表示他们是土匪和罪犯。mambi（黑匪）一词也被西班牙人在古巴战争中再次使用，它在那里得到更广泛的流行，并很快被黑人视为荣耀的象征。[①]

塞斯佩德斯在 1868 年 10 月的起义并不是没有背景的突发事件。知识分子阶层已经做好了充足准备。政治运动和同乡会的秘密活动在全国，尤其是在奥连特省已经活跃了多年。古巴地主罕见地难以驾驭，他们敌视自己本应当承担的西班牙税收。18 世纪曾经为古巴经济发展奠定基础的墨西哥白银补贴早已消失。盛产甘蔗的古巴替代墨西哥成为了西班牙的摇钱树并且被期望在财政上支撑西班牙帝国，而西班牙现在则发现自己难以支撑。古巴的纳税人为西班牙在 1862 年对墨西哥，1863 年到 1865 年对圣多明各的军事征伐，以及 1866 年在秘鲁和智利（Chile）的海战和在非洲进行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做出了贡献。最后，古巴人还要为拉丁美洲的西班牙外交使团支付薪水。[②]

对外战争的屈辱性失败使马德里的一个自由政府在 1867 年垮台，被一个极端保守的政权所取代。一个反动浪潮很快来到古巴：军事法律被重申；压迫悄无声息地到来；政治集会被禁止。随着所有的改革派行动都相继失败，许多古巴人开始准备起义。当西班牙摆脱它的反

① 出自 Fernando Orientz 为 James O' Kelly 的 *La Tierra del Mambi*（Havana，1930）所写的序，引自 Antonio Elorza，*La Guerra del Cuba*，*1895—1898*，Madrid，1998，477 页。

② Luis Aguilar，“Cuba，c. 1860 – c. 1930” in Leslie Bethel（ed.），*Cuba：A Short History*，Cambridge，1993.

动政府，在1868年9月宣布革命时，古巴那些寻求独立的人必然将其视为一个不可多得的黄金机遇。 74

在“亚拉的呐喊”发生后的10天内，塞斯佩德斯的军队占领了巴亚莫，监禁了西班牙卫戍部队的降兵。塞斯佩德斯手下的军官皮德罗·费奥雷多（Pedro Figueredo）写下了后来成为古巴国歌的诗句：

Al combate cored Bayameses

Que la pattia os contempla orgullosa

No temais una muerte gloriosa

Que morir por la patria es vivir

快起来，上战场，巴亚莫的勇士们！

祖国正骄傲地注视着你们，

不要惧怕光荣的牺牲，

为了祖国献身，就是永生！①

长期致力于推动独立事业的激进自由党人现在转而用暴力革命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为祖国献身”成为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困扰这个国家的一项传统。起义者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虽然很少有迹象表明在他们的战士中间有过尖锐的分歧。也许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斗争将会持续那么久的时间，也没有意识到它将是如此的残酷无情。西班牙亦决定不惜任何代价维持它对古巴的控制。

勒松迪（Lersundi）将军和志愿者占据哈瓦那（1868—1869）

塞斯佩德斯起义时担任哈瓦那总督的佛朗切斯科·勒松迪（Francisco Lersundi）将军是一位保守派，且狂热地支持殖民者，他立即组织力量镇压起义。他是在西班牙右派分子于1867年上台之后获得任命

① 此即《巴亚莫颂》或者《巴亚莫人之歌》，此处只引了一段。下一段中文歌词是：“偷生在枷锁下不如死，谁愿在耻辱中忍气吞声？听那嘹亮的号角已吹响，拿起武器勇敢的人们，冲啊！”此处译文参照《百度百科》，见 http：//baike. baidu. com/ view/564951. htm? fr = ala0_ 1（2010. 2. 23）。另外还有与此不同的中文译本。——译者注

的，因此他像敌视古巴起义一样敌视马德里的革命，且正在准备自己发动反对马德里革命的起义。他在给马德里的一封著名电报中宣称“La isla de Cuba es de Espana, mande quien mande en la Peninsula, y para Espana es preciso defenderla y conservarla, cueste lo que cueste.”（古巴属于西班牙，无论谁统治半岛，西班牙的任务是不惜任何代价保卫并拥有它。）

勒松迪的第一个行动与塞斯佩德斯一样大胆。他宣布脱离西班牙的控制并且拒绝承认马德里的新政权。在他收到了被流放的伊莎贝拉女王给他发的要求其不要向马德里政府投降的电报时，他以女王的名义举行了一次庆祝她生日的传统招待会。由于担心西班牙新政府寻求与起义者的谈判，并且他认为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统治受到真正的威胁，于是他派自己的副司令巴尔马塞达伯爵弗拉斯·德·维利亚特（Blas de Villate）将军用武力收复巴亚莫。

75 有些古巴自由主义者希望西班牙的革命重新点燃改革派的殖民地计划。勒松迪可不是他们所希望的那个人。当一群马坦萨斯湾蔗糖区的改革派种植园主的领军人物，其中包括朱利安·苏卢埃塔（Julian Zulueta）和米格尔·阿尔达马（Miguel Aldama）要求召开一个会议，希望避免一场破坏性的战争时，勒松迪很轻蔑地解散了他们。改革无法进行。苏卢埃塔仍旧忠诚于西班牙并留在古巴保卫他的种植园，阿尔达马却带着全家逃到纽约并成为起义者的代言人。他的许多糖厂被国家没收。[①]

这次起义的前几个月，勒松迪面对起义的威胁感到沉重的压力。只有2.2万名西班牙正规军驻扎在岛上，并且许多人长期开小差，忙着打工以补贴自己微薄的军饷。[②]《时代》的一位通讯员安东尼·加伦加（Antonio Gallenga）指出，勒松迪不能够依靠他的西班牙军队，因

① Laird Bergad, *Cuban Rural Society in the Nin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1990, p. 187.

② Joan Casanovas, *Bread or Bullet*, *Urban Labour and SpanishColonialism in Cuba*, *1850—1898*, Pittsburgh, 1998, pp. 97 – 106.

为大部分士兵都被“这里的气候带来的多种疾病所削弱和吞没”。[①] 革命中的西班牙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派出增援部队。军队需要在国内对付威胁马德里政府的内部敌人。[②]

面临马德里和塞斯佩德斯的压力，勒松迪在 1868 年秋季开始组织当地的武装，那里并不缺少志愿者。岛上的大多数西班牙人都支持西班牙的事业。新近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即半岛人（*penisulares*），都乐于战斗，支持西班牙在古巴的统治，认为古巴是其宗主国西班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③] 许多移民屈从于岛上的精英们所宣扬的白人种族主义的主流情绪，都害怕独立将使古巴变成由黑人独裁统治的“另一个海地”。甚至阿尔达马的改革派所宣传的自治和自由贸易计划也被视为对他们这样的西班牙人特权地位的一种威胁。

半岛人具有欧洲白人殖民者的典型特征，就像在其他任何地区和任何时代所表现的那样。像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南非的英国殖民者一样，这些生活在古巴的西班牙殖民者集其对祖籍地的强烈忠诚和对那些他们得与之共存的黑人和土著民深深的敌意于一身。加伦加曾把来自西班牙半岛的“下层”移民描绘成“带有偏见和盲信的”人群。[④]

勒松迪动员了在哈瓦那的白人种族主义者们的同乡会，利用它重新组织和武装了旧时的志愿者民兵（millitia）。志愿兵（voluntarios）在古巴殖民早期已经存在，但在 1825 年，即军管法长期实施的时期，被正式组建为武装军队的辅助部队。在 19 世纪 40 年代的危难时期复苏，又于 1855 年重新组建，志愿兵队伍在 1868 年和整个十年战争期间展现了自身的价值。勒松迪使用从西班牙商人、地主和奴隶贩子手中所征之税给士兵们发军饷，使这个强大的组织长期主导了该岛的管

① Antonio Gallenga, *The Pearl of the Antilles*, London, 1873, p. 20.

② 最后，西班牙被迫寻找更多的士兵增援古巴。1868—1880 年间派往古巴的有 25 万人。1878 年 5 月，即战争 10 年后，西班牙透露，已经有 10 万名士兵战死在古巴，最终的数字可能更多。古巴方面至少有 5 万人被杀。

③ Raymond Carr, *Spain, 1808—1975*, 2nd. editon, Oxford, 1982, p. 308.

④ Gallenga, *The Pearl of the Antilles*, p. 41.

理。志愿兵组织很快扩展到全国的城镇，从1万人扩张到3.5万人。76 加伦加估计在哈瓦那大约有1.1万人，在岛上其他地方可能有6万人。他们自己就是法律。他写道："他们成为了唯一的主人，即使不是在全国，也至少在所有主要的城市，尤其是哈瓦那。他们随心所欲地自我组织和自我武装。"①

加伦加注意到，这些志愿者用于内部镇压的时候几乎和用于与起义者作战一样多。圣地亚哥和哈瓦那有名的持反西班牙立场者都被逮捕，并不经审判就被处决：

> 他们的目标不是去起义地区与起义者战斗——因为他们把这项任务留给了正规军——而是威慑叛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搜捕他们的同伙。作为一支政治力量，他们的职责是在城市制造恐怖。这些特别部队和他们的军官会议，以及西班牙俱乐部——一个后来在所有其他城市被复制的哈瓦那的机构——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

加伦加后来把哈瓦那的这种机构与公社时期的巴黎机构组织相比较。

远在马德里的首相塞拉诺将军（General Serrano）了解到勒松迪的这些活动后即下令将其免职，任命和蔼的多明格·达尔西将军（Domingo Dulce）取而代之。达尔西在哈瓦那采取了早期在1866年实行的限制，发布一道大赦起义者的命令并开始了改革进程——而这正是勒松迪所害怕的。勒松迪在1868年底不情愿地撤出该岛，用特别的语言赞美了志愿兵，他们仍旧是他"不投降"立场的武装宣传者。他们将在随后的几年内决定该岛的未来并除掉勒松迪的继任者。

达尔西作为自诩革命的马德里政府的代表于1869年1月来到哈瓦那，并带来了一份现代化改革的计划。他允诺赦免起义者，同意给予民众以出版和集会的自由。他甚至亲自制订了一个选举计划，坚持要

① Gallenga, *The Pearl of the Antilles*, p. 17.

求古巴代表有机会出席马德里国会。和平使节被派到塞斯佩德斯处讨论和平问题，并提出赦免那些在40天内投降的任何起义者。

达尔西很快发现，他面临两线作战的局面。一方面是在各省要求独立的共和派，另一方面是在城市里亲西班牙的党派仍旧热烈地维护被推翻的女王的事业。马德里倾向于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并且达尔西也不可能用手中的一支小部队立即发动一场战争回击起义者。然而，由于控制了哈瓦那的志愿兵的活动，改革也不可能进行。加伦加写道，他们“守卫着俯瞰这些城市的要塞，把正规军赶出墙外”。他们“控制了总督和所有的政府人员、陆军、海军和市民”。[1] 很快地，他们就准备发动一次政变（*coup d' etat*）。 77

达尔西试图限制他们的权力，但是没有成功。正是在他到达的那个月，志愿兵袭击了古巴改革派经常聚会的两个场所——哈瓦那的比亚努埃瓦（*Villanueva*）剧场和卢佛尔咖啡店（*Café Louvre*）。许多人被杀。3月，当250个政治犯被集合在哈瓦那码头准备登船，运往西班牙非洲殖民地费尔南多波岛（Fernando Po）服刑时，志愿兵在阿马斯广场组织了抗议游行。放逐这些政治犯是达尔西的一项温和举动；志愿兵则宁愿他们被处决。达尔西亲自出面来平复众人的情绪，政治犯被允许离开，但是付出了代价。达尔西被迫做出一个完全支持志愿兵的声明。

但这远远不够。在6月1日的晚上，大批民众聚集在达尔西的官邸外面喊：“杀死达尔西！”（“Muere Dulce”），政变全面爆发了。志愿兵各支队的统领前来告诉达尔西，他应该辞职。达尔西被羁押并转移到一艘战舰上，在6月5日驶往西班牙——这是他在哈瓦那短期公务的一个屈辱的不光彩的结局。他被一个愿意接受志愿兵要求的将军卡瓦列罗·德·罗达斯将军（Caballero de Rodas）取代。在他们设于“西班牙人俱乐部”的大本营，这些殖民者的军队和半岛的精英人物将以既成事实的殖民政府的身份应付随后的战争，只有在1873年2

① Gallenga, *The Pearl of the Antilles*, p. 17.

月，一个西班牙共和国宣布建立时，有一个小小的波折。[1]

起义者关于奴隶制度和兼并的争论

一开始成功地占领了巴亚莫和奥尔金（Holguin）的塞斯佩德斯起义武装没有坚持多久。他们于 1869 年败在巴尔马塞达伯爵手中，伯爵的军队得以重新进入巴亚莫，但因那些城镇的爱国公民宁愿烧毁城镇也不肯投降，使西班牙人的胜利大打折扣。起义的主动权现在回到了卡马圭的阿格拉蒙特组织手中，他们对起义的支持由于一次事件而加强，即被召集去与达尔西的使节谈判的代表被“志愿兵”暗杀。然而在起义者的军营里，塞斯佩德斯和阿格拉蒙特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起义者在 1869 年 4 月举行会议，以制定一项新章程的名义讨论这些分歧。会议在瓜伊马罗（Guáimaro）举行，它位于从卡马圭到拉斯图纳斯镇（Las Tunas）之间的公路旁。

刻不容缓的领导人问题被迅速地解决。塞斯佩德斯当选总统，曼纽尔·德克萨达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更严重的是奴隶制问题。塞斯佩德斯在战争开始时已经释放了自己的奴隶，当地与他联合的地主也如法炮制，并且他们释放的奴隶在起义军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核心。78然而，并没有一个完全废除奴隶制度的号召。存在于所有古巴改革派人士心中的矛盾还没有消失。1868 年 12 月，塞斯佩德斯发布的第一份宣言勾画了一个未来国家的蓝图，只是提到要“逐渐地”废除奴隶制并宣称奴隶主将获得补偿。甘蔗种植园仍旧免受攻击，进行此类袭击的人将被处以死刑。尽管这份宣言模仿了美国独立宣言（“我们相信人人生而平等和自由”），但很快证明它对于奴隶的表述备受关注（“我们期望逐渐地、有偿地解放奴隶”）。

在卡马圭，阿格拉蒙特一伙的起义者更加激进。由于他们都出自少有奴隶的畜牧乡村，不会有很大的损失，遂在他们控制的全部地区废除了奴隶制度。塞斯佩德斯更加忧虑。尽管他是个废奴主义者，但

---

① Casanovas, *Bread or Bullet*, p. 106.

结束奴隶制的要求在奥连特省鲜有支持者。他害怕废除奴隶制会令马坦萨斯和其西部富裕地区的种植园主产生政治分歧。瓜伊马罗的会议达成了一个不愉快的妥协。新章程宣布“所有共和国的居民”都绝对自由，但是它也明确表示被释放的奴隶仍然是其主人的有偿劳动者。这个计划既不受奴隶主的欢迎，也得不到奴隶和自由黑人的支持。

矛盾的是，马德里的西班牙政府很快以更优厚的条件来与起义者的计划竞争。1870 年 3 月，它决定从哈瓦那总督手中拿走处理涉及古巴奴隶制事务的权力，并向起义者作出让步。西班牙殖民大臣西吉斯蒙德·莫雷（Segismundo Moret）在所谓的“自由子宫法案”的名义下发布了一项有条件结束奴隶制的法令，奴隶父母所生的孩子和超过 60 岁的奴隶以及那些帮助西班牙军队保卫该岛的奴隶都获得了自由。

这份妥协传到瓜伊马罗时，受到了 20 岁的黑白混血儿队长、支持塞斯佩德斯的黑人起义者领袖安东尼奥·马塞奥（Antonio Maceo）的强烈反对。马塞奥和马克西莫·戈麦斯都是杰出的军人领袖，他们的简单战术是：组织大规模的黑人起义，烧毁甘蔗种植园并解放在那里工作的奴隶。这样做将获得新的起义者，与此同时也破坏了西班牙的经济基础。

在战争中，起义者使用的更多的是砍刀而不是步枪，其战术也适应砍刀的特点。虽然种族人数的天平倾向于白人，但是黑人在奥连特省仍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多数人群，几乎占 80%。他们基本上是支持起义的。在梯刑压迫下幸存的自由黑人认识到他们的利益取决于起义的成功，但是可想而知最开始没有得到任何承诺的奴隶行动很慢。马塞奥的战略有助于使他们站到起义者一边。

79

许多种植园很快被焚毁。在 1869 年，“黑匪”袭击了圣地亚哥北部山谷，破坏了 23 座糖厂和 15 处咖啡种植园。1868 年，卡马圭地区曾有 100 多座糖厂在运转，但是 10 年后仅有一座能够运行。[①] 塞斯佩

① Oscar Zanetti and Alejandro Garcia, *Sugar and Railroads: A Cuban History, 1837—1959*, Capel Hill, N. C., 1998.

德斯很快转向这种战略，认为这会对古巴的自由有利，“即使我们被迫烧毁了所有文明的痕迹”，但是卡马圭的种植园主将会震惊。马塞奥和戈麦斯知道，该战略的成功有赖于使战争越出古巴的东部地区并深入到西部的富裕土地上，他们计划用火和砍刀来实现它。然而，他们从未能够拯救整个运动的支持者。

戈麦斯不像马塞奥那样激进，在所有起义委员里他经常支持温和派。他是一位相当有组织能力和政治才能的战士，出身于圣多明各的一个富裕家庭，曾在那里担任过一支西班牙军队的司令。当这一地区在 1865 年卷入内战时，戈麦斯失去了土地和财富，他流亡到古巴，在巴亚莫附近定居成为农场主。1868 年，32 岁的他成为塞斯佩德斯军队的一名中士。虽然人们经常认为他将成为一位领袖人物，但戈麦斯在起义战争期间和后来的和平时期从未使自己登上总统的位置，他于 1905 年去世，享年 69 岁。

奴隶制问题并不是起义者在瓜伊马罗会议上唯一的分歧。塞斯佩德斯通过一份争取独立的号召发动了起义，但是倾向于同美国合并的情绪在起义者阵营里仍很强烈。瓜伊马罗会议的决议倾向于这样的结果。美国政府密切关注古巴的革命并继续对这个岛屿的未来感兴趣，但是当尤利塞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将军得到起义者要求合并的消息时，他决定等候机会。古巴仍旧是一个奴隶国家，革命者结束奴隶制的承诺仍然远没有兑现。有些美国的官员仍旧倾向于按照早先的计划从西班牙手中购买这个岛。

古巴社会的许多阶层都有强烈的合并期望，成千上万名古巴人以逃离古巴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们逃离了战争的恐怖和贫困，在美国安家。被当时的西班牙历史学家经常引用的数据表明，仅在起义的第一年就有 10 万名古巴移民进入美国。[1] 像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全球移民数字一样，它是不可能被明确证实的。然而即使这个数字减半，它也似乎占了印象中的古巴人口的 5%。

① Justo Zaragosa, *Las insurrecciones en Cuba*, Madrid, 1872, vol. 2, p. 374.

在1869年巴亚莫城外的第一次大战后，起义者开始尽量避免与西班牙军队正面交战。他们采取了游击战的方式，住在山间的流动军营内的小股游击队，随时准备下山来偷袭西班牙要塞或者烧毁甘蔗种植园并释放其奴隶。起义者的掠夺行为可与早期西班牙的焦土政策相比。西班牙人逮捕和处决被发现离家出走的年轻人并把农村地区的住户赶到城镇中——这是一个带有后来西班牙战争中"集中营"政策特点的雏形。

80

加伦加描述了在古巴的中心城镇——圣克拉拉、大萨瓜（Sagua La Grande）、雷梅迪奥斯（Remedios）和西恩富戈斯等地，"最恐怖的镇压"成为定律。西班牙武装

> 认为那些不满情绪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认为这种不满完全不应该达到公开起义的程度。他们不仅射杀手拿武器的暴动者，而且毫不怜悯地射杀那些因他们的到来而躲到树林里面的手无寸铁的难民，甚至那些仍旧安静地呆在家里，却被怀疑对起义事业抱有同情心的人们也同样遭到屠杀。①

由于交战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取得更大的优势，战争年复一年地持续着。西班牙军队把起义者包围在该岛的东部和中部。而西部却从来没有发生暴动的迹象，马坦萨斯的种植园仍旧在运转。西班牙人修建了一条横贯该岛中部的50公里长的有效防线（*trocha*），这条防线由北部的莫龙（Moron）延伸到到南部胡卡罗（Jucaro），由壕沟和木制栅栏构成，并以43个小型要塞加固。多年来，这条防线有效地把起义者隔离在了岛的东部，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起义领导人不愿意进军古巴西部。而当戈麦斯最终（而且是迅速地）得到起义委员会的批准，在1875年1月打破僵局向西部进军时，这道防线被证明并不能有效地阻止他的进军。

① Gallenga, *The Pearl of the Antilles*, pp. 164 - 165.

起义者由于内部的分歧而被削弱。这不仅影响了其战斗力，而且影响了他们与那些在美国尽力为其提供武器和金钱以维持战争的支持者之间的关系。随着这些战士们的想法变得更加激进和理想化，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流亡者逐渐对战争不再抱有幻想并很少愿意为它提供援助。

由于看不到战争的结束和外交上的结局，起义者各个阶层内部的潜在分歧于 1873 年浮出水面。起义者聚集起来把塞斯佩德斯赶下总统的宝座，代之以奇斯内罗斯·贝坦科尔特（Cisneros Betancourt）。后来，贝坦科尔特又让位于一位来自巴亚莫的教师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Tomás Estrada Palma）。塞斯佩德斯后来在 1874 年的一次小冲突中牺牲。起义者现在分裂为种族的和民族的两条阵线。许多人反对戈麦斯，因为他是多米尼加人，还有人反对马塞奥，因为他是黑人。两派人员都非常愤怒地拒绝接受另一方的指挥。马塞奥写信给埃斯特拉达，抱怨"一个小集团"不愿意服从自己的命令"因为我属于有色人种"。[①]

对"另一个海地"的担忧在起义者各个阶层内部仍旧表现得很强烈。马塞奥被激怒了。"因为我并非是这个共和国无关紧要的部分，这个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上的，无论是现在还是任何其他时候，当我被认为在倡导一个黑人共和国或者任何类似事件时，我必须竭尽全力反对之……"起义者将因失去他们最有魅力的总司令的领导而变得虚弱。

81

《桑洪（Zanjón）条约》和《巴拉瓜（Baragua）抗议》

十年战争是在西班牙自身革命和国内战争的背景下展开的。普赖姆将军在 1870 年被暗杀，他是被人们选举出来取代必须于 1873 年退位的君主伊莎贝拉女王的，短暂的西班牙共和国在 1874 年被一次军队

---

① 见 Hugh Thomas，*Cuba，or the Pursuit of Freedom*，London，1971，265 页。关于十年战争中的民族问题在 Ada Ferrer，*Insurgent Cuba，Race，Nation，and Revolution，1868—1898*（Chapel Hill，N. C.，1999）一书中被谈及。

政变所推翻。马德里总督马努埃尔·帕维亚—罗德里格斯（Manuel Pavia y Rodriguez）司令用由来已久的言辞宣称，他的军官的职责是："作为士兵和公民去拯救社会和国家"。[①] 在西班牙和古巴的压迫浪潮后，他发动了政变，结束了这次革命。

君主制在当年年底恢复，现任国王是一个在英国桑赫斯特（Sandhurst）陆军军官学校接受教育的挥金如土的17岁军校生阿方索十二世（AlfonsoXII）。新国王的摄政王是阿塞尼奥·马丁涅斯·康波斯（Arsenio Martinez Campos）准将，一位曾经在古巴跟随巴尔马塞达伯爵作战的年轻军官。新的西班牙首相安东尼·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Antonio Canovas del Castillo）亦然。直到那个世纪末，马丁涅斯·康波斯和卡诺瓦斯都在古巴和西班牙事务上扮演了极有影响力的角色。[②]

马丁涅斯·康波斯被任命为古巴总督，他在1877年初带着一个和平战略来到哈瓦那。他带来了援兵并承诺进行改革。当他开始与筋疲力尽的起义者谈判时，平叛行动恢复了活力。这时仍然在坚持战斗的唯一高级领导戈麦斯要求在12月份停火。1878年2月，他们在普林西佩港东部锡瓦尼库（Sibannicu）附近的桑洪别墅（*quinta* of Zanjón）开始了谈判。[③] 如果起义者放下武器，马丁涅斯·康波斯将宣布特赦，允诺进行政治改革并释放参加起义的奴隶。虽然没有提到古巴独立和结束奴隶制的问题，起义领导人还是接受了这个协定。

但人们所争取的东西并没有被完全放弃。所有参与"黑匪"军队的奴隶都获得了自由，中国劳工依照这个条约也获得了自由。1880年

---

① Cart, *Spain*, p. 336.

② 国王阿方索在10年后，即1885年11月去世，他的有孕在身的哈布斯堡家的皇后玛利亚·克丽丝提娜（Maria Cristina）继位，从1885年一直到1902年，她作为西班牙的摄政，处理了1898年西班牙所面临的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落入美国之手的灾难。他的儿子阿方索三世的统治一直到1931年西班牙选举时才被推翻，从而结束了西班牙君主制的又一段沉浮史。

③ 《桑洪条约》在传统上被古巴人认为是一个国耻，桑洪事实上已经从地图上割走了。它位于中卡雷特拉（Carretera）的南部，在锡瓦尼库（Sibanicu）和圣奥古斯丁·德布拉佐（San Agustin del Brazo）之间。我非常感谢哈尔·克莱帕克（Hal Klepak）为我提供了有关地理知识的一些细节。

的一个“庇护者法令”授权最终解放奴隶，尽管它要求他们在“庇护”他们的原主人名下工作 8 年（后来缩短为 6 年）。政府在《桑洪条约》签订后努力促使种族融合，禁止在剧院、咖啡厅和酒吧歧视黑人并命令国立学校按照与白人平等的原则接纳黑人孩子。没有人因为种族出身被排斥在公共雇员之外。[①] 奴隶制于 1886 年 10 月最终被废除。

82

然而，许多起义者并不欢迎《桑洪条约》。马塞奥继续争辩，如果没有独立和完全地废除奴隶制，就没有和平。他从不相信那些在独立战争时期转变政治立场的卡马圭的富裕种植园主们，认为他们放弃了斗争，为换取和平牺牲了太多有意义的东西。

在奥连特省，马塞奥手下还有 1 000 多人，并且大多数是黑人，他要求与马丁涅斯·康波斯会面一次。这位西班牙将军和黑人领袖的会面于 1878 年 5 月在圣地亚哥北部巴拉瓜的一个芒果园中举行，会谈双方都坐在树下的吊床上。在热情地问候了马塞奥后，马丁涅斯·康波斯告诉他，他能与“一位最值得称颂的古巴战士进行个人会谈”感到很自豪。但这种奉承对马塞奥毫无影响，他简要地提出了自己的目标：如果不实现独立并结束奴隶制就不可能有和平。这两个要求是不可分的。

马丁涅斯·康波斯回答：“不应该再有牺牲和鲜血，是时候让古巴加入到进步的人类生活中。古巴应该沿着文明和进步的道路前进，享有它所有的权力并与西班牙统一。”他解释道，他个人倾向于结束奴隶制，但是这个决定取决于马德里的国会。至于独立，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他知道马塞奥会提出独立的要求，他就不会接受这一会谈。

马塞奥清楚地表示，战争将继续。当马丁涅斯·康波斯询问他需要多长时间恢复敌对状态时，他的答复是“8 天”。他仍旧是奥连特省起义部队的总司令，他的起义士兵再一次明确了他们的战争义务。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省政府并通过了建立一个独立古巴的新条例。

① Ronald Segal, *Black Diaspora*, London, 1999, p. 225.

“巴拉瓜抗议”作为古巴人渴望继续反抗的象征进入到古巴的历史和传说中，在后来的岁月里激起更大的反响。在一个多世纪后，当20世纪90年代面对苏联解体的现实，作为一个曾经跪在苏联脚下的国家，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使上述口号获得了新的生命。1878年，马塞奥在他的部下的支持下，采取了勇敢的姿态。然而他手下那些人大多数都已经筋疲力尽，没有了进一步战斗的欲望。马丁涅斯·康波斯明智地避免攻击他们。于是，那个新的省政府很快说服了马塞奥就此罢手，以待来时。1878年5月，各条战线的战斗都结束了，马塞奥乘坐西班牙的战舰离开圣地亚哥开始流亡。但是当时这个撤退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马塞奥并没有打算放弃斗争，相反他准备在古巴国内外继续进行另一场战争。

一场新的在人们的记忆中称为“小战争”（Guerra Chiquita）的起义于1879年8月爆发，起义同时发生在东部，即在希瓦拉（Gibara）、奥尔金省和圣地亚哥以及中部古巴许多地方。这次密谋在实施前即暴露，当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仍旧在国外，西班牙政府亦做好了充分准备。从外部——从圣多明各和海地——提供人员和武器的计划被阻挠。起义者像从前一样在种族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一名白人领导者卡利斯托·加西亚（Calixto García）将军阻止黑人马塞奥参与，担心会因他的参与使西班牙当局将这次起义归之于一次“种族战争”。奥连特省的行政长官卡米洛·波拉维哈（Camilo Polavieja）将军很快老调重弹地提出“另一个海地”的问题相威胁。

83

因为马塞奥被命令离去，起义的主要发动者加西亚在国外，这次小战争一开始就不顺利。当加西亚最终在古巴登陆时，花了几周时间走遍全国也没有找到起义者。起义在9个月后宣告失败，幸存者投降。波拉维哈完全不像马丁涅斯·康波斯那样宽宏大量，他在整个奥连特省进行了一场残酷的对黑人民众尤甚的镇压活动。1880年底，他下令逮捕了265名“密谋者”，其中大部分是黑人，他们被判处在几内亚

海湾的费尔南多波岛监狱服刑。[①]

"小战争"从未对西班牙的统治造成严重的军事威胁。波拉维哈的压迫有效地削弱了黑人，而此时白人起义者的地位也由于在《桑洪条约》签订后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中发展起来的自治运动的强化而被削弱。现在，自由党被允许以合法的身份举行会议，推选候选人，发行自己的报纸并派代表参加马德里国会。[②] 该党趁此风驶离了独立运动，然而它本身也没有获得多大的进展。更多的人倾向于团结宪政党(Partido Constitucional Unido)——一个保守的、反对自治的亲西班牙党派。

与此同时，波拉维哈在1890年担任了古巴的总督，继续其种族主义宣传，极力说服白人民众相信，起义者计划建立一个黑人共和国，他取得了一些成功。他宣称马塞奥的目的是强加给古巴"一个他的种族的政府和创立一个类似于海地的共和国"。他警告道：这样一个结果将会带来美国佬的入侵。

诽谤者在那些害怕黑人获得自由的古巴白人中找到了合适的环境，而绝大部分被流放于国外的独立斗争的领导人却必须面对这种问题，他们必须保证他们阵营中的黑人和白人结成统一战线。古巴社会的种族主义偏见现在成了捍卫古巴独立的主要障碍。被他的拥护者视为"一个新的救世主"的马塞奥，必然要退居次要地位。这时，一位古巴乃至拉丁美洲历史上的英雄何塞·马蒂担负了历史的重任，将去证实一个独立的古巴应该是黑人和白人共有的自由国家。

84

何塞·马蒂（Jose Martí）和新的独立之梦

在哈瓦那旧城一处靠近港口的老建筑区，有一座漆成蓝色的小型建筑物，这就是纪念何塞·马蒂的博物馆。这是他的出生地，但是对

① Aline Helg, Our Rightful Share, The Afro – Cuban Struggle for Equaltity, *1886—1912*, Chapel Hill, N. C., 1995, p. 50.

② 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原改革党（Partido Reformista）重组为自由自治党（Partido Liberal y Autonomista）。

他的纪念遍及全岛。每一个城镇都有一座博物馆，每一个学校外面都有一尊白色的半身石膏像。在保留下来的照片上，他是一个留着大八字胡须和浓厚眉毛、总是穿着黑色上衣、系着一条白色领带的小个子。他的身高仅有 5 英尺多一点。他的大部分生命都贡献给了古巴的独立斗争，他于 1895 年 5 月在古巴被杀，年仅 42 岁。对于所有拉丁美洲人而言，特别是对于古巴人而言，马蒂是被列入拉丁美洲反抗西班牙的独立斗争的早期领导人先贤祠中的一员。

马蒂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斗士，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是作为一名流亡者在美国居住，但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古巴独立的倡导者，并坚定地反对那些欲将古巴从西班牙分离出来而与美国合并的“有影响的古巴人”。他在 1891 年写道：“任何民族的双手都必须是自由的，因为只有遵循自己的特性和个性一个国家才能不受束缚地发展”。因此，应当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被美国兼并。[①] 他的几句似乎是最后遗言（因它们经常被引用而唤起人们对他的记忆）的话，直接针对由美国引起的危险：“我知道这个怪兽，因为我曾生活在它的兽穴中——我的武器只有戴维（David）的弹弓。”

马蒂是一位革命活动家和勇于奉献的政治理论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诗人和记者，一位令人信服的演说家。他定期记述当代事件，虽然也有些自相矛盾的观点，但是他主要关注从那时起至今都长期存在于拉丁美洲的特殊问题，即民主和独裁、改革和革命、白人殖民者和土著民的冲突等。作为一名 19 世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也写作了一些关于教育的目的，作为工业发展基础的农业之重要性和把普遍的经济法则应用于美洲大陆之特殊环境方面的文章。最重要的是关于古巴问题，他是一位坦率直言的种族平等的支持者；他向白人和黑人同时宣传他的关于独立和自由的思想。[②]

马蒂于 1853 年出生在哈瓦那的一个西班牙移民家庭，他的家庭属

---

① 引自 Thomas，*Cuba*，301 页。

② 搜集了马蒂作品的一部有用的选集是 Philip Foner，*Inside the Monster*：*Writings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merican Imperialism by Jose Marti*，*New York*，1975。

于前述通过移民使古巴人口“白人化”的计划的产物。他父亲原是来自瓦伦西亚的炮兵中士，后来成为哈瓦那的一名警察；他的母亲莱奥诺尔·佩蕾斯（Leonor Pérez）来自加那利群岛中的特纳里夫岛。马蒂很早就参与政治，因为1868年爆发第一次独立战争时，他已经在学校读书。1869年1月，当自由主义在哈瓦那有了几星期的繁荣，他协助 85 出版了一份报纸《祖国自由报》（Patria Libre），报上发表了他对于起义事业的浪漫评论。于是他被“志愿者”确定为颠覆分子，被指控批评了一位加入志愿者行列的朋友而被捕。他被判6年监禁，尽管当时他只有16岁，仍旧被送往哈瓦那的圣拉萨罗（St Lazaro）石场服刑，6个月后被转移到松树岛（Pines）。1871年2月，他被流放到西班牙。

马蒂到达西班牙时，西班牙正处于其革命的艰难历程中，他很快被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情绪的涌动所吸引。当他在马德里［后来在萨拉戈萨（Zaragoza）］大学学习时，受到朱利安·桑斯·德尔里奥（Julian Sanz del Rio）的影响。此人的著作对西班牙人和拉丁美洲人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在教育领域。朱利安·桑斯·德尔里奥是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e）作品的翻译者和传播人。卡尔·克劳斯是德国的人文主义者，是黑格尔（Hegel）同时代的人，也是伟大的教育家弗里德里希·福楼拜（Friedrich Froebel）的朋友。马蒂特别关注教育——一项延续到21世纪的古巴的遗产——就源于他早年接触的这个著名的思想学派。①

1875年，马蒂正式完成了学业，遍游欧洲后，他返回拉丁美洲并在他父母已经定居的流放地墨西哥安身。这是他在拉丁美洲大陆上的第一次亲身经历，像大多数到墨西哥的游客一样，他深深地震惊于白人殖民者和土著民之间潜藏的文化冲突——他作品的一个主要主题。他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Guatemala）的大学里短暂地工作了一段时间，对于最近一代的拉丁美洲殖民统治者（*caudillos*），即对墨西哥的

---

① 进一步阅读见 Richard Gott, “Karl Krause and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Cuban Revolution”,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London, *Occational Papers*, No. 28, 2002。

波菲·迪亚斯（Porfirio Diaz）和危地马拉的胡斯托·鲁非诺·巴里奥斯（Justo Rufino Barros）的统治有了亲身体验，遂成为军事统治的激烈反对者。后来他察觉到，十年战争时期的英雄马克西莫·戈麦斯有着与这些大陆独裁者同样的癖好，因此他费尽心力去确保未来的古巴革命掌握在文明的民主者手中。

1787 年的《桑洪条约》中包含一个给与政治流放者的特赦，于是马蒂能够重返古巴。他再次成为革命组织中的活跃分子，加入了由卡利斯托·加西亚建立的基地设在纽约的古巴革命委员会（Cuban Revolutionary Committee）。他结交了一位黑白混血儿律师朋友胡安·瓜尔伯托·戈麦斯（Juan Gualberto Gómez），他们在 1895 年的密谋中成为亲密战友。在 1879 年筹备“小战争”起义期间，马蒂被指控有密谋行为，被再次流放到西班牙，但是由于当时独立运动的基地在纽约，他很快又横跨大西洋踏上了归程。他在纽约生活了将近 15 年，与其他古巴流亡者密谋再次发动独立战争。为了赚钱，他为多家拉丁美洲报纸撰稿，并成为乌拉圭（Uruguay）、阿根廷（Argentina）和巴拉圭（Paraguay）领事馆的代理人。

在他最终在纽约定居前，马蒂在委内瑞拉度过了几个月的时光，在那里他发展了玻利瓦尔的一些思想，使之成为他自己国际主义哲学的一部分。他开始理解土著民的苦难，并指责政府的活动只为白人殖民者的利益着想。他与委内瑞拉教育家西蒙·罗德里格斯（Simón Rodríguez）的意见一致，认为拉丁美洲需要从本土发展起来的制度，而不是从外部引进。他还想起了玻利瓦尔的国际主义梦想，要求建立“一个拉丁美洲人民的大邦联”。[1]

86

马蒂在委内瑞拉时感受到了其理想的破灭，如他还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时所感受到的那样。他的建立军队、地主和天主教会三方联合政体的构想，被安东尼·古斯曼·布兰科（Antonio Guzmán Blanco）在委内瑞拉专横统治的实例所击破。他也为加拉加斯的富人及周边农

① Peter Turton, *Architect of Cuba's Freedom*, London, 1986, p. 77.

村地区的穷人之间的巨大鸿沟所震惊。他鄙视地写道，“在城市，像巴黎；在农村，像波斯”。他梦想古巴独立将采取一条不同的道路。

返回纽约后，马蒂发现由于十年战争失败后的疲惫和沮丧，大量古巴流亡社团内部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甚至将使社团更加分裂。马蒂现在被视为一位杰出的流亡领导人，当卡利斯托·加西亚在古巴时，马蒂被任命为临时的纽约古巴革命委员会的主席。他开始为最终的反西班牙战争重新进行准备并且在1882年7月把一份关于他的政治立场的提纲送给现在洪都拉斯（Honduras）流亡的两位幸存军事领导人戈麦斯和马塞奥。马蒂并没有制订重新发动革命斗争的计划，而是急切地想把流亡团体统一到独立思想之下——在一个时期内，许多人仍旧倾向于同美国合并。马蒂坚定地反对这个计划，正如在他给戈麦斯的一封信中尖锐地说道：

在古巴，一直有一个由保守派组成的重要群体，他们以憎恶西班牙的统治为荣，却不敢牺牲个人幸福投入到反对它的斗争中。这些人，受到那些不愿意付出血的代价而喜欢分享自由果实的人们的援助而热烈地支持古巴与美国合并。这些胆小鬼、这些缺乏坚定意志的人、这些肤浅的观察家、这些见钱眼开的人，有着明显支持上述解决办法的爱好，他们相信那是代价颇低的易事。于是，他们炫耀着自己的爱国情感，也表现出他们对真正的爱国者的恐惧。①

马蒂在写给马塞奥的一封信中概述了他的另一个中心主题——最为需要的是种族和谐。

将军，我没有时间告诉你，为什么在我的眼里比起政治层面的问题，古巴更需要解决的是其社会层面的问题，为什么除了通过两个种族间的互爱和宽容，这种社会层面问题的解决就不可能得到实现……

87

① 引自 *Turton*, *Marti*, 12页。

对我而言，一个在古巴激化仇恨，或者利用已有仇恨的人是罪人。而那试图镇压这个已经遭受足够多的不幸只是合理地希望能过上良好而谨慎生活的种族之人也是罪人。

实现独立的共识和种族平等的需要，这是比较容易服众的论据。困难的是由军队的，还是文职的官员领导一个未来的政治运动或者政府的老问题。马蒂的全部政治上的直觉倾向于文官，而戈麦斯和马塞奥带着早年战争时期政治争论的强烈记忆倾向于一个由军官们控制的统治集团。毕竟，这是西班牙帝国体制遗留的模式。

戈麦斯和马塞奥这两位战士在1884年来到纽约，在流亡者中间推销他们的观点。马蒂开始时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但是当他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这一争论的先机，将成为这两位军人的下属时，他离开了流亡地，隐退多年。

他写信给戈麦斯说，“一个民族的建立和一座军营的建立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什么呢，将军？是实现那温暖着我们内心的理想、勇敢而谦逊的服务者吗？是一个陷入了危难的民族的真诚朋友吗？或者是手执皮鞭，足踏踢马刺，准备把人民带到战争中去，结果只是为了在人民头上称王称霸的勇敢而幸运的军事首领吗？”

马蒂现在忙于应付他手上的各种工作，他既作为乌拉圭领事馆的领事，也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民族日报》（*La Nación*）的美洲事务常任评论员。他曾经一直是目光敏锐，言辞犀利的观察家，对美国的社会发展基本上持积极态度，但是1886年与芝加哥干草市场（Haymarket）骚乱相关的著名事件和随后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屠杀，使他采取了一个更加具有批判性的立场。尽管他激进地反对资本主义并被刚刚出现的劳工运动所吸引，但却尖锐地批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这时在美国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哲学家。对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的残酷处罚使他反对以美国作为古巴社会所仿效的模式，并增强了他反对与

美国合并想法的立场。[1] 他并不对所谓美国会关心古巴繁荣的说法抱有幻想：

> 除了在一些伟人的心底隐藏着的想法外，古巴对美国而言从没有任何价值，而只是值得占有，这种占有的唯一不利因素就是它的民众，这些民众被认为是任性的、懒惰的和无足轻重的。[2]

后来在 1887 年，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庆祝“亚拉的呐喊”19 周年的会议上，马蒂重返古巴流亡政治团体，当时，他和其他人的情绪都已经平静。纽约、费城和基韦斯特（Key West）的流亡组织都支持他的观点——军方应当服从于民选政府的领导——他获得了作为流亡团体最有魅力的领导人这个本来就应属于他的位置。在他的拥护者们鼓励下，他于 1887 年 12 月写信给马克西莫·戈麦斯要求他作为副手参加斗争。他写道“古巴不再是〔1868 年〕亚拉革命中在农村战斗的那些幼稚和愚昧的人民”。这个国家已经改变，对他的领导人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88

戈麦斯对马蒂的提议表达了谨慎的热情，但是他和马蒂都不认为一场新的战争会立即发生。如果古巴人仍然像 10 年战争期间那样离心离德，美国对古巴的首选政策仍旧是兼并。马蒂需要做大量的工作。1890 年，他自己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因为他的克劳斯派思想[3]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他建立了一所培养未来革命干部的学校——教育同盟（Liga de Instrucción）。马蒂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名教师，他的学生是全新的古巴听众——当时在纽约工作的数以千计的黑人流亡者。他告诉

---

① Turton 在其《马蒂》一书中用一整章的篇幅讨论了干草市场（Haymarket）事件对于马蒂的影响，见第 115—144 页。

② 1886 年 5 月致 Ricardo Rodríguez Otero 的信，引自 Turton，*Martí*，17 页。

③ “Krausista”是指卡尔·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克劳斯［Karl Christian Friedrich Krause，（1781 年 5 月 6 日—1832 年 9 月 27 日）］的哲学思想，他是 19 世纪对西班牙革命影响较大的哲学家。对于在西班牙接受教育的马蒂有过较深的影响。参见本节前面的部分。——译者注

他们，古巴的唯一前途是完全的独立。这场即将开始的斗争不能由那些计划和组织10年战争的富裕种植园主来操纵；它将掌握在伟大的人民手中。①

下一年，马蒂来到南方，在坦帕（Tampa）与古巴的烟草工人一起工作，而且，在1892年1月正式建立了古巴革命党，这是一个群众基础广泛，由个体支持者提供赞助的独立运动组织，每一位支持者将贡献他们收入的1/10。那个旧的、依赖于少数寻求其政治影响的富裕赞助人的组织被削弱。这个新党策划发动"一个短暂和广泛的战争"，在8月，马蒂再次去找戈麦斯和马塞奥以寻求他们的支持。

在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他找到了马塞奥，他在那里已经成为一名香蕉种植者，而戈麦斯则返回了圣多明各。两人都同意重新加入独立武装，由戈麦斯担任军队总司令。马蒂现在放弃了他记者的工作，放弃了他的报纸专栏和领事的职位。他开始全身心地组织一场秘密的革命战争，成为人所共知的这场革命的领导人。

传道者之死（1895年5月）

落后的海滨村庄普莱伊塔斯（Playitas）村位于古巴南部海岸、关塔那摩港的东部，是通向巴拉科阿山脉的道路的起点。在1895年4月的早些时候，马蒂和戈麦斯乘一叶扁舟来到这里并机警地进入山区。他们的小股革命者队伍则从海地越过狭窄的海峡驶来。马蒂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佩戴着左轮手枪，航行的方向明确。当红色的月亮升起时……我们在一片岩石海滩登陆。"

89

起义军的黑人指挥马塞奥和他的兄弟何塞（José）以及弗洛尔·克龙贝（Flor Crombet）同时在哥斯达黎加启航，在紧邻巴拉科阿的奥连特省北部海岸登陆。奥连特省的两位司令官、曾经参与1868年塞斯佩德斯起义的巴托洛米·玛索（Bartolomé Masó）和圣地亚哥的一位黑人领袖吉列蒙·蒙卡达（Guillermon Moncada）已经于2月在该省揭竿

① Thomas, *Cuba*, p. 300.

而起。一场新的推翻殖民统治的长期解放战争开始了。[1]

对于西班牙而言，这场最新的古巴独立战争将在1898年的重大"灾难"中结束——随着美国的军事干涉，西班牙陆海军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同时败北，保持了400年的庞大的西班牙帝国最终崩溃：在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古巴一败涂地。还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西班牙才能从这次屈辱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对于古巴革命者而言，他们的战争事实上的结果几乎是一样的糟糕。田园荒废了，经济衰败了，而且新的世纪将证明这只是古巴奢求中的独立之梦的开始，美国的干涉和占领给岛上的政治发展套上了枷锁，这种政治将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扭曲它的历史。

作为外部的旁观者，曾经于1895年末在古巴度过了一个月并乐于回忆1762年英国对古巴干涉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认为，战争结束后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我同情这场起义——但不同情这些起义者，"他写道：

> 好像历史的书页已经翻过，光明的未来和美好的时代将要来到古巴。如果英国未曾失去古巴，可能未来几年内就会看到这个岛屿现在的样子——在一个正义之法和爱国政府管理下的，向全世界贸易开放着它的港口，把它的矮种马送到英国马球总会（Hurlingham），把它的板球运动员派到洛兹（Lords）[2]，用哈瓦那的雪茄烟交换兰开夏（Lancashire）棉布和用马坦萨斯的蔗糖交换设菲尔德（Sheffield）的刀叉餐具的自由和繁荣的古巴。至少我们希望如此。[3]

英国人从未对古巴产生像丘吉尔那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样的文化影

---

① 马蒂曾想提前一年组织这场反抗战争，但是制糖企业的需求是第一位的。对其计划感兴趣的种植者们希望在反抗之前再获一次丰收，因此要求将战争推迟到1895年。

② 洛兹是英国板球运动的发源地。——译者注

③ Randolph Churchill, ed., *Winston Churchill*, *Companion*, vol. I, *1874—1895*, London, 1967, pp. 617-618.

响，但是英国资本可能甚至在战争结束前就平静地收购了古巴的铁路系统。[①]

马蒂是一位政治组织者，但不是一位天生的游击战士，然而他的早期文字却预示了切·格瓦拉日记中的描述。马蒂在一封写给女儿的气氛轻松愉快的信中谈道："我全副武装，肩扛步枪，皮带上挂着我的砍刀（machete）和左轮手枪；一肩悬挂着装有100发子弹的布包，另一肩斜挂着卷成筒形的古巴地图；在我的军用背包里装有价值50英镑的药品、衣物、我的吊床、一张毛毯和书籍；你的照片挂在我胸前。"[②]

90

马蒂在1月份驶离纽约，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与戈麦斯会合。两位领导人在紧邻海地边境北部的小港口蒙特克里斯托（Montecristo）会面，并发布了他们的第一个政治宣言。它设想了一个未来的古巴共和国，它将不同于"封建的和理论上的"西属美洲共和国，古巴由于它的人民和历史显得与众不同。独立战争将采用文官体制进行，黑人将被邀请参加独立战争，而私人财产和非战斗人员将受到尊重。胜利后，一个新的经济制度将向所有的人提供就业。这份宣言包含这样的标语"La Victoria o el Sepulcro"（胜利或者牺牲）——承其先驱加里波第（Garibaldi）的口号"Roma o Morte"（罗马或者牺牲）的理想，启迪了其后继者卡斯特罗的祈祷"为祖国毋宁死"。

上述标语的后半段[③]比任何其他期望着的结果都更早地实现了。在普莱伊塔斯登陆6周内，马蒂牺牲了——时年42岁。他和戈麦斯在距离巴亚莫不远处与马塞奥的部队会合，然后，在前往同巴托洛米·玛索率领的一支当地武装会合的途中，于5月19日陷入了西班牙人在多斯里奥斯（Dos Rios）设下的埋伏。当代人关于马蒂之死的记载表

---

① Zanetti and Garcia, *Surgar and Railroads*, pp. 235 – 255.

② Deborah Schnookal, ed. *José Martí Reader*, *Writings In the Americas*, New York, 1999, p. 222.

③ 即"胜利或者牺牲"这一标语的后半段"牺牲"。"La Victoria o el Sepulcro"中之"el Sepulcro"的西班牙语原意为"墓地"、"坟墓"之意，译者依其原意引申为"牺牲"。——译者注

明，他勇敢地骑着一匹白马，这是很难抹去的明显标志。有些人相信他急于证明他的勇敢，要与普通的起义士兵共患难。也有人认为，他希望以自己的牺牲停止与起义者中军方领袖间持续进行的政治争论。虽然他解决了早期与戈麦斯的分歧，但是他知道马塞奥仍旧渴望实现在革命委员会中的军方领导。

没有充分的记录能说明在1895年的前几个月存在着政治斗争乃至于会影响到马蒂的斗志。他没有从事游击战争的经验，更有可能是他不善于作战而不是自取灭亡。无论何种原因，过早地和粗心地失去它的政治领导人，对于古巴的起义和古巴的未来，都是一个严重的灾难。

西班牙和古巴再起战端（1895—1896）

自从这次推动独立战争的计划之后，古巴岛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发生了许多变化，而且19世纪90年代早期已经在讨论其进一步的改革计划，不仅在纽约的起义流亡者中间，而且在马德里的殖民政府内皆

91

然。在纽约，马蒂所组织的政治俱乐部设计着为独立而进行“一场短暂和广泛的战争”。在马德里，政府设计了改革计划以避免起义的发生。

1893年底，作为改革派首相，普拉克塞德斯·马蒂奥·萨加斯塔-埃斯科拉（Práxedes Mateo Sagasta y Escolar）在马德里走马上任。[①] 他的负责海外领地的大臣安东尼奥·莫拉—蒙塔纳（Antonio Maura y Montaner）提出要给予所有领地自治，即“自主统治”。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将被允许自行管理公共事务、通信、卫生和教育。[②] 至于古巴，莫拉提出了一个在选举人法律上的改变，即让选举人的数量双倍于原来，并推动自由自治党（*Partido Liberal y Autonomista*）发展的进程——这是最使马蒂愤怒的事。因为，这个国内的执政党是寻求独立的革命者的主要对手。

① 见 Jose Luis Compellas, *Sagasta, el politico de las horas dificiles*, Madrid, 1995。

② 见 Javier Tusell, *Antonio Maura, una biografia politica*, Madrid, 1994。

然而，西班牙人是不情愿进行殖民地改革的，萨加斯塔亦没有给予莫拉在1894年3月设计的这一计划很多支持。一年后，在1895年3月，当古巴起义的消息传到马德里时，萨加斯塔政府倒台。西班牙现在所面临的困难是，需要一个采取强硬路线的政府，20年前曾为西班牙君主服务的、狡猾的保守派政治家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再次出山，以67岁的高龄为帝国服务。[①]

古巴还看到了另一个熟悉面孔的归来：《桑洪条约》的起草者阿瑟尼奥·马丁涅斯·康波斯在1878年胜利地回到古巴。通过派他返回哈瓦那担任总督，卡诺瓦斯希望他能够像先前曾经做的那样，通过政治手段解决起义。于是，马丁涅斯·康波斯在1895年4月带着7 000名士兵开往关塔那摩海湾，同在一个月前仓促逃散的9 000人会合。岛上现存的卫戍部队于是有了1 6000人。他本来希望在奥连特省获得胜利，但立刻意识到他所面对的问题。尽管起义仍旧仅限于该岛的东部，但是起义者却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他在6月从哈瓦那写信给卡诺瓦斯，描述“当他经过村落茅舍时……没有看到男人，当女人被问及她们的丈夫和儿子时，她们带着恐怖坦言‘在山里，与某某某在一起……’。”

马丁涅斯·康波斯从他先前的经验中意识到，只有普通民众屈服于他还没有准备实行的、达到一定程度的压力时，他才可能成功。他向卡诺瓦斯指出将要发生什么：

我们可以再次把乡村的家庭集中到城镇，但是将需要更多的士兵强迫他们，因为那里的居民已经很少有人想成为［西班牙人的］志愿者……贫穷和饥饿将会很可怕：于是，我得供给他们口粮，在上次战争中，所供应的口粮达到一天40 000份。这种方法会将乡村与城镇隔绝，但是它不能阻止妇女和儿童从事间谍活动。也许我们必须这样做，但这只是最后的一招，我认为我缺乏执行这样一项政策的能力。[②]

92

① 见 José Louis Comellas, *Cánovas del Castillo*, Barcelona, 1997。亦见 Melchor Fernández Almagro, *Cánovas su vida , su politica*, Madrid, 1951。

② 引自 Thmas, *Cuba*, 320页。

马丁涅斯·康波斯相信战争不可能获胜，他对自己局限性的估计是正确的。他在6月份写的信中告知马德里："我的诚挚和忠诚的观点是：即使我们在这片土地上获胜并镇压了这些起义者，无论是否进行改革，在20年内我们必得经历另一场战争。"如果战争发生，西班牙帝国将在3年内灭亡。

马丁涅斯·康波斯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在戈麦斯和马塞奥的领导下，起义军在1895年间已经扩展到了奥连特省的整个山区。自从上次战争以来，人们的情绪发生了变化，起义者现在得到了几乎每一个人的支持，最明显的是来自黑人的支持。一批与西班牙保持联系的白人支持者长久以来预言，独立将意味着一个黑人共和国的出现。正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这场新战争正在成为一次黑人起义。海地的阴影再次盘旋在这个岛屿的上空。在第一年底被动员起来的30 000名起义者中，80%是黑人。丘吉尔在一份美国杂志上写道，起义军队是由"大量的有色人种"组成的"一群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如果这次革命成功，他补充道："古巴将成为一个黑人共和国"。[①] 一位在马坦萨斯曾与戈麦斯接近的美国记者格罗弗·弗林也因起义队伍中黑人的数量之多感到震惊。他写道，"军中在籍者有一半是黑人"。他还提到出现了两名"中国人（澳门苦力运输的幸存者），诡诈的、目光锐利的蒙古人，没有人可以在平静的洗衣店里找到他们"。[②]

马蒂的牺牲对于起义者是一个政治打击，他的离去并没有对战争的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桑塔卢奇亚侯爵（Marqués de Santa Lucia），一位年逾七旬的卡马圭起义的老兵，曾在1868年参与塞斯佩德斯革命的萨尔瓦多·西斯内罗斯·贝坦科尔特继他之后成为新生的古巴共和

---

① Matin Gilbert，*Churchill：A Life*，London，1993 and Thomas，Cuba，2nd edition.，p. 183. 丘吉尔当时是一名年青的军官和刚出道的新闻工作者，曾经受英国军事情报部门派遣去调查西班牙在当时使用的新款德意志茅瑟枪（German Mause）所用子弹的威力。他曾在1895年在圣斯皮里图斯和卡马圭之间短期随西班牙军队活动。

② Grover Flint，*Marching with Gomez：a war correspondent's field noter – book kept during four months with the Cuban army*，London，1898，p. 25. 亦见 Rosalie Schwarz，*Lawless Liberatores*，*Political Banditry and Cuban Independence*，Durham，1989。

国的临时主席。马索（Masó）被任命为副主席，而戈麦斯和马塞奥仍旧是军队的正、副总司令。起义者的前主席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自从1878年以来并没有经常地参与流亡者的政治，而在美国当了多年小学校长。他在内心里是支持美国兼并的。他被马蒂邀请担任纽约革命者的代表，并且一直担任这一角色。这些人都是上次战争的老兵，长期为独立事业奋斗，但是他们在有关战略、战术和政治问题上持有迥然不同的观点，他们的运动缺少一个能够使其协调工作的充满魅力的领导人。

戈麦斯现在是关键人物，当种植园主叫嚣要阻止他的游击队进入古巴中部和西部富饶的甘蔗地时，他决定不再重蹈上次战争的覆辙。他与马塞奥立即一起冲出卡马圭，在10月带领1 000名骑兵越过胡卡罗和莫龙之间的旧防线冲向圣斯皮里图斯和圣克拉拉。到年底，他们已经威胁到马坦萨斯。没有大的战役发生，但是到处都使用了火攻。甘蔗地、糖厂以及种植园的房子都遭到焚烧。一位庄园主在12月份写道："这完全是咆哮的炼狱，在所有通向特立尼达群山和海洋的道路沿途，我们都只能看见浓烟和穷人脚下冒烟的废墟……房子被烧，衣服被偷。"[①] 这种使用松明（*La tea*），即火把和火焚的战略在古巴变得司空见惯。

93

1896年1月初，戈麦斯到达了哈瓦那郊外，而马塞奥绕过首都直趋比那尔德里奥。他们沿着岛屿的闪电式进军在7个月里就获得了上次战争7年才取得的成果，使西班牙人面临战败。西班牙人只有使用严酷的镇压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但冷静而富有经验的马丁涅斯·康波斯已经告诉马德里，这并不是他准备采用的战略。1896年1月，在上任仅仅9个月后，他便辞职返回马德里。

韦勒将军之集中营的发展（1896—1897）

1896年派来的新总督是一位真正的焦土政策专家。瓦雷里阿诺·

① Edwin Artikins, *Sixty Years in Cuba*, Cambridge, Mass. 1926，引自 Thomas, *Cuba*, 323页。

韦勒［（Valeriano Weyler），1838—1930 年］将军是特内里夫侯爵（Marques de Tenerife）和巴塞罗那（Barcelona）的前任总督，又一位上次古巴战争中的老兵，由于他的军事能力和冷酷无情的性格而被卡诺瓦斯选中。韦勒极端拘谨和多愁善感，他喜欢牲畜胜于人类并且在马德里建立了一个马儿的家园。[①] 在美国内战时期，年轻的韦勒曾作为西班牙军队的随员（attache）出现在华盛顿，是谢尔曼（Sherman）将军凶残策略的追随者。谢尔曼将军在 1864 年曾把佐治亚（Georgia）夷为平地，留下了被大火烧毁的建筑物、被毁坏的农田、被破坏的铁路和绝望的民众。[②] 对古巴，韦勒也考虑使用类似的方法。

当到达哈瓦那时，韦勒发现起义者已经聚在城门口。他告诉卡诺瓦斯"在我到达后的那天，他们禁止了牛奶的运入"。戈麦斯仅仅距城几英里，从乡村运来的食物只有当交纳了起义者要求的运输税之后才能进城。马丁涅斯·康波斯的最后行动是准备迅速向哈瓦那发动攻击。韦勒受到哈瓦那城内仍然积极为西班牙事业献身、保卫着"邮局和主要的公共建筑"的"志愿者"们的鼓励。他写信给马德里，描述了"这些值得赞美的部队"是如何"守卫着这个城市的外围使之免受攻击的"。[③]

94 韦勒在他寄回国内的第一份急件中透露了他所面临问题的困难程度。"人们完全不尊重权威。到处都有人私下诋毁西班牙，到处是批评和抱怨。"甚至在哈瓦那，也存在着"分离主义的萌芽"和援助起义者的密谋活动。他特别关注烟草工厂，"因为那里的读书人阅读分离主义者的书籍和文章以及错误和夸大了的有关战争和革命的新闻，因而在工人中激起了对西班牙的仇恨"。

韦勒是被派去拯救古巴的，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把戈麦斯从哈瓦那的近郊赶走并把马塞奥驱逐出比那尔德里奥。他的计划是迫使起

---

① Thomas, *Cuba*, 2nd edition, p. 190，并参见 Luis de Arminan Perez, *Weyler, el Gran Capitan*, Madrid, 1946。

② Hugh Brogan, *The Penguin History of the USA*, London, 2001, p. 342.

③ Thomas, *Cuba*, p. 328.

义者退回胡卡罗和莫龙之间的旧防线以东，他现在开始加固这条防线。他还在哈瓦那的西部建立了一条从马列尔到马哈纳（Majana）的新防线。起义者第一次被迫接受阵地战，马塞奥的部队对比那尔德里奥进行了抢掠性短途行军后与戈麦斯会合，在2月被韦勒发现并造成了很大的伤亡。韦勒在该省投入60 000兵力，他建造了著名的日光反射信号塔网来监视游击队的出现和快速传递信息。①

这使起义事业受挫，但是两位司令官还能够把他们的部队集结在马坦萨斯城外，并思考他们下一步的行动。马塞奥返回哈瓦那以西地区，而戈麦斯则向东前往圣克拉拉。他们的少量部队在3月得到来自奥连特省的卡利斯托·加西亚满载大量物资的军队的增援。加西亚接手了东部战区的指挥职责，直到战争结束。

韦勒现在开始实行“反游击战”的战略，这一战略在古巴－西班牙战争中开始成为著名战略——创立了“集中营”和“战略村庄”。这成为这场20世纪非常规战争的特点。在1895年，马丁涅斯·康波斯曾经考虑过使人口重新集中（*reconcentration*），即把农村家庭转移到城镇这一可能性，事实上在10年战争期间，韦勒本人也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尝试过。现在，他把早年的意识应用于严峻的现实中。他的计划是把指定军事地区中的城镇和农村的所有民众“集中到”防守完备的中心，使起义者丧失他们的天然选民和支持者。集居区（reconcentrados）的食物，如果有可能，将从当地的特别农业区域提供，如果找不到食物，韦勒宁愿使集居区的人们忍饥挨饿。西部各省的民众被要求服从登记，那些不遵守军事命令的人将被视为犯了叛国罪而予以处决。② 10月，韦勒在马塞奥仍在积极活动的比那尔德里奥颁布了第一道集中命令。

这些古巴“集中营”的建立，在美国很快被广泛知晓，这都得益于新闻记者和古巴流亡者的传播。这种现象在纽约的报纸中受到了谴

① “Las luchas por la independencia nacional, 1868—1898”, *Historia de Cuba*, vol. II, Havana, 1996, p. 489.

② Thomas, *Cuba*, 2nd edition, p. 191.

95 责，尤其是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n Ramdolph Hearst）于1895年所创办的《纽约日报》（*New York Journal*）上。在那个时代处于人权新闻业最前沿的这份日报已经警告他的读者关注韦勒将军，在1896年2月把他描绘成一个“极其凶恶的暴君……一头野兽、种植园（*haciendas*）的破坏者……无情的、冷酷的、人类的剿杀者……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那淫邪的、兽性的脑子利用它自己发明的酷刑和臭名昭著的、嗜血的淫荡来实施暴力。”格罗弗·弗林在描绘了50万农民被“集中”到一些城市外的拥挤和肮脏的营地时注意到，记者们称它为“一项灭绝政策”。[①] 韦勒的策略，尽管十分残酷，但对于战争的进程有相当重要的影响。韦勒比毛泽东更早地领会了游击战的思想，即游击队员在农村民众中如鱼儿在“大海”里一样，他成功地排干了“大海”，使起义者失去了供其遨游的水源。

到1896年底，戈麦斯和马塞奥都陷入了困境。韦勒的军队在西部——比那尔德里奥、哈瓦那和马坦萨斯——取得了军事主动权。在东部戈麦斯也遇到了政治困难，与民众领袖间产生了矛盾。戈麦斯是一位卓越的军事领袖，但是他的思想和战略逐渐受到古巴和纽约的民众领袖的质疑。受到种植园主影响的民众领袖已经越来越敌视烧毁种植园及切断乡村地区与西班牙控制的城镇之间贸易交往的战略，即火炬行动（*tea*）。戈麦斯面对这些批评变得不再平静。当外国咖啡种植园主的一位代表要求他们的财产应当受到尊重时，戈麦斯告诉他们“带着你们的生意回自己的国家去”。[②]

第二个争论反映在军队的任命上。戈麦斯按照游击战正常的程序提拔那些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的人。许多人来自下层或是黑人。民众领袖们则极力提拔职业阶层的白人——律师和医生——他们参加了革命

① Flint, *Marking with Gómez*, p. 28. 亦见 Joseph Wisan, *The Cuba cities as reflected in the New York Press* (*1895—1898*), New York, 1965。

② “Las luchas por la independencia nacional, 1868—1898”, *Historia de Cuba*, vol. II, Havana, 1996, p. 489.

运动但是缺乏军事经验。[1] 关于军队任命的争论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寓意。

10月，马塞奥接到了戈麦斯督促他向东进军与他会合的一条紧急信息。戈麦斯需要他在政治上而不是军事上的援助。在与民众政治家争吵后，他声称要辞职以威胁他们。他需要马塞奥的支持。马塞奥的部队在9月份由于马克西莫的儿子弗朗切斯科·戈麦斯（Francisco Gómez）所率领一船人和埃斯特拉达·帕尔马（Estrada Palma）从美国送来的受欢迎的大量武器和给养而得到增强。

马塞奥现在动身去与戈麦斯联合，在他与民政首领对抗时援助他。他避开了从马列尔到 马哈纳的有效防线，乘船穿越马列尔海湾在哈瓦那城外扎营。1896年12月，他在这里遭到一支比他的军队数量大得多的西班牙军队的袭击，在一次并不重要的小战役中与小戈麦斯一起遇害。马塞奥的死对争取解放的武装力量是一个打击。青铜色的泰坦神（*El Titán de Bronce*），他们的最勇敢的最富有冒险精神的最有魅力的领导人牺牲了。一位军官写道："每个人都很悲伤"。而另一个人回忆说，他从没有看到见惯了危险和死亡的人们会如此深切地悲痛。[2]

96

韦勒现在把他的注意力转向那位仅存的起义军司令。怀着毁灭叛军最高领导人的希望，数千新征集的军队被部署在古巴中部。随着马塞奥的去世，戈麦斯被迫撤回他对起义团体的辞职威胁并重新焕发活力去战斗。然而在1897年中期，他的游击队仍然处于防御状态。战争进入了西班牙人的轨道。只有卡利斯托·加西亚在奥连特省获得了一些胜利，在8月份占领了拉斯图纳斯镇。

在马德里，卡诺瓦斯决定，再次挥舞改革旗帜的时机已经成熟。1897年2月，宪政改革被引进古巴，给予当地的市长们更大的权力并且给予这个国家一定程度上的财政独立。策划这项新措施并非是要影响古巴的舆论，而是要使美国人相信，（西班牙）已经在努力结束战

① "Las luchas por la independencia nacional", p 503.

② Helg, *Our Rightful Share*, p. 76.

争。美国公众的舆论仍旧被韦勒在进行强权压迫的故事所左右，华盛顿是一位时刻留心古巴发展的观察者，甚至已经摆出了行动的姿态。

但是一件在巴斯克郡突发的戏剧性事件完全改变了战争的方向并且促使其朝着一个无法预期的结果发展。当卡诺瓦斯于1897年6月21日在圣塞巴斯蒂安郊外度假时，被来自巴塞罗那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米格尔·安焦利洛（Miguel Angiolillo）暗杀。安焦利洛本来计划杀死一名西班牙王室成员，以报复最近在巴塞罗那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处决。当他去巴黎旅行时，遇见了一位长期与古巴流亡者密切联系的黑白混血的波多黎各活动家拉蒙·埃梅特里奥·贝特斯（Ramón Emetério Betancea）博士，后者说服他，首相是一个更重要的目标，并且给他500法郎帮助他执行计划。

对于古巴独立运动而言，安焦利洛3颗子弹的作用等同于3年的斗争。在纽约，报纸赞扬这次激动人心的暗杀行为，宣称古巴现在将要完全得到它的自由。在马德里，卡诺瓦斯的突然死亡和一位主张古巴自治的，自由派的老一代领导人普拉克塞德斯·萨加斯塔重新担任首相，立即导致政治形势的变化。萨加斯塔任命曾经帮助结束奴隶制的西吉斯蒙德·莫雷担任新的殖民大臣。莫雷拥护古巴的自治地位，沿袭（英国在）加拿大的作法，这是一种在有影响力的古巴人中长期流行的观念。他允诺将实行新的宪政，包括使成年男子拥有普选权和一个两院制的议会。这些承诺是有感召力的，即使这样会使与西班牙的联系依然存在。

97 韦勒读到墙上的公告而辞职。意识到这位将军在美国的不受欢迎程度会促使美国成为战争的一方，萨加斯塔也愿意让他离任。西班牙已经付出了巨大的战争代价——金钱上和人力上的。从1895年以来，大约200 000名士兵被派往古巴，没有多余的军队去应对另外的战争。古巴也不是西班牙唯一关注的焦点，因为自从1896年以来，西班牙就面临着另一场殖民者的暴动，即菲律宾的战斗。古巴和菲律宾的战争

同时进行，亦带有许多相同的特点。[①] 马尼拉（Manila）总督拉蒙·布兰科（Ramón Blanco）在1896年返回马德里而在1897年11月被改派到哈瓦那。

在菲律宾，由于不可能有更多的军队投入，西班牙被迫谈判。拉蒙·布兰科对于古巴所采取的计划没有什么变化。包括建立自治政府和谈判。韦勒实现成功的代价是西班牙不能够长期承担的。没有开展进一步的军事攻势。拉蒙·布兰科宣布了特赦令，所有在西班牙监狱的古巴政治犯都被赦免。一个“自治”政府最终建立，其首领是何塞·马利亚·加尔维斯（Jose Maria Galvez），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老一辈自治派领导人。

西班牙已经在菲律宾获得了和平，这时候最应该去关注古巴问题，但是萨加斯塔的改革计划几乎没有对马克西莫·戈麦斯产生影响。鉴于在《桑洪条约》签订时的经验教训，戈麦斯拒绝接受一切自己掌控不了的谈判。他知道自治主义者被孤立了；只有少数人仍旧倾向自治。正像许多殖民地在争取解放的历史中所发生的一样，帝国主义者给予殖民地的条件通常太少也太晚。古巴现在不可挽回地在争取独立的起义者和西班牙的忠诚者之间分裂了，战争继续进行。

在马德里，摄政太后也不高兴，她抱怨萨加斯塔的和平计划是对美国的让步。[②] 她是对的，但是这个让步并没有效果。6个月后，古巴

---

① 当时菲律宾的新任总督是波拉维哈将军，曾在古巴的统治者韦勒手下就职，曾一度以其种族主义的立场攻击马赛奥，当他于1896年10月进入马尼拉时，其第一个决定性行动是下令杀死菲律宾民族主义者领袖人物、被称作“菲律宾的何塞·马蒂”的约瑟·里扎尔（Jose Rizal）。里扎尔是在伦敦卡姆登镇（Camden Town）旅居期间被捕入狱的，波拉维哈认为，里扎尔的死能够遏制那些支持独立运动的反抗者的热情。可能他非常后悔没有将马赛奥杀死而是流放。杀死里扎尔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他的死点燃了反抗运动的火焰，西班牙在菲律宾的驻军如同在此前在古巴那样陷于绝境。波拉维哈要求增援，但是他在1897年4月得知，所有可用的军队都已调往古巴。他在抗议声中黯然辞职，费尔南德·普利姆德·利沃拉（Fernando Primo De Rivera）将军继任，但是他已经得知手中无援军可用，不得不接受与埃米利奥·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领导的反抗组织谈判。1897年12月，双方在比亚卡巴托（Biacabato）签署了一份协议，并且进行了大赦。后来，阿奎纳多被流放到香港，与他在一起的有菲律宾总督的侄子，后成为西班牙长枪党（Falange）首领的米盖尔·普里莫·德里维拉（Miguel Primo De Rivera）。

② Thomas, *Cuba*, 2nd edition , p. 209.

和菲律宾的历史由于美国人决定向西班牙帝国宣战被改变了。1898 年 5 月 1 日西班牙太平洋舰队在马尼拉海湾被摧毁，马尼拉自身在 8 月 13 日落入美国军队手中。[1] 类似事件必将在古巴重演。

“记住缅因号!”：美国对古巴的干涉（1898）

在圣地亚哥（古巴的）东北部的郊区，一些舒适的别墅和铺着木质地板的圣胡安宾馆环绕着一座铺满青草的小山丘，山上陈列着若干古老的独木舟和石碑。这座小山即洛马·圣胡安（Loma San Juan），曾经是这个城市外围防线的标志，而且正是在这里，当美国军团于 1898 年 7 月 1 日侵入古巴时，与西班牙军队进行了唯一的一场著名陆战。战争是不对等的，不到 1 000 名西班牙人抵抗着超过 3 000 人的美国军队，然而它持续了一整天，美国损失也不小——223 人被打死和 1 000多人负伤。西班牙则损失了一半兵力。

98

由于当时的海军部长助理并且很快成为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的出现使得这场战斗被美国人所铭记。罗斯福那吸引人的“莽骑兵”团、其官方身份是美国第一志愿骑兵团（但是也被人们称为“西奥多的恐怖分子”），在那时获得了公众的极大注意。在罗斯福的密友、列奥那多·伍德（Leonard Wood）将军——麦金利（Mckinley）总统的医生、并且很快将成为古巴的统治者——率领下的莽骑兵是美国各式民众的混合体，正如罗斯福在他的战争回忆录里面写的那样，是从“山区和大平原的野蛮骑手和枪手中”招募的。[2] 多年以后，一位亚利桑那的骑兵把这个分队的成员描绘成“百万富翁、贫民、讼棍律师、牛仔、庸医、农夫、大学教授、矿工、冒险家、传教士、投机家、社会主义者、记者、保险经纪人、犹太人、政客、绅士、墨西哥人、基

---

① 美国人将埃米利奥·阿奎纳多带回到马尼拉，希望他可以配合美国人的入侵，但是不久他就在吕宋再次组织了反抗运动。他拒绝进入马尼拉，并且在马洛洛斯建立了独立的米沙鄢人（Visayan）共和政府，甚至在 1898 年 12 月菲律宾在巴黎条约中被割让给美国后，他还在继续反抗。美国加强了力量，将兵力增加到 60 000 人，慢慢扫平了在阿奎纳多于 1901 年被捕后丧失了信心的反抗者。

② Theodore Roosevelt, *The Rough Riders*, London, 1899, p. 6.

督教传教士、印第安人、西点毕业生、阿肯色（Arkansan）的野蛮人、棒球手、县治安法官和马匪”。[①] 这是一个由土著美国人——切罗基族人（Cherokees）和奇卡扫人（Chickasaws）、绍克陶人（Choctaws）和克里克人（Creeks）——组成的军队。莽骑兵仅仅是投身于美国侵略军的许多志愿支队中的一支，但是围绕这些特点，很容易杜撰出“神话”。许多有关古巴战役的传奇，不可磨灭地铭刻在美国民间的记忆中，正与这些迥然不同的民众混杂组合有关。

而古巴人回忆起美国的干涉则很少有喜悦之情。距离圣地亚哥最近的叛军司令官卡利斯托·加西亚受美国人之邀，在美军进攻该城时出兵转移西班牙军队的注意力，他从马埃斯特腊山脚下开始行动。他派出了手下的3 000名战士，但是没有一个人受邀参加后来进行的胜利庆典。在仅仅3周的时间里，古巴被美国侵略者从西班牙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然而古巴人已经进行了长达3年的战斗。他们凄凉地看着唾手可得的胜利被美国人夺走。

罗斯福是圣胡安山战役的关键人物，沙文主义的《纽约日报》主人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也是同道中人。[②] 他的报纸和那些在传媒圈子里与之竞争的对手们的报纸，都尽可能地鼓动美国报界的广大读者——并波及美国政府——支持美国军队对古巴的干涉，在整个古巴—西班牙战争中进行亲古巴的宣传。赫斯特不可能置身于这个他曾经热情推动的战争之外。

赫斯特原准备为干涉寻找根据，但是必须开战的诱因（*casus belli*）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也没有被他制造出来。它发生在五个月前的哈瓦那港。在1898年2月15日，当美国军舰“缅因号”平静地在那里抛锚时，突然发生了巨大的爆炸，军舰沉没，258名美国水兵客

99

① Hermann Hagedorn, *Leonard Wood: A Biography*, vol. I, New York, 1931, p. 147.

② 赫斯特因与他的记者（及战争艺术家）弗雷德里克·雷明顿（Frederic Remington）之间的著名的通信往来而知名。1897年2月，雷明顿在哈瓦那的塞维利亚旅馆给赫斯特发送了一条所有记者都将记得的电报，他曾经发送的电文如下：“一切很安静……不会再有战争了，我想回去。”但是赫斯特的回电既快速，又简洁：“请留在那里，你提供了画面，我将提供战争。”

死异乡。

罗斯福在他的日记里记录道，“缅因号被一个卑鄙的背叛行为所击沉”。美国新闻界把这场灾难归咎于一枚西班牙水雷，一个被随后的美国官方调查认可的观点。西班牙政府不同意这种说法，宣称是发生在船上的内部爆炸，这个观点后来在1910年被伊琳娜·莱特采纳。她写到“这是一个普遍流行的观点，缅因号不是被西班牙人或者古巴人有意识地毁灭的，而是由于船自身内部的爆炸。”[①] 证实这个观点的更为有力的证据在许多年后，即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海军司令海曼·里科弗（Hyman Rickover）在分析、梳理证据之后公布。将军认为，与弹药库毗邻的仓库里的锅炉引发了这次爆炸。此类火灾也在其他场合发生于另外一些美国船只上，尽管没有造成像这次事件那样可怕的结果。[②]

缅因号的沉没是一个意外，但是那时没有美国人相信。早期阻碍华盛顿采取行动的疑虑被一扫而光。在新闻界的敦促下，美国政府别无选择地拿起武器。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谈判从2月持续到4月，但是不可能达成一致的意向。西班牙之外的其他欧洲国家要求双方接受一个协商解决。但是，这一斡旋没有任何结果。1898年4月25日，美国对西班牙宣战，美国军官被告之要准备进攻，不仅是进攻古巴，而且包括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海域的其他西班牙岛屿。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太平洋的关岛（Guam）都进入美国人的视野。美国很快制订了一个更具野心的计划，而不仅仅是保卫古巴的自由。曾被视为“古巴国内的解放战争”必将发展成为“美西战争”，一场摧毁了具有400年历史的庞大西班牙帝国残余的战争。

美国人对待缅因号灾难的态度夹杂着恐惧和爱国的自豪感，伴随着不可抗拒的复仇激情。志愿者的聚集成了亮丽的风景线。一位4月份到达曼哈顿的记者约翰·布莱克·阿尔金斯（John Black Arkins）在

① Irene Wright, *Cuba*, New York, 1910, p. 502.

② Thomas, *Cuba*, 2nd. edition, pp. 1039—1040, 见 Hyman G. Rickver, “How the Battleship Maine was Destroyed”, Dept. of the Navy, Naval History Division, Washiogton, 1976。

《曼彻斯特保卫者》（*Manchester Guardia*）一书中描绘了期望战争的公众们那特别疯狂的情绪。

美国国旗在所有的街道和窗户上悬挂着。好战的观点和战争简报贴在商店的窗户上。街上行走的男男女女和他们的狗戴着美国的徽章或者“支持”的字样。自行车装饰着国旗的颜色好像要进行一次奇特的服装展示游行。人们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口号“记住缅因号！”[①]

缅因号事件是个借口，但是，即使没有发生这件事，一些其他的事件也完全会激起一场战争。美国存在显著的扩张主义情绪。它的内部疆域已经稳定了。几个世纪的印第安人反抗已经结束，其标志是1890年12月的“翁迪德尼”（Wounded Knee）大屠杀，当时，第七骑兵团屠杀了达科他（Dakata）南部的苏族（Sioux）印第安人。主流的情绪发生了改变，其中也不乏政治家的声音。罗斯福和他的朋友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只不过是为美国寻求一个更广阔世界角色的最重要的人物。 100

这种新情绪被当时出现的“黄色压迫”增强——好斗的、竞争的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报纸发表了大量的评论。这些报纸帮助创造、利用这种沙文主义的气氛，而且从1895年以来就密切地注意古巴的事件。一场与本国如此紧密相关的并且明显影响美国安全的国外战争是一个有用的、可广泛传播的话题。在纽约的古巴流亡者，最明显的是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和他的团队，从来都能及时、稳定地供给报纸以信息和支持，以强调人权的被伤害。有关韦勒的残暴和古巴人民承受苦难的报道在美国变得普遍流行。

受到一种由新闻界煽动的激烈公众舆论的推动，美国政府从1895年以来严密地注视古巴的事件。门罗主义60年的历史和经验是不能被

① John Black Arkins, *The War in Cuba, The Experiences of an Englishma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rmy*, London, 1899.

轻易抛弃的。然而政府内部产生了分歧，有人并不愿意进行干涉。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总统再次重申中立立场，并且乐于考虑调停，但还是不情愿地关注并干预了此事。1896 年 4 月，美国向卡诺瓦斯提出了一项调停的提议，宣称它“关注着所有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但是这位西班牙首相拒绝了他的提议。平静的外交在继续，但是其他的可能现在也被考虑，并且美国的其他政府机构也关注此事的发展。海军情报部门被要求在 1896 年 6 月制订战争计划，以应对与西班牙可能发生的战争。

1896 年的总统选举战使古巴停留在了公众的眼中。即将离任的克利夫兰总统被指责“对于古巴无所作为”。随着报纸定期地刊登来自古巴暴行的报道，导致敌视扩张主义的民主党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大选中落败，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获胜。麦金莱在 1897 年 3 月就任美国总统，任命罗斯福担任海军助理秘书。一位新的驻马德里大使得到通知，他须警告西班牙政府，如果不采取行动结束古巴的冲突，美国将自行采取措施。

戈麦斯对于谈判的拒绝意味着西班牙大势已去。缅因号沉没事件使干涉不可避免。在 1898 年 4 月 22 日，在美国正式宣战前仅仅 3 天，101 西班牙下了最后的赌注。在一封给戈麦斯的信中，拉蒙·布兰科建议西班牙和古巴的军队联合抵抗美军：“古巴人将从西班牙军队得到增援，并且伴随着‘西班牙万岁，古巴万岁’的欢呼，我们共同抵御入侵者，把我们同一个种族的后代从外国的枷锁中解放出来”。[1]

这样一种结果不会出现。布兰科迟来地屈辱地呼唤西语国家的团结，呼唤白种人热爱自由的本性，不会激起叛军中黑人和混血军人的反应。戈麦斯给予他一个简练的答复，谈到它“太晚了”，然而他给布兰科的信中谈道，他明显地相信美国的高尚目的。

---

① 引自 Thomas，*Cuba*，2nd. edition，218 页。

你代表着一个古老的和名誉扫地的君主国，我们是为了玻利瓦尔和华盛顿共同的原则而战斗。你说我们属于同一个种族，并且邀请我们为抵抗一个外国侵略者战斗。可我只知道一个唯一的种族，人类……西班牙在这里无恶不作，美国来古巴是为了执行人道和文明的责任……我看不到你所提到的由于美国入侵根除某些东西会带给我们危险……如果那将会到来，历史将会做出裁决。

显然，历史将会做出裁决。

正像古巴和其他地方的历史所记载的，对于美国入侵的最终结果不能过分地美化。然而，那时大多数古巴起义领导人欢迎它。马蒂和马塞奥完全可能拒绝，但是他们都已经离世。重要的古巴决策者是军队总司令戈麦斯和"省政府"主席马索（Masó）。戈麦斯拒绝布兰科提出的合作，已经含蓄地接受了美国的入侵，而马索给了它热烈的欢迎。马索宣布何塞·马蒂发动的光荣革命将要成功，"感谢美国宽大的援助；在3年战争中从未被西班牙人征服的我们将很快会获得胜利"。马索支持这次入侵，但是，在其晚年却因自己的决定感到悔恨，成为《普拉特修正案》[①] 的直言不讳的反对者，提出美国对于独立的古巴宪政的干预是永久的威胁。

奥连特省的司令官卡利斯托·加西亚的立场是模糊不定的。他由于长期不与之接触，并不同情在美国的古巴流亡领导人，只是当一名海军上尉在1898年5月秘密到达他的山区根据地时，他才意识到美国人在他经常活动的地区登陆了。他不知道是否应该合作并且被迫在此

① 1901年美国陆军拨款案的附加条款，旨在把古巴变成美国的保护国。由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O. H. 普拉特（1827—1905）提出，故名。美西战争之后，该修正案于1901年2月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表面上，该修正案承认古巴独立，实质上，美国却在竭力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对古巴进行全面控制。古巴制宪会议慑于美国的压力，不得不把《普拉特修正案》作为附录列入本国宪法。1903年，美国与古巴签订永久条约，美国向古巴租借关塔那摩港作为永久性的海军基地，并多次对古巴进行武装干涉和军事占领。由此，古巴沦为美国"统而不治"的殖民地。1934年，美国宣布废除该修正案，但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继续被美国占领。（http：//baike. baidu. com/view/77958. htm，2010年6月4日）——译者注

刻做出了一个现实的决定，同意援助侵略军。他的一支庞大的分队乘
102 船沿着美国海岸航行，在圣地亚哥东部的代基里（Daiquiri）登陆。加西亚接待了来访的威廉·赫斯特，他为这位编辑的报纸支持古巴的事业而向他表示感谢，还送给他一面起义者的旗子作为礼物。像马索和其他人一样，加西亚开始赞扬美国的入侵，但是他只活到美军占领之初的几个月，因为他在12月份访问华盛顿时突然死亡。

许多古巴人对美国的入侵持矛盾心理，部分是因为《泰勒修正案》（Teller Amendment）的结果，这是一则对4月份的战争宣言加以补充并且得到美国国会正式批准的条款，它宣称美国不会永久占领古巴。这则条款，是参议员亨利·泰勒在古巴流亡者院外活动集团压力下提出的，是一则反对任何殖民意图的补充条款：

> 美国特此否认任何寻求统治权、司法权或者控制该岛的倾向或者意图，除了使其安定和帮助它作出决定。当那些任务完成时，将移交给政府和控制该岛的人民。

《泰勒修正案》劝说许多古巴人相信，美国的入侵不会带来任何影响；它也使人们确凿无疑地相信，美国的干预在当时以及20世纪上半期大部分时间内，都被人们理解为是一种公正的姿态、一个要把古巴岛从一个压迫性的殖民政权下解放出来的人道主义的行动。像它在现实中的结果那样，美国的政策从未如此完全的明确或者在道义上如此的毫不含糊。

美西战争的第一个胜利仅仅在宣战后的5天发生在世界另一端的海洋上。5月1日，马尼拉湾海军准将乔治·杜威（George Dewey）率领的美国舰队摧毁了西班牙的太平洋舰队，打开了美国人征服菲律宾的道路。

西班牙的大西洋舰队在帕斯夸尔·塞尔韦拉（Pascual Cervera）上将率领下，受命从加的斯开往加勒比海，许多美国人害怕它的目的地是美国的东海岸。但这支舰队却是来保卫古巴而不是来攻击美国大陆

的，5 月底，它安全地停泊在圣地亚哥的大港湾。它在那里停泊了一个多月，被威廉·桑普森（William Sampson）上将率领的一支在外部游弋的庞大美国舰队包围。

桑普森的舰队在 4 月 25 日宣战后从基韦斯特开来，在 6 月到达奥连特省。在炮轰了莫罗的要塞后，派出了一支侦察部队去寻找一个适合远征军登陆的地点。1 000 名士兵在关塔那摩海湾登陆，遇到了西班牙军队意料之中的抵抗，但他们还是与一支古巴人叛军分队取得了联系。

由威廉·鲁弗斯·谢夫特（William Rufus Shafter）将军率领的 15 000多人的美国侵略军主力一直在坦帕驻扎，直到 6 月 14 日。《哈泼斯》（*Harpers*）新月刊的撰稿人理查德·哈丁·戴维斯（Richard Harding Davis）写道："带着真正的美国人的乐观精神，随时准备抓住最好的机遇……正像站在甲板上的一位将军所言：'这是全能上帝的战争，我们只是他的代表'。"[①] 这位将军可能就是莽骑兵司令官列奥那多·伍德，他写信给妻子，谈到他意识到美国的一项新政策将要开始："难以想象这是……我们国家的第一次远涉海外的伟大远征，并且标志着我们与世界关系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②]

谢夫特将军花时间阅读了一本有关 1742 年舰队司令爱德华·弗农对关塔那摩进行的灾难性远征的著作。想起那次英国事件中出现的问题，他决定使部队在更靠近圣地亚哥的地方登陆。6 月 22 日，在受到来自海上据点的西班牙人的猛烈轰击后，美军在代基里海滩发动了第一轮攻击。这是一个开阔的海滩，只有一个船坞和为西班牙美洲钢铁公司装运矿石的钢铁码头，但是第一天有 6 000 人上岸。

西班牙人的抵抗是软弱无力的，美国人很快与先期到达的一支来自巴亚莫的 1 500 人的古巴队伍会合。卡利斯托·加西亚率领的来自马埃斯特腊山的 3 000 人的部队几天后由海路到达。约翰·布莱克·

① Richard Harding Davis, *The Cuban and Portor Rican Campaigns*, New York, 1899.
② Herman Hagedorn, *Leonard Wood: A Biography*, New York, 1899.

阿尔金斯写道："这些暴动者衣衫褴褛，从其挂在身上的丝丝布条能使人想象出其夹克或者裤子的形状。他们很瘦弱，这些人可能是以椰子和芒果为生。无论何时，当有人点火时，一个古巴人就会出现，安静而神秘地像一个幽灵一样做出要抽烟的样子，并且要东西吃。"①

阿尔金斯注意到美国士兵如何迅速地变得对他们的古巴盟军不抱幻想，部分是因为"古巴暴动者把每一个美国人都视为一个慈善机构，在任何场合都期望他给予物品。古巴人不断地指点美国人的衬衫、帽子或者裤子，然后指点他自己，意思是他希望得到美国人的东西。"两支军队缺乏同志关系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美国军队几乎都是白人，古巴军队几乎都是黑人。

一周内，美国侵略军完成了登陆并且沿着内地的道路进军，7 月 1 日在洛马·圣胡安与西班牙军队遭遇。这次美军的胜利决定了岛上西班牙军队的命运。两天后，美国在海上取得了类似的成功。那位西班牙舰队司令不希望遭到像太平洋舰队在马尼拉覆灭的同样命运，然而随着圣地亚哥将要落入美国陆军手中，他被命令离开该港以防他的舰队落入美国人手中。这是一个自杀式的决定，在 7 月 3 日，整个西班牙舰队离开该港，但正中美国人的下怀。西班牙舰只受到袭击，被驱散和击沉。没有任何一支庞大的舰队像西班牙帝国舰队这样自取灭亡。

104

美国现在取得了陆上和海上的完全胜利，两周后的 7 月 17 日，西班牙同意签署投降条款。条款细则将在哈瓦那、华盛顿和马德里制定，随后的细节谈判是困难的和漫长的，但是美国国旗现在已经在圣地亚哥的宫殿上飘扬，列奥那多·伍德将军被任命为这个城市的新总督。

伍德将军和美国占领古巴（1898—1902）

美国对古巴统治的 4 年，实际上是一种军事独裁统治。西班牙总督被一个美国将军所代替。而从 1898 年到 1902 年，对于美国占领古巴的性质及其应该持续多久等问题，美国国会有过无休止的辩论，岛

① Black Askins, *The War in Cuba*, p. 98.

上的美国官员也在激烈争论着。古巴需要什么样的改变，美军的占领应该持续多久？

美国人未曾有过统治外国的经验，在古巴的老一代美国官吏只能从30年前内战结束时，他们在美国南方诸州的管理经历中寻找经验。这是他们熟悉的模式，也是他们在古巴所仿效的模式。

随着西班牙舰队被摧毁，这个岛屿被美国军队实际上占领了，西班牙和美国的官员的交接全部遵循着那个时代的礼仪。最后一位古巴总督阿道夫·希门尼斯·卡斯特利亚诺斯（Adolfo Jiménez Castellanos）将军在1898年12月于哈瓦那举行的一个正式退出仪式上，把该城的控制权交给美军第3号高级将领约翰·布鲁克（John Brooke）将军。一年后伍德将军取代了约翰，但是在整个1899年，伍德一直在圣地亚哥。美国人保留了西班牙的行政机构，西班牙官员和政府雇员被确认保留他们的职位。许多人的任职一直持续到古巴独立时期。

古巴人——士兵、官员和人民——没有得到新来的美国人和即将离去的西班牙人的任何宽容对待。那些从西班牙征募的士兵并不是无所作为地等待回家，而是在他们离开之前对奥连特省的人民及其财产发泄仇恨。牲畜被杀死，其粪便被填到水渠中。[①] 新来的美国人更加挑剔，他们从街上收集垃圾，清理排水沟并且开始迎击已经在他们部队中造成损失的黄热病。然而，新统治者蔑视古巴人，解散了戈麦斯和卡利斯托·加西亚的士兵，并且公开歧视黑人。官方的交易主要是同富裕的商人团体以及从纽约和佛罗里达新来的流亡者——在美国受过教育、在行为和语言上已经与美国人相似的古巴白人——达成。

105 这些受到美国影响的古巴人很快与一股涌入古巴、访问其新占领土或者计划其新生活的美国公民汇合。1900年5月，《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报道：

> 古巴完全为各个年龄段、各种生活状况、各种有职业和无业的美

① Thomas, *Cuba*, 2nd. edition, p. 238.

国人所颠覆。从白发的保姆到大街上卖报的儿童，美国人显然无处不在。许多年前，美国人曾经冲向西部：现在，这股浪潮转向南方的古巴……表面看来，许多人好像认为，他们将发现现成的黄金路在等着他们去收获。[①]

占领军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组织一次人口普查。[②] 现在官方记载的总人口是 1 500 000 人，其中 250 000 人在哈瓦那。这次人口普查表明，黑人人口减少到不足总人口的 32%，是自 18 世纪第一次人口普查以来黑人所占的最小的比例，尽管这个数据可能会受到它的组织者主观意志的影响。这次人口普查也揭示了有占总数 1/5 的 300 000 多居民，从上次的统计数据中消失，从而推知这就是战争的死亡人口总数。4 年的战争确实对人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疾病和战争本身，伴随着韦勒的人口"集中"政策，杀死了大量的古巴人民。美国驻哈瓦那司令官菲茨休利（Fitzhugh Lee）将军在 1899 年秋提供了一份关于在比那尔德里奥破坏情况的说明：

各种商业都停止了。农耕活动停止了；巨大的甘蔗园连同其庞大而昂贵的机器一起被破坏；房屋被烧毁；牲畜被西班牙军队赶走、吃掉或者杀死。就算还有一副犁存在的话，也几乎没有拉犁的牛。猪圈里没有为那些依旧活着的穷人留下一头猪，或者一只能下蛋的鸡，他们中多数人生着病，疲惫而虚弱。绵延数十英里的旷野，看不到有人居住的乡村或者家养的动物。在古巴岛的一些地方，极其肥沃的土地看上去像一堆灰烬，其他地方则是令人沮丧的荒漠。[③]

这位军人统治者面临的一件更重要的任务是创建一支古巴安全部

① *New York Times*, 7 May, 1900, 引自 Louis Perez, *One Becoming Cuban: Identity, Nationality, and Culture*, New York, 1999, 96 页。

② Thomas, *Cuba*, 2nd. edition, p. 246.

③ 引自 Perez, *One Becoming Cuban*, 101 页。

队。西班牙军队的士兵在投降后已经回国，33 000 多名古巴起义军在 1899 年通过领取养老金而退伍，每人得到 75 美元作为其上交武器的代价。鉴于美国计划负责岛上的防御，但又不愿意创立一支真正的军队，遂决定重建一支在西班牙时期已经具雏形的准军事性的农村卫队。美国在这支武装中引进了种族隔离制度，这在参与独立战争的黑人战士中间引起了可想而知的愤恨和不满。军官几乎完全是白人。

106

这支卫队的意图是肃清那些没有工作仍在继续活动的退役的起义士兵，应对战争结束后仍旧在乡村长期存在的土匪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建立农村卫队的做法。一位著名的负责马坦萨斯地区事务的美国进步军官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将军强烈地反对，他担心会导致一个军事独裁政体——极其类似拉丁美洲的模式出现。他写道："给我钱，用来购买耕牛和工具并重建农民的茅屋，我将保证和平和秩序。"[①] 但无人听取他的意见。

缺乏一支严格意义上的军队在共和国早期导致严重的困难，并使古巴的军事武装有别于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相应制度。[②] 当古巴走向独立时，这支农村卫队以总统的名义补充了一支由 150 名古巴白人组成的炮兵部队。

尽管公布了《泰勒修正案》，大多数跑到古巴的美国人仍然认为他们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并应该继续停留。他们得到了麦金莱总统的承诺，总统在 1898 年 12 月通告美国国会，军政府将留在古巴，"直到这个岛上完全平静并且一个稳定的政府正式就职"。没有人知道这需要多长时间。大部分人认为占领会持续到遥远的未来，甚至是永久——这个命运被判给了 8 月份占领的波多黎各。几乎没有人想到对它的占领仅仅持续了 4 年。

布鲁克将军相信他的政府是受欢迎的并将持续到无限的将来。他在 1900 年 1 月任期结束时报告道："没有一个明智的人认为我们可能

① Rafael Martínez Ortiz, *Cuba: los primeros años de independencia*, Paris, 1929, pp. 76 - 77.

② Rafael Fermoselle, *Politica y Color en Cuba: la guerrita de 1912*, Montevideo, 1974, p. 29.

长时期地离开古巴”。那个时间将不能“数以月计，而是要数以年计”。布鲁克宣称他与“所有的阶层商议”，但是他仅仅会见了古巴社会的很保守的部分，他们告诉他想听到的东西：古巴人支持美国的兼并。

布鲁克将军并没有计划自己一个人来控制全国，古巴人被选来担任4个主要的政府内政部门的长官，即财政、司法和教育、农业、工商业。只有那些曾经在美国居住的流亡者被授予部长的职务，并且全都是白人。经济被安全地控制在美国人手里。作为重要收入来源的海关部门被置于美国军队的控制下，由塔斯克·布利斯（Tasker Bliss）少校掌管。

布鲁克将军在1899年12月份被伍德将军代替。像布鲁克一样，伍德相信他会在那里进行长期统治。像所有殖民地的总督一样，他根本不与被统治者合作，他在1900年4月给麦金莱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表达了这种蔑视：“我们正统治着一个100年来一直在走下坡路的民族”。[①] 麦金莱告诉他“要让这些人民准备接受”一个共和国形式的政府，谈道：“我把计划的细节告诉你。要给他们建立一个良好的学校107 体系，试着整顿法院，尽你所能把这些交给他们自己。我们想要做所有那些我们可以为他们做的事情，尽可能快地安全离开该岛。”

伍德将军得到了在教育方面做些事情的命令，他自己仍旧相信，事实上这次占领是美国对古巴的兼并，于是他按照美国的方针来组织这个国家，他按照俄亥俄州（Ohio）通行的模式改组了现存的西班牙学校，并且建立一些新的学校。教科书从英语翻译过来，教师被送到美国培训，用美国的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进行指导。[②]

从美国涌入该岛的新教传教士建立了一些学校，“用来使天主教徒改宗……基督教新教，并且把美国人的思想强加给他们”。[③] 美国的卫理公会教徒、浸礼派教徒、主教派教会成员、长老会教徒等在古巴

---

① 引自 Thomas, *Cuba*, 2nd. edition, 445 页。

② Thomas, *Cuba*, 2nd. edition, p. 259.

③ 引自 Helg, *Our Rightful Share*, 95 页。

建立了教会。卫理公会教徒则专门给白人精英的孩子提供隔离式教育。

美国占领者在大多数方面是种族主义者，却愿意使用来自任何地方的劳动力。尽管城市里几乎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但是在种植园和矿场里仍旧有许多事情可做。很快地，如同在西班牙占领早期那样，雇主们开始在附近的加勒比海岛屿寻找劳动力。由于面临战争造成的劳力短缺，种植园主和矿业公司从海地和牙买加补充黑人契约工人。第一批 1 000 人在 1900 年 6 月到达。很快地，古巴白人过去对于出现一个黑人岛屿的担心重新出现了，军政府下令停止移民。当一个美国公司计划从牙买加引进 4 000 名工人修建一条纵贯古巴岛的铁路时，圣地亚哥的古巴人进行了抗议，其后美国当局被迫再次介入。美国人最终从布鲁克将军的助手弗兰克·斯坦哈特（Frank Steinhart）那里得到信息，宣称“只能接受白人移民”，建议应该从西班牙北部接收移民。①

占领的一年后，华盛顿方面的情绪开始改变。总统和国会逐渐担心他们新的帝国责任的代价。仅仅在古巴，一个月就要花费 50 万美元。菲律宾在预算中也被认为与此相同。马尼拉的占领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但是随后的占领遇到激烈的反抗。起义直到 1901 年才被镇压下去。美利坚帝国在太平洋的建立被证实是代价昂贵的。古巴亦然。新任国防部秘书伊利胡·鲁特（Elihu Root）把它描绘成“一项负担和令人烦恼的事”。

一位富裕的共和党律师鲁特是在 1899 年被总统麦金莱选定负责规划古巴未来发展的华盛顿政治家。麦金莱明白，他的国家获得的新的帝国责任需要一名在战争部门任职的、能干的行政人员而不是一个军人。一名鲁特的继任者亨斯·斯特森（Henry Stimson）曾经记载，在美国过去的历史上“未曾有过如此聪明、富有建设性和生命攸关的力

---

① 引自 Thomas，*Cuba*，2nd. edition，431 页。亦见 Charles Gaukdm，*The Last Titan*：*Percival Farquhar*，*American Entreoreneur in Latin America*，Stanford，c. alif. ，1964。

108 量”占有这个位置①。

鲁特把他的注意力转到选举问题上。在占领的前几个月，华盛顿和古巴的美国当局设想古巴将很快地并入联邦。他们寻求与那些少量的但是长久支持美国兼并的部分古巴人结成政治联盟。鲁特同意伍德将军关于“明智的”古巴人支持美国兼并的观点，而且，如果能够操纵选举确保“明智的”古巴人获胜，兼并的梦想将会实现。② 如果在古巴实施一次有限制的投票，鲁特写道，“大量无知的和无能力的”人们将被排除在外，它将可能“避免我们使用导致在中美洲和其他西印度群岛长期革命的那种控制方式”。③

古巴沦为殖民地之后的第一次选举在1900年举行。市政选举在6月举行并且在12月份进行了一次有关选民的会议。美国人制定的选举规则给予20岁以上的能够读写的古巴男子以选举权。他们也应该是拥有250美元财产的有产者，或者，作为一种不得已的让步，那些曾经在叛军中的服役者也可参加选举。古巴妇女不得参加选举。由于这些限制，选民总数仅仅有100 000名男人，大约占人口总数的5%。穷人和黑人实际上被剥夺了选举权。④

有3个党派参加了市政选举。两派要求立即独立：圣克拉拉的地方长官何塞·米盖尔·戈麦斯（José Miguel Goméz）将军领导的共和主义者，还有喜欢心照不宣地支持马克西莫·戈麦斯并且在哈瓦那势力强大的民族主义者。只有民主派联盟分子，一个包括许多旧自治派的支持者在内的保守派组织支持合并。由于对地区忠诚的调和，结果

---

① 1899年，鲁特最需关注的是在美西战争中的3个区域。除了计划将古巴移交给古巴人外，他又为菲律宾起草了一部民主宪章，此外他还处理了同波多黎各关税协议的细节。后来，即1905年，他被罗斯福总统任命掌管国务院。1909—1915年，作为一位共和党议员，他获得了191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并且将其余生奉献给了国际仲裁事业。他是第一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主席，1937年去世。见 Philip C. Jessup, *Elihu Root*, vol. I, *1845—1909*; vol. II, *1905—1957*, New York, 1938；以及 Richard W. Leopold, *Elihu Root and the Coservative Tradition*, Boston, 1954。

② Jessup, *Elihu Root*, vol I.

③ Louis Perez, *Cuba: Betwee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xford, 1995, p. 182.

④ Perez, *Cuba: Betwee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xford, 1995, p. 182.

是有独立思想的派别取胜。

伍德将军感到震惊，承认古巴的独立现在已经被提上议程，他痛惜于在古巴结交的朋友没能施加他们的影响。他沮丧地指出："高智商的古巴地主、工商业阶层不参与政治"。[①] 他没有意识到，他倾向的这些阶层不仅仅是对政治不感兴趣，其思想中还有其他的东西。他们正在进入一个无望的衰落期，因为战争破坏了他们的生意。蔗糖工业处于危机中，种植园主破产，农村地主的财产被毁灭。西班牙帝国的崩溃使得先前依附于它的既得利益者衰落。他们很少关注这个岛的政治前途。这些人希望做的就是打点行囊，而后离去。

109 鲁特是比较乐观的。这次保持一个狭隘的选民群体的目的之一是阻止黑人参加选举。头一年《纽约时报》的一则大字标题再次旧调重弹："古巴可能成为另一个海地。承认普选权的结果将是一个黑人共和国。黑人可能支配第一次选举。"[②] 从这点来看，至少，鲁特写道，6 月份的这次选举还是取得了胜利，因为它排除了大批的、"曾经毁灭了海地和圣多明各的" 因素。[③]

然而，仍然不能忽视的是，选举的结果是倾向于独立的党派的一次胜利。古巴的独立现在不可避免。可以理解伍德的沮丧，他被迫为这个他不欢迎的结果进行策划。他和美国政府的新任务是组织和准备权力的移交，使美国在离开后仍然能够牢固地控制这里。美国人能够从这场选举灾难中保留点什么呢？伍德希望能够控制"关税征收和军队司令官——代表美国的——如果有必要，获得否决权"。[④]

伍德还有更狂妄的想法，他试图在古巴独立后运用知识文化来维系它与美国未来的关系。在 1901 年 1 月的一封信上，他再次提出美国在加勒比海永恒的历史性利益问题，并且援引了"美国对于古巴的传

---

① 引自 1901 年 3 月伍德致鲁特的信，转引自 Perez, *Cuba: Betwee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xford, 1995, 183 页。

② *New York Times*, 7 August 1899, 引自 Fermoselle, *Politica y Color en Cuba*, 30 页。

③ 引自 Thomas, *Cuba*, 448 页。

④ Thomas, *Cuba*, 2nd. edition, p. 260.

统的和既定的政策”。他回溯到最早于 19 世纪 20 年代做出的决定：“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西班牙外的任何外国列强拥有古巴岛”。[1] 对于一个要求独立的古巴，美国必将在 20 世纪的新环境下更好地实施这个决定。

鲁特认为，美国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在古巴建立“一个稳定的和能胜任的政府”。他认为，确保该岛继续独立存在具有历史性和战略性意义。但是在当时的中美洲和加勒比海，乃至更大范围的拉丁美洲，并不具备这样的信心去创建一个明智、稳固和独立的古巴，于是，这种独立如何能保证？鲁特与伍德观点一致，认为古巴的政治阶层天生不适合通过选举产生，但是希望在未来出现“民众中的一个较好的阶层”。他特别期望他们能够“摆脱掉那些现在得势的冒险者”。然而，他也很现实地承认这是不可能的。美国面临着的选择是创建一个不稳固的“中美洲共和国”（后来以一种更贬仰的方式将它描述为一个“香蕉共和国”）还是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美国对“应时代要求建立的一个稳固政府”的控制。

110 鲁特非常理解，这是不容易的。他写道，古巴的人民一直生活在“一个军事殖民地中，60% 是文盲——许多人（他们中间）是非洲人的子女”。[2] 他能参照的统治模式几乎没有，但是他熟悉 1882 年英国占领埃及（Egypt）的故事，和其后英国与开罗（Cairo）政府的关系。虽然英国人被迫在这个国家驻军，军队的两个最高目标是排除其他列强的干预，并且确保埃及的统治者为它所欠的外国货款支付利息。为什么美国人不可以在古巴采用这种模式？

鲁特的精明用意是在古巴人不久将开始讨论的新共和国宪法中添加一些保障条款把两个国家紧密捆绑在一起。这些保障条款将给予美国对古巴外交、防卫和经济政策的否决权；它也允许美国为了保护“古巴的独立和维持稳定的政府”而保留“干涉的权力”。后一个要求

① Thomas, *Cuba*, 2nd. edition, p. 262.

② 引自 Thomas, *Cuba*, 2nd. edition, 262 - 263 页。

最终在参议员奥威尔·普拉特（Orville Platt）的建议下，在美国国会以“修正案”形式被通过，亦被古巴人不情愿地添加到他们新共和国的宪法中。

被“抵押”的独立：《普拉特修正案》（1902）

《普拉特修正案》（Enmienda Platt）在一个多世纪里为每一个古巴学子所熟悉，这两个词使人想起在美国占领结束时强加给古巴的屈辱协议。奥威尔·普拉特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中一位有影响力的共和党政治家，他于 1901 年 2 月 15 日在华盛顿的国会上提出了这则必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修正案”。[①] 普拉特自己并不重要；他只是简单地执行鲁特的命令，而鲁特则是与伍德将军一唱一和地谋划了关于美国与古巴未来关系的构想。继续进行军事占领不再是一种选择，但是，即使古巴已经取得了独立，美国占领军已经离去，《普拉特修正案》的规定仍确保美国对古巴维持着一种极不寻常的殖民控制形式。

由于它强调美国文明的优越性，无视古巴人的感情，《普拉特修正案》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典型文件。在它于 1934 年被正式废除后，其影响仍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而且在一个世纪后仍然影响着美国的全球观念，这明显地体现在 1996 年的《赫尔姆斯 - 伯顿法》（Helms - Burton Act）[②] 的措辞上。在 1901 年 2 月，它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时，其目的只是在古巴人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之前使古巴和美国紧密粘合成一种永久性的伙伴关系。1900 年 12 月被选举来起草一份新宪法的古巴立宪会议被迫接受了它。美国人坚持把它写进古巴人认为将由他们自己设计的宪法中。

111

《普拉特修正案》分为 7 个部分，第 1 部分的设计是要保证没有美国的允许，古巴不能与外国列强签订协议，或者允许外国军队在它的领土上建立基地。第 2 部分指出古巴的公共财政将被置于美国的监督

---

① 从法律意义上看，《普拉特修正案》是对古巴持续增加驻军的经济支持拨款提案的修正。

② 也称《古巴自由与民主声援法》，见本书第 303 页（原书页码）。——译者注

下。第3部分给予美国在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时候干涉古巴的权力。第4部分禁止任何追溯既往的企图，质疑美国占领期间发生的事情。第5部分是由伍德将军建议的，迫使古巴人继续努力进行由美国占领军推行的改进国家疾病控制的工作。第6部分给地位未定的松岛设计了未来的法律归属，而第7部分则给予美国人在该岛建立永久军事基地的权力。（关于《普拉特修正案》的文本，参见附录2）

美国在关塔那摩的海军基地就是第7部分的成果，它的作用持续到一个世纪之后。美国海军长期把这个港湾看成一个方便的煤炭补给站，在风季也有着其他的战略发展意义。美国海军部长约翰·德龙（John D. Long）在1900年5月指出："鉴于有可能修建一条穿越地峡的运河（最终修建了横穿巴拿马的运河），美国有必要控制顺风通道，商船和我们的运输船以及战舰必须从这条通道的北部通过运河。"①

《普拉特修正案》在1901年3月2日被写进美国的法律，在6月12日的古巴立宪会议上，伴随着许多抱怨声，人们投票表决把它作为附件收在他们一直在准备的共和国宪法内。选举被通过，表决的结果是15票对14票。马蒂原来的追随者和独立战争中的一位黑人领袖胡安·瓜尔贝托·戈麦斯（Juan Gualberto Gómez）将军投票反对它，声称修正案"把古巴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缩小为一个神话"。那些投了赞成票的人争辩道，一个受到限制的独立要比美国的继续占领好得多，多数人相信这种情况能够改变。

虽然《普拉特修正案》最终在1934年被废除，但它在共和国的前30年中对于古巴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并且直到20世纪末都使美古关系笼罩在阴影下。美国通过军事手段在1906年到1909年，1912年以及从1917年到1923年干涉了古巴政治。修正案使得古巴政府在它面临内部强大反对（来自工人或者农民，或者仅仅是来自

① 引自 James Hitchman, *Leonard Wood and Cuban Independence, 1898—1902*, The Hague, 1971, 90-91页。

政治上的竞争对手）的任何时候，都要借助于美国的军事援助，从而以更具有灾难性的方式妨碍古巴的政治发展。美国士兵经常来古巴解 112 决一个真正独立的政府应当自己解决的问题。这种敌对情绪导致了1933年和1959年革命的爆发。

113

第四章　古巴共和国（1902—1952）

美国控制下的共和国：埃斯特拉达·帕尔马（Estrada Palma）和查尔斯·马古恩（Charles Magoon）（1902—1909）

如今只有他的一双鞋子依然可见。在下面，似乎是一个头戴桂冠，脚穿凉鞋的巨型希腊女神泰然地站立在柱脚（底座）前面的台阶上，甚至准备好了用她那石雕笔来写作。只有很少的关于庆典的文字还依稀可辨。这座雕像矗立在哈瓦那新城区的一条通往海边的大道上（德洛斯总统大道），是为了纪念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这位第一个被选为古巴共和国总统的人而建。现在这里几乎没有东西幸存下来。埃斯特拉达·帕尔马被认为背叛了祖国和人民，因此他的雕像在1959年的革命中被摧毁。他不可宽恕的罪行就是在美国占领军手中接受了远远低于独立的形式，他主持建立了一个看上去美国人比古巴人拥有更多特权的共和国。

正如支持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ista）的历史学家所记载的，古巴伪共和国在1902年5月20日正式宣布成立。美国军队的统帅列奥那多·伍德正式地将统治权交给了总统埃斯特拉达，这个曾被政治流放达30年的，老练的美籍古巴人。共和国的特点就是无休止的暴乱、日益明显的腐败、军事哗变、无法无天的强盗行为和美国断断续续的

军事干涉，同时共和国也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发展成就，并让社会上的极少数人先富了起来。60 年后，1959 年，共和国最终被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推翻。然而在美国，人们依然把 5 月 20 日作为古巴独立日来纪念，卡斯特罗革命则完全抹去了这个周年纪念日。

埃斯特拉达作为共和党的代表，毫无异议地赢得了 1901 年 12 月的总统竞选。马克西莫·戈麦斯拒绝继续支持埃斯特拉达，巴托洛梅·马索（Bartolome Maso）这个反对《普拉特修正案》且比埃斯特拉达更受民众欢迎的候选人，在得知伍德将军控制了选举并任命了 5 个埃斯特拉达的支持者加入选举委员会以反对自己后，即退出了竞选。[①] 大部分幼稚的古巴政治精英们追随了新总统埃斯特拉达。

114

埃斯特拉达属于他那个时代。他属于有教养的统治阶层，对美国占领者没有敌意和偏见，并希望在独立后与美国继续保持紧密的友好关系。多数古巴人似乎应该接受最起码的民族主义思潮，然而，在早先的半个世纪里，成千上万的古巴人曾经到了美国，工作、学习或做些小买卖。在殖民统治的最后 10 年里，战争和经济的不确定性，导致规模巨大的古巴移民，生成了美国大陆上大批古巴裔的美国人，他们并非没有回归家乡的想法。马蒂可能已经预料到“这位北方的巨人”将会对他的人民有所影响，但是，他可能没想到在他之后更多的移民已开始为美国的活力、慷慨和它的现代性所倾倒。

这次移民涵盖了不同层面的数代古巴人，年轻的和年老的、男人和女人、黑人和白人，他们许多人很轻易地在大陆和岛国之间来回流动。大陆和岛国之间一直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在共和国早期，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和有影响的人都有在美国生活的经历。[②] 美国对古巴事务的干涉在这些人看来并不是对他们的侮辱，相反地，受到了他们的欢迎，有时候，他们要求美国的干涉。

---

① Luis Aguilar, “Cuba, c. 1860—c. 1930” in Leslie Bethel (ed.), *Cuba: A Short History*, Cambridge, 1993, p. 40.

② Louis Perez, *On Becoming Cuban: Identity, Nationality, and Culture*, New York, 1999, p. 6.

那些共和国政府的执政者可能倾向于占领者已经试图实行的美国政策体系，甚至赞赏这种政策体系，但是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模式可以供他们直接使用，这不同于当年的西班牙，允许统治者按照自己的利益管理国家。埃斯特拉达是一个简朴的校长，就他自身而言，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但是那些谋求成为政府官员候选者的以往叛军中的许多军官并不是那么有自制力。即使就个人而言他们是诚实的，但是，其原来军队中的士兵对他们依然保持忠诚，这些士兵现在贫穷，没有工作，于是这些军官被指望着向他们的支持者慷慨施舍。

贪污腐败当时并不是简单的因为个人私欲膨胀。由于在政府工作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了生活来源，而他们的工作又依赖于他们的政党在总统竞选中的胜利。选举欺骗在共和国初期变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武装支持者们保卫投票点，以确保他们的代表获得胜利。如果出现严重的争论——这在每一次选举中都会出现——美国将会按照《普拉特修正案》中的规定，履行其相应的义务，对古巴进行干涉。

115 在共和国早期，美国的干预受到了古巴精英的欢迎和相当多的美国移民和商人的支持。直到 1905 年，13 000 多名北美人获得了进入古巴的权利，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投资。不久之后，美国个人和企业占有了古巴将近 60% 的农村财产。[①] 许多在独立战争中为古巴独立而不是与美国经济合并而战斗过的古巴人醒悟过来，担心美国的经济渗透。但是另外一些人则坚信，这对古巴的发展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利的，他们急于和这些大陆的新经济势力联合。

伊琳娜·莱特在 1910 年同情地注意到，“突然从殖民条件下释放出来”的一个民族并没有“把自己看作是古巴的人民，或者说组成了一个具有自我认同感的民族”。[②] 她在当时的一则评论中揭示了其内部的问题。在历经殖民地的黑暗统治、战争的打击并被分成不同的民族

① Louis Perez, *Cuba: Betwee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xford, 1995, p. 197. 还有 15% 的土地属于西班牙人。

② Irene Wright, *Cuba*, New York, 1910, p. 502.

和阶级后，古巴人民很难在历史的舞台上继续前进。他们也没有准备好迎接这将要到来的事情，即由于缺乏一个具有适当组成形式的古巴国家造成的真空，使得美国移民者和企业家及他们的一些盟友很容易填充到这个岛上的空白中。艾琳·赖特评价了这一悲剧：

这个共和国并非由古巴人所缔造——既不是他们所造，也不受他们影响——但是相反，它完全是美国制造的，是美国人打造了这个古巴共和国。当它失败以后，美国人再次把它建立起来。美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如果他们发现这个国家有什么东西应该受到批评，或者它失败了，那么，就请美国人记住，他们所指责的东西恰恰是他们自己创建的。①

美国海军仅仅离开4年就重新回到了古巴。1906年，近2 000名海军在哈瓦那登陆并继续驻扎在他们的老基地——位于市郊的哥伦比亚兵营。不久之后，美国在古巴的周边地区又派遣了5 000名海军。这些士兵在这里驻扎了近两年，大部分时间主要是绘制古巴的地图，最后于1909年2月撤退。这次干预并不是美国单方面的军事行动，而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依据《普拉特修正案》条款要求美国行动的结果。没有人能像美国在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那样被埃斯特拉达的请愿书所激怒。罗斯福曾公开声明：“对于这个地狱般的古巴小国我非常地生气，我们从他们那里想要得到的就是使他们自己举止端庄、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为此我们不得不干涉。现在看来……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干预。”

对于古巴，同对其他地方（除了巴拿马和菲律宾）一样，在20世纪早年，美国人都企图摆出自己并不情愿做帝国主义者的姿态。以欧洲的模式进行吞并或者占领并不是他们所乐于采取的方式，尽管他们不是不知道这种方式。美国海军在1912年至1925年占领了尼加拉

① Wright, *Cuba*, pp. 152 – 153.

116 瓜；1915 年至 1934 年占领了海地；1916 年至 1930 年占领了多米尼加共和国。于是，他们在 1912 年、1917 年、1921 年 3 次回到古巴。[①] 在美国人对待古巴人的态度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亨利·卡伯特·洛奇。他在 1906 年 9 月写道，“没有人想要吞并他们，但是将军必须冒着危险执行命令，直到他们（古巴人民）守规矩。”[②]

1906 年，美国对古巴内战进行干预，以阻止古巴人内部的斗争，其必须这样做的理由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所占有的这份不适当的遗产。1904 年 2 月，当国民大会选举之时，美国很快地就显示出它根本没有能力组织一次欺骗性的竞选。古巴分裂为两个大的党派，一是共和党，主要由保守派和中央集权主义者组成；另一个是支持地方自治的民族自由党，所以选举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争论。在美国人看来，这两个政党几乎没有原则性的差别。它们的领导人都是先前企图破坏和平的叛乱者。[③]

埃斯特拉达的共和党人有较大的权力，并且事实上比自由党更擅长政治欺骗，并获得了较多国会议员的支持，自然是胜券在握。自由党拒绝接受这一结果，并缺席了国民会议，这成为了 1905 年 12 月总统竞选的不祥征兆。由于坚信自己是古巴无可替代的人选，并依靠在哈瓦那的美国部长的支持，埃斯特拉达·帕尔马决定再次竞选。自由党联合一致支持的候选人是圣克拉拉的总督——何塞·米盖尔·戈麦斯，他的竞选伙伴是阿尔弗雷德·萨亚斯（Alfredo Zayas），一位不动声色的律师。如果马克西姆·戈麦斯没有在 1905 年去世的话，他将会是最受欢迎的总统候选人。何塞·米盖尔·戈麦斯和萨亚斯互相仇视对方，但是他们两人都是接下来 20 年古巴政坛中的优势人物，两个人后来都成了总统。

12 月的竞选之前笼罩着暴乱气氛，政府官员为保证埃斯特拉达

① H. A. Ellsworth, 180 *Landings of the US Marines, 1800—1934*, 2 Vols, Washington, 1934.

② Hugh Thomas, *Cuba, or the Pursuit of Freedom*, 2nd editon, London, 2001, p. 283.

③ Thomas, *Cuba*, 2nd edition, p. 276.

再次赢得竞选，迫使戈麦斯退出，所以埃斯特拉达没有遭到任何反对，再次成功当选为总统。自由党只有求助于一件他们所熟悉的武器——他们在 1868 年就试着使用过它。他们以手中的甘蔗刀和一些简单的武器，组织武装起义，目的是推翻政府。其中包括有许多黑人的 24 000 多名起义者于 1906 年 8 月在比那尔德里奥省集结，开始向哈瓦那进军。全国各省由民众领袖组织起来的队伍加入其中，这就是著名的八月战争（*Guerrita de Agosto*）。居住在哈瓦那的白人像以前一样开始恐慌，要求美国进行干预。一个情绪激动的作家要求美国立即吞并古巴，在著作中他把自由党叛乱描述成种族战争的"第一个火花"，在这场种族之战中，"充当刽子手的非洲人"将对白人进行报复。[①]

埃斯特拉达所面对的叛乱，并不是他可以轻易粉碎的。美国人撤离古巴后也没有留下一支长期的驻军。本土军队只有 3 000 人，而且零星分布在全国各地。一支炮兵部队只有为数不多的士兵。由于害怕自己的统治被推翻，埃斯特拉达在 9 月份开始向华盛顿请求军事援助。 117
为了和其他的古巴领导人一样，一切事情按照埃斯特拉达预定的轨道发展，这就使得他必须做出这样的决定。在独立战争时期，埃斯特拉达就和美国关系紧密，他很高兴美国可以插手古巴事务。[②]

罗斯福同意在"古巴自己已经表现出其陷入了革命的泥沼难以自拔；缺少足够的能力以确保自治政府的和平；长期的党派争论使国家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时，干预古巴事务。[③] 他派出了两名特使前往哈瓦那，以寻求"和平的方式"解决古巴问题，于是，战时副部长威廉·塔夫脱（William Taft）和副国务卿罗伯特·培根（Rober Bacon）到达了哈瓦那后，在埃斯特拉达和自由党之间就相关事宜进行斡旋。

---

① 引自 Aline Helg，*Our Rightful Share：The Afro - Cuban Strugle for Equality，1886—1912*，Chapel Hill，N. C.，1995，162 页。

② Perez，*On Becoming Cuban*，p. 46.

③ 引自 Thomas，*Cuba*，2nd edition，280 页。

埃斯特拉达并不希望和自由党进行谈判，只希望通过美国的干涉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以辞去总统职务并强迫内阁解散的方式逼罗斯福总统就范。这样古巴就没有了政府。罗斯福不可能抛弃古巴和在古巴的美国投资者而使古巴进入新一轮的内战，美国有义务来填补这个真空。于是，美国海军被派往哈瓦那以“建立和平与秩序”。

在很多人看来，罗斯福应该会派伍德将军重返古巴，但是罗斯福总统却选择了查尔斯·马古恩（Charles Magoon），这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律师，成为了第一个平民的海军将领。马古恩是美国所拥有的一位与典型欧洲殖民总督最类似者；他曾经出色地完成对巴拿马运河区这个美国最近刚刚获得的战利品的控制。[1] 他在古巴的主要任务就是继续1902年未竟的事业。马古恩的智囊团设计了一个比较可靠的选举体系，为行政官僚机构制定了规则，并建立了小型的职业化军队。[2] 他们还制定了新的法律体系以取代西班牙统治时期的法律。

马古恩在古巴统治了3年。到1908年时，新的军队已经训练有素，新的选举规则也逐渐成熟。关于如何进行必要改革的任务交给了陆军上校伊诺克·克劳德尔（Colonel Enoch Crowder）处理，这个美国政府官员在古巴接下来的20年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马古恩一样，伊诺克·克劳德尔曾在菲律宾做过军事总督的法律顾问，因此他有统治殖民地的专长和经验。这个经常被描述为来自密苏里州的“农场男孩”，毕业于美国的西点军校，他的战争生涯可以追溯到对印度安人的战争：1886年，他在新墨西哥州参加了对抗印第安人阿帕奇族首领杰罗尼莫的战斗；1890年又参加了对抗苏族首领西廷布尔（Sitting Bull）的斗争。

克劳德尔把古巴的代表集合起来组成了改革委员会，以起草改革的具体内容，虽然这些代表经常缺席会议。事实证明，有时候把这些

---

① David Lockmiller, *Magoon in Cuba: A History of the Second Intervention, 1906—1909*, Chapel Hill, N. C., 1938.

② 100年以后，古巴人仍幻想着美国将再次来组织这个岛屿的选举制度。

细节化的问题交给占领者更容易一些，古巴的代表们并不想为了这些问题费神。1908 年 8 月，各省、市的竞选活动在克劳德尔设计的规则下开始进行，共和党人获得胜利，被重新命名为保守党。这似乎是马古恩的另一个创造——由支持埃斯特拉达的联盟组成。自由党和原来一样还是处于分裂状态，但是，在 11 月举行的总统竞选中，他们支持的戈麦斯和萨亚斯，这个在 1906 年曾被剥夺了胜利果实的组合，最终获得了总统竞选的胜利。戈麦斯一直统治到 1913 年。1909 年初，当马古恩、克劳德尔和美国海军离开古巴的时候，戈麦斯总统乐观地向人们宣布："古巴人民再一次掌握了自己民族的命运"。

118

美国的第二次占领对很多的古巴人来说是耻辱的经历。他们在外来者面前表现得如此没有经验、无能，而且不团结。似乎任何一个失去竞选资格的、被排斥的党派，或者在争论中感觉无助时，都会高喊"卑鄙"并转移到山中，而他们的对手就得迅速跑到美国大使馆，要求美国海军重新登陆古巴。

尽管在共和国初期美国对古巴进行了全面的渗透，但是依然留下了许多西班牙帝国统治时期的残余。西班牙的倒台并不意味着它对古巴社会许多方面控制的结束。由于许多西班牙官员继续保留了自己原来的工作，因此新的共和国和原来并没有明显的区别。那些留下来的人只不过举行了新的效忠宣誓，一开始向美国，而 1902 年之后，则向古巴共和国。对这些人而言只是宣誓的对象不同而已。古巴国家的统治几乎与它在殖民地时期一样。除了在美国占领时期的少量修正外，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世纪之交时，西班牙出身的"半岛人"在古巴的数量依然很大，之后又增加了许多。在古巴共和国建立后的头几十年，来自西班牙的移民仍将保持稳定的增长率。

一个为西班牙白人殖民者建立的共和国

在卡萨布兰卡村（Casablanca）狭窄道路的高处，哈瓦那港口的东方，接近拉卡瓦尼亚（La Cabaña）要塞的地方，矗立着一个耶稣的大理石雕塑，他的一只手高举，祝福着人们。这座雕塑完工于 1958

年，是巴蒂斯塔时期最后一批宏伟工程中的一个，同一时期的工程还有通往港口的地下隧道。美国的游客看到这座雕像的那一刻，往往会想起在纽约港口向欧洲贫穷的和拥挤的人们展开怀抱的自由女神像。

这个借鉴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1900年伍德将军下令在哈瓦那港口模仿纽约爱丽斯岛（1892年对外开放）建立一个移民接待中心。新的古巴移民中心叫做特里斯科尼亚（Triscornia），设在卡萨布兰卡的斜坡上面，一直维持到1959年。和原来的西班牙占领者一样，伍德将军的目标是鼓励来自西班牙的白人移民定居古巴。

1898年以后，许多西班牙移民者继续留在古巴，这和西班牙较早时期的经历完全相反。19世纪初，当西班牙帝国在拉丁美洲的统治瓦解时，成群结队的西班牙人离开了殖民地，这些人有的回到了西班牙本土，有的移居古巴和美国。这种人口流动和20世纪60年代欧洲从非洲大陆撤退时的情景非常相像。最先是阿尔及利亚和肯尼亚的白人移民，之后是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移民，都重返欧洲。在人口回流问题上，古巴是一个特例。不只是这些西班牙移民继续留在了古巴，接下来的30年里，又有数百万新的西班牙移民来到古巴。[①] 当初老西班牙帝国要把古巴“白人化”，并且白人要占到古巴总人口50%的目标，终于在西班牙人撤退以后达到了。与西班牙统治的400年相比，20世纪最初30年内，更多的西班牙人来到了古巴，从而使新移民更加持久到来。[②]

和非洲的许多欧洲殖民地一样，古巴也是一个由白人殖民者管理的典型移民社会。虽然土生古巴人掌握了政治，但是商业、工业、商品零售贸易以及学校和报社中的职位都为西班牙人所控制。1899年，由美国组织的人口普查显示，古巴的外来白人男性达到了113 000人，在总数为523 000人的成年男性中占据了20%的比例。这20%中的大多数人是西班牙出生的。另有25 200人的白人男性被认为是古巴人，

① 大约有80万西班牙移民是在1902—1931年间来到古巴的，大约平均每年2.5万人。Jordi Maluquer de Motes, *Nación e immigración: los espanoles en Cuba*, Oriedo, 1992, p. 112.

② Thomas, *Cuba*, 2nd edition, p. 295.

而剩余的158 000人则被称为“混血儿”。[①]

1898年以后到达古巴的西班牙人，多是因为原有的移民传统和国内经济的衰落而来的，和过去一样，这些移民多来自加利西亚、阿斯图里亚斯以及加那利群岛。[②] 虽然有些人后来返回了西班牙、有些人去了美国和拉丁美洲，但是在50万西班牙人中至少有40%在共和国初期的20年里依然留在古巴。这其中就有安吉尔·卡斯特罗（Angel Castro）——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父亲。

伍德将军为尊重西班牙移民的权利做出了特殊的努力，希望他们可以继续留下来管理这个国家。军政府在1898年12月的和平条约中答应维护他们的私人权利和财产权益，这也被共和国的新宪法所批准。为了确保白人移民稳定地迁入古巴，伍德草拟了一项法令以尽可能地减少黑人和华工移民的数量。1902年5月，在他离任前5天，伍德签署了一项禁止输入契约劳动力的法令，特别指出的是华工，但是也阻止可能从波多黎各涌入的大批黑人移民。埃斯特拉达的新共和国并没有和旧的殖民统治完全分离，而且接受了美国人强加于他们的种族分离政策。[③]

由于并非所有的新西班牙移民都是受过教育的农场工人，因此“只使用白人”的政策在面向土地所有者时出现了问题。他们中间一些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是工联主义者，是西班牙乡村社会的典型“产品”。一些人被训练成为了鼓动者，目的是他们可以在古巴初期的联盟运动中起积极作用。在1917年10月，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制糖业工人罢工，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和实行8小时工作制，之后，总 120

① 该数据来自1899年美国陆军部的统计，引自Péres, *Reform and Revolution*, p. 200。其中不包括女性和15岁以下的儿童，而且显然低估了黑人的数量。

② Péres, *Reform and Revolution*, p. 202.

③ 大地主继续着19世纪的传统。该国最大的制糖业大亨劳里亚诺·法拉·盖迭雷斯（Laureano Falla Gutiérrez）于1912年召集了一群大地主，建立了“推动欧洲移民地产主协会”（Asociacion de Hacendados para el Fomento de la Inmigración Europea），希望可以维持古巴的只引进白人移民的政策，旨在推动欧洲的移民。1917年，该协会放弃“欧洲”一词，但是其重点还是白人。

统颁布法令，把所有与这次罢工有关的外国人全部驱逐出境。所以白人移民也是一把双刃剑。

大多数西班牙移民社会地位上升很快，使他们在古巴社交活动中比在家里花费的时间多。于是，在19世纪晚期，他们乐于在哈瓦那建设娱乐场所（casinos）或者社交中心，即哈瓦那城内一些最华丽的高楼大厦。正如黑人曾经建立教士会堂（Cabildos）以保持他们本土的非洲文化记忆一样，西班牙人也希望继续保持他们的本土特色。阿斯图里亚诺中心（Centro Asturiano）就是由西班牙北部沿海省份的移民组成的一个俱乐部，现在仍然矗立在哈瓦那中央公园。这座宏伟的殿堂陈列着国家美术博物馆中的非古巴展品。这个豪华得经得起竞争的建筑始建于1885年，目的是要超过其他可能存在的对手。它不只是移民情感的象征，也代表了白人的自尊，同英国建筑师赫伯特·贝克爵士（Sir Herbert Baker）在比勒陀利亚的建筑物非常相似。穿过中央公园，在塞维利亚酒店（Hotel Inglaterra）附近矗立着泰肯剧院（Tacón）。它最初是加利西亚中心（Centro Galiciano），由后来在古巴富裕起来的、来自加利西亚的贫穷移民所建。

这些中心都是作为集会场所而设计的。在这里，许多家庭的女儿们将会嫁给门当户对的新郎。他们拥有自己的剧院和图书馆；建立了贷款和存款银行；编辑自己的报纸，特别是《海洋日报》。他们向自己的成员提供就医和上学的优惠条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单是一个西班牙社区中心，它的预算就要远远大于岛上的任何一个省政府。

特里斯科尼亚的移民中心一直保留到1959年，但是此前很久西班牙的殖民者就开始逐渐减少。战争和经济的衰退使得这里不再那么吸引移民，1933年革命后古巴环境的变化也使得西班牙的移民不再受到欢迎。1933年西班牙内战结束时，大批难民流向了墨西哥城而不是哈瓦那。

共和国抵制黑人：埃瓦里斯托·埃斯特诺斯（Evaristo Estenoz）与1912年大屠杀

在共和国的初期，官方的倾向是白人至上，但是持乐观态度的移民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这就是古巴还有大量存在不满情绪的黑人。古巴黑人曾经是独立战争中士兵的主体，但是没有获得任何奖励。由于共和国初期重新强调殖民社会的种族主义原则，“黑匪”[①] 们就被人遗忘了。他们的军事将领们都死在了战争中。那些保护黑人社区的新的领导人多来自“混血儿”中的中产阶级，他们是流放归来的为自由党工作的有抱负的政治家。

121

新时期两位最突出的黑人领导者，胡安·瓜尔伯托·戈麦斯（Juan Gualberto Goméz）和马丁·莫鲁亚·德尔加多（Martin Morua Delgado）是通过促进教育发展和推动种族融合来发展黑人事业的。戈麦斯主要在报界活动，而莫鲁亚则在参议院中工作。他们寻求在公共场所禁止种族隔离和取消就业歧视的立法。虽然莫鲁亚获得了在炮兵中取消种族隔离的胜利，但是在立法方面大部分都没有成功。

他们两人在国会和报界所作的努力并没有使国内的黑人醒悟。独立战争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曾经流放在纽约的黑人记者拉斐尔·塞拉（Rafael Serra）在1907年出版的一本随笔中表达了这种情绪：

> 如果古巴的黑人为了古巴的独立和自由付出的牺牲所得到的回报，是去听巴亚莫圣歌和错误地沉溺于纪念那些光荣献身的烈士的活动中，那他们就是不幸的。不，我的兄弟们，我们应该得到正当的待遇，而不能再继续鼓励那种卑微的和荒谬的爱国主义。[②]

---

① 殖民主义者对反抗西班牙统治的、以黑人为主的民间游击队的蔑称。见本书第三章。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54816——译者注

② Rafael Serra, *Pare blancos y negros*, Havana, 1907，引自 Helg, *Our Rightful Share*, 117页。

美国黑人历史学家亚瑟·朔姆堡（Arthur Schomburg）于1905年访问古巴时，也记录了古巴黑人的不满：

> 和今天相比，在西班牙殖民时期黑人的待遇更好一些，他们还享有大量的自由和快乐。许多古巴黑人在他们被压迫的时代还是受欢迎的，但在和平时期……他们却被剥夺了职位，被流放或是成为政治的弃儿。黑人为古巴做了很多，而古巴却没有为黑人做任何事情。[①]

在那些为争取独立而战斗的白人自由主义者和为西班牙而战的人中间，有许多是种族主义的保护者。反对《普拉特修正案》的英雄巴托洛梅·马索是白人移民的支持者，他关于黑人在独立的古巴中的作用有他自己的成见。在1898年的采访中，他提到："我们的黑人……大部分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十分不适合据有一些岗位。只要有足够的就业，（他们）就不会给我们制造麻烦……我们的黑人将会像以前一样继续在甘蔗田里工作，在我看来，他们没有理由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在政府机构中没有有色人做为官员，我们的官员几乎都不是黑人……"[②]

战后，一些黑人老兵在由他们建立起的各种协会中相当活跃，还有许多人被少量的金钱所贿买。但是黑人大众仍然存在着不满，所以大多数人在1906年8月加入了自由军队，以支持何塞·米盖尔·戈麦斯反对埃斯特拉达·帕尔马。在随后的查尔斯·马古恩统治时期，当关于改革选举体系的讨论开始时，许多黑人老兵开始考虑动员黑人或者组成一个政治派别的可能性。

122

这些人中突出的是埃瓦里斯托·埃斯特诺斯。这个生来就是奴隶

① 引自 Perez, *On Becoming Cuban*, 323页。亚瑟·朔姆堡原是波多黎各人。

② Geroge Clark Musgrave, *Under Three Flags In Cuba: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Cuban Insurrection and Spanish – American War*, Boston, 1899, pp. 162 – 163；引自 Helg, *Our Rightful Share*, 78页。

的战时老兵，在哈瓦那做着私人承包商的工作。他提出，黑人是独立战争的建筑师，但是“所有的胜利果实”都被别人窃取了。埃瓦里斯托·埃斯特诺斯和他的朋友最初支持自由党；现在他们表达了自己的失望和敌意。自由党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改善黑人的境况。1907 年，通过一个广阔的、渐进的平台，他建立起来一个黑人政党——黑人独立党。这个政党为黑人在公共部门争取了更多的工作。

埃斯特诺斯的母亲是黑人，父亲是白人，出生于奥连特省。埃斯特诺斯游历过很多地方，到过欧洲和美国。他和拉斐尔·塞拉一起去美国考察那里的黑人组织。如果白人可以从美国那里学到东西，那么黑人也一样可以。由于对《普拉特修正案》的合理性产生了疑问，他甚至去拜访了马古恩，并和克劳德尔互通信件交换意见。他希望可以说服美国去关注亚非和古巴的事业。

这个新政党和它的报纸《预见》，开始宣传一种后来被称为“黑人觉醒”的新思想。报纸攻击那些迷恋于欧洲起源的古巴白人，同时提出了古巴人源于非洲的论据，指出在穆斯林时期西班牙曾经是非洲的殖民地。它呼吁废除“白人至上”的移民政策，以及撤销禁止黑人移民的禁令。自由党曾经把公鸡作为他们的徽章，并支持斗鸡的合法化（美国占领时期曾被禁止），而和自由党不同，新的黑人独立党选择了马作为他们的标志。马不仅代表了独立战争中受欢迎的运载工具，而且是约鲁巴人的雷电之神——查果神（the god Changó）。[①]

新政党是与 1902 年建立的政治秩序对抗的第一支政治势力。当它开始在黑人组织内部干扰传统自由党的投票时，就面临着许多无度的对抗行为。过去对海地式革命的恐惧开始在哈瓦那报界复苏，埃斯特诺斯被指控推动了黑人种族主义的发展。他于 1910 年被捕，他的报纸被查封，黑人独立党处于各种威胁的包围之中。国内成千上万的黑人被捕。如此专制的行动增加了白人的恐慌，哈瓦那报纸开始危言耸听地宣称将会有一场黑人暴动发生。黑人已经被适当地扣押，《海洋日

① Helg, *Our Rightful Share*, p. 150，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将马作为其标志。

报》宣称，“因为他们威胁到了白人，更确切地说是白人妇女”。[1] 将于1910年5月19日按照预定时间经过古巴岛上空的哈雷彗星，又使依然迷信的人们增加了说辞，他们认为这预示着白人将遭遇种族大劫难。

123

当哈雷彗星安宁地通过以后，白人的恐慌也逐渐平息。没有发生任何起义；没有出现任何军队；没有出现任何黑人的阴谋。1910年底，埃斯特诺斯被释放，其他的入狱者经审判后也都被无罪释放。但是这已经造成了伤害。这件事情过后，形成了一种政治氛围。在这种氛围之下，国会轻易地就通过了禁止黑人组织任何政治活动的法令。这部被称为“莫鲁亚法”（Morúa Law）的法令是由改革派的黑人参议员提出来的，改革者声称，由于埃斯特诺斯的政党只代表了古巴黑人的利益，它不可避免地会歧视白人，这样就会违反宪法。黑人独立党被取缔。

埃斯特诺斯可以通过两条途径采取行动。他和何塞·米盖尔·戈麦斯有着共同的使命，试图劝说他，如果解除禁令并给黑人提供工作保障，他的黑人支持者将会投票正式支持自由党。另一种方法是，他可以在《普拉特修正案》上大做文章，向美国——古巴自由党自封的担保人提出一个新的提案。他曾经受到马古恩和克劳德尔的友好接待，为什么不期盼着可以从威廉·塔夫脱总统那里获得相同的礼遇呢？埃斯特诺斯将如此试探美国的担保政策是否包括了黑人。

和戈麦斯的谈判没有任何收获，埃斯特诺斯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莫鲁亚法》不取消的话，黑人将为他们的荣誉战斗到底。同时，希望避免美国干预的威胁，他向塔夫脱总统递交了要求会谈的请愿书。虽然该请愿书在美国官僚机构冗长而复杂的传递程序中丢失，但是1912年2月，驻哈瓦那的美国部长向华盛顿方面表达了他个人的观点。他解释说，虽然古巴黑人“曾经一直是政治起义的骨干”，但是他们却都是“在白人领导下”行动。所以黑人的孤立行动将会是无关

---

① Helg, *Our Rightful Share*, p. 172.

紧要的力量：

> 正如实际上一样，所有那些有才能的黑人和有政治倾向的混血儿都深得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欢迎，黑人自己缺少必要的领导力量以及发动一场不受外力帮助的大规模反抗运动的能力。因此，我认为，现在的骚动除了给他们增加一些激情外，不会有任何结果。最多会有一些零星的起义发生，而这些起义必然很快会被对于黑人运动没有丝毫同情心的军队镇压下去。①

这位美国部长低估了黑人领导者的决心。埃斯特诺斯仍然希望可以激起美国的干预，1912 年 5 月 20 日，即古巴独立日这一天，他发动了武装抗议运动。这次行动主要集中在奥连特省，在拉斯维拉斯（Las Villas）聚集了一小队民众。叛民数量多达 4 000 人，另有人估计达到了 7 000 人。　124

美国战舰当月就开始向古巴进发，4 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关塔那摩湾登陆。这是自 1909 年马古恩离开古巴后美国的首次军事干涉，现在伍德将军在华盛顿是军事统帅，他要求迅速加强美国在关塔那摩湾的军事基地的建设。但是美国陆战队并不是来支持埃斯特诺斯和黑人的；他们被派遣来的目的是保护美国在该地区的蔗糖庄园。②

戈麦斯总统对于美国的介入非常不高兴。他自己的军队完全可以独立地进行屠杀，不需要外援。这场镇压是残暴的，约有 3 000 多黑人被杀害。这是一场被古巴白人镇压的种族之战。屠杀持续了 3 个星期。埃斯特诺斯在 6 月 12 日遇害，后被一个巡逻兵意外地发现。他的尸体被运到圣地亚哥，并在蒙卡达（Moncada）兵营举行了葬礼。③

---

① 引自 Helg, *Our Rightful Share*, 190－191 页。

② Jorge Dominguez, *Cuba: Order and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1978, pp. 48－49. 美国干涉的后果之一和关塔那摩基地被重新启用都源于 1912 年 10 月的一个新条约。该条约重申以每年 2 000 美元租借的价格，美国对关塔那摩所具有的权利。

③ Rafael Fermoselle, *Politica y Color en Cuba: la guerrita de 1912*, Montevideo, 1974, p. 167.

围绕这些事情出现了许多争论，产生了一场和“La Escalada”[①]密谋很相似的辩论。这究竟是遭受挫败的黑人暴动，还是政府组织的种族主义大屠杀？就当时的官方来说，这是一次被忠心耿耿的部队幸运地粉碎了的黑人暴动。后来的历史学家对于这一事件也产生了分歧。阿利纳·赫尔格（Aline Helg）把它描述成“一个由政府发起的种族大屠杀”，目的是要歼灭埃斯特诺斯的黑人政党，同时他有证据证明，政府的镇压早在黑人抗议者行动之前就开始了。[②] 另外，特别是路易斯·佩雷斯（Louis Pérez）认为，黑人抗议运动逐渐发展成为暴力的和难以控制的黑人和农民的叛乱。这派理论认为，对1902年共和国建立的不满和失望，使奥连特省之黑人群体的梦想破灭，最后在山上爆发了黑人参与的现在称之为“种族之战”的农民起义（扎克雷[③]起义）。埃斯特诺斯点燃了这根导致大爆炸的导火线。这次暴乱有一个政治目的，但是它超出了选举时期的法律和秩序通常的限定范围，使无政府状态的爆发变得更为普遍。[④]

这些说法之间并不互相矛盾。从1868年以后，各种拿起武器来表达其立场的党派和个人都卷入了古巴政治之中，而1912年埃斯特诺斯的兵谏和1906年戈麦斯领导的抗议运动在原则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时过境迁，有3件事情已经不同了，这对埃斯特诺斯来说是不幸的。这次黑人领导的抗议运动，是自100多年前阿庞特叛乱后的第一次黑人运动；它发生在种族主义者在新闻界大肆宣传的背景下；它主要是在奥连特省爆发的，是自早期西班牙占领以后古巴地方冲突和矛盾的主要集中部分，远不同于戈麦斯在1906年举起义旗的西部省份。

埃斯特诺斯或许曾经期盼他的兵谏会导致一个谈判时期的到来；

---

① 此处似乎有误，疑是与前文“梯刑”密谋起义（Conspiracy of La Escalera）所论事件有关。见本书原书页码第64页。——译者注

② Helg, *Our Rightful Share*. pp. 298 - 299.

③ 此处借用了法国中世纪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典故，扎克雷即农民起义之意。——译者注

④ Louis Perez, *Lords of the Mountain: Social Banditry and Peasant Protest in Cuba, 1878—1918*, Pittsburgh, 1989.

结果却是爆发了种族战争，并且处于1869年勒松迪的志愿者和1896年韦勒集中营引起的恶毒的气氛再次复兴之时。保守党的报纸《新的一天》（El Dia）发表了评论，“这是自由而美丽的美洲，它防卫着来自非洲的威胁”。《新的一天》肯定了美国的私刑可以成为一种使黑人处于控制之下的模式。[①] 他们成立了白人自卫队，强令执行战时法，将军命令部队在奥连特省为记者们组织一场特殊的表演，展示军队的新装备。他们向一个平静的农村发动了攻击，150户农民家庭都在自家的陋舍中被杀害。[②]

圣地亚哥的法国领事写道，“古巴将军下令实行‘再集中政策’，将要在农村清空所有的本地和外来家庭住户，将把所有那些不幸的和毫无还手之力的黑人劳动者、农村工人、咖啡采集者、甘蔗收割者、牧民和仆人交给执行军政府肮脏勾当的无情的刽子手。我因这些黑人的遭遇而感到震惊。”[③]

几十年之后，1912年的这场大屠杀依然铭刻在古巴黑人的记忆之中。他们几乎不再参与政治，或沉浸在音乐之中或回退到他们自己的非洲宗教中，或者参与到古巴白人社会中他们最容易进入的体系——下层士兵和警察中。或许在20世纪20年代马查多（Machado）独裁统治期间，他们才得以向白人报复。之后的独裁者是他们的自己人——弗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

共和国的投机者：马里奥·梅诺卡尔（Mario Menocal）和伯特·克劳德（Bert Crowder）

白人种族主义、暴动、贪污以及美国的军事干涉，是共和国第一个10年的显著特点。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古巴的国家经济得到了惊人的恢复和复兴。当古巴从西班牙时代过渡到了美国时期的时候，新的移民和资金也涌入了古巴，这不止使古巴的制糖产业和相关的铁

---

① Helg, *Our Rightful Share*. pp. 196 – 198.

② Helg, *Our Rightful Share*. p. 211.

③ Helg, *Our Rightful Share*. p. 222.

路网得到了改观，而且也使煤矿和烟草工业、纺织制造业和其他的消费品产业获得了发展。考虑到1898年古巴国家的衰竭状况，这时期的经济复苏是一个显著的成就。

经济复苏的第一个政治上的受益人就是1913—1921年的保守党总统——马里奥·梅诺卡尔-迪奥普（Mario Menocal y Deop）。他的任职时间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任美国总统的时间几乎一致，同时也与使外界对古巴蔗糖产品有了一个稳定需求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一致。1914年至1916年之间古巴蔗糖的收入翻了将近两倍。

一直梦想着在20世纪30年代能够重返政治舞台的梅诺卡尔在同时代的人看来，“更像是一个美国人而不是古巴人”。[①] 他出生于1866年，在康奈尔大学接受教育，后返回古巴在卡利斯托·加西亚（Calixto Garcia）的领导下参加独立斗争，之后在美国军政府中任哈瓦那警察长。当美国人离开以后，马里奥回到古巴希望可以有一番作为，他加入了新成立位于纽约的古巴美国蔗糖公司，并成为了奥连特省查帕拉尔（Chaparra）大庄园的经理，不久之后又成为了一个古巴最成功的制糖企业家。

126

梅诺卡尔，这位腰缠万贯的商人坚信古巴美国蔗糖公司的利益就是古巴的利益。他如此富裕以至于他几乎没有必要在私下里贪污，但是，梅诺卡尔却从古巴国库中，而不是在查帕拉尔制糖厂中得到了更多的财富。他以独裁的方式进行统治，似乎依然是一个无视民主呼声的无拘无束的西班牙海军将领，而且，他统治着这样的一个可以使用国家的钱来高效率地买通人民的政府机构。他推行了许多扩大总统权力的改革，包括通过合并正规军和地方民兵进行军队现代化建设。他还在1915年创办了国家银行，该银行发行了国家的统一货币——古巴比索，与美元的票面价值相等。

虽然，远在欧洲的战争的爆发总的来说给加勒比海地区的发展带

① Louis Perez, *Intervention, Revolution and Politics in Cuba, 1913 - 1921*, Pittsburgh, 1978, p. 3.

来了负面效应：导致海盗增加和贸易崩溃，但在古巴的长期遭受殖民的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却给它带来了巨大的好运，因为战争的需求，糖价急剧上涨。由于德国供应商切断了甜菜糖的供应，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为了满足食用糖的供应，不得不求助于美国，这种情况进一步扩展到了古巴。[①] 大量土地被收购、农民被驱逐、森林被砍伐、种植园荒废了、制糖厂建立起来并引进了新技术。特蕾莎·卡苏索（Teresa Casuso）这位制糖产业寡头组织的后裔，对当时的奥连特地区环境遭受破坏的情景记忆犹新：

我记得……为了种植甘蔗，大到无法通过的森林被点燃，整个林区燃烧起来，被夷为平地。我的父母为失去大量美丽而芬芳的热带林木——如西洋杉、红木和乳香黄连木，以及产量丰富的石榴等——而绝望，这熊熊火焰是对以甘蔗田覆盖乡村的疯狂行为的献祭。晚上，这种遍地燃烧的情景，让我产生了一种陌生的、可怕的焦虑，远处飘来的树木燃烧的阵阵浓香，恰似置身于教堂中所闻到的香味一样。[②]

其他人关注的是那些就像被伐掉的树一样无家可归的农民，他们记述了农民们从他们的土地上被遣散，加入了山上幸存的强盗团体中。[③]

新的土地要有人来耕种和收获，所以种植园主对劳动力十分渴求。被剥夺财产的农民们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变成顺从的劳动力。和在种植园里劳动比起来，原来的黑人奴隶更喜欢为了独立而战斗，而且他们依然对1912年的大屠杀十分愤怒。战争时期，由于航海运输的困难，来自西班牙的移民处于低潮。而从加勒比海雇佣黑人的做法在19、20世纪之交已经被禁止，但是对工人的持续需求使得此后连续几届政府 127

① *Histoira de Cuba*, *La Neocolonia*, *organizacion y crisis*, *desde 1899 hasta 1940*, Havana, 1998, p. 106.

② Teresa Casuso, *Cuba and Castro*, New York, 1961, pp. 9 – 10.

③ *Histoira de Cuba*, *La Neocolonia*, p. 115.

无视现有的立法。庄园主们必须从邻近的岛上寻找劳动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埃瓦里斯托·埃斯特诺斯要求的废除禁止黑人移民的法令，在他死的那年居然获得通过。隶属于美国水果公司的尼佩湾公司（Nipe Bay Company）说服政府允许其从海地输入 1 400 名劳动力，以满足其与查帕拉尔相邻的普雷斯顿种植园的需要。禁止黑人移民这堵墙开始冲出了缺口，在接下来的 10 年里，约有 200 000 名来自海地以及 80 000 名来自牙买加的劳动者为了工作涌入了古巴，这座岛从没有经历过如此的繁荣。[①]

许多工人只在收获季节才会被雇佣。庄园主比较喜欢雇佣海地人，因为收获季节之后他们可以乘船回家，雇主不必在非生产季节继续支付其劳务费。而许多来自牙买加的工人则留了下来，在古巴东部的人口数量中留下了永久的痕迹。美国人比较喜欢牙买加人，正如一个记者所载："在古巴，只有他们是可以做任何美式饭菜的仆人"。[②] 劳动力招募者也重新征用了华工移民，华工的使用在美国占领时期被禁止，亦在 1873 年遭到中国皇帝的谴责。由于满清王朝的统治在 1911 年被推翻，旧的条款不再生效，但在古巴的华人社区中，许多新的华工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

梅诺卡尔乐意从政，1916 年开始策划他的再次竞选，并使用了他惯于使用的政治欺骗手段以确保自己竞选的胜利。马古恩和克劳德尔曾在 1909 年设计了一个详细的看起来又极其简单的选举体系，但是，令每个人都不会感到奇怪的是，历届古巴总统都会用不正当手段操纵选举结果。古巴的人民却仍相信 19 世纪的战争和革命传统。又一次欺诈性的选举意味着又一次的暴乱，1916 年的暴动并不是一个特例。

骗取的胜利引来了混乱，自由党组织了武装叛乱以抗议选举结果，因为后者发现投票数远远多于有资格的投票人，于是呼吁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进行干涉。1917 年 2 月，何塞·米盖尔·戈麦斯在南部

---

① *Histoira de Cuba*, *La Neocolonia*, p. 112.

② Roby Hart Philips, *Cuban Sidehow*, Havana, 1935, p. 259.

海岸登陆，而阿尔弗雷多·萨亚斯和另外两个自由党成员举起了反叛旗帜。这两个人，即格拉尔多·马查多（Gerardo Machado）和卡洛斯·门迭塔（Carlos Mendieta）将在接下来的20年里相继成为古巴总统。这次运动后来被称为“La Chambelona”，即“棒棒糖”（lolipop），是因为在此期间非常流行的一首自由歌曲而得名。

戈麦斯确信在1906年曾对他有所帮助的美国朋友会再次帮助他。但是，美国人现在对于处理古巴事务已经非常有经验，不会总是按照古巴人的期盼做决定。1906年，美国人不情愿地支持了一个在此前4年被他们推上去的古巴政权。现在，古巴已经独立了15年，且正处于投入欧洲战争的前夕，在此情况下，美国更不愿意出面干涉古巴事务。但美国人谴责了自由党的叛乱，并于1917年派遣了2 000名海军，这些海军到达古巴后，和1912年所做的一样，是为了保护美国的蔗糖种植园，而不是像愤愤不平的古巴各政党所要求的那样来解决国家的内部争端。这些海军在岛上驻扎了6年，其中1 600人驻扎在奥连特省，还有1 000人驻扎在卡马圭。 128

美国海军对梅诺卡尔和自由党之间的战争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梅诺卡尔通过从西班牙那里继承来的残酷镇压的方法击败了叛乱。戈麦斯和他的许多支持者一起，被捕并被监禁，但在9月他就被释放，其他的人则在1918年3月被特赦。

当新的竞选开始的时候，梅诺卡尔邀请伯特·克劳德重返哈瓦那并建议制定“选举法修正案”。克劳德早已为古巴人所熟知，目前在美国也很有名气，他主管草案的起草工作。1919年3月，克劳德到达古巴，专心于制作人口统计表和选民名册，以寻求一个更加完善的选举体系，为1920年11月的政治大选做准备。

阿尔弗雷多·萨亚斯在选举中获胜，自由党再一次高呼这是政治欺骗。自由党要求美国再次对新的选举结果进行查证核实。华盛顿方面再次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两国条约的范围是保护个人的生命和财产，但是美国也深知现在形势并不稳定，美国驻哈瓦那的使节在信中提到：

“如果发生骚动和革命，美国的利益将首当其冲地受到侵害”。[①]

美国海军自1917年就一直驻扎在古巴，但是威尔逊总统更喜欢政治的而不是军事的干预。1921年1月，克劳德作为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被再次派往哈瓦那。他乘坐美国的战舰——明尼苏达号到达古巴，战舰停靠在哈瓦那港，克劳德在轮船的甲板上就开始进行斡旋，以防止暴乱进一步扩大，并着手解决选举争端。

1921年3月，举行了新的总统选举，这次选举是在一种暴力的氛围下进行的，自由党人担心再次成为政治欺骗的受害者，在选举中弃权。一直对美国抱有希望的戈麦斯前往华盛顿向新任的美国总统沃伦·哈定（Warren Harding）求救，要求美国进行干涉。哈定总统对此不感兴趣，6月戈麦斯在纽约逝世。这位古巴领导人曾千方百计利用各种关系寻求美国干预古巴事务，如此的固执和张扬，最后却没有参与竞选。5月，阿尔弗雷多·萨亚斯成为了古巴总统。

选举的欺骗行为与更严重的危机比起来不免相形见绌。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影响到了蔗糖的生产和价格。由盎格鲁—美国委员会确定的世界蔗糖价格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一直很低，1磅原糖的价格是4.6美分。1919年对蔗糖的控制措施被废除，在1920年最初的几个月里，蔗糖价格迅速地飞升，3月达到了每磅10美分，而5月又达到了20美分。这种不可思议的但却是短暂的时刻是受制于著名的“dance of the millions”（舞百万）事件[②]，正如在古巴的美国蔗糖公司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一样，这些财富很快就丧失了。这种状况在1920年6月达到了顶峰，之后蔗糖价格突然急剧下跌，到11月竞选开始时，每磅蔗糖的价格比原来的4美分还要低。

129

现在古巴银行失去了美国制糖公司曾经赢得的东西。他们要求延

① 引自 Thomas, *Cuba*, 2nd. edition p. 548。

② 相关学者的研究说明，这是一次被大财团所操纵的事件。详见 Kevin Grogan, *Cuba's Dance of the Millions: Examing of the Causes and Concequeces of Violent Price of Fluctuation of Sugar Market between 1919 to 1920*. University of Florida, 2004 硕士论文，http: //etd. fcla. edu/UF/UFE0006301/grogan_ k. pdf (2010 - 11 - 17)。

长债务偿还期至1920年10月，而事实上这一要求也得到了批准。政治和财政危机交互纠缠着古巴，不久就使它崩溃了。1921年4月，国家银行被迫宣布破产。它的控股股东在自己公寓的阳台上自缢。6月，整个古巴的银行体系瘫痪，许多银行家逃亡海外。只有少数的外国银行，主要是美国银行还在继续运营，他们通过购买那些已经破产了的工厂主的制糖厂，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实力。

曾经的富有者，现在却一无所有。古巴迫切需要美国的帮助，这次需要的不是海军的武力支持，而是大量的贷款。萨亚斯组织的新政府试图贿赂几个美国银行，这些银行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要求仍然停留在明尼苏达号船上的罗伯特·克劳德担保。克劳德此时充当了财政专家和顾问的角色，他拟了一个草案，萨亚斯负责将这份草案公布于世。政府的预算要削减，现行的合约要重新审核，将来的工程要经过国会的同意，即按照美国的方式来执行。克劳德和萨亚斯各自独立地工作，但是又在一起致力于改革政府官僚机构和根除腐败。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1922年，美国人承诺的贷款最终下拨到了古巴。克劳德作为新的美国大使和美国银行家的担保人继续留在哈瓦那。

1906年、1912年和1917年美国人对古巴的军事干预，为不稳定不可靠的古巴政府维持和平和安全提供了支撑。1921年克劳德的干预是一种新的和以往不同的方式，更加直接的与困难时期美国的投资和贷款的保护有关。古巴成了一个重要的巨大财富的生产地，美国的公司和个人深深地卷入财富的生产中，他们从事各种活动。银行家和商人、工厂和种植园主、铁路经营者和简单的小投资者，他们都希望美国可以保护他们的利益。此时，古巴除了其名义上的共和之外已经完全沦为了殖民地。

独裁下的共和：格拉尔多·马查多——热带的墨索里尼(Mussolini)

1924年的总统竞选依然充满了暴力和欺诈，这次自由党获得了胜利。这是自1909年后，他们第一次获得胜利。自由党的候选人格拉尔

多·马查多－莫拉莱斯（Gerardo Machado y Morales），是一个典型的自由党军事独裁者，与共和党第一代的腐败官员别无二致。马查多把自己看作是戈麦斯总统的政治继承人。他很受欢迎，不只是对传统的自由党选区的选民有吸引力，对军队、警察、自由政党、商人团体和美国大使馆也同样具有吸引力。

130

如果是管理19世纪的那些拉美共和国，马查多应该算是训练有素的，但他却在20世纪20年代，即在蔗糖价格的暴跌、股票交易彻底瘫痪以及国家财政长期无序的时期当上了古巴总统，于是他发现，国家面临的情况比早些时候要困难得多，他的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也是相对残酷的。他把政府变成专制的独裁政府来应付当前的局面，这种独裁是那一时期世界其他地区风行的方式，古巴也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共产主义学者的领袖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Julio Antonio Mella）用了一个让人难忘的短语，即"热带的墨索里尼"来描述马查多。

和以前的总统比起来，马查多有着低微的出身。他于1871年出生在圣克拉拉，曾经是当地的屠夫，出身于一个偷牛贼的家庭。他们往往是在白天处理掉在晚上盗来的赃物。在古巴独立战争中，他加入了叛乱者队伍，之后升任指挥官，在和平时期转向自由政治派。1900年被选为圣克拉拉市长，是何塞·米盖尔·戈麦斯的合作者。当自由党人变成了古巴军队建立后的主要受益人时，马查多从中受益。1909年，他被任命为武装部队的副指挥，之后成为内务部长。他在"La Chambelona"起义，即1917年的自由党战争中非常地活跃。

在向政治阶梯攀爬的同时，马查多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圣克拉拉市控制着电力公司，随后在卡米达（Carmita）掌控着制糖中心。20世纪20年代，又成为了实力强大的隶属于美国公司的古巴电力公司（Compania Cubana de Electricidad）的经理，由于电力价格的居高不下，许多年来这家公司往往成为古巴民族主义斗争的对象。美国老板对马查多的政治竞选给予了财政上的支持。

马查多的经商经历是他使用得最成功的资本。罗伯特·克劳德注意到了这一点，马查多就像是"在半独裁权力位置上的一个有才智的

主管”。[1] 不久以后，马查多开始从美国人身上学习经验。既然每隔几年美国的代理领事可以召集顾问前往古巴，重新为古巴起草选举法，为什么古巴总统不可以让国会做相同的事情呢？他筹备了一个与自己意见一致的国会，通过颁布法令加强对所有政治党派的控制。法令严禁建立任何新的党派，禁止旧的党派重组。通向一党专政的道路已经定型了。马查多的权力建立在军队之上，而且很快成为国内最具权势的政党。

19 世纪令老自由党害怕的是，古巴的独立会遵行拉美或加勒比海的模式，即出现军事独裁（*caudillos*）或建立黑人统治。事实上，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这些担心因为马查多的军事独裁而实现了。1928 年，马查多将他的总统任期又延长了 6 年，却没有引起要求重新竞选的麻烦。

131

直到 1927 年，罗伯特·克劳德一直担任着美国驻哈瓦那大使，看到自己制定的保护性措施正常运行，他相当地自豪。1927 年 2 月，他写到，“大多数的古巴人”对（马查多的）第二个任期是赞赏的，自从马查多支持同美国进行“最可能的合作”以后，美国国务院给他提供了一些“非正式的”保证，以确保不会有人反对他的连任。[2] 在克劳德看来，马查多在困难时期的执政是非常成功的，他的经济政策也是非常明智的。事实上，这些政策预示着罗斯福新政的一些设想。为了解决失业问题，马查多实施大规模的公共工程计划，其中包括建设全长相当于整个岛屿长度的中央公路，以及模仿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在哈瓦那市中心建立国会大厦。这些有影响力的建设工程主要是在没有开始收割甘蔗的非生产季节集中进行的。对于那些在禁止黑人移民时期蜂拥来到古巴的成千上万美国公民来说，这个岛屿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和时尚的度假胜地。他们陶醉于这里优美的音乐旋律、黄金海岸、明媚的阳光以及甜酒之中。很少有人会去关心这个国家的政治。

① Thomas, *Cuba*, 2nd. edition p. 587.

② Thomas, *Cuba*, 2nd. edition p. 584.

古巴人对马查多的指责要比美国游客多。长期的财政危机、经济的不稳定以及马查多对政治体系的操纵，产生了任何一任总统都难以应付的相当大规模的反对势力。在前面冲锋陷阵的大多是老一代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幸存者，他们大多是新成立的退伍军人和爱国者协会的成员。马查多对国会的控制意味着这些新团体几乎没有机会通过合法途径重返政治舞台。卡洛斯·加西亚·维勒斯（Carlos Garcia Velez）将军是卡利斯托·加西亚的儿子，于1924年4月马查多就任前，在西恩富戈斯附近组织了武装暴乱。他用同样的语言谴责克劳德手下人的贪污和腐败，但是他的美国朋友却只为他提供了很少的帮助。柯立芝总统派克利夫兰号前往哈瓦那支持古巴政府，叛军很快就溃败了。[①]

几年以后，一个相似的团体组织了另一次叛乱，几乎是这种类型叛乱的最后一次。前总统梅诺卡尔和前总统戈麦斯的儿子米盖尔·马里亚诺·戈麦斯（Miguel Mariano Gómez）以及受到民众欢迎的哈瓦那市长卡洛斯·门迭塔上校一起，要恢复"La Chambelona"起义的精神。他们组织了一个右翼团体——民族主义者联盟（Union Nationalista），从武装部队中寻求反对马查多势力的支持者。他们也希望获得美国的支持，搞一次政变，当这种期盼没有实现时，他们转而发动了武装叛乱。梅诺卡尔和门迭塔从哈瓦那游艇俱乐部出发，在位于比那尔德里奥省境内的里奥韦尔迪登陆。这种旧式的行动太过轻率了，他们很快就被扣押和监禁。

其他人的遭遇也很悲惨。埃米利·劳伦特（Emilio Laurent）和塞尔吉奥·卡尔沃（Sergio Carbo）领导的40人小部队在奥连特省的北部海岸希瓦拉登陆。他们坐火车提前到达了奥尔金省（Halguín），但很快遭到攻击。虽然劳伦特和卡尔沃成功逃了出来，但是其他的大多数人遭受了酷刑甚至被杀害，几个无辜的希瓦拉居民也在劫难逃，在爆炸中遇难。[②] 另一个东部小组在安东尼奥·吉特拉斯（Antonio Guit-

132

① David Lockmiller, *Enoh H. Crowder, Soldier, Lawer, and Statesman, 1859—1932*, St. Louis, 1955, p. 24

② Thomas, *Cuba*, 2nd. edition p. 593.

eras）的领导下，试图占领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但是也失败了，他们被俘并被监禁。

希瓦拉事件只是那些经历过独立战争的那一代人的绝唱，随后的小规模战争大多数是在古巴总统竞选活动期间出现。独立战争中的一些老兵，有的已经离开人世，或者已是耄耋之年，而且多数都已经声名狼藉。

在马查多独裁统治时期，社会上开始出现一些其他的势力团体。自从19世纪奴隶暴动以后，古巴的工人已经不仅仅是不安分了，而且开始走上创建自己组织的道路。和西班牙及拉丁美洲一样，古巴早期的工人运动传统也是根植于无政府主义。一个规模较小的工人组织，古巴工人阶级全国联合会（CNOC）[①]于1925年由无政府主义者创立，吸收了决心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小团体。20世纪20年代，无政府主义者的奋斗激情开始逐渐减弱，部分是因为已经成功的俄国革命的吸引力。俄国革命预示着，适当的纪律对政治运动可能是有用的，另外也是因为马查多杀害或是驱逐了一些重要的无政府主义领导人，或者是把他们喂了鲨鱼。[②]

1925年8月，一些深受俄国革命影响的社会主义者成立了一个早期的共产主义政党。1931年，它已经足够成熟并取代了古巴工人阶级全国联合会。几个比较重要的古巴共产主义者是来自东欧的犹太人——一个新的民族投入了古巴的多民族混合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发现说意第绪语还是要比说西班牙语容易得多。[③]荣格尔·塞姆乔维奇（Yunger Semjovich）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他用法比奥·格罗瓦特（Fabio Grobart）的名字在古巴生活，直到1959年革命的前几年。民族主义左翼和右翼都普遍对共产主义者缺乏信心，他们被看作是

① 其全称是：Confederación Nacional Obrera Cubana。——译者注

② 从岬角城堡中将持异见者抛入大海是古巴人的传统。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人学会了这一方法，只不过他们是把持异见者从飞机上扔下去。

③ Thomas, *Cuba*, 2nd. edition p. 577.

"外来人"、"犹太人"，另外，对莫斯科的依赖也是古巴共产党发展面临的障碍之一。梅利亚是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一个杰出的学生演说家，1929 年在其流放墨西哥期间被暗杀，暗杀令是马查多下达的。当时梅利亚和意大利摄影师蒂娜·莫多蒂（Tina Modotti）一起在外面散步，他死在迪亚戈·里维拉①（Diego Rivera）的家中。

和大多数的古巴政治家一样，梅利亚来自于中产阶级，但是共产主义者比其他任何反对马查多独裁统治的运动都更加地"强调工人利益"。这一党派与似乎也号召关注黑人利益的中产阶级政党比起来，对黑人更为关注。他们主要的目标就是把工厂、蔗糖和烟草种植园、铁路行业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这样不可避免地就会使他们与黑人民众联系在一起。对于黑人在共产党中担任领导职务，共产主义者没有任何偏见，而且，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一个短时期内，他们支持了在奥连特省建立一个黑人共和国的想法，因为在奥连特省黑人占据了当地人口的大多数。

从自身的立场来看，马查多别无选择，只能将这些各种形式的反对运动扼杀在萌芽之中，他也这样做了，以罕见的残暴行动镇压了这些运动。对梅利亚的谋杀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这次行动是在外国进行的，而不是发生在本国。古巴一直都是一个暴力社会。奴隶主带着猎狗，拿着鞭子监督工人的传统依然存在，机关枪取代了砍刀成为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那些参与罢工和其他反对活动的人，在马查多统治时期首当其冲成为被镇压者。在拉丁美洲各国的统治中，古巴并不是一个特例。用武力镇压工人的示威集会，在其他地方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133

这种镇压不久就影响到了社会上那部分不习惯于接受这种暴力方式的人，特别是那些大学里的中产阶级学生，他们的父母不想他们被枪杀。一个激进的学生组织"大学生指挥部（Directorio Estudiantil）"在哈瓦那大学建立，以对抗马查多政府的独裁行为。这个组织的出现

① 墨西哥画家，活跃的共产主义者。——译者注

基于 20 年代在每个拉美国家中都普遍存在的学生们的热情，这种情景和之后 1968 年出现的氛围非常地相似。大学生们完全是来自于中产阶级，与遥远的俄国革命比起来，1918 年发生在科尔多瓦的阿根廷学生暴动对这些学生的影响更为强烈，因为这次暴动把学生带到了政治变更的最前线。他们毫无保留地接受反帝国主义的思想，但是有时对社会主义又太过于谨慎。1927 年马查多解散了学生指挥部，这就迫使学生采取更加激烈的反对方式。

20 世纪 30 年代，时代的变迁把新的思想和新的领导人带到了时代的前沿。拥有各种不同目标和动机的各种秘密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激增。所有这些组织建立的目的都是要结束马查多的统治，许多人漫无目的地从一个组织转入另一个团体，只为寻求有效的行动而不是思想上的纯洁性。[①] 随着马查多当局压迫的加重，这种莽撞的反对马查多的尝试变得更加激烈。经历了 30 年有名无实的独立后，古巴依然充满了贪污腐败和暴力动乱，处于马查多的黑暗统治之下，有时候甚至很难区分具有政治动机的武力团伙和一般的罪犯。

1930 年 9 月，大学生指挥部作为一个秘密组织被重建，不久之后，就开始着手准备一系列的暴力运动、恐怖主义以及暗杀。6 个月后，更多的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激进学生从这个组织中分离了出来，组成左翼学生组织（Ala Izquierda Estudiantil），和其他组织一样得到了劳尔·罗亚（Raul Roa）的支持。另一个反对派组织——革命联盟（Unión Revolution）是安东尼奥·吉特拉斯·霍姆斯（Antonio Guiteras Holmes）创立的，他是反对阵营中最激进的左翼代表人物。安东尼奥原来是“大学生指挥部”的领导人之一，后来在 1931 年的运动中分离了出来。他放弃了化学研究，全身心投入政治运动之中，暂时与“民族主义联盟”并肩作战。

第三种密谋运动由于安全原因自我标榜是 ABC，成立于 1931 年 9

---

① José Tabares del Real，“Proceso revolucionario：ascenso y reflujo（1930—1935）”，chapter 7 of *Historia de Cuba*，*La Neocolonia*，the third volume of the History of Cuba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o de Historia de Cuba.

月，重点强调“年轻人”加入，并要和过去划清界限。尽管马查多已经步墨索里尼的后尘，但是一些曾经与他同一阵营的主要右翼势力也开始反对他。ABC 和西班牙长枪党的一些特点非常相似，但是从政治谱系来看他们似乎更接近意大利未来主义者和墨索里尼。ABC 的领导者是马丁涅斯·萨恩斯（Martinez Saenz）和卡洛斯·萨拉德里加斯（Carlos Saladrigas），这两个人都是中产阶级律师，还有受过法国教育的作家茹热·马纳赫（Jorge Manach）。

134

1932 年初，ABC 发表了其宣言——纲领，这个纲领建立在 1919 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纲领的基础之上。这是激进右翼势力的一个民族社会主义计划，它反对美国的商业利益，支持企业间的联合、号召政府控制公共服务领域以及呼吁“古巴人优先”。它计划取缔文盲的选举权，从中可以看出其浓烈的法西斯色彩，在古巴，这显然是针对黑人。没有人揭示过 ABC 组织究竟代表着哪一方的利益，但是一些共产主义者多少正确地解释道，它就是古巴白人协会（Asociación Blanca de Cuba）。[①]

和它的理论倾向相比，ABC 组织之实际行动的意义更加重要，因为在 30 年代早期，对所有的学生团体来说，很容易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外国势力的影响，而没有看清古巴的现实情况。许多人可以天衣无缝地从一个团体转到另一个组织，ABC 有时候会和大学生指挥部合作。尽管思想意识不一致，但是反对马查多的运动，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势力都倾向于暴力运动，他们相信反对政府的恐怖策略——轰炸政府建筑和袭击政府工作人员——就是他们唯一有效的武器。他们对恐怖政治的使用和同一时期发生在欧洲的运动非常相似，这些运动也和古巴过去的革命相同。ABC 可能希望这样就可以成为美国干涉的原因，吉特拉斯的“革命联盟”和“大学生指挥部”对这种要求是强烈反对的。

---

① Thomas, *Cuba*, 2nd. edition p. 594. Thomas 转引自 C. Gozalez Peraza, *Machado, Crimenes y Horrores de un regimen*, Havana, 1933, 115－150 页。关于 ABC 党的细节在 Tabares del Real, “Proceso revolucionario” 一文中有总结。

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暴力革命起因是1929年10月华尔街的崩溃[①]后引起的毫无希望的经济形势。虽然古巴政府实行了强力压制，但是它不可能轻而易举地从这种影响岛国的经济危机中走出来。在经济萧条期间，古巴又遇到了一场加勒比海飓风。仅仅用一个经济指标就可以测量这次经济灾难对古巴造成的影响。古巴蔗糖产量的实际产值从1929年的将近20亿美元暴跌到1932年的4亿美元。[②] 直到1991—1994年，这个岛国才再次经历到与这次经济大灾难相似的情况。马查多政府缺少可以使古巴渡过这次危机的建议和办法。超过1/4的工人失去了工作、上百万的人口面临着饥饿的威胁，随后就爆发了政治暴动，这远远超出了国家能够控制的范围。

这次经济风暴导致全世界很多国家发生了政治剧变和革命，拉丁美洲也处于这种经济风暴之中。1932年1月，在萨尔瓦多发生了著名的农民暴动；同年6月，在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叔叔玛尔马都克·格罗维（Marmaduque Grove）领导下的一次智利空军起义建立了一个短暂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美国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的时期。一个由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领导的新政府于1933年1月诞生。美国人接受了罗斯福的“新政”，拉丁美洲人民则得到了美国人与之实行“友好邦交”的承诺。罗斯福对驻华盛顿的古巴大使声明，他“无意于干涉”古巴事务。美国唯一的责任是保证“在古巴人民中没有饥饿和混乱”，仅此而已。[③]

135

1933年的新任美国驻古巴大使是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他在20年代曾是克劳德的一个随从人员，对古巴的制糖工业十分熟悉。韦尔斯和罗斯福曾在格罗顿就读于同一所学校，和西奥多·罗斯福曾经与伍德将军的关系一样，他们也有着亲密的关系。罗斯福询问马查多，他是否可以接受让自己的这位老朋友作为一个特殊

① 此即1929年的经济危机之开端。——译者注

② Tabares de Real, “Proceso revolucionario”, p. 238. 1929年的精确数字是198 661 078美元，1932年为41 862 427美元。

③ 引自Thomas, *Cuba*, 2nd. edition, 620页。

的外交使节，就像克劳德曾经所做的那样，但是古巴总统要求韦尔斯应该作为美国驻古巴的大使。马查多不可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韦尔斯可以根据形势下达指令和许可。如果需要，他还可以解除马查多的政治权力。

这种困难局面在夏季就开始酝酿起来。7月，在哈瓦那发生了公共汽车司机总罢工，以反对在城市交通中增加出租车的数量，结果导致警察和司机的血腥对抗。其他的工人，如有轨电车的司机、货车司机、印刷工人和码头的装卸工人也加入了这次罢工。到8月，本属于一次普通的工人抗议运动已经发展为全社会的总罢工，其弦外之音就是叛乱。

韦尔斯一直站在幕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许多富有的古巴人相信革命即将爆发，并希望美国可以遵照《普拉特修正案》的条款进行军事干预。美国军队在他们的基地——关塔那摩湾早已整装待发，准备再次进行干预，支持古巴政府。在邻国——自1915年以来一直处于美国军事占领之下的邻国海地的另一支美国军队也警戒起来。[①] 但是他们并没有接到行动的命令。

没有美国的帮助，马查多难逃厄运。经济崩溃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四处爆发的罢工运动，另外还有来自高层官员的压力——最后是来自韦尔斯的压力——马查多被迫辞职。8月12日，他离开古巴前往拿骚（Nassau）。[②] 他的倒台比韦尔斯预想的要快得多，同时导致了20世纪古巴第一次革命。

革命者的共和国：安东尼奥·吉特拉斯和1933年革命

1933年革命可以分为3个不同的阶段，因为每一支进行秘密反对马查多运动的团体都轮番从地下走到台前来主持他们的政府。第一阶段带有半法西斯主义的色彩，只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其政治支

① 美军对海地的占领直到1934年。

② Charles Thomson, “The Cuba Revolution: Fall of Machado” *Foreign Police Reports*, II. No. 21, 18 December 1935, p. 24.

持者来自于 ABC。第二阶段是一次激进的极端左翼势力运动，其领导者来自大学生指挥部，领导者是安东尼奥·吉特拉斯，坚持了 4 个月。第三个阶段是从 1934 年到 1939 年持续 5 年之久的反革命运动，其政治特色源于弗尔亨西奥·巴蒂斯塔——一个值得称颂的马查多的继承者。 136

一开始，有序的权力交接导致一个临时总统的任命，事实上是由萨姆纳·韦尔斯选择了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Carlos Manuel De Cespedes）担任临时总统，他是 1868 年独立战争的著名领袖塞斯佩德斯的孙子。他曾经在马查多的统治下担任部长职务，得到了 ABC 中有法西斯思想倾向者们的支持。他组织的右翼势力政府，特别是其亲美内阁，所做的只不过是主持马查多国会的解散工作和无助地任由暴乱肆虐。

他们无法控制，也无法疏导民众激情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爆发。由于缺少警备力量，哈瓦那面临的形势更加戏剧性。马查多的那些警察在民众的暴乱之前，就已经明智地四处溃逃了。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中，许多人被处以私刑，成千上万的人民惨遭杀害，许多房屋被洗劫一空。

英国驻古巴的大使格兰特·沃森（Grant Watson）描述了这种复仇的场景，“在当时的目击者心中，留下永远痛苦的回忆”，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发现哈瓦那的中产阶级也参与到抢劫中是出乎意料的。晚饭后从大使馆的窗户向外望出去，他看到了一伙疯狂的群众把他的邻居家洗劫一空，这个邻居是马查多的一个议员。他发现了“一个混乱的场景，因为黑人为了留声机、护士为了大披肩而大打出手，富有的家庭开着帕卡德和卡迪拉克到来，夺取了路易十五的柜橱和镀金的椅子。”①

独裁统治的压力解除以后，不仅仅是哈瓦那，整个国家都面临着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这远远超出了任何政治集团可能操纵或控制的范围。一股骚乱和动荡的浪潮横扫着那些甘蔗种植区，并扩展到了远

① 引自 Thomas, *Cuba*, 2nd. edition, 620 页。

处的工厂区。年轻人和老人、黑人和白人、常住居民和新移民者——每个人都被这种革命热情所感染。一年之后，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的一伙古巴研究专家提供了一份有关夏季大剧变的清晰报告。他们曾访问古巴，对这一革命之年的大事件进行报道。他们描述了 8 月 21 日卡马圭的蓬塔·阿莱格雷（Punta Alegre）对制糖厂的第一次占领：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工人控制的工厂数目估计达到了 36 个。据报道，苏维埃政权已经在马拜（Mabay）、哈罗努（Jaronu）、塞纳多（Senado）、桑塔卢西亚（Santa Lucia）和其他地区的中央机构中组织了起来。各地的糖厂经理成为工人的阶下囚。工人武装队伍组织了起来，他们的武器装备有棍棒、手杖以及少量的左轮手枪，红色的臂章被视为统一的制服。工人和士兵以及警察保持了友好的关系。

在运动的第一个阶段中，发生在卡马圭和奥连特省的示威游行经常是一个工人、一个农民和一个士兵走在前面。在圣克拉拉、卡马圭和奥连特省的一些中心地区，工人不仅占领了工厂，而且掌控了公司的铁路系统，并把他们的控制力扩展到了许多附属的港口、邻近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

137

救济委员会向这些罢工者和他们的家庭提供食品，有时候甚至变成了罢工区域全部人口的生活委员会。在许多地区，这些救济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农业工人耕作。①

在这种持续笼罩着乡村的革命氛围和伴随着充斥整个哈瓦那街头的暴力以及那些紧闭着的大门背后的各种政治阴谋的背景下，塞斯佩德斯和 ABC 很难幸存。9 月 4 日，一场毫无计划的不曾预料到的政变把他们全部清除了。在哈瓦那郊区的巨大军事基地——哥伦比亚营的军事总部发生了一场暴乱。一伙存在不满情绪的部队军官发动了军事

① *Problems of the New Cuba*,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New York, 1935, p. 183；亦见 Samuel Farber, *Revolution and Reaction in Cuba, 1933—1960, A Political Sociology from Machado to Castro*, Middletown, Conn, 1976, p. 39。

政变。这些军官害怕幸存的马查多政府官员发动政变，遂提前起事。他们成立了一个由军官、下士和官兵小团体组成的革命政治集团。

他们的领导人中，最优秀的是31岁的弗尔亨西奥·巴蒂斯塔·萨尔迪瓦（Fulgencio Batista Zaldivar），他是一个典型的奥连特省出生的混血儿。这次军官领导的兵变是一次奇迹般的、意想不到的事件，在通常由下层阶级发动政变的拉美国家的历史上，这只是一个特例。不久之后，一小撮来自"大学生指挥部"的教授和学生领导人利用了这次兵变，这些学者们曾经阅读过革命指南，也曾经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制订秘密计划。他们前往哥伦比亚营，和士兵一起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奋斗，并且协助组建临时革命政府。塞斯佩德斯政府被士兵和学生组成的联盟所取代。同一时期的一个关于军官行动的报告解释了士兵和学生结盟的原因，这个报告的作者是《纽约时报》一个记者的妻子鲁比·哈特·菲利普斯（Ruby Hart Phillips），她是一个见闻广博的人。她的描述可能足够接近当时的情景：

> 这些军官意识到国内的人民不可能支持无名军官领导的军事政府，因此他们派出汽车，并电话通知大学教师中的成员、"大学生指挥部"的成员以及其他知名的激进分子火速赶往哥伦比亚营。所有这些激进分子和学生都冲进了哥伦比亚营，认为这就是他们所预谋的计划；当他们到达后才发现，这其实是军官们的阴谋，但是他们认为只要他们参与，这个密谋和其他任何密谋都会一样奏效，因此每个人都高呼"共和国万岁"。[①]

聚集在哥伦比亚营的士兵和学生发布了一份《告古巴全国人民书》，并于第二天公布。这份宣言是由报社编辑塞里戈·卡尔沃（Serigo Carbo）起草的，他曾参加了1931年在希瓦拉失败的登陆，16名市民、两名老兵和巴蒂斯塔共同签署了这份宣言，巴蒂斯塔在其签名旁 138 ·

① Hart Phillips, *Cuban Sideshow*, p. 112.

边给自己加上了“全古巴军人革命首席士官”的头衔。[1]

宣言中概括了稳健的计划要点，即期待召开国民大会重新制定宪法、组成法庭审理马查多的罪行。它寻求对私有财产，包括国民与外来移民财产的保护；承诺将偿还前任政府欠下的巨额债务；重建和平和正义。这是由中产阶级学生组成的大学指挥部的胜利，是该指挥部的计划纲领的胜利。

整个8月，更激进的学生领袖十分警觉。一方面是由于塞斯佩德斯和萨姆纳·韦尔斯结成了同盟，另一方面，马查多的军队在他离任之后依然是完整的。部队军官的叛乱对激进分子来说是天赐之物。普通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士兵开始拿起武器反对那些贪污腐败、享有特权的军官们。这是出人意料的，但却是革命中最有意义的发展。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革命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塞尔吉奥·卡尔沃曾告诉《纽约时报》，随着“欢快的呼唤声”，共和国已经“脱离了美国大使馆的控制”，成年了。[2]

在由卡洛斯·普利奥·索卡拉斯（Carlos Prio Socarras）和爱德华·多奇瓦斯（Eduardo Chibas）签署的声明中，大学生指挥部强调他们自己的组织在革命中的地位，强调他们反对的是“美国大使控制下的无生命的政府”，并且有必要整顿、清洗武装人员：

> 鉴于国家目前的混乱状态、没有任何权威性的原则可言、许多受马查多影响的人依然留在军队中，大学生指挥部决定和军队中相对纯洁的，即那些有极大爱国热情和责任感的部分成员，共同发起革命行动，我们的斗争是积极进取的，但是没有必要采取暴力形式。我们是在以这个方式来洗涤军队使其光荣统一——由于这支军队的头目们与马查多的勾结，它已经处于声名狼藉的边缘。[3]

---

① Tabares del Real “Proceso revolucionario” p. 303.

② 引自 Hart Phillips, *Cuban Sideshow*, 115页。

③ 引自 Thomas, *Cuba*, 2nd. edition, 640－641页。

上述“欢快的呼唤声”的最后转折，是来自于街头黑人群众的暴乱，这很快在哈瓦那的美国人和古巴本国的白人精英中引起了惊慌。来自于外交政策协会的美国研究人员描述了“在起义的领导人中间的黑人如何攫夺蔗糖厂的财产以及如何向那些工厂经理提出过分的要求”，注意到了“担心黑人的暴乱将再次控制古巴的大部分人口”。[①] 鲁比·哈特·菲利普斯在她的日记中以美国观察员的口气，记录了9月革命后的一天在宫殿阳台上所看到的情景：

> 城镇里的所有黑人都在那里，很明显，他们甚至没有打算回家吃午饭，或者他们可能认为新政府应该提供午饭。巴蒂斯塔中士已被证明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善于煽动人们情绪的演说家。他确实很好，但是他最好再谨慎一些，那些黑人并不理解“这个岛屿是完全属于他们的”这种观念的深刻含义，他们注重的只是眼前的利益。[②]

139

鲁比·哈特·菲利普斯是杞人忧天。不久之后，白人再次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很快转而反对黑皮肤的巴蒂斯塔。巴蒂斯塔也同样声明了他的立场。在宫殿的阳台上，他抛弃了那些学生革命者，转而去与萨姆纳·韦尔斯会面，这显然是基于他自己的要求。最初，韦尔斯非常恐慌，害怕情况会恶化，于是召集了更多的美国战舰停靠在哈瓦那港口，但是巴蒂斯塔凭借其无限的个人魅力和明朗的微笑，给这位紧张的大使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双方进行了频繁的接触。

巴蒂斯塔的执政团队选择了一个富有的医生兼大学教授，原来支持大学生指挥部的拉蒙·格劳·圣马丁（Ramon Gran San Martin）博士作为新任总统。9月10日，他宣誓就职，由于他根本无力在这次革命中控制局面，仅在任4个月。巴蒂斯塔和军官仍然在幕后工作，而学生们则通过斗争努力解决他们自己之间的争端。

---

① *Problems of the New Cuba*, p. 33.

② Hart Phillips, *Cuban Sideshow*, p. 115.

格劳的革命政府在一开始就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是来自安东尼奥·吉特拉斯的革命联盟的激进团体，一派是来自大学生指挥部的温和分子。吉特拉斯占据了最有权势的职位，被任命为内务部长、战时大臣和海军部长，对陆军、海军和警察部门拥有名义上的控制权。他的盟友古斯塔沃·莫雷诺（Gustavo Moreno）主持交通工作，爱德华多·奇瓦斯负责公共工程项目。现在吉特拉斯是革命的领导人之一，成为何塞·马蒂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之间的纽带。他的政治思想和行动预示了20年后卡斯特罗的思想和行为，然而在一个腐败的时代，他的清廉和简朴的作风是比较引人注意的——据说他仅有一件套装——却使他成为马蒂的后继者。这3个人都深受爱国主义的影响。

吉特拉斯出生于1906年，父亲是古巴人，母亲是英国人。在一定程度上说，他是在美国长大的。他是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不久又被社会主义吸引，虽然美国的驻哈瓦那大使习惯把他描述为共产主义者，但实际上他并不支持共产主义。和其他的学生领导人一样，吉特拉斯也长期从事秘密组织工作。1931年，他脱离了大学生指挥部，建立了“革命联盟”。之后，1934年，他组织了新的运动——古巴青年组织（Joven Cuba），呼吁实现社会主义；提倡大陆改革、实行工业化以及建造本民族的船舶公司；希望通过武装斗争和对军队的渗透达到这些目标。

吉特拉斯的观点反映了他受到了从奥古斯特·布朗基（Auguste Blanqui）到让·雅克·饶勒斯（Jean Jacques Jaures）的一种折衷混合的革命理论的影响。他从墨西哥和俄国革命、爱尔兰革命和尼加拉瓜的桑地诺（Sandino）游击运动中得到启示。他支持那个时代的以无政府主义为根基的反帝政策，提倡乡村和城市武装斗争、袭击部队兵营、暗杀警察和政府官员。他是一个坚定的主张直接行动的人，接受了布朗基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以行动达到宣传目的的思想。他的唯意志论和对暴力运动的偏好受到了共产主义者的批判。

140

格劳的政府面对着无数的敌人。首先是法西斯组织ABC的死硬分子，还有以梅诺卡尔为核心的旧保守主义者和以门迭塔上校为核心的

自由主义者，他们共同组成了国民联盟（Union Nacionalista）。最后是军队中的高级官员，他们是马查多时代的残存分子。许多人在奥古斯特暴乱时期一直受辱，现在他们面临的选择是发动一场政变还是流亡国外。巴蒂斯塔和一些军官的积极活动使得发动政变更加困难，于是大多数人决定离开本国，流亡海外。

萨姆纳·韦尔斯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扫清了道路。在9月军官政变造成的恐慌中，韦尔斯将古巴的美国人召集在马雷贡（Marecón）海滨大道上的宏伟建筑物——古巴国宾馆集中。韦尔斯呼吁美国进行干涉，就算直接干涉不可能实现，也需要保卫国宾馆和大使馆。几艘美国的战舰守候在哈瓦那港口，但是没有一艘拥有足够的海军力量可以登陆来阻止可能发生的反抗。

有些重要的细节被忽视。几百名马查多时期的军官和美国人一起在古巴国宾馆里避难，呼吁美国立即干预并帮助他们迅速撤离。他们的祈求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巴蒂斯塔的士兵用大炮袭击了宾馆，约80人被杀，200人受伤。幸存的官员全部投降，被押往卡瓦尼亚（Cabaña），又有几个人在途中被杀害。在ABC部分成员的支持和空军的鼓动下，11月，军官发动了第二次暴动，结果同样遭到了血腥镇压，200多人惨死。

马查多派军官的失败和被屠杀无限地强化了巴蒂斯塔的权力，现在他是无可非议的部队首领。上百名警官和陆军或空军下士被提拔上来，以填补各级军官的空缺。在这个新组成的部队的支持下，巴蒂斯塔现在已经处于一个远比他的联盟者吉特拉斯和那些学生更加有权力的位置上。

然而，格劳政府的激进政策仍在继续实行。格劳政府拒绝偿还马查多时期欠下的美国贷款，并把古巴美国糖业公司的两个工厂——查帕拉尔和德里西亚斯（Delicias）以及古巴电厂收归国有。

几十年来一直受挫的民族主义体现在一份备受争议的法令中，这份法令要求所有的企业必须保证它们的工人中50%是土生土长的古巴人。这份法令的目的是要打击西班牙人和来自加勒比海的黑人。古巴 141

社会中固有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在9月革命的影响下被重新释放了出来。同样被释放出来的是古巴人对西班牙移民那傲慢态度的仇恨。实际上，自从经济大危机以后，西班牙的移民一直在减少，但是这个法令对强大的西班牙团体来说是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古巴政府可以采取这种措施反对其母国的公民——这种观念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耻辱。然而，这份反对西班牙的法令却在民众中很受欢迎，西班牙的企业和商店都遭到了袭击。英国、德国和北美的许多公司也受到了影响。

这份法令对来自牙买加和海地的黑人移民也产生了严重的冲击。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教父是驻海地圣地亚哥的一个领事。1985年，卡斯特罗回想起了当时的领事对于这份法令的反应：

> 1933年革命标榜其是一场反对不公正和滥用权力的斗争和反抗运动。它要求把电力公司和其他的外国企业收归国有，以及实行国有化就业……上万名海地人被残忍地驱逐回了海地。依照我们的革命思想，那是一件非人性的事情。[1]

不管它是非人性的还是有人性的，这份反对黑人的法令和对西班牙社团的袭击一样受到了民众的拥护。

这些民粹主义的措施不足以保护格劳政府。巴蒂斯塔和吉特拉斯最后的决战是在1934年1月。巴蒂斯塔已经依靠武装力量击败了他的敌人，目前只剩下了美国大使，美国大使坚定地拒绝承认格劳政府。巴蒂斯塔非常了解美国的意图，美国将只承认和支持一位更加温和的总统。受到美国青睐的候选人是旧自由党的左翼领导人门迭塔上校。随着危机的加深，吉特拉斯呼吁举行普遍性的罢工以保护现任政府，但是公众的情绪已经发生了变化，工人们也不再听从指挥。巴蒂斯塔迫使门迭塔接受总统职位。1月18日，门迭塔宣誓就职，在宫殿中接

---

① Frei Betto, *Fidel and Religion*, Sydney, 1986, p. 83.

受那些情绪激昂的人群的致敬。

巴蒂斯塔的判断非常正确。持续的不稳定使格劳政府失去了曾经拥有的支持者。随着一位新的更加保守的总统就职，美国很愿意承认他的政府，并在几天后正式宣布支持新政府，而格劳却从海上逃亡到了墨西哥。

弗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组织的共和国（1934—1952）

142

巴蒂斯塔使自己成为了古巴政治的主宰者，并统治古巴达25年之久。巴蒂斯塔1902年出生在一个蔗糖种植园里，和古巴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统治者相比，不管是以前的还是后来的，他都更加具有代表性，他声称自己的血管里流着非洲人、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中国人的血液。他19岁时参军入伍，学会了如何使用打字机，之后他成为了一个拥有士官军衔的速记员，并在军事法庭工作。不久之后，他成为古巴20世纪内除了卡斯特罗以外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作为革命的领导者、选举产生的总统、军事独裁者和黑手党中腰缠万贯的卫士，他在古巴历史上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印记，只有1959年革命可以将其抹去。

从20世纪30年代的平民政府建立之后，巴蒂斯塔就在幕后操纵一些重大事件——从1934年到1940年的7次更换总统——直到最后使自己参与竞选，并于1940年10月成功当选。虽然他事实上成了那个时代最受人们诟骂的拉丁美洲独裁者之一，但是在他担任总统的那些年，即从1940—1944年，他还是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1934年1月，他的反革命打击轻松地取得了好的效果。通过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他很容易就将忠诚于格劳的武装力量转移到了门迭塔手中。美国通过废除古巴民族主义者最不满的《普拉特修正案》来加强门迭塔总统的统治。1934年5月29日，《普拉特修正案》被正式从古巴宪法中删除，古美又签订了新的协定。但是美国为自己留了后手，拒绝放弃关塔那摩湾的军事基地。

尽管巴蒂斯塔进行了政变，但是国内许多地区仍然处于革命情绪之中，门迭塔对此无能为力。吉特拉斯摆脱了政府的琐事，重新建立

了名为“青年古巴”的秘密组织，该组织曾经同马查多斗争，现在则和城市游击运动紧密结合起来，目的是要推翻门迭塔的统治。反政府抗议、工人停工和罢工从 1934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 1935 年开始的几个月。吉特拉斯在 1935 年 3 月发动了大罢工试图再次摧毁政府，并使国家处于瘫痪状态。但是门迭塔和巴蒂斯塔依然乘民粹主义之风而顺风顺水，并且依照旧的西班牙方式强制实行战时法，他们残酷地镇压了工人罢工。镇压浪潮再一次席卷全岛，各种联盟组织和工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大学被关闭，监禁和拷打成了许多政治积极分子的必修课。

古巴处于不断强化的军事控制之下。这个过程从马查多时期开始，在巴蒂斯塔的统治下得到了加强。军队成为了政治活动中最重要的力量，这种力量很快就渗透到了文化中，并深深地植根在古巴社会里。外交政策协会的美国研究员记录了这样的情景，当“有人提到在哈瓦那的游乐场和操场应该有导游时，一名古巴妇女会提到在她家附近的一个小公园里聚集的孩子们。整天整天地……孩子们玩着革命的游戏。他们排着队行进，用想象中的枪支相互射击并拖走那些牺牲者。”[①]

在一部有关北美电影影响的著作中，路易斯·佩雷斯描述了 30 年代的匪徒电影是如何变得特别流行，进而影响到了古巴政治暴动的形式。“边开车边射击——这种经常出现在电影中的场景，却变成了哈瓦那政治斗争的一个显著的主题。电影观众非常熟悉的场景：超速行驶的汽车、机枪的开枪声、仓皇逃跑的人。”[②] 强盗行为（*gangsterismo*）一词就是用来描述古巴政治新发展的标志性词语。

在总罢工失败的绝望中，吉特拉斯打算隐退到墨西哥。他在墨西哥已经购买了一个农场，并准备在那里训练游击队士兵以便在将来重返古巴，以 19 世纪的模式开展革命战争。[③] 吉特拉斯打算在 1935 年 5 月从马坦萨斯湾离开古巴。这一行动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直到 20 年后

① *Problems of the New Cuba.*

② Pérez, *On Becoming Cuban*, p. 297.

③ Tabares del Real, “*Proceso revolucionario*”, p. 332. 亦见 José Tabares del Real, *Guiteras*, Havana, 1973。

才开始付诸实施，而且其领导人也不再是吉特拉斯。当他准备离开古巴逃亡时，在马坦萨斯的莫里堡（Fortin Morillo）被杀害。

门迭塔在职的时间并不长，接下来就任的都是级别较低的政治人物，他们的任职都是巴蒂斯塔的一时兴之所至。总统竞选最后在1936年1月举行，但是主角仍然是过去的政治人物，以前的总统马里奥输给了米盖尔·马里亚·戈麦斯。戈麦斯总统勉强地维持了一年的统治，在农村学校的问题上失败了。考虑到旧的自由党精英估算的一个引发民粹主义的危险，巴蒂斯塔遂分派士兵建立农村学校，并让他们在那里任教。当议案提交到国会投票的时候，戈麦斯因试图阻止这个议案而遭到弹劾，他的副总统取代了他的位置。

随着暴力运动的减少，在巴蒂斯塔控制下旧秩序开始逐渐恢复。格劳·圣马丁重新召集原有的支持者，组织新的中产阶级运动，重新起用了马蒂当年建立的政党的名称——古巴真正革命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Cubano Autentico）。共产主义者也开始从地下转到地上，并寻求自身的合法性，建立了由诗人、大学教授胡安·马里涅罗（Juan Marinello）领导的革命联盟党（Patido Unión Revolucionaria）。由于格劳的政党没有与共产主义者合作的意图，所以共产主义者逐渐转向了巴蒂斯塔一方。如果巴蒂斯塔允许共产主义者进行活动，他们将会为巴蒂斯塔政党提供支持。随后双方签订了一份协定。共产主义政党被允许进行合法活动，并出版了由华金·奥多基（Joaquin Ordoqui）主编的党报——《今天》（*Hoy*）。共产国际杂志虔诚地指出，“那些为推翻巴蒂斯塔统治而奋斗的人们将不再是为古巴人民的利益奋斗了。”[1] 144
共产主义者被允许组织新的联盟运动——由黑人烟草工人拉扎罗·皮纳（Lazaro Pena）领导的古巴工人工会联合会（CTC）。由于和劳工部的紧密关系，工会联合会成了受益者。

在当时的情况下，共产主义者和巴蒂斯塔之间的联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却遭到了中产阶级激进分子的嘲弄。他们把共产主义者看作

① *World News and Views*, No. 60, 1938, 引自 Thomas, *Cuba*, 711 页。

是 1933 年政变的继承者，关于共产党背信弃义的说法在 1959 年以后仍然长期地流行。

1933 年革命的一个迟来的成就是创建了一部新的宪法。马查多为了便于自己的统治曾制定过一部宪法，但是 1940 年的宪法是自 1902 年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之后，由制宪会议通过的第一部宪法，而 1902 年的宪法由于受《普拉特修正案》的影响是有缺陷的。1939 年 11 月举行了大选，格劳的真正党和他的同盟者获得了 76 个席位中的 46 个席位。巴蒂斯塔政党和共产主义者得到了 35 个席位。制宪会议在 1940 年 2 月召开，并在 6 个月后完成了它的使命。

新宪法在那个时代来说有一个重要的进步的构想，并成为后来许多年的一个重要的参考点。新宪法有很强的社会民主原则：赋予工人 8 小时工作制的权利，每周工作 44 个小时和一个月的带薪假期，增加退休金，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和意外事故赔偿；凡年满 20 岁的成年人都可自由参加社团活动，自由参加选举投票以及公民投票；妇女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

尽管自从 1910 年以后，种族隔离被废除，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政治运动也被禁止，但是对黑人数量的紧张情绪又再次复苏。虽然美国现在实行的是罗斯福新政，新宪法仍然受到了美国模式的影响，它有利于推动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行产权监管和对所有儿童实行 8 年义务教育。[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定条件下，巴蒂斯塔本人成为总统，实行了社会民主统治。工会权利得到了巩固并进一步扩大，政府资金用来统筹社会规划，地方共产主义者在政府中受到了欢迎（因为斯大林被看作是反希特勒的一个重要盟友，古巴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

战争导致了亚洲和欧洲的蔗糖产业崩溃，古巴再次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幸运。1940—1944 年，古巴的蔗糖产量从 2.7 亿吨上升到了 4.2 亿吨，原糖产品的实际价格从 11 亿美元上升到了 25.1 亿美元。虽然

① Thomas, *Cuba*, 2nd. edition, pp. 448 – 449.

失去了欧洲市场，甚至由于船运的不足导致部分蔗糖销售在美国市场的萎缩，但是对巴蒂斯塔政府来说这仍然是不错的几年。[①] 蔗糖价格的居高不下、长时间的社会和平、共产党对政府的支持以及共产党和劳工运动的联合，使巴蒂斯塔政府给人们留下了积极的印象。[②] 人们忘记了战时资源的短缺、失业、通货膨胀和外来旅游者的减少。

当巴蒂斯塔的4年统治结束的时候，他希望他的总理——ABC的前任领导人卡洛斯·萨拉德里加斯可以争得总统职位，但是投票者选择了格劳·圣马丁和他的真正党。人们对1933年的记忆，使格劳在全国选区范围内取胜。但他进入政府后却继续支持巴蒂斯塔的改革路线，又很快使他的那些激进的支持者失望。随着冷战的开始，在其劳工部长卡洛斯·普利奥·索卡拉斯的支持下，格劳开始转而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者主导的工人联合会，即古巴工人工会联合会。

格劳对右翼势力的支持在真正党各阶层之间激起了反对。1947年，爱德华多·奇瓦斯（Eduardo Chibaás），20世纪30年代的另一个风云人物，组织了一个更加激进的政党——古巴正统人民党（Partido Revolucinario Cuban Ortodoxo）。爱德华多·奇瓦斯希望依靠他的正统党赢得1948年的总统竞选。和真正党的领袖普利奥·索卡拉斯进行竞争，这是1933年的另一个遗俗。普利奥赢得了选举，他从1948年到1952年的4年任期，被描述成古巴共和历史上"最极端、最贪污腐败、暴乱最多和最不民主"的时期。[③]

20世纪中期，古巴政治和社会面临着体制上的危机。参与1933年革命并推翻了马查多统治的那一代人拥有管理国家的新机会，但是他们放弃了这种机会。所有的老政治家都名誉扫地，但是其中有一个仍然保持着很高声誉的爱德华多·奇瓦斯，却戏剧性地退出了历史舞台。1951年8月，奇瓦斯在录制完反普利奥政府贪污腐败的周末广播

① Pérez, *Cuba Between Reform and Revolution*, pp. 282 – 283.

② 共产党后来于1944年更名为社会人民党。

③ Julia Aweig, *Inside the Cuban Revolution: Fidel Castro and the Urban Underground*, Cambridge, Mass. 2002, p. 5.

后，自杀身亡。这可能是意外或者更有可能是谋杀，奇瓦斯的死亡标志着自1933年以来的整个时代的结束。

新的参与者正在蓄势待发。其中一个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他在哈瓦那大学召集了50名可能成为革命者的人。不久之后，他组织了一场新的革命运动，这个运动毫无疑问地唤起了人们对早年经历的回忆。

另一个首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竞争者是军队。由于巴蒂斯塔对军队的重建，古巴的军队被深深地卷入政治斗争中，但并没有陷入拉丁美洲大陆的典型模式。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统治精英。下级军官们和社会其他领域的任何人一样，都意识到了相继建立的市民政府的失败。政治腐败和强盗行为加之高级军官们奢侈的生活方式几乎击溃了现有的秩序，这无不引起了具有民族主义情感的年轻军官和大学生的愤怒。

146 在普利奥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下级军官试探巴蒂斯塔将军，看其是否支持他们考虑已久的政变。这个老练的政变制造者最初并不情愿，总统竞选将在1952年举行，巴蒂斯塔将再次成为候选人。奇瓦斯是正统党具有超凡魅力的候选人，但是在1948年去世了。真正党的候选人是没有任何魅力的格劳·圣马丁。巴蒂斯塔估计他可能不会获得竞选胜利，另外军队中的骚乱也暗示着这次竞选可能不会成功地举行。当巴蒂斯塔发现无论他参加与否，下级官员都决意要发动一场政变的时候，他决定参与其中。

1952年3月10日星期天的清晨，巴蒂斯塔率部队向哥伦比亚营进发，逮捕了正在那里睡觉的高级官员。在拂晓之前，他就控制了整个城市，而此时的普利奥·索卡拉斯正在前往墨西哥使馆寻求庇护的路上。普里奥的统治到了最后的期限，他的倒台在人们中间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没有一个人接受他的号召起来反抗，不费吹灰之力，普利奥政府顷刻间就被瓦解了。

巴蒂斯塔的新政权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在试图保护宪法的正确性，以及继续重复他在30年代的通过寻找一个傀儡总统的做法等一系列尝

试之后，巴蒂斯塔决定自己出任国家的最高元首。在他的第一次演讲中，巴蒂斯塔使用了马丁的名字，把自己和人们渴望的进步与民主、和平和正义联系了起来；这是一次没有任何瑕疵的表演。巴蒂斯塔政府增加了警务人员的薪酬和军饷；国会议员和参议员的工资和原来一样。同时 1940 年宪法的大部分内容被抛弃，但是除了正统党人，像卡斯特罗和他的朋友一样的大多数人都对新政府怀有疑问。在美国承认巴蒂斯塔政府之后不久，欧洲和拉美国家很快也在外交上承认了其合法性。

巴蒂斯塔的政变阻断了总统选举，各个派别的政治家被迫修正他们的计划。一些人适应了新的统治，但是对于新一代的政治积极分子来说，政变是一个新的政治机遇。像 30 年代那些迷茫的政治先驱者一样，他们对古巴环境下的选举过程是否有价值怀有疑问。和他们的前辈一样，年轻的政治家们开始组织一些活动团体，并卷入了自相残杀的内争和强盗行为之中，这就是战后一个时期的特点。现在他们拥有天赐的良机，可以把他们理论上对暴力的支持付诸于行动。时机已经成熟。巴蒂斯塔政变最初得到了那些憎恨议会制度之腐败的人们的支持，然而，随后的行动却表明他并没有真正地与以往决裂。除了对自己和自己的经历了如指掌外，巴蒂斯塔并没有振兴国家的新配方。这是远远不够的。

147

第五章　卡斯特罗革命爆发(1953—1961)

卡斯特罗对蒙卡达的进攻（1953年7月26日）

从蒙卡达兵营到圣地亚哥中心广场只需要很短的车程。在20世纪50年代，它位于城市的郊区。一个曾经阴沉灰暗、有着两层城垛的兵营，现在则被涂上了有着白色条纹的亮黄色，在地面的入口处，有着一排水泥台阶。20世纪50年代，作为仅次于哈瓦那哥伦比亚兵营的全国第二大兵营，蒙卡达兵营在1898年之后的美国占领时期，原本是被计划用来收容乡村警卫队的，在后来就常常被视为高压政府的象征。100年后，牢房和审讯室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它的庭院被多间教室和一个尘封已久的博物馆共享，因为20世纪50年代的革命者们承诺，这样的营房建筑都将变为学校。

1953年7月26日，爆发了一场由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对蒙卡达的武装进攻，这个即将掌控着古巴政治和历史超过半个世纪的人，当时还只是个26岁充满活力的青年。这次对蒙卡达的进攻，以及同时发生的对巴亚莫兵营的行动，目的是为了从军火库中获取武器，但是其根本目标却是推翻在一年前的一场军事政变后建立起来的巴蒂斯塔政权。就其本身来说，这次行动是一次灾难性的失败，就像共产主义者们所形容的那样，是一次毫无准备的政变。它与20世纪30年

代的那场暴乱一样，在这个国家武装斗争的传统中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蒙卡达事件是对政权的一次挑战，它奠定了一个革命组织。即“7·26运动”的基础，而且这个革命组织将在不到6年的时间内取得政权。它也使得运动领导者的名字传遍了整座海岛。

卡斯特罗在那个时期，被视为其同代人中的杰出人物，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演说家和成功的运动员，是一个从青年时代就声名卓著的政治活动家。他生于1926年8月，是安吉尔·卡斯特罗的儿子，一个来自加利西亚的白人移民，他的第二任妻子莉娜·露兹（Lina Ruz）是比那尔德里奥人。安吉尔·卡斯特罗在奥连特发迹，成为一个富有的地主，并拥有多个子女，但是只有弟弟劳尔（Raúl）在菲德尔一生的事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童年是在奥连特比安镇（Birán）、靠近马亚里（Mayarí）和尼佩湾（Bay of Nipe）[1] 的父亲的庄园与周边的地区度过的。卡斯特罗在耶稣学院（Jesuit Cllege）里接受教育，在哈瓦那大学学习法学，1948年娶玛尔塔·迪亚斯·巴拉特（Mirta Díaz Balart）为妻，她是卡斯特罗同学的妹妹，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家庭。[2] 卡斯特罗起初想要走上一条正规的政治道路，他还准备作为正统党（Ortodoxo Party）可能的议会候选人参加1952年的选举。但这个时候，他的计划被巴蒂斯塔的军事政变所打断。

148

卡斯特罗是20世纪非常杰出的政治人物，古巴的历史将会长久地由他主导。他的革命的成功，成了1959年世界新闻的头条，他缔造了古巴人的国家，为过去斗争的意义正名，使一个处于困境但根本无关紧要的加勒比岛屿，变成了世界舞台中的一员。在他的领导下，古巴人民“站了起来”——按照毛泽东的生动表述——并且第一次真正地认识了他们自己。作为一个叱咤国际政坛逾40年的人物，卡斯特罗与两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相继任职的多位总统进行着平等的交往和

① Tad Szulc, Fidel, *A Critical Portrait*, London, 1987, p. 159.

② 卡斯特罗和玛尔塔·迪亚斯在1954年离婚。迪亚斯·巴拉特家族的许多成员在革命后离开了古巴，玛尔塔的侄子林肯·迪亚斯·巴拉特（Lincoln Diaz Balart）成为了一名著名的反卡斯特罗共和国的美国议员。

谈判。作为第三世界鼎盛时期最有魅力的领导人，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古巴的海岸线。晚年胡须灰白的他，不论走到哪里，都仍然是具有吸引力的、被关注的对象，现场的观众们对这位历史书中的伟大人物着迷，就像他们曾经被那耀眼的革命之火所吸引一样。

俄罗斯人从一开始就着迷于卡斯特罗（特别是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和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欧洲的知识分子们（让·保罗·萨特［Jean - Paul Sartre］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也同他推心置腹，非洲的革命者们（艾哈默德·本·贝拉［Ahmed Ben Bella］，科瓦米·恩克努玛［Kwame Nkrumah］和阿戈什蒂诺·内图［Agostinho Neto］）欢迎他的支持和建议，拉丁美洲的政治运动则受到了他的革命的鼓舞和激励。只有美国的领导人，连续9届总统，都将他视为永远的敌人。

卡斯特罗成为了一个加里波第式的世界性英雄，是一个用其理念和言辞影响了一个大陆历史的民族领袖。在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处在自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少数寡头统治之下的被忽视了的拉丁美洲国家，进入了世界人民的视野，他们的政权也受到了这座岛屿共和国之革命宣传的强烈挑战。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他，一代又一代的拉丁美洲人都深切地受到了菲德尔的影响。

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古巴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在这个国家149里，民族主义要比社会主义更加显著。在这里，马蒂的传奇要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更大。卡斯特罗的政治技巧，也是他漫长的政治生涯的关键手段之一，就是始终保持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共同发挥作用。他将古巴的历史还原给古巴人民，使他们知道，他们岛屿的名字是被深刻地烙在20世纪的全球历史之中的。他适时地援引马蒂的名字和事例，他的诞辰100周年纪念恰好是在1953年1月，这是特别可喜的一件事。

对于很多古巴人来说，巴蒂斯塔的重新掌权，封闭了他们沿着自由民主的途径和道路获取政治权力的途径。失去耐心的卡斯特罗义无反顾地主张立刻进行武装起义，并在巴蒂斯塔的军事政变实现后就开

始进行组织筹备。这种策略是动荡的古巴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加勒比海附近政局动荡的小国那里亦然。卡斯特罗并不孤立。其他小的、独立的集团，也秘密地在哈瓦那和其他城镇聚集，准备重拾过去的政治暴力的传统，对巴蒂斯塔政权发起进攻。

卡斯特罗的个人魅力、他的战略思想和他的组织才能，使得他的集团获得了极大的优势。他集结起了150多人，对他们进行训练，并筹集了必要的资金。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自于人民党的少壮派，与其说他们是革命者，倒不如说是激进分子。卡斯特罗草拟了一份宣言，以马蒂的名义，勾画出了统治规划的轮廓。他也做了在农村进行游击战的准备，就像吉特拉斯在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那样，作为攻击蒙卡达兵营失败后的退路。

他们为蒙卡达行动所做的准备未被察觉。他们租用了圣地亚哥城外希波尼（Siboney）附近的一个小农场，人员和军火逐渐地聚集在了那里，当地的农民则以为他们是要修建饲育斗鸡的鸡舍。在他们选定的1953年7月的一天，100名游击队员身着军装，坐着汽车和摩托车，从希波尼出发前往圣地亚哥。他们发动了突然袭击，但是兵营的防御者们则占据着有利地势。卡斯特罗的游击队被迫进行苦战。一些防御的士兵在战斗中被打死，但是游击队员们却被轻易地击退了。卡斯特罗临时凑集起来的军队在混乱中撤退，有一半以上的人被留在后面没有跟上撤退队伍。一些人战死了，许多人被俘，随后被枪决。

菲德尔的弟弟劳尔也加入了这次行动。他的小队成功地占领了邻近兵营的法院，但是在策划过的其他行动失败后，也被迫撤退。劳尔逃入乡下，躲过了之后的屠杀，但是最终他还是被抓了起来，受到了审判。

菲德尔也逃到了山里，在几天后才被发现。一个乡村卫队的黑人中尉救了他，这个黑人机智地把卡斯特罗送到了圣地亚哥的警察局，而不是蒙卡达兵营，要是在那里的话，他肯定会同其他的囚犯一起被枪决。那之后他被转移到了城外山上的鲍尼埃托监狱（Boniato）。

150

政府开始进行报复。一个高级将领带着巴蒂斯塔关于如何处理这

一事件的特殊指令，从哈瓦那赶来。“在战斗中，军队死伤的人数是起义者的3倍，这对军队来说，是很耻辱很没面子的事。”卡斯特罗记述，在他随后的审判中，这位将军是如此宣称的。“必须为每个死去的士兵枪决10名囚犯。”[①] 这是巴蒂斯塔的命令，这条命令随后被超额执行。接踵而至的屠杀致使超过70名被捕的游击队员被枪决，使得公众对他的统治变得更加反感和抵触。在圣地亚哥公教会大主教的干涉下，这场屠杀才停了下来。

卡斯特罗9月在圣地亚哥受审，连同他一起的还有100多名被告，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当地的左翼分子，跟蒙卡达袭击没有任何的关联。作为一个具有专业水准的律师，卡斯特罗担负了为他们辩护的职责。基于他的陈述，即现政权不合法，公民有权对一个非法的政权发动起义。当被问到谁是这场袭击的幕后主使的时候，他回答说：“这场革命机智的领导者是我们独立的导师——何塞·马蒂。”

他的辩护非常成功，只有26名囚犯被认定有罪，并且多数人都得以宽大处理。圣地亚哥的法官仍旧保持着他们的独立性。但是，作为领导人之一的劳尔，被判处13年的监禁。菲德尔并没有被列入第一批被告的名单中，他在10月被带到了另一个法庭，对他本人的审判则是在一个市民医院的护士的房间里进行的。据说，他做了2个小时的讲演，为他的行为辩护，并描述出了他的政治纲领，但是关于他的这次演说并没有保留下来任何记录，他不得不在事后回忆整理。“对我处以死刑也没有什么关系，”在最后他这样说道，“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他的讲演公开出版之后，就成了卡斯特罗的革命运动的宣言。在其中，他详谈了进攻蒙卡达成功后，将会公布的“五项革命法案”的内容。第1条是“还政于民”，重新恢复1940年宪法。第2条则是处理土地权利的问题，承诺所有那些占有土地面积不足165英亩的人，或者是使用这些土地的人，都会获得土地的所有权，现存土地的拥有

① Fidel Castro, *History Will Absolve Me* (the Moncada trial defence speech, 16 October 1993), London, 1968.

者们，则获得10年租金的补偿。第3条法案是给予那些在大工厂和采矿公司的工人们分享公司30%的股金。第4条则是授予糖料植物的种植者们得到他们产品之利润的55%。第5项法案则是打击腐败，查没那些在前政府部门任职期间，犯有欺诈罪的官员的财产。[1] 被收回的财产中的一半，会被用于补贴工人的养老金，剩下的则用于医院、收容所和慈善机构。

这些还不是全部。最初的五项法案会在“起义结束的时候”立刻公布，随后还会有其他的措施，包括公共教育的改革、私人拥有的公共事业和电话的国有化、对地租的控制、对逃税者的追缴。这些是对吉特拉斯1933年所提出的革命主张的回应。

151

卡斯特罗的法案还重新强调了1940年宪法中的两项条款：1. 宣布封建世袭地产为非法，限制耕作用地的规模（“将土地归还古巴人民”）。2. “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要求这个国家“确保每个体力和脑力劳动者都过上适宜的生活”。

这些自由的，但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改革，还同一项宣言联系在了一起，即古巴未来在美洲的政策，将是“同美洲信仰民主的人民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没有专门涉及美国的内容，只有一则呼吁，要古巴人民变成“自由的堡垒，而不是专制链条中可耻的一环”。卡斯特罗最后在马蒂的百年诞辰时以马蒂的名义，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似乎对于他的记忆将要永远地消失了，但是他还活着。他并没有死。他的人民是不受摆布的，他的人民是高贵的，他的人民是忠实于对他的记忆的。古巴人民开始保护他的信条。青年们做出了为补偿他的高尚姿态，他们已经开始抛洒热血，为他们的同胞奉献自己的生命。古巴啊！如果你对导师的记忆死去了的话，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① 在卡斯特罗的第5条“革命法案”中规定，“特别法庭拥有可以获取在这个国家所有注册或运营的公司的记录，以调查非法的隐匿资金，要求外国政府引渡囚犯，依法扣押那些属于古巴人民的财产的全权。”Fidel Castro，*History Will Absolve Me.*

这篇辞藻华丽的讲演辞是为历史而准备的，它并没有打动法庭。卡斯特罗被判处15年监禁。他和他的兄弟，还有其他的幸存下来的同志们一起被关押在松岛（Isle of Pines）上的监狱中，在这里他受到了激进政治的教育，这正是他在早年的学校教育中所欠缺的。

牢狱生活为他提供了大量阅读的机会——小说、历史和政治——在其他时候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卡斯特罗读到了拿破仑和列宁，还有罗斯福。他当时的爱人纳塔莉亚·勒维莱塔（Natalia Revuelta）的信件支撑着他，他同她维持着充满真情的信件往来。后来，他开始对未来进行规划，对"7·26运动"时期初步形成的思想进行整理归纳。[①]

受益于大赦，卡斯特罗服刑不到2年就被释放。1954年的总统选举开始了，当时他还在狱中，巴蒂斯塔是唯一的候选人。前任总统格劳·圣马丁认为自己还是有些个人威望的，遂提名自己参与竞选，使之开始进入合法的程序。到了最后阶段，他意识到了选举根本就是个骗局，跟古巴传统中的选举一样，他退出了，于是巴蒂斯塔宣布自己

152 为获胜者。[②] 在宣称恢复宪制、保护言论自由后，他感到有足够的把握实现特赦政治犯的承诺了——其中包括卡斯特罗兄弟。

在1955年5月被释放后，卡斯特罗在哈瓦那车站受到了劳尔·奇瓦斯（Raúl Chibás）的欢迎，他是死去的爱德华多的兄弟。卡斯特罗原本认为自己会受到欢迎，重新回到正统党之中，但是事与愿违。正统党的领导层因为他激进的言论而感到恐慌，没有将他吸纳到他们的政治计划中去——用很好的理由。卡斯特罗写的少量具有煽动性的报刊文章，控告蒙卡达兵营的指挥官犯有刑讯和谋杀罪，将巴蒂斯塔描述为"自负、爱慕虚荣、奸诈和腐败"的人。他的这些文章很快导致新闻审查程序的恢复，当局还对过去的平民政治家们发出威胁。巴蒂斯塔的民主开明并没有持续多长的时间。

在哈瓦那停留了3个月后，卡斯特罗认识到，选举政治是没有前

---

① 对卡斯特罗入狱期间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并搜集了他所阅读书目的著作是 Robert Quirk, *Fidel Castro*, New York, 1993, pp. 60 - 82。

② 格劳·圣·马丁1959年之后一直留在古巴，1969年去世。

途的。他在信中对他的朋友说，这场危机的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武装起义”，就是那条被马塞奥和马蒂设计好的道路。[①] 他的思想在这个时候形成了。他于 1955 年 7 月飞往墨西哥，他的兄弟劳尔则先行一步。墨西哥是为早先的几代古巴人和西班牙内战的流亡者们提供庇护的国家，它本身也充满着革命的神秘气息。在这里，卡斯特罗将追寻着 19 世纪的英雄们的脚步，组织起一支游击力量。在将它武装起来并训练成熟后，他们会从海路再次登上古巴的海滩，然后举起起义的火把。

在他到达墨西哥城还不到一周，卡斯特罗被他的兄弟劳尔介绍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来自阿根廷的革命者，这个人从前一年 9 月起就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当时年仅 27 岁的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已经同一些在墨西哥生活的古巴流亡者建立了友谊。他们全体在 7 月 26 日聚集在卡斯特罗兄弟的公寓里共进晚餐，庆祝袭击蒙卡达两周年。格瓦拉在他的日记中简明地记述道，他同“古巴革命家”的这次见面是“一次政治事件”。他描述卡斯特罗是“一个年轻人，机智、非常自信，具有超乎寻常的胆识”。在一段巧妙的轻描淡写中，他记录道，“我想我们是意气相投的。”[②]

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这两个人立刻被对方强烈地吸引住了，这种吸引即将对古巴的历史产生长久的影响。格瓦拉为卡斯特罗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范围更大的书单，对其他革命实践的深刻的洞察，还有关于拉丁美洲的大量直观的认识。卡斯特罗则给了格瓦拉一个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才准备好的政治主张，还有他在组织武装革命活动实践中的有益经验。他们将一起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组织一场变革，余波势必影响整个世界。

格瓦拉 1928 年出生于阿根廷，是一对进步的中产阶级夫妇的孩

---

① 引自 Quirk，*Fidel Castro*，85 页。

② Jon Lee Anderson，*Che Guevara*：*A Revolutionary Life*，London，1997，pp. 170－175. 格瓦拉第一次听到古巴革命运动的消息是在一年前的危地马拉，在那里他同安东尼奥·“尼科”·洛佩斯（Antonio“Nico”Lopez）结交，他是一个流亡到那里的蒙卡达运动的幸存者。洛佩斯在 1956 年“格拉玛登陆”时被杀。

子，他们为了给患有哮喘病的儿子找到适宜生活的气候环境，在许多153省份的城镇里都生活过。格瓦拉本来对政治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加之他还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阿根廷成长的，那是胡安·庇隆（Juan Perón）将军的民族主义时代，他的父母对这个人没有好感，他曾学习成为一名医生。青年时期的他无拘无束，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两次游历了南美的安第斯山国家，亲眼目睹了农民的状况和政治运动，这对他这个年纪和背景的人来说，是不同寻常的。

去墨西哥之前，格瓦拉在危地马拉停留了9个月，即从1953年12月到次年9月。他在那里亲历了一个革命政权，即哈科伯·阿本斯（Jacobo Arbenz）政府的最后岁月——这个政权受到当地共产党的支持——它激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对。阿本斯对一项温和的土地改革政策的支持，将会影响联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的剩余土地，那是一家美国拥有的，很有权势的，专门生产香蕉的企业。这导致了1954年6月危地马拉军官中一支小部队的侵袭，这次行动策划和资助均由中情局在幕后进行。格瓦拉被迫在阿根廷大使馆中避难。

美国支持的政变致使危地马拉政府被颠覆，这对格瓦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坚定了他本不成熟的革命信念。他在那里的经历，使他产生了对美国深深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强烈，一直持续到他1967年在玻利维亚被处死，那也是一次由美国特工监控的行动，正是这样的美国情报人员，摧毁了阿本斯政权。

他同卡斯特罗兄弟的偶遇，赋予他生命中一个全新的角色，他很快就同意了参加他们那还处于摇篮中的革命活动。卡斯特罗来墨西哥是为了组织一支能够攻入古巴的游击队，但他缺少骨干和资金。10月，他坐飞机去了美国，利用他作为正统党成员的关系从那里的古巴团体中筹款，在纽约、费城、迈阿密进行讲演，但筹到的钱寥寥无几。那是前景黯淡的几个月。卡斯特罗被从古巴的时事中隔离，很少有人认同他的观念，即武装斗争才是正确的道路。其他反对巴蒂斯塔的群体已在古巴国内开始筹划起义。哈瓦那大学的学生们加入了大学生联合会（Federacuion Estudiantil Universitaria，简称FEU）。在何塞·安东

尼奥·埃切维里亚（Jose Antonio Echeverria）的领导下，这一组织在基层持续发挥着影响力。同样，糖业工人也在策划反抗，其领导者是孔拉多·贝克尔（Conrado Becquer）。甚至连青年军官，在驻华盛顿武官拉蒙·巴尔坎上校（Ramon Barquin）的领导下，也正在谋划一场军事政变。他们计划占领哥伦比亚兵营，但其领袖被出卖，于1956年4月被捕。相比之下，卡斯特罗的“7·26运动”催生了一些好的宣传册，但在其他方面也影响不大。

逐渐的，形势开始对卡斯特罗这边有利。赞助金在慢慢地汇聚——这些钱来自于委内瑞拉、美国和古巴本身。到了5月，他有了足够的钱，在墨西哥城以南约20英里的地方租下了一座农场，被征募的人员可以秘密地聚集在那里。卡斯特罗的支持者们，三三两两地从古巴结伴而来，这些人中还包括蒙卡达军营的老兵们。卡斯特罗得到了阿尔伯特·贝尤（Alberto Bayo）的协助，他曾经是一名西班牙内战期间同弗朗哥（Franco）作战的共和国军官，由他来训练他们进行游击战。 154

即使在友好的墨西哥，秘密地组织起一支由外国人组成的游击队也并不容易，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在6月都被逮捕了，农场被搜查。只是由于墨西哥前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Lazaro Cardenas）的干涉才使得他们获释，但是以后的军事训练就要转移到更为偏远的乡村地区进行了。同前总统普利奥·索卡洛斯派来的信使进行的艰苦谈判，终于使得他们获得了大笔的资金支持。卡斯特罗用这笔钱，从一个在图克斯潘（Tuxpan，位于墨西哥的大西洋沿岸）居住的美国人那里购买了一艘小型的摩托艇格拉玛号（Granma）。11月底，他将游击队员们集合在图克斯潘，在此地上船。很快，他们就从墨西哥湾驶出——前往古巴。

格拉玛号登陆和革命战争（1956—1958）

靠近红滩（Playa Las Coloradas）南边的红树林沼泽，在奥连特省的西南角，坐落着一座小型的陈列馆和那艘小摩托艇的复制品。一条

小路从这片红树林中穿过，通向一片沙滩，那艘复制品的原型——格拉玛号——就是于 1956 年 12 月 2 日在这座海滩附近的暗礁间穿行。在古巴秘密登陆的历史中，这是比较糟糕的一次了，尽管它最终被当作一次最为英勇的史诗般的行动来歌颂，因为卡斯特罗是这艘老旧并且漏油的小船的船长。作为一个经常关注历史比较的人，卡斯特罗心知肚明，何塞·马蒂在大约 61 年前就是在奥连特省的东部登陆的，肩负着与自己相似的任务。他认为自己是在完成马蒂未竟的事业。

自 1953 年以来，卡斯特罗的整体战略没有大的改变。他计划用格拉玛号登陆来引发一场广泛的、全国范围的暴动，进而推翻独裁者。尽管它有着一个不幸的开端，但还是一场不仅被载入古巴史册，而且名垂拉丁美洲历史的重要事件。在之后 25 年的时间里，整个拉丁美洲的年轻男女都梦想着重现古巴革命的经历，并且做出了相应的计划和方案，以为一场在农村地区的游击战争可以点燃一场势不可挡的全面起义。在他们最初也是最具有说服力的革命理论家切·格瓦拉的鼓动下，大多数古巴人坚信古巴模式可以被重现。多年后，人们才开始明白，在这场胜利的起义中古巴城市中的革命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这是一种必要的澄清，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地方经常忽视这一点。

格拉玛号及其所承载的 82 名游击队志愿军，在一周之前就已经从图克斯潘启航。这次在深海中穿越墨西哥湾的大约 1 200 英里的长距离航行，使他们中的多数人开始晕船，这显然对即将发生的战斗不利。计划是安排少量兵力在荒无人迹的海滩上接应他们，使他们可以从这里安全地进入内陆，前往巴亚莫和圣地亚哥。在登陆的同时，将在圣地亚哥举行一场暴动，对蒙卡达兵营和警察总局同时发动新的袭击。这次的行动将会牵制巴蒂斯塔在当地的军队，使卡斯特罗的部下在不会受到严重阻击的情况下，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区。

155

但最初的计划却由于天气的变化无常而没能实施。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缓慢前行的格拉玛号比原计划晚了两天才到。弗兰克·派斯（Frank Pais），这位优秀的“7·26 运动”的青年领袖，按照原计划在 11 月 30 日发起了城市暴动，他手下的人在这一天占领了哈瓦那城里

大部分地区。但因为没有卡斯特罗登陆的消息，加上政府军的猛烈反击，他们撤退到了山里，在红滩等待接应卡斯特罗的船只到达的卡车也被迫撤走了。

更糟糕的是，格拉玛即将进行的登陆已经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在卡斯特罗等人到达之后的几个小时里，这些经验不足的游击队员们受到了来自空中和陆地的夹击。多人被杀，22 人被俘，之后遭到审判。剩下的这些可怜的人们在混乱中挣扎着穿越沼泽地。据说，他们中只有 12 个人活了下来，或许这个好似圣经中的数字[1]是一种过低的估计。3 天后，他们在一个叫作阿尔及利亚·德·皮诺（Algeria del Pino）的地方集合。这时他们却遇到了伏击，又有几个人被杀。幸存者在周围迷路了，筋疲力尽，饥饿难耐，无助迷惘。在登陆 10 天后，他们才与国内抵抗组织的成员们会合。

他们最初是同克莱赛西奥·佩雷斯（Crescencio Perez）取得了联系，他是一个非法的农民领袖，控制着马埃斯特腊山脉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作为奥连特省的隔离区传统——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殖民征服早期的非法黑人和印第安人移民——的继承者，佩雷斯在征募当地的农民和土匪参加游击事业方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在马埃斯特腊山区进行长期的游击战并不是卡斯特罗原来的设想；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游历过这里的群山，但是对它们的详细地理特征并不熟悉。“我们对马埃斯特腊山仅有的一些认识，都是从地理书中学到的。”他后来回忆道。他更倾向于进行一次成功的武装起义，即蒙卡达袭击那种模式的行动。但是在乡村的长期战争也必须经常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选择，因为他对上个世纪那场旷日持久的独立战争非常了解。“我们并不着急，”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区 6 个月后，他在给弗兰克·派斯的信中这样写道，“如果需要，我们会一直坚持战斗的。”[2]

尽管卡斯特罗很了解 1895 年有关何塞·马蒂的传奇，巴蒂斯塔当

---

① 这是借用《圣经·新约》中耶稣与十二门徒的典故。——译者注

② Quirk, *Fidel Castro*, p. 141.

156 局也同样熟悉瓦雷里阿诺·韦勒所做过的事情，他是西班牙将军，曾经通过将农民“集中”在城镇中的做法摧毁了1896年的抵抗。以瓦雷里阿诺·韦勒为榜样，巴蒂斯塔的人开始将农民从他们的农田和家宅中清理出来，“再次集中”在山区的低缓地带，以阻止他们同游击队的联合。在被清空的地区，一旦发现任何人立即击毙。在20世纪，他们以这样一种故技重演的镇压政策来彻底消灭反抗者。

巴蒂斯塔还以民兵的形式重新组建了19世纪60年代那种志愿兵，以罗兰·马斯费雷尔（Rolando Masferrer）为统帅，此人曾经是一个左翼的支持者，在巴蒂斯塔时代则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者。戴着白色棒球帽、号称“老虎”（*Los Tigres*）的马斯费雷尔的死党成了对圣地亚哥及其周围的农村地区进行镇压的先锋。

在马埃斯特腊山区重组后，格拉玛号登陆后幸存下来的这些人使自己习惯于游击战的常规战术。他们在靠近海岸的地方袭击那些孤立的卫戍部队，以获取武器弹药，然后就撤退到难以通过的群山中。不久，他们就与城市里的“7·26运动”组织建立起了经常性的联系，弗兰克·派斯在1957年2月初从圣地亚哥前往卡斯特罗的总部。他们草拟了行动计划，确保要持续地向马埃斯特腊山输送补给人员和武器，宣传战也受到了重视。派斯在月底返回，同行的还有赫伯特·马修斯（Herbert Matthews），他是《纽约时报》资深驻外记者，将起义军存在的消息传到了外界。

马修斯的经历可以回溯到1936年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①]的侵略及西班牙内战时期，他现在则给《纽约时报》的读者们讲述了在“马埃斯特腊山区那崎岖不平、几乎无法通行的天然屏障”中的战争。在那里，“古巴起义军年轻的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还活着，而且在艰苦地战斗，并取得了成功”。[②] 就像在19世纪一样，古巴人清楚地知道，确保北美新闻舆论对他们的支持是十分必要的，马修斯的报道有

① 埃塞俄比亚的旧称。——译者注

② 赫伯特·马修斯的3篇报道中的第一篇，刊登在1957年2月24日的《纽约时报》上，随后他写了一本有关他同卡斯特罗早期接触的书《古巴故事》，于1961年在纽约出版。

助于在古巴和海外创造出一个永恒的、富有魅力而不可战胜的领导人形象：

> 这个人的品质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出，他的人崇拜他，也很容易就能知道为什么他会成为整个古巴岛上年轻人的偶像。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将全部身心投入到一项事业中的狂热者，是一个有理想，有勇气，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人。

马修斯后来将卡斯特罗视为“自何塞·马蒂以来，古巴历史上……最为引人注目、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

同派斯和马修斯一起前往马埃斯特腊山的还有一些“7·26运动”城市领导层的成员，包括福斯蒂诺·佩雷斯·埃尔南德斯（Faustino Perez Hernandez），他也是格拉玛号上的一员，后来去哈瓦那做组织工作。还有埃迪·桑坦马莉亚（Haydee Santamaria），她是参加过蒙卡达行动的老革命者。在马修斯离开后，支持菲德尔的核心人员同卡斯特罗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他们制订了计划，要增强现存的游击队力量，将行动扩展到新的地区，在每个省份都建立城市义勇军。在政治战线上，他们同意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一次“城市抵抗运动”，以获得工人和中产阶级的支持，并准备以一场“革命性的全国总罢工”来推翻政府。[①] 这场运动在哈瓦那进行，由恩里克·奥尔图斯基（Enrique Oltusk）负责，而且它使现存的“7·26运动”的支持者们和中产阶级的正统党人士，如劳尔·奇瓦斯，联合起来。

157

革命的种子广泛地播撒开来——影响着政治、战略和战术——最终在马埃斯特腊山起义者和城市抵抗分子们的努力下结出了果实。卡斯特罗的起义继承了19世纪独立运动内部不统一的特点。数月之后，马埃斯特腊山游击队们的政治诉求无疑会变得更加激进。随着切·格

① Julia Sweig, *Inside the Cuba Revolution: Fidel Castro and the Urban Underground*, Cambridge, Mass., 2002, p. 13.

瓦拉现在日益成为不可或缺的游击队领袖，他的政治影响力开始增加。但是他对“帝国主义”的敌视、对美国控制的反感，城市组织中的许多领导人并不认可，他们坚持着古巴中产阶级的亲美传统——并且希望在反巴蒂斯塔这个问题上得到美国的支持。[①]

弗兰克·派斯当时是这场“山外”运动的公认领袖，承担了广泛范围的责任。派斯于1930年出生在圣地亚哥一个基督教浸礼会成员的家庭，曾经计划成为一名教师，但是1952年巴蒂斯塔的军事政变使得他转而成为一个全职的抵抗分子。最初他组建了自己的组织，1955年之后，作为在奥连特省运动的“武装斗争和破坏行动的最高长官”，他成了一个神机妙算的组织者、一个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谋划者。他于1956年8月在墨西哥第一次同卡斯特罗会面，一起谋划了与格拉玛号登陆同时进行的圣地亚哥暴动。

1957年，因为卡斯特罗被困在山中，派斯为保证武器弹药及食物和药品的补给所作出的努力，对游击队的生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派斯同时担负起了将记者输送进山，报道战事的任务。随着警察在城市里施加的压力不断增大，他的任务也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②]

同组织一场游击战争的后勤保障同样重要的是与各种反对巴蒂斯塔的运动协调一致的政治需要。这些运动有的是那些旧的政治党派所组织的，他们寄希望于最终的选举结果——或者可能是一场军事政变——也有的是来自支持武装抵抗的新生代。古巴的正统党和真正党的各种分支机构和附属组织对青年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是它们拥有一大批具有组织能力和经验的核心骨干力量，吸引了大量资金。前任总统——流亡在迈阿密的普里奥·索卡洛斯急迫地想要重新夺回权力，

① 20世纪90年代，美国研究员朱莉亚·斯维格（Julia Sweig）史无前例地被准许查看古巴革命的档案，其中包括有关50年代的城市地下活动的文件。根据斯维格的记述，“古巴的文件证明，直到这场历时2年的起义的最后6至8个月，有关战术、战略、资源分配、同其他反抗组织与古巴流亡者及暗中的对手的政治联系、同美国的关系（在哈瓦那和华盛顿）等大部分决策，都只被城市地下组织的少数人所知。”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兄弟对这些并不知晓。见 Sweig, *Inside the Cuba Revolution*，第9页。

② Sweig, *Inside the Cuba Revolution*, p. 14.

卡斯特罗和其他的组织都收到了他的钱，他希望武装斗争可以加速独裁者的灭亡。 158

与“旧党”为伍，同时不被“7·26运动”的年轻支持者们所信任的，就是古巴人民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ra Popular，简称PSP），即古巴共产党，在1934年的清洗之后，他们一直在它的总书记布拉斯·罗加（Blas Roca）和主席胡安·马里涅罗的领导之下。从那之后，它的整个领导层表现突出，在“7·26运动”组织中，共产党引发的反感多是由于当时革命的学生们一直保持与各党派分离的状态，无论在左翼还是右翼成员中，都保持着对外国人和犹太人政治鼓动者的不信任感。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通常都是激进的，他们在工人和黑人中间拥有大量的支持者，也吸引了许多的知识分子，但是在政治上，他们完全不被具有其他传统的左翼组织信任。

就像其他的保守党派一样，人民社会党也一直对武装行动持反对态度。回忆1933年革命期间他们同安东尼奥·吉特拉斯之间的分歧可以看出，他们尤其反对阴谋破坏和颠覆——更不用说游击战了——而这些都是“7·26运动”所拥护和支持的。这并非共产主义者的风格。人民社会党扎根于古巴的工人阶层，被许多中产阶级所轻视和不信任。激进派不喜欢它是因为它在1933年所起到的令人铭记于心的作用，也是因为在之前20年的时间里，他们同巴蒂斯塔间或的合作关系。冷战时期的反共气氛也对它不利。

古巴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多年来一直是精明老道的政治操盘手，一旦有机会就会同掌权者进行谈判，反对那些旧有的义无反顾地去组织武装革命的自由传统。即使那些反复出现的自由运动不断地失败，他们仍然持有尊重赞许的态度，认为这是合乎20世纪潮流的，也并不吝惜给予舆论上的支持。但是许多人认为他们的立场和态度是软弱的，完全不起作用。古巴共产党参与了1933年反对马查多的大罢工，但是当他们考虑到他的垮台可能会引发一次美国的入侵之后，他们的观点发生了改变。他们也参加了1935年反对门迭塔的罢工，但是被批评加入得太迟。1937年，他们曾经同巴蒂斯塔过从甚密。当时，在经过了

多年的非法状态后，巴蒂斯塔允许他们成为一个合法存在的政党。

1938年，他们开始出版日报《今日报》，由阿尼巴尔·埃斯卡兰特（Anibal Escalante）担任主编。不久，该报就成为巴蒂斯塔最亲密的盟友。共产党控制的总工会——古巴工人联合会（CTC）曾经同政府的劳工部合作。两个共产党员，胡安·马里涅罗和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Carlos Rafael Rodriguez），在1942年加入了巴蒂斯塔的内阁。同时，烟草工人联合会的黑人领袖拉扎罗·皮纳也积极参与其中。但是，同巴蒂斯塔的联盟在战后并没有持续，共产党也于1947年被从劳工运动中清除了出来，但是他人对他们曾与当局合作的记忆则延续了下来。尤西比奥·穆贾勒（Eusebio Mujal），这位古巴工人联合会的反共领导人在整个50年代都同巴蒂斯塔保持合作关系，他以前的共产党员身份对共产党的名声有百害而无一利。古巴共产党对1952年巴蒂斯塔军事政变的反应最多算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其领导层公开谴责卡斯特罗攻击蒙卡达的行动是“叛乱”行为。严格地说，这一描述可以算是正确的，但是这种分析并不会受到卡斯特罗支持者们的欢迎。

1957年，古巴共产党的领导层开始公开反对巴蒂斯塔政府，但是马里涅罗仍然梦想着建立一个组织罢工和示威游行、参加选举的人民阵线，这个党对主张武装起义战略的组织仍然保持着敌视的态度。在这些组织中，“7·26运动”是最有名的，但是在古巴的城镇里，至少还有3个重要的竞争者，它们都是在巴蒂斯塔政变后就组织起来反对他独裁专政的。

其中一个组织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MNR）[1]，其领袖人物拉斐尔·加西亚·巴尔塞纳（Rafael Garcia Barcena）是一个教授哲学的讲师，曾经是20世纪30年代非常有名的学生领袖，早期就得到了大量来自职业阶层的支持。在蒙卡达攻击发生之前的几个月，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曾经试图在1953年复活节的那个周日攻击哈瓦那的一处军事

① 该党的全称是：Movimiento Nacional Revolucionario。——译者注

基地，但遭到了失败，加西亚·巴尔塞纳被抓进了监狱。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支持者包括福斯蒂诺·佩雷斯和恩里克·奥尔图斯基，他们后来都参加了“7·26运动”，像是阿曼多·哈特·达瓦洛斯（Armando Hart Davalos）。此人是律师，后来娶了埃迪·桑坦马莉亚为妻。

第二个组织是革命军（OA）[①]，它是由普里奥·索卡洛斯创建的，是革命党的武装派。他们组织起了一支小规模的游击武装力量，也是由阿尔伯特·贝尤在墨西哥训练的。1957年5月，他们在马亚里东边的奥连特登陆。因为被当地的农民向驻军告发，只有少数人幸存了下来。[②] 普里奥想要创造出在卡斯特罗之外另外一种选择的愿望，也跟着这支队伍的覆灭一起落空了。

革命党的游击队同第三个组织有着紧密的合作，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何塞·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它是从哈瓦那的大学生联合会（FEU）中发展出来的。作为一个天才演说家和组织者，埃切维里亚是革命党的支持者，比卡斯特罗更年轻，代表了古巴革命传统中更类似于ABC组织的那个派别。ABC是20世纪30年代学生中的法西斯组织。埃切维里亚成立了一个秘密的学生革命指导委员会[③]（DRE），这是一个专门从事暗杀和阴谋破坏的恐怖主义组织，其名称就是为了让人们重新回忆起20世纪30年代的指导委员会。埃切维里亚于1956年在墨西哥同卡斯特罗进行了两次会面，以研究出指导委员会同“7·26运动”可能的合作方式，但是两人并没有达成一致。由于他们拒绝支持格拉玛号登陆，卡斯特罗对埃切维里亚的城市恐怖主义的厌恶感加重。他们有着各自的计划。

160

该指导委员会同革命军一起制定了一个占领哈瓦那总统府，暗杀巴蒂斯塔的计划。1957年3月，这两个组织中的150人奋力向这座建筑杀去，与此同时埃切维里亚控制了主要的广播中心。他们那勇敢却

① 即Organizacion Autentica。——译者注

② Sweig, *Inside the Cuba Revolution*, p. 20. Hugh Thomas, *Cuba, or the Pursuit of Freedom*, London, 1971, p. 950.

③ 即Directorio Revolucionario Estudiantil。——译者注

仓促的起义以灾难收场。进攻者们成功地进入了官邸，但是却找不到巴蒂斯塔，多数人在突袭的时候被射杀了。埃切维里亚在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从占领的电台播音室宣布总统已经死亡，并号召进行全国大罢工。但不知什么人关闭了广播站的开关，他的话并没有被传播出去。当他在返回维达多（Vedado）的大学时，他的车遇到一辆警车的拦截，他在交火中被杀。①

福尔·乔蒙·梅迪亚维利亚（Faure Chomon Mediavilla）替代埃切维里亚成为了大学生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人。此前，他是一个军事指挥官，之后他成为卡斯特罗政府的一个部长。袭击总统官邸的戏剧性事件使得埃切维里亚成了古巴烈士中的一员，但是它削弱了指导委员会的组织力量，导致了镇压的加强。

卡斯特罗的主要竞争者在1957年中期不是被严重削弱就是被摧毁了，他的那支在马埃斯特腊山的弱小游击队——直到5月份也只有100人——是这座岛屿上唯一存活下来的起义军。5月底，这支游击队攻击了奥连特南部海岸位于艾尔乌贝罗（El Uvero）的一支偏远的驻军，尽管双方互有死伤，但这次袭击对“7·26运动”来说是一次及时的、宣传上的胜利，显示出它的游击队仍然活跃在战场上。

就如同19世纪的起义者同美国的代表保持着联系一样，20世纪50年代的革命者们也在如法炮制。弗兰克·派斯于1957年同美国领事在圣地亚哥定期会晤，阿曼多·哈特和埃迪·桑坦马莉亚有时也会参加，其中还包括古巴城内巴卡第（Bacardi）朗姆酒公司律师的女儿维尔玛·埃斯品（Vilma Espin），她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工程学，1956年成为在墨西哥的卡斯特罗兄弟的信使。一个美国中情局（CIA）的主管干事记载：“我和我的全体工作人员都是菲德尔兄弟的人。”②他们谈论的议题之一就是美国对这个国家未来之稳定的忧虑。派斯告诉了卡斯特罗一段在古巴历史上不断重复的话，即美国担心古巴会变

① 对袭击官邸的详细记述，见 Quirk，*Fidel Castro*，134－137页。

② Sweig，*Inside the Cuba Revolution*，p. 29.

成另外一个海地，与其说这是19世纪旧种族主义者对加勒比海另一个黑人掌权国家所持偏见的一种表现，莫如说这是对古巴会像海地一样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的一种预言。

同美国领事的关系可能说服了派斯，使得他认为有必要同正统党的平民政治家们进行接触。他派遣埃迪·桑坦马莉亚前往哈瓦那，看看他们是否能搭上"7·26运动"这艘脆弱的三桅帆船。她的商谈有了结果，于是派斯在7月带着他们的一个代表团前往马埃斯特腊山基地，同卡斯特罗就他们之间未来的关系进行商谈。他们中间有劳尔·奇瓦斯、古巴国家银行的前任首脑并参加过20世纪30年代学生革命的老革命者弗利佩·帕索斯（Felipe Pazos）、正统党领袖的儿子罗伯托·阿格拉蒙特（Roberto Agramonte）、还有来自于党内少壮派的恩里克·巴罗萨（Enrique Barrosa）。正统党的代表同卡斯特罗宣布了一项联合声明，即《马埃斯特腊山协议》（*Pact of the Sierra*）[①]，号召组织"人民革命阵线"以迫使巴蒂斯塔放弃政权，进行新的选举。卡斯特罗同这些著名的政治家们的合影很快就出现在哈瓦那的杂志上。这是一次公众宣传上的成功，可以与赫伯特·马修斯的那次访问所引发的效果相毗美。

161

这是弗兰克·派斯的最后一项成就。在从马埃斯特腊山返回后，就在这个月底，他在圣地亚哥的街头被人枪杀。在这座城市进行的一场规模巨大的葬礼游行之后，接下来就是一场持续了5天，从圣地亚哥波及到这座岛屿众多地区的大罢工。

派斯之死对于"7·26运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一些新的运动亦在进行中。9月，在西恩富戈斯发生了一起由迪奥尼西奥·圣罗曼（Dionisio San Roman）和城市"7·26运动"的组织者艾米利奥·阿拉贡内斯（Emilio Aragones）领导的由一伙青年军官参与的海军攻击战。这是一次影响广泛、组织周密且与其他海军港口有密切联

---

① Sierra，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山，复数即山脉。本书中多次出现大写的Sierra，即说明是指特定的马埃斯特腊山，故此译。——译者注

系的密谋活动。起义者占领了海军基地并在一天内控制了哈瓦那城的多数地区，但是他们受到了刚刚从美国得到武器的巴蒂斯塔武装的激烈抵抗，最终失败了。阿拉贡内斯得以逃离，但圣罗曼被捕，遭受折磨后被杀。

学生指导委员会又重新活跃了起来，福尔·乔蒙率领的一支游击队也于 1958 年 2 月在努埃维塔斯附近的北部海岸登陆，随后向南，即位于特立尼达岛北部的埃斯坎布雷山区（Escambray）进发。他们发现举步维艰，不久就撤回了哈瓦那，尽管其他各自为战的游击队还在那个地区坚持行动。

这时候，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腊山的游击队有足够的自信扩展其军事行动。劳尔·卡斯特罗在 3 月份带着 65 人离开了大本营，去位于奥连特北部海岸的克里斯多山区（Sierra Cristal）开辟第二战场。胡安·阿尔梅达（Juan Almeida）也在这个月在圣地亚哥北边开辟出了第三战场。

1958 年初，共产党终于同意支持卡斯特罗。它的青年运动的少数成员自前一年起就已经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同切·格瓦拉的纵队并肩战斗了，其中就有曾经访问过中国的黑人军官保罗·帕布尔塔（Pablo Rivalta）。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早在派斯死后就同埃德贝·桑坦马莉亚建立了联系，但是他直到 7 月才前往马埃斯特腊山。除了一次前往中央委员会进行短期汇报外，他一直在那里，直到战争结束。但是他并没有参加此间关于组织大罢工的所有讨论。

从马埃斯特腊山斗争的初期开始，人们每每讨论到最终摧毁巴蒂斯塔政权的方式时，进行一场革命性大罢工的主张都会被重点提上日程。在民众的记忆中，正是大罢工导致了 1933 年马查多的倒台。这样的一场罢工不仅是工人停工，还包括范围广泛的一系列反政府活动，其中包括破坏、针对性的刺杀和全面暴动，继而发展为城市暴乱。[1]

162

这样的一场罢工必然是要以平原（*llanos*）上的城市运动为先导，

① Sweig, *Inside the Cuba Revolution*, p. 120.

而不是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腊山区（the Sierra）的游击战，而且它的组织方式一定会成为双方关系紧张的核心。福斯蒂诺·佩雷斯是哈瓦那"7·26运动"和"人民抵抗运动"的领导人，3月来到卡斯特罗的营地，讨论这个与罢工有关的计划。佩雷斯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卡斯特罗则没有这么肯定。起义的组织还有严重的缺陷。虽然共产党近期转而支持"7·26运动"的事业，但"7·26运动"对共产党的不信任感仍旧很强，而且哈瓦那的组织者们在其准备工作中没能将共产党及其庞大的工人运动包括进来，尽管"7·26运动"组织本来已经与其他工人组织有所接触。在哈瓦那受到的冷遇使得共产党非常担心罢工会失败，于是一个高级官员前往马埃斯特腊山区，告诉卡斯特罗，罢工的领导者们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力量。[①]

卡斯特罗感觉到他别无选择，只能前进，尽管有这样一些警告，而且他自己也不情愿这样做。他和佩雷斯签署了一个题为《反对暴政的全面战争》的宣言，号召罢工并宣布反对巴蒂斯塔的斗争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这个国家"将会考虑用全面战争来反对暴政……整个国家，不是被解放，就是被毁灭。""仅次于军事行动"的革命性大罢工将会成为推翻政权的决定性一击。[②]

这个宣言规划了为后巴蒂斯塔时代所设计的政治方案。临时总统将是曼努埃尔·乌鲁蒂亚·列奥（Manuel Urrutia Lleo），他是一个来自于圣地亚哥的律师，是被卡斯特罗提名到这个位置上的。乌鲁蒂亚是典型的反共自由主义者，在古巴受到广泛的支持——同样也被美国人所欢迎。他曾在几个月前前往华盛顿寻求支持。他一直表现出对"7·26运动"的同情，例如在1957年5月他接手了一桩案件，151人被指控犯有反政府罪，其中22人是在格拉玛号登陆后被捕的。乌鲁蒂亚裁定这些囚犯应该被释放，声称鉴于"巴蒂斯塔和他的追随者们非法地攫取了政权，这些被告们是在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内行事"。[③]

① *Szulc*, *Fidel*, p. 348.

② *Szulc*, *Fidel*, pp. 345 – 346.

③ Sweig, *Inside the Cuba Revolution*, p. 12.

大罢工的日期被定在了4月9日，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即在罢工前一个月在哈瓦那制造大爆炸，以营造出前期的混乱气氛。"7·26运动"在哈瓦那的一次重要的赛车运动前夕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行动，即绑架了来自于阿根廷的世界冠军赛车手胡安·曼努埃尔·方吉奥（Juan Manuel Fangio），之后又大张旗鼓地将他释放。"7·26运动"的国家学生阵线在里卡多·阿拉尔孔（Ricardo Alarcon）的领导下，保证了全部国立学校的停课。[①]"人民抵抗"显然已经将行动明目张胆地发展到了警察的眼皮底下。箭在弦上，无法改变了。

163

"今天是解放日"，4月9日早晨"7·26运动"组织在他们所占领的一座电台对外广播道，"整个古巴推翻巴蒂斯塔的最后斗争在这个时刻开始了。"

事后证明，卡斯特罗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工人们没有做准备，警察和军队则是全副武装，准备妥当。"7·26运动"的城市活动者们没有足够的武器完成他们的牵制计划。他们的民兵很快就被击溃了。这场计划用来推翻政权的起义，几乎在它开始之前就已经结束了。卡斯特罗尝试着找到它积极的一面，在他写给圣地亚哥的忠诚助手赛莉娅·桑切斯（Celia Sanchez）的信中提到："这只是一场战斗失败了，并不是一场战争。"但是他无法抑制他的愤怒，承认这次灾难的惨重性："我理应是'7·26运动'的领导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必须要为其他人的愚蠢负责，但是我根本就是个什么都决定不了的废物。"[②]

5月初，他们在山里召开了一次会议，分析过去行动的错误和将来应该如何去做。"7·26运动"两翼的成员都出席了。格瓦拉在会上作了发言，对罢工的组织者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批评他们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即没有将共产党纳入到他们的计划中，军事上组织不力——在组织军队时没有经过"训练或士气的鼓舞"，也没有进行

① Sweig, *Inside the Cuba Revolution*, p. 159.

② *Szulc*, *Fidel*, p. 349.

“严格的筛选”。[1] 会后做出了领导人员调整，让“平原”中的一些领导成员，包括福斯蒂诺·佩雷斯转移进了马埃斯特腊山区。

罢工运动失败后，巴蒂斯塔政府下定了决心，准备将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游击队彻底肃清。5 月，大约 10 000 名士兵被部署用来进攻卡斯特罗在南部山区里的基地，另外对劳尔在北部的纵队发动了炮击。进攻持续了 2 个多月，但是游击队员成功地坚持住了，“每个进入马埃斯特腊山的入口都像温泉关（Thermopylae）一样坚固”，卡斯特罗对前来访问的记者们如是说。[2]

胜利击退这些试图攻占马埃斯特腊山区的军队，是这场战争中的一个转折点，是游击队员们的胜利，这场胜利补救了罢工的失败。卡斯特罗这时抓住机会，策划战争的最后阶段，将战事扩展到古巴西部的时机已经到来，这也正是遵循着 1896 年戈麦斯和马塞奥的道路。切·格瓦拉得令向拉斯维亚斯中央省挺进，卡米洛·西恩富戈斯（Camilo Cienfuegos）的目标则是西部省份比那尔德里奥，在进军途中，于埃斯坎布雷重申了卡斯特罗对独立游击队的领导权。他们在 8 月带着一支由 230 人组成的队伍出发。格瓦拉在 10 月到达了拉斯维亚斯山区。卡斯特罗在一个月后从山上的防御阵地中下来，开始向圣地亚哥行军，劳尔也从北方同时进发。 164

整个秋天，在各个战场上，战斗持续不断地进行着。乌鲁蒂亚在 12 月初借助起义军的机场跑道着陆于马埃斯特腊山，为最后的时刻做好了准备。西恩富戈斯绕过了哈瓦那，前往比那尔德里奥。格瓦拉在这个月末占领了中心城市圣克拉拉。

仅仅在进入山区的两年后，卡斯特罗就已经将其所有的竞争者们都控制住了，并且即将取得胜利。他的运气来自于他的战地指挥官们，而在两年前，他们都还是一群门外汉。格瓦拉、西恩富戈斯还有他的兄弟劳尔都显示出了杰出的领导力和战略观，他们的属下十分爱戴他

① Sweig, *Inside the Cuba Revolution*, p. 150.

② *Szulc*, *Fidel*, p. 353.

们，忠心不二。卡斯特罗另外一个幸运之处或者说是高明的地方，是保证了美国对古巴游击队的政策一直处在分歧和不明确的状态之下。持自由主义的美国人的观点以《纽约时报》和中央情报局中的进步群体为典型，是赞成和偏向于卡斯特罗的，但是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政府不管是出于惰性、保守主义，还是反共，都倾向于继续支持巴蒂斯塔，尽管他们对他的信心是越来越少。虽然美国仍在继续为其提供武器，但是既没有提供过足以使巴蒂斯塔取得一场军事胜利的军火，也没有给他的陆军和空军提供更为精密的武器装备。

当卡斯特罗胜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时候，美国人并不想与古巴未来可能的统治者为敌，尽管这并不能阻止英国或者南斯拉夫（Yugoslavs）一直到最后仍在为巴蒂斯塔提供武器。美国人认为，卡斯特罗的胜利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革命之后一定也是无政府的混乱和政治斗争，这在 1933 年革命之后已经发生过一次了。从古巴历史来看，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卡斯特罗的一次胜利能够实现将近半个世纪的稳定。

巴蒂斯塔将军在除夕夜被扫地出门了。他坐着飞机，从哥伦比亚兵营的机场起飞出国避难，随行的还有他的家人和朋友。他们想飞越海峡，从哈瓦那到圣多明各去，那里是在巴蒂斯塔的朋友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的统治之下。这名控制了古巴 1/4 个世纪的黑白混血儿士官终于走到了他政治生涯的尽头，耻辱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个曾经崇拜富兰克林·罗斯福并将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半身像放在办公桌上的人，被他的美国朋友抛弃了。在这个 10 年开始的时候，他曾经幻想，他是能够扭转古巴体制危机的人，于是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以清除旧政治阶层的腐败。他失败了，仅仅是成功地将事情变得更糟。现在轮到菲德尔·卡斯特罗了。

165

革命的开端：1959 年 1 月

1959 年 1 月 2 日，从圣地亚哥一座能够俯瞰优雅的塞斯佩德斯广场的露台上，卡斯特罗做了革命开始后的第一场演说。他选择这座城

市，是为了表彰它在马埃斯特腊山的斗争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为了表明，1898 年美国在这片沿海地带登陆的耻辱不会重演了。“革命从现在开始，”他宣布，“这次不会像 1898 年那样，北美人来到这里，成为我们国家的主人。幸运的是，这一次，革命者将真正掌握政权。”

在第一天，这位革命领袖就向美国发起了挑战——尽管当天晚上他同美国领事和他的妻子在圣地亚哥共进晚餐。

一场革命曾经被视为社会病患的终点，是一系列导致社会及政治制度无法运行的灾难的必然结果。盛行于革命最初几年的，前革命时代的古巴给人们留下的普遍记忆是几十年停滞不前的经济，政治失败、腐败、官僚主义的无能、抢劫犯罪猖獗、暴力充斥、社会崩坏。革命（或者社会主义）从感觉上来说，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形势所产生的必然结果。革命的任务就是重组社会，包扎它的伤口。

但是古巴在 1959 年并非一个贫困的，由被蹂躏的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落后际遇的国家。它是相当富裕的，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拉丁美洲，其人均收入高居第二位，仅次于以石油收益为其主要收入的委内瑞拉。[①] 从其他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指标来看——城市化、识字率、婴儿死亡率和平均寿命等——古巴是当时的拉丁美洲五强之一。[②]

全民医疗保健服务的引入经常被视为这次革命的伟大胜利之一。但是，革命前的古巴在提供医疗服务方面也并不落后。这座岛屿还拥有几项在整个美洲最高的健康指数，它并没有落后于美国和加拿大（Canada）很多。在人均预期寿命、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量两个方面，古巴都处于领先者的行列。就人均医生数量来看，古巴在 1959 年之前排在世界的第 11 位，领先英国、法国、荷兰和日本。在拉丁美洲，它排在第 3 位，位于乌拉圭和阿根廷之后。[③] 这些数字当然会严重地偏

① 革命时期，古巴人的平均年收入是 374 美元，委内瑞拉则是 857 美元，是古巴的两倍还多。

② Marifeli Perez - Stable, *The Cuban Revolution Origins, Course and Legacy*, Oxford, 1993, p. 5.

③ Jorge Ibarra, *Prologue to Revolution: Cuba 1898—1958*, London, 1998. 亦见 Louis Perez, *Cuba and the US: Ties of Singular Intimacy*, Atlanta, 1990。

向于城市人口，因为多数古巴的医生都在哈瓦那和大城镇中。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在奥连特省，条件当然要严峻的多——少量的医生、少量的道路、少量的学校和很少的固定就业机会——相比之下哈瓦那的许多居民，则是相当的富足。

166 对上述革命前的古巴历史的评估来自于古巴流亡者，他们常常是念念不忘过去的。关于古巴 20 世纪 40 年代生活的一大批浪漫小说于 20 世纪 90 年代在美国出版以及诸如"乐观社会俱乐部"[①]（Buena Vista Social Club）这样古老乐队的复苏——他们很快就风靡世界，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如果历史研究能够不受时代思潮的影响，那将是令人惊奇的。不断发展的怀旧感甚至被视为古巴的国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感觉源于其来自遥远海岸的祖先——就像黑人怀念其成为奴隶之前的非洲世界，白人移民者保持着对欧洲那已经褪色的回忆一样。20 世纪 60 年代在革命的古巴，正像托马斯·古蒂埃雷斯·阿莱亚（Tomas Gutierrez Alea）1968 年制作的电影《不发达时期的回忆》那样，通过唤醒那些曾经存在的，但是现在已经逝去的回忆，来牵动人们的心弦。这部电影反映了一个吃利息的中产阶级的焦虑不安，他在革命后留在了哈瓦那，为之前所做的决定而感到后悔不已，无法自拔。

但是，不管对 20 世纪 50 年代古巴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确切状况有多少疑问，巴蒂斯塔时代的镇压激起了复仇的呐喊和对更加美好未来的向往则是千真万确的。对于大多数"7·26 运动"的积极分子来说，反对独裁者的这场斗争是由摆脱一个令人厌恶的暴君的渴望，还有对一个即将到来的更好的社会的希望所激发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卡斯特罗从一开始就能从分歧严重的古巴社会获得如此广泛支持的原因。在 1959 年 4 月访问普林斯顿（Princeton）的时候，卡斯特罗将革命的胜利归因于普遍的"对巴蒂斯塔秘密警察的恐惧和憎恶"，还有

---

① 20 世纪 40 年代古巴的一个音乐舞蹈俱乐部，也有"乐满哈瓦那"之称。——译者注

起义者“没有宣扬阶级战争”的事实。[1]

巴蒂斯塔的独裁被普遍认为是残忍并具有报复性的，它本身确是如此（尽管在程度上不及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拉丁美洲的南方国家那样严重）。但是政府的许多暴力行动是为了对付城市的恐怖主义和游击战争。将人民带到卡斯特罗一边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他在群山中生存了下来，还有他随后在军事上的胜利。如果巴蒂斯塔能够在1958年赢得战争的胜利，或者不是如此一败涂地的话，古巴公众的看法可能就会偏向于他了。因为古巴的多数人想看到的是战争及镇压的终结，自然都会去支持胜利的一方，正如人们在这种形势下常常去做的那样。

革命的最初几年被混乱和变化不定所缠绕，卡斯特罗的士兵们在政治真空期内取得了他们的胜利。在元旦当天，哈瓦那没有政府存在，因为巴蒂斯塔的高级官员们正在估计他们能有多大的机会来对付向全国两座最大城市挺进的起义军。很快，他们发现自己根本寡不敌众，处于完全的劣势。国家传统的节假日伴随着一场总罢工的宣言，使得任何想创造一个没有巴蒂斯塔的巴蒂斯塔政权的企图都化为乌有。

167

卡斯特罗在1月2日进军圣地亚哥。西恩富戈斯在同一天从圣克拉拉进入哈瓦那，进入了巴蒂斯塔刚刚放弃的哥伦比亚兵营里的基地。格瓦拉在1月3日拂晓占领了哈瓦那港入口处的堡垒卡巴纳（La Cabana）。这两位被认为是最具英雄气概的起义指挥官是卡斯特罗军队中最具有感召力并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现在他们控制了能够掌控哈瓦那的两座军营。

因为想要追求戏剧化的效果，同时在直觉上认为，胜利所引发的狂热激情应该被允许用几天的时间来冷却，卡斯特罗仿效早期西班牙征服者所习惯的方式，开始了从圣地亚哥到哈瓦那的全国性巡视。他用了一周的时间在岛屿的各处巡游，有时坐着敞篷吉普，有时在一辆

[1] Thomas Bogenschild, “*Dr Castro*” *s Princeton Visit*, April 1959, Program in Latin American, Princeton, 1998. http：//www. princeton. edu/plasweb/publications/Essays? Castro. htm.

坦克上，且频繁地停下来向热情的群众致意。他的胜利之旅被记录在黑白电视的屏幕上。到20世纪50年代末，大约有50万台电视进入了古巴。

直到1月8日，他才抵达哈瓦那，穿过极度狂热兴奋，遍布旗帜的街道，进入了哥伦比亚兵营。在那里他意识到，支持他的联盟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于是他向现场广大听众们讲演革命团结的必要性。在讲演的最后——一件被所有亲历者所铭记的突发事件——两只白色的鸽子飞过来，停在他的肩膀上。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但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象征，标志着古巴历史新时代的开启。①

哈瓦那进入了长时间的喜庆狂欢之中。对于在革命最初几周来到哈瓦那的、激进的意大利出版商詹贾科莫·菲尔特里内利（Giangiacomo Feltrinelli）来说，哈瓦那是一个繁华和混乱的城市，满是西班牙人、黑人和华人，充满着生机和色彩。那些来自于山区的起义者非常引人注目，“你会经常在这里或那里碰到那些留着大胡子的游击队员。他们全副武装，带着手枪和冲锋枪，懒洋洋地坐在公共建筑前的大椅子上，防备着敌人的袭击。”② 胡子和贝雷帽于是成为革命的象征。

卡斯特罗为了缓和人们间的政治对立情绪，首先做的就是实现其承诺，指定曼努埃尔·乌鲁蒂亚为总统，何塞·米罗·卡多纳（Jose Miro Cardona）为总理。乌鲁蒂亚出生于一个清教徒家庭，他当时最关心的是关闭哈瓦那的赌场和妓院。卡多纳是一个自由主义律师，曾经是卡斯特罗的大学老师。在新内阁中，只有3人来自游击队，一个人来自“7·26运动”。卡斯特罗本人仍领导起义军，现在它被称为“起义武装部队（Rebel Armed Forces）”。他获得了一个新的头衔——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也是真正的权力所在。

同时，局势需要稳定，因为最初由于国外对革命的普遍欢迎所带

---

① 对萨泰里阿教的信众们来说，鸽子是神之子欧巴塔拉的象征，是一个产生人的身体，并控制每个人的思想、观点、梦想的神。鸽子飞落在卡斯特罗的肩上，被信众们看作是他被萨泰里阿教众神选中来引导和保护人民的信号。

② Carlo Feltrinelli, *Senior Service*, London, 2001, p. 184.

来的兴奋很快就被对现实的忧虑所代替，革命必然要那些曾经镇压革命的人们付出价代。数百名巴蒂斯塔过去的同伙、警察、刑讯者在例行公事的审判后，被行刑队枪毙。这场被美国新闻界形容为“血浴”的大规模战后清算，从古巴历史上来看，算是正常现象。战争期间被点燃的激情和狂热是根深蒂固的，类似的事件在现存的记忆中屡见不鲜。“30 年前，马查多政府的雇员们被认为犯有相同的罪过，被群众们抓了出来，然后被杀死了。”新任美国大使菲利普·邦萨（Philip Bonsal）在其回忆录中如是记载。[①] 政府坚称，那些被判有罪的人都经过了在马埃斯特腊山颁布的法律的审判，但是这次处决却使古巴革命在许多局外人眼中失去了光泽。

168

这种坏名声因为一项将哈瓦那体育场对战犯审判的经过通过电视直播诏告天下的决定变得更糟了。群众们群情激奋要求革命政府进行公正裁决的场面，使许多驻哈瓦那的外国记者赶到惊骇和恐惧。看似矛盾的是，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对这些情景有着自己的看法。他对美国参议员国际关系委员会做出了对这场政治剧变真相的解释：

> 当你进行一场革命时，就得杀死你的敌人。古巴军队做了许多残忍和镇压的事情，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对付那些敌人。现在他们可能将会大量使用司法裁决。这种裁决很可能会太过分，但是他们不得不经历这个阶段。[②]

奥连特的军事指挥官劳尔·卡斯特罗和卡巴纳的切·格瓦拉被认为是冷酷无情的人。格瓦拉亲自签署了至少 50 份死刑判决书，劳尔则据称主持了对 70 名巴蒂斯塔的军人的集中枪决——在一处敞开的明渠前，用机关枪将他们打死。作为一个以激进闻名，坚韧到近乎残忍的

---

① Philip Bonsal, *Cuba, Castro, and the United States*, Pittsburgh, 1971.

② Quirk, *Fidel Castro*, p. 224.

人，劳尔的强硬派名声得到了他兄长的公开承认。卡斯特罗任命劳尔为“7·26运动”的副司令，如果他死去，劳尔就可以接任。菲德尔于1月份在哈瓦那告诉公众，他们不应该担心暗杀的威胁。“人民的命运不会取决于一个人，”他说，“在我之后，会有其他比我更加激进的人上来，暗杀我只会强化革命。”① 在被选为菲德尔的正式接班人之后，劳尔同时担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负责组织一支新的古巴军队。

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巴政权顶端的活动时间将会超过40年。作为卡斯特罗五兄弟中最为年轻的一个，他循着兄长们的足迹，进入了在哈瓦那的教会学校，但是因为缺乏宗教和体育方面的天赋，他放弃了学业，在父亲的农场里工作。在被菲德尔说服，重返哈瓦那后，他去大学里学习法律，被共产主义的青年运动所吸引。18岁的劳尔后来被169 他的姐夫描述为“求知欲很强，对共产主义感兴趣，（并且）关注司法问题”对社会学很感兴趣。“他求知若渴，渴望改变整个现状，共产党给了他所有的东西。”劳尔自己称，他早期激进主义思想的产生是因为假期返家时发现“在数以千计的农民中，能够上学的只有我们家的那些人。”

正如拉丁美洲所普遍存在的那样，在加入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后，就意味着有机会到海外游历。劳尔于1953年2月坐船去了欧洲，参加在索菲亚（Sofia）举行的世界青年大会，在旅程中访问了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和布拉格（Prague）。这次的对外接触对其日后大有裨益，而且在返回哈瓦那的船上，他同尼古拉·列昂诺夫（Nikolai Leonov）成为了朋友，后者是苏联的一名年轻外交官，后来进入克格勃，这次，他是被派往墨西哥去的。1955年，他们在墨西哥会面，然后列昂诺夫恰好在1960年被派往哈瓦那任职。劳尔和未来苏联之间亲密友谊的种子这时就已经被播下了，这对革命事业意义重大。

劳尔在游击战争期间成为了最有权势的指挥官中的一员。他被派往克里斯多山区建立一个起义基地，将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半土匪性质

① Quirk, *Fidel Castro*, p. 225.

的武装力量改编成了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他们中的许多成员日后成为了古巴新军的军官。为了获得农民的支持，他在克里斯多山区同“国家小农协会”的领袖们取得了联系，这是一个受共产党资助的农民组织，然后他召开了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以确保得到他们的支持。1958 年 7 月，他是第一个对共产党的政治领袖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来到这个山区表示欢迎的。

前共产党员劳尔可能会继菲德尔之后接管政权的宣言使“7·26 运动”中那些积极反共的人感到了威胁。卡洛斯·弗朗基（Carlos Franqui）是菲德尔的支持者，也是一个反共记者，后来逃亡到海外，非常不喜欢卡斯特罗的这位弟弟，将他描述为“轻歌剧级别的希特勒”。人们从本能上排斥他，弗朗基写道，“并且菲德尔说劳尔是坏小子的话增加了他的负面形象；他们彼此间的互补是如此的完美，就像老端（Laurel）和哈迪（Hardy）一样。”[①] 但是，军队中的军官和士兵们则十分崇敬他们的这位长官。

劳尔于 1959 年 1 月娶维尔玛·埃斯品为妻。作为一个有天分，富有吸引力的女人，她曾经是圣地亚哥革命运动领导人之一。这对夫妇最终还是劳燕分飞，但埃斯品维持住了她的权力基础“古巴妇女联合会”，它是这座岛屿上主要的妇女组织。菲德尔是一个顽固坚持资产阶级道德的人，在战争期间，那些在马埃斯特腊山有了情人的游击战士们被要求在和平时期将他们的关系合法化。劳尔是第一批这样做的人。格瓦拉不久也这样做了，在 5 月的一场简单的婚礼上，他娶了阿莱伊达·马奇（Aleida March）为妻。只有菲德尔一直无拘无束地不受新的婚姻关系的束缚。他说，他娶了革命为妻。

新的革命政权在最初的 6 个月中迅速地利用旧的政权机器为它在社会最贫困分子中的支持者们谋求利益。如果哪里有需要，它就会在哪创建新的机构。其在 1 月所进行的第一个行动，即乌鲁蒂亚总统个人进行的改革运动有着很高的道德基调，标志着与不久之前的古巴明

170

① Carlos Franqui, *Family Portrait with Fidel*, London, 1980.

确地决裂：妓院、赌场、国家发行的彩票将被取消。这项措施立刻遭到了妓女、赌场老板、侍者和各种艺人的反对。在众多人的干涉面前，卡斯特罗要求行动暂停执行。他强调，人们在找到可以替换的工作之前，不能被从现有的工作上剔除出去。[①] 让乌鲁蒂亚更加不欢迎的措施是，卡斯特罗做出了政府部长们应该接受减薪的决定。乌鲁蒂亚每年10万美元的薪水同当年巴蒂斯塔的年薪相同，他想要保持这个水准的薪金。2月份，法官们的薪水降了下来，但是国家政府机构的基层雇员们的工资则增加了。

一些新的部门被创建，其中最受到欢迎的是"收缴非法侵吞财产部"（Recuperation of Misappropriated Goods）。在福斯蒂诺·佩雷斯的领导下，这个部门的目标就是处理巴蒂斯塔和他的流亡朋友们的财产和公司。两个社会部门被创建，一个是社会福利部，另一个是住建部。其初期的措施包括减少房屋和公寓的租金，在一些情况下可以减半，降低抵押贷款的利率。地主们禁止驱逐他们的佃户，城市土地的拥有者们则必须要将空地以低价卖给任何想要在那里建造房屋的人。

政府继续承担着急剧改变的压力。对电话和电力价格的控制在3月开始实行，多个公共事业公司被"干预"，尤其是美国所有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当地的分支。电话收费被降低，在4月，同样的措施也被施加于药品价格上，还规定了收割甘蔗的工人最低工资。公众保持着极度愉悦的高昂情绪，政府中没有一个人问，这些钱要从哪里出。

被期待已久的土地改革的细则最终于5月在马埃斯特腊山的一次庆典上被公布了。卡斯特罗告诉与会的农民们"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新的法案终结了所有大地产，就像他在1953年蒙卡达事件之后的讲演中所预言的那样。地主们被允许保有他们原有地产中402公顷（1 000英亩）的土地，但是多余的部分要被依法没收。[②] 一些大型牲畜养殖场免于被分割，还有那些有着丰厚产量的糖料和稻米的种植园

① Quirk, *Fidel Castro*, p. 229.

② 最开始的补偿形式是每年利率为4.5%的20年期国债。

得到了同样的处理。它们中的一些总的占地面积达到了 1 375 公顷（3 333英亩）。大量被没收的土地，即占这座岛屿约 40% 的耕地被分割为每块 67 英亩的小块土地，同时较大的牧场和种植园则以农村合作社的形式进行经营。

这些方案的设计受到无地农民们的欢迎，为他们带来一个光明的未来。“从现在开始，”卡斯特罗在 6 月对那些来自于圣克拉拉附近地区的人们讲道，“农民的孩子们将会有学校、运动场和医疗保障，农民们将第一次被视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7 月 26 日，在哈瓦那纪念“蒙卡达攻击”的庆祝会上，数以千计的农民骑着马进入了城市——有些人是乘坐客车来的——来听卡斯特罗关于新改革的讲话。支持这一事业的是拉萨罗·卡德纳斯，这位年老的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墨西哥革命总统，他在台上，坐在卡斯特罗旁边。 171

这次的土地改革本身是温和的，只是在言词上是革命的。但是它却被古巴和整个拉丁美洲的强大地主阶级看做是得寸进尺的开端。它之所以引起了美国的特别关注，是因为其中一条明确的规定，在未来，土地只能被古巴人所有。这项法案打击的是外国地主，这些人主要是美国人。有补偿的承诺，但是在许多人的眼里，这项法案证实了卡斯特罗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不论是在古巴国内还是国外，这时的他都被贴上了共产党的标签。政权内部的斗争变得更加尖锐。

为了进行土地改革，创建了新的国家机构：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INRA）很快就成为革命政府真正的总部。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以巴蒂斯塔时代曾经的市政厅为基础，分别设立工业部，由切·格瓦拉掌管，一支 100 000 人的民兵由劳尔·卡斯特罗管理，还有一个商业部。确切地说，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被同任何与土地改革有关的事情联系了起来，很快就包括了道路建设和房屋建设，也顺理成章地将卫生和教育涵盖其内——还有国防。

卡斯特罗亲自掌控着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安东尼奥·努涅斯·希门尼斯是主任，他是土地改革法的主要起草者。努涅斯·希门尼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但可能更是一个革命的浪漫

主义者。他后来被一位在古巴工作过一段时间的法国农学家雷内·杜蒙（Rene Dumont）描述为“与其让他合理地去组织社会主义的农业部门，莫如让他组织一次集会，或者骑在一匹马上，迎风高举旗帜去占领美国水果公司。”①

土地改革法被内阁签署生效，但是很多成员都反对其中的条款，认为它们是“共产主义的”。乌鲁蒂亚总统和其他的温和派现在声明自己是反共产主义者，这不是因为对苏联的担心，而是因为共产党在卡斯特罗兄弟的随从中的强势地位。第一个严重的抗议来自于空军司令佩德罗·迪亚斯·兰斯（Pedro Diaz Lanz）。他在军队中公开控诉了“灌输思想和主义的阶层”后，于6月乘一艘小船逃离古巴，前往迈阿密。下一个就是乌鲁蒂亚总统，他在多次的公开采访中概述了自己的反共观点，之后，在卡斯特罗的压力下，他被迫辞职。卡斯特罗选定的新总统是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Osvaldo Dorticos），他曾经是律师、西恩富戈斯游艇俱乐部的主席，对共产党持友好态度。他曾经是共产党长期有名无实的领导人胡安·马里涅罗的秘书。

172

内阁的内部纠纷是古巴国家原来的政治和社会精英阶层对革命的发展方向愈发不满的一个反映。为了表达他们对土地改革的批评，古巴旧的政治阶层——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大地主，或者是旧的经济体系的获益者——开始像他们的祖先在先前60年所做的那样去做了。他们对《普拉特修正案》的记忆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受到任何除他们之外的社会力量的威胁时，他们就会向美国求助，认为美国会再次被召唤而来，保护他们的利益。

这些旧的精英感到自己处于经济威胁之下，但是他们在政治领域也感到了危险，革命允许那些迄今为止几乎未登场的黑人出现在了这个政治舞台上。许多的白人，不能原谅卡斯特罗对黑人的支持。

革命中的黑人（1959）

1959年3月的一个晚上，切·格瓦拉的黑人保镖同他的朋友前往

---

① Thomas, *Cuba*, pp. 1 217 – 1 218.

位于哈瓦那东部塔拉拉（Tarara）的海滨度假村中的一家俱乐部。格瓦拉在游击战后精疲力竭，正在那里疗养，政府事实上也搬到了这里。他的卫士哈里·维耶加斯（Harry Villegas），绰号庞博（Pombo），后来同他在刚果和玻利维亚并肩作战。多年后，他回忆了当他进入塔拉拉俱乐部后所发生的事情，那是过去规定的黑人禁止入内的地方。

庞博在内的这群黑人被拒绝入内，曾经在墨西哥训练过这些游击队的贝尤将军被叫去将他们带走。庞博问道，像贝尤这样"在军队中如此受尊重和喜爱的人"怎么可能"不理解，如果我们不抗争的话，黑人将会继续被压迫的道理"。[①]

这次在塔拉拉的事件是一次微小的但是危险的事件，是对60年前形势的重现，当时黑人士兵抗议他们不被允许参加反对西班牙的自由战争，他们发现在和平年代的古巴，奴隶时代的习惯仍然被保留了下来。庞博和他的朋友们离开了俱乐部，因为贝尤要求他们这么做，但是当他们回到基地，向切·格瓦拉护卫队其他成员们说明了所发生的一切后，他们的愤怒再次爆发了。他们拿起了步枪，返回了那家只允许白人进入的俱乐部，然后告诉所有人从那里出去，说："现在这里是革命军的俱乐部了。"

根据庞博的记载，贝尤向格瓦拉说明了所发生的事情，格瓦拉对黑人士兵们做了讲演："告诉我们不应该像这样去做，因为这会被敌人所利用。他说，革命还没有发展到让人们能够理解黑人和白人其实是一样的，现在，我们正在为了全体古巴人民，为了平等，为了反对歧视而战斗。" 173

庞博在多年后，即20世纪90年代做了反思。"革命创造了结束歧视的条件，它也正在为此而战，但还是有当面侮辱你的人存在……有人对我这样说过，我愿意为你而死，但是我不允许你娶我的女儿，因为你是黑人。"

---

① Making History: *Interviews with four generals of Cuba's 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New York, 1999. pp. 127 – 130.

卡斯特罗的革命是由白人激进分子完成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孩童时代从西班牙移民而来的。100 年前，这样的人会加入志愿军，为西班牙，同黑人的古巴进行战斗。20 世纪 50 年代，他们成为了革命性改变的先锋。但是黑人在革命战争的领导层中并没有占据突出的地位。少数的，可能只有 12 人，参与了 1953 年的蒙卡达袭击，更多的人是在马埃斯特腊山区被征募进入革命军的。胡安·阿尔梅达，一位黑白混血的砖匠学徒，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成为了一位高级指挥官和重要的革命领导人，但是作为 19 世纪“黑匪”独立战争时期显著特征的黑人因素，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游击战里并没有占据主要的位置。

大量的黑人不愿意参与到起义事业中来，这有着几方面的原因。一是缺少一个专门针对黑人的政治纲领。卡斯特罗的“7·26 运动”并没有在吸引黑人支持者方面做出太大的努力，“肤色问题”在 1959 年之前从来没有出现在卡斯特罗的讲话或者纲领之中。[①] 在革命胜利后，他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共产党是唯一的一个不厌其烦地去发展黑人党员的党派。诗人尼古拉斯·纪廉、工会领导人拉扎罗·皮纳都是共产党内卓越的黑人党员。卡斯特罗在公开场合维持着同共产党的疏远关系，因而无法从这种联系中获益。

另外一个缺少黑人支持者的原因是许多黑人对独裁者在感情和政治上的支持。巴蒂斯塔是一个黑白混血儿，在血统上出身低贱，被传统的白人统治精英们所鄙视和嘲笑。黑人支持和同情他：他同样不被允许进入排他的、只有白人的俱乐部；他公开参与了萨泰里阿教[②]的仪式；他对非洲裔古巴人所欢迎的黑白混血儿之舞的庆典给予支持，在传统的从未给予黑人支持的白人政治体系中，巴蒂斯塔的角色是一名外人，一名反对者，这使得他成为了许多贫困黑人的榜样。巴蒂斯

① 根据卡洛斯·弗朗基的记述，“在 7·26 运动内部没有关于古巴黑人状况的讨论。有一个完全在形式上的，对激进的种族歧视的谴责，但是也就到此为止了。”引自 Carlos Moore, *Castro, the Blacks and Africa*, Berkeley, 1988，第 7 页。

② 一种源自于非洲的信奉万物精灵的宗教，由非洲黑人奴隶带到古巴，在举行庆典时伴随有舞蹈、魔法和动物献祭仪式。——译者注

塔军队和警察武装中的黑人比率高于全国的平均数字。

174 当然，许多黑人支持了卡斯特罗，参加到了革命战争和城市抵抗中去。但是就像1898年那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胜利之后感到无尽的失望，庞博在开始的时候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卡斯特罗始终注意公众的情绪，很快就得到了消息，革命对黑人问题的处理终于成为它的伟大成就之一，尽管对它的争议也从来没有停息。

卡斯特罗对塔拉拉所发生的事件迅速采取了行动。3月，他针对这个问题做了第一场讲话，号召开展一场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在教育、就业和所有公共服务领域。肤色的不同没有任何的意义，他说，"我们都拥有或浅或深的肤色。较浅的肤色意味着他的祖先来自于西班牙，他们曾经接受过来自于非洲的摩尔人殖民者。另外，没有人能够自认为是纯种的人，更不用说什么高级的种族了"。[①] 他不止一次地回顾起了独立战争的历史："我们也都知道有这样的反动分子，他们常常会说，独立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我们获得了独立，那么它就会带来一个由黑人控制的共和国。因此，他们心中充满了各种的恐慌和不安，与现在所浮现出来的恐惧一样。"

他的讲演后来被称为"反对歧视宣言"，所有古巴的白人专用的设施随后向所有人开放，或者是被关闭了。许多的白人对这些新的发展感到不满，或者往好处说的话，表示怀疑。卡斯特罗昔日的朋友，后来流亡海外的特蕾莎·卡苏索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利用黑人这种战略武器"是如何变成"菲德尔在古巴的全面策略中的重要一环"的。"他试图将自己变成那些受压迫的人——也就是说，黑人和农民——的朋友和保护人"，[②] 她写道，旧的精英阶层不能原谅卡斯特罗发动"这些被压迫的，长期受苦的群体加入到一次恶意和仇恨的改革运动中去"。卡苏索的话讲出了那些不满的白人流亡者的心声，但是在革

---

① 1959年3月22日卡斯特罗的讲话。本书援引的所有卡斯特罗的讲话都来自于德克萨斯大学所筹建的卡斯特罗高速数据库（Castro Speed Data Base），网址为 http://lanic.utexas.edu/la/cb/cuba/castro.html。

② Teresa Causo, *Cuba and Castro*, New York, 1961, p. 241.

命的初期，绝对不存在任何黑人欣喜若狂、妄自尊大的现象。

从本质上来说，卡斯特罗是一个进步的白人自由主义者，他关于种族的雄辩言辞与美国总统肯尼迪（Kennedy）和约翰逊（Johnson）相像。他当然不会接受1912年黑人激进分子们所举起的黑人分离主义的旗帜。卡斯特罗革命对黑人分离主义仍旧保持着敌意，这一点同这个世纪初的白人政权是一样的——可能更甚。卡斯特罗政府取缔了殖民时代曾经在促进黑人和非洲人意识上起到重要作用的黑人社团。带有互助性质的有色人种社团长期以来都是表现非洲裔古巴人的文化和社会喜怒态度的一个渠道。它们被严重削弱，因为革命不允许有任何竞争者。这些社团的节日庆典被限制在周末的聚会上，其资金被没收。各省的黑人俱乐部及其在全国的总部都被关闭了。[①] 500多个黑人社团被禁止存在，一个社会学家，曾经的黑人全国联合会的主席胡安·雷内·贝当古·本柯莫（Juan Rene Betancourt Bencomo）逃亡到了海外。

175 但是卡斯特罗用自己的方法来向黑人表明，他同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在革命初年，他被人广泛地称为“骏马”，卡斯特罗将一个马的模型放在他的桌子上，这样一来，每次他出现在电视上的时候，观众们都能看到它。这个习惯的来源，通常被追溯到伟大的黑人歌手贝尼·摩尔（Beny More）的一段话，他听说卡斯特罗前一天晚上来了，于是喊出了“马儿来这里了”——于是这个绰号就被流传下来了。[②] 马的受欢迎和流行来源于中国人博彩时作为神奇的第一名的图画表现形式。更为有趣的是，尽管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个典故，但马却是埃瓦里斯托·埃斯特诺斯的象征，他是1912年黑人起义的领导人。[③] 卡斯特罗反对黑人分离主义，但是却唤起了人们对深深地印在奥连特省黑人的记忆之中的这次起义的回忆，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向黑人表示，他

---

① Ronald Segal, *Black Diaspora*, London, 1999, p. 235.

② Franqui, *Family Portrait with Fidel*, p. 25.

③ Louis Perez, *Lords of the Mountain: Social Banditry and Peasant Protest in Cuba, 1878—1918*, Pittsburgh, 1989; Aline Helg, *Our Rightful Share: The Afro - Cuban Struggle for Equality, 1886—1912*, Chapel Hill, N. C., p. 150.

站在他们一边。

革命将为广大的黑人民众创造出经济发展好的前景，但是在没有美国式的，积极的歧视政策的情况下，他们的社会和政治上的发展仍旧缓慢。到了1979年，34名部长中仍然只有5人是黑人，古巴共产党的政治局里只有4名黑人成员（一共14人），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里，则是16人（一共146人）。亦没有黑人将军在安哥拉服役，尽管军队的主体是黑人。①

一如白人古巴的传统，革命并不希望古巴黑人以黑人的身份组织起来，但是察觉到了种族问题后，卡斯特罗很快就领会了这个问题在国外的重要性。美国的黑人已经开始被动员起来，维护他们的公民权利，在非洲的黑人们经过斗争，成功地从殖民统治中摆脱了出来，获得了独立。古巴革命很快就与这两个集团取得了联系，间或为他们之间的会见提供便利。古巴将成为美洲和非洲之间的一座重要的桥梁。

革命对外国的影响（1959—1960）

在古巴发生的新风潮冲击了拉丁美洲长期存在的军事独裁国家，革命本身对整个世界的所有国家都形成了近乎直接的影响。它爆发于英法帝国几近最终崩溃的时刻，美国此时则濒临于学生激进主义和黑人运动的新时期。在这些国家，那些二战时期（或者更早）的老一代角色仍然在掌权，而古巴的革命则被视为新时代的曙光。美国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法国的戴高乐将军、英国的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苏联的尼基塔·赫鲁晓夫以及中国的毛泽东——所有这些人都出生于19世纪——旧的世界，已经非常衰老了。

在这些老人掌权的背景下，年轻人涌现出来，尤其是来自于古巴山区的那些抢眼的游击队员们。20岁到30多岁的精力充沛的战士们有望清除旧的秩序，带来新的纪元。他们的改革热情和似火的国际主 176

① Antoni Kapcia, *Cuba, Island of Dreams*, Oxford and New York, 2000, p. 200.

义言辞很快就被各地的新生代们接受，他们不满于——或者只是厌烦于——战后的协议。从革命一开始，想要成为革命者的人们就不断地造访哈瓦那。最初，它的影响在拉丁美洲最大。自 19 世纪初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在世界历史上，古巴再次成为了主角。后来涌现出来的 20 世纪拉丁美洲的伟大小说家们——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Augusto Roa Bastos）、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都受到了革命所释放出来的文化能量的激励。他们中的一些人为革命贡献了激情澎湃的文字，成为政权的喉舌，其他人则为切·格瓦拉的阿根廷同胞豪尔赫·马塞蒂（*Jorge Masetti*）所创建的古巴新的革命杂志《拉丁美洲通讯（*Prensa Latina*)》写作，其雄心是在"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视角之外，提供认识这片大陆的另一种视角。

来自于拉丁美洲之外的访问者们带着他们准备好的笔记本，从革命的第二个年头，即 1960 年起陆续来到哈瓦那。美国的知识分子们也受到了古巴剧变的强烈吸引，他们的政府出于敌意，却对此感到担忧。这些知识分子们对于革命的热情不久就对学生运动、黑人的反抗、反核运动和反越战运动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运动是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政治和文化的特征。从欧洲也来了一大群崇拜者，包括法国作家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德·波伏娃。他们将古巴革命比作 1944 年法国解放，将游击队看作法国马基游击队（Maqui）的翻版。

这些早期的革命观光客们来到古巴，带着他们自己的目的、期望，来诠释一场革命应该是什么样。一些人回顾了 1917 年的俄国革命，将古巴收割甘蔗的工人描述为创造了正统革命苏维埃模式的工业无产阶级。其他人则援引了 1949 年的中国革命，详述了古巴农民在马埃斯特腊山中所发挥的先锋作用。另一些人则期盼着战后出现的新兴的后殖民时代的第三世界为经济发展而进行的斗争，视古巴为即将发生的斗争的最前沿。

作为战后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哲学家（他的著作为格瓦拉所熟悉），

萨特于1960年初到了古巴。“革命是一剂猛药，”他在题为《萨特在古巴》的著作中如是写道，该书于第二年在英国出版。他对自己所见所闻进行了描述，并给予了它坚决的赞同：

177

一个社会，在重锤之下，打破了它的框架，摧毁了它的结构，推翻了它的机构，改变了所有制，并对社会财富进行了重新分配，将它的生产调整到其他的原则之上，试图尽可能快地提高发展速度，并且，在最为激烈的摧毁的时刻，还试图进行重建，移植一个新的框架结构。这种治疗的办法是极端的；它必须要经常与暴力为伴。[①]

1960年初的几个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其他人是一些来自于美国的独立左翼人士，有些是作家，如一个非常有名的马克思主义期刊《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编辑利奥·胡贝尔曼（Leo Huberman）和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一场革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他们带着预见似地写道，“它要经过许多的阶段和步骤才能展开。它永远不会停滞不前。今天看来正确的事物到了明天可能就不正确了，反之亦然。”[②]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左翼学者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几个月后来到了古巴，然后写了题为《听着，美国佬》的书，采取一个古巴革命者向一个美国读者解释古巴革命的模式展开叙述。这本书是对革命的一部赞歌，但是在最后用他自己的声音，赖特·米尔斯论述了这次革命的主要缺点，即人才的缺乏：

这里面含有两层意思：首先，在普通意义下，缺乏足够的掌握技术和知识，还有识别力的人；但是第二个，我所谈到的缺乏是与被感知到的反革命威胁和普遍的未受教育的人口这一事实相联系在一起的。

① Jean - Paul Sartre, *Sartre on Cuba*, New York, 1961, p. 14.

② Leo Huberman and Paul Sweezy, *Cuba: Anatomy of a Revolution*, New York, 1960. p. 77.

这种结合会导致一种简单的解决办法：对所有表达意见的方式的绝对控制和制定路线让人们来执行。[1]

赖特·米尔斯在这本书出版不久之后就死了，他没能看到自己是多么的有远见。

在记者和学者之后，热情的左翼支持者们也很快地赶来，著名的人物有 I. F. 斯通（I. F. Stone），他是他自己主编的华盛顿的政治周刊的主编。还有来自于法国《世界报》的克洛德·于连（Claude Julien），以及年轻的美国研究者们，比如罗伯特·席尔（Robert Scheer）和莫里斯·才特林（Maurice Zeitlin）。[2]"古巴革命"，席尔和才特林写道，"首先，是一场经济发展的革命。就像发生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运动一样，它的领导者们将经济发展看作了社会和文化进步的关键。"[3] 这也是一个准确的预言，古巴的示范性效果——对拉丁美洲和新出现的第三世界的其他国家——将给 1961 年新的肯尼迪政府敲响警钟，程度不亚于对卡斯特罗支持共产主义的倾向的恐慌。

在美国的古巴革命的支持者们，于 1960 年 4 月在纽约组织了古巴公平竞争委员会（Fair Play for Cuba Committee），它的附属委员会亦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许多城市中建立起来。在他的早期支持者中，有威廉·阿普曼·威廉姆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和劳伦斯·弗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还有熟悉古巴问题的人们，比如卡尔顿·比尔斯（Carleton Beals）和沃尔多·弗兰克（Waldo Frank）等。[4] 该委员会后来因为其成员们的活动在 1963 年变得声名狼藉，李·哈维·

178

① C. Wright Mills, *Castro's Cuba*, London, 1960, p. 184.

② 克洛德·于连所写的关于革命的最初的历史著作之一是 *La Revolution Cubaine*（Paris, 1961）。

③ Robert Scheer and Maurice Zeitlin, *Cuba: An American Tragedy*, New York, 1964.

④ E. Van Gosse, *Where the Boys Are: Cuba, the Cold War, and the Making of the New Left*, London, 1993.

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被确认为暗杀肯尼迪总统的人犯。①

那些普通的参观者们急于更直观地去观察一场革命，持续不断地涌入古巴，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一些人是自费前来，许多则是公务来访。古巴的革命者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些人作为潜在宣传者的意义，他们不断谋划着非同寻常的国际性大事件，包括一次1968年举行的文化大会，使得来自于欧洲、美洲和非洲的作家、艺术家和颠覆分子之类的政治活动家们来到了哈瓦那。20世纪60年代的哈瓦那如同18世纪90年代的巴黎、20世纪20年代的莫斯科一样，在短时期内成为了一个革命的圣地，一个改变中的、乐观的世界中心。

美国对革命的反应（1959—1960）

卡斯特罗的革命并不受艾森豪威尔总统第二任政府的高层的欢迎，当时正值它衰弱的阶段。这位著名的战时将军有着他远征欧洲，同丘吉尔和斯大林（Stalin）交往的回忆，是不会对一场加勒比海的革命感兴趣的。他更倾向于在一旁袖手旁观，不理不睬。当卡斯特罗于1959年4月访问华盛顿的时候，他则自己去打高尔夫。艾森豪威尔有同他们这样的人接触的经历，因为他曾经在1954年命令中情局在危地马拉推翻哈科伯·阿本斯政权，那是美国的一次成功的行动，被认为是冷战时期处置一个被认为过于接近共产主义政权的模板。

他的兄弟米尔顿（Milton）对拉丁美洲很有感情，但是作为总统，艾森豪威尔在20世纪50年代末对这片大陆则大感焦虑，因为副总统

---

① 在加利福尼亚参议会调查反美活动小组委员会（Senate Fact - Finding Subcommittee on Un - American Activities in California）的听证会之后公布的一则对古巴公平竞争委员会的报道显示出当时的官方态度："这个组织于1960年4月成立，目的显然是扩展对卡斯特罗革命的宣传和发展共产党的分支机构。这个组织的各分支小组在全美的许多大学里都表现活跃，尽管在加利福尼亚他们还处于分散的状态，他们会突然积极地参与到同其他组织共同进行的一次游行示威中，然后就疏散开来，脱离人们的视线，直到下次机会来临……在共产党阵线的外围，有一些无固定组织的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家应和着共产党的立场，认为卡斯特罗的革命实际是由美帝国主义引起的，是因为美国大企业集团对古巴人民的剥削。这个路线是典型的，由共产党精心策划的，意在使我们看起来就像是祸首恶棍，而'民主的人民政府'在国家舞台上则看起来像是英雄。"

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于1958年5月巡访拉丁美洲的时候受到了令他不愉快的待遇，这冒犯了他。[①] 在每个首都城市，尼克松都遭遇了示威者，他们表达着对美国支持拉丁美洲军事独裁者的不满。当尼克松的汽车在加拉加斯的街道上受到袭击后，艾森豪威尔立刻采取了军事行动。“当这个消息传到我这里的时候，”他回忆道，“我命令1 000美军飞往关塔那摩湾和波多黎各”，准备营救副总统。[②] 这就是艾森豪威尔首选的方式，先一棍子打来，然后再问问题，即使是尼克松自己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美国最近对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和民主表示重视，应该不会是坏事。

179 这一年的年末，当巴蒂斯塔政权濒临垮台的时候，总统从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那里收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共产党人和其他的极端主义者们显然已经渗透到了卡斯特罗的运动里。如果卡斯特罗接管了政权，他们就可能会进入政府。”[③]

艾森豪威尔为自己没能更早得到消息而感到遗憾，然后将希望寄托在巴蒂斯塔和卡斯特罗之外的某个“第三支力量”的出现上。当时，这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实际上在1959年新年当天，也就是新政权未建立而巴蒂斯塔的将军们行动失败时就已经被挫败了，但是这个议题还是被保留在了美国的日程上。1959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开会期间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对促成建立“另外一个统治古巴的政府”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但是这些讨论无果而终，到6月就被放弃了。[④]

最初，美国曾经因为乌鲁蒂亚和卡多纳的任命而打消了疑虑。1

---

① 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回忆录里称，“近半个世纪”来一直对拉丁美洲有兴趣，他曾经于20年代在巴拿马运河区服役3年。他甚至曾经想在阿根廷做一番事业，“我认为，那个地方在19世纪70年代就像我们自己的西部”。成为总统后，他让他的兄弟米尔顿担当这片大陆的特使。他的著作 *The Wine is Bitter* 广泛而真实地记述了这片大陆上的人们对美国不断增长的敌意。

② Dwight Eisenhower, *The White House Years: Waging Peace*, 1956—1961, London, 1966, p. 519.

③ Eisenhower, *Waging Peace*, p. 521.

④ Szulc, *Fidel*, p. 384.

月7日，一份放在艾森豪威尔办公桌上的情报部门的汇编报告称："在哈瓦那集会的美国商人们强烈要求美国迅速地对新的古巴政府予以承认，现在这个政府显然比他们所期望的要好得多。"[1] 其他更加接近于本国的人也在如此力荐，其中包括亚当·克雷顿·鲍威尔（Adam Clayton Powell），他是纽约的黑人民主党国会议员。在这一天，官方也给予了外交承认。菲利普·邦萨，一个没有同巴蒂斯塔有过联系的人作为新任大使被派往了哈瓦那。邦萨是古巴问题老手，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为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古巴工作，后来在哈瓦那大使馆做领事。他的父亲在1898年美国干涉古巴期间曾经在这个岛屿上做过战地记者。

尽管双方都在互相恭维，最初的氛围也是礼貌客气的，但是美国政府和古巴革命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的不信任感。回顾自1898年以来的美国、古巴之间的冲突史，在没有华盛顿方面关注的情况下，任何激进的或者民族主义的政府都不能在哈瓦那掌权。同样，任何一个实至名归的激进的古巴政府都不会对未来同美国的关系抱有幻想。这种分裂是需要在一定阶段才会出现的。而它出现得越早越好。

当然，古巴人对美国的熟悉要高于美国人对古巴的熟悉程度。多数美国人都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他们过去同这座岛屿之间的关系，但是新的古巴政府对此并不这么认为。10月，失望的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惆怅地回忆美国曾经是如何为了古巴的自由而战的："从我们的历史上来看，你们应该相信，这个国家是我们真正的朋友。"[2] 而在对自己历史进行解读之后，古巴得出的结论则完全不同。

尼克松是第一个会见卡斯特罗的高层人物。在卡斯特罗4月访问华盛顿期间，两人交谈了3个小时，艾森豪威尔忽视了这次访问。尼克松后来回忆，他将他的观点告诉了所有人，卡斯特罗"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也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3] 6月，土地改革法颁布后的几

---

① Eisenhower, *Waging Peace*, p. 522.

② 语出艾森豪威尔的记者招待会，1959年10月28日。

③ Richard Nixon, *Six Crises*, New York, 1962, p. 379.

180 个星期内，美国送出了一份官方的抗议照会，就像古巴的反对派们希望的那样。美国的声明称，这场改革会对古巴经济产生反作用，会阻碍对农业和工业的个人投资。法律中所申明的补偿是微不足道的，这项声明要求，这一补偿应该是“及时的，适宜的和切实有效的”。这样的说法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反复出现。古巴人对这些被没收的财产进行估价的时候，是以这些土地所有者们自己呈交的纳税申报表上所提供的价值为根据的。基于数年前所做的评估，其价值当然是相当低的了，远低于现时的土地价格。

美国人曾经是土地改革的温和的支持者，后来通过进步联盟，相当热心地于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推动土地改革。他们在1945年之后曾经在日本进行过一次土地改革。格瓦拉于1959年6月访问东京时指出，被“美国政府所支持和严格控制的”日本土地改革，是这个世界上最为激进的——“他们只允许每个人拥有一公顷（2.47英亩）的土地”。美国人怎么会批评允许每个人占有400公顷土地的古巴改革呢?[①] 日本改革在补偿合同上给予的利息率更低。[②]

土地改革是美古关系的转折点。当国家安全委员会于6月重新恢复了关于古巴问题的讨论时，它得出的结论是，卡斯特罗必须垮台。美国政府未公开的目标是积极行动起来，“以支持古巴反对派发展的方式，带来……一个新的对美国有利的政府”。[③] 这项任务没有它最初看起来的那么容易。负责美国国内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伊·鲁伯特姆（Roy Rubottom）在1960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总结，描述了在此之前6个月中他们所做的事情：

---

① Jose Luis Llovio – Menendez, *Insider: My Hidden Life as a Revolutionary in Cuba*, New York, 1988, p. 17.

② Thomas, *Cuba*, p. 1217.

③ 美国NSC会议，1960年1月14日，引自Piero Gleijeses, *Conflicting Missions: Havana, Washington, and Africa, 1959—1976*, Chapel Hill, N. C., 2002, 14–15页。利文斯通·麦钱特（Livingstone Merchant）在国务院担任助理国务卿时在1960年1月的NSC会议上解释了美国的计划，并且指出，这项政策是在1959年6月被初次制定出来的。

在6月（1959年）我们得出了结论，只要卡斯特罗在位，就不可能完成我们的目标……在7月和8月我们一直忙于起草一份取代卡斯特罗的计划。但是一些美国公司在这段时间向我们报告，他们在谈判上正有所进展，这个因素使得我们的计划暂缓执行。这些公司的期望并没有实现。10月是澄清的阶段……①

鲁伯特姆的报告写道，到了10月底，国务院和中情局草拟出了一个新的计划。他们向美国总统建议，批准它"授权我们支持那些在古巴反对卡斯特罗政府的群体，同时使得卡斯特罗的倒台看起来像是他自己所犯的错误带来的结果。"②

这个决定是因为经济因素，而不是由于共产主义的威胁而产生的。古巴的精英人物们对卡斯特罗同当地共产党合作的意愿表示了担忧，但是古巴同苏联在1959年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1月份俄罗斯人与美国同时承认了古巴政府，但是他们间的外交关系直到1960年5月才恢复。这个时候革命已经进行了6个月，美国决意将其推翻。

181

苏联对革命的反应（1959—1960）

古巴革命令苏联措手不及。从苏联政府到其社会，对拉丁美洲的忽视是根深蒂固的，它的领导人对可能会在加勒比海获得一个社会主义盟友的情况完全没有准备。第三国际时期，拉丁美洲的各共产党组织与莫斯科之间的大量信息往来在二战期间终结了，苏联很久以前就接受了拉丁美洲是被美国控制的西半球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事实。直到卡斯特罗革命之后，俄罗斯人才感到必须要为之前对他们的忽视予以纠正。他们在莫斯科建起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院，大规模地培养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专家——他们去做外交官、间谍和记者，还有古巴民族工业的顾问。

① Gleijeses, *Conflicting Missions*, pp. 14－15.

② Gleijeses, *Conflicting Missions*, pp. 14－15.

莫斯科和哈瓦那最初的外交联系是在二战的特殊环境下建立起来的。第一座苏联大使馆是由驻华盛顿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于 1943 年在哈瓦那开设的。斯大林对巴蒂斯塔的外交部长奥列里·孔切索（Aurelio Concheso）也表示了欢迎，此人于同年对莫斯科进行了一次访问。[①] 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同时身兼驻华盛顿和哈瓦那大使，但他从来没有访问过古巴岛。巴蒂斯塔的战时政府对莫斯科和古巴共产党的友好态度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在冷战开始后，古巴总统格劳·圣马丁（Gray San Martin）和普里奥·索卡洛斯投向了美国的反共势力那边，跟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为伍。在 1952 年巴蒂斯塔的军事政变后，苏联中断了双方的外交关系。

1953 年，卡斯特罗对蒙卡达的攻击以及随后的游击战争并没有引起莫斯科高层的注意。“当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带着军队进入哈瓦那的时候，我们对他的政权会走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全然不知。”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②] 格瓦拉的传记作者乔恩·李·安德森曾经对与古巴有过往来的级别较低的官员们进行过采访，他所介绍的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他认为，在 1959 年之前，俄罗斯人就已经对古巴产生了兴趣。“克里姆林宫并不是在读到了古巴革命的报道后，旋转了下地球仪，才‘发现’它……”[③] 可能情况确实如此，但是这种在苏联管理机构的基层中所产生的兴趣并没有怎么渗透到政治局中去。俄罗斯人在革命的第一年并没有对这座岛屿公开表示过兴趣。

182

相比起其他事情来说，古巴人更乐于向苏联主动示好。他们需要推销其蔗糖产品。1959 年 6 月，当土地改革法的细节公之于众，美国开始秘密地策划推翻卡斯特罗政府的时候，切·格瓦拉被派到国外考察以获取支持。他访问了几个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其中包括埃及、

① Thomas, *Cuba*, p. 731.

② Strobe Talbott, ed., *Khrushchev Remembers*, Boston, p. 488.

③ Anderson, *Che Guevara*, pp. 414 – 415.

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斯拉夫。[1] 他在日本也找到了新的市场，苏联也在他的考虑范围内。在开罗的时候，格瓦拉同苏联大使馆取得了联系，他们之间交流的进程加快。他与俄罗斯人在7月份达成了初步的协议，苏联购买古巴50万吨糖。这份协议本身没有什么引人关注的，因为他们曾经在1955年，即巴蒂斯塔时期，也购买了这个数量。

但是苏联的好奇心已经被激发出来了，作为外交官兼克格勃间谍的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Alexandr Alexiev）在10月抵达了哈瓦那。在他们的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的办公室里，他被介绍给了卡斯特罗和努涅斯·希门尼斯。[2] 阿列克谢耶夫曾经于西班牙内战期间在西班牙生活，是一个能说一口流利西班牙语的演说家。他在苏联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工作过，随后掌管苏联外交部的拉丁美洲司。1961年，在苏联—古巴的外交关系恢复后，他成为了苏联驻哈瓦那大使。

努涅斯·希门尼斯于1959年7月访问了纽约，然后参观了在纽约的一个苏联贸易展览会。他当时表示，这个展览会应该被带到古巴去。他告诉卡斯特罗和阿列克谢耶夫："它会显示出美国关于苏联的反动宣传是不真实的，从而让古巴人民真正地认识苏联。"[3] 这个展览当时已经被安排前往墨西哥城做巡回展览，将它的巡回展览延伸到哈瓦那并不困难。展品于1960年2月到达了哈瓦那。

俄罗斯人现在完全意识到了古巴问题。赫鲁晓夫派出了他的代理人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去哈瓦那主持展览会的开幕。米高扬是一个来自亚美尼亚（Armenia）的老布什尔维克，1935年后就一直在苏共政治局。他签署生效了一笔同古巴人的蔗糖交易案，同意在未来的5年内，每年购买100万吨糖。俄罗斯人在支付的时候，20%使用美元，80%使用货物——主要是石油、机械、小麦、新闻纸和各种化学制

① Anderson, *Che Guevara*, pp. 425 – 434.

② Anderson, *Che Guevara*, pp. 441 – 443.

③ Anderson, *Che Guevara*, p. 443.

品。[1] 他们还提供了用于购买植物和设备的100万美元信贷。类似的协议在之后的连续几个月中同数个苏联的盟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达成了。

米高扬同卡斯特罗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并游历了古巴全国。他的儿子谢尔科（Sergo）同格瓦拉建立起了亲密且持久的友谊。两个人带着对革命的一份积极乐观的记述返回了莫斯科。这种关系建立的正是时候，因为古巴和美国的关系现在正呈剑拔弩张之势。这是美国的 183 选举年，选举斗争充斥着公众的视野。理查德·尼克松和约翰·肯尼迪在他们的处理古巴威胁的承诺上胜过了其他人，同时艾森豪威尔总统仍然继续着他摧毁革命的秘密计划。

"第一次哈瓦那宣言"：革命换挡提速（1960）

在米高扬1960年2月访问哈瓦那的时候，美国摧毁古巴革命的计划已经拟订了。1月，这个计划已经被艾伦·杜勒斯递交给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中情局建议破坏古巴的榨糖厂，这是古巴财富的主要来源。许多依赖于单一经济活动的拉丁美洲国家产品——危地马拉的香蕉、智利的铜、委内瑞拉的石油等——在这方面都是脆弱的。如果美国不喜欢这些国家掌权的政府的话，都可以以此威胁。

艾森豪威尔喜欢这个提案，但是认为它还远远不足。根据他的特别安全助理的一份报告，他告诉杜勒斯："现在到了应该用明确的、侵略性的方法来反对卡斯特罗的时候了，它不仅仅是骚扰。他要求杜勒斯先生再带来一份扩展的计划。"[2] 杜勒斯在准备一份更富野心的方案的同时，其建议的"侵扰"先行启动了。对这座岛屿的蓄意破坏行动很快开始，通常都是由中情局资助的流亡者们乘坐小型飞机来进行，以制糖工厂为主要目标。其他的目标则更具野心。一艘比利时货船从

① Edward Boorstein,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Cuba, a First - Hand Account",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68, p. 27.

② 艾森豪威尔的特别安全助理格雷（Grat）的记述，引自 Gleijeses, *Conflicting Missions*, 15 页。

安特卫普带来了少量的军火——不顾美国的武器禁运——这艘船于1960年3月4日在哈瓦那的港口内爆炸了。100人被炸死，300人受伤。当时，这引起了人们对缅因号事件的回忆——正是缅因号的毁灭导致了1898年美国介入古巴事务，但是这次的事件也产生出了切·格瓦拉那张戴着他的贝雷帽的著名照片。他当时赶到现场的时候，被阿尔贝托·柯达（Alberto Korda）抓拍到。

4月，美国和古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当时苏联首批30万吨的石油运抵古巴，这些石油是用来交换蔗糖的。古巴政府要求岛上现存的3个炼油厂——分别为壳牌（Shell）、标准石油（Standard oil）和德士古（Texaco）所拥有和经营的工厂——对这些石油进行提炼。美国阶段性的计划是尽可能地从经济上对古巴进行破坏，在古巴的美国石油公司迫于来自于美国政府的压力，拒绝提炼苏联的石油。面对着他们的不合作，古巴人在6月没收了他们在这座岛屿上的财产。[①]

美国人这时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对古巴制糖工业的摧毁上。一项早在1月份就在国会上提出的议案赋予了总统取缔现有的美国蔗糖进口配额的权力，进口配额通常都会给古巴糖制品优惠的税率。艾森豪威尔最终在6月签署了法令，减少蔗糖的进口配额。这一年，古巴有70万吨的蔗糖产品没有了销路。[②] 184

“他们将会一磅一磅地减少我们的配额，我们将会一座接着一座地减少他们的糖厂。”当这项议案在国会通过后，卡斯特罗如是说。[③]他警告，如果配额被砍掉的话，美国在古巴的财产将被国有化。一条新的标语出现在了哈瓦那的街道上——*sin cuota*，*pero sin amo*——意即“失去了配额，但是走了个主子”（*amo*是古代语言中奴隶主的意思）。

俄罗斯人立刻前来救援，提出购买那没有被卖出去的70万吨蔗糖。中国人随后积极跟进，提出未来5年每年购买50万吨蔗糖的计划。赫鲁晓夫走得更远，他宣布苏联不再承认美国对美洲的控制权。

---

① Quirk, *Fidel Castro*, pp. 316–318.

② Quirk, *Fidel Castro*, p. 289.

③ Boorstein,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Cuba”, p. 28.

"我们认为门罗主义已经过时了，"他说，"它已经寿终正寝了，可以说，是一个正常死亡；对那些已经死去的事物，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去埋葬它。"[1]

正如所声明的那样，卡斯特罗在8月6日对美国进行了反击。他宣布将岛上所有的美国大型资产国有化，其中包括36家美国拥有的糖厂和邻近的种植园、所有美国的炼油厂，同时还有电力和电话设施。9月，美国所有的银行都被没收了，其中包括花旗银行的分行、大通曼哈顿银行和波士顿银行。在其后的3个月间，国有化被扩展到了美国所有的铁路、港口设施、酒店和影院。[2]

一个月后，在9月2日，卡斯特罗进一步阐明了他的计划，公开谴责美国，并将古巴革命置于拉丁美洲大陆众多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之中。他的讲话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哈瓦那宣言"：

> 古巴人民强烈谴责北美帝国主义令人憎恶和可耻的、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对所有拉丁美洲人民的统治。拉美人民不止一次地看到墨西哥、尼加拉瓜（Nicaragua）、海地、圣多明各和古巴的土地被侵略；他们已经被贪婪的帝国主义掠走了像德克萨斯这样广袤和富饶的土地，像巴拿马运河这样至关重要的战略地带，甚至像波多黎各那样，整个国家都被占领。
>
> 这种建立在超级军事力量上的，基于不平等条约的，并以那些卖国政府可耻的投敌叛国行为为基础的统治，在我们美洲——这片玻利瓦尔、伊达尔戈（Hidalgo）、胡阿雷斯（Juarez）、圣马丁、奥希金斯（O' Higgins）、基拉甸奇（Tiradentes）、苏克雷（Sucre）和马蒂想要看到它的自由的大陆上——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美国使之成为一片被剥削的地带，成为美国经济和政治帝国的后院，成为国际组织中备用的票箱……

---

① Quirk, *Fidel Castro*, p. 322.

② 古巴所有的银行都在10月份被国有化。只有加拿大人幸免于难。丰业银行和加拿大皇家银行在"彼此都能接受的补偿办法"被制定出来后，于12月关闭。

185

在为一个被解放的拉丁美洲而战斗的过程中，兴起了不可战胜的力量以反对那些僭越者要求的驯服声音，这是真正的人民呼声，这个呼声从煤矿和锡矿的深处迸发出来，从工厂和糖厂迸发出来，从穷人（*rotos*）、土著混血人（*cholos*）、游牧的加乌乔人（gauchos）、农民（*jibaros*）所生活的各处互相隔离的[①]土地上迸发出来，萨帕塔（*Zapata*）和桑地诺的后人们为了自由而拿起了武器；诗人和小说家、学生、妇女和儿童、老人和无助者都听到了这个呼声。对我们兄弟的呼声，古巴人民大会做出了反应：我们准备好了！古巴不会失败！[②]

在那预示着两年后核危机的不祥语句中，卡斯特罗点明了，革命的古巴这时已经获得了来自大陆之外的军事支持。他说，古巴“心怀感激地接受”，“在我们的领土受到美国军队入侵的时候，来自苏联的火箭的支援”。赫鲁晓夫关于门罗主义已经死亡的谈话揭示出了它的全部含义。

更为火上浇油的是，就在这个月，当卡斯特罗为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来到纽约时竟住在了哈莱姆。当卡斯特罗与一个50人的代表团抵达之后，本来入住在莱克星顿大道上的谢尔本酒店。第二天，他从该酒店里出来，抱怨他被要求预先付费，于是，他就住在了特里莎酒店，这是爵士乐手、拳击手、四处游历的音乐家们经常出入的地方。此前还没有任何一位前往联合国的元首会住在哈莱姆。

卡斯特罗在特里莎住了一个多星期，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晚上，苏联领导人前来拜访了他。双方都很清楚他们会面地点的象征意义。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通过前往一个黑人社区的黑人旅馆，我们向美国对黑人和古巴的歧视政策做出了双重的示威。”在哈拉姆欢呼雀跃的黑人群众们毫无疑问地让所有人都知晓了他们对革命的支持。

① 此处原文为feudal，在西欧中世纪史中是“封建”之意。其实，它反映的是地方割据的历史，故此处译为相互隔离的。——译者注

② 卡斯特罗1960年9月2日的讲话。

美国并不喜欢卡斯特罗传达的信息，11 月它就用其武器库中最为强大的经济武器做出了反击：颁布美国对古巴出口的贸易禁令。从现在开始，它禁止从美国向古巴出口除了食物和药品之外的任何东西。格瓦拉被派往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寻找替代那些曾经在一夜之间就能从美国运到古巴的东西，并寻找新的糖料市场。苏联和东欧的国家与古巴达成了协议，于 1961 年购买 400 万吨糖，比美国曾经购买的数量还要多出 100 万吨，俄国人同意填补这个重要的缺口。美国的贸易禁运一直持续到了这个世纪末——并且延续到了下个世纪——在古巴人对他们整个经济结构再次进行调整的时候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巨大的混乱。其经济结构现在已经被彻底改变了，30% 的耕地已经被归入社会部门，大约 80% 的工业生产力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国有企业生产出了国家出口品中的 90%。

革命时期的经济（1959—1961）

格瓦拉本身并不是一个经济专家，而是一个天资聪明、自学成才的人。他对于古巴从“帝国主义”的经济桎梏中脱离出来所需要的东西有着明确的看法。从 1959 年 11 月在国家银行任职之后，到 1961 年 2 月成为工业部长，他曾经决定了古巴的经济策略。他想让这座岛屿的产业从被糖业垄断中摆脱出来，发展起基于工业化的独立经济，但是他的计划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商榷和考虑。一个独立的经济就意味着自给自足的绝对主权，或者同大量不同的合伙人进行贸易的可能性吗？糖业之外的多种经营或许是一个好主意，但是现在还应该种植什么作物呢？每个人都赞成工业化，但是古巴需要钢铁工业或小型工厂来生产生活消费品吗？同所有来客进行贸易显然是可取的，但是古巴生产什么才会是那些贸易者真正想要的呢？

革命早期的显著特征就是对所有问题的认真讨论，但是有更多的问题则需要当机立断。摆脱了帝国主义，意味着掌控古巴经济的制高点——糖厂、炼油厂、大型牧场以及绝大多数制造工业的美国公司的经济权力被剥夺了。这些被视为“帝国主义”的企业在未来还是要由

国家来运作。但是国家本身还无法这样去做，也不能源源不断补充有能力的、数量庞大的、受到良好训练的管理者。这些要到后来才能做到。只有少数的古巴企业家或者技术专家在1959年以后留在了古巴。

革命的古巴还缺少训练有素的经济专家。古巴现存的多数储备人才——这些观念上的保守派都是在美国接受的教育，对运作一个国家控制的经济没有兴趣，更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都已经离开，前往了迈阿密。左翼的、思想开明的经济专家人数寥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数量可以用一只手数得过来。

但是，拉丁美洲和美国本身则有许多激进的经济学家，大部分都得不到政府的青睐，他们中的许多人为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ECLA）工作，这个组织的基地在智利圣地亚哥（Santiago de Chile），由一名阿根廷学者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主持。古巴请求ECLA派出未被雇佣的经济专家来哈瓦那。普雷维什的经济哲学在ECLA中占据支配地位，试图通过以可变的贸易壁垒保护民族工业的方式，来促进拉丁美洲国家工业的发展，这种保护方式在那个时代司空见惯。

187

从整个拉丁美洲挑选出来的ECLA经济学家们在哈瓦那建立了工作机构，很快就开始对国家银行、外经贸部、工业部、经济部及中央计划委员会（Juceplan）的运作进行帮助。多数人都是年轻而富有激情的，受到了革命的激励，迫切地想要将他们激进的理论付诸实践。格瓦拉是他们富有魅力的上司。在它自己的训练有素、本土化的经济学家们开始源源不断地涌现之前，古巴革命在初期是依赖于拉丁美洲的，后来它接受了来自俄国和东欧经济专家们的支援。

如英国经济学家代表团团长杜特利·西尔斯（Dudley Seers）的描述，古巴的新时期，即一个“乐观的计划”开始于1961年。中央计划委员会接受了为1962年制订经济计划的任务，还要为1962年到1965年起草一个4年计划。尽管这种现象在欧洲已经讨论了很久，但是可以将经济完全——并且迅速地——置于国家控制之下的唯一模式，却是由苏联和东欧的国家建立起来的。几位这方面的专家受邀前往哈

瓦那，其中包括一个由捷克的经济专家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技术人员所组成的团队。在这些优秀的访问者中，包括1960年到来的波兰学者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el Kalecki）与1961年到来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夏尔·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①

所谓“乐观的计划”是由中央计划委员会的首任领导雷吉诺·博蒂（Regino Boti）所提出的。他在1961年8月出现食物短缺的情况时就乐观地宣布，国家不久将会实现10%的经济增长率。他说：“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在古巴未来10年的景象上，我断言……我们将最大限度地成就拉丁美洲最高的生活水准，一个几乎能与任何欧洲国家相媲美的生活标准。”②

这种乐观昙花一现。1962年3月，古巴开始实行定量供应，一个“经济现实主义”的新时期开始了。卡斯特罗毫不犹豫地批评了乐观主义者们。“就在几个月前，”就在公布了定量供应的细则时，他在电视讲话中说，“我们做出了不能实现的承诺。”他说，食物短缺在一定程度上是缺少有经验的管理者导致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农民没能将他们的产品卖出去。因为农民不再被迫支付租金，他们为市场而进行生产的兴趣被严重削弱了。

多数古巴官员都对国家相关的贫困问题没有什么概念。当国家住房研究所（INAV）建立起来后，它修建了有着美国中产阶级水准的，成千上万套新公寓和独门独户的住宅。农民的房屋配备了厕所和坐浴盆。对于新一代革命者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了。按照爱德华·波尔斯坦（Edward Boorstein）的记录，每个单元“价值大约8 000到10 000美元，还被设计了大量的固定家具和小物件，几乎全部都是美国制造。”③

188 始于1960年11月的经济封锁影响的不止是公共住房建设的投入。

① Dudley Seers, ed., *Cuba: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volution*, Chapel Hill, N. C., 1964, pp. 46 and 395.

② Seers, *Cuba: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volution*, p. 47.

③ Boorstein,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Cuba*”, p. 41.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为古巴生产生活消费品的工厂提供原料。国家不能再依赖于它现有的机器和技术，因为其中的多数都来自美国。没有可供选择的、能够稳定提供备件的来源。

格瓦拉认为，工业化是社会主义经济唯一的真正根基。[1] 但是古巴现存的工业，即那些生产瓶子、洗涤剂、涂料、纸张、肥皂、轮胎、锡杯的小工厂大多数都为美国公司所有，并且依赖美国的技术。格瓦拉最初天真地以为，古巴可以大规模地进口苏联的机械和技术。他幻想，苏联会为古巴提供工厂，最好是免费的，到时它们就能运转起来，为古巴消费者生产商品。

这个政策于是被付诸实践，但是很快就碰到了问题，其中的一些属于文化差异。古巴工人过去都使用新式的美国机械，对苏联及其东欧盟友制造的这种笨重的、“中级的技术”并不熟悉。但是如果想要从西欧和日本进口先进的、效率高的机械，就必须支付美元，美元只能靠出售蔗糖来获得。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政府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在短短的几年间，特别是在管理者和技术专家持续离去的情况下，将一个像古巴这样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经济体，那将是一项最为卓越的成就，杜特利·西尔斯这样写道。发生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改变，“就算不是以世纪来算的话”，那也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2]

扫除文盲的运动（1961）

古巴缺少的不止是经济专家和管理者。它有着大量文化落后、缺乏教育的人口，古巴人口中大约 40% 是文盲。卡斯特罗在 1953 年蒙卡达之后的讲话中，提出将教育作为改革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他当时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极端糟糕的、经常是完全不存在的乡村学校的状况

---

① Claus Brudenius, *Revolutionary Cuba: The Challenge of Economic Growth with Equity*, Boulder, Col., 1984.

② Seers, *Cuba: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volution*, p. 49.

上，自童年起他就已经熟悉了这个问题。只有很少的小学教师在农村地区教书。1960 年，他在联合国发言时承诺，革命将在一年内扫除文盲。在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里，从没有出现过这种可能。

在哈瓦那西部郊区马里亚瑙（Marianao），散布着原来的军事基地哥伦比亚军营的营房，在历史上，它是由美国军队中的哥伦比亚团在 1898 年设立的，而 1959 年后，这里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校综合体。189 原来的机场变成了运动场和跑道。在这座兵营中的一条长长街道的深处，是一个关于 1961 年扫盲运动的小型博物馆，10 万名学生与教师参加了这次扫盲运动。这些教师的大多数都是不到 20 岁的青年人，他们被发给专门的制服和一盏用于在乡村地区走夜路的油灯。这个博物馆搜集了许多装订成册的扫盲教师的报告，还有那些新近识字的农民们在教师鼓励下所写的书信。每封信的开头都是“敬爱的菲德尔”。这场运动并不是没有危险的，一些人成为反革命的攻击目标。曾经有 40 多人被杀。但是这些青年教师们教会了 100 万人读写，正如卡斯特罗所承诺的那样，革命在一年的时间内扫除了文盲。这场运动是它的伟大胜利中的一个。

卡斯特罗在数年后承认，如果到 20 世纪末，买一些小型收音机，用它们进行一场较慢的、更方便的扫盲运动，显然会做得更好、更廉价。但是 1961 年所做的，有助于在革命初年在国内外树立起它的形象。它对农民的影响是惊人的，而对那些青年来说，是决定性的时期。他们在进入那些从来没有涉足过的国家偏远地区的同时，发现了自我。对错过了革命战争的那代人来说，这些经历使得他们能够理所当然地称自己为革命者。

扫盲运动给世界留下了印象，并成为革命初期最为重要的一个“卖点”。它的成功促使政府投入到了一场持续不断的促进成人教育的运动中去，有助于创造出一支训练更好、具有更高政治觉悟的劳动大军。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在苏联的支持和大量的资金投入下，古巴发展出了一个与拉丁美洲完全不同的改革性教育体系——并且是完全免费的。从革命的第一年起，这个体系就开始运作，当年建成了3 000多

所学校。大约 30 万儿童第一次进入了学校，并且新招募和培训了 7 000名教师。[1] 这不仅是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一个为每个 6 岁到 15 岁的人提供免费教育的国家学校教育系统中，也使古巴以它的自愿创新和实验而闻名。

革命将 1961 年称为“教育年”，但是这一年很快因为某件比扫盲运动意义更加重大的事情而被人们所铭记。1961 年 4 月，数以千计的实习教师恰是在整个古巴处于美国策划的猪湾（Bay of Pigs）入侵前夕的紧张氛围之中出发前往农村地区的。

---

① Carmelo Mesa - Lago, ed. ,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Cuba*, Pittsburgh, 1971, p. 386.

190

第六章　革命的政权（1961—1968）

流亡者在猪湾入侵（1961 年 4 月）

这里没有一个指向猪湾的路标，但是在圣克拉拉以南、东西方向的高速公路外、位于一个废弃的"澳大利亚"糖厂旁的一条狭窄的道路上，却有着不少小的水泥纪念碑。每个纪念碑上都标明了一个在 1961 年 4 月保卫这座岛屿的民兵的被杀之处。这条位于猪湾和萨帕塔沼泽之间的道路一直延伸到了吉隆滩（Playa Giron），那是一片沙滩。中情局训练的一支由古巴流亡者组成的军队就是在那里登陆并试图摧毁革命的。

这次入侵是在古巴海岸线上进行的又一次半秘密登陆行动，这些登陆活动不时出现在这座岛屿数个世纪间的历史中。就像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一样，这次的登陆仍然是组织不力、指挥拙劣，最终也没能成功。卡斯特罗的军队，主要以新装备的民兵为主，已经做好了准备，流亡者的军队在几天内就被消灭了。这次登陆是由中情局组织的，美国军队并没有直接参与到这次战斗中。

这次入侵是美国在 20 世纪严重的战略错误中的一个，它巩固了卡斯特罗对古巴的控制，确保了其革命的持久，并将他推入苏联的阵营之中。这次没有美国制空权保护的糟糕登陆——制空权是确保这次流亡者取胜的基本因素——是华盛顿方面意见分歧、计划不力以及行动

的最终目标不明确的结果。它们反映出了长久以来美国对古巴的矛盾情绪，这也是在之前 150 年间美国政策的典型特征。

挫败流亡者的入侵，不仅对古巴，还对整个拉丁美洲都产生了影响。世界现在对革命另眼相看。对古巴人来说，他们的胜利意味着一个多世纪内古巴社会中存在的“合并主义”思想，即期盼此岛会成为美国一部分的思想已经信誉扫地，毫无力量了。古巴现在已是不可改变地独立了，所有那些试图走另一条路的人们此后即被视为叛国。卡斯特罗给他的革命战车附上了复兴的、古巴国家主义的强大力量，变得无与伦比。 191

对许多拉丁美洲人来说，猪湾事件增强了他们根深蒂固的信念，即美国从来都是不可信赖的；美国在猪湾的失败表明，他们北方的邻居不再像它曾经看起来的那样强有力。长久以来，深植在拉丁美洲的“地理决定论”这一看法的支配地位瓦解了。整座大陆上的政治组织都认真地视古巴为榜样，试图走古巴的道路，相信美帝国主义的失败是可能的。

在此前并不清楚卡斯特罗政权受到公众支持程度的世界其他地方，开始因此认识到古巴流亡者们的断言是个谎言：革命并非即将垮台。甚至在美国的支持下，流亡者都没能将他们对卡斯特罗的不满转化为一场推翻他的全民运动。卡斯特罗还会继续掌控政权。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苏联领导层进行过秘密的讨论，但是俄罗斯人一定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开始的时候卡斯特罗被看作一个标新立异的初生牛犊；现在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值得寄予厚望的人。

1961 年古巴所受到的威胁是对加勒比海大约 7 年前发生过的一次重要事件的追忆。哈瓦那的古巴人和华盛顿的美国人都熟悉危地马拉所发生的事件，在那里，哈科伯·阿本斯的左翼政府被持有不同政见的军官所领导的、由中情局秘密组织的入侵所推翻。当时，中情局虽然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自己参与其中，但整个拉丁美洲却对此事心知肚明。艾森豪威尔是当时的美国总统，艾伦·杜勒斯时任中情局局长。两人当时都扮演着在古巴革命期间相同的角色，1960 年他们同意在古巴重演危地马拉计划。

一个准备推翻卡斯特罗并训练一个流亡者组织的正式决定是艾森豪威尔在3月份提出的。① 这个计划将由中情局运作，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并制定了多个方案，以确保消灭古巴领导人。一些参与当年危地马拉事件的老手，尤其是中情局特工、负责组织流亡武装的理查德·比塞尔（Richard Bissell）被重新召集到华盛顿。② 危地马拉是准备最终攻击的最合适的选择。

1960年5月，在流亡者中征募的新兵开始进行游击战的训练。一些人被集中在了远离佛罗里达海岸的乌瑟帕（Usseppa）岛，其他人则被集中在巴拿马运河地区的圭利克堡砦（Fort Gulick）。到了8月，第一批训练好的人员集中于危地马拉的赫尔维蒂亚（Helvetia）种植园，以训练更多的流亡者士兵，此处种植园是危地马拉驻华盛顿大使的兄弟罗伯特·阿雷霍斯（Roberto Alejos）的产业。

哈瓦那同华盛顿一样熟悉1954年在危地马拉发生的事件。切·格瓦拉当时就在危地马拉城中生活和工作。他在那里的经历对他政治上的激进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成就了他后来的坚定信念，即美国会用任何必要的手段来摧毁古巴革命。卡斯特罗也接受了他的观点，在1960年，无须从流亡者那里获得秘密消息，他也确信美国正计划在古巴重演危地马拉行动。古巴在联合国的外交官们反复地谴责美国在支持一次大规模的流亡者入侵。每个人都知道，它即将发生；只是时间

192

① “在1960年3月17日……我命令中央情报局开始组织对古巴流亡者的训练，主要是在危地马拉，为未来他们可能返回祖国的那一天做准备。更加详尽的计划是不可能制订出来的，因为生活在海外的古巴人并不想在他们中间选出一位领导人作为流亡政府的首脑。” Dwight Eisenhower, *The White House Years: Waging Peace, 1956—1961*, London, 1966, p. 533.

② 根据彼得·怀登（Peter Wyden）的记述，“每个人都在考虑‘危地马拉模式’，比塞尔尤为如此。在一个星期内，中情局就推翻了危地马拉政府。一支150名流亡者组成的军队几乎没有开枪，还有少量的二战时的P-47战斗机，由中情局雇佣的飞行员驾驶，这些都是公开的、表面上的武器。中情局的诡计才是真正的武器。该局在触发猪湾行动的时候使用的是相同的基地：在迈阿密市郊奥帕洛卡（Opa-Locka）的一个基本被废弃的、美国空军基地的双层营房。中情局的两位高级战地特工——举止优雅的崔西·巴内斯（Tracy Barnes）和行事并不保守的E. 霍华德·亨特（E. Howard Hunt）在古巴的军事行动中占据了关键职位。同时，他们为了危地马拉的冒险雇佣过一个宣传负责人：大卫·艾特礼·菲利普（David Atlee Philips）。在古巴，他做的也是同样的工作。” Peter Wyden, *Bay of Pigs: The Untold Story*, London, 1979, p. 20.

和登陆地点还有悬念而已。

1960 年秋，美国最重要的事情是总统竞选，古巴是竞选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理查德·尼克松和约翰·肯尼迪竞相使用干涉主义的言论，肯尼迪提醒人们记起 1823 年的门罗主义：外国势力应远离美洲。美国不会让“苏联将古巴变成它在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基地”，他说道。肯尼迪认为，苏联的介入会有助于“那些在海外和古巴的山区里为了自由而战的军人们。”[①]

比塞尔最先考虑用卡斯特罗自己的方式，即游击战来打败他。中情局最初的建议是建立一个游击战的桥头堡，以 1956 年的格拉玛号登陆为模板。以此为先导去设法点燃古巴国内反卡斯特罗起义的烽火，然后将人民集合在流亡者的旗帜之下。比塞尔将他的关注点集中在奥连特省，那是一个传统的登陆点。马蒂和卡斯特罗分别于 1895 年和 1956 年在那里登陆，迅速地进入了山区，隐匿于农村居民之中。其他在考虑之内的登陆点还有卡马圭的库维塔斯山（Sierra de Cubitas）、比那尔德里奥的洛斯奥加诺斯山（Sierra de los Organos）和特立尼达以北的埃斯坎布雷山区。

奥连特因为距哈瓦那太远而被排除，比塞尔开始关注埃斯坎布雷。游击队员们可以在特立尼达附近登陆，然后立刻进入山区。他们在那里会得到空投的食物和武器的补给，同已经在那里的其他反对卡斯特罗的人会合。在古巴岛上，人们对比塞尔的阴谋计划并非毫无所知，卡斯特罗为挫败他们而进行了准备。1960 年，埃斯坎布雷武装“匪徒”的存在，在哈瓦那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卡斯特罗开始训练一支由农民组成的民兵守卫这个地区。大约 800 名当地的农民在拉坎帕纳（La Campana）农场上了 2 个月的训练课，也在这个地区的周围修筑了障碍物。[②]

9 月，一支由农民组成的民兵已经做好了行动准备，少量兵力在这

① Karl Meyer and Tad Szulc, *The Cuban Invasion*, New York, 1962. pp. 66 – 67.

② *Making History: Interviews with Four Generals of Cuba's 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New York, 1999, p. III. 亦见古巴对于“猪湾事件”的官方记载，载于 Juan Carlos Rodriguez, ed. *The Bay of Pigs and the CIA*, Melbourne, 1999, 68 页。

个地区进行搜查，抓获了近200名“盗匪”和多名匪首。他们的胜利迫使在华盛顿的中情局高级官员们改变策略。他们不能保证少量的游击队能够发展为一场范围广泛的抵抗运动，埃斯坎布雷计划在11月被放弃了。

发动一次常规入侵的方案现在被纳入了考虑之中。流亡者们将接受相应的训练来执行有限的军事行动，先占领并坚守一个地区，以便将预先准备好的反卡斯特罗政府的成员们空运过来。这样的一个“政府”会立刻得到美国及其盟友的承认，然后美国人就会公开对它进行支援。① 选定的入侵地点是一处大海湾，即猪湾（*Bahia de Cochinos*②），这个名字使人们回忆起16—17世纪欧洲的海盗袭击，当时上岸的欧洲海盗们大肆追猎那些在田野上自由放牧的猪。猪湾位于古巴岛的南边，通往特立尼达，就在加勒比海最大的一片湿地、偏远的萨帕塔沼泽（Cienaga de Zapata）的东边。

美国人并不知道，这个地区最近得到了来自于革命政府的发展援助。在沼泽上建设了新的可以通行的道路，还有在吉隆滩旅行观光的简单住所，卡斯特罗在1960年多次巡视这个地区，还在特索罗湖（Laguna del Tesoro）钓鲑鱼，该湖从长滩（Playa Larga）开始绵延入内陆，是猪湾的顶端。猪湾看起来似乎挺偏僻，但它不再是不受现代世界所影响的地方了。

在登陆之前的一个星期里，岛内的反革命分子们开始更加频繁地进行袭击。比那尔德里奥的一座糖厂被摧毁了，哈瓦那中心的大型百货公司，即“魅力百货公司”（El Encanto）被炸毁。两架小型飞机在4月15日向哥伦比亚兵营和哈瓦那及圣地亚哥的两座空军基地投下了炸弹，摧毁了大部分古巴空军力量，还杀死了数名平民。卡斯特罗警

---

① 美国策略的本质在猪湾惨败后引起很大的争论。中情局是希望这场入侵能够引起一场全面暴动还是他们认为建立一个滩头阵地，可以迫使肯尼迪总统批准支持临时政府的军事行动？实际上这些方案并不冲突；他们先尝试了一个，然后又尝试了另一个。最后两个都成了灾难。

② Cochinos，在西班牙语中即“猪”之意，Bahia de Cochinos（又译科奇诺斯湾）即“猪湾”。——译者注

觉地意识到，入侵已经迫在眉睫。他在为轰炸受害者举行的葬礼上做了讲演，第一次说明了古巴革命的“社会主义”性。他说，“我们要在他们的鼻子底下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他们所不能原谅的”。他赞扬了苏联所取得的“令人钦佩”的成就。当时，苏联刚刚将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送入太空，他对比说，而美国却对“一个没有空军的国家的军事设施”进行了轰炸。①

两天后，4 月 17 日，入侵开始了。“拂晓之前，”由纽约的一家公共关系公司为中情局所准备的一份声明中宣称，“在城市和山区里的古巴爱国者们，为了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专制统治中解放我们的家园而开始了战斗。”一群流亡者在吉隆滩登陆，那是猪湾的东入口，同时另一批人在长滩登陆。

当地的民兵首当其冲地承受着入侵的冲击，但是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哈瓦那，卡斯特罗警醒地用上了空军中仅有的装备。于是，流亡者的军队受到了装着机关枪的教练机和能发射火箭的海怒舰载战斗机的攻击。流亡者军队所使用的运兵舰没有空军的保护，多艘都丧失了战斗力。卡斯特罗从哈瓦那向南赶去，并将他的总部设在了哈圭格兰（Jaguey Grande②）附近的那家澳大利亚糖厂。③

194

在离开哈瓦那之前，卡斯特罗下令逮捕那些有从事反革命活动嫌疑的人，仅首都一地就拘留了 35 000 人，其中还包括哈瓦那的辅理主教。中情局幻想有数以千计的人会起来反对革命的企图在第一天就被挫败了。卡斯特罗还起草了一份告“美国和世界人民”书，希望他们与古巴人民团结一致，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它的那些已经在我们国家

① 这是一次精心准备的讲话。阿曼多·哈特和布拉斯·罗加数年后告诉塔德·肖尔茨，卡斯特罗本来是计划在国际劳动节进行这次讲话的。可以理解，日期被提前了。Tad Szulc, *Fidel: A Critical Portrait*, London, 1987, p. 443.

② 西班牙语“大水塘”之意。——译者注

③ 巧合的是，这家工厂在 19 世纪的 10 年战争期间也发挥了作用，1869 年它被独立军占领，然后又被志愿兵们重新夺回，这些志愿兵就是 1961 年那些入侵者们的先驱。这个巧合被莱尔德·博加德（Laird Bergad）证明属实，他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过此事，见他所作：*Cuban Rural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Monoculture in Matanzas*, Princeton, 1990, 184 页。

登陆的雇佣兵和投机者们”。赫鲁晓夫向肯尼迪发出了外交照会，其中传达了明确的、支持卡斯特罗的信息：“我们将会给予古巴人民和他们的政府所有他们必需的支持，以击退美国对古巴的武装进攻。”这个信息是受欢迎的，但是严格来说，并不是非做不可的。

在长滩附近的战斗进行得很激烈，160 名古巴的保卫者被杀，但是最后的结果差不多从战斗开始的时候就没有悬念了。这次入侵在两天内就被粉碎了。在 1 500 名参与登陆的流亡者中，100 多人被打死，1200 人被俘。幸存者们在挤满人群的哈瓦那体育场内游街示众，每天晚上都在电视直播中接受记者的询问。他们的指挥官多数都曾经是巴蒂斯塔军队的军官，按照何塞·拉蒙·费尔南德斯（Jose Ramon Fernandez）将军在 1997 年接受采访时的说法：“当我们俘虏他们的时候，我知道他们所有指挥官们的姓名。他们中的许多人革命前都曾是我的学生，当时我是军校的教师和校长助理”。①

卡斯特罗用了一晚上时间与那些被俘的流亡者——他们代表着社会各个阶层：军队军官、农民和黑人的反对者们——辩解革命的好处。当卡斯特罗建议他们的命运应该由古巴人民投票决定的时候，听众们高喊“枪毙他们”——于是他不得不改变了主意，说“任何贬低我们的胜利”的人都要受到惩罚。

被俘者中只有 5 名军官被处死，另外有 9 人被判处 30 年监禁，其余囚犯大部分被羁押在古巴，等待着被转移到美国去。卡斯特罗向华盛顿建议，用 500 辆拖拉机来交换他们，而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同意担任“拖拉机委员会”的主席。华盛顿方面对这样的提议没有兴趣，谈判被拖延了一年多。囚犯们最终在 1962 年 12 月被交换，不是同拖拉机，而是价值 5 300 万美元的食物和药品。

猪湾灾难使肯尼迪清醒了一些，肯尼迪政府立刻修改了它的战略，但是没有放弃摧毁革命的企图。按照美国的一本军事行动史的记载，4

① *Making History*, p. 110.

月的惨败致使肯尼迪核心集团内产生了对卡斯特罗的“个人仇恨”。肯尼迪总统本人，还有他的兄弟司法部长罗伯特尤甚，“渴望着清算的机会”。[①]新的秘密计划很快就开始制订了。由于对比塞尔失去了信任，这一秘密计划的指挥权被转交给爱德华·兰斯戴尔（Edward Lansdale）将军，一位反暴动的军事专家，之前在菲律宾表现活跃。他被授权负责一项被称为“猫鼬行动”（*Operatopm Mogoose*）的计划，由罗伯特·肯尼迪密切关注实行。打出“猫鼬”旗号的这个秘密行动计划在古巴制造动乱，继而推翻政权，并策划对卡斯特罗实施暗杀。

195

400名中情局特工在华盛顿和迈阿密为兰斯戴尔的计划工作。1961年11月，一则总统令创建了猫鼬方案，宣称美国将会“帮助古巴人民从古巴内部推翻共产党政权，建立一个能够跟美国和平共处的政府”。兰斯戴尔于1962年1月向白宫提交了一份行动方案，要用“总共6个阶段的努力”从内部瓦解卡斯特罗政权。他的方案计划“用一场公开的叛乱”来结尾，于1962年10月“推翻共产党政权。”[②]

其中没有提及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性。3月的第二份总统令暂时搁置了兰斯戴尔的计划，命令中遗憾地注意到，“猫鼬行动”最终的胜利确实需要“决定性的、美国军队的干涉”。肯尼迪总统仍反对美国对古巴的“直接军事干涉”。新任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后来称，兰斯戴尔将军的团队“在小肯尼迪持续不断的烦扰之下”只能以一些“疯狂的方案”收场。[③]

它们可能确实疯狂，但是对猫鼬的记忆所造成的损害远超过了它的策划者们疯狂的想象。卡斯特罗对它的存在和所能造成的威胁非常清楚，他现在要铤而走险了——由苏联所设想出来的——以确保他的革命不再受到像猪湾攻击一样事件的威胁。

---

① Ernest R. May and Philip D. Zelikow, eds, *The Kennedy Tapes: Inside the Whitehouse du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Cambridge, Mass., 1997, p. 26.

② Szulc, *Fidel*, p. 465.

③ May and Zelikow, *The Kennedy Tapes*.

1962 年 10 月的导弹

从官方的视角来看，在 1962 年 10 月 22 日那个周一的晚上，在肯尼迪总统首次在电视上宣布在古巴发现了苏联的导弹，宣称要实施海上封锁之前，整个世界并没有意识到古巴导弹危机。一个星期之前，即 10 月 14 日，美国的一次越界飞行在比那尔德里奥的圣克里斯托巴尔（San Cristobal）地区拍到了一个 R－12 导弹发射点，肯尼迪在两天之后得知了这一消息。在之后的 6 天内这个消息都处于保密的状态下，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则在制定应对这场危机的方案。对历史学者们来说，幸运的是，他秘密地将他们的商讨记录了下来。[1]

196

“我的估计是，”肯尼迪总统在 10 月 29 日的周一，即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平息之后，对处置这场危机的小团队说道，“是的，每个……处于绝境之中的人都会去使用核武器的。”[2]

这是危机的那个星期人们所普遍相信的事情。这是自美国 1945 年在广岛（Hiroshima）和长崎（Nagasaki）投下原子弹之后，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第一次为核武器可能再次被使用而感到恐惧。几十年后，这场危机看起来与其说是真实存在，不如说是表面上的——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当时的危机中都是冷静的交涉者——但是当时引发了国际性的极度焦虑则是真实的。

在许多国家引起的核恐慌在古巴本土却并不明显。多数古巴人都更多地关注于美国军队即将进行常规性入侵的可能性，而不是一场全面的核战争。古巴人对两个星期前，即 10 月 16 日的那个周二迪恩·鲁斯克（Dean Rusk）在白宫举行的首次危机会议上所做的评论并不知情，但是美国国务卿的思路差不多完全映射出了他们自己的想法：

---

① May and Zelikow, *The Kennedy Tapes*, p. ix. “整个危机期间，美国的决策集中于白宫，大部分时间内，都有一台录音机在工作。除了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兄弟罗伯特，参与讨论的人没有一个知道它的存在。作为一个危机时期慎思明辨之讨论的记录，这些录音带在历史上的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是绝无仅有的。”

② May and Zelikow, *The Kennedy Tapes*, p. 657.

"我认为，我们必须在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上非常认真地进行考虑，"鲁斯克告诉他的同僚们，"一个是实施迅速打击……我不认为有必要因这件事情的发生对古巴进行一次入侵……或者是我们要做出决定，现在是通过毁灭这座岛屿来消灭古巴问题的时候了。"[①]

美国瓦解革命的可能——如果不是消灭这座岛屿本身的话——位于十月危机的核心，自一年前的猪湾入侵之后，它就是古巴和苏联讨论的主要议题。在10月16日美国的第一次导弹危机会议上，所有历史性的、美国对古巴独立的厌恶情感都爆发了出来。或许我们不得不"让缅因号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再次沉没"，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如是建议。[②] 其他的人则在商讨美国对这座岛屿实施一次空中打击的可能性。

自上一年起，卡斯特罗就感受到了持续不断的外部力量的威胁——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古巴在猪湾的胜利并没有结束流亡者和美国要颠覆古巴革命的行动。"猫鼬行动"的策划者们仍然在不停的工作。美国支持的反革命分子们在埃斯坎布雷的山区中死灰复燃。数年后，人们承认，肯尼迪政府无意赞助流亡者或者美国军队进行一次新的入侵——猪湾的惨败已经消除了他们这样的野心——但是古巴人在考虑他们自己的防御的时候，还必须要将这种可能性考虑进去。美国军队当然为这样的一次入侵制订了应变的计划，正如10月危机期间所显现出来的那样。

除了入侵和战争之外，美国人还想尽了各种办法整垮卡斯特罗，他们曾经非常专注地、精心策划一个反对这座拉丁美洲岛屿的国际联盟。在美国的压力下，美洲国家组织（OAS）在1962年初投票将古巴开除出其成员国之列。[③] 拉丁美洲的政府联合起来，反对古巴革命，

197

---

① May and Zelikow, *The Kennedy Tapes*, p. 54.

② May and Zelikow, *The Kennedy Tapes*, p. 101.

③ 这个决定是1月份美洲国家组织在乌拉圭埃斯特角（Punta del Este）的外交部长会议上做出的。只有古巴和墨西哥反对美洲国家组织的提议；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和厄瓜多尔弃权。委内瑞拉外交部长辞职。

使得这座岛屿陷入了外交的冷遇之中。

卡斯特罗在2月份做了一次时间很长的、情绪激动的讲演，以回应美洲国家组织的决定，即“第二次哈瓦那宣言”，他在其中用一句新的口号强调了他在整个美洲大陆进行革命的抱负。他说古巴人民认为，“每个革命者都有进行革命的责任。革命终将在美国和全世界取得胜利，但是革命者不能坐在自己家门口，等着帝国主义的尸体经过……”这就为在整个大陆进行古巴模式的游击运动，推翻现存政权，帮助古巴摆脱孤立的状态开了绿灯。

古巴同时也在继续向苏联示好。卡斯特罗在猪湾事件前夕就已经宣布古巴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年底，即1961年12月，他宣布——希望能够进一步迎合他的新朋友们——他现在是并将一直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下达了一些命令，要在古巴建立一个站在苏联阵线上的新的共产党，这个党要从当初那个参与古巴革命的由多个党派拼凑起来的不稳定的政治联盟的废墟上重建。在一份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上签字后，卡斯特罗希望能够获得苏联给予古巴军事支援的保证，而他的这一身份理所当然地能够得到它。

几个世纪以来，卷入到古巴事务中的帝国势力总是在最初的占领和殖民后对这座岛屿的防务予以关注——尽管效果差强人意。16世纪的西班牙人在意识到法国和英国海盗对这座岛屿的进犯时，开始采取措施在哈瓦那和其他沿海港口设防。之后，18世纪英国占领它后，开始在哈瓦那港的入口处修筑卡瓦尼亚堡。美国人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考虑，在1898年以后的对古巴占领期间，在关塔那摩创建了自己的基地，认为它对于当地所受的干涉和大陆的防御都是有益的。

现在轮到俄罗斯帝国担当起古巴保护者的角色了。有争议的是，它试图用20世纪的新事物，即核弹头来实施这种保护。它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危机的过程，反复地出现在关于历史的争论中。由此产生了一些相关的回忆录和官方文件的辑录。参与其中的人员于1987年到2002年间举行了多次会议——在华盛顿、莫斯科和哈瓦那——以重新检视所发生的事件，并将他们的发现公之于众。

但在已经出版的关于看待这一事件的各种视角中，却经常缺少古巴这 198
个危机中心的视点，尽管关键性的决定并非是在这里做出的。

卡斯特罗对苏联的持续示好，伴随而来的是美国政府极大的担心，他们不可避免地作出最坏的假设。但是俄罗斯人并不急于将古巴迎进共产主义阵营。整个 1961 年和 1962 年的最初几个月，莫斯科显示出了对这个新的加勒比朋友在政治方面不信赖的迹象——还有分歧。当时苏联同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正在迅速升级，并且对莫斯科的许多正统共产党人来说，卡斯特罗的革命言辞——特别是当他主张游击斗争和农民革命的时候——显示出了有接近中国领导人所主张之路线的危险。当卡斯特罗在 1962 年 3 月转而反对原来古巴共产党的一些成员，攻击并免除 20 世纪 30 年代的老兵——苏联印象中创造新的共产党的最佳人选阿尼巴尔·埃斯卡兰特的职务的时候，多位俄国高层对这位新伙伴的裁决感到困惑。[①]

另外一些人则更加乐观。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他们都发自内心地被卡斯特罗所吸引，并保有一部分老一代布尔什维克们的革命热情——看到了将这个富有魅力的领导人纳入到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中来对于实现苏联全球战略的好处。他们几乎不能允许卡斯特罗被推翻。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会严重削弱他们的革命领导权，不仅是在中国，在由最近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的那些国家所产生的第三世界中亦然，古巴在他们中间是标志性的存在。接受卡斯特罗为苏联的战略盟友，保护并将古巴拉入到共产主义阵营的政策日益显得更具吸引力。这个决定是在 1962 年 4 月或 5 月的某天做出的。

苏联迅速将他们对古巴的军事支持提高到核武程度的动机，还有做出这个决定的时间，至今仍在讨论中。现在苏联已经认识到，其对古巴的保护，它的生存，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同美国形成更加对等的战略核武平衡的渴望更是苏联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苏联当时在太空扩张中占据

① 埃斯卡兰特的罪名是同原来的共产党成员组织新的党派，造成了 7·26 运动和学生指导委员会的人员流失，被控犯有“宗派主义”错误。

主导地位，但是在制造和发展核弹上则是落后的，苏联需要做一些事情来赶上美国。古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罕见的、实现突破的机会。

谢尔科·米高扬称，他的父亲与赫鲁晓夫于1962年4月底第一次商讨向古巴运送核弹的问题。[①] 这当然不是古巴人的主意。古巴一直在要求苏联对其可能遭受的美国进攻进行军事保护，但是并没有明确 199 要求怎么做。"我们当时在同苏联人进行商讨，"卡斯特罗对美国记者塔德·肖尔茨（Tad Szulc）说（没有提到日期），"我们正在讨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他们询问我们的意见，然后我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们没有谈到导弹——必须要让美国清楚，一次对古巴的入侵意味着一场同苏联的战争。"[②]

卡斯特罗告诉肖尔茨，要求"能够给予古巴绝对保证可以抵御一场常规战争和一次美国入侵的措施"这一提议肯定是来自古巴，但是"具体的布防导弹这个主意是苏联提出来的"。[③] 根据1962驻哈瓦那的苏联高级外交官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的记述，苏联的一个明确涉及导弹安置的决定是在5月做出的。阿列克谢耶夫在5月底被召回克里姆林宫，同赫鲁晓夫会面，当时在场的有6名苏联高层人员——包括米高扬、安德烈·葛罗米柯和苏联国防部长罗季翁·马林诺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y）元帅等。根据阿列克谢耶夫的记述［在同格瓦拉的自传作者乔恩·李·安德森（Joh Lee Anderson）谈话时］，赫鲁晓夫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阿列克谢耶夫同志，为了帮助古巴，拯救古巴革命，我们达成决议，在古巴安置［核］火箭。你有什么想法？菲德尔会有什么反应？他是否会接受？"[④]

阿列克谢耶夫说，他认为古巴人不会同意，但是他发现苏联领导层并没有因为他的否定答复而灰心，于是推测这一决定早已达成。他

---

① James G. Blight and David A. Welch, *On the Brink: Americans and Soviets reexamine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1989, p. 238.

② 1984年1月28—29日塔德·肖尔茨对卡斯特罗进行的一次采访，见 Szulc, *Fidel*, 471页。

③ Szulc, *Fidel*, p. 472.

④ Jon Lee Anderson, *Che Guevara: A Revolutionary Life*, London, 1997, p. 525.

于5月29日返回哈瓦那，同行的还有刚刚上任的苏联国家战略导弹部队总司令谢尔盖·比留佐夫（Sergei Biryusov）元帅。一到哈瓦那，这位元帅就同卡斯特罗兄弟就军事合作问题进行讨论。根据古巴的官方记载，这位元帅问卡斯特罗："想要阻止一次美国的入侵，什么才是必不可少的呢?"[1] 卡斯特罗以一个简单的表述来答复："所采取的措施要明确地告诉帝国主义，任何对古巴的入侵都意味着一场不单纯是对古巴的战争。"

比留佐夫问他，"具体"应该怎么做。卡斯特罗做了答复，他认为一个简单的苏古军事条约就足够了。他指出，美国有许多这样的条约，这些条约都受到了重视。

比留佐夫于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即是否能考虑将核弹作为支持的一个明确信号，他将赫鲁晓夫在这座岛屿部署这些导弹的建议的细节也告诉了他。卡斯特罗询问这些导弹是什么类型的，俄国人对他们可能会实施的部署是如何设想的。比留佐夫解释了"导弹的主要特点、它们的射程以及它们的核弹头的爆炸威力"。他还指出，他们的部署必须要"迅速、秘密且在掩盖之下"进行。

在这次苏联和卡斯特罗的初步接触后，双方又进行了一次更加正式的会议，一方是比留佐夫和随行的苏联官员，另一方是新近成立的古巴革命统一组织（ORI）[2] 的6人书记处。[3] 这是当时革命的统治集团，由卡斯特罗兄弟、切·格瓦拉、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艾米利奥·阿拉贡内斯和布拉斯·罗加组成。作为3个月前对埃斯卡兰特进行清洗的结果，罗加成为了原共产党的唯一代表。

200

---

① Tomas Diez Acosta, *October 1962: The 'Missile' Crisis as seen from Cuba*, New York, 2002, p. 101. 在记述的时候，蒂兹·阿科斯塔获准看到了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记录，这些记录被封存在位于哈瓦那的古巴历史研究所中。

② 即 Organizationes Revolucionarias Integradas。——译者注

③ 1962年3月，两个主要的革命组织：7·26运动和革命指导委员会同共产主义的人民社会党合并，形成了古巴革命统一组织。一年后，即1963年，ORI更名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党（PURS，即 Party of the Cuban Socialist Revolution）。1965年10月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党更名为古巴共产党。

卡斯特罗下了决心，成为赫鲁晓夫计划的拥护者。他将苏联在岛屿上布置导弹的陈述递交给了国家的最高领导者们，期望他们能够同意。在他看来，这些导弹的部署会强化社会主义阵营——按照古巴官方记录中所记载的："如果我们的党能够相信，社会主义阵营愿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发动战争，那么就丝毫不用担心这个决定会给古巴带来任何的危险。"①

在场的那些人达成一致，认为赫鲁晓夫的建议会有助于古巴的国防，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威慑力量，美国将不得不在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权衡利弊。"

卡斯特罗轻信了苏联的提议，但是多年后的评论表示，古巴人民并不喜欢这些导弹，如果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防御的话，他们不会接受使用核武器。这个决定是困难的，"不仅是因为我们对它可能带来的危险担心"，而且是因为它会"损害革命的形象，而我们则非常积极地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地方维护革命的形象"。

卡斯特罗也清楚，导弹会将这个国家变成"苏联的一座军事基地"，这样做将会让国家形象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② 当时遍布世界的外国军事基地是人们争议颇甚的话题。1961 年古巴积极参与的不结盟国家贝尔格莱德会议曾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对超级大国保有的那些基地的谴责。③ 古巴长期以来也一直在强烈抗议美国在关塔那摩驻军。

尽管会产生这些对革命不利的国际影响，古巴领导层仍然认为必须向前走。劳尔·卡斯特罗和比留佐夫元帅一起在古巴岛上勘查可以部署导弹及其附属设备的地点。"在途中"，官方历史记录，劳尔被"详细地"告知了这些军事装备的特性，以及将会留在古巴的俄国人

① Diez Acosta, *October* 1962, p. 102.

② Diez Acosta, *October* 1962, p. 102, and James G. Blight, Bruce J. Allyn and David A. Welch, *Cuba on the Brink: Castro, the Missile Crisis, and the Soviet Collapse*, New York, 1993, p. 198 - 199.

③ 在危机期间，美国要求几内亚和塞内加尔政府拒绝苏联飞机的着陆权。尽管塞古·杜尔（Sékou Touré）是古巴的盟友，他也同意这样做，因为他是外国军事基地的坚定反对者。

的数量。[①] 俄国人急于给劳尔留下的印象是，他们所提供的军备数目极其庞大。开始时，苏联会派来大约42 000名士兵——相当于4个团。军事硬件也要达到相应的规模，16个中程弹道导弹发射装置和24个中程发射器，每个配备了2枚导弹和一枚核弹头。此外，还有24个先进的萨姆2地对空导弹连、42架米格截击机、42架伊尔28轰炸机、12艘蚊子级导弹艇，以及大量的海岸防卫巡航导弹。此前从来没有如此昂贵的船只和舰队，在古巴的海域中出现过。[②]

201

古巴人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担心：怎么才能让如此庞大的军火库在不引起美国怀疑的情况下绕过半个地球运过来呢？劳尔·卡斯特罗询问，苏联人是否真的能将这些20米长的导弹运到古巴来而不被"敌人精明的情报机关"发现，他还和菲德尔讨论了他的担心。古巴领导层对这种事情发生可能性明显不安，这种情绪一直贯穿了准备期间的数个月，尽管官方记录轻松地表达着他们"对苏联在这方面的专业水准的'自信'"。[③] 可苏联人却即将让人大失所望。

古巴人有理由去担心。10月份，导弹基地一开工，美国就看到了它们——从他们飞越这个岛屿的侦察机所拍到的照片上。美国人对苏联导弹基地的外观了解得很清楚，因为他们在苏联上空做过同类飞行。因为过于自信，俄国人并没有改变或者调整其设计。

事后，古巴人对于自己过分屈从于苏联盟友的态度感到后悔。"如果我们知道那些导弹的样子，"若干年后的1968年，卡斯特罗对他的同僚们说，"并且如果伪装的问题交给了我们，那很容易就能决定将如何去做。在这样一个有着如此众多的建设项目、如此众多的大型鸡舍和各种［其他］设施的国家里，将这些设施在屋顶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下面修建起来肯定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了，而且它们永远

① Diez Acosta, *October* 1962, p. 103.
② Anderson, *Che Guevara*, pp. 527 - 528.
③ Diez Acosta, *October* 1962, p. 103.

也不会被发现。”[1]

尽管古巴有这些担忧，但是当时并没有表达出来，俄国人开始实施他们的计划了。6月10日，克里姆林宫正式做出了开始导弹部署的决定。俄罗斯人估计安装会在5个月之内完成，正好是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古巴人仍旧希望同苏联形成公开而正式的合作关系，以保证未来古巴的国家安全面临较少的挑衅，因此仍然讨论着要与苏联成为普通的军事伙伴。俄国人赞同这个想法，于是劳尔·卡斯特罗在7月初前往莫斯科去草签一个议案。

因为仍旧担心导弹穿越大西洋时候可能被发现，菲德尔告诉他的兄弟，就问赫鲁晓夫一个问题——如果行动在进行的时候被发现了会怎样?[2] 菲德尔可能比赫鲁晓夫更清楚，保密并不容易，或者有可能是，向来行事不顾后果的赫鲁晓夫对此也并不是真的特别在乎。根据古巴的记载，他给予了劳尔一个典型的、粗鲁的答复：“不用担心，我会抓住肯尼迪的睾丸，让他谈判。毕竟，他们也用他们在土耳其和其他地方的基地包围了我们。”[3]

202

劳尔和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签署了军事协议的草案，计划5年后更新。它包括核设施的内容，在其条款中有一条规定，苏联军方保有对核弹头的唯一控制权。[4] 方案议定后，这个条约将于11月在哈瓦那正式签署，届时赫鲁晓夫希望能够访问这座岛屿——面对大吃一惊的世界揭开导弹上的罩布。[5] 对古巴的军事勘查和观测在7月中旬开始。一群古巴的洞穴专家选出了适合于储存武器和弹药的洞穴，同时“生活在被征用地区的农民家庭”则不得不搬迁到别处，并得到了新的土地和住房。[6]

参与到这个代号为安纳德尔行动（Operation Anadyr）计划中的俄

① Diez Acosta, *October 1962*, pp. 121 - 122。书中援引了1968年1月25日古巴共产党会议的记录。

② Diez Acosta, *October 1962*, p. 103.

③ Diez Acosta, *October 1962*, p. 104.

④ Anderson, *Che Guevara*, p. 528.

⑤ May and Zelikow, *The Kennedy Tapes*, p. 711.

⑥ Diez Acosta, *October 1962*, p. 110.

国人开始时被告知，他们将参加的是在苏联遥远的北方沿安纳德尔河举行的一场军事演习。数年后，这个计划的指挥官阿纳托利·格里布科夫（Anatoly Gribkov）将军解释了这个前所未有的任务：他要去"集合并装备将近5.1万名陆军、空军和海军人员；为这一大群人的长期驻扎估算武器、装备、补给和支持；要找85艘货船运输这些人和装备；将他们运出海，保证他们在到达古巴后得到良好的接待及合适的工作条件"。他还被要求"隐瞒整个行动并在5个月内完成"。[①]

苏联的各个分队于8月初开始陆续到达，在古巴海岸线附近的7个不同的港口登陆：圣地亚哥、努埃维塔斯、卡西尔达（Casilda）、哈瓦那、翁达湾（Bahia Honda）、卡巴尼亚斯（Cabañas）和马列尔。"军队登陆后重新编队，在夜晚乘着30到40辆卡车离开。为了确保他们能够顺利前行，苏联和古巴的工程队维修了道路，他们修建了新的道路，铺设了浅滩便道，以绕开那些不堪重负的桥梁。"[②]

最后到达的设备、核弹头于10月初到位。这些精密物件被装在两艘船上，一艘是破冰船印迪吉尔卡号（*Indirgirka*），于10月4日抵达；另一艘是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号（*Alexsandrovsk*），它是在10月23日靠港的。伊万·谢申克（Ivan Shishenko）上校，这位负责储藏它们的苏联军官说，印迪吉尔卡号运输的是整件的核弹头，另外一艘船运送的是补充的军火，它们没有从船上卸下来。[③] 两艘船都是从摩尔曼斯克（Murmansk）起航，在马列尔靠港。

最初，这些核弹头被收入哈瓦那省贝胡卡尔（Bejucal）的一个仓库里，直到10月26日被运到发射场之前一直都保存在那里，而那一天正是危机最终被解决的前一天。在古巴的热带气候下，运输它们的难题之一，就是要保持其周围气温低于20摄氏度，必须要使用空调车。[④]

① Anatoli I. Gribkov, William Y. Smith and Alfred Friendly Jr., *Operation Anadyr: US and Soviet Generals Recount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Chicago, 1994, pp. 23–24.

② Diez Acosta, *October 1962*, p. 113.

③ Diez Acosta, *October 1962*, p. 114.

④ Diez Acosta, *October 1962*, p. 114.

卡斯特罗做出了最后的努力，为说服赫鲁晓夫公开宣布这个防御条约，他派格瓦拉和阿拉贡内斯在8月前往莫斯科，商讨此事。表面上，这两个古巴人是将古巴对于劳尔在7月草签的军事条约的修订版带过去，实际上他们也希望能够说服俄国人将它公开，它本身就足以阻止美国可能的入侵了。于是，古巴人可以在接受苏联基地的同时坚持自己的权利，就像美国在土耳其建设核基地的时候，土耳其政府所做的一样。[①]

203

但格瓦拉和阿拉贡内斯在克里米亚岛（Crimea）上赫鲁晓夫的夏季别墅中拜访他时碰了壁。赫鲁晓夫坚持这项协议要保密到导弹被安全装好为止。古巴人不得不与他的愿望保持一致。显然赫鲁晓夫不想签署这个防御条约，他说将在今年稍后访问古巴的时候这么做。可能他认识到，同美国的危机会在某个阶段出现，在没有古巴蹚浑水的情况下，与美国进行双边谈判会更加容易一些。（或者按照他生动描绘的那样，“抓住他们的睾丸”。）格瓦拉问他，如果美国人过早地发现了安纳德尔行动会怎么样，赫鲁晓夫满面笑容。“你不必担心，”他轻松地说道，“美国那里不会有任何的问题。”[②]

赫鲁晓夫错了，出了大问题。在格瓦拉和阿拉贡内斯返回哈瓦那的时候，即9月初，美国已然知晓了苏联军队在古巴的不断集结。高空侦察机已经发现了萨姆2导弹场，还有苏联士兵数量的不断增加。9月7日，肯尼迪向国会申请，批准征集15万名预备役军人，宣布10月将在加勒比海进行一次军事演习，话语中满含着美国即将会受到一次入侵的火药味。[③] 9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授权总统如果有必要，可以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阻止这座岛屿上可能会危及美国安全的军事建设。古巴人最担心的成为了现实。

当肯尼迪总统的危机委员会于10月16日周二在白宫开会时公开提出，对这座岛屿进行空袭是否不合适时，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

---

① Ernest May and Zelikow, *The Kennedy Tapes*, p. 711.

② Anderson, *Che Guevara*, p. 529.

③ 这次的演习包括一次对波多黎各沿海的维埃克斯岛（Vieques）的抢滩登陆，目的是推翻一个假设的、叫做 Ortsac—— Castro 一词的反向拼写——的暴君。

马拉（Robert McNamara）带着一种更有节制的现实的态度，将此引入到了讨论中。他说如果苏联的导弹基地已经开始运作了的话，就不能对它们发动空袭：

> 如果在空袭前它们就已经开始运行了，我不认为我们能保证，在它们发射之前打掉它们。不仅如此，如果它们被发射了，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美国] 东海岸或者距离古巴半径在600到1 000英里以内的地区都会陷入到混乱之中。[1]

麦克纳马拉还说明，这场空袭一定会延伸到机场和储藏仓库，而这一定会导致“可能造成的古巴人的伤亡——人数至少数百，很有可能会上千——可能会是2 000或3 000”。麦克纳马拉以坚决反对这种打击的态度结束了自己的发言：“我强烈反对空袭，在这一点上我是非常直率的，因为我认为，这种行为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实在是太大了。”[2] 204

这个危机小组继而开始审视发动一次入侵的可能性。麦克纳马拉认为“入侵从而将秩序重新带回到这个国家”或许是必要的。按照参谋长马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Taylor）将军的说法，这样的一次入侵需要9万人。海空并进的话，要用5到7天的时间。[3]

肯尼迪总统做出了他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决定：“我们要除掉这些导弹。”这是美国最为基本的立场。他并没有明确说明应该如何去做，在空袭还是入侵的争辩中也没有偏袒任何一方。他只是要求，两手准备都要做好。5到7天是泰勒将军认为做好准备的必要时间。

在哈瓦那，古巴人对这个决定一无所知，但是周末，即10月20日和21日两天，关塔那摩的变化使得他们警惕起来，感到危机可能会迅速升级。不同寻常的数量庞大的增援美军正在陆续抵达美国基地，住在那里的居民被勒令离开。古巴日报《革命报》10月22日星期一

---

① May and Zelikow, *The Kennedy Tapes*, p. 55.
② May and Zelikow, *The Kennedy Tapes*, p. 59.
③ May and Zelikow, *The Kennedy Tapes*, p. 67.

早上的头条新闻是“美国准备入侵古巴”。没等到原定于晚上播出的肯尼迪的电视讲话开始，在仍旧不能确定这是否预示着一场迫在眉睫的入侵的情况下，白天卡斯特罗就让古巴军队进入了戒备状态，在当天晚上动员了约 27 万预备役士兵。古巴驻联合国大使接到指令，请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

苏联驻古巴的指挥官当天接到了在莫斯科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命令，“立刻采取措施，做好战斗准备，同古巴军队和其他所有的苏联军队一起，击退敌人”——但 R－12 导弹和核弹头不参与此次行动。[①] 就像美国人一样，俄国人也并不希望这场危机失去控制。

在华盛顿方面经过了一周时间的秘密商讨后，肯尼迪于 10 月 22 日晚上出现在电视上，宣布对苏联军事装备活动的严密监视发现了“一系列进攻性的导弹发射基地”，它们“在这个被禁锢的岛屿上做好了准备”。他说，每个装载了核弹头、射程达 1 000 英里或者更长距离的中程导弹能攻击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巴拿马运河、卡纳维尔角（Cape Canaveral）、墨西哥城或者位于美国东南部、中美洲以及加勒比海的任何城市”。另外一个中程弹道导弹，其射程能达到前者的两倍，“能够对西半球大多数大型城市进行打击，范围北及哈德逊湾（Hudson Bay），南及秘鲁的利马（Lima）。”肯尼迪继续说道，古巴位于“一个众所周知的，同美国有着特殊关系和历史渊源的地区”，导弹的部署是“一次蓄意的挑衅，对现状的不公正的改变，这不能被美国接受”。

205

肯尼迪决定了要做什么，排除了空袭和入侵。他作出了第三种选择，宣布对这座岛屿进行海上封锁：“所有驶往古巴的各种类型的船只，不管来自于哪个国家或者港口，只要被发现装载有进攻性武器，都将被驱逐。”

他还要求安理会考虑美国的一个决议，要求“立刻拆除和撤走在古巴的所有进攻性武器。”这样的行动需要监察员；它需要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监督下”进行。

---

① Diez Acosta, *October 1962*, p. 159.

肯尼迪以“对古巴被囚禁的人民”情绪激动的呼吁来结束讲话，描述了他是如何“满怀悲伤地看着，你们的国民革命被出卖，你们的祖国落入外国的控制之下。现在你们的领导人不再是被古巴的理想所激励的古巴领导者了；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国际阴谋的傀儡和代理人。”①

卡斯特罗在第二天晚上对肯尼迪的讲话做出了回击，同样也是电视讲话。他说道，最近的事件是自革命胜利以来，美国所实行的政策的顶峰。就像肯尼迪一样，他深入探究了历史，回顾了上个世纪末的最后几年，说明了他们“特殊的关系和历史渊源”是什么，那个时候，“我们的发展、我们的独立，还有我们的主权”都被“美国佬的官方政策破坏了”。他进一步指出，美国人试过了各种手段——外交施压、经济侵略，还有“一个危地马拉类型的侵略——在吉隆滩的入侵”等。现在他们开始了一次新的冒险，“试图阻止我们在苏联阵营支援下的自我武装”。卡斯特罗不接受任何联合国干预的论调，在提及卢蒙巴（Lumumba）死后联合国在中非的持续危机后，他说：“我拒绝所有的调查，古巴不是刚果。”

在援引了古巴历史上那些更为久远的因素后，卡斯特罗称肯尼迪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海盗，这是一个在古巴人中特别能产生共鸣的词。他质问，美国人为什么要在“他们已经拥有了这片海域的时候”宣布进行封锁，“［亨利］摩根是这个海域的所有者。我不提［弗朗西斯］德雷克，因为德雷克还是一个有些声誉的人……他们尽管可以去搜遍档案文件……但是在海盗的历史上，他们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先例。这是在和平时代发动战争的行为！”

卡斯特罗继续说道，唯一的先例或许能在法西斯的历史中被发现。“今天的美国不幸成为了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及世界上最为落后和反动势力的庇护所。这是历史事实。它曾经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但是林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林肯到肯尼迪，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卡斯特罗最后以炫耀他所拥有的借来的核威慑结束了讲话：“人 206

① 肯尼迪讲话的全文收录在 May and Zelikow, *The Kennedy Tapes*, 276 –281 页。

民应该知道下面这些内容：我们拥有击退直接进攻的手段……我们正在冒险，除了冒险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欣慰的是，在一场热核战争中，那些发动过一场热核战争的侵略者们将会被消灭。我相信我的话里没有任何的歧义。"①

这个星期古巴的情绪是相当放松的，尽管卡斯特罗做了这样轻率的威胁。肯尼迪在他的讲话中将结束语给了古巴"被禁锢的人民"，但是这并没有反映出当时哈瓦那的情绪，就像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奎尔克（Robert Quirk）在他的《卡斯特罗传》中所概括的那样：

> 1962 年 10 月，绝大多数人在危机中支持他们的政府，就像他们在猪湾入侵的时候所做的那样，一部分人是因为他们支持社会和经济改革，其他的人则是因为他们那高于经济收益的国家荣誉感。当莫斯科和华盛顿的要人们正在讨论这数百万人的命运时，大多数古巴人的生活还是一切如常。他们搭乘捷克的公共汽车前去工作。他们挤进受欢迎的咖啡馆和点心店，排队等着买限量的食物——一些人可能买的比平时还要多。白天孩子们在学校里上课。沿着马雷贡大道（Malecón），男人和男孩们在岸上钓鱼。②

同时，猫鼬行动计划在华盛顿再次被提了出来。在星期二，即 10 月 16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午的会议结束后，罗伯特·肯尼迪同参与这个计划的人开了一次会并暗示了总统对迄今进展的"普遍不满"。他集中讨论了中情局刚刚设计的，一个新的更具有积极性的破坏计划。理查德·赫尔姆斯坚持要搞清楚，这个行动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对古巴的流亡者们能做出什么样的承诺，于是罗伯特·肯尼迪暗示，总统可能"不太反对美国公开的军事行动"。他大声质疑，"如果这个国家被侵略"，有多少古巴人会真地保卫卡斯特罗。猫鼬的专家们继续讨

① 卡斯特罗讲话的全文见 Diez Acosta, *October 1962*, 224 - 255 页。

② Robert Quirk, *Fidel Castro*, New York, 1993, p. 434.

论利用古巴流亡者攻击核导弹基地的可能，但是可能对所有与会者来说幸运的是，罗伯特·肯尼迪“和这群人中的其他人都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1]

美国的海上封锁开始于10月24日星期三，第二天苏联政府命令它的舰船的船长们停留在封锁区域之外——这个命令对运载着R-14核导弹的船只以及它们的潜艇护卫队产生了作用，他们本来计划于当日靠港的。尽管随后的几天里充满了不安和焦虑，这场危机最后的解决则相当简单。10月26日星期五，一封赫鲁晓夫的信被送到了肯尼迪那里，信中说，他将那些他称之为“防御性”的导弹送到古巴的目的，是为了阻止猪湾事件的重演。如果美国同意不入侵这座岛屿，他会高兴地将它们撤走。鉴于在这场危机之前，美国就已经不打算支持另外一次流亡者的入侵了，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提议。第二天，他们送出的回信同意苏联的提议。为了保全面子，他们坚持联合国的监察员应核实苏联的撤离，这个要求被赫鲁晓夫接受了，但是被卡斯特罗狂怒地拒绝了。美苏协议中包含着一个默契，即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被认为已经过时了，将被撤走。

207

全程接触了这些事件和决定的是卡斯特罗，他的革命位于这场危机的中心。他并没有要求将导弹安置在古巴。当它们被运走的时候，没有人去请求他的准许。为了遮羞，他在10月2日发表了声明，以表明他是有发言权的，有着自己的观点，即使没有人在听。他说，肯尼迪所保证的不会入侵古巴是不起作用的，除非有其他的措施并解除海上的封锁。卡斯特罗提出了5点要求：停止经济封锁；停止由美国发起的，对古巴的颠覆活动；停止美国基地实施的“海盗行为”；停止对古巴领空和领海的侵犯；停止美国对关塔那摩的占领。暗含在他的声明中的意见是，5点要求应该被包含在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协议中。

当这场紧迫的危机结束后，米高扬被赫鲁晓夫派到哈瓦那去修复关系。他于11月2日抵达，不得不停留了3个星期的时间，以安

[1] May and Zelikow, *The Kennedy Tapes*, p. 77.

抚古巴领导人。[①] 米高扬不仅是来谈古巴一直保持坚决的反对态度的联合国检查的，他们还商谈了苏联伊尔 28 轰炸机从古巴撤离的问题，这项要求是美国人事后添加的。米高扬无权同古巴人进行协商，莫斯科已经做出了决定。他的任务是说服卡斯特罗接受核查，3 个星期后，他不得不承认失败。卡斯特罗对此态度坚决，不会有核查出现。

肯尼迪总统在 11 月 20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危机正式结束："当然，我们不会放弃在这个半球做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努力，去终止源于古巴的破坏活动。我们当然也不会放弃决心和希望，即古巴人民将在某天被彻底解放。但是这些政策同任何发起一场对这座岛屿的军事行动的意图是截然不同的。"麦克纳马拉在同一天宣布解除海上封锁。

208 苏联的舰船载着核导弹和他们的军队驶离了古巴。美国放弃了核查的要求，同意对古巴进行空中监视（古巴对此不能阻止）就已经足够了。在古巴，人们的情绪很低落。导弹危机是革命历史上极少遇到的，卡斯特罗没能掌握优势的重要事件之一。他不习惯于失败和受辱，尤其是在他最近如此追求的盟友的手下。

"那些天的事件留下的是失望和苦涩。"记载这次危机的古巴官方历史学者托马斯·蒂兹·阿科斯塔（Tomas Diez Acosta）如此写道，他的记载反映了卡斯特罗的观点。这种失望的感觉来自在接受美国所有的要求时，"苏联所充当的拙劣的政治角色"。这使得古巴陷入"一个非常复杂的形势之下"，因为它必须要反对"美国侮辱性的现场核查的要求"。

更加糟糕的是，用美国撤出设在土耳其的导弹换取苏联撤出在古巴的导弹的公开交易。事实上，对于任何交换的建议，对苏联人来说

① 米高扬在到达后接到消息，他的妻子去世了。平常一直担任其私人秘书的，米高扬的儿子谢尔盖必须要返回莫斯科，而米高扬则留在了哈瓦那。

更加体面的——对古巴人也是公平合理的——的方法是，首先应该要求美军归还其非法占领的关塔那摩基地，并将所有驻扎在那里的美国军队撤走。

经历了这次痛苦但是有教育意义的事件后——古巴人在其中既没有被征求意见，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古巴人再也不会这么相信苏联在处理国际问题上的政治领导能力了。[①]

继任的美国政府延续了肯尼迪政府（从来没有公开透露过）做出的不入侵古巴的承诺。加勒比海的其他国家却都成为了美国军队的目标——多米尼加共和国、格林纳达（Grenada）、巴拿马、海地——但是古巴一直不受侵犯。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古巴流亡者又重新燃起华盛顿方面会给予推翻卡斯特罗的运动以更加积极的支持的希望时，美国依然信守这个承诺。

反卡斯特罗的舆论当然还在继续。这座岛屿仍旧处于外交的孤立之中，流亡者仍被怂恿去继续他们的侵扰计划。肯尼迪于12月在佛罗里达的橘子杯（Orange Bowl）体育场主持了一个仪式，欢迎那些在猪湾被俘，现在终于被释放归来的囚徒们。在从他们那里接过了战旗后，他承诺，会在"一个自由的哈瓦那"将它归还给他们。

中情局仍旧是事事插手，到处都能看到它的身影，不仅如此，尽管猫鼬行动被官方宣告结束了，但它除了没有正式名目，一切照旧继续运行。为推进与古巴相关的"新的行动思路"而设立的美国国务院的一个新部门——古巴事务协调委员会（Coordinator of Cuban Affairs）于1963年4月提交了涉及对流亡者继续支持的"当前的秘密政策"的报告。这些人仍旧相信，卡斯特罗政府可以"从内部被推翻"，并计划对古巴的船只进行破坏性袭击。[②] 肯尼迪在6月授权中情局支持一项针对适宜目标的有限的"打击和轰炸"计划。这个计划在秋天又被

209

① Diez Acosta, *October 1962*, pp. 199 – 200.

② James Blight and Philip Brenner, *Sad and Luminous Days: Cuba's Struggle with the Superpowers after the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2002, pp. 275 – 276.

扩大了，包括了对发电站、炼油厂和糖厂的破坏。

“我们立刻赶上了，”卡斯特罗后来回忆说，以“中美洲的海岛为基地和对我们的海岸进行海盗袭击”为特征的历史时期又回来了。他说，现代的海盗行为是：

> 用装备着最先进电子设备的舰船，以不受惩罚的方式来进行的……因此，在这个伟大并非凡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洲际导弹的时代，我们被迫回到了荷兰海盗、德雷克、雅克·德索雷以及所有我们在历史书中读到过其丰功伟绩的绅士们的时代。[1]

对古巴沿海的袭击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持续不断，这是对其政府和人民的持续刺激，也是古巴政府始终保持强有力且具攻击性的特务机关的借口。如同在西班牙时期那样，这座岛屿的总督被迫采取铁腕措施打击“海盗”——和这座岛屿上支持他们的那些人。

卡斯特罗和苏联的早期“蜜月”（1963年5月）

导弹危机后，哈瓦那和莫斯科之间的信任感产生了极大的裂痕。赫鲁晓夫意识到了这一点，遂试图同卡斯特罗重建新的关系。他于1963年1月寄送了一封篇幅很长、内容诱人的信，邀请卡斯特罗于4月访问莫斯科。为了给古巴领导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俄国人派他们的新型飞机去接他。图-114被称为当时最大、最重的客机，配备的是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用12个小时就能从古巴直飞摩尔莫斯克。卡斯特罗带上了一群可靠的“菲德尔派”同行，其中包括艾米利奥·阿拉贡内斯（在阿尼巴尔·埃斯卡兰特被免职后，他被委派组织新的革命共产党）、塞尔吉奥·德瓦列（Sergio del Valle）、何塞·阿夫兰特斯

---

① 1968年1月26日卡斯特罗的“秘密”讲话，引自 Blight and Brenner, *Sad and Luminous Days*, 66页。

［（Jose Abrantes），负责国家安全的最高长官，还是前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和勒内·巴列霍（Rene Vallejo）。除了阿夫兰特斯，里面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4月28日，卡斯特罗在莫斯科机场受到了赫鲁晓夫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的迎接，同时到场的还有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古巴的访问对赫鲁晓夫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国内处境困难的情况下，他需要仰仗古巴革命领导人的光芒向他的党和人民证明，他对古巴这个苏联阵营的新成员的支持是正确的。他还要确保难以捉摸的卡斯特罗连同他的那些难以控制的支持者们不要倒向中国，因为这一时期中苏之间的争论仍旧十分激烈。 210

卡斯特罗的访问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公众对古巴政党的欢迎是自发和热情的；卡斯特罗无论到哪里都受到隆重的欢迎。俄国人为这位来自遥远热带地区的富有魅力的领袖人物而着迷。[①] 卡斯特罗参加了各种社交宴会和观看了在波修瓦剧院（Bolshoi）的一场演出，但是他也曾摆脱了自己的保卫人员，在没有护卫的情况下漫步穿行了红场，享受群众们的鼓掌喝彩。5月1日，他出现在列宁墓，在赫鲁晓夫的身边观看了苏联的导弹发射器从鹅卵石上驶过。

卡斯特罗在莫斯科停留了一个星期，然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游历了苏联全国，行程十分紧张。他访问了塔什干（Tashkent）和撒马尔罕（Samarkand），接着去了伊尔库茨克（Irkutsk），沿着贝加尔湖（Lake Baikal）畔散步。他在一个集体农场中学说了几句乌兹别克语，使得当地群众感到欣喜。他经由西伯利亚的克拉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和乌拉尔山地区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返回了列宁格勒，然后前往基辅，之后返回莫斯科，参加了在列宁体育场的赛车决赛。即使到这时，访问也还没结束。卡斯特罗和赫鲁晓夫一同离开，前往苏联领导人在黑海边上的郊外别墅，并访问了第比利斯（Tbilisi）。卡斯特罗直到6月才返回了莫斯科，及时赶

① Quirk, *Fidel Castro*, p. 460.

上了苏联配有大型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的飞机从摩尔莫斯克返回哈瓦那。

访苏期间的会谈对革命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古巴现在放弃了格瓦拉不切实际的经济多样化的计划，然后在苏联的支援下集中发展制糖业。古巴政府注意到了一个苏联专栏作家的论调，拒绝走“自给自足的冒险主义路线”，这个选择使得古巴同中国产生了嫌隙，同时也是对格瓦拉所支持的另一种政策的一个打击。[①]在中苏纷争上，卡斯特罗以经济上的需要为标准作出了选择。中国向古巴送去了大米、杂技团和安全套，但是苏联则送去了工厂建设所需要的全部资金，还有农业机械和武器。当然，苏联人还购买了大量的糖。[②]

这次对苏联的长时间访问使得恢复古巴同美国之间的关系没有了任何希望。“没有一个附属国的领导人在俄国停留过40天，”肯尼迪总统对记者们如是说，“享受到如此的荣耀，并且引起了赫鲁晓夫个人极大的关注。”[③] 这回美国政府不但没有像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某委员6月所建议的那样，尝试同卡斯特罗建立起“沟通的渠道”，而且把重心再次转到了一个破坏活动上——“针对的是古巴的经济命脉”。[④] 就像对古巴沿海地带的袭击一样，双方的公开辩论持续不断，但是卡斯特罗和肯尼迪私下都表示了探索可替代的策略的兴趣。法国《快报》记者让·丹尼尔（Jean Daniel）于1963年10月和11月对两人分别进行了采访，并写出了一篇充满希望的报道。但是不管做什么，都太迟了。11月22日，丹尼尔和卡斯特罗正在共进午餐的时候，肯尼迪总统在德克萨斯的达拉斯（Dallas）被暗杀，美古关系可能改善的幻想破灭了，且再也没有出现过。

---

① Quirk, *Fidel Castro*, p. 473.

② Quirk, *Fidel Castro*, p. 477.

③ Quirk, *Fidel Castro*, p. 475.

④ Quirk, *Fidel Castro*, p. 474.



图1　阿图依，泰诺族的酋长，努力抵抗西班牙征服，但是1512年被烧死在火刑柱上。20世纪20年代格雷内特·埃里索（Elisio Grenet）的一首流行歌曲的活页乐谱唤起了人们对他的记忆。



图2　迪亚戈·贝拉斯克斯（Diego Velazquez，1465—1524），1511年古巴的西班牙征服者，也是这座岛屿的第一位统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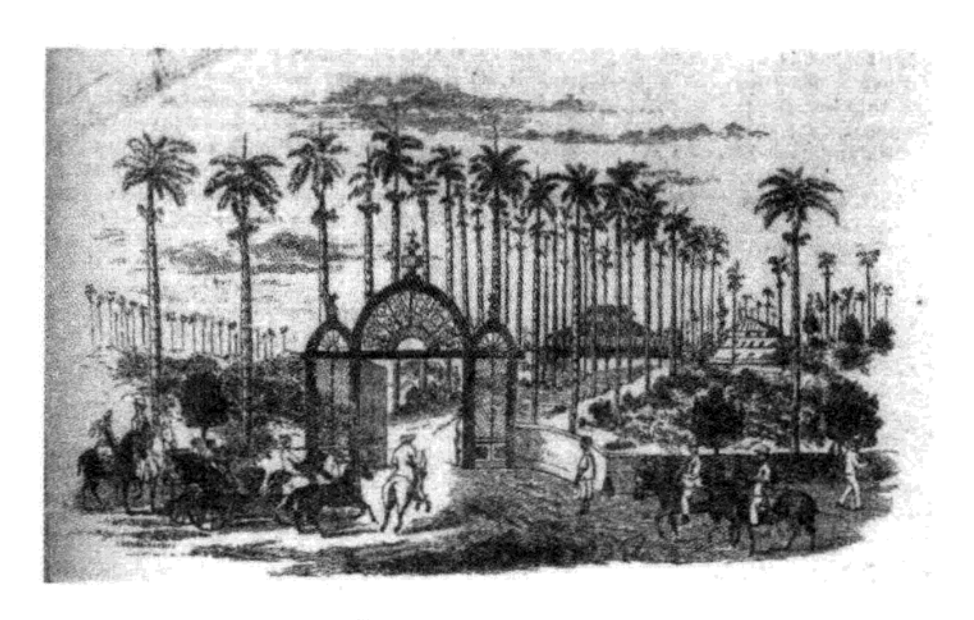


图3　咖啡种植园，《哈波斯杂志》（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卷6，185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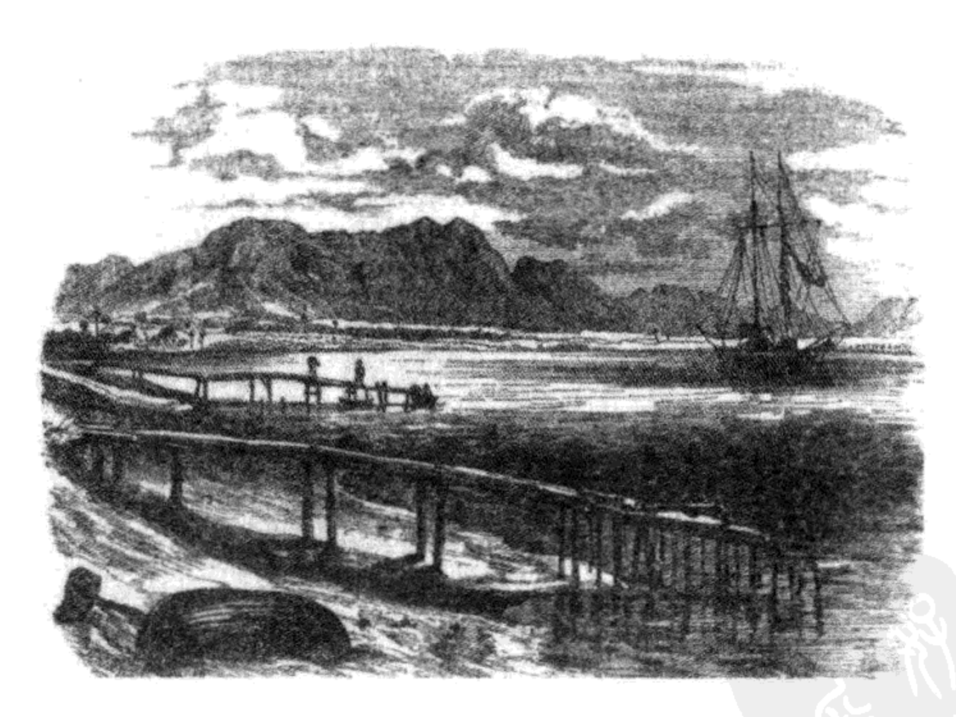


图4　比那尔德里奥的莫里略（El Morrillo）海滩，1851年纳尔西索·洛佩斯（1799—1851）在这里登陆，想要将古巴并入美国。《哈波斯杂志》，卷6185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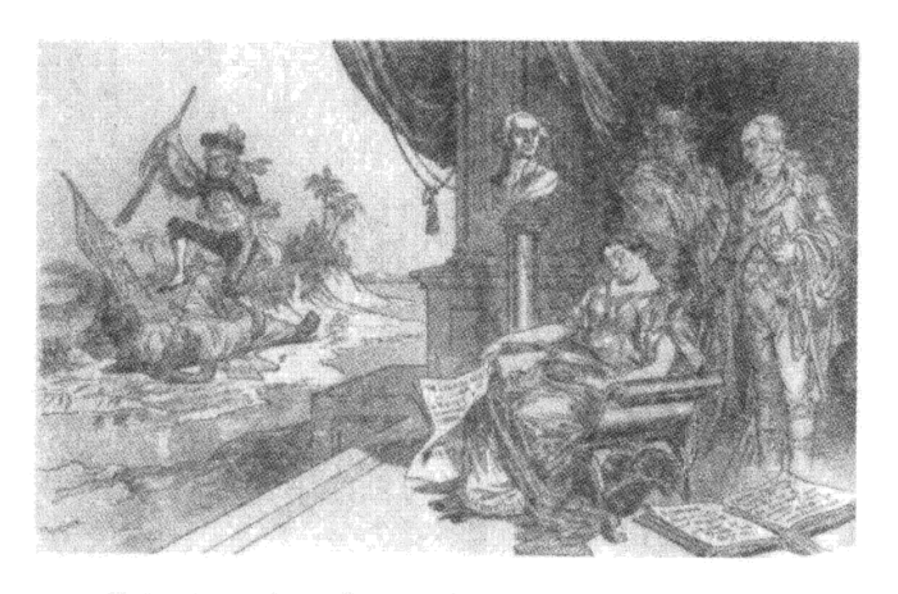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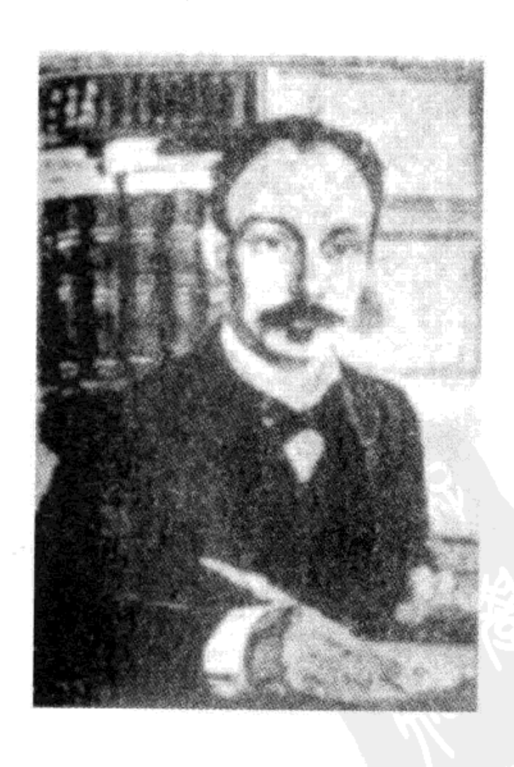


图5　为古巴申辩。“西班牙在古巴的统治是一部屠杀、暴政、暴虐的历史。”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of Lafayette）和拜伦·冯·史特宾（Baron Von Steuben）问哥伦比亚，如果没有进行独立战争，美国的命运会如何。维克托·基里安（Victor Gillan）发表于《法官》（Judge）杂志，1895年10月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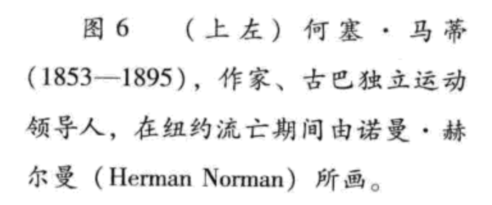


图6　（上左）何塞·马蒂（1853—1895），作家、古巴独立运动领导人，在纽约流亡期间由诺曼·赫尔曼（Herman Norman）所画。



图7　（上右）马克西莫·戈麦斯（1836—1905），一名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战士，他成了独立战争中古巴军队的总司令。



图8　瓦雷里阿诺·韦勒（Valeriano Weyler，1838—1930）将军，1896年到1897年间西班牙在古巴的总督，集中营的创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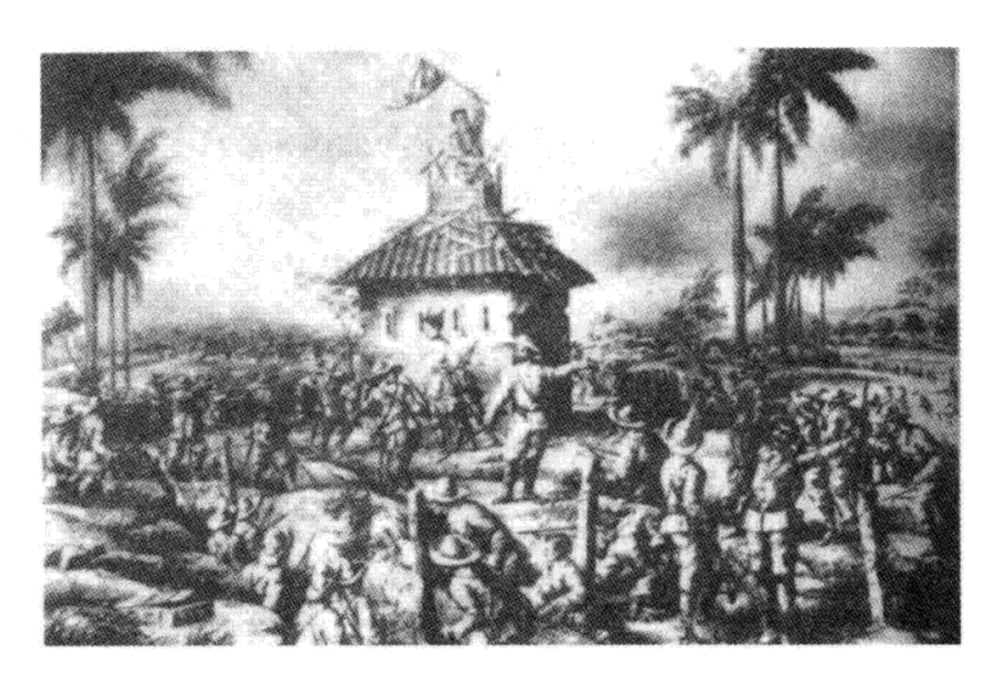


图 9 贡法乌斯（Gonfaus）要塞，位于瓜伊马罗（Guaimaro），西班牙军队所掌控，1896 年 10 月被卡利斯托·加西亚占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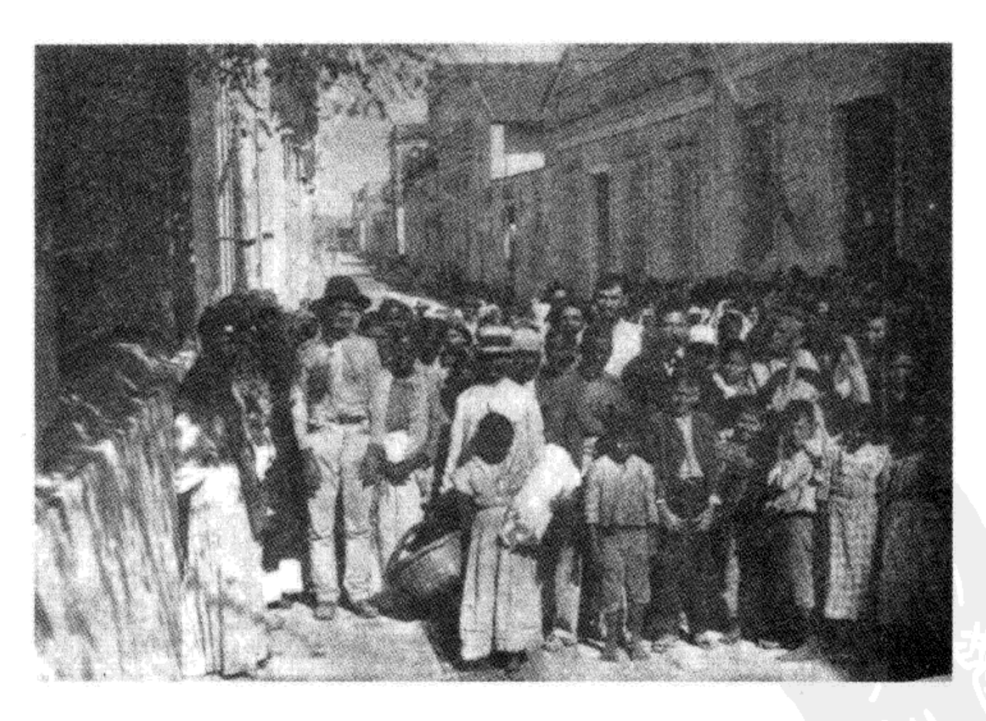


图 10 在美国领事亚历山大·布赖斯（Alexander Brice）设于马坦萨斯湾的办公室外等待食物的儿童。189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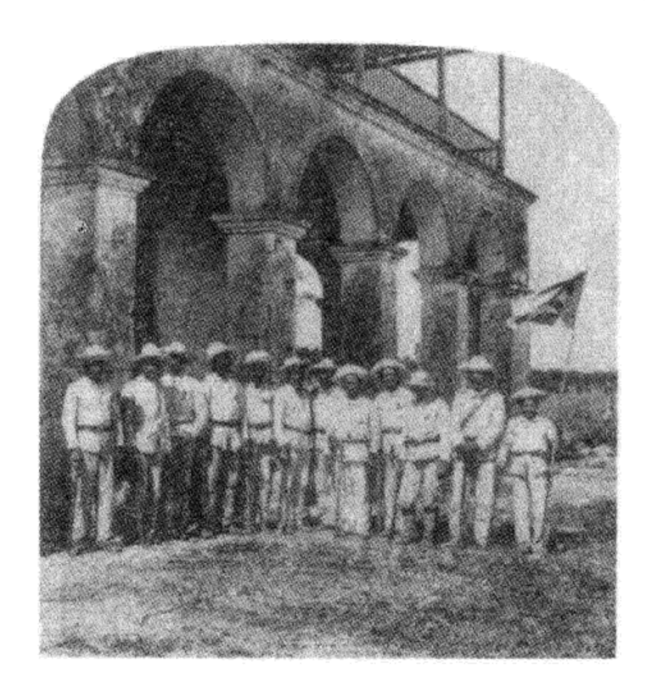


图11　雷梅迪奥斯镇，马克西莫·戈麦斯部的军官们。1899年



图12　列奥那多·伍德将军（1860—1927），1899年到1902年间美国在古巴的军事长官，摄于190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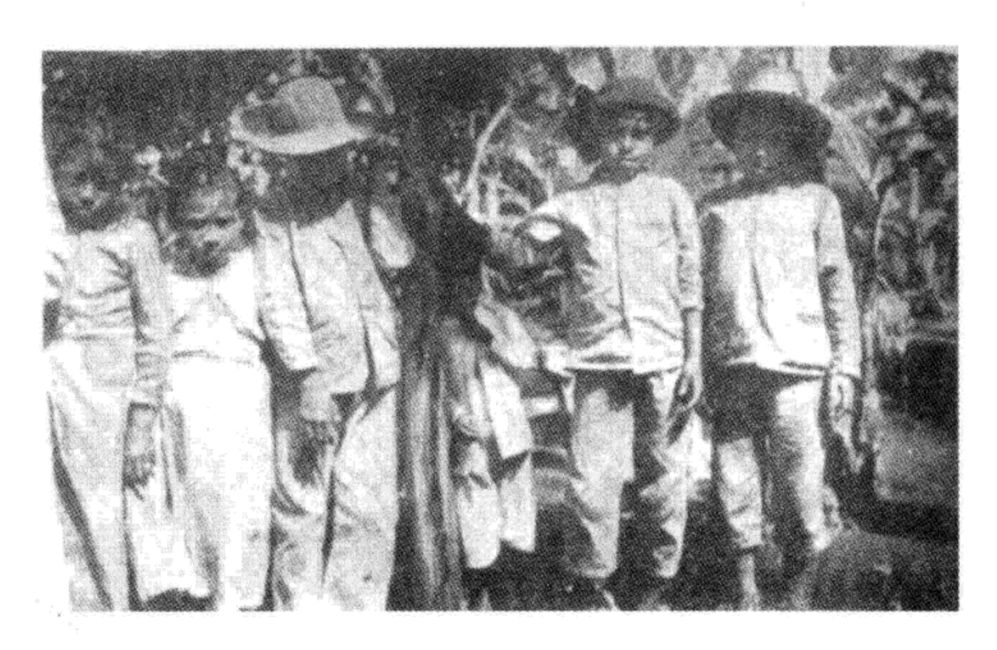


图 13　亚拉的印第安儿童，在巴拉科阿城外，美国人类学专家斯图尔特·库林摄于 1901 年。





图 14　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1832—1908），古巴第一任总统，1902 年到 1908 年间任职，1902 年摄于哈瓦那总统府。



图15 弗尔亨西奥·巴蒂斯塔（1901—1973），1940—1944年和1952—1958年间的古巴总统，这是大约在1935到1936年间和他的妻子还有她的娘子军团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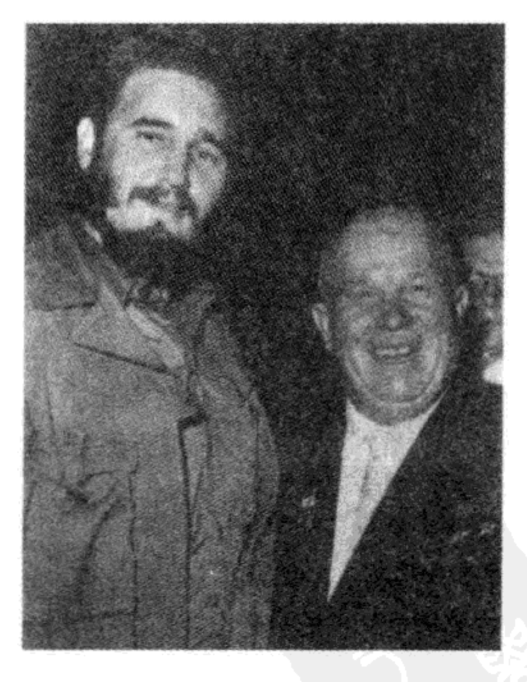


图16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1960年9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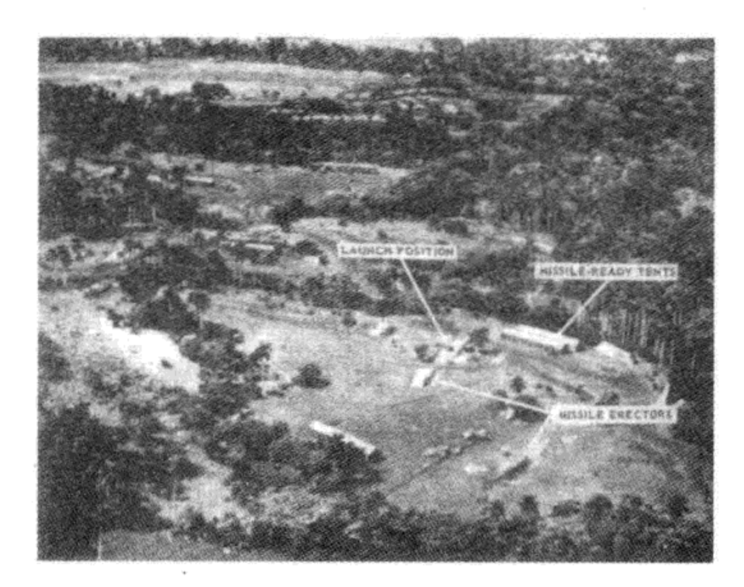


图 17　苏联在比那尔德里奥的圣克里斯托设置的中程弹道导弹基地，1962 年美国侦察机摄。

（图中的 3 个名词为发射阵地（左上）、放置导弹的帐篷（右上）、导弹起竖架（下）。



图 18　在教皇 1998 年 1 月访问古巴期间，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卡斯特罗在1964年1月第二次访问了苏联，因为赫鲁晓夫需要古巴保证坚持苏联的和平共存政策，不会同美国总统约翰逊的新政府产生什么问题。就卡斯特罗个人来说，他希望做成一次更好的糖的交易。10天后，两个领导人将这两点都解决了。赫鲁晓夫同意，至少于1970之前以每磅6美分的价格购买古巴的蔗糖。俄国人在1965年买了210万吨，1966年300万吨，1967年400万吨，之后是500万吨。古巴革命曾经试图从制糖业的单一经济逃脱出来，现在则将可预见的未来绑在了它的上面。

至于和平共存，卡斯特罗和赫鲁晓夫达成一致，革命运动是为了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可以沿着和平与非和平的道路前进，这是对中国的认可，同时也承认了古巴仍旧有在拉丁美洲推广成功的革命经验的打算。

211

卡马里奥卡港（Camarioca）的首次开放（1965）

革命对共产主义的拥护增加了想要离开这座岛屿的古巴人的数量，但是因为自导弹危机之后这座岛和美国之间的商业飞行被终止了，乘飞机流亡海外变得越来越困难。尽管并非总是很轻松，但在革命最初的几年，离开这座岛屿的程序是相当简单的。想要流亡的人需要一张机票、一张古巴政府的出境许可证、一份美国政府的入境签证，这是当时拉丁美洲国家国民们的标准做法。美国的签证总是很难获得，只在特殊情况下才被给予知名的左派人士。获得一份古巴的出国许可证经常是一场官僚主义的噩梦，只有在所有收入和财产税的缴纳被核实后才会派发。但是尽管有这些障碍，还是有数万古巴人离开了这座岛屿。

一部分古巴人在过去的数个世纪中已经习惯于流亡，这是一种任何政府掌权时都会经常出现的由于贫困、压制和政治分歧所滋生出来的现象。整个19世纪，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中产者们在欧洲和美国寻求庇护；那个时代，数以千计的工人们——主要是烟草工业——迁移到佛罗里达，在那里建立起了繁荣的社区，在观念上仍

212

旧保持着古巴人的特点。独立战争期间的活跃分子们经常发现自己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进入西班牙设在休达（Ceuta）、摩洛哥的海岸或者费尔南多波岛上的非洲监狱中忍受折磨。古巴的独立战争都是由流亡海外的古巴人策划并提供资金支持的，反对巴蒂斯塔的战争亦然。卡斯特罗时期逃亡的人在海外过着与他们的先辈们相同的生活。

在革命之后，第一批离开的是参与到巴蒂斯塔政权中的人——它的受益者和主要支持者们——革命特别瞄准了他们，其初期对那些著名的刽子手和刑讯者们的刑罚就是一个信号，他们在这个新的古巴中是不受欢迎的。据估计，在最初的两年里，有 4 万多人离开了古巴。[①]

第二批更为庞大的群体是由那些对革命的根本转变不满的人所组成。古巴本土自由中产阶级中的许多人，虽然只是在革命中袖手旁观，却认为自己已经参与到了卡斯特罗的战争中去了，但是他们不赞成随后突然向社会主义转向，更不用说共产主义了。天主教信徒们，还有那些足够富裕到能将自己的孩子送到私立学校的人们，是革命向左转的早期反对者。这些人一般都认为，卡斯特罗对政府的掌控将是短暂的，许多飞到了迈阿密的人确信他们不久之后就能回去。据估计，1961 年有 8 万人离开，1962 年则接近 7 万。[②]

“许多当时离开的人”，美国大使邦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相信，在不需付出艰辛努力的情况下，他们很快就能返回，看到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恢复如常。”[③] 这些自愿

---

① Richard Fagen, Richard Brody and Thomas O' leary, *Cubans in Exile: Disaffection and the Revolution*, Palo Alto, Calif. , 1968, p. 63.

② Fagen et al. , *Cubans in Exile*, *and Luis Pérez*, *Cub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ies of Singular Intimacy*, Oxford, 1988, p. 245. 不同的作者的数字略有出入。根据 Jose Luis Llovio - Menéndez 的记载，1959 年第一批大量出逃的人数接近 75 000，其中包括富有的古巴人或者同巴蒂斯塔政权有联系的人，或者是两者皆有的人。1960 年到 1962 年，更庞大的一群人，大约 190 000 人离开了古巴岛，其中包括职员阶层、技术专家和工匠。Llovio - Menéndez, *Inside: My Hidden Life as a Revolutionary in Cuba*, New York, 1988, p. 88.

③ Philip Bonsal, *Cuba*, *Castro*, *and the United State*, Pittsburgh, 1971, p. 164.

的移居者们低估了革命的韧性，但是有一些人当时还是孩子，没有选择的余地。大约 14 000 名儿童在 1961 年和 1962 年通过一次被称为“彼得·潘行动”（Operation Petro Pan）的计划被单独地空运出去。[1]父母们不顾一切地让他们的孩子从他们所认为的共产主义的灌输中逃脱出来，认为在佛罗里达会更好一些。这种曾被设想为暂时的分离在许多情况下则成为了一生的分别。

最开始的巴蒂斯塔支持者们的离去对革命颇有益处，有效地排除了反革命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使得国内的反对者势力失去了核心和领导。一些历史学者称，革命的政治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潜在的反对势力转移了出去。

对古巴人来说，流亡远不像被卷入其他革命中那样痛苦，因为佛罗里达有自 19 世纪以来就建立起来的繁荣的古巴裔美国人社区，为最初的流亡者们提供了现成的欢迎条件。[2]

导弹危机后，古巴人出走的速率急剧下降，古巴和大陆之间的飞行整整停航了 3 年时间。那些想要离开的人只能依靠船，这是一种危险且没有把握的方式。为了使这种出境更为有序，卡斯特罗在 1965 年 9 月宣布了一项新的政策，大胆地宣布：参与革命，全凭自愿。任何想要离开这座岛，前往“美国佬的天堂”的人，都可以不受约束地去这么做，他在革命委员会成员的重大集会上如是说。人们正在用小船逃走，“许多人被淹死”的事实被美国“作为宣传工具”加以利用。“美国之音”称，古巴就是“一座监狱岛”，它的人民想方设法从此地逃离。[3] 是需要做些什么的时候了。

因为没有直通航线，解决的办法就是提供一个可以合法且有序离开的港口。卡马里奥卡，一个位于瓦拉德罗（Varadero）海滩度假村西边的渔港被选定为这样的地点。卡斯特罗讲，10 月起它将对想要来

① Yvonne Conde, *Operation Pedro Pan*, London, 1999.

② Akistair Hennessy and George Lambie, eds, *The Fractured Blockade: West European – Cuban Relations during the Revolution*, London, 1993, p. 3.

③ Wayne Smith, *The Closet of Enemies*, London, 1987, p. 90.

接走其亲属的古巴流亡者们的船只开放。条件是严苛的：那些离开的人必须将他们的房屋和财产留给政府。这项政策即刻有了反应，数千古巴人从这座岛的各地会集于卡马里奥卡，数百艘小船从佛罗里达过来接他们。

许多人再也没能抵达彼岸。在华盛顿古巴司工作的外交官韦恩·史密斯（Wayne Smith）之后写道，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尽其所能地将这些船只纳入监控之中，但那是一场失败的战斗。“太多完全没有操作船只经验的人坐着体积小、经不住风浪的小船进入了大海。”12 只船沉没了。筋疲力尽的海岸警卫队很快做出了预测，除非终止这种行动，否则会出现“一场大灾难”。①

人道主义问题已经足够严重了，现在媒体又引起了极大的公众关注。在政治上对美国政府造成更大破坏的，是那些计划外的不受管制的避难者们的到来。在它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之前必须采取措施，美国政府现在要求同古巴人对话，这是多年以来的第一次官方接触。卡斯特罗同意从 11 月 15 日起暂时停止从卡马里奥卡的“偷运”，在这一个月的外流时间里，接近 3 000 名古巴人从这片海滩离开了，还有大约2 000人留了下来。

美国人建议，应该开设定期空运，将那些要求离开的古巴人运送到迈阿密去，他们的出境申请由在哈瓦那的瑞士大使馆的美国“联络代表处”代理。让他们大感吃惊的是，卡斯特罗同意了。

约翰逊总统在 10 月 3 日签署了一部新的移民法案——《美国—古巴调节案》，向那些想要流亡的人呼吁“那些想要在美国寻求庇护的人们，你们会如愿的”。他要求美国国会提供 1 200 万美元，为预期到来的大量涌入的人员提供资金。美国人提出，应该给予那些人数在 15 000到 20 000 之间的亲属已经在美国生活的古巴人优先权。他们还宣布，他们愿意接收古巴的政治犯，在美国大略的估计下，人数在 15 000到 30 000 之间。　214

① Smith, *The Closet of Enemies*, p. 91.

约翰逊和卡斯特罗所协商的“自由航班”始于12月，在瓦拉德罗机场，一天两个航班，一周5天通航。那2 000个被留在了卡马里奥卡海滩上的移民最终坐着美国政府所租用的船只去了佛罗里达。航班持续了6年，直到1971年尼克松总统将其叫停。卡斯特罗也愿意看到这个航班的终结，认为它是“不必要的劳动力消耗”。①

美国政府为航班支付费用，并为每个家庭提供了100美元的补助。6年的全部花费是5 000万美元，此间3 000次航班将25万以上的古巴人（260 561）流亡者运到了美国。② 20世纪80年代末，全部古巴移民的数量接近100万，大约是古巴总人口的1/10。③

随着时间的流逝，庞大的移民群体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20世纪60年代初的流亡者主要来自白人中产阶级，受到了美国已准备好的欢迎。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移民主要来自于社会的其他阶层，学历较低，没有什么技术，并且很多是黑人。就像他们来自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的移民同伴们一样，这些人在到达美国后发现他们处在机会阶梯的下层，受困于失业、歧视、缩减的教育资源和社会公益服务。

约翰逊总统的《美国—古巴调节案》授予任何没有书面证明的登上了美国土地的古巴人以自动的定居权。后来克林顿（Clinton）总统在1994年和1995年签署的移民协议规定，所有被海岸警卫队在海上拦截的古巴人都要被遣返古巴。结果在那些年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非法的高速汽艇从古巴接走大量的移民，在躲过了古巴和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后，让他们在佛罗里达海岸登陆，他们在那里立刻获得美国的定居权。

这些年里超过100万古巴人的离去对移民者们是一段悲惨的经历，

---

① Quirk, *Fidel Castro*, p. 683.

② Robert M. Levine, *Secret Missions to Cuba*, New York, 2001, p. 68.

③ 在移民美国的100万古巴人中，超过半数聚集在佛罗里达南部，主要是在戴德郡（Dade County）。大约80 000人定居在新泽西（New Jersey），60 000人在加利福尼亚，20 000人在伊利诺伊（Illinois），15 000人在德克萨斯。Louis Pérez, *Cub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ies of Singular Intimacy*, Athens, Ga., (2nd edition), 1997, p. 253.

同时也是对革命持续不断的伤害。在美国政府的资助和支持下，身处国外的古巴反对派在猪湾露出了它的獠牙，直到这个世纪结束，一直对革命构成严重的威胁。但是这些流亡者们在其本土的颠覆活动大部分都是非法的，只会进一步强化革命的势力。

对古巴政府来说，早期大规模的迁移出境意味着专业和技术人才的严重流失，这不但无损于它的政治，甚至还带来了经济上的优势。英国经济学家杜特利·西尔斯在1962年的学术旅行中发现，这种迁移给政府"提供了大量房屋和汽车补给，因为拥有这些的避难者们不得不放弃了它们。它也减少了生活消费品的需要，同时还改变了需求的结构，因为离开的那些人大部分是奢侈品的消费者。"[①]

215

许多的房屋被政府机构接管，其他的则划归各省的学生、外国顾问和贫民安置计划，黑人家庭高兴地搬进了中产阶级的居住区，以前他们是禁止在那里生活的。40年之后，哈瓦那的市中心和郊区的许多地区仍旧居住着当年非法占有房屋的居民，看起来他们仿佛是不太相信自己的幸运。

哈瓦那的损失无疑是佛罗里达的收获。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里古巴裔的百万富翁迅速增加到了700人。流亡的古巴人在当地的经济中占有将近10亿美元的资产，是数千小企业的自豪的拥有者，包括杂货店、餐馆、药房、珠宝店、家具厂、面包房、制衣厂、私立学校、雪茄工厂、录音棚、出版社和广播站等。数千名古巴医生和数百名律师及银行家以及建筑业的众多企业家们在佛罗里达扎下了根。[②]在最初几个世纪的征服中，佛罗里达和古巴曾经被统一在西班牙的旗帜之下；在20世纪后期，这两个部分的古巴社会无法挽回地分离了，但是永远地被血缘、历史和记忆的纽带结合在一起。

---

① Dudley Seers, *Cuba: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volution*, Chapel Hill, N. C., 1964, p. 32.

② Pérez, *Cub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 255.

输出革命：拉丁美洲（1962—1967）

当那些心怀不满的古巴人驶往迈阿密的时候，一小部分人离开了古巴，去帮助煽动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甚至在古巴革命的最初几个月，古巴领导人们就在讨论推翻加勒比海的独裁者们，将起义军的行动延伸到拉丁美洲大陆。切·格瓦拉在第一个月里勾画了革命胜利可能带来的后果："我们的革命对拉丁美洲的榜样作用，还有它所包含的经验摧毁了所有的咖啡理论。我们已经证明，只要有一小群不屈不挠、受到人民支持、必要时不畏惧死亡的人，就可以对付一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并且能够彻底地打败它。"[①]

格瓦拉并非是唯一这么想的人。革命在大陆发展的可能性是卡斯特罗在 1959 年 1 月，即革命早期一次讲话中的主题："我们大陆上的人民是多么的需要像古巴这样的一场革命!"后来他大胆地谈到安第斯山脉（Andes）将如何成为拉丁美洲革命的马埃斯特腊山。

就像其他革命一样，古巴人梦想着他们自己的经验可以改变世界；他们豪迈的国际主义言辞堪称典范。但是到了 1962 年，他们才做出了清醒的决定，将他们的革命理论付诸实践，在拉丁美洲积极地推动游击战争。在格拉瓦的鼓励下，卡斯特罗制定了加快历史进程的方案。

216

在 1961 年的猪湾入侵引起警醒，导致革命根本转变后，古巴在拉丁美洲这个半球内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除了墨西哥，每个政府都与古巴断绝了外交关系，加入了美国的贸易禁运。古巴设想要用已经被证明对巴蒂斯塔非常成功的游击战战略来推翻这些政府，摆脱这种孤立的状态。

格瓦拉是这一政策最为坦率的拥护者和主要的鼓动者。他早年游历了整个大陆，是古巴唯一的一个对它的地理和当代史有着直接和深

① 1959 年 1 月 29 日在哈瓦那对"我们的时代社团"（Nuestro Tiempo Society）的谈话，见 Ernesto Che Guevara, *Obras, 1959—1967*, Havana, 1970, 21－22 页。

刻认识的革命者。他狂热地相信，少数武装民兵就可以击败正规军，就像他们在古巴所做的那样。他作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论证，尽管他忽略了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的脆弱小国与南美洲强大的经济体及军队之间所存在的鸿沟。前者仅仅能用一些准军事化的警察部队来保卫他们自己，后者则有着数个世纪的镇压本国叛乱的经验。

在拉丁美洲——后来是第三世界——的农村地区组织非正规战争的政治可能性成为了格瓦拉主要关注的事情，他最终离开了古巴，去寻求证实他的理论正确的依据。这些在他的第一本书，即出版于1960年的《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这本书是他对古巴胜利的战争的个人记述。随后他又出版了第二本书《论游击战》，这是一本为游击战士准备的手册，在整个拉丁美洲出版并再版。“至少在拉丁美洲和几乎所有经济欠发达国家目前所处的条件下，”他写道，“农村地区提供了理想的斗争条件。”

这个主题被卡斯特罗在1962年2月的讲话，即第二次哈瓦那宣言所沿用，它因为对革命理论热情洋溢的援引，还有在拉丁美洲不可避免地即将出现政治动乱的观点而为人所知晓：

> 这个召唤清晰地从大陆的一端传到另一端。那些无名的大众——有色的美洲人、忧郁和沉默寡言的美洲人，他们悲伤而怨恨的歌声在整个大陆回响——开始用他们自己的鲜血去书写历史，去历经磨难，去牺牲。他们开始撼动这个世界……去夺回他们被这样或者那样的人剥夺了差不多500年的权利。他们从美洲的田野和群山中，从峰峦间，从平原和森林中，从隔离之地和城市的车流中，从海滩和河畔揭竿而起，出于真正的人性，喊出了“够了”！并终于开始行动。[①]

古巴的游击计划不缺少应征者。在整个拉丁美洲，数千青年被古巴这些蓄胡须的男人们所鼓舞，许多人现在想要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复 217

① 菲德尔·卡斯特罗，第二次哈瓦那宣言，1962年2月4日。

制这场革命。古巴提供少量的经济支援，供应武器、军事训练和建议，甚至在少数情况下会提供少量的古巴战士。

古巴人并非是在政治和历史的真空中行动的。在20世纪的拉丁美洲，武力推翻独裁统治被每个到了具有政治识别年龄的新生代们所讨论。经验丰富的西班牙老军人贝尤将军描述了他早年是如何“同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者们”进行了“数千次”谈话的，他们梦想组织游击战——推翻弗朗哥、苏穆萨（Somoza）、佩雷斯·希门尼斯（Perez Jimenez）、庇隆、卡里亚斯（Carias）、奥德里亚（Odria）、巴蒂斯塔、斯特罗斯纳（Stroessner）、罗哈斯·皮尼利亚（Rojas Pinilla）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人。贝尤冷冰冰地记载道：“这些谈话在说完之后，就像雪茄的烟雾一样消散在空气中”。[1]

在革命最初的几个月，古巴发起过几次小规模的远征——反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特鲁希略；反对尼加拉瓜的苏穆萨；反对巴拿马。这些是加勒比型的海盗式远征，这种海盗行径在数个世纪里不断地发展完善，经常只是针锋相对地相互攻击。它们大多数都是在没有古巴国家政府支持下的独立行动，尽管有时会在死去的游击战士的帆布背包中找到的一封切·格瓦拉所写的鼓励信。特鲁希略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目标——他将流亡的巴蒂斯塔迎进了圣多明各，并援助其他向古巴发起袭击的流亡者们——尽管他最终在中情局的帮助下才被暗杀。

格瓦拉曾经生活并保持着友谊联系的危地马拉同样被列在名单上。同样情况的还有秘鲁，格瓦拉第一任妻子的兄弟里卡多·加德亚（Ricardo Gada）正在那里筹划一场武装起义。[2] 尼加拉瓜在格瓦拉的考虑之列，据说格瓦拉于1961年为卡洛斯·丰塞卡（Carlos Fonseca）和托马斯·博尔赫（Tomas Borge）提供了2万美元，这是两个创立了桑地诺派（Sandinista）运动的革命者。委内瑞拉的左翼也没有被遗忘，他们于1958年为古巴游击队提供过帮助。他们受到了古巴大量的

---

① Alberto Bayo, *Mi aporte a la revolucion cubana*, Havana, 1960.

② Anderson, *Che Guevara*, pp. 534 – 535 and 560.

支持。[1]

在格瓦拉重点考虑的事情中，位居首位的是他的祖国阿根廷。1962 年，他开始计划在阿根廷的北部省份开展游击运动，希望能借此将它扩展到整个大陆。通过与古巴特务机关的合作，3 个阿根廷人被征募来组织这一运动——豪尔赫・马塞蒂、阿尔伯特・格拉纳多（Alberto Granado）和西罗・布斯托斯（Ciro Bustos）。这是古巴主要的行动，哈瓦那警察局长阿韦拉多・科洛梅・伊瓦拉（Abelardo Colome Ibarra）被授予全权，同他一起的还有何塞・马丁涅斯（Jose Martinez），他是古巴和阿根廷作战部队的首席联络官。弗朗切斯科・塞特（Francisco Ciutat）将军是另一名原西班牙共和国的参与者，在莫斯科居住了 25 年。他加入进来，成为了游击队的教官。[2]

218

这个阿根廷人的群体自称为人民游击军，于 1962 年秋天在古巴开始受训。在导弹危机后他们搬到了捷克斯洛伐克，1963 年 1 月则搬到阿尔及利亚（Algeria）。5 月，他们前往拉丁美洲，在越过国界进入阿根廷的萨尔塔省（Salta）之前，在玻利维亚东部的一个农场里集合。豪尔赫・马塞蒂是他们的领导者，被称为副指挥官，因为他正在等待着指挥官格瓦拉的到来。

这并不是发动一场自由战争的最佳时机。这群人抵达阿根廷的时候正值一个在军事统治后被重建的文官政府时期。经过 6 个月的招兵买马和开展斗争，他们被出卖了，敌人包围了他们，粉碎了他们的反抗活动。[3] 格瓦拉本人留在了古巴，第一次开启一场大陆革命的尝试戛然而止，但并非全盘尽失。两年后，以萨尔塔的实践为基础，一场游击运动再次在玻利维亚的东部低地组织了起来，与上次相比，其地理位置相同，参与斗争的人也相同。

古巴人现在将其努力的重心放在了委内瑞拉，当地的共产党已经同意支持武装起义。多名古巴的高级军官参与其中，包括乌利塞斯・

① Richard Gott, *Guerrilla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 London, 1971, pp. 93 – 165.

② Anderson, *Che Guevara*, pp. 537 – 555 and 573 – 579 and 587 – 594.

③ 关于此事的最好记述见 Anderson, *Che Guevara* 一书。

罗萨莱斯·德尔·托罗（Ulises Rosales del Toro）和阿纳尔多·奥乔亚（Arnaldo Ochoa）。1963年到1967年间，他们不时地帮助小分队在拉腊（Lara）和法尔科（Falco）海岸登陆。尽管有少数的古巴战士参与到了委内瑞拉战争中，但是古巴援助计划的重心是在训练和补给上。在这段时间，大约有300名委内瑞拉人通过了古巴训练营的洗礼，20世纪60年代，大约有2 000名拉丁美洲人在古巴学习游击战的基本技术。这个数字当然也是不精确的。[①]

1963年12月的总统选举后，委内瑞拉共产党开始调整方针。在这次大选中，国家压倒多数的选票都投给了保守党的候选人。许多从前的革命者们开始重新检视他们对游击战争的承诺和投入。1965年11月，在经过了大量的内部讨论后，委内瑞拉共产党建议“终止武装行动”。战争以散乱零星的状态持续到了这个10年的结束，并且至少到1967年还在接受古巴的支援，但是它失去了城市里许多的政治支持。

即将于1966年1月在哈瓦那举行“三洲”会议，来庆祝整个第三世界革命游击战争胜利的卡斯特罗被委内瑞拉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的决定激怒了。他在接下来两年的时间里公开谴责他们的懦弱，赞扬那些在委内瑞拉继续奋斗的游击队员们，但这并非他在克里姆林宫的新伙伴们所想要听到的。

古巴的游击战略被一位法国作家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用理论的形式表达了出来，他在和卡斯特罗以及格瓦拉进行讨论后，219 写出了有关这个方面的一系列文章，在拉丁美洲广为传播。他最为突出的贡献，是一篇引起长期争议的论文，名为《革命中的革命》，出版于1967年初。他在其中认为，从古巴经验来看，一个农村游击队这样的小型发动机是可以驱动城市里的革命斗争这样的大火车头的。但是待它发表的时候，这个理论已经失去了吸引力。[②] 到了60年代中

① “对这个数字的评估相差很大，有的时候是草率的”，蒂莫西·维克汉姆·克劳利（Timothy Wickham - Crowley）在他的著作（*Guerrillas and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surgents and Regimes since* 1956, Princeton, 1992, pp. 85 - 90）中写道。

② Regis Debray, *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 London, 1967.

期，反革命势力已经明显占据上风。在秘鲁，依照古巴模式形成的革命团体在1966年已经被摧毁了；在危地马拉的革命运动也遭遇了严重挫折，其中包括1966年共产党领导层被暗杀；在哥伦比亚长期存在的、可上溯到50年代并被古巴革命所激励的起义运动已经被逼退回远离国家城市中心的山区和丛林的要塞中。

古巴对拉丁美洲斗争的实质性的参与始终是小规模的，局限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当南美之梦逐渐消散后，古巴人在其他的大陆开始了新的冒险。在1965年将同格瓦拉去刚果参战的士兵——刚刚超过100人——要比前往拉丁美洲的所有游击队员的总和还要多。

输出革命：古巴黑人重返非洲（1960—1966）

在意识到拉丁美洲的革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候，古巴在1965年作出了一个战略决定，直接加入到被认为正在展开的非洲革命中去。“非洲正在从废墟中崛起，”古巴军事杂志《绿橄榄》（*Verde Olivo*）在1964年如此宣称，“民族解放的火焰正在安哥拉熊熊燃烧；扎伊尔（Zairean）的爱国者们正在将独立的旗帜挂在他们的枪口上；起义者们正在莫桑比克英勇战斗；南罗得西亚（Southern Rhodesia）正在推翻那只会让少数种族歧视者们的统治永远延续下去的虚假的独立。”[①]

仍旧是在国际主义精神的强烈激励下，古巴革命伸出援手的时候到了。首个战场不是《绿橄榄》所提到的任何一个国家，而是地理上位于非洲中心的国家刚果。[②] 受过良好的游击战训练，由切·格瓦拉所指挥的100名古巴黑人组成的分队在1965年被派遣到那里去，加入到了这个国家东部的起义战斗中去。“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多的黑人在一起，”古巴的一个游击队员如是说，“黑人，只有黑人，我们全都是黑人。这让我不解。我

---

① Piero Gleijeses, *Conflicting Mission: Havana, Washington, and Africa, 1959—1976*, Chapel Hill, N. c., 2002, p. 98.

② 前比属刚果（Belgian Congo）在1960年变成了独立的刚果。1971年10月，它更名为扎伊尔（Zaire），1997年5月又改称刚果民主共和国（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本书始终都称其为刚果，同时（为了避免混淆），它的邻国被称为刚果共和国（Republic of Congo）的前法属殖民地被表述为刚果—布拉柴维尔。

自问：‘扯淡！这是怎么回事？’”① 这是一件严重的事情。②

这支分队在经过6个月被撤回来后，古巴又将它的援助集中于几内亚比绍（Guinea – Bissau）的一场起义运动，那是一个在阿米尔卡·卡帕拉尔（Amilcar Cabral）领导下的，为摆脱葡萄牙统治而独立的战斗组织。古巴也派出了一组人前往刚果—布拉柴维尔（Congo – Brazzaville），去训练安格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士兵，即MPLA，领导者是阿戈什蒂诺·内图。穿越大西洋的黑人士兵经常被关注。“我不相信死后还会有来生，”卡帕拉尔1966年8月在布拉柴维尔对古巴士兵们说，“但是如果有的话，我肯定，我们的那些被抓到美洲做奴隶的祖先们的灵魂现在一定会欢欣不已，因为他们看到子孙们重新团聚，并为争取我们的独立和自由而精诚合作。”③

在古巴革命胜利的时候，古巴黑人摆脱奴隶的地位还不到一个世纪。他们的祖先所繁衍生息的非洲大部分仍旧处于欧洲殖民势力的控制之中，只有少数国家是独立的：埃及和埃塞俄比亚（Ethiopia），还有加纳在1957年摆脱英国统治而独立。南非是白人统治的种族隔离制的共和国。

才两三年的时间，这种景象就完全改变了。戴高乐将军在1959年，即古巴革命的几个月前重新掌权，使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所有法国殖民地获得独立。英国和比利时人认为有必要效仿，于是非洲的16个欧洲殖民地在1960年获得了独立。他们中的一些激进的新政府认为，他们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应该被扩展到整个非洲。出于这样的目的，他们为在白人统治下的国家的解放运动提供了积极的支持。对殖民统治的武装抵抗现在在葡萄牙的殖民地开始了——1961年在安哥拉，1963年在几内亚比绍，1964年在莫桑比克。

古巴革命是在这样一个恰当的时刻出现的，因而被许多非洲人视为是影响了非洲和世界大部分地方的解放斗争潮流的一部分。到了

① Rafael Noracen 中尉接受了格里杰斯（Gleijeses）的采访，见 *Conflicting Mission*，89页。

② Gleijeses, *Conflicting Mission*, p. 105.

③ Gleijeses, *Conflicting Mission*, p. 199.

1961 年，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及更为激进的非洲领导人们联合了起来，并承诺为他们的革命目标提供帮助。古巴人是游击战的第一位倡导者和专家，非洲希望得到他们的建议。没有人能在最初的几年预测到这些接触最终能走多远。

格瓦拉是第一个对非洲产生兴趣的古巴领导人，也是第一个访问这个地区的古巴领导人。他于 1959 年 6 月取道开罗，向纳赛尔总统（Nasser）、当时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英雄表示敬意。在古巴革命前，除了在埃及的一个领事馆，古巴同非洲没有外交上的联系。劳尔·卡斯特罗继格瓦拉之后于 7 月去了开罗。在秋天，外交关系建立了起来。古巴同夸梅·恩克鲁瓦的加纳和塞古·杜尔（Sekou Toure）的几内亚也互派了大使。

塞古·杜尔是第一个对哈瓦那进行国事访问的非洲人，他在 1960 年 10 月受到了高喊"非洲！非洲！非洲！"的数千热情的古巴黑人的迎接。他后来同几内亚比绍的解放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1] 他在一年后实现了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革命者的接触，即 1962 年 7 月，当法国最终撤离，阿尔及利亚最后胜利前的几个月。古巴的革命者们早在 1959 年 1 月之前的几年里就曾经对 50 年代中期逐步展开的阿尔及利亚革命斗争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古巴反巴蒂斯塔的激进分子们早已经被《波西米亚》（*Behemia*）周刊上的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定期报道所强烈吸引。阿尔及利亚的经历同他们自己是相似的。[2]

221

1961 年 10 月，古巴派往设于突尼斯的 FLN 总部的首位特使是豪尔赫·马塞蒂。他是一名记者，后来领导了格瓦拉在阿根廷的游击运动。他带着卡斯特罗的礼品来到突尼斯，赠给 FLN 一船美制的武器——这是从 4 月份猪湾行动的那些流亡者手中缴获的。这是一次很好的接触。阿尔及利亚人心怀感激地接受了。这些武器，包括步枪、机关枪和迫击炮于 1962 年 1 月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卸船，随即运到阿尔及利亚边境。在返程中，古巴的这艘船运载了 76 名受伤的阿尔及

---

① Carlos Moore, *Castro, the Black, and Africa*, Berkeley, 1988, p. 95.

② Gleijeses, *Conflicting Mission*, p. 31.

利亚游击队员和20名来自于难民营的孤儿。1963年，多达53人的公共医疗工作者被派往阿尔及利亚。这是古巴革命所做的前所未有的同非洲的人道主义团结计划的开始，在随后的数十年中，这一计划持续进行并不断发展。①

古巴同阿尔及利亚的友谊是建立在卡斯特罗同本·贝拉（Ben Bella）的个人友谊的基础上的，此人在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时担任了总理。卡斯特罗对于外交事务的许多决定——好或者坏——是基于他对所会见的外国领导人的评价所决定的。如果一些有影响力的非洲领袖，如本·贝拉、阿戈什蒂诺·内图、阿米尔卡·卡帕拉尔、埃塞俄比亚的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Mengistu Haile Mariam）迎合了他的喜好，卡斯特罗会最大程度地去支持他们。他同那些拉丁美洲的卓越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智利的阿连德（Allende）、尼加拉瓜的托马斯·博尔赫、格林纳达的莫里斯·毕夏普、秘鲁的胡安·贝拉斯科（Juan Velasco）、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每个人都得到了他个人的、热情洋溢的称许。这种吸引力和投入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卡斯特罗经常不在乎或者不介意他的特殊朋友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地掌控其国家的形势。当他试图去分析一个他对其历史、习惯和文化非常不熟悉的某个特定的国家形势的时候，这种片刻就总结概括一个人能力的做法对他并非总是有好处的。

就在阿尔巴尼亚取得独立的3个月后，本·贝拉于1962年10月16日坐飞机从纽约来到了哈瓦那。他受到了卡斯特罗的迎接，还有那些手捧着鲜花的阿尔及利亚的孤儿们。“世界上最年轻的两场革命运动相会并交换了意见，”本·贝拉后来回忆道。在接下来的3年里，直

---

① 根据美国研究者的记述，到1978年，大约11 000名古巴公民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工作。他们中约8 500人在安哥拉。在90年代初，古巴公民在21个非洲国家从事公共健康、教育和体育训练的工作。他们还提供制糖、渔业、动物遗传学和建筑工业的专业技术。数千非洲青年被送到古巴上学。1992年6月，有来自于101个国家的22 000名外国学生在古巴上学。他们中的3/4——约17000人——来自非洲。Francine Marshall, “Cuba's Relations with Africa: The End of the Era”, in Donna Rich Kaplowitz, ed., *Cuba's Ties to a Changing World*, London, 1993.

到1965年他被推翻前，本·贝拉是古巴在非洲大陆的政治向导，尽管埃及的纳赛尔、坦桑尼亚（Tanzania）的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刚果—布拉柴维尔的阿方斯·马桑巴－代巴（Alphonse Massamba－Debat）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阿尔及利亚为多位非洲自由运动的领导人提供了一个根据地，并且为他们同古巴接触提供便利。本·贝拉也向古巴在拉丁美洲所支持的游击运动提供援助，尤其是在委内瑞拉和阿根廷。

古巴在阿尔及利亚的大使胡尔格·塞盖拉（Jorge Seguera）四处联络，同上述每个人都保持着联系。他曾经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战斗过，是卡斯特罗兄弟和格瓦拉的密友。尽管他积极且知识渊博，但其想法并非总是审慎明智的。古巴研究非洲的历史学者皮耶罗·葛利杰斯（Piero Gleijeses）认为，他的建议促成了“哈瓦那对这一地区的革命潜力的过高估计”。[①] 222

古巴人在非洲还是一个处于学习期的新手，对刚果有着特别的兴趣，关注着它的事态发展——就像当时的其他人一样。当卡斯特罗于1960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他讲到了当天的主题——非洲的独立——并宣布了他对阿尔及利亚人、南非的黑人和刚果的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 Lumumba）的支持。刚果在6个月前已经独立，但是随后成为了联合国干预和分离主义战争的牺牲品。“刚果人民站在坚持保卫他们国家利益的唯一领导人一边，”卡斯特罗说，以便在联合国会议上，在这个有着两派对立意见的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这个领导人就是卢蒙巴。”

刚果占据了世界头条新闻若干年，比利时人撤离后，随着联合国军队的到达，内战从此开始，后来南非和美国的雇佣兵也参与其中，他们之中有些就是古巴的流亡者。卢蒙巴于1961年1月被俘，随后被

---

① Gleijeses, *Conflicting Mission*, p. 51.

杀害。[1] 1964 年 7 月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来自加丹加（Katanga）的保守派领导人莫瓦斯·冲伯（Moises Tshombe）在比利时和美国的支持下夺取了政权后，引发了一场自称为卢蒙巴继承者的新激进团体的起义。他们的起义 11 月被西方的一支干涉力量所击溃。比利时的伞兵部队乘着美国的运输机，从阿森松岛（Ascension Island）上英国的基地出发，摧毁了位于国家北部斯坦利维尔（Stanleyville）的起义军总部。

格瓦拉于 12 月前往纽约，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西方的干涉，并对代表革命的起义者们提供支持。“世界上所有自由人一定都做好了准备，为刚果报仇。”他如是说。卡斯特罗派他前往非洲，去了解能做些什么事情帮助卢蒙巴主义的起义者们，并评估其他解放运动所需。格瓦拉的行程贯穿了 1965 年的前 3 个月，他会见了刚果的卢蒙巴主义者、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2]、几内亚比绍卡帕拉尔的非洲几内亚及佛得角独立党（PAIGC）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limo）。

这是他首次飞往 3 个建立了激进派政权的前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和刚果—布拉柴维尔。在阿尔及利亚，他同本·贝拉做出了计划；在科纳克里（Conakry），塞古·杜尔安排他同卡帕拉尔会面，卡帕拉尔的总部即设在这座城市；在布拉柴维尔，他第一次会见了安哥拉的领导者们。毗邻刚果和安哥拉的飞地卡宾达，刚果—布拉柴维尔有着中非最为激进的政府，自 1963 年 8 月起由阿方斯·马桑巴－代巴领导。此人原是一名教师，曾经在法国学习，接受了许多法国左翼的言辞。他曾经给予刚果的卢蒙巴主义运动和安人运（MPLA）以早期的支持。布拉柴维尔是这两场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他担心，这可能会招致西方对政府的破坏。他请求格瓦拉派古巴军队来加强他

223

① 在 1961 年 2 月的一次采访中，卡斯特罗说，“恶劣到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对无畏的卢蒙巴的暗杀”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野蛮凶残混合的结果，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和傀儡金融垄断公司去搞的，他们企图将世界人民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它是一次野蛮行径。它将会在整个非洲引发起义。”Prensa Latina 引用了发表在 *Combate*（14 February 1961）上的 Castro 谈话。

② 简称安人运，英文全称为 Movimento Popular de Libertacao de Angola，自安哥拉独立后一直为执政党。见 http://www.iciba.com/MPLA（2010 年 9 月 24 日）。——译者注

的总统卫队，格瓦拉将这个请求转达到了哈瓦那。

马桑巴 - 代巴将格瓦拉介绍给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最重要的3名高级领导人——阿戈什蒂诺·内图、路易·德·阿泽维多（Luis de Azevedo）和卢西奥·拉拉（Lucio Lara），他们正在安哥拉组织一场反对葡萄牙的游击战争。目前安哥拉人只希望得到古巴人的指导，而不是武器或者军队。“这场战争日益困难，我们缺乏经验。”拉拉后来回忆说，“我们期盼古巴的指导员，这是因为古巴革命的威望，也是因为他们的游击战理论与我们自己的非常接近。”[①] 格瓦拉说明，古巴计划派出指导员去支援卢蒙巴拥护者的运动，同意将一些人派往布拉柴维尔，以帮助安哥拉人民。豪尔赫·里斯科特（Jorge Risquet）率领的一组人在下半年抵达了这里。

格瓦拉在途经北京短暂停留后，于2月继续前往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与卢蒙巴的拥护者们以及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进行了接触。他主要接触的卢蒙巴主义者是伽斯东·桑马利奥（Gaston Soumaliot）和洛朗·卡比拉（Laurent Kabila），后者控制着刚果东部的起义军。切·格瓦拉承诺要为他们提供30名指导员，“还有我们剩下的所有武器”。卡比拉“欣喜地”接受了，而桑马利奥要求这些指导员应该是黑人。

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爱德华多·蒙德拉纳（Eduardo Mondlane）和马尔塞林诺·多斯·桑托斯（Marcelino dos Santos）的会谈则要困难得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最近开始了它的解放战争，格瓦拉清楚地知道，宣称战争必然胜利是言过其实的。可以理解，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们并不羡慕格瓦拉给予刚果战争的优惠，也不想像格瓦拉主张的那样，让他的游击队员在那里受训。他们在思想上没有达成共识。古巴人从未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建立起如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那样的亲密关系。格瓦拉最后做出了让步，同意将大批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战士送到古巴受训，同时还将提供武器援助。

① Gleijeses, *Conflicting Mission*, p. 83.

格瓦拉同一群来自于其他解放运动的人开了一次会，争论很激烈。他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刚果的战争最为重要——“那里的胜利能够在整个大陆产生影响”。他还重申了自己倾向于为非洲的自由战士们在刚果建立一个由古巴人负责管理的训练中心。接受过训练的战士们在返回他们自己的国家从事斗争之前，将先支援刚果的解放。格瓦拉对非洲人那口头上的，要建立泛非洲统一的热情信以为真，以为非洲人对大陆统一的抱负是同拉丁美洲的那些人一样的。事实并非如此。多数非洲人并不具有格瓦拉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们只为他们自己国家的解放做好了战斗的准备，而不是为这片大陆。

224

非洲对格瓦拉的乌托邦方案是完全否定的。按照格瓦拉自己的记述，与会的非洲人激烈地争执着，他们的人民“受到帝国主义的凌辱和歧视”，不会接受为“一场解放其他国家的战争”而伤亡的结果。格瓦拉的眼光则更加远大。“我试图使他们明白，我们正在谈的并不是一场有着固定边界的斗争，而是一场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在莫桑比克的敌人同在马拉维（Malawi）、罗得西亚或者南非、刚果或者安哥拉的敌人都是一样的，但没有人这样看。”[①]

这是关键性的差异。古巴人带着他们自己的经验，以及截然不同的应该如何去做的观点来到了非洲。非洲人则更加接近于他们自己的现状，也有着另外一种看法。格瓦拉掩饰了这种差异，坐飞机返回了哈瓦那，给了卡斯特罗一个乐观的报告。一支黑人组成的军队已经在训练之中，整装待发。格瓦拉于4月份返回了达累斯萨拉姆，率领着第一批14名古巴黑人游击队员，穿越坦噶尼喀湖（Lake Tanganyika）进入了刚果东部。

古巴人低估了分歧和困难。这一计划从开始就有了麻烦。没有高级别的刚果革命领导人来到达累斯萨拉姆商讨未来的计划。卡比拉和桑马利奥还远在开罗，在商谈解决刚果革命内部的政治分歧——这是

① Che Guevara, *The African Dream: The Diaries of the Revolutionary War in the Congo*, London, 2000, p. 7.

一个对即将发生的事件令人沮丧的征兆。

非洲人也有着他们自己的理由；他们并没有被告知古巴战士将要由格瓦拉领导。他们得知的是，要来的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他们并不知道，它要被一位世界著名的游击战领导人率领。但是很清楚的是，他们和古巴人的观点并不一致。当地的政治家们，虽然身处困境，但是很少有人喜欢外人过来告诉他们该如何组织自己的解放运动。古巴人是最为纯粹的国际主义者：他们前往任何存在美帝国主义的地方，同它战斗，并为世界的革命而奋斗。刚果人并没有这样的抱负，被自己那狭隘的民族主义、内斗和对整个世界政治了解的匮乏所限制。作为一场革命运动，他们并不算认真彻底。

古巴人在刚果停留了 7 个月，每个月都会有其他的小组前来支援，最后人数超过了 100 人。他们语言不通，对当地的地形、地势并不熟悉。他们在军事和政治上都遭到了失败，于 1965 年 11 月撤走。他们被南非的一支雇佣军赶走，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的一项撤回对卢蒙巴主义者的支持的决议也削弱了他们的实力。随着本·贝拉这位古巴主要的非洲盟友于 6 月份被推翻，来自于激进非洲国家的对刚果人的军事行动所提供的国际支持开始瓦解。

225

格瓦拉在 11 月 20 日做出了最后撤退的命令，组织他的人渡过坦噶尼喀湖，返回坦桑尼亚。“所有刚果的领导人都撤走了，农民们变得日益不友善。但是最后放弃这个地区；用我们来的方式走掉；将农民置于没有保护的境地之下……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非常的难过。”①

在世界的另一边，卡斯特罗则没有感到失落。“最后，”卡斯特罗后来说明，“是刚果的革命领导人做出了停止战斗的决定，然后这些人被撤走了。实际上，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我们已经核实了，在那个特定的时期，斗争深入发展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

在达累斯萨拉姆休整几天后，古巴派遣人员大部分都回国了，但是格瓦拉留在了古巴大使馆里写一部痛苦的回忆录：“胜利会带来大

① Che Guevara, *The African Dream*, p. 216.

量的有益经验，”他写道，“但失败也会带来这样的经验，甚至要更多。在我看来，当参与者和观察者都是外国人，他们在一个仅由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联系起来的、语言不通的陌生国家出生入死，并以这种方式在现代的解放战争史上开创出独一无二的新篇章的时候，尤其如此。”

这一经历确实是独一无二的，而且看起来是不可重复的，至少对古巴人来说是这样。格瓦拉下次的革命经历发生在玻利维亚，那是一个更加熟悉的国家，古巴人能够听懂它的语言。卡斯特罗对格瓦拉在非洲失败的记述并非完全信服。10 年后，在 1975 年的安哥拉，他对非洲进行了一场更富戏剧化的干预。但是首先，他将对更靠近其家乡的其他黑人运动产生兴趣。领导这些运动的人就像古巴的黑人一样，祖先来自非洲，曾经是奴隶。

输出革命：动员美国黑人

1960 年 9 月，在哈莱姆的特里莎酒店的时候，卡斯特罗开始公开表示对美国的黑人有兴趣。他曾经会见了黑人记者，还同黑人穆斯林教士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① 进行了交谈。他表示，他是与美国的黑人运动站在一起的。他早期关于种族问题的演说颇有煽动性，使得他在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同时，也高调地批判了美国的社会模式。

“黑人又怎么样呢?”他在 1962 年 2 月发表的，后被称为第二次哈瓦那宣言的讲话中发问。他所指的是“进步联盟”（Alliance for Progress），即美国为拉丁美洲发展所提出的一项计划。卡斯特罗表达了他的怀疑，即远比穷人和印第安人数量要多的拉美黑人是否会被这项计划所强烈吸引。“他进入什么样的‘联盟’才能被美国的私刑和残酷的歧视制度所赦免呢？拉丁美洲 1 500 万黑人和 1 400 万黑白混血儿知

226

① 马尔科姆·艾克斯（1925—1965）是美国民权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其父是一位黑人牧师，被 3K 党谋杀，后成为主张黑人与白人隔离的“黑人穆斯林运动”的重要成员和其教义的宣传者。他的名字中的 X 是数学符号中的未知数，是要表明他自认为非洲黑人后裔，在找到自己祖先的族姓之前不采用其他的姓氏。——译者注

道其北方兄弟们的憎恶和愤怒。他们不能跟白人同胞同坐一辆公共汽车，也不能上同样的学校，甚至不能死在同一家医院里。”

但是除了颇具煽动力的演说，古巴人从来没有真正地做过任何更具实质性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古巴同美国黑人革命者的关系变得愈发成问题。卡斯特罗受到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发生在其政府内部的、被同莫斯科方面日趋密切的关系所推波助澜的、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的争论影响；另一方面，他也需要保持同美国的关系。

当60年代早期，暴动席卷了美国城市，多个黑人集中居住区在这个过程中被他们自己亲手摧毁的时候，古巴人袖手旁观。1965年8月洛杉矶发生的34人被杀的华特暴动（Watts Rebellion）受到了古巴新闻舆论的密切关注。卡斯特罗也邀请受迫害的美国黑人来古巴寻求政治避难，但是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

前后历届的美国政府都作了努力去消除那些最令人厌恶的种族歧视因素，约翰逊总统在1965年3月华特暴动前甚至——相当草率地——赞扬黑人们的抗议。“这场斗争中的真正英雄是美国黑人。”约翰逊在纪念著名的从塞尔玛（Selma）到亚拉巴马（Alabama）的民权大进军时这样讲道：“他的行动和他的抗议——他冒着不安全甚至是生命危险的勇气——唤醒了这个国家的良知。他的游行示威是要引起对不公正的关注，是在推动改变和激发改革。他是在叫我们去实现美国的承诺。”这场进军是由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发起的，旨在检验新的民权法案的实际效力。约翰逊的演说和新的法案不管在提交国会通过的时候经过了怎样的删减，都对减少大众中激进分子的数量大有裨益。

除了格瓦拉在安哥拉的征程，以及后来对玻利维亚的远征，古巴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活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的主动性。古巴会给予金钱和军事训练上的帮助，但只有当地人在准备策划、组织和战斗时才这么做。许多美国黑人有相应的热情，但是古巴人对待这种特殊的文化却没有经验或者说缺乏经验。那些访问古巴或在那里生活的人也没有什么作为，因为他们明显不团结，也没有可以坚持很长时

间的、坚定的意识形态上的信仰。中情局1967年7月的一份调查这样记述，古巴人给予“那些激进的非洲裔美国人以精神上的支持”，但是很小心地“不供给他们任何物质上的支援，当然也不会有军事训练”。[1]

227 古巴人在帮助美国黑人方面还有其他的困难。许多黑人团体都拥护接近分离主义的黑人民族主义。这是旧的古巴共产党和始于这个世纪初的古巴白人的共和思潮所深恶痛绝的东西。古巴领导层想要表现出它对美国黑人的支持，但是它当然不希望他们改变古巴的政治信仰，也不会允许他们的观念渗透到古巴广大的黑人群体中去。

结果就是对于美国黑人斗争表示支持的口头上的宣传，特别是1968年之前的这个时期，对黑人革命领袖们，特别是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和艾尔德里奇·克里弗（Eldridge Cleaver）的积极劝阻。他们到古巴去表达了自己的革命热情，然后迅速地（威廉斯是个例外）被送往了其他目的地，通常都是非洲。

1960年卡斯特罗在哈莱姆逗留期间就已经与威廉姆斯这位来自于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的黑人民族主义者见过面了。威廉姆斯是在古巴公平竞争委员会所组织的旅行中访问古巴的，按照他自己的记述，受到了卡斯特罗的鼓励。他于1961年从中情局的监视中逃离出来，返回了这座岛屿，在哈瓦那长期居住，是许多即将这么做的美国黑人革命者中的第一人。[2] 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困难的一个——并不是说他令人生厌——古巴不得不与其打交道的美国黑人民族主义者。他在哈瓦那居住了5年，直到1966年离开。

威廉姆斯是50年代在“美国有色人种协会”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但是他不满于这个协会的和平主义姿态，组织了武装自卫小队，

---

① Gleijeses, *Conflicting Mission*, p. 98.

② Robert Carl Cohen, *Black Crusader: A Biography of Robert Franklin Williams*, Seacaucus, N. J., 1972. 威廉姆斯称，格瓦拉同情他的黑人民族主义立场，但是一直没有任何其他的证据可以证明。更为可能的是，格瓦拉对他有些不太了解的一个主题有着敏锐的感觉。

保卫他所在的当地社区免受三 K 党的侵袭。作为一名美国老兵，他是第一批号召组织黑人解放阵线，设想在美国开展城市游击战的美国黑人中的一员。

威廉姆斯在哈瓦那成为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会见了少数从事革命活动的黑人要员，还有切·格瓦拉和古巴负责国际行动的安全局长曼努埃尔·皮涅罗（Manuel Piñeiro）。皮涅罗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曾经在美国学习和生活，还娶了一名德克萨斯州的女子为妻。在思想观点上，威廉姆斯同 60 年代初许多大都市的拉丁美洲左翼分子是相近的，是格瓦拉"游击中心"理论的早期信仰者，并且论述了如何才能让它适合美国。尽管他是美国的一个叫作"革命武装运动"（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的组织名义上的流亡在外的主席，但他并没有多少追随者。[①] 皮涅罗向他表明，相比于他所拥护的分离主义的黑人民族主义，古巴更喜欢马丁·路德·金那种取消种族隔离的方式。[②]

由于他的左翼路线，威廉姆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这个时期的意识形态的内斗中。就在古巴人坚定地支持苏联的时候，他在中苏论战中站在了中国一边。他在古巴居住了 5 年之后，于 1966 年 7 月离开前往中国。中国乐于出版他对古巴"种族主义"的攻击，因为他感到自己受到了种族主义的伤害。古巴人做出了反应，编造了威廉姆斯风格的新闻［据说是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Osmany Cienfuegos）主使的］，指责毛泽东和那些"傲慢自大、疯狂崇拜权力的下属"已经"背叛了古巴革命"，并指责他们在中国怂恿"狂热的种族中心主义"和"对非洲人的歧视"。[③]

228

与威廉姆斯的团体不同，更少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新一代黑人激

---

① 随后在 1968 年，威廉姆斯成为了新非洲共和国的第一任领袖（State of the Republic of New Africa）。这是一个支持创造一个由美国南部的 5 个州组成的黑人国家的分离组织。Ruth Reita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n Alliance: Cuba and African－American Leaders in the 1960s*, *East Lansing*, Mich., 1999, p. 53.

② Reita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n Alliance*, p. 40.

③ 其用语足够令人信服的，从而让许多人相信这些指控是真的。威廉姆斯在北京要证明它们是伪造的有困难。Moore, *Castro, the Blacks, and Africa*, p. 266.

进分子于60年代中期在美国涌现了出来。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摒弃传统的黑人组织的和平主义和非暴力的意愿。他们称自己为“黑人权力”（Black Power）运动。这个新团体最初的支持者之一、后成为其中最具魅力的代言人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访问了古巴。他出生于西印度群岛，是一位曾经担任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主席的激进主义者，于1967年8月受邀前往古巴，并在拉丁美洲团结组织（OLAS）会议上发言。“卡斯特罗是我所知的肤色最黑的人了。”他对《时代》杂志如是说。[①]

当美国的许多城市，尤其是底特律的黑人聚居区在炎热的夏季发起战斗的时候，卡迈克尔号召黑人继续暴乱，目标是“在美国创造50个越南”——回应了格瓦拉所树立的著名形象。他向古巴人保证，美国黑人做好了准备“从内部摧毁美帝国主义，正如你们准备从外部所做的那样。我们不能坐等他们屠杀我们，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先下手为强”。

卡斯特罗给予卡迈克尔热烈的欢迎并告诉与会的听众们，帝国主义者的愤怒是“因为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同美国内部的革命运动之间友好关系的建立”。然后，在一声叹息后，卡斯特罗补充说，“如果他能选择生活在这里的话，我们将倍感光荣，但是他并不想待在古巴，因为他认为家乡的斗争是他的根本责任”。[②]

卡迈克尔询问古巴人，如果愿意帮助他，可前往科纳克里，在那里有阿米尔卡·卡帕拉尔的总部。许多像卡迈克尔这样的黑人领袖都在其个人的心灵旅途上前行，从黑人民族主义者走向泛非主义者，这是美国黑人运动早期关注点的复兴。古巴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中间站，但是许多人相对于古巴的混血人种社会，更喜欢非洲纯种黑人的环境。卡迈克尔希望非洲裔美国人能够被允许与几内亚比绍的游击队员们共

① 1967年5月12日《时代》杂志。其他卡迈克尔的引语来自 Maurice Halperin, *The Taming of Fidel Castro*, Berkeley, 1981, p. 259。See also Stokely Carmichäel and Ekweme Michael Thelwell, *Ready for Revoluti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Stokely Carmichael*, New York, 2003.

② Moore, *Castro, the Black, and Africa*, p. 260.

同作战，为他们参加越战而赎罪。

古巴人在9月将他送往了几内亚，卡迈克尔同非洲几内亚及佛得角独立党讨论他的建议。卡帕拉尔充其量算是反应冷淡，但是他同意接受大约20或30名非洲裔美国人来参战，条件是他们要在其他地方进行训练。卡迈克尔和他的古巴随从接下来去了达累斯萨拉姆，寻求朱利叶斯·尼雷尔的支持。这位坦桑尼亚总统也相当令人意外地同意了，但是当卡迈克尔返回科纳克里后，遇到了南非歌手米瑞安·马克贝（Miriam Makeba）。[①] 爱情战胜了革命，他最终娶了马克贝，在科纳克里过着幸福的生活。在1968年的一次讲话中，他认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从意识形态上并不适合"黑人，实际上是用这种方式同古巴说了再见。"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对阶级斗争而言的，但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被剥削。我们面对着更为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②] 接着，可能是在马克贝的影响下，他收回了先前对古巴所做的不友善的评论，并成为了远在他乡的、坚定的古巴的支持者。马克贝1972年前往古巴，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并被授予了古巴荣誉公民的称号。

229

卡斯特罗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美国舆论的变化。紧随着1967年4月美国发生第一次反战抗议"结束越战行动委员会"（Mobilisation to End the War in Vietnam）之后，他就在庆祝猪湾胜利6周年的讲话中提到了这一事件：

> 看到数十万的美国市民在纽约游行，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他们中的一些人手持胡志明（Ho Chi Minh）的照片……并且……除了胡志明的照片外，还有那些民权事业烈士的照片。一些新闻报道说，其中还有切·格瓦拉的照片。[③]

① Gleijeses, *Conflicting Mission*, pp. 193 - 194.

② Moore, *Castro, the Black, and Africa*, p. 261.

③ Martin Kenner and James Petras, eds, *Fidel Castro Speaks*, London, 1969, p. 213.

同年，来自于激进的美国学生运动——促进民主社会学生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的（白人）外交特使带着一场新的比“黑人权力运动”更加激进的黑人运动即将发生的消息来到了哈瓦那。他们带来了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 for Self Defense）的宣传册，还有一本名为《冰上灵魂》的新书，作者是该党的宣传部长艾尔德里奇·克里弗。[①]

克利佛事实上是在1968年12月来到哈瓦那的，但是就像卡迈克尔一样，古巴发现他也是一个难以相处和好斗的同志。5个月后，他从这座岛屿离开，前往阿尔及尔（Algiers）。他被允许在那里设置一个黑豹党的国际办事处。[②] 黑豹党的创始人休伊·牛顿（Huey Newton）之后在1973年前往古巴，但是他就像此后到来的其他人一样，刻意保持着低调。

美国的激进黑人运动在70年代衰落下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警察的严酷行动，同时也是因为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和不稳定。随后，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古巴同美国黑人运动中的各个党派建立起了更加友好稳定的关系。最合适的中间人是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她是一个富有魅力和才智的美国黑人共产主义者。当她于1972年10月到达古巴的时候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戴维斯先后在布兰德斯大学和法兰克福（Frankfurt）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是美国共产党切-卢蒙巴俱乐部的成员，对黑豹党人的暴动策略不满。在一场群众集会中，古巴黑人对她的欢迎是如此的热情以至于她几乎不能讲话。卡洛斯·摩尔（Carlos Moore）描述了因为她这个古巴黑人榜样的出现而非她的演说本身造成的超乎寻常的影响：

230

> 10年来一直渴望着其认同的积极偶像出现的古巴黑人对安吉拉·戴维斯的美丽、卷曲的“非洲式”发型做出的反应是如此的热烈。这

① Reita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n Alliance*, p. 65.

② Moore, *Castro, the Black, and Africa*, pp. 161 – 162.

个形象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并认可的，他们不怕被贴上“反革命”或者“黑人激进分子”的标签。安吉拉·戴维斯是古巴人所认可的一名共产主义者、一位女英雄、一个“不受摆布”的女黑人。她身着一件漂亮的颜色“过分艳丽的”的紧身连衣裙，没有束发。她是黑人；她不屈服；她是革命者。按照非洲裔古巴人的黑人密码的理解，她是美丽的。[①]

如果戴维斯的访问是白人的古巴通过长期斗争同岛上的黑人达成妥协的里程碑的话，那么它也标志着美国黑人对古巴革命更加宽容的态度的开始。古巴是非洲国家领袖们的麦加圣地的事实不可避免地唤起了美国黑人的兴趣。整个70年代，非洲裔美国人中杰出的文化人士连续不断访问这座岛屿，其中包括西德尼·波蒂埃（Sidney Poiter）和哈里·贝拉方特（Harry Belafonte）。

但是旧的习惯需要时间去改变，古巴黑人需要时间去适应北美黑人的纲领。1977年来到哈瓦那的小说家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难过地发现，古巴的年轻人对身为黑人并没有感到特别的自豪。“我们越强调自己是美国黑人，”她写道，“他们就变得越疏远，越困惑。”她有这样的印象——休伊·牛顿是哈瓦那唯一的非洲式黑人。[②]

尽管古巴革命对美国黑人有兴趣，但是它在迅速推动加勒比地区的黑人权力运动方面所做甚少。多位加勒比知识分子在60年代后期访问了古巴，将他们的经历写了出来，但是没有人将古巴的革命进程同当时加勒比海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做过联系。1968年在牙买加爆发了暴动，当时圭亚那（Guyanese）出生的历史学家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被驱逐，暴乱蔓延到了城市贫民窟里。但是古巴

① Moore, *Castro, the Black, and Africa*, p. 302. 卡洛斯·摩尔本人应被看成是解读古巴黑人，批评革命对黑人态度的一个小小的注脚。他1942年生于古巴，父母是来自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的移民。他于1963年离开了这座岛屿，随后，在定居法属西印度群岛之前，他曾在法国和非洲的埃及、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学习和工作。

② Alice Walker, “Secrets of the New Cuba”, MS magazine, September 1977. 转引自Quirk, *Fidel Castro*, 774页。

人对加勒比海岛屿上的黑人权力问题，以及它所引发的两败俱伤的内斗并不关心。直到数年后，1979年3月格林纳达爆发革命后，这种情况才得到改变。当时，卡斯特罗对它的注定要失败的领导人莫里斯·毕晓普产生了个人兴趣。

231

输出革命：切·格瓦拉对玻利维亚的远征（1966—1967）

1966年1月在哈瓦那举行的三洲会议标志着古巴对游击战争和革命输出观念的鼓吹达到了顶峰。一系列重要的代表团从世界各地来到了这里，卡斯特罗一贯强调革命团结的必要性，甚至邀请了被毛泽东思想的诱人号召所吸引的那些团体，尽管他特别批评了中国对古巴的敌视态度。

在会议期间，一位看不见其身影的出席者是切·格瓦拉这位公认的革命先驱，尽管他当时并不在哈瓦那。他此时还在达累斯萨拉姆，才从刚果的灾难性冒险中复原，正在撰写这次经历的回忆录，尽管刚刚开始。古巴革命仍旧需要他，一颗看不到的钉子已经被扎在了拉丁美洲的地图上——就在它的中心，被陆地包围的玻利维亚共和国——这个地方被认为是一场潜在的、新的革命浪潮的中心。

玻利维亚在1963年就引起了古巴的注意，当时马塞蒂集团正在阿根廷东南角的一座农场中开始他们在阿根廷的冒险。它曾经为一个古巴所支持的艾克特·贝哈（Hector Bejar）领导的游击组织提供过起步的平台，这支队伍同年去了秘鲁。现在玻利维亚又成为了古巴大陆革命希望的中心。玻利维亚共产党的几位年轻成员于1965年底，来到古巴参加军事训练。古巴的一个间谍"塔尼娅"（Tania）在前一年就被派驻拉巴斯（La Paz）。

格瓦拉于1966年7月秘密返回了哈瓦那，为他的新任务挑选了一支小型古巴军队。其中一些人早在古巴游击战争时期他就熟悉，其他的则曾经在刚果同他并肩战斗。其中一些人是马塞蒂溃败后的幸存者，尤其是马丁涅斯·塔马约（Martinez Tamayo）。这次计划意欲支持罗伯特·"可可"·佩雷多（Roberto "Coco" Peredo）所领导的玻利维亚共产党和一个青年运动团体，并在玻利维亚东部尼亚卡瓦苏

（Nancahuazu）河崎岖不平的河岸旁购买一处农场作为基地。格瓦拉于11月到了那里。[①]

这个处于萌芽状态的“游击中心”在未被察觉的情况下，在安第斯山脉的丘陵地带坚持了几个月，但是它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严重的政治问题。卡斯特罗同古巴原来的共产主义者们以及莫斯科苏共领导层的持续激烈争吵现在已经严重影响了古巴在玻利维亚的这次远征。玻利维亚共产党的领导人马里奥·莫尼（Mario Monje）最初同意了古巴的计划，部分是因为他认为这一计划的主旨是指导一场像早年在阿根廷和秘鲁那样有希望的游击运动。他为自己的国家选择的是和平道路。当年玻利维亚举行了选举，尽管是为了将1964年的一场军事政变合法化，但是共产党获准参加选举，并且获得了一个尽管微不足道，但是值得称颂的表决权。莫尼于12月探访游击队营地的时候告诉格瓦拉，如果现在玻利维亚发生一场游击战争，他自己肯定要成为指挥官。这个想法是荒谬的，莫尼知道他会被拒绝。在刚果的经历之后，格瓦拉不再容忍在控制权上的任何争论。莫尼从营地撤了出来，他的党派不再对游击队提供任何援助。只有少数已经向格瓦拉表示效忠的年轻的玻利维亚共产党员留在了他身边。

232

格瓦拉现在被困于玻利维亚的丛林中。除了16个古巴人、3个秘鲁人和29个玻利维亚人之外，没有任何看得见的支持。在他第一次带着格拉玛号登陆的幸存者们撤入马埃斯特腊山的时候，卡斯特罗也面临过相似的人数过少的困境，但是在古巴的城镇里他还有一个初期的抵抗运动。格瓦拉一无所有，甚至同哈瓦那联系的通信设备也只能依赖于不成熟的无线电技术，效率低下，笨重而难于搬动。

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期间，古巴的形势正在发生变化。自1965年离开古巴后，他就不再是革命委员会中的核心成员了。尽管他提倡在拉丁美洲进行游击战争，并亲自参与了古巴在玻利维亚的战争，因此获得了在哈瓦那的最高革命指挥部的坚定支持，还是没能摆脱他的那些

① 对切·格瓦拉的一生和死亡最好的记述是安德森的《切·格瓦拉》。

批评者。苏联以及它在原来古巴共产党员中的支持者对他尤其不满。卡斯特罗在一些年里同时驾驭着两匹马，一方面积极支持格瓦拉的游击计划，同时也向苏联伸出了手。在这两匹马向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奔驰的时候，杂技表演是不可能无限期地坚持下去。

一份苏联的警告于1967年中期被递交给了哈瓦那，当时正值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Aleksei Kosygin）突然来访。这个阴郁的、缺乏魅力的苏联人于6月抵达古巴，古巴人当时正在准备拉丁美洲团结组织的第一次会议，这是受到古巴武装斗争策略支持的那些组织的一次集会。格瓦拉身在玻利维亚，在当时已是不公开的秘密，他的最后一篇论著《创造两个、三个、许多个越南》刚刚出版。他在其中表述了他的预期："在我们的美洲"，这场斗争不久就将完成"大陆的部分"。在一番精彩的长篇论述后，他写下了自己的挽歌：

> 我们每个行动都是一声对帝国主义战斗的呐喊，都是一首为人民团结、反对人类最大的敌人——美洲的美国而战斗的颂歌。无论在哪里，死亡与我们不期而遇，我们都会欣然接受它。只要我们战斗的呐喊能够传到同志们的耳中，另一双手能够拾起我们的武器，其他一些人则能在断断续续的机关枪的轰鸣中、新的战斗和胜利的呐喊声中，低声吟诵葬礼的挽歌。①

233

格瓦拉的赞美诗使得拉丁美洲的左翼支持者们激动不已，陶醉其中，在苏联总理的耳中则是一首尖锐刺耳的音乐。他刚刚拜访了美国总统约翰逊。在那里，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合唱了和平共存的颂歌。在苏联人的眼里，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太过危险，它是经不起反复无常的、倡导革命的幻想家们的骚动的。柯西金前往哈瓦那，去向它的桀骜不驯的加勒比盟友晃起强大苏联的手指，做出了适时的警告。如果

---

① John Gerassi, ed., *Venceremos: The 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Che Guevara*, New York, 1968, pp. 413-424.

古巴继续对拉丁美洲输出革命的话，苏联可能会停止经济支援，尤其是切断石油生命线。卡斯特罗得到了这个信息，心领神会，但他不能立刻采取行动。他正在等玻利维亚的消息。

当拉丁美洲团结组织的会议在7月召开时，是在“每个革命者的责任就是创造革命”这一煽动性的口号下进行的。卡斯特罗重申了他熟悉的主题，引起了欢呼喝彩。他重述了几个月前说过的一段话，当时古巴的一支游击分队在委内瑞拉海滩被俘：“我们正在对世界上任何角落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提供支援，并且我们将在每次接到请求的时候，继续这样去做。”

但是柯西金的访问给这种行为泼了冷水。如果华盛顿方面和苏联联合起来，如果两个超级大国共同行动的话，像古巴这样的小国又有什么机会能自行其是呢？

从历史的角度看，1967年古巴在玻利维亚的游击战就是一场被预言了的悲剧。格瓦拉的游击队于3月被军队发现，在4月就被分割成了两支部队，游击队员们漫无目标地在玻利维亚东部洪水泛滥的地区徘徊，两支队伍都在来回穿越格兰德河（Rio Grande），做着重新集结的徒劳努力。一组人于8月在试图过河的时候被出卖，然后被消灭了，而格瓦拉的一队人在10月被玻利维亚军队包围。格瓦拉本人受伤被俘，第二天被处死刑。少数古巴战斗人员幸存下来穿过这个国家，在第二年初到达了邻国智利的安全地带。

玻利维亚远征的溃败导致了古巴政策的改变。卡斯特罗现在感到必须要遵循柯西金的要求，放弃武装斗争的战略。复兴西蒙·玻利瓦尔的抱负，点燃大陆革命的梦想终于渐近尾声。这个战略早在1967年10月之前很久就已经被看出破绽了。古巴在阿根廷、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和秘鲁所支持的运动大部分都是在没有当地共产党的支持下进行的，没有一个显出了胜利的迹象，一些已经被摧毁了。只有格瓦拉的个人魅力以及对这位伟大的游击战理论家和战士能够在其他人失败了的地方获得胜利的希望，才使得人们相信，玻利维亚的斗争有可能出现一个好的结果。现在他已经死了。

234

随着他的死亡，哈瓦那出现了新的现实主义。那些在古巴接受训练的拉丁美洲游击队员们发现自己被莫名其妙地搁置了起来。他们不知道，卡斯特罗在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正试图找个机会抛弃他们。拉丁美洲的游击斗争，已经不在古巴的菜单上了。[①]

格瓦拉在 1965 年 3 月动身前往刚果之前给他父母的一封告别信中写下了自己的墓志铭："我再次感觉到了我脚下触及的、驽骍难得（Rocinante）的肋骨。我要将盾牌带到手臂上，重返那条小径。"

驽骍难得是堂吉诃德的马的名字，格瓦拉将自己比喻为一个 20 世纪的堂吉诃德。"许多人愿意称我为冒险家"，他写道，"我确实是"，但是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冒险家，应该被归入那些"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证明真理"的人之中。这就是他持之以恒，不懈追求的。他参加了一场胜利的革命，然后就将它完全抛诸脑后，再次从头开始。格瓦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① 政策改变的第一个受害者就是弗朗切斯科·卡玛尼奥（Francisco Caamano），他是 1965 年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次起义的领导人，带着想要在自己的国家发动一次游击战争的目的于 1967 年 11 月来到古巴。古巴严格约束了他若干年，但最后还是被迫让他走了。他带着一支不大的队伍，于 1973 年 2 月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登陆，几乎立刻就被俘虏和杀害。Gleijeses, *Conflicting Mission*, p. 221.

第七章　在苏联阵营内（1968—1985）

235

“布拉格之春”[1] ——向苏联阵营的决定性转变（1968）

1967 年古巴远征玻利维亚的失败以及格瓦拉之死标志着古巴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接下来 20 年的历史中，古巴将结束其与苏联在外交事务、经济政策、文化以及政府结构等方面的密切合作。古巴将重塑自身在苏联阵营中的形象。

第二年，即 1968 年 8 月，当苏联领导的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且在布拉格建立了新的亲苏政府时，需要做出决定的关键时刻即已到来。许多古巴人，包括一些支持卡斯特罗的人都认为这样的干预会激起古巴人的敌意，并将遭到批评。他们处于恐慌当中。

从越南到美国、从法国到墨西哥、从捷克到古巴，对于整个世界来说，1968 年都是关键的一年。在 1 月底的“春季攻势”（The Tet of-

① 1968 年初，新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杜布切克领导了一场被命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民主化改革运动，被苏联认为是脱离苏联集团的信号。于是，苏联军队于 1968 年 8 月 20 日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用暴力干涉。这次军事入侵导致了约 10 万人左右的难民潮，其中包括许多精英知识分子，也影响了在许多西方国家中宣扬列宁主义的左翼人士的地位，最终也导致了这些政党的部分崩溃。——译者注

fensive）中，越南南部的美军基地遭到成千上万越南军队的进攻，这激起了整个美国的示威游行，美国的公共舆论发生了转变，开始反对这场战争。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于3月份宣布：他将不再竞选美国总统，与越南共产党的和平会谈开始在巴黎举行。而4月马丁·路德·金的被杀以及随后其他美国城市中许多黑人示威者的被杀使得美国社会的这种危机感加深了。罗伯特·肯尼迪这位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也于6月在洛杉矶被暗杀。

在法国，5月份的一场学生动乱引发了索邦大学的骚乱。“巴黎事件”——青年学生的骚动很快传播到全世界的大学，它模仿了两年前在中国毛泽东时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形式。而7月份，在奥运会召开前的墨西哥城，警察攻击了一场示威游行，上百名学生被杀害。虽然这些示威游行各有各的地方原因，但他们主要的共同目标都是反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支持卡斯特罗；支持古巴革命；支持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以及“布拉格之春”改革活动。在1968年，所有学生运动都举着格瓦拉的照片，柯达快照中的这位头戴贝雷帽的游击战领袖成为全球范围内抗议活动的偶像。

236

卡斯特罗最初对革命精神的贡献是推行国家的行为。3月，他把革命深入到古巴那些私人领域中的“反革命”残余，其在经济增长上的贡献很小，但对于解决就业问题意义重大。他说：“那些依赖别人的劳动而生的一小撮人，他们好吃懒做，监视别人劳动，却过着比其他人更优越的生活；这些拥有富足的物质条件的懒人们制定了某种商品标准并建立了各种小企业，只是为了每天获得50比索[①]。现在是对付他们的时候了。”这些寄生虫必须离开，猛烈的革命将要解放小商品行业。按照记者雷耶斯·路易斯·略维奥－梅嫩德斯（Jose Luis Llovio－Menendez）的报告，全国上千名党员秘密、谨慎地分散行动去查抄所有私人商业。这种查抄措施影响到很多行业，包括酒吧、杂货店、汽车修理厂、小商店，个体工匠、以及其他独立的劳动者，如木

① 一种主要在前西班牙殖民地国家使用的货币单位。——译者注

匠、泥瓦匠甚至管道工人。两天后，“除了为数不多的属于私营的农民、货车业主以及司机外”[1]，古巴再无私营企业。如记者梅嫩德斯所揭示的，流放、镇压预示着一个新的纪元：“古巴人的生活失去了喝着啤酒或鸡尾酒、使用着街角洗衣房的便利；享受着个体工匠的专业技术服务及随处可享用的炸丸子、玉米饼以及街头冷饮服务的舒适生活，变得更加灰暗，更加沉重。”[2]

当然，革命者认定的所谓操纵着哈瓦那咖啡文化的反革命者最终受到致命的打击，但这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小型私营企业所创造的资本经济的活力30年后才在这个国家重新恢复。

另一方面，全世界的学生所认为的旧的政治体制正在明显衰落的这种意识，随着捷克事件的发展而逐渐增强，并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可能改变苏联阵营中其他地区的信号。阿尔托·诺沃提尼（Antonn Novotn）这个旧的斯大林主义领袖在1月份的选举中被更年轻的、主张推动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所击败。4月，捷克斯洛伐克出台了一项“行动计划”。它宣称：如果没有“一种开放的、交换的观念，没有一种整体社会、政治体系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将无法建构。国际上把这一事件称为“布拉格之春”，并且把杜布切克的计划描绘成“人性的社会主义”。 237

世界用赞赏的眼光看待捷克斯洛伐克人为获得国内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欧洲的共产主义国家，如反苏的领袖们——南斯拉夫的铁托（Tito）总统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Ceausescu）总统都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者。在东欧其他国家以及在古巴，人们对这一过程的细节有着强烈的兴趣，而苏联则对杜布切克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改变路线。如果赫鲁晓夫为害怕失去西方的卫星国而不得不对捷克进行干涉时，会使1956年匈牙利的悲剧重演吗？或者这一次苏联领导人会允许他们的捷克斯洛伐克同盟者采取自治措施？

---

① Jose Luis Llovio – Menéndez, *Insider: My Hidden Life as a Revolitionary*. New York&London, 1988, pp. 217 – 218.

② Llovio – Menéndez, *Insider*, p. 218.

8 月 21 日黎明，当苏联军队穿越鲁塞尼亚（Ruthenia）山区，跨越国界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时，这一野蛮的答案揭晓了。与他们一起的还有波兰、匈牙利、东德和保加利亚的 50 万军队。在布拉格市区的大街上行驶着上百辆苏联坦克，杜布切克和其他领导人被逮捕并押往莫斯科。一夜之间，“布拉格之春”变成寒冬。

当卡斯特罗还在考虑应该说些什么时，古巴陷于长时间沉寂中。甚至在多年以后，古巴领导人对此问题的内部争论仍没有披露出来。大多数古巴人以为由于捷克斯洛伐克革命为世界带来的刺激，卡斯特罗会重申古巴革命传统的独立道路，并谴责苏联的侵略行为。难道切·格瓦拉——在他去世后的那些激情岁月里，他的思想被人们所深深地怀念——不正是一位苏联模式的尖刻的批评家吗?

苏联进攻布拉格两天后，卡斯特罗终于出现在电视上。令电视机前的观众大为吃惊的是，卡斯特罗竟然发表演说强烈支持苏联的行动，并且以强有力的语气批判杜布切克的改革：

> 一个真正自由的风暴被释放出来，一连串有利于反对党的政治口号开始形成——（例子）共产党手中的支配权遭到禁止——一些手段得到使用，如建立资产阶级形式的压迫的“自由”。这意味着反对革命，而且社会主义的敌人、剥削者们将被授权自由地发表反对社会主义的讲话和作品。[①]

卡斯特罗主要是针对其国内听众，而很少关注国外的意见。他投苏联正统思想之所好来决定自己的选择。同样，古巴虽然没有公开承认，在 10 年后，即 1979 年，它采取了支持苏联进攻阿富汗的立场。古巴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没有可选择的共产主义可替代。从现在开始，238 古巴无可非难地成为苏联的支持者，并且在苏联模式下重建其社会结构。这将需要时间，且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叶古巴才获得苏联正统

① Castro speech, 23 August 1968.

卫星国家的地位，但其道路是被选定的。

卡斯特罗对古巴在苏联战略力量上的重要地位充满自信，并且相信它的体系之强度，直到1991年苏联突然解体。他开始相信，古巴必须有一个纪律严明的共产党，甚至当苏联解体后他仍继续坚持一个独立政党的重要性。不过，古巴独立的旧观念仍然存在。卡斯特罗忠诚地坚持他的苏联配方，经常声称古巴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是苏联模式的改进。他认为，古巴比它的苏联导师更适合于支持第三世界的革命。

20世纪60年代，卡斯特罗曾经试着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在第一个10年革命期间，古巴社会并不是完全的苏联模式。虽然古巴在很多方面都受惠于苏联的援助，但它坚持了自己国家制订的计划。然而到1968年，卡斯特罗政体的智力资源枯竭，他如释重负地倒进了苏联温暖的怀抱。古巴与苏联结盟的吸引力不是在于其军备和已准备妥当的武力上的担保，而是在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实践为他们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蓝图。

1959年时，大部分古巴人已经愉快地接受了与他们的过去划清界限，但是革命背后的思想却从来没有得到清楚的解说，而且这种思想也似乎从来没有被认为是能够动员人们支持革命的最重要因素。大多数的思想都来源于卡斯特罗本人——善于演讲和鼓动群众的魅力十足的“平民”领袖。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是展现了他的历史感。他善于从古巴的历史脉络中抽出较为激进的成分，并把它们与过去的古巴人对一个独立、繁荣的共同体的想象编制在一个新的体系中。他于1953年做的《历史将证明我无罪》的演讲极为重要，该演讲强调了古巴未来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变化的必要性，并且暗示这种变化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之外。

这位游击队领袖把时间花费在军事战略和战略战术上，却从没考虑过当时的战略需求之外的将来政府的性质问题。古巴城市的理论家为“7·26运动”设计的蓝图和计划常常遭到山区领袖们的否定。除了温和改良派的整体计划，包括土地所有权、教育以及工人们工作环境的改善等，很少有具体的改革计划。

1959年，“7·26运动”的力度比计划中预期的要小，虽然控制 239 了整个国家，但却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卡斯特罗所公开发表的演讲和文章中那些模糊的、直接的、不完整的思想意识价值不大。应该存在政治哲学的地方却是一片空白。

在这种情况下，卡斯特罗和他亲密的同志们最终选择与当地的共产党和苏联结盟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这样做显然是出于战略原因：美国就在90英里之外，且1954年美国对危地马拉的干涉经常提醒着他们，苏联的军事支持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卡斯特罗真的需要购买苏联所有的产品、锁、原料以及枪支吗？他自身从来不是一个传统的共产主义者，对于老的共产党他无所顾忌，并且他也很快与正在兴起的第三世界中那些激进的非共产主义政权发展了友好关系。虽然其中很多国家更赞同两个超级大国之中的苏联而愿意与其同道，却不赞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卡斯特罗已经超越了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或者恩克鲁玛领导下的加纳和简朴的民族主义，但是难道他不能追随南斯拉夫的铁托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所倡导的独立主义吗？

他没有选择这样做，也似乎没有考虑过这样做的可能性。原因是他领导的运动缺乏理论思想。当革命席卷古巴整个国家的时候，他们惊慌失措。实质上他们是实用主义者，先是尝试一件事情，然后再尝试另一件事情。他们引进外国经济学家；尝试进口替代行业；寻求多样化；把视野内的所有行业都收归国有；也听取那些建立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警告性建议。最终，他们转向苏联。它是无数顾问、新技术的源泉，而且看来似乎拥有无限的财富。苏联的革命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在这方面他们是专家，他们知道答案。企图发现另外一条道路的尝试是不现实的。杜布切克已经做错了。

随着卡斯特罗对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者的谴责，之后发生的是古巴原来出现的关于开明政治的辩论被遏制，这些关于开明政治的辩论受到美国和西欧左派势力的激进潮流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正统思想意识逐渐向古巴渗透，而许多没有机会离境的具有独立思想

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求出境签证，人才正在不断外流。古巴将在20世纪90年代恢复其自身在音乐和艺术方面的独特优势，但是它在文化和戏剧方面的声望却在这一期间丧失殆尽。

对于许多外国的革命支持者来说，卡斯特罗对“布拉格之春”的抨击就像是那最后一根稻草。西欧自由主义者、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开始放弃他们早期对之赞同的想法。卡斯特罗与莫斯科的联合 240 与团结沉重打击了托洛茨基分子（Trotskyists）、那些反对斯大林的传统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们。在美国，许多托洛茨基分子曾经是温和的古巴革命委员会的支持者，他们要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同一年，美国发生的政治动乱、西欧骚乱的高涨热情都引起人们对1848年革命的回忆，当时，执政当局无不感受到席卷他们殿堂的革命风暴。卡斯特罗的演讲对于他以前的许多支持者来说，似乎是在企图浇灭大众的激情。针对古巴革命的更多有保留的或者是带有敌意的批评开始在国外出现，而此前，那些地方只有对古巴革命的赞扬和奉承。

“1 000万吨！”——1970年制糖目标的失败

最后一次自发性革命事件发生在1970年上半年的几个月，成为卡斯特罗执政10年的标志性事件。在苏联正统经济迫近的前夕，卡斯特罗异想天开地试图对抗自然和经济规律，在甘蔗园创造一个奇迹。“达到1 000万吨！”（*Los diez millones van*！）是一个鼓舞民族的口号。是的，我们要收获1 000万吨的蔗糖！

1963年卡斯特罗访问苏联后，制糖业重新成为经济的中心。早期受格瓦拉和少数激进革命派所欢迎的发展多元经济的空想很快结束了。苏联的经济智囊团认为，蔗糖是古巴主要的农作物，古巴可借此在世界市场中获得相当好的利润，蔗糖生产的收入是为进口商品买单的最好方式，而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早就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可预见的将来，古巴经济将依赖于它的制糖业。这一点仅用30多年时间就得到了证实。

蔗糖是古巴唯一的产品，而古巴新盟友的真正意图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消费者，因此古巴的蔗糖产量很快变得比以前多了。从1960年到1990年，古巴的蔗糖产量增长了40%，1990年蔗糖的种植面积达到古巴可耕地面积的45%，这样大面积的土地似乎应该为广大古巴消费者种植粮食作物，但这种讨论却被推至将来。制糖工业需要大批雇佣工人，在20世纪80年代末，农业工人达到235 000人，而工业方面达到140 000人。

在1966年开始实行的合同中，古巴答应在以后的各年度向苏联定期提供原糖，如1968年和1969年，古巴每年向苏联提供500万吨原糖。与革命前对美国的贸易一样，古巴现在有了稳定的市场和价格，且现在的贸易条件更为宽松。在苏联的帮助下，一项雄心勃勃的、实现工业现代化的投资计划很快实施。需要注意的是，现存的建于19世纪的工厂已经过时。甘蔗仍是用人工砍伐，现在将受益于机械设备的引进；运输甘蔗的铁路严重失修；容纳苏联船只的港口需要扩大化和现代化；现有的仓储设施根本不够。1959年之前，古巴只是与美国进行小型的沿海贸易，现在它需要更多的空间储存来自世界各地的进口商品。

241

然而，尽管投资规模很大，但蔗糖产量的增长率却下降了。古巴没有能力向苏联提供协议规定的蔗糖数量，1968年和1969年的蔗糖生产总量只达到370万吨。卡斯特罗仍然是用极端的革命方式表达了其对蔗糖产量的不满意，认为国家可以做得更好。他凭空采用了整数，对1970年的蔗糖产量提出了一个新的更大的目标。1 000万吨的产量——一个以前从没实现过的数字将是这个国家的目标。

卡斯特罗的理由是，如果这个目标实现，古巴的经济问题将不再存在。苏联将按照协议以高出世界市场价格的金额购买达成协议的500万吨蔗糖。另外，古巴还将以正常的价格向世界市场提供200万吨，其余的会在国内市场销售或销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人都会各得其所。

这个无疑是要所有人去行动的数字吸引了公众的想象力，整个国

家的干劲像早年革命时期那样被激发起来。从 1969 年 11 月到 1970 年 7 月间的收获季节打响了一场“蔗糖之战”，党、工会、军队、行政官员、大中学校学生以及小学生——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去实现这一目标。假期、圣诞节被取消，工作计划被打乱。整个国家的力量都指向甘蔗种植场，在狂欢混乱的节日气氛中收割甘蔗。

然而很快地，1970 年前几个星期的事实证明，这个目标将不能实现，很多国外观察家们已经看到从一开始古巴的野心就太大了。政府中传来悲观的叹息，特别是那些老共产党员，他们一直关注着苏联对古巴的赞助。1968 年，当第一次讨论这个想法时，他们其中一些人就开始反对，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目标。他们认为，“根据我们所种植蔗糖的规模，我们所剩下的时间，以及我们遇到的困难，至 1970 年达到 1 000 万吨的产量是根本不可能的。”[①] 卡斯特罗不听他们的劝告。当格瓦拉的一位老战友、蔗糖部长奥斯瓦尔多·博雷戈（Oswaldo Borrego）委婉地提出意见，认为不太可能实现这个目标时，他被指控胆怯而遭免职。

事实上，最后收获的产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850 万吨的产量在其他任何一年这都是相当可观的结果。然而考虑到如此大规模的投入，这个结果是非常令人失望的。甘蔗地中即使投入再多的工作、再多的志愿者的劳动也不能弥补生产组织形式——运输、通信和时间观念——的落后。这个伟大的运动不但没有完成糖的总产量，而且对其他部门的经济造成相当大的毁坏。 242

接下来一年，蔗糖的产量为 590 万吨。虽然没有达到理想的结果，但在 70 年代蔗糖的产量开始趋于稳定。整个 10 年，蔗糖的销售占古巴外汇收入的 3/4。苏联向古巴提供定量的面包和黄油，而销向世界各地的蔗糖却为其带来急需的美元。[②] 20 世纪 70 年代，大部分时间

---

① Llovio - Menéndez, *Insider*, p. 239. 对于 1970 年古巴状况的歪曲报导参见 Alma Guillermoprieto, *Dancing with Cuba*, New York, 2004。

② Robert Quirk, *Fidel Castro*, New York, 1993, p. 754. 糖业经济也受天气的影响。连年的干旱影响了糖料作物和咖啡作物的生长，由此造成国内市场的日用品供应短缺。

里，古巴每年向西方市场销售的蔗糖可以获得2亿到3亿美元，但是1974年和1975年发生了全球商品价格的巨大上涨，增加了古巴的收入，如1974年获得了大约8亿美元，1975年大约是12亿美元——这一年似乎是“奇迹迭出之年”（*annus mirabilis*）。[①]

回到原题，蔗糖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些与格瓦拉看法一致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的错误。其他人则认为，古巴强制性地把原先与美国的蔗糖贸易转向苏联，以扩大出口市场来缓解国内市场的萎缩，为古巴带来的是“一个历史性的缓刑”。[②] 只有当1991年苏联解体时，古巴才被迫重新考虑他们的策略，以旅游业代替了蔗糖制造业。

所有人都认为，试图制造1 000万吨产量是一个错误，这是卡斯特罗一个人的责任。他动员人们去完成一个事实证明是不可行的个人方案，然而他的经济决策者同意这个计划。革命10年后，这些经济学家与他们的政治同僚一样已经思想枯竭。他们做了很多尝试，但是事倍功半。社会中一些最薄弱的部分——卫生、教育以及住房等方面获得了社会保障，但是政府的心脏仍然保持着一片空白，这就需要有一项经济政策。生产力下降，经济不景气，国人都很迷茫，不知国家会向何处去。

现在，卡斯特罗把国家经济交给一个新的苏联顾问组织，获得了一些长时间不受欢迎的老的古巴共产主义者的支持。对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派的攻击标志着古巴的政治发生转变。此后，在1972年，随着古

---

① George Lambie, “Western Europe and Cuba in the 1870s, The Boom Years”, in Alistair Hennessy and George Lambie, eds, *The Fractured Blocade*: *West European-Cuban Relation during the Revolution*, London, 1993. 世界糖料价格在1970年是3.68美分/磅。1974年的价格上涨到29.66美分/磅（11月上涨到56.60美分/磅），但是1977年的价格便下跌到8美分/磅。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西班牙是古巴最大的也是最可靠的西方合作伙伴。古巴人在1975年犯了一个大错，他们拒绝了日本提出的以17美分/磅的固定价格每年购买100万吨古巴糖料并且持续到1980年的合同。古巴人提出要19美分，但是日本人在澳大利亚以17美分达成了协议。当糖料的价格从25美分下降到8美分的时候，古巴人后悔不已。

② Gerry Hagelberg and Tony Hannah, “Cuba's International Sugar Trade”, in Hennessy and Lambie, *The Fractured Blocade.*

巴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1]，即控制苏联及其盟友之间复杂商贸关系的共产主义国家经济联盟，古巴完成了经济上的转向。古巴成为苏联阵营的正式成员，而且此后10余年，古巴从这种联盟关系中持续获利。只是几年以后，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它的优势似乎才不再那么明显。

243

“勃列日涅夫（Brezhnev）时代”：在苏联阵营中重塑国家形象

20世纪70年代，重新恢复古巴经济的工作开始进行，其中大多数工作在幕后开展。其间，许多古巴人去莫斯科旅行，苏联顾问也一次次地参观哈瓦那。1971年夏，苏联人在哈瓦那的出现变得更频繁。根据罗伯特·奎尔克的估计，在这座城市中大约可以看到10 000名俄国人。“小男孩在大街上学着用俄语叫‘同志’，向俄国人讨要口香糖和圆珠笔。”[2] 顾问们与生产出口商品的工厂经理密切合作，并且参加一些会议，把苏联的技术引入到计划中的进程里。1902年至1959年期间一直在商业交流语言中占主导地位的英语衰落了。

柯西金于1971年11月重访哈瓦那，其态度比1967年访问时友好。卡斯特罗现在已被安全地置于苏联阵营中，苏联石油生命线顺畅地输送到古巴，其武器也由定期的货船运达。1971年早些时候，苏联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Marshal Andrei Grechko）元帅带着载有大批军事装备的货船，包括地对空导弹造访古巴。卡斯特罗陪同柯西金在古巴参观了几天，视察工业和农业项目。“社会主义胜利了。”这位苏联领导人用一种乐观的语气说。

1972年，卡斯特罗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在东欧进行了一次广泛的旅行，准备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并出访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捷克和东德等新贸易伙伴。6月，卡斯特罗在莫斯科受到列昂

---

① 即经济互助委员理事会（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它是控制苏联及其盟友之间复杂的商贸关系的共产主义国家经济联盟。——译者注

② Quirk, *Fidel Castro*, p. 682.

尼德·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款待。7月，古巴被正式接纳为经济互助委员成员。11月，卡斯特罗又一次返回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签署了一份15年经济协议，该协议是苏联与古巴经济学家协力工作一年的结果。在这一协议中，苏联给予古巴大量补贴。卡斯特罗充满激情地将此协议描述为真诚的兄弟般友好的国际主义者范例，是革命的关系。俄国人同意提高他们对古巴蔗糖的支付价格，且所有古巴需偿还的债务被延迟了15年（可以在25年内偿还，无利息）；而且新的信贷投资项目（以后的3年将超过3.5亿美元）将实行低利率。卡斯特罗诚实而感激地承认，克里姆林宫已“拿出了大部分的主意”。[①]可谁也没有想到15年后，当古巴必须偿还债务的时候，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掌握了苏联的政权。

244

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古巴政府创立了坚实的计划经济体系。1976年，国家宣布的以工业化为目标的第一个5年计划出现了。该计划的主要古巴设计师是曾留学莫斯科的经济学家胡姆贝托·佩雷斯（Humberto Pérez），未来10年的经济计划将一直由他负责，并管理中央计划委员会（Juceplan）[②]。古巴新的计划体系——“经济管理与计划部”[③]（SDPE）模仿10年前从苏联引入的模式，其目标是帮助国营企业财政自给，引入利润和奖励的观念，促进权力分散，提高生产效率。[④]

1975年至1985年的10年间，革命进入经济增长的阳光高地。至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古巴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1970年至1988年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是4.1%，而拉丁美洲的参照数据不足

① Quirk, *Fidel Castro*, p. 717.

② 佩雷斯最终于1985年初，在重要的方向转变，即1986年4月“修正运动”前夕被替换。

③ 全称 Sistema de Dirección y Planificación de la Economía。——译者注

④ Andrew Zimbalist, “Perspectives on Cuban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for the 1990s”, in Hennessy and Lambie, *Franctured Blockade*.

1.2%。[①] 古巴人开始为发展而欢呼。

苏联顾问们还有一个附加的任务，即帮助古巴建立新的政治体系。卡斯特罗和他的一些朋友通过临时的、偶然的方式花费10多年的时间控制了革命。“1 000万吨”决策的惨败证明十分有必要改变一个人决策的现状。革命需要一个更为正式的民主平台，在此平台上，民众们的意愿至少在理论上应该得到重视。共产党的雏形需要扩大和典型化，这个国家需要一部适时的宪法。

最早的改革始于部长会议。它于1972年建立，由8名权威成员组成执行委员会。现任领袖中有3位最值得信任的领导负责解决与苏结盟中出现的问题：劳尔·卡斯特罗的任务是在军事上保持与苏联的亲密关系，他已经证明了自己能胜任这份工作；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Osvaldo Dorticós）负责政策和贸易；而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将负责处理国际事务。他们定期访问莫斯科和东欧的一些首都。

第二项改革包括起草一部新的宪法和发展一种受欢迎的政府参与机制。在布拉斯·罗加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准备起草新宪法，并将它发往党的基层组织、工厂和农场征求意见，进行广泛讨论。同时，这部宪法试图确立新的法律结构，而且也新设计了一种民主决策的形式。民众权力（*Poder Popular*）分散到由市级、省级和国家级组成的3级体系中。虽然以苏联体系为基础，但它仍包含了大量的古巴特色。 245

第三项改革是对共产党自身的改革。多年来，古巴人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一开始就能够组织群众运动的政党，结果于20世纪60年代创立了不同寻常的组织，即古巴共产党。现在这个政党按照苏联更加正统的模式进行组织。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于1975年11月举行，卡斯特罗出席大会并发言。面对来自全世界的共产党代表，卡斯特罗承认：

---

① Andrew Zimbalist and Claes Brundenius, *The Cuban Economy: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Socialist Performance*, Baltimore and London, 1989.

在我们开始革命之前，其他政党已经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我们却没有充分利用他们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很虚心，如果我们没有高估自己，我们将能够看清，革命的理论在我国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我们应该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有所贡献。[1]

一年后，即1976年11月，第一届国民大会（人民权力系统的顶端）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卡斯特罗正式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这一刻，革命政府一直拥有的权力将移交给国民大会。部长会议也将其行使了18年之久的组阁权力与立法权力移交给国民大会。这18年是我们祖国的社会和政治发生最深刻变革的时代。让历史公正地评价这一时代吧。

经过数十年革命的震荡，古巴现在是一个稳定、组织良好、武装力量齐备的共产主义国家。1959年时，人们（即使是老共产党员）也很少想象出会有这样的结果。1976年以后的10年被许多古巴人衷心地怀念，称其为“勃列日涅夫时代”。勃列日涅夫用他那双颤抖的手控制苏联和东欧近20年，其他国家却很少颂扬这位日渐衰老的领导人所从事的国家活动。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在其生前的执政期间，苏联与古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几乎提供了无限的资金，在政治上很少施加压力，在某种程度上使人联想到古老的西班牙帝国管理较好的时期。苏联资助的资金用来充实武装力量，投入这个岛国的教育和医疗卫生项目，但是它也引起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品需求的扩大。

其他国家的革命没有这么顺利，法国革命过后的25年，革命者大多已离世，他们的英雄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已被击败。苏联革命者在同一时间跨度遭遇到类似的命运，俄国革命25年后，斯大林的大清

246

① Malifeli Perez - Stable, *The Cuban Revolution: Origins, Course, and Legacy*, Oxford, 1993.

洗运动中的生还者又遭遇了德国纳粹的种族灭绝战争。相对而言，古巴的革命进行得非常平和。它屈服于苏维埃帝国，却不像法国大革命中人们对吉伦特派（Girondist）人物皮埃尔·韦尼奥（Pierre Vergni-and）[①] 的评价那样：它不吞噬自己的孩子。

国内外反苏阵线（1968—1972）

20 世纪 60 年代末，并非所有人都同意卡斯特罗投奔苏联的决定。许多支持革命的外部力量曾经被革命的创意及自发性所吸引，痛惜革命湮没在苏联的正统性当中。许多古巴的知识分子也进行抗议，并因其反抗行为而受苦。在无人能理解古巴政府的这场游戏规则的时代，人们经常广泛宣传的最著名事件是"埃维尔托·巴地拉（Heberto Pa-dilla）事件"。他是偏激的作家和诗人，不喜欢亲苏势力，因而受到审讯并遭受政治迫害。

像革命前 10 年时那些杰出的古巴知识分子那样，巴地拉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青年时代曾有些年在美国度过。后来，作为一位世界性人物和革命的热情支持者，他享受着适当的生活特权。他曾在伦敦的拉丁美洲通讯社工作，且服务于苏联和布拉格的古巴大使馆。他逐渐感受到苏联体系的伪善，开始对此反感，而且当他于 1967 年回到哈瓦那后，毫不隐讳地表示了他对于古巴社会似乎在构建一个与苏联相似的模式而感到的失望。很多同时代的人已经选择自我流放，如《革命》杂志的前任编辑卡洛斯·弗朗基已经于 1964 年离开；1965 年，古巴最有才能的作家圭勒尔默·卡布列拉·因凡特（Guillermo Cabrera Infante）也离去。其他人把革命方式的确立理解为技术层面的活动，选择过一种默默无闻的生活。巴地拉也在这些人之列，但他开始发动攻击。他的诗作向人们灌输着这样的思想，即一名艺术家应该拥有自由的精神和政治上的独立。这在西方是正常的，而在 60 年代末的古巴

① 此人全名皮埃尔 - V. 韦尼奥（Pierre - Victurnien Vergniaud），是法国大革命中吉伦特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原书作 Vergniand，疑为印刷错误。——译者注

是要被批判的。

卡斯特罗在对艺术家和作家的演讲中已经表明了古巴革命对文化的态度，并于1961年将自由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分类。卡斯特罗宣称，“在革命阵营内部”，可以有创造的自由，但任何东西都不允许与“革命对抗”。

当时，大多数革命的支持者接受了这个标准。这个国家一直受到攻击，如今仍然受到战争的威胁，起码的爱国者应该有一定程度的节制，这影响到了艺术工作者的正常规则。在一些作家选择其流放生涯的同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于1959年回到哈瓦那，定居下来服务于革命，愉快地创作诗歌、小说、戏剧，而最著名的是他们的电影创作。247 艺术家和电影制作者很活跃。由阿尔弗雷多·格瓦拉所执导的国家电影机构，即古巴电影及艺术发展委员会（ICAIC）的创作是最出色的革命文化作品。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Santiago Alvarez）的纪录片开始闻名世界。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苏联结构的阴影下，文化活动范围开始缩小。

1968年出版的隐晦地批判了革命给艺术家的待遇的一部巴地拉诗歌集获得了“美洲之屋”（Casa de la Americans ）的年度奖。“美洲之屋”是一个具有泛美使命，致力于促进革命的文化机构。特别是那首题为《游戏之外》的诗歌，任何古巴读者将发现它能激发一种当地的人共鸣：

诗人！踢出去！
这里没他什么事。
他不玩这种游戏。
他从来不表达他的热情，
或者清楚地发表意见。
他甚至从来看不到奇迹，
但却整天在吹毛求疵。



巴地拉的这首诗是献给一个希腊共产主义诗人雅尼斯·里索斯（Yannis Ritsos）的，后者于1967年被希腊政府拘禁，但是古巴当局没有被愚弄。直接的和严厉的批评出现在《绿橄榄》杂志上，《绿橄榄》是由武装力量和劳尔·卡斯特罗主办的一份新闻周刊。[①] 关于这首诗歌的价值出现了论战，但没有持续多久。巴地拉被淘汰出局，他和其他那些有着相对独立性、我行我素思想的人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此后，具有吸引力的、受欢迎的获奖作品不再为古巴的那些国家出版社所接受。

巴地拉与欧洲的作家和记者保持联系，而古巴特工则与他保持联系。1968年以后，当外国媒体开始倾向于对古巴进行负面报道时，巴地拉被指责为敌对批评者的代表。1971年，他被控告发表反革命诗歌而被捕。世界上许多著名的作家起来为他辩护，并在《世界报》（*Le Monde*）联署了一封信，表明他们的疑虑，呼吁释放他。其中署名者有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和卡洛斯·富恩特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以及胡里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这是一份强大的、著名的古巴革命支持者的名单。（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科萨塔尔后来与卡斯特罗达成和平共识，从支持者名单中退了出来。）

卡斯特罗对此进行还击。在4月召开的关于教育和文化的国民大会上的发言中，他攻击古巴和外国知识分子缺乏革命的信念。最恶劣的罪犯——“卑劣的帝国主义文化媒介”——来自于西欧。国会不久回放了他的演讲，呼吁艺术要成为服务革命的武器：

假冒左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的黑帮主张竟然变成社会的评价理念，对此我们拒绝接受。这些人是殖民主义的帮凶，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文化的代理人，他们在我们的国家找到了一小帮能回应他们思想

248

① 有些人称，由莱奥波尔多·阿维拉（Leopoldo Avila）执笔的对巴地拉的攻击文章实际上是劳尔·卡斯特罗本人的作品。见 Llovio - Menéndez, *Insider*，264页。

的精神上被殖民的人。[①]

国会谴责“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每一种表现”，并声称文化，如教育，不是也不可能是政治的和公平的。巴地拉的支持者惊愕于国会的语气。因为自1961年至1968年哈瓦那再次召开文化会议这一段时间，这场革命曾经长期心胸坦荡地、热情慷慨地欢迎古巴和世界知识分子。

一个月后巴地拉被释放，他做了一个公开的自我检讨，这使得他的朋友感到惊愕，也更加引起国外的愤怒。他们在《世界报》上共同签署了一份新的联名表，增加了一些新的名字，包括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墨西哥小说家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他宣称巴地拉的遭遇让人们想起“斯大林时代最肮脏的时刻”。巴地拉此后在古巴居住了10年，一直做翻译工作，最后于1981年离开古巴去了美国，在美国出版了回忆录。[②] 他于2000年在亚拉巴马州去世。

古巴的文化事务最终于1976年由文化部重新进行了整合，文化部与共产党和国民大会一起沿着苏联的道路在同一时间重新建立起来。新的文化部在阿曼多·哈特的负责下背离古巴文化，向全世界开放的范围也只限于东欧世界。

向大陆开放：卡斯特罗访问阿连德领导的智利（1971）

1968年以后，外界对与苏联紧密联系的古巴革命开始失望，他们能简单地把自身对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影响从古巴转移到智利。卡斯特罗的支持者和亲密的朋友，多次参与智利总统选举的社会党人萨尔瓦多·阿连德于1970年9月被选举为智利国家总统。智利在70年代早期成为新的革命热情的关注点，并且其社会主义道路很快与古巴所选择的道路形成对比。

---

① 引自 Quirk, *Fidel Castro*, 672页。卡斯特罗的声明是在5月2日发表的。

② Heberto Padilla, *Heroes are Grazing in my Garden*, New York, 1984.

卡斯特罗于1971年11月到达智利的圣地亚哥，考察这一国家的新政体并与自己的老朋友交换经验。古巴革命在理论上是有益于拉丁美洲大陆其他国家的革命政权的。推动游击战争的发展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然而当他们取得胜利后，古巴又变得特别紧张，如1970年对智利、1979年对尼加拉瓜那样。

249

智利方面向卡斯特罗提出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阿连德选举成功的原因在于其走苏联道路的决定。智利拥有一个强大的莫斯科战线的共产党，卡斯特罗常常对此发表不满的评论。然而阿连德所在的社会党却走上了共产党“左”倾路线，并且可能是古巴革命最热烈的拉丁美洲支持者。阿连德曾经是拉丁美洲团结组织（The Latin America Solidarity Coalition）的赞助者，这个支持古巴游击运动的组织创建于1967年。阿连德不仅为智利提供策略，而且与他的政党一起支持卡斯特罗。

问题是卡斯特罗不再支持他们。作为莫斯科的忠实同盟者，他现在与智利共产党的关系更为密切。智利共产党领导人担心智利革命会无法控制，开始敏感地压制革命的火焰。卡斯特罗对阿连德的访问对智利社会党和共产党双方来说都是必需的，但也是十分为难的。美洲存在着与古巴具有不同的历史和政治背景的马克思主义竞争者，这不是卡斯特罗所能接受的简单理论。阿连德发现卡斯特罗的出席让人紧张不安。这激起了民众对他的政府的反抗，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一场军事政变摧毁了他多年来所从事的社会主义尝试和智利以后的民主。

卡斯特罗并不了解智利模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因此，尽管卡斯特罗感觉到了阿连德支持者的热情，但是仍有一半的国民不支持卡斯特罗，也不支持阿连德，而且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会这样说。智利人曾希望卡斯特罗逗留一个星期，但他在智利逗留了3周之久，并走马观花地匆匆走遍了整个智利。他对于学生的诘问和各种小报很不习惯，经常感觉自己受到了很不友好的对待。圣地亚哥地区爆发了右翼分子组织的敌对势力的示威活动，主要由来自富人区的大量妇女构成。他们敲着空的瓶瓶罐罐——尽管他们中许多人并不是生而善于此道——

指责社会主义就是饥饿的前兆。“我们不想让卡斯特罗在这里。”是他们的口号中最不具有攻击性的一句了。

这场运动必然引起阿连德支持者的反应：工人们不允许“法西斯暴民再一次控制街道”。工人运动的共产主义领袖如此说。骚乱和城市的紧急状况随着夜幕的降临而结束，负责宵禁的官员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将军维持了秩序。

面对智利不容乐观的将来，卡斯特罗离开了智利。工人阶层对卡斯特罗的欢迎使其倍感惬意。由于他对总统权力的有限性并不了解，因而很难理解阿连德为何不愿武装工人。据报导，卡斯特罗回到哈瓦那后称阿连德“顽固地”生活在“一个充满错误信仰和诗歌的世界中。他被其宪政思想所束缚，相信军队的公平，还确信他们将永远保护合法政府。”[①]

250

卡斯特罗并不认为军队会保护阿连德。“他们一旦有机会就会推翻他”，他说。而不到两年的时间，即1973年的9月11日皮诺切特将军得到了他的机会。

卡斯特罗在其回国的路上，在利马停留，被这里的另一番景象所吸引。他拜访了胡安·贝拉斯科将军，他是激进的秘鲁总统，早在3年前发动政变，然后继续促进土地改革并将国外石油公司的所有权收归国有，并致力于同哈瓦那和莫斯科建立外交关系。当卡斯特罗回国后曾向一群朋友说道：“在拉丁美洲军事政变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像智利这样的，由一群军人去策划实行土地改革，并且把北美公司收归国有的。他们的胆识已经远远超出了采纳进步和改革措施的范围。”[②]

卡斯特罗原以为贝拉斯科的军政府有革命的潜力，但还是发现了其严重的弱点。他担心“群众更广泛地参与”武装，以及“他们更倾向于以权谋利”。卡斯特罗的分析一针见血，非常犀利。1976年贝拉

① Llovio – Menéndez, *Insider*, p. 270. 尽管卡斯特罗对阿连德有其私人看法，但他还是乐于欢迎阿连德于1972年12月对古巴进行国事访问的。

② Llovio – Menéndez, *Insider*, p. 272.

斯科去世，随后其政体也很快地瓦解了。他是一个坚强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镇压了国内的反对者，忽略了所有平民政治家，没有留下可长久继承的遗产。但是卡斯特罗在贝拉斯科统治的秘鲁感受到了比阿连德统治的智利更亲切的回家的感觉。

卡斯特罗迅速保护安哥拉（1975）

卡斯特罗已经拿了苏联的钱，但他保留了操作自己账户的能力。令莫斯科和华盛顿吃惊的是，卡斯特罗于 1975 年又奔向切·格瓦拉和古巴部队早在 10 年前就已匆匆离开的非洲这个大竞技场。他唐突地命令紧急空运一支大部队到安哥拉首都罗安达（Luanda），救援在南非入侵安哥拉时几乎败局已定的阿戈什蒂诺·内图的革命军队。

古巴秘密的突然的以及没有任何自私动机的干涉行为被认为是保护内图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的有限行动，保护其不被打败。卡斯特罗计划在危机结束后撤离他的军队，但这并没有实现。15 年后，古巴部队仍积极参与安哥拉事务，其承诺远远超出 1975 年的设想。

安哥拉是一个能引起许多古巴人（包括白人和黑人）同情的非洲国家。许多古巴黑人的祖先来自于刚果河（Congo River）畔以及部分非洲沿海地区。西葡传统将古巴与大西洋奴隶贸易联系在一起——它曾经与巴西和安哥拉、西班牙和葡萄牙进行大西洋奴隶贸易——这是古巴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巴白人也同样被安哥拉吸引，因为安哥拉像古巴那样，也是一个白人居住的国家，是来自欧洲的许多家庭的移居地。1945 年以后，曾经有数千人从葡萄牙迁至罗安达。1974 年，这里的人口达到 640 万，包括 32 万白人，但这些白人中有许多将于 1975 年离开非洲。 251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是由一群左翼知识分子建立的。自 1961 起，它一直从事着反对葡萄牙殖民权力的小规模游击战争。1965 年，格瓦拉在布拉柴维尔（Brazzaville）会见内图，与安人运开始了直接的接触。这一年，少数古巴军官被派往安哥拉北部卡宾达省的安哥拉人民

解放运动营地。双方都不满意：古巴人过于乐观了，他们发现安哥拉人政治落后，学习进度缓慢；安哥拉人发现古巴人高傲而专横。内图于1966年1月访问哈瓦那，去参加三大洲会议（Tricontinental Conference），随后记下了他的感受。他认为“菲德尔和其他古巴领袖对非洲的解放运动失望了，且由于在扎伊尔（Zaire）不成功的经历，他们变得非常谨慎。”[1] 1965年，格瓦拉远征的失败带来了长期的阴影。

1967年，古巴的顾问撤回，不再对安人运（MPLA）提供帮助，开始把精力集中在阿米尔卡·卡帕拉尔在几内亚比绍的“非洲几内亚及佛得角独立党”（PAIGC）。这被证明是一次成功的投入，葡萄牙在几内亚比绍战争中的失败导致其国内1974年4月的革命。一群年轻的官员由于他们在非洲战争中的失败而变得激进，推翻了旧独裁者萨拉查（Salazar）的继承者马塞洛·卡埃塔诺（Marcelo Caetano）这个在里斯本（Lisbon）的无能政体。

这个深受到葡萄牙共产党影响的新的里斯本军政府迅速地撤出其在几内亚比绍的武装力量，并于1974年9月允许几内亚比绍独立，继而于1975年6月允许莫桑比克独立。安哥拉的问题比较多，有3个同时存在的独立运动组织，每股独立运动都拥有自己的国际赞助者，他们都在追逐权力——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谈判和武力斗争实现这个权力。内图的左翼组织，即安人运（MPLA）得到了葡萄牙政府中一些个人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莫斯科和哈瓦那的政治支持。其中有在西方新闻界著名的、被称为“红蝴蝶”的罗莎·孔蒂尼奥（Rosa Coutinho）上将。他被派往罗安达执行归还殖民地的命令，把殖民地交与安人运。

这种结果遭到第二支独立运动组织，即罗伯托·霍尔登（Roberto Holden）领导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NLA）[2] 的反抗。他从中国获得武力资助，从刚果总统蒙博托（Mobutu）那里获得政治支持，且长

---

① Piero Gleijeses, *Conflicting Missiones: Havena. Washington, and Africa, 1959—1976*, Chapel Hill, N. C., 2002. p. 244.

② 其全名为National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Angola。——译者注

期从中央情报局获得小额报酬。[①] 第三支独立运动组织则是由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领导的规模比较小的运动——“安哥拉完全独立民族联盟”（UNITA）[②]，被怀疑与萨拉查、卡尔塔诺领导的前葡萄牙政府有联系，且不久后被南非打败。葡萄牙政府寻求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以筹备安哥拉于 1975 年 11 月独立。1 月，安哥拉相互竞争的各派力量集会于葡萄牙的艾科（Alvor），原则上同意解决他们的分歧。在协议规定的日期之前，安哥拉即陷入内战。 252

1974 年秋，内图请求古巴派出军事顾问，但是古巴有了早期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交往经历以后变得十分谨慎。他们在做出决定之前，秘密派出两名军官去考察局势。自从安人运希望获得其传统支持者——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帮助后，紧急情况就没再出现过。当内图告诉了卡斯特罗其武器装备不足时，也请求后者以其在苏联阵营中的影响力来提供“有效而及时的帮助”。[③]

直到 1975 年中期，卡斯特罗才采取了进一步行动。这一时期安人运的情况相当惨淡：葡萄牙将罗莎·孔蒂尼奥上将从罗安达调离了；对安人运将接手独立筹备事项的私下承诺现在不再有效；危险的内战正在进行，南非也可能将进行干预。现在，安人运迫切需要得到帮助，但是哈瓦那并没有把精力集中在非洲事务上。卡斯特罗正全神贯注于国内的发展，重新组织国家政治和经济结构。古巴新建立的共产党的第一届大会被安排在这一年的年末。8 月，他答应帮助内图进行培训：480 名军事顾问将派往安哥拉，建立 4 个训练中心。他们将于 10 月开始工作，用 3 至 6 个月的时间训练新兵。

其他国家开始关注安哥拉的内战。7 月，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授权中央情报局暗中资助罗伯托·霍尔登和若纳

---

① 1961 年总计 6 000 美元/年，1974 年上涨到 10 000 美元/月，1975 年 1 月一次性付给 300 000 美元。见 Gleijeses，*Conflicting Missiones*，279－283 页。

② 全名 National Union for the Total Independence of Angola，即“安哥拉完全独立民族联盟”，是安哥拉第二大政治党派，建立于 1966 年，在安哥拉独立战争期间曾与安人运（MPLA）共同战斗（1961—1975），后与安人运进行内战（1975—2002）。——译者注

③ Gleijeses，*Conflicting Missiones*，p. 247.

斯·萨文比2 400万美元，这是未来20年持续活动的开始。[①] 在苏联或古巴开始用他们微薄的资金帮助安人运之前，美国的美元和武器已经送到安哥拉。8月，南非军队向北推进，以保护他们曾经资助的库内纳河（Cunene）上的水力发电工程为借口，进入安哥拉南部。葡萄牙政府提出抗议，但是南非声称他们在保护他们的投资。[②]

在1975年最初的几个月里，福特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对葡萄牙左派革命的担忧多于其过去殖民地的未来，并且断言前共产党的总理，与孔蒂尼奥将军一样最同情安人运的瓦斯科·贡萨尔维斯（Vasco Goncalves）将军会于8月份下台。随着西欧共产主义威胁的增强，美国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于安哥拉。

253

现在，古巴意识到安人运可能需要紧急军事援助，因为直到明年初安哥拉新兵才能完成其训练计划。安人运在罗安达的基地处于威胁当中。葡萄牙革命中最为激进的角色奥特洛·萨雷瓦·德·卡瓦略上校（Col. Otelo Saraiva de Carvalho）于7月26日参加哈瓦那的传统节日庆典时，卡斯特罗请求他确保葡萄牙政府加快从古巴向罗安达运输武器的速度。现在，卡斯特罗出于对军事形势的微妙的警觉，于8月给勃列日涅夫写信，说古巴需要特种部队，并且如果有可能的话，还需要苏联帮助运输。[③] 这一时期，苏联领导人一心想着与美国建立更广泛的友好关系，开始不太情愿同意古巴的要求。直到第二年，苏联才向古巴提供运输上的帮助。

古巴所承诺的480名顾问的队伍乘坐3艘货船组成的船队于12月初到达安哥拉港。随后他们进入4个训练营：一个在罗安达以东30公里处的恩达拉坦多（Ndelatando）；另一个继续向南，在本格拉（Benguela）港；第3个在罗安达东部省份；第4个在卡宾达地区。

基辛格后来宣称，古巴作战部队已经于8月到达，后来证明并不

① Gleijeses, *Conflicting Missiones*, p. 293. 罗伯托（Roberto）和萨维姆比（Savimbi）每人每月得到200 000美元。

② Gleijeses, *Conflicting Missiones*, pp. 258 – 259.

③ Gleijeses, *Conflicting Missiones*, p. 260.

是这样。[①] 安人运（MPLA）击退了罗伯托·霍尔登领导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NLA）的攻击，保卫了罗安达，获得胜利，但是在与古巴军队一同作战时却没有成功。12 月 14 日，当南非强大的武装入侵罗安达南部时，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内战变成了国际战争，不久有古巴顾问在战争中被俘。

南非的侵略战争，即"祖鲁行动"（Operation Zulu）由在南非接受过训练的 1 000 名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员组成，再加上 150 名白人士兵和军官，不久又有 1 000 名南非国防军增援。11 月初，侵略部队迅速北上，到达罗安达南部本格拉省的外围地区，此地是古巴的第 2 个训练营所在地。战斗在本格拉省南部 43 英里处的卡腾格（Catengue）打响，古巴人不可避免地陷入战争，共有 20 多人战死、受伤或者失踪。[②] 他们的力量不足，11 月 6 日，本格拉省落入南非人手中。罗安达的败象很快显现出来，罗伯托·霍尔登认为他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组织将在独立日，即 11 月 11 日之前攻占罗安达。

卡斯特罗听到卡腾格战败的消息后，决定在 11 月 4 日派出军队保卫罗安达。除了他的兄弟劳尔以外，他没有向任何人咨询，也没有试图与莫斯科对话。时间紧迫，而且苏联政府也会如勃列日涅夫在 8 月份所做的那样，对此事进行推诿。卡斯特罗对于古巴所部署的代号为"卡洛塔行动"（Carlota）的计划是借用了 1843 年马坦萨斯湾地区甘蔗种植园的一个带头起义的女奴的名字，她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弯刀。1973 年在古巴举行了纪念这位反抗者的活动，这个女奴的名字一直在古巴人心中。[③]

254

在没有苏联帮助的情况下，古巴特种部队乘涡轮式螺旋桨扑机飞向罗安达。航行花费了 48 小时，经停巴巴多斯、比绍以及布拉柴维尔

---

① Gleijeses, *Conflicting Missiones*, pp. 270 – 271.

② Gleijeses, *Conflicting Missiones*, p. 303.

③ Gabriel Garcia Marquez, "Operation Carlota: the Cuban misin to Angola", *New Left Review*, Nos 101 – 102, February – April 1977. 卡洛塔行动是卡斯特罗发动的一次更具野心的行动。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与卡斯特罗本人以及其他参与者谈话后做了完整的报告。

加油。第一架飞机搭载了 100 名士兵，第二天的两架飞机搭载了 150 名士兵。罗安达北部受到了有白人雇佣兵和蒙博托领导的刚果军队帮助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威胁，南部则受到南非军队的威胁。11 月 10 日，古巴军队及时到达，配备了 6 名苏联火箭炮手，在罗安达北部的希万贡多（Quifangondo）参加了对付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一次决定性战役。

在古巴人的帮助下，安人运的队伍挺住了。当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混合部队试图向罗安达进攻时，遭到溃败。内图于是得以在 11 月 11 日的午夜宣布安哥拉独立，同时葡萄牙行政长官悄悄地从港口乘船离开。

南非武装的主力仍然在从本格拉向罗安达进军。古巴军队现在被调往南部，加入到本格拉军营中幸存的顾问队伍中，去制止这场看似阻挡不住的进军。他们在新里东杜（Novo Redondo）以北坚守抵抗南非的防线，炸毁了桥梁以阻止其前进。这少数古巴战士已扭转了战局。11 月底，古巴军舰搭载 1 000 多名士兵停靠在罗安达，补充了安人运的军力。

几支古巴部队转向北方去抵抗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刚果蒙博托的入侵，保卫卡宾达省。一名在马埃斯特腊号上驶往卡宾达省的古巴后备军人在他的日记中写下他们离开古巴时卡斯特罗的最后指示：

然后他告诉我们卡宾达省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去那里的任务是阻止敌人进入这个省，而且也要保护我们的刚果兄弟免遭南非军队可能的攻击……

他让我们务需谨慎，不希望有伤亡，信任我们，因为我们都来看学生和工人。他一直对我们讲话，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古巴革命的故事，把卡宾达和吉隆滩（Giron）相比较，把蒙博托和皮诺切特相比较，然后还把“马埃斯特拉腊”号和格拉玛号相比较。[1]

① Gleijeses, *Conflicting Missiones*, p. 319.

至这一年岁末，大约4 000名古巴士兵被派往安哥拉。直到1976年1月苏联才开始合作，他们帮助在哈瓦那与罗安达之间组织了一次物资的空运。苏联的帮助现在至关重要，因为美国已经说服了巴巴多斯政府取消飞往罗安达的古巴飞机的着陆权。 255

在没有迅速取得军事胜利的希望时，在没有国际支持的情况下，1976年7月南非开始从安哥拉撤军。古巴的干预具有戏剧性，且具有影响力，岛国的语言和象征符号已进入到大陆的想象中。卡斯特罗曾把卡宾达省和吉隆滩相提并论。一个退休的南非将军也这样讲过，他的话在一份报纸上这样写道："安哥拉可以被视为南非的猪湾。"①

卡斯特罗于3月飞往几内亚，在首都科纳克里会见内图，商讨古巴撤军的时间安排。他们决定，古巴将留下足够的军事武装来帮助安哥拉组织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只要有必要，他们将一直留下。内图的主要请求是，安哥拉应该拥有一支能够保护内部安全和国防的军事力量而无须请求外来的援助。但考虑到其国内游击队的实力，这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

卡斯特罗不再计划迅速撤军。5月，一名叫赫伯特·马修斯的古巴资深观察员凭直觉写出安哥拉的事业是如何为古巴开拓了新的领域：

> 这种让菲德尔·卡斯特罗感觉眼花缭乱的前景将随着安哥拉胜利而开启————对菲德尔·卡斯特罗来说，没有"最黑暗的非洲"。非洲到处有火光在闪耀——那是革命者营地的篝火。只要卡斯特罗的古巴存在，非洲就有武装的古巴人，而且他们对于俄国人来说，将远胜于突击部队。菲德尔·卡斯特罗把这些武装人员看成是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的旗手。②

古巴的干涉对非洲在情感上的影响是很难预测的，然而它揭示的

① Gleijeses, *Conflicting Missiones*, p. 345.

② Herbert Matthews, "Forward with Fiedel Castro, Anywhere", *New York Times*, 4 March 1976，转引自 Gleijeses, *Conflicting Missiones*, 391页。

问题却很少被人们完全洞悉。如 1976 年 2 月一个专栏作家在《兰德每日邮报》(*Rand Daily Mail*) 中记录的那样:

> 不管大部分进攻是由古巴人还是由安哥拉人进行的,都是在战场上进行的无形的、与肤色有关的战争,因为事实是他们赢了,而不是白人赢了;白人在 300 年的殖民主义和帝国统治下享受和利用的心理优势悄悄地消失了。在安哥拉,白人精英论开始遭受不可逆转的打击,这里的白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1]

黑人也同样意识到了政治氛围的变化。约翰内斯堡 (Johannesburg) 外围的非洲重镇索维托 (Soweto) 的一所黑人高校的校长于 2 月告诉《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安哥拉"非常吸引"他的 700 名学生。"它给他们以希望,"他说。[2] 4 个月后,即 1976 年的 6 月,索维托——这座约翰内斯堡最大的城镇爆发了南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城市骚乱。古巴对安哥拉的干涉是其导火线之一。索维托青年革命者所崇尚的英雄是马尔科姆·艾克斯、毛泽东和切·格瓦拉。 256

由游牧部族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卡斯特罗和埃塞俄比亚革命 (1977)

安哥拉革命使卡斯特罗重新燃起了他长期以来对非洲的兴趣。他一直着迷于其革命的可能性,常常给予其比拉丁美洲更高的优先权。他仍痴迷于复兴古巴黑人之非洲根源的想法,但是现在他是第三世界的领袖。由于他成功地帮助了阿戈什蒂纽·内图,因此在 1976 年 8 月他被指定为不结盟运动的最高领袖。

卡斯特罗认为非洲比拉丁美洲更有希望,因为右翼军事独裁者一直在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以及乌拉圭实行着暴力和恐怖主义。

---

① Gleijeses, *Conflicting Missiones*, p. 346.

② *New York Times*, 21 February 1966.

1978 年，一位去哈瓦那的访问者听到卡斯特罗强调说，拉丁美洲“僵硬的社会结构”和“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使得其比非洲更难出现反抗活动，因为非洲“贫穷而缺少这种力量”。[1]卡斯特罗认为，拉丁美洲国家被困在一个由军队和教会编织而成的僵化的、保守主义的网中，受到商业公司、工会以及政党组织的支援和强化。相对而言，非洲是一页白纸。这种在卡斯特罗不情愿地卷入非洲复杂事务时显现出的认为非洲问题过于简单的观念，是他持续不断地去干预非洲事务的典型特征。不单单他一个人这样，其他人也有这样的误解。

除了帮助安哥拉和其他一些葡萄牙以前的殖民地之外，继 1965 年格瓦拉前往刚果的使命之后，古巴还一直在帮助非洲其他地区。来自非洲解放运动的要求很少停止过。一些人以索马里（Somalia）为基地，由古巴教官训练他们。厄立特里亚（Eritrea）的一些分裂主义者为脱离埃塞俄比亚控制而争取自由的斗争得到古巴人的帮助。横跨红海的南也门社会主义共和国亦然，从 1973 年起，古巴为其配置了 100 名教官。

索马里从非洲之角俯视着苏伊士运河和红海海湾水域，这里长时间被西方和东方视为一个敏感地带。一场冷战的对峙在这一地区持续了几年，对也门人民主义共和国、埃塞俄比亚以及索马里产生了政治影响。人们认为，1969 年上任的索马里统治者——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Mohamed Siad Barre）总统是站在苏联的立场上的，他允许苏联可以通过柏培拉（Berbera）进入索马里海军基地。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在海尔·塞拉西皇帝（Haile Selassie）统治下的，跨越欧加登（Ogaden）[2] 荒芜的边疆地区的埃塞俄比亚曾经是美国的亲密联盟，

257

---

① Robert Levine, *Secret Missions to Cuba*, *Fidel Castro*, *Bernardo Benes*, *and Cuban Miami*, New York, 2001, p. 91.

② Ogaden，索马里语称 Ogaadeen，是埃塞俄比亚东部索马里州的部分地区，面积约 2 万平方公里，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埃属索马里”（Ethiopian Somaliland），以与英属索马里、法属索马里和意属索马里相区别。19 世纪末，该地区被埃塞俄比亚征服并占领，1897 年得到英国的承认，与其签订正式条约划分了边界。索马里独立后，长期对此地区有领土要求。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两国曾为争夺此地区而进行了战争。参见 http://zh.wikipedia.org/zh/（2010－10－18）。——译者注

并建立了几个美国军事基地。1974 年 9 月，皇帝被推翻，连续几年其国家政治前途都呈现不确定性。

1977 年 2 月底，卡斯特罗进行了一次意外的、持续了几个星期的非洲之旅。使他重新感兴趣的是，对他而言的陌生区域内发生的真实革命燃起了他那原有的热情。埃塞俄比亚不稳定的政局最后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军官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上校所终结，他在 3 月 3 日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发动的一次流血政变中篡夺了政权。门格斯图表达了其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政体的意向，并向苏联请求帮助，促使美国宣布减少对埃塞俄比亚的资助计划，因为埃塞俄比亚反对人权。

埃塞俄比亚一直是非洲和亚的斯亚贝巴地区的主角，是非洲联盟组织的总部。一次左翼革命将对这一大陆产生重大影响，会促使埃塞俄比亚改变其在冷战期间的立场，影响到古巴现有盟友——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命运。西亚德·巴雷上校一直计划建立一个“大索马里”。他早期统治索马里的野心是把丢失的殖民时代划分给埃塞俄比亚并将一直被其占有的欧加登那广阔的荒凉区域并入索马里。亚的斯亚贝巴政权的更迭肯定会阻止这一野心。

这并非白纸一张，而是一个需要大做文章的地域。卡斯特罗需要进行实地考察，掌握非洲的情况。在一小撮最亲密顾问的伴随下，他立刻出发了。这些顾问对非洲的各个方面了如指掌，如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何塞·阿夫兰特斯（José Abrantes）以及他的共产主义者导师卡洛斯·拉菲尔·罗德里格斯。

他也寻求非洲方面的建议，于是在阿尔及尔机场停留，去拥抱胡阿里·布迈丁（Houari Bounmedienne）[①] 而且又在利比亚停留，与时任总统的卡扎菲（Gadafy）会谈，还参加了国民大会在特利波利举行的一次集会。然后，他飞至公然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南也门的首都

① 胡阿里·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e，1925—1978），阿尔及利亚国务活动家，前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总理、总统，原名穆罕默德·布哈鲁巴。——译者注

亚丁（Aden）。在结束同南也门总统萨里姆·阿里·鲁巴伊（Salim Ali Rubayyi）的两天会谈之后，他才去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Mogadishu）与西亚德·巴雷会谈。

卡斯特罗需要使用他所有的外交手腕。古巴和索马里是朋友，但据报道，埃塞俄比亚的革命太过激进。卡斯特罗在摩加迪沙足球场向索马里群众发表演说，毫不迟疑地强调了"古巴和索马里人民中间存在伟大的合作精神与兄弟情谊，正在并肩与帝国主义战斗"。

第二天，他飞往亚的斯亚贝巴，会见新的革命领袖。门格斯图给卡斯特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交谈了很长时间。卡斯特罗遇到的是一位革命同志，因此，现在对埃塞俄比亚革命的支持成为古巴人的首要任务。"我很了解门格斯图，"卡斯特罗在回哈瓦那的路上对《亚非》（*Afrique - Asie*）杂志的记者说道，"他镇定、聪明、胆大而勇敢，我相信作为一名革命领袖，他拥有非凡的品质。"[①] 258

卡斯特罗对埃塞俄比亚的发展充满信心。"2 月 3 日的事件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说，"'左'倾主义者和真正的革命领袖掌握了权力，这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过程。"他为自己看到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能使他回忆起法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深刻革命而激动万分。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开始了，"斗争的一方是工人和农民，另一方是业主和资产阶级"。显然，埃塞俄比亚革命正在受到国外阿拉伯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罪恶攻击，这一事实不就足以证明它的激进吗？

卡斯特罗与门格斯图秘密会谈了几天，他们商讨古巴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提供支援，在通过欧加登时将如何避免与索马里发生冲突。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间将发生战争，卡斯特罗认为这是无法忍受的。他制定了举行一次会议的方案，欲联合东非的"进步力量"，并且他说服门格斯图参与同索马里和也门的会谈。[②]

卡斯特罗主持的紧急会议在实行社会主义的亚丁召开。他企图说

① 西蒙·马雷（Simon Malley）对卡斯特罗的采访，见 *Afrique - Asie*，May 1977。

② Quirk, *Fidel Castro*, p. 763. 南也门总统萨里姆·阿里·鲁巴伊于次年，即 1978 年 6 月被赶下台。

服这3位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建立松散的反帝联盟，苏联将向该联盟提供帮助。这种安排将迎合索马里的要求，使得在欧加登和另一块古巴所感到为难的地区，即北部的厄立特里亚开放一些自治权成为可能。

这项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斗争双方之间的差异不可能消除。西亚德·巴雷回国后指责门格斯图的不肯妥协，而埃塞俄比亚人也一直关注着索马里领导人的扩张计划。会议在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结束，接下来门格斯图直接向卡斯特罗提出请求，请求古巴为其提供军事援助以对抗索马里可能发动的进攻。

卡斯特罗没有立即做出答复。这种决定不仅仅需要非洲的支持，还需要其他方面的支持。当时他正在继续他的非洲之旅，在北上去柏林和莫斯科之前——与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安哥拉以及阿尔及利亚的领导们会谈。新闻采访当中仍能看到他个人对埃塞俄比亚革命的热情。“可以说，我发现了非洲，”他在阿尔及尔向一位记者说，“就像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了美洲那样。”这是一个颇带暗示的声明。他的第一手非洲经历已经给他提供了新鲜的令人惊讶的，但并非不寻常的对当今世界本质的洞察力。

“在世界各地走走，”他告诉一个东柏林的听众，“你将学到很多，259 不仅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新殖民主义。”他继续描述他是怎样看非洲国家的：“从部落制度和游牧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这些都是有趣的现象，它们能够丰富我们的理念和策略”。①

今天，“非洲是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当他回到哈瓦那时，向《亚非》杂志解释说。“非洲存在着将社会制度直接从部落时期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化的完美机会，不需要像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那样，得经过社会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②

---

① 引自 Quirk，*Fidel Castro*，766 页。

② *Afrique – Asie*，May 1977. 卡斯特罗告诉西蒙·马雷，非洲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帝国主义在那里的统治不像在拉丁美洲这样的强势”。

卡斯特罗创造了一种新的精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游牧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只通过一个简单的跳跃。他不容置疑地向柏林惊讶的德国听众和俄国人解释他惊人的观点。他在回国的路上停留于莫斯科，受到整个苏联领导层的欢迎：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Podgorny）、柯西金以及葛罗米柯。对他们的盟国古巴来说，没有比这种待遇更好的了。在宴会上，勃列日涅夫向卡斯特罗敬酒，说他们都在"以同志般的关注"追随着他的非洲之旅。

卡斯特罗向他的苏联盟友叙述了与门格斯图的会面以及他对埃塞俄比亚革命的欣赏。毫无疑问，他后来向《亚非》杂志解说了他在苏联表达过的看法。"在一个农民实际上是奴隶身份的封建国家里，这是一场强大的群众运动和深刻的土地改革。城市改革已经实现，国家中的主要工业都已国有化。"他说，埃塞俄比亚革命的成功和巩固对非洲"非常重要"。在门格斯图的领导下，这个国家实现了"真正的革命"。当然，他将有资格接受苏联的支援。

如卡斯特罗预言的那样，埃塞俄比亚革命迅速向前发展。门格斯图命令所有美国军工厂于4月关闭。5月，他追随着卡斯特罗的脚步前往莫斯科，受到热情接待。卡斯特罗派遣古巴在安哥拉的总司令阿纳尔多·奥乔亚将军前往亚的斯亚贝巴评估埃塞俄比亚的军事需求。

7月，战争开始。索马里军队的4万名士兵和250辆坦克开始入侵欧加登。美国已经向他们开了绿灯，暗示将向他们提供武器。一年后，卡斯特罗告诉一名美国外交家："听说你们将资助西亚德·巴雷军火，希望触发这场战争，因为很明显，你们希望索马里胜利，并驱逐门格斯图，很难相信你们不是故意这样做的。"[①]

最初，古巴同意派遣一批军事教官帮助埃塞俄比亚人；9月，200名士兵被运往埃塞俄比亚。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在索马里又一次进攻欧加登之后，门格斯图向卡斯特罗请求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同时，西

---

① Wayne Smith, *The Closest of Enemies, a personal and diplomatic account of US – Cuban relations since* 1957, London, 1987, p. 132.

亚德·巴雷于11月把居住于摩加迪沙的所有古巴人和俄国人驱逐出境。和埃塞俄比亚一样，他已经改变了在冷战中的立场。

260 像早期对安哥拉所做的那样，在1977年秋，古巴开始向埃塞俄比亚派遣战斗人员，并于1978年1月开始提供武器。届时，古巴占主导地位。这一时期，苏联支持这一决定。古巴—苏联的联合行动开始实施，苏联提供运输，古巴提供军队。一部分军队从哈瓦那出发，另一部分从安哥拉和刚果—布拉柴维尔调派。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大约2.4万名古巴军人被部署在埃塞俄比亚。

正如古巴对安哥拉的干涉那样，它对埃塞俄比亚的干涉也具有决定作用，击败了索马里向刚果的进攻。1978年3月，奥乔亚将军率领埃塞俄比亚和古巴联军强行通过了基吉卡（Jijiga）通道，索马里军被迫撤离。4月，门格斯图访问哈瓦那，受到热烈欢迎。胜利后，古巴军队慢慢撤离。1979年1月，仍有16 000名古巴军人驻守在埃塞俄比亚。

卡斯特罗在埃塞俄比亚的旅行并非高枕无忧。在安哥拉战争中，古巴军队对此地并不陌生。因为罗安达是一个欧洲化的城市，居民使用葡萄牙语，古巴人有种像在自己国家的感觉。而在欧加登战争中就没有这样的热情。除了从莫桑比克购得的黑奴以外，古巴与东非没有历史渊源，古巴与埃塞俄比亚在文化上也没有任何共性。之前埃塞俄比亚被古巴曾经在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帮助过的派别视为敌人，现在却成为同盟，最好的结果也只是引起混乱。

自1970年起，倡导从埃塞俄比亚分离的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一直受到古巴的支持，而今，门格斯图在欧加登的胜利使他能够转移注意力去粉碎这一反抗组织。虽然古巴士兵没有被要求参加对付厄立特里亚的战争，但是他们驻扎在索马里边界，时刻准备迎击西亚德·巴雷军队的袭击，这就是对门格斯图最大的帮助，使他能安全地将部队转移到厄立特里亚北部的前线。

1979年9月，古巴军队最终撤离埃塞俄比亚，但门格斯图对埃塞俄比亚的统治又持续了12年。其间，他指挥了一场对付分离主义的长

期的战争，其间经历了可怕的饥荒时期。当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古巴军队结束他们陌生的非洲冒险之旅时，门格斯图的革命也早已结束。[①] 虽然卡斯特罗把门格斯图视为雅各宾派革命者，认为他将改变非洲的面貌，但是西方却把他看作另一个非洲独裁者，他的倒台受到人们的欢呼。卡斯特罗的非洲战争对非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非洲并没有因古巴的大量付出而给予其相应的回报，而且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执政时期，古巴与美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可能性也由于其在非洲的扩张而变得更加困难。

卡特时代的哈瓦那、华盛顿和迈阿密（1976—1979）

1976年10月6日，古巴击剑队在委内瑞拉比赛胜利后返回哈瓦那。他们的飞机从加拉加斯起飞，经停特立尼达和巴巴多斯，在从巴巴多斯起飞10分钟后发生爆炸。一枚定时炸弹被置于行李舱内。这是恐怖分子第一次炸毁民用航空飞机，73名乘客被炸死。[②] 这是美国9·11事件发生之前最严重的一次恐怖袭击。两名委内瑞拉人被控告在飞机上放置了炸弹，但人们认为其背后的操控者是那些古巴流亡者。两名前中情局成员奥兰多·博施（Orlando Bosch）和路易斯·波沙达·卡里勒斯（Luis Posada Carriles）在加拉加斯被捕并被判有罪。但是博施后来获释，波沙达越狱在逃。在以后的10年中，他们一直在进行反对古巴的活动。

爆炸发生后一个月，美国选举产生了一位新的民主党总统。吉米·卡特政府被普遍认为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辞职，福特总统的短暂过渡时期，对于越南战争的反战情绪等，

---

① 1991年5月，门格斯图遭到流放，在津巴布韦得到了罗伯特·穆加贝的庇护。他的下台是内部因素以及失去苏联支持的结果。埃塞俄比亚的军队受到了厄立特里亚和提格雷（Tigrayan）游击战胜利以及持续的分裂战争的影响，他们遂采取行动除掉他。厄立特里亚于1993年脱离埃塞俄比亚获得独立。参见 Francine Marshall，"Cuba's relations with Africa：The End of an Era"，Donna Rich Kaplowitz，ed. *Cuba's Ties to a Changing World*，London，1993。

② Ann Louis Bardach，*Cuba Confidential：Love and Vergeance in Miami and Havana*，New York，2002，pp. 186 – 189.

许多事情有待处理。卡特似乎想改善哈瓦那和华盛顿之间关系（自从1975年古巴远征安哥拉之后，这一关系处于阴暗时期）的想法在两个首都中一直被广泛争论，尽管确立一种和睦友好关系的愿望并不意味着有可能在一个短时期（不足3年的时间）内达成有效的协议。尼加拉瓜1979年的革命、1980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当选，表明乐观主义者高兴得太早了。

两个首都之间的持续会谈一直集中在极其特别的话题上。1973年2月，双方签订了协议，欲共同处理"劫机事件"，两国都表示要严惩劫机犯或引渡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家受审。巴巴多斯爆炸事件使古巴更加急切地希望中情局不再支持古巴流放者。

当理查德·尼克松当选为总统时，古巴与美国改善关系的所有可能都被阻止了。对于卡斯特罗，据说尼克松曾对他的一位助手说："等我当选为总统时，对那个讨厌鬼的态度将不会有任何变化。"古巴的《格拉玛报》（*Granma*）一改以往的谦恭方式，用纳粹标记拼写尼克松名字中间的"X"。[①]然而在1974年8月尼克松辞职之前，华盛顿方面的态度已经成熟了。美国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已经于4月份投票决定恢复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并且结束贸易禁运。

尼克松辞职后，亨利·基辛格对古巴表现出友好的态度。在他使共产主义中国不再被孤立后，人们认为他可能会与古巴达成妥协。他说，他认为"永久的对抗"[②]没有意义。1975年1月，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开始与古巴秘密商谈。商谈的主要问题仍是美国贸易禁运、补偿古巴因禁运而造成的损失问题、早年被古巴没收的美国财产的补偿问题。而在其背后，则是另外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关塔那摩军事基地的未来、古巴家庭的团聚和释放政治犯等。9月份，鉴于这些会谈取得

262

① Quirk, *Fidel Castro*, p. 731.

② 几位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前去该岛视察开发情况，其中就有在1972年被尼克松击败的民主党候选人、参议员乔治·马克高文（George Mcgovern）。1975年5月，他带着记者和商人前往该岛。

了成果，美国现在可能准备与古巴“进行对话”[①]的暗示出现了，但这未能实现。11 月份古巴对安哥拉的干涉使得这种可能性“冻结”，秘密会谈被搁置。

吉米·卡特于 1977 年举行了就职典礼。他须致力于实现这种可能，而且他的第一个法案就是命令美国停止向古巴派遣侦察机，放宽美国公民去古巴旅行的限制。[②] 3 月，秘密谈话重新开始。9 月，关于两国海域疆界的谈话最终达成一致，重新开放了华盛顿和哈瓦那的大使馆。[③] 它们将继续被称为“联络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仍行使正式大使馆的职权。1977 年开始时，这里有 10 名外交官，至 90 年代美国的“联络处”已经拥有 50 多名外交官，成为哈瓦那规模最大的外国大使馆。

大使馆的重新开放是卡特试图与卡斯特罗治下的古巴达成协议的最高点，更多的努力被他的幕僚中战略原则的不一致所破坏——事出于卡斯特罗对门格斯图的军事援助和美国为迈阿密的古巴流亡者所赞助的恐怖组织的失败。

华盛顿方面，在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④] 与国务卿塞勒斯·万斯（Cyrus Vance）之间出现了政治分歧。布热津斯基是一位苏联问题专家，他所关注的是在更广泛的冷战范围中力量的均衡，但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美古关系中的历史特殊性。他认为古巴是受苏联摆布的。尽管古巴已经从安哥拉撤出了一些军队，但 1977 年秋它仍向埃塞俄比亚派遣了军事教官，而且在 1978 年 1 月，其军队到达并开始参与欧加登的战事。布热津斯基争辩

---

① Quirk, *Fidel Castro*, p. 741 and Smith, The Closest of Enemies, London, 1987, p. 105.

② Smith, *The Closest of Enemies*, London, 1987, p. 105.

③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US State Department, Washington vol. LXXVII, December 1977.

④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其波兰姓氏也作 Brzeziński，1928 年 3 月 28 日生于波兰华沙。著名的波兰裔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地缘战略家、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7—1981），美国重量级智囊之一。http：//baike. baidu. com/view/128358. htm——译者注。

说，非洲的军事行动使得我们试图与哈瓦那恢复正常关系变得不太可能。[1] 一位古巴问题专家，美国驻哈瓦那“联络处”的头目韦恩·史密斯则批评布热津斯基倾向于按照“一些苏联征服世界的计划”来解释政治和军事问题。[2]

塞勒斯·万斯的观点与布热津斯基不同。他认为，美国没有重新组织内图政府，这为古巴对安哥拉的干涉打开了方便之门。“安哥拉人允许古巴人在安哥拉的原因”，他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是因为南非的再一次入侵以及南非对‘安哥拉完全独立民族联盟（UNITA）’的支持。”[3] 至于古巴对门格斯图的支持，则很难为之辩护，于是万斯在华盛顿的内部辩论中败北。

263

现在促进双边关系改善的努力降级了。即使双方都可以为此做一些努力，但任何一方都不会太迫切。国会希望理顺这无意义的争执，因为这是外交任务，但是他们没有太大的动力这么做。古巴同样不积极。卡斯特罗的主要兴趣在于请美国帮助控制迈阿密的恐怖组织，但是这从未实现过。古巴的军事和经济上的保障是与苏联拴在一起的，而且它们的基础是与第三世界发展新的友好关系。

当美国人民也不再关注古巴时，大多数美国商人受经济禁运的限制，希望看到贸易的恢复。他们没有理由害怕卡斯特罗，其在古巴不再拥有需要得到保护的资产。20 年前失去了财产的那些大公司，其损失也早就被一笔勾销了。新的一代需要寻找新的贸易机会。美国 100 多家公司的代表，包括波音公司、施乐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迪尔公司、卡特皮勒公司、保诚集团以及霍尼韦尔国际公司等在 1977 年前去哈瓦那，权衡与古巴贸易的可能性。[4] 卡斯特罗欢迎他们，但是没有明确表示他已准备作出让步，结束禁运。

然而，即使商界的压力已经动摇了华盛顿，但如果涉及贸易的解

---

① Smith, *The Closest of Enemies*, London, 1987, pp. 122 – 123.

② Smith, *The Closest of Enemies*, London, 1987, p. 128.

③ Cyrus Vance, *Hard Choices*, New York, 1983, p. 71.

④ Quirk, *Fidel Castro*, p. 772.

禁，大量的法律难题也使得美国对古巴的贸易举步维艰。一系列国际贸易法案使得美国政府拒绝对古巴进行所有援助，除非有利于对国家财富“迅速、充足而有效的补偿”。美国官方强烈反对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向古巴贷款。[1] 除非总统正式“确认古巴已经不再被控制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外国政府或外国组织所主宰或控制”，以1962年制定的《扩张贸易法》（Trade Expansion Act）为依据的贸易禁运就不会被解除。尽管古巴可能不是被主宰或控制，但其无疑是苏联阵营的成员。

古巴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去达成协议，但它不能不顾一切。卡斯特罗没有理由向美国低头。至于苏联，作为另一个超级大国，它似乎有必要与美国相互了解，但古巴就没有这样迫切的需要。这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要走自己的道路。虽然禁运遭人厌烦，但古巴需要长时间去适应它，并且知道怎样绕开它。

现在，古巴在第三世界有了新的朋友。20世纪70年代，古巴做了许多努力去维持与这些国家的稳定关系，恢复早年被证实为非常成功的友好关系，唤醒那些旧的辞令。其政策是非常成功的。10年中，古巴已重新修复了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皮诺切特政变结束了古巴与阿连德时期的智利建立的友好关系，但同一年，古巴与阿根廷出现的新的模糊的左派政府——庇隆（Peronist）政府重新牵手。一份贸易协定允许有益的交往，包括古巴购买在阿根廷制造的美国汽车产品。至1975年，古巴驻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拿马以及洪都拉斯等国的大使馆重新开放，而与加勒比海岛屿巴巴多斯、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巴哈马群岛及圭亚那的大部分第一次建立外交关系。 264

杰出的外国来访者开始莅临哈瓦那：一些是共产主义者，如勃列日涅夫、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以及范文同（Pham Van Dong），另一些来自西方阵营，包括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和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墨西哥总统

[1] Quirk, *Fidel Castro*, p. 742.

路易斯·埃切维利亚（Luis Echeverria）甚至带着一支街头乐队于 1975 年 8 月到达哈瓦那。[1]

古巴对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的军事支持可能遭到了华盛顿的指责，却使非洲更加信任古巴。在非洲大陆，古巴被认为走在反抗西方殖民主义战争的前列。在古巴不适合进行军事援助的地区，卡斯特罗就派出医生、体育教练和教师，这些项目使得古巴在第三世界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当古巴那些有经验的外交家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和其他许多国家的首都做了大量工作之后，古巴自然被选择为第三世界及其不结盟运动的领袖。1979 年 9 月，不结盟运动的最高级别会议在哈瓦那举行。

卡斯特罗对于自己作为第三世界革命领袖的新角色充满喜悦，因而不再有兴趣去修复与华盛顿的关系。他曾在美洲大陆特别关注的两项具体事务可以在迈阿密更轻松地做到。卡斯特罗需要结束自由派的恐怖主义，如受迈阿密遥控的巴巴多斯爆炸事件，这已变成古巴生活中永久的痛。猫鼬行动，即肯尼迪时代中央情报局的计划已经长时间被搁置了，美国政府也不再正式参与对革命的破坏计划。然而，中央情报局曾经帮助和建立的迈阿密古巴流亡组织一直自行其是。

卡斯特罗的另一个需要是跨越佛罗里达海峡与迈阿密的古巴人建立友好关系，弥合旧的伤口，使古巴大家庭重新团结一致。古巴的这两个需求是不可分开的，如果对乐于接受这种关系正常化结果的迈阿密流亡者采取适当的措施，自然会减少他们对激进恐怖主义者的支持。

---

① 1972 年和 1976 年访问古巴的总理和总统还有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1972 年 12 月）；阿尔及利亚的胡阿里·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ne，1974 年 4 月）；坦桑尼亚的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1974 年 9 月）；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sois Mitterrand，1974 年 10 月）；巴勒斯坦的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1974 年 11 月）；圭亚那的福布斯·伯恩汉姆（Forbes Burnham，1975 年 4 月）；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1975 年 6 月）；牙买加的迈克尔·曼雷（1975 年 7 月）；刚果布的马里安·恩古瓦比（Marien Ngoubi，1975 年 9 月）；巴拿马的奥马尔·托里墨斯（Omar Torrijos，1976 年 1 月）；安哥拉的阿戈什蒂纽·内图（Agostinho Neto，1976 年 7 月）；老挝的凯山·丰威汉（Kaysonme Phomvihane，1976 年 9 月）；几内亚比绍的路易斯·卡布拉（Luis Cabral，1976 年 10 月）。

265

自从美国政府不再有兴趣控制迈阿密的恐怖分子之后，古巴最好的策略就是试着减弱在流亡者组织内部对恐怖分子的支持。1978 年中期，古巴开始实施第一步计划。

古巴在迈阿密和巴拿马有自己的情报机构，并且一直在栽培一个富有的银行家——一个从 1960 年开始流亡的著名的卡特派人物。伯纳多·贝尼斯（Bernardo Benes）是迈阿密古巴流亡组织中的杰出代表，拒绝了流亡者主体试图孤立古巴的政策。贝尼斯于 1977 年 8 月在巴拿马进行商业旅行的过程中接触了几位古巴的高层知识分子［包括乔斯·路易斯·帕德隆（Jose Luis Padron）和托尼·德·拉·加迪亚（Tony de la Guardia）］，共同探讨了访问古巴的可能性。[1] 1978 年 2 月，他应邀访问哈瓦那，与卡斯特罗进行对话，他们商讨了单方面释放政治犯的问题。贝尼斯把他与哈瓦那的这个秘密协商告知了白宫，这个美国总统长期关注的问题将会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这一动议开始又遭到了布热津斯基的反对。他会见了贝尼斯，拒绝为此想法做任何事情，表示除非古巴人把从非洲撤军提上日程，美国将不会与古巴有任何正式的对话。万斯却对此比较感兴趣。由于卡斯特罗并没有向美国提出任何交换条件，万斯命令他的古巴事务顾问密切关注此事的进展。

主动权现在仍在卡斯特罗一方，他继续把贝尼斯当做他在迈阿密流亡者世界的眼线。1978 年 9 月，他宣布迈阿密流亡组织的代表已经受邀访问哈瓦那。他们将讨论两个重大问题：释放政治犯和增加家庭互访，即让流亡者们回国探亲。银行家贝尼斯一直在迈阿密努力工作，把愿意接受挑战的与他有共同想法的流亡者组织在一起。

10 月，当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同贝尼斯和 6 名美籍古巴人会见时，他概括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他说他承认，不能把所有的流亡者

---

① 贝内斯称自己在哈瓦那大学和劳尔·卡斯特罗一起踢过足球。伯纳多·贝内斯访问古巴的详情可见 Robert Levine, *Secret Missions to Cuba*, *Fiedel Castro*, *Berbardo Benes*, *and Cuban Miami* , New York, 2001。

都称为“反革命者”[1] 而遣散。他还说，他乐于“迅速地实现”被拘禁于古巴的犯人的释放“程序”，并迅速地重组古巴人的家庭。于是，贝尼斯得以带着46名政治犯坐飞机回到迈阿密。此事被描绘为古巴流亡组织的胜利，然而这也是卡斯特罗的重要突破。[2] 从此，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而不是经由华盛顿来处理与迈阿密有关的事情。

为与卡斯特罗进一步会谈，贝尼斯于11月回到哈瓦那。这一次他带回一大群美籍古巴人，据称是由75人组成的委员会。他们的讨论卓有成效。据卡斯特罗的统计，当时有3 238名囚犯因叛国罪被拘禁，另外有巴蒂斯塔统治时期的425名罪犯。现在，他们将以每个月400人的频率被释放。[3]

266 卡斯特罗还告诉这个75人委员会，他现在将允许所有在国外的古巴人访问古巴，但那些希望发动“圣战”的恐怖分子和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除外。同时，批准古巴人出国旅行的规则将放宽。

但古巴面临的一个明显难题是有人运送行李时会夹带炸弹。[4] 对于这个问题，人们想到可以在哈瓦那建立美元商店，使回来探亲的流亡者在哈瓦那为家人购买礼物。贝尼斯已经受到迈阿密反卡斯特罗集团的威胁，古巴所有人对巴巴多斯爆炸事件仍记忆犹新。探访者和美元商店也成为古巴政府中一个新的、绝妙的硬通货来源。

古巴与佛罗里达之间的关系开始步入一个新时代。在整个1979年，大约有10万多名美籍古巴人享受了卡斯特罗提供的优待，来古巴旅行并探望自己的亲人。每天有6次航班。最终，他们把大批的钱财带给自己在古巴的亲人，与成千上万在美国的拉丁美洲移民把汇款寄达南美南部和中部的亲人如出一辙。古巴在1979年和1980年期间从探亲者手中获得了上亿美元的钱款，而在以后10年的汇款中，古巴将

---

① Levine, *Secret Missions to Cuba*, p. 118.
② Smith, *The Closest of Enemies*, London, 1987, p. 163.
③ Levine, *Secret Missions to Cuba*, p. 130.
④ Levine, *Secret Missions to Cuba*, p. 129.

获得巨大的利益。[①]

这一新政并未结束美籍古巴人对卡斯特罗的敌意，而且这种敌意在以后的25年中时而增强，时而减弱。这一政策也没有结束迈阿密和其他地区的小群体对恐怖主义活动的支持，但它还是改变了一些事情，不仅减少了犯人的数量，而且减少了无情的革命为数千个家庭带来的痛苦。

流亡者的探亲活动对古巴社会产生了深刻的、也可能是出乎意料的影响。美籍古巴人带来了美元和美国杂志，购买礼品，是持久的消费者。与革命所倡导的相悖的另一种生活方式正在展示出来，而且必将越来越吸引那些只知道社会主义的朴素生活方式的年轻一代。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要找机会离开古巴。

第二次移民：马列尔偷渡事件（1980）

马列尔港是哈瓦那以西处于首都高速公路尽头的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工业城镇。由于它拥有古巴岛上最大的水泥厂和最大的造船厂、大型发电站，因此几乎没有一处可供旅游的胜地。在1980年的4月到10月的6个月内，大约有125 000名古巴人从这里乘小船去佛罗里达寻找新的生活。这一大批出走事件被称为“马列尔偷渡事件”。与此同时，正值波兰发生团结工会运动，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领导的团结工会反对共产党的政府。古巴出现的那件惊人的插曲威胁了卡斯特罗政府的稳定性，这被美国认为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政治进一步衰落的标志。 267

1980年，对古巴政府、特别是卡斯特罗来说是艰难的一年。他最亲密的朋友、自蒙卡达兵营起义之后即担任他的秘书、助手和政治顾问的赛莉亚·桑切斯于1月死于肺癌，从而使得最高领导人失去了能给予安慰和忠告的朋友。更多的忧虑包括12月苏联对阿富汗的进攻。1979年，卡斯特罗亲苏的立场只会破坏他曾感到自豪的在不结盟运动

① Smith, *The Closest of Enemies*, p. 198.

中的领导地位。经济的前景也不容乐观，蔗糖产量下降，其在世界市场中的价格也在下降。配额开始缩减，经济的紧缩又一次成为发展的趋势。[1]

4 月初，国内的不满情绪开始高涨。一小撮寻求庇护的古巴人开着一辆卡车冲进哈瓦那米拉莫（Miramar）区的秘鲁大使馆，执勤的古巴看守被杀。秘鲁大使拒绝交出寻求庇护者，因为这是他的权利，于是，古巴当局撤出保护大使馆的卫队。数天内，大约 1 万名古巴人在使馆区内寻求庇护。

卡斯特罗按照当年西班牙总督的方式，开始实施危机时期的个人控制，亲临米拉莫区的一处房舍指挥行动。《格拉玛报》的一篇社论声称，寻求庇护者大多是“罪犯、无业游民、反社会主义分子、游手好闲者以及寄生虫等”。他们没有人受到过“政治迫害，他们也不需要神圣的外交庇护”。[2] 一份政府声明称他们为“残渣余孽”，即放弃祖国，追逐奢侈消费的人。现在，共产党在那些进入大使馆的人们的家门外组织了敌对性的示威（mítines de repudio），一支庞大的抗议示威队伍集合起来向大使馆进军。[3]

经过持续很久的谈判之后，大使馆中寻求避难的 1 万多人被允许乘飞机前往哥斯达黎加。在哥斯达黎加，当他们继续其利马之旅前，受到国际媒体的强烈关注，当然，这里不是他们想要去的目的地。大多数人遭到美国的拒绝，因为卡特总统只允许 3 500 人入境。他们进入美国同离开古巴一样困难。

两天后，卡斯特罗停止了飞往哥斯达黎加的航班，他宣布任何想离开的人都必须获得准许。这时，危机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成千上万名古巴人立即迅速抓住这个机会，的确比卡斯特罗想象的要多。卡特总统也同样鲁莽，宣称美国将敞开胸怀接纳他们。“我们是一个难民国家——我们将继续敞开心扉，热情欢迎那些从共产主义统治区

268

① Smith, *The Closest of Enemies*, p. 198.

② Llovio - Menéndez, *Insider*, p. 383.

③ Pérez - Stable, *The Cuba Revolution*, p. 150.

出来寻求自由的难民。”①

在取得卡斯特罗同意的前提下，迈阿密的古巴人所组织的大批民众开始出走，上百只小船由佛罗里达驶往马列尔港。4 月 24 日，有 94 艘船只驶入，第二天有 349 艘，26 日又有 958 艘。由于数千名古巴人要求离境，古巴设立了专门的官员来处理他们离境的事宜。监狱、拘留中心和精神病医院少了很多人。

4 个月后，美国已经受够了。这种大规模的移民在政治方面产生的影响对于将于不久以后的 11 月再次参与总统选举的卡特政府是不利的。古巴人不再局限于佛罗里达，移民中的失业者和犯罪子分散布在美国各个监狱，从阿肯色州（Arkansas）到亚特兰大（Atlanta），甚至整个国家都受到影响。不久，一系列新的谈判开始进行。10 月，大批的移民最终停止了。这一插曲对卡特来讲是个灾难，这加速了他在与罗纳德·里根竞选中的失败。

几年后的 1986 年 3 月，由马列尔离境的将近 2 000 名古巴囚犯仍然居住于亚特兰大的拘留所。按照监狱官员的说法，从 1981 年起，有 9 名杀人犯、7 名自杀者、400 名严重的自杀未遂者以及 2 000 多件严重的事件。② 卡斯特罗打开无限制移民的闸门的气度，是用来对付美国的强大武器，但对于美国来讲，由于它跳出来与古巴作对，多少有些自作自受的味道。马列尔偷渡事件反映了古巴广泛存在着不满情绪，是对古巴革命的反面宣传。在过去 3 年中哈瓦那和华盛顿之间形成的相互谅解关系现在很快地消失了，卡特知道与古巴这个被人们认为是不幸的、许多人想离开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是不会拉到选票的。

许多年来，大批西方记者第一次来到这个岛屿时都相当兴奋地讲述它的故事。古巴政府确定无疑地表示，古巴人民对那些出走者的敌对态度一直坚定不变，以显示大部分人仍然忠于革命。那些移民被官方描述为“无业游民”，然而，大多数出走者的动机与这一时期那些

---

① Quirk, *Fidel Castro*, p. 809.

② Rafael Fermoselle, *The Evolution of the Cuban Military*, *1492—1986*, Miami, 1987, p. 6.

来自加勒比诸海岛或者中美洲的逃离者的动机别无二致，他们只是想在美国寻找一种更好的生活。[1]

佛罗里达对他们的接纳不像他们希望中的那么友好，在从马列尔港出走的这一代移民中，多数是黑人或黑白混血儿，他们来自古巴社会中比较贫穷的地区。他们抓住这个机会，是因为想改善自己的经济条件，但是他们多数一无所有，只能赞誉其所得到的一些免费服务——包括医疗、教育和健身设施等方面的，因为他们在古巴已经习惯于这些服务。这不是老一代流亡者想听到的消息，且新一代移民加速了流亡组织中已存在的分裂，这个组织已被伯纳多·贝尼斯率先倡导的一系列措施所打乱。

269

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的革命（1979）

1979 年 7 月，即马列尔偷渡事件的前一年，在经过短期的起义战争后，尼加拉瓜的桑地诺党革命者胜利地冲进马纳瓜（Managua）城。用暴力革命推翻苏穆萨的独裁统治，这一事件看起来似乎是古巴革命的副本，是格瓦拉所梦想的一次游击战争的胜利。像古巴那样，一小股武装打败了正规军并掌握了权力；像古巴那样，人们起来推翻了可恶的独裁者；像古巴那样，这个国家曾因被美国占领而千疮百孔。美国海军陆战队曾于 1912 年至 1933 年间驻扎在尼加拉瓜，并于 1927 年至 1933 年间受到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Augusto Cesar Sandino）——尼加拉瓜的何塞·马蒂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攻击。[2]

1979 年尼加拉瓜的胜利重新引起了人们对拉丁美洲的兴趣，就像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古巴和 70 年代早期的智利一样。外国游客涌向马纳瓜，如他们曾经去过哈瓦那和圣地亚哥那样，去呼吸革命的醉人芬

① Sebastian Balfour, *Castro*, London, 1995, p. 137.

② 桑地诺发动的游击战有这样的宣言：“要自由国家，或者选择死亡（Patria Libre o morir）”。当 1933 年美国从尼加拉瓜撤军后，桑地诺下了山，但不久他就被美国任命的国民警卫队长官阿纳斯塔修·索莫扎（Anastasio Somoza）杀害。索莫扎本人于 1956 年也被谋杀，其子接替了他的位置，也叫阿纳斯塔修。

芳。古巴人可能会一时感到历史又一次站到了他们这一方，但是卡斯特罗却比较谨慎。自1967年格瓦拉死后，古巴革命运动放弃了对拉丁美洲游击战的公开支持，但是它却很难阻止其他人重整革命旗帜。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中美洲组织和重新组织起来的左派运动更多地应归功于其自身历史经验的力量，而不是吸取古巴的范例，如危地马拉、萨尔瓦多（El Salvador）和尼加拉瓜都拥有过长期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游击组织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由曼努埃尔·皮涅罗领导的古巴秘密行动机构的帮助和抚慰，但是它的特别机构的重要性却在逐渐弱化，其继续存在的很大原因在于情感方面。[①] 一些革命者会以个人名义在古巴驻留，特别是尼加拉瓜的托马斯·博尔赫，而卡斯特罗对于一些革命群体则很谨慎，但是他的主要任务是劝说那些固执己见、以自我为中心的领袖们，只有团结才能成功。[②]

当桑地诺党获得胜利时，古巴人感到不安。卡斯特罗不希望他们这么快成功，于是迅速地指出，这次革命与古巴革命的不同之处与相似之处同样重要。然而出乎卡斯特罗意料的是，桑地诺党却投入了他的怀抱，并且在没有正式邀请的情况下，桑地诺党的几位高级领袖在他们胜利之后立即飞往古巴，去参加每年7月26日在奥尔金（Holguin）省举行的蒙卡达庆典。卡斯特罗在热烈的欢庆气氛中参加了庆典，但是他的演说相当得体，恰似那些谨慎而老道的政客： 270

每个国家有它自己的道路、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方式以及自己的目标。我们有我们的，他们有他们的。我们用某一种方

---

① Jorege Castaneda, *Utopia Unarmed: The Latin American Left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1993. pp. 51 – 89.

② 一份报告中提到，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同5个来自萨尔瓦多的组织进行会晤时，将一只M – 16步枪放在桌上，要求大家将手放在上面，以此作为联合的标志。由此，法拉本多·马蒂（Farabundo Marti）民族自由阵线诞生了。他们于1981年1月，即罗纳德·里根就任美国总统之时在萨尔瓦多开始了游击战。见 Raymond Bonner, *Weakness and Deceit, US Policy and El Salvador*, London, 1985, 96页。20世纪70年代前期建立民族自由阵线的雏形桑地诺党（Sandinista）时，争论不休的各个组织也是如此行事的。

式——我们自己的方式——而他们将用他们的方式……两种革命是不同的，它们也不可能相同……我们的问题也不会恰好是他们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发生的条件与他们革命的条件不是完全相同的……或者说，尼加拉瓜发生的情况与古巴的情况不是完全相同的。[①]

桑地诺党的胜利使古巴进退两难。因为其自身的利益，古巴人欢迎桑地诺党的胜利，因为尼加拉瓜将是一个对古巴有益的大陆盟国。然而，它的存在为美国和苏联增加了新的问题。所有人都能一眼看出的尼加拉瓜事件与古巴经历的相似之处就在于美国干预的可能性，卡斯特罗煞费苦心地提醒桑地诺党不要徒然地反对美国。他建议他们集中力量建立一个多元混合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并且尽量与天主教会保持良好的关系，天主教对尼加拉瓜的影响力远大于其对古巴的影响。[②]卡斯特罗不希望尼加拉瓜的中产阶层消失，如古巴曾经出现的那样。

桑地诺党听取了卡斯特罗的意见，但是他们自身革命的发展难免与美国发生冲突。当 1981 年 1 月罗纳德·里根接替了卡特时，美国试图横扫蔓延这个地峡的整个反抗潮流。这也是古巴的艰难时刻，因为卡特时代萦绕于岛屿上的那个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梦想在一夜间破灭了。

对于没有经验的桑地诺党，这更是一个艰难的时刻。给他们带来权力的政治统一体瓦解了，统治集团中较为保守的势力离开了。由于这次革命之激进的特点，数千名专业人士离开了这个国家，去迈阿密和哥斯达黎加立足。很快，反革命武装尼加拉瓜反抗军（Contras）组织起来进行游击战来反对政府。20 世纪 80 年代，在中央情报局的经费资助和建议下，反抗军始终保持低强度的攻击，这将慢慢消磨掉桑地诺党人的防御。

卡斯特罗第一次与与桑地诺党领导人谈话时已承诺为其提供教师

① 1979 年 7 月 26 日卡斯特罗在奥尔金（Holguin）的演说。

② Smith, *The Closest of Enemies*, London, 1987, p. 181.

和医生，但是不久他送去了军事教官和武器。苏联也向桑地诺党人送去了军事教官和武器。然而，如在安哥拉那样，本质性差异很快出现了。几年后，古巴派驻马那瓜的军事教官内斯特洛·佩斯·古巴（Nestor Lopez Guba）将军写来报告说：

> 桑地诺党人同时拥有古巴和苏联的军事教官，但我们的建议总是不能获得赞同——苏联总是强调其庞大的、专业的、有着精密技术的正规军的作用。而我们相信，尼加拉瓜需要的是一支能够消灭他们所面对的这股非正规武装力量的军队，这是正规军无法对付的军队。

古巴的观点基于他们于60年代早期在安哥拉和埃斯坎布雷山区的经验。苏联则回溯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在竞争观念和军队结构上仍有分歧”，佩斯说道，“这种分歧也是我们在安哥拉和非洲其他地区面临的。”必须以非正规战争的方式而不是大规模的正规军的战斗来对付非正规的武装。“必须由志愿者来进行战斗，”这就是古巴“如何在中央山脉地区击败了强盗。”①

尽管桑地诺党人的胜利成为世界头条新闻，但是同年早些时候在格林纳达岛上发生的革命更合卡斯特罗的意。1979年3月，在这个仅有10万人的小岛上出现的一场革命，即新宝石政治运动（新政运动）是一个按照古巴模式建立的政治组织。② 一场黎明的袭击推翻了腐败的埃里克·盖里（Eric Gairy）政权，这甚至被形容为格林纳达的“蒙卡达”。这次运动的领导人莫里斯·毕晓普是一位古巴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激进分子，他向卡斯特罗寻求启迪和帮助。格林纳达革命者拜倒在了卡斯特罗的脚下。1979年9月，毕晓普在哈瓦那的不结盟会议上

---

① *Making History, Interviews with Four Generals of Cuba's Revolutionay Armed Foreces*, New York, 1999, pp. 33 – 34.

② 格林纳达在一位20世纪50年代就是长期的工运组织者和格林纳达人民党（即后来的格林纳达联合工人党，GULP）领导人埃里克·盖里（Eric Gairy）的领导下，于1974年2月从英联邦独立出来。新宝石运动是由莫里斯·毕晓普和尤内森·惠特曼（Unison Whiteman）领导的反对盖里的运动，该运动出现于1973年，即格林纳达独立前一年。

发言说，“关于社会主义如何在小国取胜，如何解决医疗、教育、就业及消灭贫穷、卖淫、疾病等问题方面”，古巴是世界上最好的例子。[①]

后来，当里根政府对格林纳达与古巴的友好关系表示担忧时，毕晓普发表了与卡斯特罗同样措辞华丽的演讲：“任何国家都无权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如何管理我们的国家或者我们应该与谁保持友好关系——我们不是任何人的后院，决不任人摆布。”

当英属加勒比海上的那些岛屿独立时，卡斯特罗一直扶植他们，并且在牙买加首相迈克尔·曼利（Michael Manley，1972—1980 年在职）那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曼利与卡斯特罗对于世界的看法是相似的，与华盛顿也有相似的难题。当他增加了对美国铝矿公司的税收时，美国切断了对他经济援助的来源。古巴向他提供大量技术和医疗上的帮助，两位领导人经常会面。[②]

格林纳达是一个类似的例子。与毕晓普的交谈是令人愉快的，且给卡斯特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关系，与卡斯特罗和曼利及门格斯图的关系相似。但卡斯特罗与毕晓普的关系可能有其消极的东西，因为这种关系可能使卡斯特罗看不清一个事实，即尽管毕晓普在革命中是出类拔萃的，然而在革命队伍中他的领导能力并不是毋庸置疑的。

272

卡斯特罗承诺提供医药帮助，很快在这两个岛屿之间建立了一条直航通道。古巴为格林纳达的学生提供奖学金，不久大约有 250 名学生去古巴学习。古巴还提供一些军事装备和大量的顾问。而最吸引人眼球的项目是在萨林斯角（Point Salines）建立的新机场，意在帮助格林纳达参与加勒比海域繁荣的旅游业。古巴向格林纳达提供建筑工人和机器设备，其总价值为 4 000 万美元，是机场建设总费用中最大的一块。1979 年 9 月的签订协议说明，这项工程将于 1984 年 3 月竣工。

---

① Tony Thorndike, *Grenada*: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London, 1985.

② 迈克尔·曼雷（Michael manley）于 1975 年、1978 年、1980 年对古巴进行了多次国事访问。卡斯特罗于 1977 年回访了牙买加。

这个机场立即引起争议，不久被美国视为苏联、古巴的基地。“它所威胁到的不仅是加勒比海和中美洲，”里根总统在谈及格林纳达的主要出口时称，“而是美国的国家安全。”[①]

格林纳达政府面临的不仅是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到1983年10月，格林纳达内部的分歧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伯纳德·科尔德（Bernard Coard）领导的新政运动中的极端分子逮捕并软禁了曼利。作为旁观者，卡斯特罗不能帮助他的被保护者，只送去了一封信说，分裂将“大大损害革命的形象”，毕晓普“在古巴是受人尊敬的”，他写道，“很难对此事件进行解释”。更糟的还在后面，当支持曼利的群众来解救他时，他连同其他几名内阁高级成员一起被士兵们抓住并被枪杀。卡斯特罗惊骇不已，他在政治和个人感情方面都遭到了严重损失：“任何教条、任何规则、任何观念都不能认为这是革命行动，没有任何内部分裂能对如此残暴的事件——对曼利的人身消灭——进行辩护，这位杰出的、可尊敬的领导人在昨天去世了。”[②]

不到一星期，即10月25日，一支美国军队入侵格林纳达。出现了微弱的抵抗，几个古巴人被杀。古巴工人被集中到机场并被驱逐出境。一个在加勒比海施行另一种发展模式的尝试被完全摧毁了，同时也是对古巴的另一次警示，它在一个特别不利的位置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

---

① 罗纳尔德·里根在1983年3月23日的演说中宣布战略防御行动（星球大战计划）开始启动就是针对这一航空港的。

② *Granma*, 20 October 1983. 毕晓普的对立派强烈反对“在菲德尔和毕晓普之间的深厚个人情谊，这导致古巴对格林纳达革命发展过程的领导地位带有‘个人’的而非‘阶级’的倾向”。

273

第八章　孤立的古巴（1985—2003）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莫斯科的新秀（1985）

19 世纪西班牙的革命经常给其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带来严重的困难和动乱。1991 年苏联解体以后，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古巴。苏联已经为古巴的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 20 年的财政支持，也是 30 年来古巴军事安全的保障者，所有的这一切在顷刻间全部消失了。自从 1985 年 3 月苏联有了一位新的领导人，即近年来苏联的第 3 位领导人，以上发生的这一切就成了定局。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这位以改革者著称，相对比较年轻的人，在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相继迅速去世后被任命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甚至在当时，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历史上的出现已经被看做是可能会给它的半殖民地古巴带来巨大麻烦的一次地震性事件。对于像卡斯特罗这样密切追随苏联发展达 1/4 世纪之久的老练的政治家来说，当一个新的最高领袖与一种全新的行事日程出现时，必然要给予相应关注。但是，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古巴将要面临多大程度的灾难。

早在两年前，当俄国人正式解释自 1962 年 10 月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开始实施的苏联防务保障将不再扩大到古巴岛时，古巴人就对此产生了反感。古巴人的烦恼开始于 1982 年 11 月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上任

的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虽然勃列日涅夫在20多年间加强了和古巴的直接关系，但安德罗波夫却要否定他所做的许多工作。1983年3月，负责古巴国防事务的劳尔·卡斯特罗被召到了莫斯科，并被安德罗波夫告知一些勃列日涅夫曾回避讨论的一些真相的细节。

安德罗波夫对劳尔解释道，依据80年代苏联外交部的拉美专家尤里·巴浦洛夫（Yuri Bavlov）的说法，苏联的将不再实施战略保障。274 "由于区域因素以及在战时苏联不可能保持和古巴之间如此长距离的交流，因此苏联将不会派遣武装部队去保卫古巴。"[①] 当然，古巴也同样被排除在苏联的核导弹体系之外。

劳尔·卡斯特罗回到了古巴。除了俄国将以相对便宜的价格为古巴提供常规武器这个附加的承诺外，他什么也没有得到。另据巴浦洛夫所说，这些补充的苏联武器将会在1983年和1990年之间运到古巴。现在由于缺乏苏联的保证，劳尔开始以"人民战争"的名义组织古巴国防力量，以抵抗可能出现的美国进攻。全民动员将代替古巴革命早些时候对苏联帮助的依赖。

安德罗波夫已经认真地解释了其新战略的现实性。戈尔巴乔夫也将对经济实行同样的策略，但是菲德尔打算先发制人。从70年代早期开始，古巴人就接受了苏联正统经济学家的建议。自1972年成为经互会的成员国以来，古巴已经把本国经济和苏联阵营紧密地绑在了一起。十几年来，古巴的整个经济形势是乐观的，长期以来持续增长，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其平均增长率达到了4.1%。但是到80年代中期以后，古巴经济开始衰弱，与非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古巴严重缺少硬通货。世界市场上蔗糖的低价以及连年的干旱和飓风，再加上西方市场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造成了古巴外汇收入的减少。[②]

---

① Yuri Ravlov, *Soviet – Cuban Alliance, 1959—1991*, Boston, 1994, p.61.

② Andrew Zimbalist, "Perspectoves on Cuban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for the 1990's," in Alistair Hennessy and George Lambie, eds, *Fractured Blockade: West European – Cuban Relation during the Revolution*, London, 1993.

1986 年 2 月，卡斯特罗颁布了一项抛弃了许多旧苏联模式的新的改良型经济计划。一些人把它看作是一次“指令性”经济的回归，这在早期苏联意识形态中比较盛行，但是不可能受到修正主义者戈尔巴乔夫的欢迎。有关这个计划的策划文件被呈交给了第三次古巴共产党代表大会，新的计划毫无保留地被命名为“纠正错误和消极倾向的进程”。[①]新的计划倾向于放弃早在 10 年前由胡姆贝托·佩雷斯（Humberto Pérez）起草的国家经济发展计划，这个计划现在被视为远离现实。佩雷斯也被别人取代。[②]

这份新计划论述了 3 个问题：最直接要做的是处理外汇危机；长远来看，要改组经济结构以减少对进口产品的依赖；更加有争议的政治性需要是修正原有的战略政策，以切·格瓦拉曾经提倡的精神鼓励来取代物质动力。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依赖于技术上的解决：对外债务暂推迟偿还；自行设计机械以重建对对外贸易的集中控制；发起了一场以促进非传统产品出口为目的的运动，这个计划也被看作是缩减消费的计划。[③]

275 这场特殊的纠偏运动有一些要素。对于经济决策更加集中的“指令性”体系的回归，目的是要增强国际竞争力和提高经济效率。政府将会减少津贴，同时引进更多精确的盈利性的措施和更加合理的政府管理策略。为了重现格瓦拉主义者建立一个更加道德的社会的景象，政府希望每个公民都应对自己的行为更加负责。

这项计划在涉及废除几个早期引进的比较受欢迎的措施时引起了争论。这些措施是农民所谓的“自由市场”；手工业市场；为增加产量授予“激励奖金”的条款；把私人企业引入广阔的商品和服务领域中；以及个人可以出售、出租以及建造房屋的政策。如果农民市场被废除了，倘若没有更好的办法，国家将不得不提供类似的设施。

---

① Sebastian Balfour, *Castro*, London, 1995, p. 146. 随后还有一场演说是 1986 年 4 月 19 日在希龙海滩（Playa Giron）纪念会上进行的。

② Balfour, *Castro*, p. 148.

③ Zimbalist, ' Perspectives on Cuban Development.

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关心的是古巴过分地依赖外来粮食的供应，需要生产更多的本土粮食，这也是推动整改的一大动力。粮食计划的实施是要使国家供应的食物比农民自由市场供应的粮食更为便宜的一次尝试。卡斯特罗后来解释道："如果这只是一个生产香蕉、马铃薯、蔬菜和水果的问题，那就让国家来做吧，因为国家具备所有必要的资源。"[①] 为地方粮食生产所提供的机械设备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操作，但是对古巴来说幸运的是，在1990年，当他们与苏联、东欧的传统供应关系破裂时，这些设备已经到位了。

整改方案是一次对改革实践的含蓄的反对——市场角色的膨胀以及对物质动力日益增加的依赖——这些改革已经在东欧社会主义经济中已经有过实践经验。古巴再次迈出了不协调的一步。1986年3月，当卡斯特罗第一次与戈尔巴乔夫进行长谈时，这种变化已经在进行之中。在演讲和私人会谈中，苏联政策的新方向已经十分清晰，卡斯特罗也已经对戈尔巴乔夫所透露的信息表达了他的不满。现在他首先必须要做的就是听苏联如何解释，但是他并不喜欢他所听到的东西。

戈尔巴乔夫所使用的关键词"政治公开性"（Glasnost）和"经济重建"（Perestroika）——即提高政治的公开性和经济的重组，可以解释为对古巴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的苏联内部事务，但是在其施政方略中的其他措辞则更加令人担忧。苏联领导人和里根总统寻求东西方缓和的做法注定要产生负面效应。卡斯特罗早在60年代会见阿列克谢·柯西金时就遭遇了挫折——他并不喜欢这种经历。

当卡斯特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古巴的领导人还没有确切地对苏联政策的变化构想出相关的政策。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这 276 位上了年纪的强硬的共产主义者虽然现在即将退休，但依然是古巴的一名副总统。在年初时，他对苏联的"经济重建"计划发表了赞成的言论。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经济互助会议上，他提到，"空想的和动

① 引自 Sergio Roca, "Reflection on Economic Policy: Cuba's Food Programme," 见 Jorge Perez - Lopez, ed. *Cuba at a Crossroads: Politics and Economics after the Fourth Party Congress*, Gainesville, Fl., 1994, 96 页。

摇的情绪在苏联的盟友中已经扩展开来”。他表示愿意“将古巴的发展”与这些国家“联系在一起”。[①]

卡斯特罗并不同意罗德里格斯这种缓和的观点，最终在1988年12月他阐述了自己对苏联发展的关注：“我们真诚地支持苏联的和平政策，但是和平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有不同的含义。可以确定的是，美国所考虑的和平方式是霸权主义，即与苏联保持和平，但是与小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是完全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战争。”卡斯特罗概括了古巴和苏联外交政策的不同。

戈尔巴乔夫有其他优先考虑的全球战略，所以直到1989年4月他才第一次访问古巴。在整个访问过程中，他举止礼貌但是也直言不讳，对于经济战线上即将发生的事情给予充分警示。他告知这位古巴领导人“正如生命总要前进一样，新的需求将会建立在我们双方互利的原则之上。这尤其适用于经济合作方面——他们将更加充满活力并更有效，为两国带来更高的回报。”在公共场合，两位最高领导人签署了一份新的为期25年的合作协议。私下里，戈尔巴乔夫向这位老的经济伙伴阐明，苏联将会不得不逐步取消保持古巴长期以来相对繁荣的价格补贴，但是还有更多的东西。以后，俄国人将会用美元支付他们购买的商品。

这些消息比卡斯特罗预想的要更加糟糕。7月，在卡马圭的演讲中，他重新提到古巴和苏联的差异，以警惕可能孤立古巴的国家。他批判了波兰和匈牙利采取的“亲资本主义政策”，并指出这和古巴的整改方案不能相提并论。提到苏联的改革，他准确地预言，这场改革将会导致分裂或内战。[②] 卡斯特罗已经准备好带领古巴人民走上前面困难重重的道路。

---

① Ecominist Interlligence Uni. Country Report：Cuba，no. 4. 1986.

② 卡斯特罗于1989年7月26日在纪念蒙卡达大会上说：“我们不得不警告帝国主义者，不要制造这么多的错觉来干涉我们的革命，也不要以为我们的革命无法抵御社会主义国家内的争论。如果我们明天或者哪一天醒来，得知苏联在发生大规模的内战，即使我们醒来得知苏联解体——当然我们希望这些事情不要发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古巴和古巴的革命依然会继续下去”。

古巴在奎托瓜纳瓦莱的胜利（1988）

古巴人民可以照顾好自己，但是他们的桥头堡安哥拉的未来却是很有争议的。成千上万的古巴军队依然驻扎在非洲，他们的安全有赖于苏联向安哥拉武装力量提供的军事武器。依据戈尔巴乔夫的海外经济重组建设方案，古巴军队将逐步撤离安哥拉，这意味着苏联将与美国结成更加友好的关系，同时美国将会为苏联的国内消费提供更多的资源。这些就是新时代。

对在改革之风冲击下苏联的变化表达不满情绪的不仅局限在哈瓦那。古巴亲密的非洲盟友——安哥拉的若泽·爱德华·多斯桑托斯（Joes Eduardo Dos Santos）政府也同样担忧。自1979年阿戈斯蒂纽·内图死后，多斯桑托斯一直担任安哥拉总统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保卫多斯桑托斯政府的长期战争有赖于25 000名古巴士兵以及来自于苏联顾问的大量战略物资。在1986年时，这些都进展良好。由于受到有美国和南非的资金和武装支持的若纳斯·萨文比的“安哥拉完全独立民族联盟”[①] 运动的游击队攻击，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部队在1987年屡战屡败。俄国人从来就对这场战争没有信心，现在则完全抛弃了安哥拉。在他寻求和西方和解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迫切需要消除一些冷战中的冲突。

277

由于看到了苏联的弱点，南非准备对安哥拉南部进行一次攻击，其最大的野心始于1975年。部队和武器装备在纳米比亚北部集结，南非做好了控制边界区域的准备。最近的古巴军队驻扎在梅农盖（Menongue），距离密林环抱的西部战略重镇奎托瓜纳瓦莱约（Guito Cuanavale）125英里。1987年11月，南非和安盟发起进攻，迫使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力量撤退到奎托瓜纳瓦莱。如果奎托瓜纳瓦莱被攻下的话，安哥拉整个南部地区都将处于南非的控制之下。安哥拉急切需要外援，越快越好。

① 简称安盟。——译者注

俄国官员掌握着最高决策权，但是面对此时的危机，多斯桑托斯很可能会从古巴而不是从苏联得到增援部队。面对南部即将失陷的形势，多斯桑托斯向卡斯特罗发出了求助信号。这是继1975年古巴干预安哥拉事务12年后新的求救。和以前一样，古巴的再次干预将会改写非洲历史。古巴把安哥拉从南非的攻击中拯救了出来，并为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扫清了障碍。

古巴在非洲的战役激起了卡斯特罗的个人兴趣和他的地缘战略雄心。一年前在哈拉雷（Harare）时，他就承诺古巴会继续驻军于安哥拉，“直到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①]之后，在罗安达，他提醒一支集结起来的古巴队伍说，他们已经在安哥拉驻扎了11年，还将继续驻扎在那里，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再驻扎“100个11年”。他回到哈瓦那后，承诺古巴已经准备好支持安哥拉“10年，20年，甚或30年”。

现在，他将直接参与到保卫奎托瓜纳瓦莱的战略计划中。古巴最先的行动是向安哥拉派遣最有经验的飞行员。以梅农盖为基地，他们攻击了围攻奎托瓜纳瓦莱的南非军队。随后，古巴的作战部队和武器到达安哥拉“以应对当前的形势和挫败敌人的计划”。[②]

成千上万的古巴军队被动员起来，新的战役使一些曾经在1975年参加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将军回到了罗安达。他们的司令官是阿纳尔多·奥乔亚将军，一位在早期安哥拉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冲突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将，被一位权威人士描述为“对古巴士兵来说仅次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传奇和英雄人物。[③]

卡斯特罗本人对奥乔亚的战略才能评价不高，安哥拉的军事统帅和哈瓦那的总指挥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卡斯特罗于是派遣另一位经验丰富且比较可靠的官员——莱奥波尔多·“波罗”·辛特拉·弗

① 语出卡斯特罗1986年9月在津巴布韦的哈拉雷（Harare）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峰会上的演说。

② 语出卡斯特罗1988年12月5日的演说。转引自 David Deutschmann, ed. *Changing the History of Africa*, Melbourne, 1989, 109页。

③ Victoria Brittain, *Death of Dignity: Angola's Civil War*, London, 1998, p. 36.

里亚斯（Leopoldo“Polo” Cintra Frias）前往安哥拉，以强化他的指挥。而奥乔亚则继续驻扎于古巴设在罗安达的主要基地，以联络安格拉人和俄国人，辛特拉·弗里亚斯则负责指挥南部前线。[①]

在1988年初的几个星期里，古巴第一批9000人的援兵到达安哥拉，开始向南非发起反攻。此时，古巴派驻军队的总人数远远超过了5万人。卡斯特罗注意到，在安哥拉的古巴军队人数——按照人口比例——和美国向海外派出的超过100万的部队是对等的。[②] 古巴士兵开始由内地向北部云雾缭绕的山上和马兰热省（Malange）的森林地区，向更远的靠近刚果和赞比亚边界的卢埃纳和南部的奎托瓜纳瓦莱转移，并在奎托瓜纳瓦莱举行了谈判。[③]

卡斯特罗和奥乔亚之间的战略分歧超出了在奎托瓜纳瓦莱应该采取的策略的范围，他们的分歧在新的一年中继续存在。卡斯特罗迫切要求直接加固安哥拉要塞的驻军，而奥乔亚则主张应该借助地雷和空军力量，即利用古巴飞行员和驻扎在梅农盖的苏式米格战斗机来加强城镇的防卫。他们之间的争论如此尖锐，以至于卡斯特罗要求奥乔亚于1988年底返回哈瓦那进行面对面的讨论。奥乔亚回到了罗安达，要求卡斯特罗就如何在奎托瓜纳瓦莱部署古巴援军给出详细的指示。

2月14日，南非发动了预料中的攻击。他们的士兵得到了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安盟游击队的支持，侵入到了奎托瓜纳瓦莱城的郊外。古巴军队迅速还击，不久就在奎托瓜纳瓦莱取得了令人惊异的胜利。经过几个星期的激烈战斗，南非最终停止了进攻。奎托瓜纳瓦莱在整个非洲变成了一种象征，表明南非的种族隔离和它的军队是完全可以战胜的。[④]

失败的南非被迫将自己的军队撤出安哥拉。随后，南非军队也撤离了纳米比亚，这就导致要通过外交来解决争端——在负责非洲事务

① *Vindicación de Cuba*, Havana, 1989, p. 395.

② *Vindicación de Cuba*, Havana, 1989, p. 394.

③ Brittain, *Death of Dignity*, p. 36.

④ Brittain, *Death of Dignity*, p. 36.

的美国部长切斯特·克罗克（Chester Crocker）的精心安排下——要求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同时，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将执掌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政权。

这次在南部非洲战略的崩溃最终导致了南非国内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1990 年 2 月，在奎托瓜纳瓦莱战役两年后，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获释。1991 年 7 月，他亲自前往哈瓦那以感谢卡斯特罗在反种族隔离斗争中所提供的帮助：

279

> 种族主义军队在奎托瓜纳瓦莱的最后失败对所有的非洲国家来说都是一次胜利……它使安哥拉享有和平并建立自己的主权政府成为可能……纳米比亚人民也取得了独立。富有侵略性的种族隔离军队的最后失败打破了白人压迫者不可战胜的神话。对南非努力奋斗的人民来说，种族隔离军队的最后失败是一个激励人心的事件。①

古巴的胜利加快了东西方世界对于南非问题的谅解，在克罗克的安排下，古巴和南非的代表加入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持续谈判。12 月，4 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了一项安哥拉协议。南非军队将撤出纳米比亚，后者的独立将会得到国际上的承认，而古巴军队将从安哥拉撤离。② 正如西班牙士兵曾经从摩洛哥撤离一样，古巴士兵陆续从安哥拉回到国内，一些怀旧的老兵依然怀念他们在非洲服役时的甘苦记忆。他们组成了一个团体，希望可以在国内为那些日益被人们淡忘的在战争中阵亡的同袍有所帮助。革命的国际主义精神仍将继续存在，但不是依靠士兵，而是依靠分布在整个非洲的数量日益增长的医生和教师。

---

① 1991 年 7 月 26 日尼尔森·曼德拉在马坦萨斯的蒙卡达纪念庆典上的演说。安·路易丝·巴达赫（Ann Louise Bardach）回忆了曼德拉在迈阿密的访问，见 *Cuba Confidential: Love and Vengeanece in Miami and Havana*, New York, 2002, 105－106 页。

② 详见 Chester Crocket, *High Noon in Southern Africa: Making Peace in A Rough Neghbourhood*, New York, 1992。

9 名经历了安哥拉战争的古巴将军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签字仪式，这标志着古巴干预的结束，但是奥乔亚将军却不在其中。1989 年 1 月，奥乔亚被召回哈瓦那，并得到许诺将升任古巴西部军队的司令，但是历史却给他带来了一个非常残酷的噩耗。

阿纳尔多·奥乔亚的死刑判决（1989）

在签署了安哥拉和平协议 6 个月后，古巴面临着其革命 30 年来最严重的国内危机。1989 年 6 月，4 名高级官员被逮捕，因为贪污腐败和走私毒品被送上了军事法庭。两人被判处死刑，另外两人被判处长期监禁。最终受审的人数达到了 14 人。这次审讯和死刑判决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一时流言四起，对官员背景的怀疑遍布各地。贪污腐败是一项威胁整个国家道德基础的犯罪，因为卡斯特罗领导的"7·26 运动"曾经与抵制此前古巴所有的贪污腐败的法令联系在一起。一些谣传认为，这次对于贪污腐败案的审判可能与政治问题有关，而非经济问题。这次逮捕发生在戈尔巴乔夫访问哈瓦那的两个月后。 280 或许，有阴谋取代卡斯特罗而代之以有利于将苏联的"政治公开"和"经济重组"改革引进古巴的改革派领导人？

一些人认为被捕者之所以被判处死刑是由于他们卷入了贪污和毒品走私之中。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对他们的处决是因为政治的变化，他们成了牺牲品。一些国外人士提出，卡斯特罗本人可能也卷入了毒品贸易中。他们还搜集了每一个细小的证据，以证明这一断言。

关于可能存在针对卡斯特罗的政治威胁的这一谣言找到了一些证据，这个阴谋的主角是奥乔亚将军，即最近负责安哥拉事务的将军。奥乔亚是一位虽在政界失宠但很受民众欢迎的战士。在安哥拉战役中，他的战略才能受到了卡斯特罗的怀疑。另外两名高级官员，托尼·德拉瓜迪亚（Tony de la Guardia）和帕特里西奥·德拉瓜迪亚（Patricio de la Guardia）兄弟两人曾是几十年来情报机构的支柱。被捕的 4 个人中，迪奥克莱斯·托拉尔瓦（Diocles Torralba）是运输部的部长，也是奥乔亚亲密的朋友。托尼·德拉瓜迪亚是奥乔亚的女婿。所有这一

切看来是被小心地限制于一个家族——但却是颇具影响力的家族——的内部。

随后被捕的是自 1986 年起担任内政部长的何塞·阿布兰特斯将军，这进一步说明了这次危机的严重性。阿布兰斯特曾是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前任领导者，在革命初期负责国家安全事务。他的被监禁标志着奥乔亚事件已经影响到了国家结构。内政部拥有自己独立的准军事部队，一直是国防部长劳尔·卡斯特罗的对手。阿布兰斯特也因其具有独立思想而闻名。他在哈瓦那最近的一次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的演讲中，提到自己非常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许多年来，这些领导人都在国家的最高层工作，包括处理一些革命时期最有风险的海外业务。奥乔亚生于 1941 年，曾参与革命战争，受训于莫斯科军校，1959 年后成了一名职业军人。20 世纪 60 年代，他在委内瑞拉游击战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之后在 1965 年加入了驻刚果—津巴布韦的古巴远征军，帮助训练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游击队。1973 年至 1974 年，奥乔亚和古巴坦克部队一起被派往叙利亚，以保卫戈兰高地在赎罪日战争后免遭以色列人的攻击。

70 年代，奥乔亚再次回到非洲，最初是 1976 年在安哥拉，之后是 1977 年 12 月在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指挥古巴军队作战。1983 年，奥乔亚回到了拉美，帮助尼加拉瓜镇压反政府武装。最近，在 1987—1988 年间他一直在罗安达。在古巴军队中，他是最著名的也是被授予勋章最多的将领之一。1975—1989 年由于上万名古巴军人在安哥拉进进出出，因此奥乔亚拥有很多朋友。

281

同一时期，德拉瓜迪亚兄弟在古巴情报机构任职。50 年代后期，他们被看做是富有的花花公子。他们成为了古巴革命的积极支持者。1961 年，两人引起了卡斯特罗的注意。60 年代，他们是负责与危地马拉游击队接触的首脑。帕特里西奥·德拉瓜迪亚在内政部任要职，有一份相对没有风险的工作，后来成为古巴驻罗安达的首席代表。在那里，他和奥乔亚有了密切的接触。

托尼·德拉瓜迪亚的人生更加风光。他是古巴革命中的一个“红

花侠”（Scarlet Pimpernels）[1]，1971年曾在智利负责卡斯特罗的安全保卫，并留在智利以训练阿连德的卫队。1975年，在阿根廷游击队劫持了谷物零售商的管理人邦吉·博恩（Bunge y Born）后，他帮助蒙托内罗斯（Montoneros），即阿根廷游击队洗黑钱。1978年，作为古巴代表，他负责与桑地诺党人的游击队接触。他与声名狼藉的美国财政家罗伯特·韦斯科（Robert Vesco）建立了联系，后者曾经是尼克松总统的朋友和支持者。1982年10月，他把罗伯特·韦斯科带到了古巴。韦斯科的财政专长对内政部的海外业务非常有用。

80年代，托尼·德拉瓜迪亚的任务是在哈瓦那管理内政部的情报部门以寻找挫败美国封锁的方法。这个部门最初的名字是MC，意即“货币兑换局（*Moneda Convertible*）”，隶属于处理进出口贸易的政府全资企业CIMEX集团。MC的特殊业务是从西方国家购买武器、电气设备和医药产品，并为古巴雪茄烟寻找市场。MC的许多工作都是通过巴拿马来完成的，后者的自由贸易区是非法交易的中心。奥马尔·托里霍斯（Omar Torrijos）和曼纽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e）政府对古巴都非常的友好。

1989年6月，这些似乎和贪污腐败毫无瓜葛的革命倡导者突然之间全部被监禁并要接受审判。在他们被拘押的第一天就提出的对其莫须有的“腐败”的控诉很快扩大到包括道德腐败、失败主义以及毒品走私等问题。奥乔亚和内政部的官员因利用MC公司作掩护与哥伦比亚的麦德林（Medellín）毒品公司（卡特尔）进行交易而被起诉，他们还特别被控通过瓦拉德罗的军用机场将卡卡因运往佛罗里达。[2] 这次审判不只是涉及个人，而且是在审判整个古巴。古巴政府是如何洞

---

① 直译“猩红色的紫繁蒌”，是常见于欧洲、北美和西亚的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花小，有多种颜色。20世纪初，由匈牙利裔英国女作家艾玛·奥希兹男爵夫人所著的一部以法国革命后的暴力时期为背景的古典话剧和小说以此命名（汉语译为《红花侠》），其主角是一位以“红花侠”为化名的贵族秘密团体“红花会”的首领。此处应该是采用这个典故描述托尼的秘密警察身份。参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Scarlet_Pimpernel（2010-10-26）。——译者注

② Hennessy and Lambie, *Fractured Blockade*, p. 323.

悉国际毒品贸易的？在多大程度上涉及深陷其中的高层领导人？是哪一层次的革命领导者决定参与此事？在古巴，每一个人都提出了相似的问题。

自16世纪开始，古巴和周围的加勒比海地区就是海盗和走私者的中心地带。非法贸易一直贯穿于该地区整个历史中。每一个海湾、小港口抑或是大的港口都见证了几个世纪以来小船上经验丰富的船员将国外的货物运进来，然后再将古巴农场和工厂的产品运出去。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由南方运至北美的最有价值的商品是大麻和可卡因，古巴恰巧是在这个路线的中心位置上。在加勒比海上买卖毒品的船员（*Lancheros*）是500年来这个古老游戏最后登场的献艺者。

282

除了美国外，古巴在这个地区拥有最大的、最尖端的情报活动。许多年来，这些情报活动包括为哥伦比亚和中美洲的游击运动提供帮助，或通过水路向这些国家运输士兵和武器。古巴在这个地区首屈一指，因此它深知在加勒比海及其周围所进行的贸易。那么，卡斯特罗对于所有这些想要知道多少呢？

3年前，即1986年，当古巴流亡者雷纳尔多·鲁伊斯（Reinaldo Ruiz）联络在巴拿马经营MC公司的哈瓦那来的古巴人时，这个特殊的毒品经营故事最终导致了奥乔亚事件的出现。[①] 鲁伊斯是一个商人，曾因未成年犯罪在1962年被迫离开古巴。他对革命没有丝毫的热情，但是却善于抓住商机。他娶了一位哥伦比亚的富婆，据称从此开始从事毒品贸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联系上了麦德林集团的头目巴勃罗·埃斯科瓦尔（Pablo Escobar）。

鲁伊斯伙同他的古巴表兄弟——MC公司巴拿马分公司的高级职员，依然对古巴忠诚的米格尔·鲁伊斯·普（Miguel Ruiz Poo）一起从事非法贸易。这两个人曾参与一项双赢的商业贸易，即向古巴走私IBM计算机以打破美国的封锁。真正的走私者是走私船员，他们把货

① Andres Oppenheimer, *Castro's Final Hour: The Secret Story Behind the Coming Downfall of Communist Cuba*, New York, 1992, pp. 17 – 129. 书中对该逸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物从巴拿马运往古巴，也参与毒品走私。鲁伊斯表兄弟之间的对话使古巴加入获利丰厚的可卡因贸易成为了可能。

他们飞往哈瓦那，与托尼·德拉瓜迪亚商讨相关事宜，被授权将可卡因运往古巴，并以此为中转站运至佛罗里达。依据《迈阿密先驱报》的记者安德烈斯·奥本海默（Andres Oppenheimer）的报道，雷纳尔多·鲁伊斯曾经询问德拉瓜迪亚，卡斯特罗是否知道并“默许”此事。[1] 现在没有证据证明托尼·德拉瓜迪亚曾与卡斯特罗讨论过可卡因走私计划，但是他们得到了 MC 公司负责人、内政部部长阿布兰特斯的同意，而这一假设是合理的。

第一次可卡因转运是在 1987 年 4 月。一架小型飞机运载了 300 公斤的可卡因，从哥伦比亚飞往瓦拉德罗的一个小型机场。这些托运的货物由“走私船员”接收，然后转运迈阿密，但是在他们到达目的地之前遇到了麻烦。“走私船员”被美国海岸警卫队拦截。

虽然最初美国缉毒局（DEA）关注的是巴拿马的诺列加（Noriega）而不是古巴，但是这引起了他们的怀疑。1988 年 2 月，即诺列加在佛罗里达被指控从事毒品走私的几个星期后，巴拿马当局应美国缉毒局的要求扣押了雷纳尔多·鲁伊斯，并将其引渡到迈阿密。鲁伊斯因利用古巴政府之便帮助走私可卡因，并因不止一次在瓦拉德罗停降毒品走私飞机而被起诉。在法庭上，他对此供认不讳。 283

这个消息在古巴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这已经不是古巴第一次被断言可能参与毒品贸易。在接受一名美国电视记者采访时，卡斯特罗拒绝接受这种断言，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并指出相似的控诉在 1982 年时也曾出现过。这是美国和古巴之间正在进行的口水战的一部分，1988 年的这些言论乍一看起来和原来的非常相似。然而这次，故事要以不同的方式发展下去了。整整一年，佛罗里达的报纸上满是关于古巴毒品走私的报导，暗示着古巴已经明显地深陷其中，并且美国人也早已洞悉一切。

---

① Oppenheimer, *Castro's Final Hour*, p. 29.

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卡斯特罗是何时发现真相的。在迈阿密，对鲁伊斯的审判拖延了一年多。卡斯特罗拥有获得消息的特殊渠道，同时美国人也会一直通知，他们知道了什么。几年之后，人们推测，可能是罗伯特·韦斯科向卡斯特罗通报了托尼·德拉瓜迪亚的行动。①

1989 年初，卡斯特罗兄弟采取了行动。菲德尔要求阿布兰特斯针对关于鲁伊斯的控诉进行调查，而劳尔则下令对阿布兰特斯内政部的行动展开独立的调查。这两次询问理所当然地会引起被调查者的警惕，导致 6 月执行了逮捕令。对托尼·德拉瓜迪亚的起诉已经很清晰了。利用自己的 MC 公司从事毒品走私转运业务一方面是渎职行为，另一方面使古巴流亡者卷入其中，托尼已经越过了国家授予 MC 公司之权力的底线。假定卡斯特罗深知他所从事的勾当，却并不能成为其为自己辩护的依据。对他的孪生兄弟帕特里西奥，或者说对奥乔亚的起诉还不清晰。鲁伊斯在瓦拉罗德行动的时候，他们两人都还在罗安达，但是安哥拉和巴拿马毒品走私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

6 月 25 日，审判开始，首先是对 47 名政府官员的审讯，之后是由乌利塞斯·罗萨莱斯·德尔·托罗将军主持的对 3 名军官的审讯。托罗将军是马埃斯特腊山的一名老兵，60 年代参与了委内瑞拉游击战。整个审讯过程都被录音，并在当晚的电视节目中进行了实况转播。

古巴在安哥拉的黑市买卖不久也浮出水面，奥乔亚和帕特里西奥·德拉瓜迪亚卷入了象牙和钻石走私贸易中。他们在安哥拉收集象牙和钻石，然后通过哈瓦那的托尼的 MC 公司进行非法转移。从一个层面上来说，这种行为是正常的，也是情有可原的。和其他在国外的有责任感的将军一样，奥乔亚关注的是他的人民可以有足够的粮食来充饥，有保暖的衣服来御寒以及有武器来装备自己。正如在安哥拉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如果连这种最低的需求都满足不了的话，那么奥乔亚将军将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处理好这些事情。从奥乔亚的供词来

284

① Bardach, *Cuba Confidential*, pp. 273 – 277. 韦斯科于 1982 年逃到古巴。1995 年 5 月，他在那里被捕，以“为外国提供特殊服务的特工”的名义遭到起诉，并被判处 22 年刑期。

看，这就意味着要进行非法贸易。通过向罗安达出口并在黑市销售古巴蔗糖，奥乔亚很快就获得了购买象牙和钻石的资金。反过来，这些东西将会在托尼·德拉瓜迪亚一伙人的帮助下出口到巴拿马，换回武器和弹药。

进一步的认罪细节之后也被曝光。在这些审判者中有奥乔亚的一名助手，他卷入到最后在巴拿马贩毒的阶段。他负责联络哥伦比亚毒品走私者，通过他们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取得联系。根据审讯的证据，奥乔亚许可他们来做此事。

华盛顿和迈阿密的记者提出了两个问题，在海外出现的质疑很快就传到了哈瓦那。卡斯特罗对这些事情知道多少？对受民众欢迎的官员的撤职是否掺杂了政治企图？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顾问杰奎琳·蒂尔曼（Jacqueline Tillman）争辩道，"卡斯特罗卷入其中的程度没有什么可质疑的"。迈阿密的美国缉毒局发言人约翰·费尔南德斯（John Fernandez）则更加谨慎地指出，"没有理由使人相信卡斯特罗或是任何身处其位的领导人会对走私者抱有同情"。①

清除奥乔亚的控告很可能含有政治动机，拉斐尔·德尔·皮诺（Rafael Del Pino）将军支持这种看法。他是一名古巴空军军官，也是一位安哥拉战争老兵，1987 年叛逃到迈阿密。1989 年 6 月，德尔·皮诺直言不讳地声称，对奥乔亚的扣押是为了阻止不满的官员开展"反政府起义"。②德尔·皮诺的言论暗示，奥乔亚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官员。之后的事实证明，奥乔亚曾支持把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引进古巴。

在持续两周的审讯之后，奥乔亚、托尼·德拉瓜迪亚和另外两人（包括奥乔亚的助手）被判处死刑。帕特里西奥·德拉瓜迪亚和鲁伊斯·普以及曾在瓦拉德罗帮助过走私船员的 4 名托尼·德拉瓜迪亚的

---

① *Time*, 10 July 1989，引自 Max Azicri, *Cuba Today and Tomorrow*, *Reinventing Socialism*, Gainesville, Fla. 2000, pp. 98 –99。

② 戴尔·皮诺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革命的早期，他就是一位忠诚的指挥官，曾作为米格战斗机的飞行员在苏联接受培训，并且在安哥拉服役多年。他表示自己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支持者，多次指控古巴的腐败活动。在其指控中的一个受害者是路易斯·奥兰多·多明格斯，他是古巴青年共产党的秘书长，由于被指控贪污，被捕入狱。

助手被判处30年监禁。其余6人则受到较轻的判决。

7月9日，29名国务委员会成员集体商讨并批准了判决。其中两人是在对平壤进行正式访问时急忙赶回来的，还有一位则被告知取消了去阿根廷的访问。每个人都支持已下达的死刑判决。7月13日，那些判处死刑的人将被处决。

285 随后，在对阿布兰特斯进行单独审判后，他被控“容忍腐败行为”被判处20年监禁，托拉尔瓦也被判处同样的刑罚。两年后，阿布兰斯特在狱中死于突发性心脏病。在他死之前，有报道称他实际上曾告诉帕特里西奥·德拉瓜迪亚，自己同意装运一些毒品。帕特里西奥把他们之间的谈话告诉了自己的妻子，而他的妻子又把谈话的内容转告给安德烈斯·奥本海默。依据奥本海默的报告，阿布兰特斯称，卡斯特罗注意到了在古巴领土上进行的可卡因贩运行径。有一次，他还批准了被古巴海岸警卫队缴获的可卡因的销售。然而，当他意识到在自己背后进行的交易已成规模时，他愤怒了。[①]

奥乔亚的朋友和亲戚们以及德拉瓜迪亚的家人从来都不相信卡斯特罗和其他的古巴高级官员对二人的行为一无所知，但是帕特里西奥的妻子提供的证据证实了关于卡斯特罗知晓其官员从事毒品走私的断言。随后，帕特里西奥的女儿和女婿被流放到了巴黎。他们一再申辩，并写了一本谴责卡斯特罗的书，声称他们的亲属是无辜的。[②]

在一些拉美国家，这种广泛的走私毒品的指控或许只是接近于个人的污点，但是从强调道德标准的古巴革命的特殊历史来看，毒品走

① Oppenheimer, *Castro's Final Hour*, p. 127. 安·路易丝·巴达赫于1994年采访了卡斯特罗，在采访中，她直接向卡斯特罗问起奥乔亚（Ochoa）审判。“奥乔亚和托尼·德拉瓜迪亚之间有很大不同”，他说道，“这两起案件之间没有可比性，我是说，从个人身份上和历史的责任上讲没有可比性。托尼·德拉瓜迪亚是一位组织者，他是一个不负责任、拿自己的国家安全冒险的人。而奥乔亚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自己却被疯狂的想法所左右，将毒品交易的钱变成国家的一种资源。他派自己的助手去会见埃斯科巴尔（Escobar）。你能想象得出，一位古巴军队的指挥官与哥伦比亚发生那样的联系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来讲，做出这个决定是很难的，但也是无法避免的”。Bardach, Cuba Confidentail, p. 270.

② Ileana de la Guardia, *Le Nom de mon Pere*, Paris, 2001, and Jorge Masetti, *El Furor y el Delirio, itinerario de un hijo de la revolucion cubana*, Barcelona, 1999. 帕特利奇奥·德拉瓜迪亚事实上于2002年3月获释是由于墨西哥总统文森特·弗克斯（Vincent Fox）的压力。

私达到这样的程度似乎使卡斯特罗感到惊讶。他可能是真的一无所知，但是这次审判和死刑判决对于古巴人民的政治化态势（占了很大的比例）无疑让人震惊和沮丧。30 年来，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与此相提并论。

卡斯特罗政府尽最大的努力减少此事造成的损害。高级军官支持政府的决定。几年后的 1997 年，古巴空军将领恩里克·卡雷拉斯（Enrique Carreras）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我们很遗憾不得不枪决那些曾经是革命者的人”，“但是一个革命者不能弄脏自己的手，即使是为了取得我们的人民需要的资金而采取了错误的方式。这里不应该有走私品，不应该有毒品，这些不应该出现在这里”。①

另一位高级将领何塞·拉蒙·费尔南德斯对于揭露出来的真相也十分震惊。他曾是猪湾事件中的老兵，1989 年出任教育部长，也是批准死刑判决的国务委员之一。② 在他看来，古巴赦免毒品走私者是不可想象的。对于他这样的老一辈革命者来说，向其揭示奥乔亚事件中暴露出的大规模的腐败和个人私欲膨胀的流弊是令人沮丧的。审判和死刑判决对古巴人民来说犹如难以下咽的毒药。③ 这件事情使古巴陷入死胡同，毫无客观解释的余地。如果革命事业没有遇到新的困难，这一事件将对 30 年革命产生更严重的破坏。面对这些，此时古巴人要做的就是团结一致。

286

“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1990）

1989 年，奥乔亚事件和戈尔巴乔夫改革是政治飓风席卷古巴的前兆，而年底发生在欧洲的突发事件使这一政治风暴最终形成。当年 11 月柏林墙倒塌之后，就是布拉格的“天鹅绒革命”。12 月，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在罗马尼亚的统治结束，齐奥塞斯库

---

① *Making History*, Interview with Four Gebrrals of Cuba's Revolutional Armed Powers, New York, 1999, p. 74.

② *Making History*, p. 107.

③ Azicri, *Cuba Today and Tomorrow*, p. 99.

被示威集会的群众从官邸驱逐，接着电视台实况转播了对他和妻子的逮捕和判决。迈阿密的古巴流亡者对此很疑惑，这种模式是否意味着卡斯特罗时代也将以这种模式结束。

12 月，美国入侵巴拿马，动用了 24 000 人的军队，使之成为自越南战争后美国最大的军事干预事件，也被认为可能会终结古巴革命。曾经把古巴的一条重要生命线提供给资本主义世界的诺列加将军跑到梵蒂冈大使馆寻求庇护，却被扩音器中播放的摇滚乐所震动，最后不得不向美国当局投降。上千名巴拿马人在杀伤力极强的炮击中死亡。堕落的诺列加政府的统治被一场暴力结束。或许古巴也将经历相同的命运？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1990 年 2 月，桑地诺党人在竞选中失败，奥尔特加（Ortega）总统无视卡斯特罗的建议，感觉到有必要继续执政。奥尔特加认为自己可以获胜，但是长期受到美国控制和干预的反抗活动使尼加拉瓜人民感到压抑和乏力。他们觉得，桑地诺政府的重新执政将意味着无休止的战争。他们可能是正确的。他们被迫为和平而投票，选择了非桑地诺主义者。又一个古巴的亲密同盟者——古巴曾经给与许多支持和精神鼓励的革命国家突然间也不存在了。

1990 年苏东剧变和 1991 年 8 月反戈尔巴乔夫政变失败后的苏联解体使古巴的经济遭到严重的冲击。对古巴最后的打击发生在 1991 年 9 月 12 日，即政变的几个星期后，戈尔巴乔夫面对来自美国的压力，宣布 7 000 人的苏联驻军将撤出古巴。和往常一样，两个超级大国处理这些事情时并没有把古巴考虑在内。

真正的危机开始于 1990 年。这一年，苏联没有按照合约及时向古 [287] 巴输出石油。古巴的国内经济陷入严重的停滞。自 60 年代开始，苏联油轮定期运来的廉价石油一直是古巴革命的重要经济补给。1989 年，从苏联进口的燃料达到了 1 300 万吨（以比较优惠的利率）。一年后，石油进口量下降到只有 990 万吨。这种下降趋势一直在持续，1993 年古巴只得到 530 万吨进口石油。古巴不得不在世界市场上寻找高价的并且只能用美元支付的替代品。

古巴的粮食进口依然严重依赖苏联。在危机之前，苏联对古巴的食品供应达到了其所需总数的63%，机械设备供应达到了80%。另外，在古巴出口的商品中，有63%的蔗糖、95%的柑橘和73%的镍被苏联购买。[①] 此时，整个交易处于危险之中。这是自60年代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以来古巴经济遭遇的最大威胁。

即将到来的麻烦在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哈瓦那后日渐清晰。长期以来给予古巴的贸易津贴被取消了。未来的贸易必须使用可兑换的货币进行支付，如在蔗糖贸易中，就得以世界市场的价格为标准。1990年，古巴出口蔗糖的平均价格是每吨602美元（指在苏联和世界市场上销售的蔗糖）。到1992年，世界市场的价格从每吨277美元（在1990年）跌到200美元，古巴不得不以此价卖出几乎全部的农产品。这种规模的经济灾难对古巴来说是史无前例的。

戈尔巴乔夫也面临着美国的压力，被要求停止支持卡斯特罗。古巴已经成了一种昂贵的刺激剂。很快，其他的经互会成员也效仿戈尔巴乔夫的做法。这些国家都要求古巴以美元支付商品。虽然苏联的领导者对古巴继续保持友好和现实的态度，但其他俄国人却毫不掩饰其对这位往昔盟友的蔑视。政治公开性意味着在共产主义阵营中要给予新闻界自由，由此解除了对于古巴的一些批判性言论的限制。半独立的苏联杂志，如《莫斯科新闻》也开始敌视古巴，因而在哈瓦那被禁。东欧国家的新闻媒体也发出了相同的言论，反映了多年来被压抑的对这个"热带社会主义国家"里挥金如土的败家子的仇恨。一家匈牙利报纸尖刻地指出，古巴人可以称得上是狂热的空想派。他们"吃着别人的面包并以其他国家为代价建立社会主义"。[②]

卡斯特罗与其他人一样清楚，自从被征服以来，古巴一直依赖着它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维持国家生存，也因此一直深受变幻莫测的世界政治和贸易的影响。近年来，甚至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受美国配

① Luis Suarez Salazar, *Cuba: aislamiento o reinesercion en un mundo en cambio*, Havana, 1997.

② Carmelo Mesa-Lago, *Cuba after the Cold War*, Pittsburgh, 1993, p. 10.

额政策的冲击，世界市场蔗糖价格的波动经常成为哈瓦那发生政治动乱的原因。但是多年来，社会主义古巴和苏联的友好关系及其加入经288互会都为古巴的经济带来了稳定。过去的历史早已经被忘记，或许卡斯特罗也没有意识到前面的道路将会如此的崎岖不平。

这次席卷全国的经济灾难是在1791年圣多明各革命后，古巴岛作为最早以蔗糖为经济基础的国家所面临的最引人注目的、也是最重大的变化。在早期，即19世纪独立战争时、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时以及60年代向社会主义转变时，古巴也曾经历过一些其他的震动，但是没有一次可以与90年代初的这次灾难相提并论。

没有一个社会可以面对这种经济灾难而毫发无损。1989年至1992年，进口下降了70%——从1989年的81亿美元下降到了1992年的23亿美元。（在危机之前，约1/3的国内产品被用来购买进口产品。）这次经济崩溃的根源在于失去了过去大多由苏联提供的蔗糖补贴（使得蔗糖收入从2000年的43亿美元降到了1992年的12亿美元，而在1993年只有7.57亿美元[①]）以及外部的财政援助（从1989年的30亿美元到1992年的一无所有）。由于缺少产品输入，国内经济更是雪上加霜——主要是燃料供应，此外还包括机器备用件、化学肥料以及动物饲料的需求等。

从1989年到1993年，外部的震动使国家经济失控下跌。国内生产总值在1990年、1991年、1992年和1993年分别下降了2.9%、10%、11.6%和14.9%。[②] 未来的古巴经济将出现自19世纪以来第一次难以想象的萧条，当人们提到古巴和海地时，会把它们与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相提并论。[③] 很快，从古巴的城镇和乡村中就可以看到这种危机的深刻影响。马拉货车和四轮马车取代了汽车和大卡车；中国

---

① 此处似乎有误，因为作者先提到2000年，然后是1992、1993年，第一个年份可能是错的。——译者注

② Ana Julia Jatar - Hausman, *The Cuban Way: Capitalism, Communism and Confrontation*, West Hartford, Conn., 1999, pp. 46 - 48.

③ Hugh Thomana, *Cuba, or the Pursuit of Freedom*, 2nd edition, London, 2001, p. 1 058.

慷慨赠送的50万辆自行车遍布哈瓦那的大街小巷；30万头耕牛取代了苏联的3万辆拖拉机。

粮食和燃料需求是要优先考虑的。从1989年到1993年，粮食进口减少了一半，但是与之前相比，购买外国粮食的费用依然占据了较大比例的外汇资源。（1993年，粮食占据了全部进口费用的25%，而相比之下1989年只占12%。）同一时期，燃料的进口下降了72%，而全部进口总额下降了76%。除了粮食以外，可以用来购买进口产品，包括机器配件、化肥和其他消费品的硬通货的数量在1993年降低到了1989年的17%。粮食和燃料是极其缺乏的，虽然还没有达到使人完全饿死的程度，但是几代以来不为古巴人所知的营养不良开始变得非常的普遍。

在国外，1991—1992年间对古巴即将垮台的讽刺言论比比皆是。迈阿密持必胜信念的古巴流亡者对此无限痴迷。1991年秋，国外的记者和撰稿人急速前往哈瓦那，以见证他们想象中的执政最后几星期的卡斯特罗政府的垮台，并写出关于其垮台的讣告。马里菲利·佩雷斯－斯塔伯（Marifeli Pérez－Stable）在总结出现在迈阿密报界的、来自古巴的各种报道时写道“这些普遍不满的言论是引人注目的，也是包罗万象的”：

289

墙上涂着“Abajo Fidel”（打倒菲德尔）的标语；青年人和警察发生了冲突；由于国内供应的短缺，码头工人拒绝装运出口的大米；电影厂抵制由党的领导将其合并于国家电视台；知识分子向领导者发出了要求改革的公开信；哈瓦那大学和其他的高等教育机构展开了清洗运动；市民侵吞了可耕种的土地；在专设的外汇商店前发生了骚乱；工人拒绝加入政府为平息不满而组织的别动队。①

卡斯特罗为应对世界形势也做出了改变，发表了几次关于困难时

① Maliferi Perez－Stable, *The Cuban Revolution*, Osford, 1993, p. 213.

期即将到来的警示性演讲。1991 年 1 月，在古巴工人联盟会议上，他向人们阐述了长期以来政府是如何准备应对战争威胁的：

> 10 年来我们一直在强化我们的国防，我们使每一个人都理解了战争的含义……我们为每一个意外事件，包括可能出现的全面经济封锁都制定了相关的对策……，在这些对策中没有一颗子弹会伤害到我们的国家……男人、妇女、孩子、青少年、高级官员以及大多数的人们将被组织起来，使入侵者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他强调国家现在面临着一个与以往不同的问题："我们必须准备应对其他形式的入侵。我们把全面封锁时期称为'战时特殊阶段'。但是，面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为'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制订出计划"。[①]

随着苏联石油供应的中断，危机比预期中来得更快。1990 年 3 月，政府不得不实行第一次"经济防御运动"作为回应，在全国范围内短期中断了汽油、水和电力的供应。8 月，当苏联不可能恢复其依常规运送的燃料时，政府出台了应对危机的直接措施，关闭了一个镍工厂，并推迟了建立一个新炼油厂的计划。国内石油和汽油的供应将削减 50%，电力消费将削减 10%。鼓励农民使用耕畜从事生产。[②] 革命取得的历史性社会主义成就——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将继续保留，但是不可避免地要对大众实行大幅度的紧缩方案。国家定量配给粮食和衣物，依赖外国进口的工厂被关闭，成千上万的城市工人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密集型的粮食生产。

290 几百年来，古巴的许多农业耕地都被用来放牧和种植甘蔗，革命后古巴一直依赖从东欧国家进口粮食来满足国内需求。除非找到其他的粮食供应国，否则古巴将面临饥荒。由于没有美元去从西方进口粮

① Castro Speech of 28 January, 1990.
② *Grama*, 29 August 1990.

食，增加国内的粮食产量是非常必要的。[①]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计划：为鼓励本国的粮食生产，10 月份出台了一个"粮食方案"；有限的资金被用于研究和开发生物技术，以使国家在药品生产方面实现自足；开展了废物回收利用运动；影响深远的简政措施使党务官员减少了一半，也为其他领域国家行政机构的改革开辟了道路。

古巴现在不得不制订一个不再把蔗糖作为国家主要创汇产业的未来计划。政府很快就做出了必然的决定，这一决定也被面临相同困境的其他加勒比海国家采用，即开发海滩度假以满足欧洲和加拿大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外国旅游者将成为古巴外汇的主要来源。古巴为新的旅游业投入了大量资金，并寻求主要来自西班牙、法国和加拿大的外国合作伙伴，对古巴旅游业进行投资、管理并使其市场化。

中央政府被迅速重组后，许多国家行政官员感觉到了改革之风的严肃性。改革对旅游业产生了特殊的影响，一个较小的部门取代了原有的中央行政管理，以监管 9 个新的、独立的、相互竞争的旅游公司，但是许多其他的部门和国家机构进行了合理化和精简改革。

由于国有公司寻求与外国私人资本的合作，因此外事机构的整改初看起来像是资本主义的回归。1992 年，古巴废除了对外贸易中的国家垄断体制，也进一步修改了宪法，允许国有资产与外国合作伙伴合资。[②] 为了吸引外国合作者，古巴出台了新的外国投资法。在这个宽松的法律条款下，外国企业可以占据合资股份的 49%，可以雇佣外国的管理人员，并可以免予缴纳许多税种，以硬通货的方式返回利润。[③] 从 1990 年到 1993 年，合资企业的数量从两家增加到了 112 家。

最初，经济政策的制定者设想只需改革其外事方面的政策，而不需要进行内部变革，即在国外支持资本主义，但在国内提倡社会主义。他们希望能通过"独立地吸引外资和发展旅游业"就能够为国家提供

---

① Sergio Roca, "Reflections on Economic Policy, Cuba's Food Programme", p. 96.

② Jatar - Hausman, *The Cuban Way*, p. 48.

③ Jatar - Hausman, *The Cuban Way*, p. 50.

维持社会建设所需的硬通货，而无须进行改革。[1] 这很快就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政府不得不处理内部机构的问题。

291 1993 年初，局势日渐清晰，即“特殊阶段”实行的经济改革难以应对危机。这些改革没有制定任何措施来解决日益增多的黑市贸易、美元短缺、货币系统失衡以及失业问题。整个经济系统处于崩溃的边缘，两名访问哈瓦那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宣称，自 1989 年以来古巴经济的衰落程度远比同一时期先前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更加严重。由卡斯特罗的亲信、年轻的古巴副总统卡洛斯·拉吉（Carlos Lage）领导的新的经济小组策划了重建内部经济的新措施。何塞·鲁伊斯·罗德里格斯（Jose Luis Rodriguez）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弗朗切斯科·索韦龙（Francisco Soberon）调任中央银行；劳尔·卡斯特罗也密切关注整改措施。1993 年 7 月 26 日，卡斯特罗在蒙卡达演讲时概述了改革的纲要。

第一个措施是在 1993 年 8 月通过了 140 号法令使美元合法化，这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没有能力处理迅速发展的美元黑市贸易，古巴当局决定屈服于经济现实。长期以来，特别是旅游时人们习惯使用的美元，尽管在加勒比海的其他国家仍然不被官方正式认可，在古巴，却同 20 世纪初一样，将成为古巴从事商品贸易和服务薪酬的主要货币。古巴比索依然用于支付工资、购买所有限量分配的商品以及所有政府内部事务。

对于高傲的革命情绪来说重新使用美元是一个严重的打击。第一次使用美元是在 1898 年后的美国占领时期，美元取代了西班牙货币，并一直使用到 1915 年古巴国家银行的创建并发行比索为止。但古巴革命之前，在大多数商品交易中美元依然是首选。亨利·沃利克（Henry Wallich）在 1950 年写道：“经历了繁荣和萧条、革命和延期偿付，美元为古巴带来了一个外表看起来稳健的，可以解决外汇短缺之困难的货币体系”。由于美元“既不升值，也不贬值”而深受美洲商业团体

[1] Jatar – Hausman, *The Cuban Way*, p. 49.

的喜爱。[1]

虽然从经济理论和流通领域的需要来看，人们接受重新使用美元，但是美元的回归却对维持古巴的政治理念产生了极坏的影响。美元在国内经济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政府开放了使用美元的零售贸易以吸收黑市的剩余产品——却使得 90 年代古巴社会中有权和无权使用美元的人群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那些持有美元的人——主要来自旅游贸易、黑市交易以及来自迈阿密的汇款——比那些没有美元的人更加富有。革命时期引以为豪的平均主义伦理被进一步破坏，尽管它早已被黑市交易的发展所削弱。 292

第二个重要的改革是实行个体经营，1993 年 9 月，141 号法令通过了这一决定。1/4 世纪以来，古巴第一次使 100 多个服务行业的小型经营活动向私人开放。（自从 1968 年 3 月以来，所有的私人酒吧和饭店都被关闭。）理发师、电工、水管工人和机械师获准可以依靠自己的实力合法地工作。1995 年底，从事个体经营的古巴人超过了 20 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 5% 多。1996 年 6 月，政府公布了将要向个体经营者开放的另外 40 种行业。[2] 失业的古巴人欣然接受了政府提供的机会，尤其是当有可能用美元支付收费服务时。这些最早的个体户感到的不足之处是他们第一次进入了纳税经济。他们所从事的小商业活动必须要登记，并要向政府交税。

在这个领域中，最富戏剧性的变化是重新推广个体经营的酒吧和饭店，即被人们称为 *paladares* 的行业。这个名词（paladar）来自于 90 年代在古巴上映的一部巴西电视剧。女主人公从乡下来到了里约热内卢，通过在海滩上卖三明治维持生计。她的勇敢尝试获得了成功，最后回到了家乡，并在那里开了一家 paladar，即饭店。尽管两年后在更加严厉的法规下这些饭店再次复兴，但是它们曾经如此的成功以至于卡斯特罗一度要强令关闭它们。1993 年 12 月，在讨论哈瓦那的周围

① Henry Wallich, *Monetary Problems of an Export Economy*, Harvard, Mass. 1950.

② Jatar - Hausman, *The CubanWay*, p. 97.

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演讲中，卡斯特罗证明了这种经营的合法性：

一个拥有 25 张桌子、100 把椅子并且有歌舞表演的饭店。有人办起了这样的饭店，人们只需要花费 15 比索就可以在里面消费……美元、比索以及任何货币都可以。他拥有他所需要的所有顾客。来自国外的旅游者会光顾这里，甚至会带上他们的朋友和家人。我计算了一下店主的收入。一天之中，他的收入不会少于 1 000 比索——这是保守的估计。一天至少 1 000 比索！所有的这些只是因为开放了那么一点点。[①]

这种获利经营方式触怒了卡斯特罗的革命道德意识。当 Paladares 再次重开的时候，只允许拥有 12 张桌子并且要家庭式经营。很快它们就变成了普遍的模式固定下来。

1993 年第三个重要的改革是建立农业合作社以取代旧的国有农场。1993 年 9 月的 142 号法令通过了命名为合作生产基本组织（UB-PC）的改革措施。原来占农业经济 75% 的国有农业部门在 3 年后下降到了 30%。[②] 然而土地技术依然掌握在国家手中，生产者被授予永久使用权，并且所有产出归生产者所有。他们拥有自主经营权，可以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员，控制自己的银行账户以及实行按劳分配。尽管合作组织不得不以国家制定的价格生产配额产品，财政也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分配，它们的自主权也没有开始时那么宽泛，但这却是 30 年来农村中最重要的革新。

有一项改革是可以直接产生明显效果的，即重新恢复卡斯特罗在 1986 年整改运动中废除的个体农贸市场。[③] 90 年代末，哈瓦那的各个社区都建立了农贸市场，为人们提供多种多样的水果、蔬菜、色拉以

293

① Castro speech of December 1993.

② Jatar - Hausman, *The Cuban Way*, p. 73.

③ Decree - Law 191 of September 1994.

及肉类——许多年没有看到城市有这样繁荣的景象了。[1]

在领导着这些重要改革的同时，卡斯特罗依然持续使用着社会主义的话语，似乎国家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在1993年底，他对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说道，改革是为了“提升和完善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是“使社会主义更加有效而不是破坏它”。他声称，社会主义不只是简单的使“各个方面更加公正、更加廉洁、更加人道”的制度，也是“为我们提供社会生存资源的唯一的制度”。

至于资本主义，它只是解决古巴问题的“一个幻想”而已。资本主义是“人们将会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荒唐的、疯狂的幻想”。卡斯特罗不同意采纳东欧和拉美国家那样的自由市场，认为它们是失控的，声称将在下一个10年筹办一个国际性集会。“拉美国家采用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其特点就是价格开放，减少实际的工资和福利计划，从来没有考虑到人民的利益，更加深了这些国家原本已经存在的可怕的不平等。”卡斯特罗指出，古巴是一个特例，其改革将会十分成功。

这位古巴人的领袖感觉他在进行一场战争，它将很容易地实行基本的经济决策而不须考虑民众的意见。改革活动在政治上是如此敏感，以至于在每一个工作场所，人民都在讨论它。1994年，从1月到3月，约300万名古巴工人联盟成员齐聚一堂，探讨这些改革措施。80 000个工厂开会分析了这些改革的社会影响，在5月召开的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特别会议上进一步讨论了这些问题。

人民赞成进一步扩大经济改革的范围，政府也迅速考虑这一提议。毫无疑问，这是被当局掌控的一种民主形式，但它也证明了为支持改革而出现的政治上的进步。这些讨论会使更多的民众了解了什么是利害攸关的大事，人们也认识到，对于未来发生的事情他们是有发言权的。 294

1991年10月，当危机开始时，古巴共产党的精英们已经在古巴

① 政府改革项目中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采取措施解决货币失衡问题。这些改革项目中包括增加税收和社保费投入，价格控制的提升以及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

共产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为改革铺平了道路。一位观察家评论道，在这次大会上，“并非所有的投票都是那么统一的”，而且会议对诸如自由农民市场、犯罪及犯罪诱因、选举制度以及新闻出版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这都是此前没有过的。[①] 政府决定广开言路，接纳不同形式的建议和批评。[②]

政府的下一个行动就是通过任命革命时期最优秀的人物之一里卡多·阿拉尔孔作为新的总统使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恢复活力。80年代，阿拉尔孔贯彻实施卡斯特罗的外交政策——特别在其担任古巴驻联合国的代表时——他的新任务就是有效地推进古巴新型“参与式民主”的进程，以及向工人们推广“特殊阶段”的计划。

作为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他死于1997年）退休后的政府首脑，阿拉尔孔的任务是设计和宣传古巴革命关于“民主”的最新理念。因为美国，并且也有较少的欧盟因素，现在要求古巴适应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对于古巴来说，给予本质上的回应、以维护它自己对于民主实践的定义是很重要的。

在外国势力一直攻击古巴的一党民主制只不过是现在已经声誉扫地的东欧国家体制的翻版之时，古巴的这种自我维护更有必要。然而，这种攻击并非完全没有根据，毕竟，1976年的古巴宪法及其提出的民众权力体系曾经是在苏联影响最大的时期制定的。古巴人有必要证明，他们能够独立思考。阿拉尔孔很快拟出了才华横溢的辩护词，同时不

---

① Gail Reed, *Island in the Storm: The Cuban Communist Party's Fourth Congress*, Melbourne, 1992, p. 20.

② 1992年进行的国内选举要求国家领导人确保其形象在民众中深孚重望。按常规，有97.7%获得选民资格的人都参与了这次选举，但是政府组织了一次个人退选的民意测验，其结果泄露了（发表在马德里保守派的报纸ABC上）。根据这一民意测验的结果（非官方结果），在240万选民中有30.5%的选票没有投给候选人名单上所列人物（在选票上给他们的名字画了×），而另外2.1%的选民弃权（在选票上什么也没写）。这一民意测验被古巴以外的相当多的人群知晓，用来作为古巴政府缺乏人气支持的证据。然而，人们仍然能够从中看到，这个国家还是有65%的人准备参加地方选举，并且积极给官方确定的选举人名单投票。考虑到当时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困难之中，对于这样的结果，政府是应该感觉到满意的。ABC, Madrid, 17 January 1993，引自 *Cuba in Transition*, vol. 4, ASCE, Miami, 1994, 189页。

失时机地指出了西方模式的缺点——其特点是下层民众和相当多的人群敌视现在的政治精英，在美国尤其如此。

1991 年，古巴重新修订了 1976 年宪法，并在 1992 年 7 月召开的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上通过。新的宪法规定，选民可以从候选人名单中直接选出参加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代表（当然，这些候选人必须得到古巴共产党同意）。同时，取消了宪法中所引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语录，废除了禁止基督徒加入共产党的禁令。

阿拉尔孔返回哈瓦那参与最高层的激烈争论，并提拔了负责监管经济改革的能力出众的卡斯特罗的得意门生——卡洛斯·拉吉，使年轻的一代成为古巴高层领导者——这是适应“特殊阶段”需要的直接结果。1986 年古巴的经济重组后，曾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现在，政治局面已经焕然一新。虽然卡斯特罗兄弟依然掌握着主要权力，但是古巴政府不再为马埃斯特拉腊的那一代革命者所独占。

295

古巴经济慢慢地开始走出了低谷。1994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幅是 0.7%，并没有继续下滑，1996 年后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平均达到了 3.5%。[①] 国内人们的情绪也发生了变化。1996 年，联合国经济学家梭伦·巴勒克拉夫（Solon Barraclough）访问了东部地区的农业合作社，发现虽然农民还有许多怨言，但是并不感到接受这一局面有多大的困难：

即使 1993 年后格瓦拉省取得了很大的经济进步，但仍然可以看到废弃的现代化的层架式鸡笼、半空的奶站、巨大的牛奶加工厂只有1/5在运营。和其他人比起来，农民们更容易获得食物。他们大多数抱怨缺少弯刀、锄头以及使这些工具更加锋利的锉刀，同样他们也缺少鞋、裤子、衬衫和裙子。这些必不可少的生活必备品逐渐被农民们用坏了，但是他们费尽心机也找不到可能的替代品。学校没有纸张、铅笔和书本。个人诊所和药剂师缺少诸如抗生素，甚至是阿司匹林等很多基本

① Jatar - Hausman, *The Cuban Way*, p. 83.

的药品。

尽管面临许多问题，但农村依然为来自城市和国际的经济难民提供避难所。巴勒克拉夫遇到了一位光着脚在农舍前照顾孩子和喂养小鸡的妇女。农舍是用茅草搭成的，是土地，但是很清洁，还有电灯和一台电视机。“在我们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她在布拉格住了7年，在学校和工厂里学会了纺织技术。她会讲捷克语和俄语，现在由于没有专职工作，不得不返回农庄。”虽然有一些不安和贫困，但是他们的乐观性格给巴勒克拉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农村人拥有哲学家的情操，看起来足以面对令人畏惧的困难。”①

国家经济重组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军队在国内事务中的权力和影响日益增加。劳尔·卡斯特罗在危机初期就曾宣布军队应该以养活自己为目标，而且军队取得的经验足以使其监管国内粮食计划。军队在国家经济事务中逐渐异军突起，并在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一位将军后来回忆，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武装部队的“专业296和技术非常的熟练”，但是“与其他的行政、财政和生产部门相比依然有差距”。90年代在“特殊阶段”的环境下，劳尔·卡斯特罗曾经提出这些问题，强调军职干部必须具备从事“粮食生产和从事农业的基本技能”以及“基本的经济事务常识”。这位将军说道，基层官兵“不需要成为经济学家，但是他们必须知道每个比索是怎么来的，并知道如何有效地使用”。②

不久之后，和许多拉美国家一样，劳尔·卡斯特罗的军官们开始负责几个经济领域的事务。负责全部事务的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经验丰富的老兵——乌利塞斯·罗萨莱斯·德尔·托罗将军。在加维奥塔

---

① Solon – Barraclough, “Protecting social achievements furing economic crisis in Cuba”, in Dharam Gai. ed. ,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A Study of Som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London, 2000.

② 对内斯托·洛佩斯·古巴将军的采访，1997年，见 *Making History*。

（Gaviota）公司的名义下，军队经营旅店并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环球百货公司（Almacenes Universales）是另一家负责仓储业、免税区和工业区事务的军事公司。安泰建筑公司（Construcciones Antex）负责建筑及房地产。首都银行（Banco Metropolitan）是军队银行和财政的分支。军队也负责在农业部门动员劳动力、经营运输业以及监管国库。[①]

军队经济事务的扩展归因于1994年政府对军费预算的大幅削减。军队的新角色是改革时期的必然结果。国家的军费开支明显减少，使军队不再有能力购买新的武器，甚至使原有的武器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过去都是苏联为古巴支付大量的军费开支。1997年内斯特洛·佩斯将军接受采访时讲了一则有趣的逸事。他回忆起，当苏东剧变的时候，苏联已经向古巴提供了最后一批米格29战斗机。其中6架已经运送到位，几年后，俄国政府询问古巴政府是否愿意再购买几架。劳尔·卡斯特罗问道："它们的价格是多少？""2 000万美元"，俄国人回答道。在这种情形之下，劳尔回答说："我们将会把已经购买的6架全部再卖给你们"。[②]

80年代，古巴的军队曾在非洲作战，并帮助训练尼加拉瓜部队。现在他们有其他的工作重点。1992年1月，卡斯特罗说道："时代发生了变化，我们也要作出改变"。"对外提供军事援助是过去的事情。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卫古巴革命。对外我们将会接受国际行为标准。"[③]

任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的海军上将查尔斯·威廉（Charles Wilhelm）同意这种观点。1998年，他告诉一名《迈阿密先驱报》（*Miami Herald*）的记者，古巴武装力量"明显地减少了"。他说，古巴"70%的军队"在从事诸如农业生产等自给活动，"完全不像80年代我们看到的古巴军队。"威廉上将说道，在他看来，80年代古巴拥有的13万部队已经减少了一半，预备役军人同样也削减了。许多的军事装备不

---

① Azicri, *Cuba Today and Tomorrow*, pp. 163 – 164.

② General Nestor Lopez Cuba, *Making History*, New York. p. 43.

③ Carmelo Mesa – Lago, ed., *Cuba after the Cold War*. p. 263.

能使用，大量的军事战斗机现在看起来“非常的小”。他的结论是，297 古巴军队不再具备任何能力在边界之外部署力量。它也“不再是邻国的一个威胁”。[①]

90年代，不单单是古巴要面对新的形势。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面对世界市场也不得不作出调整，曾经一度依靠苏联提供的发展模式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开始欣然接受新自由主义信仰体系（也就是人们熟悉的“全球化”）。同越南和中国一样，古巴在决心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几乎是孤立的，古巴与中国的关系在90年代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古巴派出官方使团来北京学习中国的经济建设模式。中国人民向古巴提供用于制作校服的免费布匹以及100多万辆自行车，同时提供了建立5家自行车工厂所需的资金。到1994年，中国已经成为了古巴的第三大贸易合作伙伴。

然而，古巴的社会主义经验和其他面对危机的国家是不同的，原因就在于它面临着美国对其独立自主政策重新开始的以及难以缓和的敌视。与获得国家财政支持一样，古美间的贸易和投资也受到了影响。美国禁运法中的特殊条款规定，禁止所有美国方面的资金以及像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等受美国控制的多国参与的经济组织的资金流入古巴。古巴只能依赖短期贸易融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微弱的援助来支撑经济发展。

正当古巴可能会从冷战的结束中获益以及美国人的态度可能缓解的时候，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古巴的经济压榨。连续几届的美国总统不断向古巴施加压力，企图摧毁古巴经济独立的尝试，并希望借机推翻古巴的领导者。革命合法性的危机是每一个访问记者主要的写作素材，比如名为《卡斯特罗的最后时刻》和《世纪末的哈瓦那》的书。[②] 但是这些预言并没有实现。无论如何古巴成功地抵御住了外来威胁，卡斯特罗保卫了国家。多年以后，1998年《纽约时报》注意到卡斯特罗

① *Miami Herald*, 21 February 1998，引自 Aricri, *Cuba Today and Tomorrow*, 161页。

② Oppenheimer, *Castro's Final Hour*, *Jean-François Fogel and Bertrand Rosenthal*, *Fin de Siécle a la Havane*, *les secrets du pouvoir Cubain*, Paris, 1993.

满不在乎“关于他即将死亡的预言，和以前一样，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胜利”。[①] 外部旁观者的结论在当时看起来很明显，但却是不合时宜的。他们设想古巴会像东欧国家一样垮台。因为有这种想法，所以他们不只误读了古巴领导人的态度，也误读了古巴人民的态度。

古巴和东欧国家的历史经验完全不同。古巴经历了它自己的革命，是20世纪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也是经过一个多世纪艰苦奋斗的革命成果。无论它有多少缺陷，卡斯特罗革命是“古巴独有的”。而东欧国家在纳粹占领之后、抵抗纳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及1945年以后经历了徒有其名的革命，但是它们的社会主义在事实上被永久定义为是在苏联强势军队的干涉下进行的。因此，在1989年和1990年间当它们的政权崩溃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挽救旧的统治。 298

有更多的东西值得古巴人来保护——他们的历史、自我认同的意识以及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大多数古巴人支持他们的政府，因为尽管他们意识到了它的缺陷，但也看到了政府所取得的成功。[②] 虽然它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他们熟知革命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古巴人都这样想。一小部分人从来就不接受古巴革命，梦想着离开古巴。随着“特殊阶段”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许多人日益绝望，渡过90英里的海峡逃到了佛罗里达。

第三次人口大外流：马雷贡（Malecón）大道上的叛乱（1994年8月）

寻求进入美国的通途的经济移民问题——此系加勒比海和拉美国

---

① *Times*, 26. January 1998.

② 通过对一份1990年所得出的民意测验的分析，若热·多明格斯（Jorge Dominguez）对政府仍然能执政的原因进行了阐述，此时民众们已经事先发现了问题，并且明显表现出不满的情绪。在接受调查的民众中，仅有1/5的回应者认为食物供应良好，1/10的回应者对交通状况满意。通过这些不满的事实，若热·多明格斯认为这一测验可信，并且由此得出其他发现也都是可信的结论，即“3/4的回应者认为医疗服务不错，4/5的回应者认为学校状况很好”。对于多数民众来说，该体制的优点大于缺点。见 Jorge Dominguez，“The Secrets of Castro's Staying Power” *Foreign Affairs*, Spring, 1993。

家面临的一个较大问题——也是60年代以来古巴面临的棘手的有待解决的问题。1965年和1980年爆发了移民者被压制事件。没有古巴和美国的合作，这个问题最终是不会解决的，但是两国政府间的交流却很少。

1994年8月，哈瓦那市中心发生暴乱，使移民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次暴乱不只是那些想移居国外的人民之不满的显现，也是革命以来第一次大的公众抗议政府的行为。这次暴乱的发生事出有因。一是1994年初来自于海地的上万名"船民"通过航运到达了美国，由这一事件产生的"示范效应"。二是古巴和美国政府之间长期举棋不定的移民政策。但是问题的根源在于"特殊阶段"长期的经济困境。

8月5日下午，几百名愤怒的群众聚集在哈瓦那海滨那往日繁华不在的马雷贡大道上。清晨，一群人在港口劫持了一艘船试图逃亡佛罗里达，但是遭到了码头工人和警察的阻止。这已是两天内第二次发生这样的事件了，在第一次劫持事件中一名警察被杀害。很快，马雷贡大道上愤怒的抗议者开始向警察——作为发泄愤怒的手段——和一家附近的对外国游客开放的宾馆投掷石块和酒瓶。

有关当局迅速动员几千人的反示威队伍来平息敌对抗议者的情绪。按照殖民地时期西班牙总督们（1810年的索姆卢埃罗斯勋爵和1869年的达尔西将军）应对此类问题的传统做法，卡斯特罗也亲临现场。在严格指示警察要和缓处理问题后，卡斯特罗艰难地通过人群直接和抗议者进行对话。他的个人干预使得即将发生的危机出现了转机。两天后，50万群众参加了遇难警察的葬礼，这也被看作是支持革命的一个表态。

299

这特殊的一幕是以发生在海地的同类事件为背景的。3年前，即1991年9月，海地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Jean - Bertrand Aristide）的统治被军事集团推翻。他的垮台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萧条导致海地偷渡美国的移民数量急剧上升。1994年6月，大约5 000人偷渡到了美国，而在7月的第一周则达到了6 000人。美国当局拒绝让这些难民上岸，他们大多数人被美国海岸警卫队抓获，并被关押在

美国的关塔那摩海军基地中。9 月，大约 14 000 多名海地人被关押在临时难民营中。[①]

自“特殊阶段”以来，到达美国的古巴偷渡者（Balseros）或称“筏民”的数量也在逐年上升：1990 年是 467 人，1991 年是 2 203 人，1992 年是 2 548 人，而在 1993 年则达到了 3 656 人。如果这些古巴偷渡者在美国水域被海岸警卫队抓获，将会被“自然”接收为难民，这和海地黑人的待遇完全不同——他们被随意丢弃在关塔那摩的难民营，等待被引渡回海地。在正常形势下，驻哈瓦那的美国办事处只向少量的古巴人发放移民签证，然而，古巴人一旦到达美国水域就会被安置在难民所。古巴政府声称，美国拒绝那些合法移民者入境只会鼓励更多的偷渡者和劫持者进入美国。1994 年初，被美国政策激怒的古巴人告诫古巴自己的海岸警卫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阻止移民。成百上千的古巴人通过劫持渡轮、使用自制的木筏或是小船离开古巴，偷渡到美国。除了一小部分人溺死海中外，大多数人会安全到达美国水域，被救助上岸。

8 月的暴乱后，卡斯特罗声明，古巴政府将会放宽移民限制。任何想要离开古巴的人都可以离开。[②] 他希望他的决定可以使美国政策发生转变。数百人聚集在古巴海岸，乘小船或是木筏驶往美国。正如所预料的那样，美国非常地恐慌。由于害怕 1980 年 100 万多古巴难民偷渡迈阿密的马列尔海港事件重演，克林顿总统决定中止 1966 年开始生效的，给予古巴偷渡者以难民身份的《古巴修正案》。

克林顿做出这个决定也是出于自身的考虑。1980 年，阿肯色州的州长因为马列尔港事件而陷入了政治困境，卡特总统也因此遭遇政治低谷。约 20 000 名古巴人被安置在阿肯色州查菲堡（Fort Chaffee）军

① 一份报告提到，到该年末共有大约 50 000 名海地人和古巴人被囚禁于关塔那摩基地。有 7 000 名古巴人被运送到巴拿马运河区的新基地，那里的状况更差，而且有一个基地被烧毁了。这些古巴人们没有抱怨当地糟糕的环境，因为此时的他们怕的是被遣送回古巴。Robert Levine, *Secret Missions to Cuba, Fidel Castro, Berbardi Bebesm and Cuban Miami*, New York, 2001, p. 243.

② Louis Perez, *Cuba Reform and Revolution*, Oxford, 1995. p. 400.

300 事基地。1980 年 6 月，发生在这里的暴乱导致卡特连任的失败。[1] 1994 年，克林顿决定使古巴移民尽可能地远离美国，而作为海地难民营的关塔那摩基地可以为此提供借鉴。之后，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军基地也充分发挥了补充作用。

接应古巴“筏民”的美国海岸警卫队现在要在美国司法部长珍妮特·里诺（Janet Reno）的指挥下，把他们全部带到关塔那摩。美国围绕着古巴岛建立了海军警戒线。9 月末，约 21 000 多名古巴人被扣押在已经关押了 14 000 多名海地难民的难民营中。

难民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美国不得不永久改变其对古巴的移民政策，这正是卡斯特罗所希望看到的。9 月，两国达成了结束危机的一项协议，里卡多·阿拉尔孔代表古巴方面参与了谈判。美国同意每年向古巴移民发放 20 000 个签证，而古巴政府则承诺尽量减少非法移民数量。根据 1995 年 5 月进一步达成的美古移民协议，在公海扣留的偷渡者没有资格成为难民，他们将被遣送回国。此即所谓“湿脚、干脚”政策的确立。美国政府建议美国公民将来不要为任何“筏民”提供帮助。

为了显示对古巴的强硬政策，克林顿宣布将采取大量的措施以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包括禁止由美国向古巴的汇款。据估计，每年约有 5 亿美元资金以汇款方式从美国流向古巴；同时也结束了向家庭成员和学术研究者发放旅行签证的措施，增加对马蒂广播电台[2]的资金支持。[3]

被关押在关塔那摩难民营中的古巴移民一直到第二年才被允许进入美国。他们的数量增加到了 3 万多人，一些人已经在难民营中被关

---

① Morris Morley and Chris McGillion, *Unfinished Business, America and Cuba after the Cold War*, Cambridge, 2002, pp. 72 and 212.

② 马蒂电台是美国人建立的专门对古巴人进行西班牙语宣传广播的电台。——译者注

③ 1983 年 9 月美国国会授权马蒂（Marti）电台播报“有关古巴和其他地区所发生的事件的新闻、评论和其他信息，以此来推动古巴的自由进程”。电台得到了美国 1 200 万美元的赞助，并于 1985 年第一次对外广播。紧随其后的是马蒂电视台，它于 1988 年得到了美国的赞助。

押了9个月。海地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被遣送回了海地。

《托里切利法》和《赫尔姆斯－伯顿法》（1992年和1996年）

1991年，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或许会被人们认为能够导致古巴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这是许多欧盟国家的设想。他们扩大了驻古巴的使馆规模、提高了同古巴交往的水平并增强了经济联系。他们认为，古巴不再是美国大陆以外的超级核大国的军事联盟；古巴不会成为美国和拉美国家的威胁；古巴也没有能力再向非洲派遣援助部队。这是欧洲人的看法，美国人并不同意这种观点。美国和古巴两国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可以一直追溯到19世纪早期，20世纪这些矛盾进一步加深。美国的政治家们——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并没有寻求和古巴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而是加强了对古巴的敌对政策。 301

国际共产主义已经瓦解，但是美国政府也面临着内部的政治问题。古巴问题不再是美国外交事务中的重要议题，但是依然被列入国内议程。散布在美国的古巴人一直在选举中有着很大的分量。不管是在地方还是在国家选举上，美国总统和政府都依赖于选民的选票，而美籍古巴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选举体系之外。他们在国会中的游说能力是强大的，经常会通过控制相关的议员来影响立法。筹集竞选资金也是他们的一种重要能力。

由于美籍古巴人在国会中的积极活动及其在重要的佛罗里达州和新泽西州的动员作用，他们影响了后苏联时代美国对古巴的政策。新一代的美籍古巴人在美国国会拥有其直接的议员代表——佛罗里达州有林肯·迪亚斯－巴拉特（Lincoln Diaz－Balart）［卡斯特罗前妻玛尔塔·迪亚斯－巴拉特（Mirta Diaz－Balart）的侄子］和伊利纳·罗斯－雷廷恩（Ileana Ros－Lehtinen）、新泽西州有罗伯特·曼内德斯（Robert Menendez）。巴卡第兰姆酒家族的雄厚财力，以及拥有巨大财富和游说能力的豪尔赫·马斯·卡诺萨（Jorge Mas Canosa）——直到1997年去世前，他一直是佛罗里达美籍古巴人公认的领导者——他们

支持这些立法者对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采取强硬态度。由于不能再把古巴说成是美国安全的一个明显的威胁，他们开始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其他领域。对卡斯特罗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成为一个可以获得巨额资助的事业，因为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量研究补贴。他们更多关注的是30年前古巴岛上被没收财产的赔偿问题。相似的关于赔偿没收资产的运动在东欧各国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建立于80年代的马斯·卡诺萨（Mas Canosa）的古美基金会（CANF）现在在华盛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集团。卡诺萨本人1939年生于古巴，1960年离开了古巴。他曾支持猪湾事件，并且20年来一直资助流亡分子的活动。80年代，他被说服建立一个和高效率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相似的游说组织，因为该组织一直对华盛顿施加压力支持以色列。古美基金会是依照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两者在工作上也是密切配合。马斯·卡诺萨说道，“我们必须停止突袭，集中精力影响公众舆论和政府行为。”①

302

参与者并不十分理解这个组织的历史含义，美籍古巴人游说行动的作用就是复兴19世纪的“合并主义”②。虽然他们现在扎根于美国，但是许多美籍古巴人对古巴依然有怀旧之情，在他们的记忆里古巴应该是美国的一部分，苏联解体以后，他们看到了希望。他们开始谈论“转变问题”，并定期召开会议就卡斯特罗垮台后如何管理古巴等问题进行讨论。接受美国政府资助的迈阿密的学者们开始第一次深入研究古巴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不是出于政治宣传的原因，而是要理解，如果果真依他们所料想，他们被要求去管理这个国家时，要面对的是什么。许多迈阿密流亡者拂去契据上的灰尘以便将来换回他们原有的

---

① Morley and Mc Gillion, *Unfinished Business*, p. 12. 安·路易丝·巴尔达赫（Ann Louise Bardach）在其作品 *Cuba Confidential* 中的一章“一个将成为王者的人”中记述了马斯·卡诺萨的生平（第126—150页）。

② 即鼓吹将古巴合并于美国的主张，在19世纪西班牙帝国的势力衰落之后是古巴社会政治运动中一个很重要的派别。见本书第三章有关描述。——译者注

财产。

卡斯特罗密切关注这种事态的发展，他在1990年对学生解释道，如果在美国建立公司“将必须决定怎么样归还先前所有者，包括大地主、工厂主、外国企业以及出租房屋者的财产。我猜想这也包括学校的所有者，因为这里的一切曾经都有业主。”①

古巴民众也非常关注他们熟悉的环境可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但是卡斯特罗也发表了一项声明，以使那些做白日梦的流亡者看清现实：

> 我不知道他们将会如何管理国家，因为甚至是我自己，当穿过哈瓦那省的时候，在经过30多年来曾经走过的乡村以及参与建设的道路和高速公路上时也会迷路。我很难辨认出道路，即便是那些我曾亲自看到正在建设的、并且在建设期间经常参观的地方……我们的乡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我们的乡村到处是……学校、大坝、水渠、仓库、作坊、国有企业以及合资企业……我认为，没有一个仍然健在的人会知道他曾经的大庄园现在在哪里。他们有可能会在一个大坝的下面发现自己的庄园……我们的家乡不可能恢复原来的样子。

但是由于其他国家共产主义的垮台，许多美籍古巴人依然抱有希望，希望可以成为卡斯特罗政权倒台后的受益者。② 他们的固执己见和美国政府的新思想倾向不谋而合，后者自1993年民主党执政以来，比尔·克林顿一直推动改革运动，以提高拉美国家的民主程度。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美国政府的这种新措施是对这一地区80年代以来几个长期存在的军事政权垮台的回应。在冷战时期，那些军事独裁政权在牵制共产主义方面发挥了明显的作用，现在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尤其是由于它们在国内早已声名狼藉，在国外也因揭露出来的违反人权的内幕而被尽人皆知。克林顿总统就拉丁美洲的民主缺陷依然有相

303

① 1990年12月19日卡斯特罗对哈瓦那联邦大学学生的讲演。

② Susan Kaufman Purcell and David Rothkopf, eds. *Cuba: The Comtours of Change*, Boulder, Col,, 2000, p. 84.

当强的生命力发表演讲，这个演讲还产生了另外一个结果——这篇新的雄辩辞成了反对古巴的一个直接工具。

在古美基金会的压力之下，一项立法程序被提到了美国国会议程上，这些法案旨在通过施加更强硬的经济制裁来推进古巴的民主。1992 年通过的《古巴民主法案》［即《托里切利法》（*Torricelli Act*）］的目的在于遏制古巴贸易，并使古巴政府迅速瓦解。1996 年出台的《古巴自由与民主声援法》［即《赫尔姆斯 - 伯顿法》（*Helms - Burton Act*）］，旨在实施一项投资，最初制定这一法案是因为古巴经济的复苏，也担心美国对古巴的贸易可能会落于欧洲、加拿大和日本的投资者之后。其根本目的是当古巴经济的存续只能依赖于它的对外开放能力——即向欧洲、加拿大和日本、拉美国家寻求市场、投资者和学习管理技术时，吓跑外国的投资商。

古巴政府强烈谴责这些新法案，指出，它们是要通过推行强硬的经济封锁，向古巴推行所谓的民主，这些做法只不过是欲使曾为美国在古巴事务中起关键作用的 1902 年的《普拉特修正案》恢复。里卡多·阿拉尔孔指出，按照《赫尔姆斯 - 伯顿法》的条款，“将不再有古巴政府和古巴共和国。而美国总统将会筹划一个委员会来监管古巴经济。”① 然而，美籍古巴人却对这些新法案很满意。

1992 年的《古巴民主法案》是由新泽西州的民主党人罗伯特·托里切利（Robert Torricelli）提出的，而在新泽西州有大量的美籍古巴人。法案的第一部分是通过加强现行的经济制裁来破坏古巴的贸易：禁止美国公司在和古巴进行的交易时给予任何补贴；禁止任何进入古巴港口的船只在 6 个月内进入美国港口装卸货物。法案的第二部分涉及了民主问题。只有古巴实现了“自由、公正和国际监督下的选举”，美国总统才有权力解除经济制裁。美国总统还劝说古巴政府应该“给反对党以充足的时间来组织和参加竞选，要对媒体全面开放，尊重公

① Roy Joaquin, *Cub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Helms - Barton Doctrine*: *International Reactions*, Gainesville, Fra. , 2000.

民自由和人权并实行市场经济”。[1]

这些侮辱古巴民族主义的条款遭到了古巴政府的强烈反对。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中，也基本没有人来支持该法案。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对美国和古巴长期以来的争吵感兴趣。但是托里切利的提案却变成了《托里切利法》，而且其条款很快成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4年后共和党控制了国会，再次把注意力投向了古巴，希望通过强化经济制裁挫败外国投资进一步打开古巴经济的缺口。

304

这次主要的参与者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前主席）以及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议员代表丹·伯顿（Dan Burton）。由于得到古美基金会和巴卡第兰姆酒家族的支持，1996 年 3 月，他们提出了新的反古巴提案——《古巴自由与民主声援法》，这个法案远远超出了《托里切利法》的内容。

《赫尔姆斯－伯顿法》的一个有争议的部分就是它涉及了民主的强化问题。新法案重申，美国有权定义古巴的民主类型，并进一步扩大了“托法”列举的条款。该法案有一个特殊的条款，声称不允许菲德尔和他的兄弟劳尔加入任何古巴民主政府，古巴新政府只有在其承诺赔偿没收的美国人和美籍古巴人的财产时，才可以得到美国的承认。

然而，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争议的条款是涉及财产权的第 3 章内容。任何“非法交易产权”的个人或企业，包括属于美国公民的（或者原来是古巴人，之后加入美国国籍的人），或者是被古巴国有化的财产，都可以上诉美国法庭。（参见附录 3：《赫尔姆斯－伯顿法》的部分条款）这是拒绝承认古巴革命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成立了专门的部门以恢复 1959 年被古巴政府私占和查封的财产，以及巴蒂斯塔及其朋友的公司的财产。

《赫尔姆斯－伯顿法》引起了建立在欧盟国家的公司的关注——到那时为止，它们一直是古巴的主要外国投资者——这些国家很可能

---

[1] Purcell and Rothkopf, eds. *Cuba*: *The Comtours of Change*, p. 84.

已经通过融资卷入了与这类资产的合股。高额的诉讼费用足以威慑潜在的投资者。美国可以忽视古巴的不满，但是却不能对欧盟国家敌对的喧闹无动于衷。

克林顿总统反对这项新的法案，开始时并没有立即决定签署，但是1996年初发生了一件事，迫使他重新考虑这项法案。在1994年移民风波时期，美国司法部长珍妮特·里诺曾发布过一项命令，不允许美国公民为那些偷渡佛罗里达州的"筏民"提供帮助。这项命令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迈阿密的美籍古巴人继续在佛罗里达海峡到处搜救移民。迈阿密还建立了一个"拯救兄弟会"组织，拥有6架定期巡视的塞斯纳（Cessna）飞机。这个组织于1991年由何塞·巴苏尔托（Jose Basulto）创立，几年来已救助了数百名"筏民"。[①]有时候，他们的塞斯纳飞机进入古巴领空会遭到古巴战斗机的警告。

305

古巴人认为这是对1994年移民协议的破坏，是难以容忍的，也是非法的。1995年7月，古巴官方报纸《格拉玛报》也发出警告，如果"拯救兄弟会"继续进入古巴领空，古巴政府将采取报复性行动："任何外来的强行侵入我们领海的船只，我们将会予以击沉；任何侵入我们领空的飞机也将予以击落……仅指那些蓄意、计划、执行、容忍这些海盗行为的国家，对此发生的任何后果古巴将概不负责。"[②]

迈阿密的反古巴分子无视这种警告，继续他们的搜救行动。1996年2月，当他们再次进入古巴领空的时候，古巴空军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在发出一系列的警告后，古巴空军击落了其中两架塞斯纳飞机，结果4人死亡。古巴声称对于击落的迈阿密飞机将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为这些飞机驾驶员拒不接受古巴发出的警告。

美国公众因这一激烈的行为而感到耻辱，迫使克林顿总统立即签署《赫尔姆斯－伯顿法》，使之成为法律。这是历史性的也是决定性的一步，因为新法案对总统（包括将来的任何一位总统）控制外交的

---

① Bardach, *Cuba Confidential*, p. 133.

② *Grama*, 26 July 1995.

权力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古巴问题的决定将不取决于任何一位总统，美国与古巴的关系完全受控于美国国会。克林顿或是将来的总统不再有权取消对古巴的经济制裁，这个规定激怒了美国的贸易伙伴，最明显的就是欧盟，也激怒了希望可以永久进入古巴市场的美国国内的农场主和制造商。

欧盟强烈反对这个法案，把《赫尔姆斯－伯顿法》看成是对国际法的践踏，也是国家间贸易的障碍，于1997年在世贸组织中对美国进行了正式的投诉。为了安抚欧洲的盟国，也为了缓和法案带来的影响，克林顿使国会通过了一项修正案，允许总统有权在6个月内废除或者是加强《赫尔姆斯－伯顿法》第3章的相关法条规定。1996年7月，克林顿第一次这样做了，此后一直到他任期结束。2001年1月成为总统的乔治·W. 布什继续执行克林顿的政策。布什在竞选前曾承诺，将会加强《赫尔姆斯－伯顿法》第3章内容，但是现实主义占据了上风。2001年7月，布什第一次宣布推迟实施法案的第3章，之后一直如此。为了减轻古美基金会的指责，布什对古巴实行了更加严格的经济贸易封锁，但是收效甚微。

同时，作为对美国推迟实施第3章的回应，欧盟国家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同意在人权方面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出于共同的立场，欧盟各国起草了一份文件，声称现在推进民主改革和尊重古巴人权是欧盟国家的重要目标。欧盟将来对古巴的经济援助将会和古巴的政治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①]　306

《赫尔姆斯－伯顿法》似乎没有对改变局势有什么影响。古巴人或许渴望更大的政治自由，也或许希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一些人或者也企图放弃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很少有人准备抛弃古巴的革命利益而唯美国马首是瞻，或者放弃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建立独立共和国的真正尝试。

现在，古巴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不希望古美基金会控制美国

① Morley and McGillion, *Unfinished Business*, pp. 124 - 125.

外交政策的美国国内团体上。他们欢迎教会团体访问古巴；主动向农场主院外活动集团提出建议；寻求使新一代美籍古巴人向家乡亲友寄钱支持的可能；期盼建立友好的关系。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这项政策的各方面开始初见成效，另外1997年11月马斯·卡诺萨的去世也有助于这一政策的实施。马斯·卡诺萨的儿子小豪尔赫（Jorge Jr.）事实上并不是一个成功的院外活动家。虽然共和党在2001年赢得了总统竞选，但是民主党依然控制着国会，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出现了一定的平衡。发生在克林顿任期最后一年的两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影响了美国的态度，促使美国采取更加中庸的立场，这就是：1998年教皇访问哈瓦那和1999年在佛罗里达海岸因船舶失事被救起的小男孩埃连·冈萨雷斯（Elian Gonzalez）。

教皇约翰·保罗访问哈瓦那（1998）

1998年1月21日，教皇约翰·保罗飞抵哈瓦那机场。这是自古巴皈依天主教后，500年来第一个访问古巴的教皇。这位四处游历的教皇已经多次访问拉丁美洲国家，但是此次古巴之行远比早先的访问更具重大意义。这次访问吸引了北美媒体的注意，这些媒体猜想这位反共产主义的波兰教宗将会以其超凡的魅力影响古巴人民，使他们从政治束缚中解脱出来，“这一政治趋势最终会导致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垮台”。[①]

当教皇抵达哈瓦那时，华盛顿爆发了性丑闻，牵涉到了克林顿总统和白宫实习生莫尼卡·莱温斯基，这使媒体非常地沮丧。蜂拥前往古巴、希望可以及时报道古巴的这次重要的政治颠覆活动的各大媒体的记者和摄影师们纷纷撤离古巴飞赴华盛顿，以报道在他们看来更具有重要意义的趣闻。美国3家重要电视网络媒体的主持人在听到这则消息后立即离开了哈瓦那。这则新闻也成为了西方媒体优先考虑的报道。后来的事实证明，媒体在这两件事情上的猜测都出现了错误。美

307

① Jim Hoagland in the Washibton Post, 22 January 1998.

国总统并没有因此而下台，他的古巴对手也没有垮台。

从美国方面来讲，对教皇访问的解释既缺乏对天主教在古巴现实的考虑，也并不理解天主教在古巴的历史地位。一种流行的错误观点认为，古巴在某种意义上和波兰非常相似，即拥有大量受挫的信徒。几十年来，他们被苛刻的自诩无神论的政府剥夺了信仰的权利。教皇的访问刺激了古巴天主教的复兴，或许会激起对卡斯特罗的反对，从而导致他的垮台。这也是媒体兴趣的潜台词。

然而，古巴的情况和波兰完全不同。和一些拉美国家不同的是，尽管革命政府并非对有组织的宗教怀有敌意，但也一直对宗教采取淡漠的态度，几个世纪以来天主教会并没有在古巴生根发芽。1985 年，卡斯特罗向弗雷·贝托（Frei Betto）解释道："天主教并不是全体人民、工人、农民和贫穷者的教会。"[①] 接受天主教洗礼的古巴人超过了 400 万（古巴总人口约 11.3 亿），但是只有 15 万人定期参加礼拜。[②] 和许多拉美及欧洲国家一样，古巴越来越成为了一个拥有较少宗教信仰的社会。

和拉美国家一样，20 世纪 90 年代，古巴人民的宗教热情非常高涨，但是这种宗教热情源于新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徒。信奉福音派的人在古巴日渐增多。90 年代，大约 100 万名新教徒在古巴各地建立了 900 多所教堂，相比之下，天主教堂只有 650 所。[③] 实际上，梵蒂冈对于教皇访问古巴的部分热情在于，通过教皇的访问阻止新教在拉美国家的发展。福音派一直在拉美国家非常受欢迎，拉美国家最贫穷的社团是福音派重要的新会员。通过把天主教和古巴联系起来，梵蒂冈希望可以以此来抑制福音派对天主教的侵蚀。

其他的宗教教派也在古巴争取人们的情感和思想。信奉新教和天主教的人数和那些信奉各种古巴黑人宗教的人数比起来明显要少很多，

① Frei Betto, *Fidel and Religion: Conversations with Frei Betto*, translated by Mary Todd, Melbourne, 1990, p. 147.

② *Newsweek*, "The battle for Cuba's soul", 19 January 1998.

③ 数据引自一位哈瓦那的教授的论著 Azicri, *Cuba Today and Tomorrow*, 370 页。

据估计信仰黑人宗教的人数超过了500万。天主教从来就没有渗透到黑人团体中，在古巴黑人中萨泰里阿教（Santeria）、帕罗蒙特教[①]（Palo Monte）、阿巴库亚教（Abakua）的存在依然是其最重要的精神信仰。

在90年代的“特殊阶段”，卡斯特罗接触教会的新方法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政治模式。1991年，在古共“四大”会议上，经过长时间（而且是公开的）的争论，最后一致同意，有宗教信仰者可以加入共产党。发言人指出，一些早期的革命支持者都是基督徒，包括圣地亚哥“7·26运动”的领导者弗兰克·派斯，他是一个新教徒。而另外一些人则注意到许多革命者是萨泰里阿教的信仰者，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党应该允许其党员选择更广的宗教信仰和信念。大会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修改1992年宪法。古巴政府宣称，古巴是一个世俗国家而不是无神论国家。

308

为了给教皇的访问铺平道路并发出正式邀请，1996年11月，卡斯特罗亲自前往梵蒂冈会见教皇，教皇原则上接受了邀请。圣诞节重新成为古巴的一个全国性假日（这个习俗是100多年前，即1898年美国军事占领时期传入的，但是在1969年被取消）。

教皇的访问持续了5天，在古巴不同的城镇共举行了4次露天布道，这些布道全都在国内进行了电视直播。卡斯特罗和古共政治局领导亲自在机场迎接了教皇，并告诉其天主教会在古巴不理想的信仰情况。卡斯特罗回想起在天主教会学校的时候被这样教导，若想成为“一个新教徒、犹太教徒、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万物有灵论者，或其他的教徒，就构成了极其严重的犯罪，要受到严厉的、无情的惩罚”。他回到了一个他最喜欢的主题，即为什么天主教过去未能使整个岛上的人民都皈依它。“在我接受教育的一些富人和特权阶级的学校里，我突然想知道学校里为什么没有黑人，但我永远不会忘记

① 帕罗蒙特教源自非洲班图人，是以以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为特点的原始宗教，由黑奴带往古巴和拉丁美洲，在拉丁美洲有一定的信徒。——译者注

我得到了没有任何说服力的回答。”[1]

教皇就此回答道，天主教会在古巴已经存在了500年，从来“没有停止传播其精神价值”，然后他开始在整个古巴巡游。在返回哈瓦那出席由卡斯特罗和几位高官参加的最后典礼之前，教皇在圣克拉拉、卡马圭和圣地亚哥（劳尔·卡斯特罗此时在场）进行了露天布道。在他的布道中，教皇讲了很多自己最喜欢的话题：他认为有必要谴责避孕和堕胎，年轻人“要避免酗酒、性侵犯、吸毒以及卖淫”，另外国家也有必要远离一切极端的宗教狂热。他同意现在古巴流行的看法，阴郁地指出“许多地区正面临着一种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复兴，新自由主义使个人服从于盲目的市场力量，并以市场力量规范人们的发展”。

教皇也就同样的主题在其他地方不同的民众面前发表了演讲，但是对于古巴来说，教皇还得到了一些特别的信息。他注意到了“使整个家庭破碎以及很多人遭受痛苦”的移民现象。就如何促进国家的良性发展提出了建议，即要使每一个人“都拥有言论自由，在市民社会中发展自己的事业并提交建议案的自由，以及享受结社自由，从而能够有效地为实现共同利益而合作”。[2]他的许多建议得到了落实，但不是全部。天主教徒和皈依天主教的人群在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逐渐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09

教皇也试图恢复教会失去的声誉。在哈瓦那大学的集会上，当他提到天主教会在古巴历史中的作用时，引用了19世纪独立运动的先驱费利克斯·巴雷拉神甫的事例。他将巴雷拉描述成了“古巴民族认同的基石”，并提出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天主教会和古巴爱国精神之间

---

① Azicri, *Cuba Today and Tomorrow*, p. 370.

② 引自 Azicri, *Cuba Today and Tomorrow*, 262 页。

一直存在着联系。①

教皇的访问并没有解决天主教会对古巴大多数人信奉非洲—古巴宗教的态度。一些非洲—古巴宗教的领袖抱怨说，在教皇访问之前他们受到了天主教会的攻击，并在教皇举办会见新教徒和犹太教徒的大公会议时，他们也受到排斥。他们提议在大教堂中用“鼓乐仪式”欢迎教皇的请求也被拒绝了。② 他们还注意到，教皇曾告诫主教和神父“不得把萨泰里阿教和其他的黑人宗教与罗马天主教相提并论”。古巴的枢机主教海梅·奥尔特加（Jaime Ortega）对此回应说，古巴天主教会并没有非难古巴黑人宗教，只是表明天主教会不喜欢“共产主义政府向天主教推行黑人宗教的礼仪”，以及他们要以此来吸引旅游者的行为。

在欢送仪式上，教皇认为有必要提到美国的经济封锁政策，这也是卡斯特罗所期盼的：

在现代社会，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孤立地生存……因此古巴人民不能被阻止与其他各族人民进行必要的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交流，尤其是当不分青红皂白地用强加的解决方法打击他们的时候，就使得贫困的人民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更加困难，比如对粮食、医疗和教育的需求等……这种痛苦的根源是可以找得到的……在于对基本自由的限制、在于使个人丧失了个性和信心，以及在于来自外部势力的——不公正的、在伦理上难以被人接受的——压制性的经济手段。

教皇离开之后，卡斯特罗发表了电视讲话，感谢古巴人民帮助他

① 菲利克斯·瓦雷拉（Felix Varela）是19世纪初哈瓦那大学的一位支持革新的哲学教授，是第一位用西班牙语而非拉丁语授课的人。他参与组建了19世纪20年代（即1820—1823年的自由时期）派往马德里的西班牙国会的政治代表团。作为拉丁美洲独立的早期支持者，他是一位激进的教育改革家和废奴主义的倡导者，提倡在对奴隶的拥有者进行补偿的前提下，立即给予奴隶自由。1823年名为“玻利瓦尔独立王国”的阴谋被揭穿后，教父瓦雷拉和其他自由主义者逃到了国外。

② Azicri, *Cuba Today and Tomorrow*, p. 262.

取得了“历史性访问的成功”。卡斯特罗曾希望从中受益，他也确实成功了。[①] 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消费保护主义方面，他赢得了教皇的支持，也获得了教皇对美国经济封锁政策温和的谴责。他将允许天主教会在古巴社会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但是他的发言人却概括了天主教相对有限的作用。里卡多·阿拉尔孔向《泰晤士》杂志解释道，虽然他赞同天主教在提高“人们精神、社会人情味和人类团结中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是将会对其世俗活动进行一些限制。天主教会将永远不会像过去一样处于最高支配地位。“我们不能回到一种宗教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因为这是对其他宗教的一种歧视。国家有义务保证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这就需要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宗教。”[②] 新教徒和萨泰里阿教的信仰者将受到同样的待遇。天主教会不拥有任何特权。

310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是一个保守的神学家：他反对在拉美国家流行的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对话；他不是弗雷·贝托及其第三世界运动中神甫朋友的狂迷者；他严厉指责著名的巴西神学家莱昂纳多·波夫（Leonardo Boof）的激进作品；实际上也强烈谴责了解放神学的支持者。但很难进一步想象他会对共产主义采取温和态度。

然而，他承认古巴革命仍然有其想象中的魅力，不只是在古巴而且在拉美国家的大多数人中间也是如此。他有必要在自己的管辖领域反对独裁者的统治，他通过这样做使全世界公众开始关注他的教会的福音。他也从古巴教会中得到了一些具体的收获，这使教会恢复了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被教皇提及的费利克斯·巴雷拉，在古巴岛这个开始带有天主教标识的地方，成了反对势力的一个口号，他们中的一些人把目光转向了欧洲而不再是迈阿密。

埃连·冈萨雷斯事件（1999）

埃连·冈萨雷斯是卡德纳斯镇的一名 5 岁的小男孩，1999 年 11

① 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危地马拉和多米尼加共和国重建外交关系。

② Azicri, *Cuba Today and Tomorrow*, p. 268.

月，他被发现依靠一个货车轮胎内胎的支撑漂浮在佛罗里达附近的水域上。他是天气不好时从古巴偷渡美国的一小群人中的一个幸存者，同时获救的还有两个人，他们乘坐的是一艘小型的不适于航海的小船，另外还有一艘摩托艇。在几乎要看到海岸时，小船翻了。埃连的母亲和其余的 11 人全部溺水身亡。[①]

埃连被他在迈阿密的亲戚所收留，对方给了他一个永久的家。埃连的父亲仍然在古巴，希望埃连可以返回卡德纳斯的家中与他团聚。华府同意埃连父亲的要求，与佛罗里达的古巴人团体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个小男孩成为长达 6 个月之久的政治风暴的中心，古巴政府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取得了胜利。在美国最高法院干涉之后，美籍古巴人在辩论中失败，埃连最终被允许返回古巴。

311 这不只是家庭团聚政策的一个胜利。埃连事件的争论使美国公众进一步对美国只是为了取悦佛罗里达和新泽西州的古巴流亡团体而孤立古巴的政策，产生了新的怀疑。这一政策并没有取得实际的成果，在埃连返回古巴以后，一些重要的美国商业利益集团，特别是农民和贸易者都尽力寻找和古巴进行商业往来的可能性，他们开始更有力地反对美国政府。

埃连事件也是美籍古巴人团体的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他们也渴望有一天回到没有卡斯特罗的古巴。关于这个古巴小男孩的争论暴露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也说明了几十年来古巴和美国之间还是发展起了新的更加融通的关系。曾经一度分离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仇视也就像那些在革命或者是内战中彼此对立的人们一样，现在，卡斯特罗在古巴的支持者和迈阿密的流亡者之间的关系是意味深长的，也是复杂的。自 70 年代卡特政府执政的最后一年开始，前往古巴进行家族访问已成为可能，这一行为在 90 年代更受古巴政府的鼓励。定期的交流如此频繁以至于古巴政府在哈瓦那机场建立了新的入口以单独处理往返于迈阿密、纽约和洛杉矶的家族航班问题。据说，自 1978 年以来，迈

---

① 巴尔达赫的作品 *Cuba Confidential* 详细记载了埃连的故事。

阿密和哈瓦那之间的航班大约售出了 100 万张机票。

古巴也受到当时在整个加勒比海地区和许多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的影响——男女青年被美国的经济机遇所吸引，寻找任何可能进入美国的途径。他们到达美国找到工作后，就会寄回其收入的一部分资助国内的家庭。从墨西哥到秘鲁、从洪都拉斯到萨尔多瓦，年轻的拉丁美洲人就这样涌进了美国。古巴大约每年能够从流散在美国的古巴人中接收到 10 亿美元的汇款收入，虽然这和 90 年代损失的共产主义世界对古巴的蔗糖补贴和财政支持相比只是很少的补偿。

据报道，埃连的父母是典型的古巴公民。尽管他们是当地革命国防委员会（CDR）和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成员，但是对政治并没有特殊的兴趣。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顺利的。埃连的父亲胡安·米格尔·冈萨雷斯（Juan Miguel Gonzalez）是一名在旅游胜地瓦拉德罗工作的出纳员，经常接触美元经济；埃连的母亲伊莉莎（Elisa）也在那里工作。夫妻两人曾协议分居，但是最终还是离了婚。胡安·米格尔再婚，伊莉莎则与一个叫做拉法（Rafa）的年轻人同居，而拉法并不是一个规矩的公民。他曾经多次出入于军队、监狱，也多次往返于古巴和迈阿密。他和一群朋友以及亲属，带着伊莉莎和埃连一起，开始了最后一次偷渡佛罗里达海岸的不幸的航行。伊莉莎和拉法两人全部溺水身亡。 312

埃连最初被带到了迈阿密儿童医院。美国移民局把他移交给了他的叔祖父拉萨罗（Lazaro）照顾。冈萨雷斯家族自 1959 年以后，就有几代人来到佛罗里达，拉萨罗是 1984 年来的。虽然埃连的父亲要求归还小埃连，但是迈阿密家族收养埃连的决定很快就得到了古美基金会的支持，古美基金会立即抓住这一事件的政治可能性，以从共产主义国家救出孩子为口实发动了美籍古巴人社团的行动。古美基金会印制了有埃连图像的海报，他被描述成一个受卡斯特罗迫害的“受害儿童”。或许，他们最初曾幻想埃连的父亲也会选择来佛罗里达和埃连一起生活。

胡安·米格尔很快使他拥有这种想法的亲戚省悟了过来，他要求

美国政府立即归还他的儿子。美国移民局考虑到程序上的问题和这件事情的政治含义，一直行动缓慢。也由于当时正值圣诞节假期，一直到 2000 年 1 月 5 日美国移民局才允许埃连回古巴和父亲团聚。

在古美基金会的支持下，其迈阿密的亲戚试图通过法庭控告移民局，并要求其同意埃连政治避难。为了使他相信美国的快乐生活，在他 6 岁生日后的一个星期，亲戚们带他去了迪斯尼乐园。1 月，佛罗里达的法官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直到 3 月份召开听证会来决定埃连返回古巴是否还有危险之前，他应该继续留在他的迈阿密亲戚那里。这次美国联邦政府卷入其中，司法部长珍妮特·里诺拒绝承认佛罗里达法庭的判决。里诺自己也是来自佛罗里达，曾是戴德郡的一位律师。她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卡斯特罗执政的古巴政府发现古巴在这件事情中占有极大的宣传优势。卡斯特罗让古巴政府做好准备。既然埃连的母亲已经去世，谁可以否定他与父亲居住在古巴的正当权利？大批群众聚集在马雷贡大道上的美国大使馆外面，抗议迈阿密做出的判决。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法律辩论仍在继续。甚至在古巴和美国，这件事情成了电视观众的晚间消遣。当埃连的祖母和外祖母被允许飞往纽约催促埃连回国的时候，事态进一步扩大了。在华盛顿，珍妮特·里诺同情她们的现状，尽管最后允许她们见埃连，但是却很难使她们突破迈阿密的亲属们对埃连的保护。

313 这件事吸引了美国媒体的注意，不只是因为人们对它内在的兴趣，还在于它所产生的政治影响。这一年是总统大选年。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将会在 11 月举行的大选中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3 月，为了在佛罗里达州拉选票，他越过了政府公务人员的底线。他呼吁应该给予埃连在美国永久居住的权利。但这并没有为他带来任何好处，因为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3% 的迈阿密选民希望埃连被送回古巴。就整个美国的民意调查而言结果亦然。

政府的律师们和埃连的迈阿密亲戚仍在继续协商，在美国国务院给埃连的父亲签发了去看望儿子的签证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一案件开

始有所突破，然而迈阿密的亲戚仍然希望劝说他留在美国。虽然埃连的父亲对古巴的忠心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双方看起来像是在下大的赌注。4月，法庭对迈阿密的判决做出了进一步的决定，埃连“在这个国家是实际存在的，因此应该听凭联邦政府的处理”，州法院不能“推翻将他归还给他父亲和古巴的决定”。和参议员托里切利一样，珍妮特·里诺试图作为中间人来和迈阿密家族进行个人接触，但是什么也不能打破他们收养这个孩子的决心。

最后，在4月的一个清晨，联邦特工来到了埃连的住处，强行破门而入。藏在柜橱里的埃连被带到一个武装特工的面前，这一幕恰巧被当地的一名记者抓拍了下来，很快照片就出现在全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几个小时后，埃连和他的父亲在华盛顿城外的空军基地团聚，此时出现了一个更加幸福的画面——埃连被父亲紧紧抱起。然而考虑到法律细节，他们必须在美国再待一个月才可以回到古巴。6月底他们最终回到了哈瓦那，里卡多·阿拉尔孔在机场迎接了他们。整个事件对古巴来说是一次完胜。

然而，关于黎明前的突然搜查的争论再次使美国产生了分歧。在11月的总统竞选中，共和党的候选人乔治·W. 布什声称，“大多数美国人看到的那个画面——埃连被一名拿着自动武器的官员紧紧地抓住，并不是美国的真实表现”。除了《迈阿密先驱报》和《华尔街日报》外，美国新闻界都站在了埃连父亲的一边，尖锐地批评了那些试图把埃连留在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古巴人。大卫·里夫（David Rieff）在《纽约时报》中把迈阿密反古巴团体描述成了“美国政体内一个无法控制的香蕉共和国”。①

何塞·巴苏尔托是一位长期流亡的领导者，也是拯救兄弟会的创建者，曾写道，他“不会在意美国民众是如何看待古巴流亡团体的”。②一个激进分子做出这样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是政治的不幸。一 314

① Bardach, *Cuba Confidential*, p. 100.
② Bardach, *Cuba Confidential*, p. 100.

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不仅开始反对迈阿密团体，而且现在70%的选民认为应该取消对古巴的经济封锁。[1] 但是11月在佛罗里达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在此前的两次总统竞选，即1992年和1996年的竞选中，大多数的迈阿密古巴人选择了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但是2000年11月，共和党候选人乔治·W. 布什宣称他已经赢得了各州竞选和总统竞选，尽管这个竞选结果引起人们强烈的质疑。古巴的胜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异议和对立（1991—2003）

在“特殊阶段”初期，出现了一种反对革命政府的新形式。60年代，几个公开的反革命组织在美国的支持下从事恐怖活动，他们一直在进行一种秘密战争，使全国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但是从来没有达到其推翻政府的政治目标。几年后，许多反对者放弃了斗争，通过申请美国签证最终到达了迈阿密，选择了流亡。90年代，政府面临着一个新的现象：那些不再关注革命但是仍然在国内的公民们试图从内部进行改革。这些人经常是一些职业中产阶级，他们遭受了“特殊阶段”穷困经济条件下的沉重打击，也缺少接近美元经济的途径，而那所谓的美元经济，却使其他国民——那些在迈阿密定居的或是在旅游部门工作的人们的亲属可以保持基本的生活。

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国际媒体逐渐如此称呼他们）经常从事经济上的斗争，但是由于缺少思想自由，政府也不愿接受关于未来发展道路的任何重要的内部讨论，因此他们也感觉自身受到了压制。随着苏联的解体，30年来被称为“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尝试也走到了尽头，许多人要求拥有参与关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公众讨论权利。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从经济上来说并不具有强大的实力，在经济意义上他们也只是中产阶级，但是许多人都是有才智的，并且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有一种强烈的认识——在现有的体制内，他们的能力并没有发挥

---

① Bardach, *Cuba Confidential*, p. 289.

出来。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外部世界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之风，这些人也对它将会对古巴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感兴趣。

1997 年，一组对改革进程不甚乐观的经济专家公布了抨击政府经济策略的一个文件。这个在古共“五大”召开后完稿的，标题为“国家属于每一个人”（*La Patria es de Todos*）的文件，批评古巴共产党坐守过去取得的革命成就，却没有为改善未来的经济局势提供建设性的意见。这个小组最杰出的成员弗拉迪米罗·罗加（Vladimiro Roca）并 315 非一个天生的破坏分子。他是古巴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布拉斯·罗加（Blas Roca）的儿子，曾是空军部队的一名飞行员，后来在政府部门工作，负责管理外国投资事宜。他和另外 3 个专业人士通力合作，急切地渴望讨论其他的经济策略。这 3 个人是工程师菲利克斯·鲍恩·卡尔卡塞斯（Felix Bonne Carcasses）、律师雷内·戈麦斯·曼萨诺（Rene Gómez Manzano）和经济学家玛尔塔·贝亚特里斯·罗克（Marta Beatriz Roque）。

这伙人实际上不能被描述成一个反革命组织，然而政府从来没有觉得应付这些理智的持不同政见者是一件容易的事，显然也对这个小组织可能会对社会其他部门潜在的不满成员产生影响有所警觉。几年前，政府就严格立法以应付反革命者的对抗行为，由于古巴一直遭受美国的封锁，因此任何关于未来经济策略的讨论很容易被定义为是从事颠覆性的活动。1999 年，这 4 名批评者被控告扰乱治安和危害国家经济遭到逮捕，并接受法庭的审判。鲍恩、戈麦斯和罗克被判处 4 年监禁，但是由于加拿大、莫斯科方面和梵蒂冈的求情，他们在第二年就获得了自由。罗加直到 2002 年 5 月才被释放，因为他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多是出于对政治而不是经济上的考虑。他声称古巴的体制难以运行，需要进行改革。他主张，即使卡斯特罗仍然掌权，也要推行改革。在狱中他改信了天主教，并告诉记者应当通过和平的以及合法的形式进行改革。“我不寻求冲突”，他说道，“我寻求的是和谐。”

在罗加“集团”之后，出现了一个与天主教会有密切关系的政治集团。以 19 世纪独立运动的先驱者费利克斯·巴雷拉命名的巴雷拉计

划（Varela Project），它是早些时候与一个称为"基督教解放运动"的组织有过联系的奥斯瓦尔多·帕亚（Osvaldo Paya）开创的。巴雷拉计划从一开始关注的就是政治改革而不是经济改革，它比罗加集团更加激进，更加缺少理智。它的任务是征集请愿签名，要求就改革国内一党政治体制问题进行公民投票。1976 年的宪法条款规定，公民可以提出新的立法方案，条件是他们要得到不少于 1 万名公民对他们提案的支持。帕亚广泛的请愿书还包括要特赦政治犯；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尊重自由结社的权利；给予私人企业更多的发展机会等内容。由于呼吁拟定新的选举法和举行新的选举，请愿活动停止了。帕亚告诉记者，"古巴的每一个方面都需要改革，巴雷拉计划就是和平地不排他地实现这些改革的途径。"①

316 罗加曾经反对巴雷拉计划，他那伙人中的一个成员玛尔塔·贝亚特里斯·罗克声称，试图改革卡斯特罗政府制定的宪法是不现实的。然而，他出狱后认为巴雷拉计划是可以实施的，因此又宣布他将会支持其实施。

另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团体是由赫克托·帕拉西奥斯（Hector Palacios）领导的众所周知的"大联合会"（Todos Unidos），该组织也赞成巴雷拉计划的在古巴克服"文化恐慌"的设想。帕拉西奥斯团体的人抱怨道，当上千人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时候，许多征集签名的积极分子遭到了言语的和肢体的攻击。他们遭到"扣押、搜身、威逼、虐待和羞辱"。

2002 年 5 月，在吉米·卡特访问古巴前夕，当帕亚按期在哈瓦那把由 11 000 人签名的请愿书提交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时候，巴雷拉计划发展到了极致。在古巴电视台现场直播的演讲中，卡特宣布支持巴雷拉计划，但是卡斯特罗已采取行动取消了这个提案。当年晚些时候，古巴政府举行了公民投票，以支持古巴现行宪法不可改变的"社会主义"特点。至此，任何累计的签名数量都不能改变这个公投

① 2002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路透社从哈瓦那报道。

结果。

持不同政见者面临的最严重困难是，必须使他们的活动脱离那些由迈阿密流亡者或哈瓦那的美国“照管利益办事处”组织的活动，最后结果证明这是不可能的。美国政府承诺支持古巴的“民间团体”，很快就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以使各地的收音机能够收听到马蒂电台的广播，并资助建立了“独立的图书馆”。或许对巴雷拉计划不利的是，它得到了美国政府公开的支持，2002 年驻哈瓦那的美国高级外交官维基·哈德尔斯顿（Vicki Huddleston）向记者描述，近期最重要的活动都是古巴的反对者组织的。她的继任者詹姆斯·卡森（James Cason）更是公开地支持持不同政见者，邀请他们进入大使馆使用便利的设施，并通过让他们环游古巴来为反古活动提供鼓励和支持。

2003 年初，古巴政府发布了镇压令，包括罗加在内的 75 名敌对派成员被逮捕，他们被指控与一个敌对势力相勾结。帕亚则可能是因为他已经在欧洲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被认为很少参加美国使馆的活动而幸免于难。这是一个困难而重要的时刻。布什政府对古巴恢复了舆论上的敌视，联合国因支持伊拉克战争而声誉骤降，以及卡森正在积极资助和组织那些反对势力，所有这些都得卡斯特罗全力应付。由于几个特工早已潜入反对派的组织中，其中一两个还是领导者，所以古巴政府很清楚反对势力所进行的活动。

317

同时，最近一次飞往佛罗里达的飞机被劫持事件使卡斯特罗认识到，古巴将会再次成为一次骚乱制造者的牺牲品。2003 年 3 月，当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时候，政府曾料想在最坏的时刻古巴也可能会遭到入侵，到时可能会再次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当佛罗里达的美国当局拒绝劫持者返回哈瓦那时，古巴人决定在下一轮可能落到他们手中的劫匪身上施行报复。一艘渡轮在哈瓦那港口被劫持，但在它驶往佛罗里达途中由于燃料不足被古巴海岸警卫队俘获，并被押回了哈瓦那港。劫持事件的 3 名头目被逮捕，受到审判，被判死刑。

死刑判决在世界上引起了普遍的抗议，最明显的就是一些欧盟国家，这些国家长期以来视死刑判决为非法。虽然这个严厉的决定可能

会阻止发生严重的危机，但是它破坏了卡斯特罗欲将欧洲人与美国人区别对待的长远策略。自《赫尔姆斯－伯顿法》宣布以来，许多欧洲政府都试图和古巴建立不受美国支配的外交关系。现在这些国家被迫以维护人权为借口，甚至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迫于反对死刑判决和监禁的公众舆论的压力，更加亲密地接近美国。

众所周知，卡斯特罗的战略一直是勇往直前的，他带领抗议游行队伍前往西班牙驻哈瓦那的大使馆，旧的殖民者西班牙一直被认为是欧洲敌对古巴的罪魁祸首。事情发展的结局进一步强化了古巴对外部世界的蔑视，也增加了自身的孤立感。

21 世纪的古巴

尽管古巴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步调不一致，但是其在技术上却是正确的。2001 年 1 月，古巴庆祝了基督教第 3 个千禧年的到来和 1959 年革命的又一个周年纪念日。卡斯特罗已经 74 岁，在他弟弟劳尔的陪伴下，他在古巴的执政时间已经超过了 40 年。他精于世故，在谋略上战胜了自艾森豪威尔到克林顿相继就任的 9 位美国总统，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比这些总统活得更长久。[①] 卡斯特罗很晚才信仰共产主义，曾经是苏联的亲密盟友，与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 6 位苏联领导人合作过。[②] 他也是为第三世界所有重要的领导人所熟知的提倡革命和反对殖民斗争的坚定卫士。[③] 2003 年 2 月，卡斯特罗和 91 岁高龄的武元甲（Giap）大将，即在蒙卡达攻击一年后的 1954 年于奠边府战役中击败法国人的越南战士，在河内一起品茶。

---

① 卡斯特罗当政时期，美国的总统相继是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

② 卡斯特罗当政时期，苏联的领导者是赫鲁晓夫、柯西金、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③ 在下列这些人中，卡斯特罗是寿命最长的一位：铁托（Tito）、纳赛尔（Nasser）、本·贝拉（Ben Bella）、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ne）、恩克鲁玛（Kwame Nkrummah）、尼雷尔（Julius Nyerere）、杜尔（Sekou Toure）、萨莫拉·马谢尔（Samora Machel）、阿米尔卡·卡贝拉尔（Amilcar Cabral）、阿戈什蒂纽·内图（Agostinho Neto）、尼尔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卡扎菲（Gadafy）、穆加贝（Mugabe）和门格斯图（Mengistu）。

新千年，卡斯特罗继续访问第三世界国家，除了纳尔逊·曼德拉以外，他是年轻的观众渴望看见和聆听其讲演的唯一政治人物。他不断地发表反对资本主义国家非正义行为的演讲，但是减少了其早年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他使用着应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兴运动的语言，并很快在名义上成为这些运动的倡导者。卡斯特罗继续坚持反对曾经一度困扰古巴社会的极端种族主义。2001 年 9 月，在南非召开的一次联合国大会上，他表示将支持那些遭受奴隶贸易迫害的国家和人民的赔偿要求。他呼吁“超级霸权国家”应该偿还“对非洲裔美国人、居住在保留地上的印第安人、上千万拉美国家和加勒比海地区移民，以及来自其他贫穷国家的移民的赔偿，不管他们是混血人、黄种人，还是黑人，他们都是罪恶的种族歧视的受害者”。①

318

卡斯特罗一直在到处寻找可能的盟友，有时在遥远的其他大陆上，有时又近在咫尺。他在邻邦委内瑞拉找到了一个心灵挚友，与乌戈·查韦斯上校（Colonel Hugo Chavez）成了亲密的朋友，并派遣了 1 万名古巴医生帮助解决委内瑞拉贫困城镇的医疗问题。这种关系的优势在于至少使古巴获得了委内瑞拉定期的石油供应。为了进一步和远方的国家建立关系，2001 年 5 月，他访问了正统派穆斯林的德黑兰总部，在大学的演讲中他告诉学生，他相信“帝国主义者终将垮台”。而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使他确信，伊朗和古巴联合起来一定能够“战胜美国”。

在新千年后，卡斯特罗的政府不再由那些白发苍苍的 50 年代的老游击队员管理。取而代之的是毕业于国内大学和技术高校的从各省招募的年轻人。政府将远离革命老兵的控制。2001 年，里卡多·阿拉尔孔宣称，古巴政府和共产党中大多数人的年龄都没有超过 40 岁。② 许多年以来，卡斯特罗被年轻人所环绕，他关注着每一代新的大学毕业生的出现，并把最优秀的紧紧抓住，留在他身边工作。

---

① 2001 年 9 月 1 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德班（Durban）的演说。

② 见同里卡多·阿拉尔孔（Ricardo Alarcon）的会面，发表于 *El Nacional*，Caracas，12 July 2001。

恩里克·奥尔图斯基是一个30年代出生的老卡斯特罗主义者，几十年来一直在渔业部工作，他强调了其所在部门为提升年轻人的地位作出努力："除了我以外，我们部门其余的副部长都是30—35岁之间的年轻人。我们一直在提拔年轻人，因为国家的未来是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奥尔图斯基说道，在古巴，把年轻人提升到较高的位置是有特殊原因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如果他们不掌管国家政权，就会反抗国家。这就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发生的事情，老兵不想放弃掌握的权力，年轻人只能起来反抗。因此，政府中95%的职位都是被年轻人占据。"[1]

319 毫无疑问，一些年轻人是在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后苏联时代成长起来的，但是他们并不缺少后革命时代的愤世嫉俗。一些人深情地回想起——由于他们热爱美国的音乐、艺术和文化——古巴和美国历史上的长期亲密关系。华盛顿的那些认为经济封锁将会"推动古巴走向民主和市场经济"的人们，把这种理念置于上述这个阶层的人们中间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需要的历史性含义。因为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并在卡斯特罗革命中巩固和扩大的古巴民族主义传统的一个本质，就是要求摆脱1902年《普拉特修正案》所强加的美国对古巴的监管。[2]

1997年，当参与了反对猪湾入侵战斗中的资深领导者何塞·拉蒙·费尔南德斯将军被问到人民对革命的普遍态度的时候，他的回答是现实而镇静的：

我并不是说……在古巴没有不满足的人群，或是不赞成社会主义的人群……我们物资短缺，生活必需品匮乏，面临着种种困难。我们在铤而走险，险象环生。一些人更喜欢享受，喜欢更加舒适的生活，

---

① Enrique Oltuski, *Vida Clandestina: My Life in the Cuban Revolution*, New York, 2002, p. 288.

② Purcell and Rothkopf, *Cuba: The Contours of Change*, p. 100.

不想奋斗。而且，也许存在这样一些人，有意或无意地把一件衬衫、一条裤子或是一辆车看得高于国家主权或社会正义，很明显这些人对革命是没有热情的。①

在古巴，老一代人满足于他们早年的记忆，出版了许多著作来叙述革命战争中的胜利。中年人回忆他们在非洲的战争（仅在安哥拉服役的古巴士兵就有30万），也可能是怀念他们在格林纳达和尼加拉瓜渡过的时光。另一些人记起了与苏联以及原来共产主义世界的一些不引人注目的国家间的长期关系。超过30万的古巴人仍然说着流利的俄语，数千人说的是捷克语、保加利亚语、波兰语或是德语，唤起人们对一度在经互会石油交易中所需要的翻译者群体的回忆。

古巴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推翻了3个强国——西班牙、美国和苏联——压迫的国家之一。这3个国家都在古巴岛和人民身上留下了重要的烙印：历经岁月侵蚀的建筑遗迹、艺术制品和混血儿。俄国人是最后到来的，也是最后离开的，而且在21世纪初，除了大量的不适合热带气候的褪色的混凝土建筑外，他们留下的只不过是一种记忆。

卡斯特罗革命使古巴在地图上的存续时间超过了40年，而且使这个岛屿成为世界舞台上永久的存在。他在古巴人民中激发了一种看不到，但却能真实感受到的民族自豪感。外国参观者们可能会忧郁地注视着哈瓦那大片荒凉的、无人照看的草坪，但是很少有人会想起古巴那些健康的穿戴整洁的人们的开朗和乐观。古巴的革命没有以同室操戈的冲突而结束，却持续地培养出了新的一代又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这些人被他们的统治者卡斯特罗和他的革命所激励，拥有成熟的爱国主义情感，为国家悠久的历史和人民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 320

卡斯特罗辞职（2008年2月）

卡斯特罗的第一次致命性疾病的预兆发生在2004年10月20日，

① 1992年的会见，载于 *Making History*, p. 103。

在圣克拉拉省切·格瓦拉的陵墓发表公众讲话后，最高领袖（*maximo lider*）重重地摔倒在地。他的手臂骨折、膝盖粉碎性骨折，在一段时间内只能坐在轮椅上。尽管遭受了这次挫折，他依然严格按照日程的安排出现在电视台上。2005 年 3 月，他宣布，早在 15 年前苏联解体时就开始的节制消费的“特殊阶段”结束。古巴在拉丁美洲拥有了新的盟友，特别是为其提供经济和政治补给的委内瑞拉和巴西。

2006 年 7 月 31 日，卡斯特罗遭受了一次更加严重的疾病打击。在一次紧急肠道手术后，他正式把权力暂时移交给他的弟弟，即他的助手劳尔，并召集了 6 位高级官员组成的领导班子。尽管他接待过一些外国领导人的来访，特别是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和巴西总统卢拉（Lula de Silva），但是他从来没有痊愈，也不再公开露面。2007 年，为了让人们记得他还活着，以及让人们注意古巴和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卡斯特罗开始定期在《格拉玛号》上写专栏文章。

终于，在 2008 年 2 月 19 日卡斯特罗 81 岁的时候，他通过他的专栏向人们宣布辞去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革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他说，之所以没有提前辞职是因为“在奋斗了许多年以后”，他的第一义务是让人们“从心理上和政治上”做好他不再执政的准备。谈及持续衰弱的身体状况，他说道，政府的任务“要有流动性，承担起总的责任，但是我已不再拥有健康的身体条件”。

劳尔·卡斯特罗比菲德尔小 5 岁，自 50 年前蒙卡达攻击开始就是菲德尔的密友，他成为古巴的新任总统。虽然大多数人盼望可以有一个漫长的过渡期，但是改革依然悬而未决。



后　　记

近些年我多次回到古巴，拜会老朋友，采访部长级官员，同历史学家交流。这些唤起了我尘封的记忆，同时也给我留下了一些新的印象，并且为本书收集了素材。40年的时间，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但是更多的东西依然如故，共产党政府通常容易被忽略的吸引力之一，就是它控制时间的能力。曾经期望改变世界并且推动全面现代化的政权，要使他们的人民满意，在行动上依然是采取坚定的保守主义。

321

古巴依然如故。今日旅游者对古巴的兴趣，除了阳光和沙滩，还在于其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的最后一点星火，而且可以发现半个世纪之前那个时代的世界。我在自由哈瓦那旅馆（Havana Libre）住了数日，那里曾经是希尔顿酒店，革命爆发之前兴建于老城区西部曾一度豪华时髦的维达多区（Vedado）。在我年轻时，酒店里满是来自拉丁美洲各地的革命党人，有忠诚的游击队活动家，也有不切实际的投机者。现在那里是专门从事旅游业的西班牙连锁酒店。帅气的黑人保安，身着意大利式薄花呢制服，从容地站立在那里，充满现代韵味，使人误以为他们是酒店的旅客。房间可以通过电脑预订，用塑料房卡开关。酒店里至今仍维持原样的是位于一楼的团结沙龙（Sala Solidaridad）会议厅，这里曾经是革命者集会的地方。

朝向北面，可见加勒比海和沿海铺设的弯曲的马雷贡滨海大道，

景色还是同 40 年前一样。由一家铁路公司投资修建的弗克沙大厦（Edificio Focsa）曾经是无数拉美经济专家的居所。面积庞大的纳雄耐尔酒店（Hotel National）是巴蒂斯塔时期的灰色财产，这里曾经住满了苏联的顾问和他们的家人。维达多区的无数带有殖民时期风格的小型宅邸仍然需要粉刷其外墙；所有这些建筑仍然如初，只是人们现在用美元就可以在弗克沙的顶楼餐厅享用烤龙虾，在纳雄耐尔华丽的阳台上品尝莫吉托酒（*Mojitos*）。没有竞争者，没有新的建筑来点缀天际，也没有投资者来眷顾这个地区，狭小的停车场、小型发动机厂以及零星的户外咖啡也一如往昔。

322

然而，在一无变化的表面印象之下，在古巴人生活中延续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一个稳定因素最终彻底消逝了。支撑古巴经济和社会的支柱倒塌了。2002 年，古巴政府向公众宣布，将放弃把种植和加工蔗糖产品作为国家的经济支柱产业。156 个企业中的 71 个，即半数的制糖厂将要关闭。以前用于种植甘蔗的土地中将有一半面积要用于种植其他作物。雇佣了将近 400 000 人的制糖企业中 1/4 的工人不得不选择其他的工作。

这一决定多年前就已经提上日程。苏维埃市场的消失以及特殊时期产品的减产导致了糖制品收入的下降。1990 年，古巴蔗糖最后一次按照旧有的合作方式卖给苏联，古巴收入 48 亿美元。2002 年，蔗糖卖到国际市场后，收入不到 5 亿美元。蔗糖的产量已经从 1989 年的 800 万吨下降到 2001 年的 360 万吨。

作为岛上的主要外汇收入，旅游业已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替了糖的地位。在制糖业挣扎了几年之后，古巴政府最终得出结论，古巴制糖业再也无法维持其过去所拥有的特殊优势。国际市场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糖的替代品已经得到了发展，而且西方食品业已在推动糖的替代品的应用。古巴制糖业尤其受到来自巴西的产品影响。20 世纪 70 年代，为了生产糖酒精来代替世界能源危机中机动车所需的能源，巴西的蔗糖业极速扩展。当这种发展已经不再有利可图时，巴西的大量蔗糖进入世界市场，致使糖价下降到很低的水平，以至于很多

专家认为这种状况是永久的。糖类产品稀缺的贸易兴盛时期已经一去不返了。

古巴曾经能长期逃离现实，初期是在美国统治时期的蔗糖配额，后来则是苏联和其进行物物交换的贸易。20 世纪 90 年代，古巴被迫作出一些艰难的决定。我曾拜会古巴糖业部长乌利塞斯·罗萨雷斯·德尔·托罗将军，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罗萨雷斯·德尔·托罗是个很不寻常的人物，是卡斯特罗政府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军队的高级官员中的地位仅次于劳尔·卡斯特罗。他是马埃斯特腊山和安哥拉战争时期的老兵，也曾参与 20 世纪 60 年代委内瑞拉的游击战，还是 1989 年审判奥乔亚将军的高级执行审判官（presiding officer）。只有像他这样级别和资格的人才有能力促成这样一项剧烈的历史性变革，去劝说糖业工人接受这一改变。他现在已经 60 多岁了，看起来身体很健康，总是身着非正式的瓜亚贝拉[①]运动衫出现在重大场合。我告诉他，40 年前当我第一次来古巴时，切·格瓦拉正在强力提倡推行工业发展，以此来摆脱单一农业作物对经济的控制。我问他是否觉得现在已经完成了格瓦拉的事业。

323

将军眼睛一亮："你恰好在最后一次大的转折时期来到这里，那时候我们接到来自苏联惊人的订单，他们以从来没有过的价格来购买我们的蔗糖，比我们从前从美国获得的配额要慷慨得多。"他仔细地历数这些数字，解释说这是古巴得到的一宗极好的贸易，因此古巴加大生产，获得更高的利润。随后，20 世纪 90 年代，这些数字出现了问题。产量下降，价格走低。这一统计结果显然不利于制糖业。罗萨雷斯·德尔·托罗的工作就是出去劝说工人，向他们和他们的家人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将来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已经走遍了全国，主持了成千上万的会议。他做出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一份工作，有些人很可能还会留在制糖业。其他人可能就会从事农业里的其他新工作，还有些人可能会待业。

① Guayabera，19 世纪以后在古巴和拉美流行的一种茄克式运动衫。——译者注

第二天我去了位于阿提米丝（Artemisa）的一家已经停产的制糖厂，它位于哈瓦那西部，原是朱里奥·劳勃（Julio Lobo）拥有的13家制糖厂之一。劳勃是一位身家百万的糖业大亨，尽管格瓦拉曾要求他留在岛上，但是他还是在1960年离开了。我所遇见的人没有一个能记得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太年轻了。制糖厂像个废弃的教堂一样矗立在那里，巨型的建筑物包裹在波纹状的铁皮中，里面存放着大型的磨床和粉碎机，现在散乱地堆在那里。一股糖浆味还飘在空中，若有若无。曾有850名工人在该厂工作，另外有一个3 000人规模的村子来管理种植园。现在估计工厂的人数要缩减到350人，其余的人要接受再培训。

朱里奥·劳勃老旧的殖民地式公馆被用做培训工人的成人教育中心。我和里面的一些老师进行了交流。除了农业课程，这里还教授蔬菜和水果的种植，学生们正在学习会计、计算机、兽医科学以及语言课程。我询问了一个曾经在工厂里面做工程师的黑人老师。我问他，看到古巴历史中这样有意义的一部分消逝是否会感到伤心。“会的”，他回答道，“它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我们的家人生长在这里。但是，我们理解这是必然的。”看到宽敞、明亮的道路，他提到，将来肯定会有其他职业出现，他们的家庭还会继续生活于斯，他们还有很多的发展机遇。

历史书不是水晶球，然而，在古巴特殊的环境中，纵览500年历史的读者可能会希望有一个合理的补充说明，可以引起人们对于一个长期主题和它在将来的发展趋势的关注。人们总是会问，卡斯特罗去世后会发生什么变化，这是一个明天或者以后20年中某一天会发生的事情，对于这个问题人们通常期望有一个预见性的答案。是发生在街上的骚乱抑或是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①]？大量地向外移民抑或是来自迈阿密的入侵？持续的反抗还是美国人再次征服？

324

由于经常处于内部叛乱和外部干涉的政治形势下，古巴的历史必

① 意指非暴力的柔性革命，见本书286页（原书页码）。——译者注

然与暴力相伴。卡斯特罗带来的半个世纪的和平以及古巴人民寻求民族自决的长期传统结束了这种暴力的历史。然而，远在革命之前，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的美国对古巴事务持续的关注，不会随着卡斯特罗的去世而消失。古巴人对自由和独立的追求也不会随之逝去。

古巴曾受到3个帝国势力的入侵，但是它成功地将之驱赶出去。“我们曾遭到西班牙、美国人以及苏维埃的控制”，一位亲革命者这样告诉我，“现在我们是独立自由的。”古巴政府不再需要通过其试图建立的社会主义来判定它的存在。而是强调其长期英勇地反抗美国的民族主义抗争，这场斗争至今仍在拉美大部分地区延续。

各种各样令人震惊的武器都已经投入到这场战争中。位于老哈瓦那重建区的博物馆忽略了岛上社会主义运动时期的成就，而去赞颂西班牙的殖民主义。正式结束于1886年的种植园文化和奴隶制没有被遭到痛斥反而被浪漫化。从前聚集革命者的旅馆，现在欢迎前来拍摄繁荣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古巴旧日辉煌的外国旅游者，而阿根廷的探戈明星、墨西哥的舞者以及巴西的歌手则与美国的贩毒集团混在一起。古巴用所有西方后现代主义者的热情接受了这一“遗产文化”。在经过了10年旅游业的发展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美元后，这种有选择性的民族主义乡愁文化注定会将古巴推向资本主义的未来。

卡斯特罗是一位足智多谋的人，也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国际局势观察者，他熟知他所在大陆的历史，他比大多数人都知道将来会怎样发展。在数十年激烈的革命将许多人拖入现代经济之后，伟大的墨西哥革命的主要成就就是为国家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好了准备，古巴似乎也在走向同一条路。

与拉丁美洲那种毫无希望的标准相比，古巴已经拥有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健康的人民，但是许多古巴人厌倦了他们的自力更生的生活。就像在老哈瓦那遗产保护区内那些工艺品货摊上陈列的俗丽的纸鱼那样，他们让鱼的嘴大张，似乎在饥渴地盼望吞食大量的资本。一旦年老的最高领袖去世，资本主义就一定会淹没这个国家。这并不是过去时代的狂热革命者们所期望的结果，但是古巴愉悦的富有激情的人们，

325

在被孤立数十年之后，仍然有能力制造更多的奇迹。在过去10年的“特殊阶段”中所获得的独立的经验，可能把他们从苏联和东欧的、差到极点的、过度的后共产主义中拯救了出来。富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屈服于无法逃避的事实以及古巴人再次逐渐被引向资本主义的诱惑后，卡斯特罗也许会为他的国家尽他最后的力量。

就我个人来说，即使卡斯特罗去世，我也不希望古巴将来有任何改变。古巴已经由后卡斯特罗政府统治了多年。从1959年起，劳尔·卡斯特罗就控制着军队。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里卡多·阿拉尔孔是国家的政治领袖，他对公众舆论的变化有很高的敏感度，而且他也是长期同美国打交道的专家级的谈判高手。卡洛斯·拉吉身兼总理，控制着国家经济。菲利普·佩雷斯·罗克（Felipe Pérez Roque）是从事外交事务的高手，确保古巴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支持。正如一位令人敬仰的西方外交官对我所说的那样，这是一支可以在任何时间胜任于管理任何国家的团队。

卡斯特罗本人现在基本已经淡出公众视野。40年前，他无处不在，出现在每晚的电视上、每天的报纸上。如果你够幸运的话，他还可能出现在你所在的宾馆里。古巴绝对不会陷入苏维埃式的个人崇拜，但是如果卡斯特罗保持沉默，什么都不会发生，他的热情成为了国家的热情。他现在是一位名誉总统、年老的政客，没有他的掌控，政府一样在运行。他还是昨日的那个他，灰白的胡子，但是内心却像是一位洋溢着年轻气息、上了年纪的摇滚明星。他不再管理国家，但是他还控制着由他所创建的政府。他把自己适应于充满暴力的20世纪的口号“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选择死亡”修改为更适应于新时代和平革命的“美好的社会将会实现”。他去世的时候，古巴会发生改变；但当人们发现的时候，改变已经悄然发生。

附录 1

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在 1823 年 4 月 23 日写给时任美国驻马德里公使休·尼尔森（Hugh Nelson）的信 326

这些岛屿是北美大陆的天然附属物，它们中的一个，即几乎就在我们海岸视野范围内的那一个，从多种角度来考虑，它已经成为对联邦的商业和政治具有重要意义的目标。它居于墨西哥湾和西印度群岛的险要地理位置，位于我国南部海岸和圣多明各岛的中间，拥有安全开阔的哈瓦那港，相比我们的漫长的，却不具备那些优势的海岸线，它的产出和需求的特性，提供补给和需要大量利润和产生互利的商业回报的特性，使其对我国的利益极其重要。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毫不逊于任何与联邦结盟的国家。

的确，在该岛和我们这个国家的利益之间，无论是地理的、商业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关系都是自然形成的，历经了一段时间，现在趋于成熟。毋庸置疑的是，大约再有半个世纪的时间，吞并古巴就会成为联邦继续发展和维持完整性的必要措施……

这里，政治上的规律和现实的吸引力同时存在。如果一个苹果被暴风雨从它原来的树上打下来，它别无选择，只能落地。古巴通过武力脱离它同西班牙并非天然的关系，是无法自立的，只能投向

北美联邦，因为按照同样的自然规律，古巴也无法摆脱它所赖以生存的空间。

Quoted in Willis Fletcher Johnson, *The History of Cuba*, New York, 1920, vol. 2, pp. 261 – 262.



附录 2

《普拉特修正案》(*Platt Amendment*)[①] (1902) 327

美国总统被授权，“將古巴的政府与控制交付其人民”，因此在依照宪法在古巴成立政府后，无论是作为宪法的其中一个部分或在附录条例中，都应确定美国与古巴的未来关系，大体如下：

A. 古巴政府永远不得与任何外国势力签署将损害或有可能损害古巴独立性的条约或其他契约，也不能以任何方式授权或允许任何外国势力通过殖民、用于军事或海军目的或其他方式（的名义），来取得占领或控制的岛屿任何部分的条约或其他协议。

B. 政府不应承担或约定任何公共债务和偿付利息，亦不能为了偿付前面所说的债务而建立合理的偿债基金规定，造成岛上的正常年度收入在支付了政府的常规费用后，出现短缺状况。

C. 古巴政府同意美国可行使干预维护古巴的独立，以维持一个适当的为保护生命、财产和个人自由的政府，并履行《巴黎条约》施加给美国对于古巴政府承担和开展的义务。

---

① 此处是作者引用的《普拉特修正案的全文》，但其最后一句话：“VIII. 古巴政府将在未来保证上述与美国的协定永久在条约中有效”一句作者未有引用。见维基百科的该法案翻译文字 http://zh.wikipedia.org/zh/%E6%99%AE%E6%8B%89%E7%89%B9%E4%BF%AE%E6%AD%A3%E6%A1%88。2010-11-6。

D. 美国在古巴军事入驻期间的这一切行为均被申请批准和确认，
328 且所有合法的权利由此予以保留和保护。古巴政府将执行，并尽可能提供已被双方共同商定为必要的岛内城市卫生计划或其他计划，以期阻止可能再次发生的流行病和传染性疾病，从而确保对古巴人民和商业的保护，以及保护美国南部商业港口和居民情况。

E. 松树岛应在既定宪法中的古巴疆界中予以略去，其所有权由未来条约调整。

F. 为了能使美国保持古巴的独立，并保护其人民，以及出于自己的国防需求，古巴政府将出售或租借给美国总统将要商定的所需的煤炭或建立海军基地的某些特定地点。

附录 3

329

1996 年《赫尔姆斯 - 伯顿法》（*Helms - Burton Act*）

《古巴自由与民主声援法》（节选 PL104—114）

该法案在于寻求对古巴卡斯特罗政府进行国际制裁，计划支持在古巴建立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同时还有其他目的。

该法案由美国参众两院制定。

标题Ⅰ——加强对卡斯特罗政府的国际制裁

标题Ⅱ——协助建立自由独立的古巴

第 205 款　决定一个过渡政府的必备条件和因素（A）

必备条件：按照本法案的意图，在古巴建立的过渡政府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 所有的政治活动必须合法化；

2. 释放所有政治犯，允许相关国际人权组织前往监狱调查；

3. 解散现有隶属古巴内政部的国家安全部门，包括革命防务委员会和快速反应旅；

4. 承诺公众可以组织自由、公平的选举来建立新政府：

（a）该政府在过渡政府存在 18 个月内要按时成立；

330

（b）新政府可以有多种独立的政党参加，并且按照分配的时间和机会，他们都有平等接受媒体采访的权利（包括电台、电视台或其他

电讯媒体）；并且

（c）这些活动要在国际公认的观察员的监督下进行，如美洲国家组织，联合国以及其他选举监督机构；

5. 停止对马蒂（Marti）电台和电视台报道的干扰；

6. 对公众承诺并公开下列进程：

（a）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

（b）作为《联合国人权宣言》签署国，尊重国际认可的人权和《联合国人权宣言》中阐明的基本自由；

（c）允许建立国际劳工组织于 1987 和 1998 年大会上所阐明的独立贸易联盟，允许建立独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社团；

7. 不包括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

8. 给予恰当地保证，确保古巴人民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补贴。

（B）额外因素：除（A）中条款外，在考察古巴过渡政府是否掌权时，美国总统还要考虑到该政府达到的程度：

1. 明显地从一个共产主义集权的独裁政府过渡到代议制的民主政府；

2. 已经向公众承诺，并确保以下过程的透明性：

（a）确保公民演讲自由和出版自由权利的有效实行，这包括允许私人拥有媒体及在古巴运营的电讯机构；

（b）允许出生在古巴的人恢复其公民权，并且回到古巴；

（c）确保私人财产权；

（d）采取相应的步骤将古巴政府在 1959 年 1 月 1 日之后从美国公民（和那些美国公民拥有 50% 或以上股份的实体）手中剥夺的财产归还给美国公民和实体，或者根据财产的数量来给予美国公民和相关实体予以补偿；

3. 已经引渡或交出了所有那些在美国犯罪并被美国司法部通缉的罪犯；并

331 4. 允许在整个古巴安置独立和不受干扰的国际人权监督员。

第 206 款　建立民选政府的必备条件

根据本法案的目标，古巴民选政府除了符合第 205（a）款法案的要求，它还需要符合：

1. 自由公平选举的结果：

（a）在国际选举观察员的指导下产生；

（b）在选举中

（ⅰ）反对党有充足的时间来为选举做准备和论战；

（ⅱ）所有的候选人都有资格在媒体露面；

2. 表明了对古巴公民的基本公民自由和人权的尊重；

3. 在本质上开始了向以占有和使用财产权利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系的过渡；

4. 承诺修改宪法，保证古巴公民享有基本的自由公平选举权、基本的公民自由和人权；

5. 建立独立司法体系的过程要透明化；并且

6. 将古巴政府在 1959 年 1 月 1 日之后从美国公民（和那些美国公民拥有 50% 或者超过这个数字的实体）手中剥夺的财产归还给美国公民和实体，或者按照国际法标准和实践，根据财产的数量来给予美国公民和实体予以补偿，这一过程必须透明。

标题 III——保护美国公民的财产权

第 301 款　裁决

国会做出如下裁决

1. 个人享有拥有和享用其财产的基本权利，这是载入美国宪法的重要权利。

2. 古巴政府非法没收或剥夺了属于美国公民的财产，并以牺牲合法拥有者的利益来继续使用这些财产，破坏了国家间的关系，破坏了商业和经济发展的自由往来。

3. 自 1959 年菲德尔·卡斯特罗掌权以来

（a）他已经践踏了古巴人民的基本权利；

332

（b）他通过独裁统治，已经没收了

（ⅰ）数百万古巴公民的财产；

（ⅱ）成千上万的美国公民的财产；并且

（ⅲ）数千因为受到迫害而逃到美国避难的公民的财产，他们最后自然地成为美国公民。

4. 古巴政府平等地尊重古巴人民和他国人民财产权符合古巴人民的利益。

5. 古巴政府为外来投资者在购买管理权，或者加入那些使用了一些从美国公民手中没收的财产和基金建立的合资企业中平等获益的机会。

6. 这种从非法没收财产中获益的勾当满足了古巴政府急需的利益，包括硬通货、石油、生产性投资和专门技术，也因此破坏了美国的对外政策。

（a）当事实已经证明，卡斯特罗政府无力承受来自国际上的经济压力之时，美国通过全面的经济禁运压力来推动古巴政府建立民主体制。

（b）保护被古巴政府非法没收财产的美国公民要求的权利。

7. 美国国务院通告其他政府，如果将古巴所非法没收的财产转移到第三方，将会增加将财产归还原主的难度。

8. 当前存在的国际司法体系，对于错误地没收财产，以及在牺牲其所有者权益的情况下，使用被政府和私人实体非法没收的财产非法获益，缺少有效的修正方法。

9. 国际法认定，一国有能力针对曾经，或者可能对其国内发生重大影响的外部边疆制定法律。

10. 美国政府有义务为其公民提供保护，防止其财产被外国或其公民非法没收，这里包括提供私人救助。

11. 为了阻止非法没收财产，那些被非法没收财产的美国受害公民将会得到联邦法院的司法救助，联邦法院将拒绝承认商人们从卡斯特罗非法没收的财产中的任何收益。

深入阅读指南

360

外部世界对古巴历史和社会的兴趣最初来自 19 世纪初德国旅行家、科学家、作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其著作的最新版本是 *The Island of Cuba*：*A Political Essay*, published by Markus, Wiener, Princeton, 2001。

美国人对古巴岛的兴趣始于他们 1898 年入侵时期，他们的一些早期著作仍具有很大的价值：几乎 Irene Wright 所描写或者编写的所有作品都非常有价值：*Cuba*, New York, 1910；*The Early History of Cuba*, 1492—1586, New York, 1916；"Rescat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uba, 1599—1610",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III, no. 3, August 1920；"The Dutch and Cuba, 1609—1643",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IV. no. 4, November 1921；*Spanish Documents converning English Voyages to the Caribbean*, *1527—1568*, London, 1929.

此外，还有 Willis Hetcher Johnson, *The History of Cuba*, New York, 1920；Chales Chapman, *A History of the Cuban Republic*, New York, 1927；以及 Ramiro Guerra Sanchez, *A History of Cuban National*（Havana, 1959）的英译本。

Hugh Thomas 的 *Cuba*, *or the Pursuit of Freedom*（1st edtion, London, 1971；2nd edition, London, 2001）是一部时间上涵盖 1762—1970

年，内容上气势恢宏、具有不可替代性的通史。

需要给予特别关注的是路易斯·佩雷斯（Louis Pérez）的大量的、涉及古巴社会方方面面的著作，它们是：*Intervention, Revolution, and Politics in Cuba, 1913—1921*, Pittsburgh, 1978；*Lords of the Mountain, Social Banditry and Peasant Protest in Cuba, 1878—1918*, Pittsburgh, 1989；*Cuba and the US: Ties of Singular Intimacy*, Atlanta, 1990；*The War of* 1898；*The United States and Cuba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Chapel Hill, N. C. 1998；*Cuba: betwee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xford, 1995；*Cub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thens, Ga. 1997；Winds of *Change: Hurrican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ineteeenth – century Cuba*, Gainesville, Fla., 2000；*On Becoming Cuban, Identity, Nationality, and Culture*, New York, 1999。

361 对于西班牙读者来说，李维·马雷罗（Levi Marrero）的著作是不可不读的，它们是，*Cuba: Economia y Sociedad*, 15 vols, Madrid, 1978。同样有价值的，如果你要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作品的话，可参阅 *Historia de Cuba*, a collective work by the Cuban Instituto de Historia in Havana；Vol. I. *La colonia, evolución socio – economic y formación nacional*, Havana, 1994；vol. II *Las Luchas por la independencia nacional y las transformaciones estructurales*, Havana, 1996；and VoL III, *La Neocolonia, organización y crisis, desde* 1899 *hasta* 1940, Havana, 1998。

卡斯特罗及其革命的历史为所有的图书馆提供了丰富的收藏资料。卡斯特罗最有价值的传记是：Tad Szule, *Fidel: A Critical Portrait*, London, 1987；Sebastian Balfour, *Castro*, London, 1995；Robert Quirk, *Fidel Castro*, New York, 1993；Peter Bourne, *Castro: Abiography of Fidel Castro*, London, 1986；Volker Skerka, *Fidel Castro: Abiography*, Oxford, 2004；Leycester Coltman, *The Real Fidel Castro*, New Gaven and London, 2003。

关于切·格瓦拉的传记市面上已经有很多种，但是最有价值的还

是乔·李·安德森（Jon Lee Anderson）的作品 *Che Guevara*：*A Revolutionary Life*，London，1997；部头最大的当属 Paco Ignacio Taibo，*Guevara*，*Also Known As Che*，New York，1997；最带讥讽味道的是 Jorge Casta·eda，*Compa·ero*，*The Life and Death of Che Guvara*，New York，1998；另外也很有价值的是，Henry Ryan，*The Fall of Che Guevara*：*A Story of Soldiers*，*Spies*，*and Diplomats*，Oxford，1998。

本书全面参考的著作已经列在脚注中，但是下列出版于过去 20 年的著作为笔者提供了极好的借鉴：

Azicri，Max，*Cuba Today and Tomorrow*，*Reinventing Socialism*，Gainesville，Fla. 2000.

Casanovas，Joan，*Bread or Bulets*：*Urban Labour and Spanish Colonialism in Cuba*，*1850—1898*，Pittsburegh，1998.

Chaffin，Tom，*Fatal Glogy*：*Narciso López and the First Clandestine US War againt Cuba*，*Charlottesville*，Va，1996.

Ferrer，Ada，*Insurgent Cuba*，*Race*，*Nation*，*and Revolution*，*1868—1898*，Chapel Hill，N. C.，1999.

Gleijeses，Piero，*Conflicting Missions*：*Havana*，*Washington*，*and Africa*，*1959—1976*，Chapel Hill，N. C.，2002.

Helg，Aline，*Our Rightful Share*，*The Afro - Cuban Struggle for Equality 1886—1912*，Chapel Hill，N. C. 1995.

Howard，Philip，*Changing History*：*Afro - Cuban Cabildos and Societies of Color in Nineteenth Century*，*Baton Rouge*，*La.*，1998.

Ibarra，Jorge *Prologue to Revolution*：*Cuba 1898—1958*，London，1998.

Jatar - Hausman，Ana Julia，*The CubanWay*：*Capitalism*，*Communism and Confrontation*，West Hartford，Conn.，1999.

Kapcia，Antoni，*Cuba*，*Island of Dreams*，Oxford and New York，2000.

Kutzinski，Vera，*Sugar's Secret*：*Race and the Erotics of Cuban Na-*

tionalism, Virgina, 1993.

362 Moore, Robin D., *Nationalising Blackness, Afrocubanismo and Artistic revoliution in Havana, 1920—1940*, Pittsburgh, 1997.

Morley, Morris, and Chris McGillion, *Unfinished Business, America and Cuba after the Cold war*, Cambridge, 2002.

Pérez – Stable, Marifeli, *The Cuban Revolution: Origins, Course and Legacy*, Oxford, 1993.

Schwarz, Rosalie, *Lawless Liberatores, Political Banditry and Cuban Independence*, Durham, 1989.

Scott, Rebecca J., *Slave Emancipation in Cuba: The Transition to Free Labour, 1860—1899*, Princeton, 1985.

Sweig, Julia, *Inside the Cuba Revolution: Fidel Castro and the Urban Underground*, Cambridge, Mass., 2002.



索　　引

① 正文中提到此人时为 Arkins，此处取正文内的拼写方法。——译者注

插图来源

1. 国家音乐博物馆（Museo Nationale de la Música

2. 古巴历史研究所，*Historia de Cuba*：*La Colonia*，1994）

3，4，5，9，10，12，14，15，16，美国国会图书馆（华盛顿特区）友情提供，华盛顿特区）

6. 古巴历史研究所，*Historia de Cuba*，*Las Luches*，1996）

7，8，Henry Houghton Beck，*Cuba's Fight for Freedom and the War with Spain*，1898

13. Bulletin of the Free Museum of Science and Art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May 1902.

17. Getty images.

18. PA Photos.

译者说明

本书翻译主要责任人徐家玲，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教授，博士生导师。

东北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王向鹏、马锋，硕士生李强、贾继玉参与了本书的部分翻译工作，并做了大量具体而细致的工作。特此表示感谢。

联系方式：长春市人民大街5268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邮编：130024

E-mail：xujl270@nenu. edu. cn

联系电话：0431-85989379；13304319331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古巴史=CUBA A NEW HISTORY
作者=作者:理查德·戈特著；徐家玲译
页数=504
SS号=13350046
出版日期=2013.07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